

承继周太祖、周世宗，历经宋太祖、宋太宗，至宋真宗时，宋朝的制度、政策已逐渐趋于稳定。由科举步入仕途的士大夫获得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权力，普通老百姓也获得了更加自由的身份，中国历史告别了以士族政治为主导的中古时代，从此进入宋元明清的“近世”时代。

“缔宋”缔造的不仅是320年的宋朝，更是未来近900年里中国历史的基本逻辑。

——刘路

上架建议：历史·畅销
ISBN 978-7-5773-1330-6
9 787577 313306
定价：98.00 元

·005·

缔宋

走出五代十国 再造中央王朝
缔造九百年中国历史的基本底色

刘路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笔名刘史君，资深编辑、历史研究者、作家。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大众编辑部主任，北京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方向为魏晋史、宋史。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北京法国文化中心（SCAC-IFC）“讲给孩子的中法历史”系列讲座主讲嘉宾。已出版《诸葛亮和他的时代》《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这样好读的历史·宋代的繁华》《细读两宋三百年》《清波寻宋》《为孩子解读〈资治通鉴〉（五代十国卷）》《史家胡同循迹》等专著，编有《三国志集释稿》。编剧作品有纪录片《中华史记》。主持或承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书法编·清代卷》《中国革命纪念设施志·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卷》等国家级出版项目。

出品：品雅文化 PINYAWENHUA

交流投稿：rhett1990@163.com

本书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书城，

及线上各大电商平台均有销售。

締宋

刘路 著

再造中央王朝



郑州大学出版社

缔宋

刘路◎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缔宋 / 刘路著. -- 郑州 :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25.
12. -- ISBN 978-7-5773-1330-6

Ⅰ. K244.07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RC9960号

缔宋
DI SONG

策划编辑	郜　毅	封面设计	iggy
责任编辑	王孟一	版式设计	刘　艳
责任校对	魏　彬	责任监制	朱亚君
书名书法	养心殿长		

出版发行	郑州大学出版社（http://www.zzup.cn）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椿路11号（450001）
发行电话	0371-6696607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 230 mm　1/32
印　　张	19
字　　数	493千字
版　　次	202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73-1330-6　　定　　价　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录

序章　乱世序曲

一、乱世中的赵氏家族　003
二、草根儿逆袭的时代　018
三、澶州兵变，黄旗加身　028
四、血战高平　034

第一章　显德风云

一、五代最强禁军的诞生　049
二、三征淮南　062
三、北伐幽燕的遗憾　088

第二章　陈桥兵变

一、谁来管枪　105
二、箭在弦上　129
三、天命所归　137

第三章　大宋开国

一、稳住人心，京城肃静　161
二、逼反二李，藩镇称臣　171
三、杯酒释兵权　199
四、收复荆湖与湖南改革　211

第四章　内斗外争

一、幕后的京尹　229
二、台前的相公　246
三、反击的官家　259
四、六十六天平蜀　270
五、竹篮打水一场空　282
六、“宋挥玉斧”的传说　298

第五章　再造中央

一、实现削藩三策　307
二、号召读书与宽仁政风　326
三、新经济政策　342

第六章　威震寰宇

一、北汉还是南汉？　355
二、最后一次亲征　367
三、大宋皇威浩荡　386

第七章　烛影斧声

一、中书外，权相落马　413
二、卧榻侧，岂容他人　435
三、雪夜中，烛影斧声　464

第八章　太平兴国

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487
二、重归一统　507
三、太平兴国　529

附录　547
参考文献　575
后记　597

序章

乱世序曲

一、乱世中的赵氏家族

幽州镇的赵氏家族

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十一日，一辆驴车正飞奔在定州城外。车上的宋太宗赵炅早已被颠了个七荤八素，他一边按着大腿上的一片血迹，一边咬着牙催促着车夫用力抽打驴背，恨不得这毛驴四蹄生烟，下一秒就飞入定州城。

五天前，太宗还在幽州城下挥斥方遒，却没想到一战而溃。要不是这头毛驴带他迅速逃离战场，他早就做了契丹人的阶下囚。

在两宋300多年的历史上，这是大宋皇帝唯一一次以现任皇帝的身份亲征幽州。从此，收不回的幽燕成为宋人解不开的心结，也成为宋朝缔造过程中无可挽回的遗憾。

在逃离幽州的那一刻，宋太宗并没有意识到，有生之年，他再也无缘踏上这片让他放不下的土地。

就像六十年前，他的父亲赵弘殷一样。

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炅（曾用名赵匡义、赵光义[1]）兄弟，一个生在洛阳，一个生在开封，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但他们的祖籍却在河北。

根据宋朝官方认定，赵氏皇族祖籍涿郡。可唐宋时期，从来就

[1] 据《宋史·太宗纪一》，太宗“初名匡义，改赐光义”。“义”字的繁体字为“義”，因此“乂”字不应是“義”字的讹写。

没有一个叫作涿郡的行政区。尽管时人常以涿郡作为涿州的别称，[1]但在官方记录中用一个别称来登记籍贯，实在不像话。一种可能是，宋朝皇族将祖先追溯到西汉名臣赵广汉，由于赵广汉是西汉涿郡人，赵宋皇室理所当然地自称涿郡赵氏。

另一种观点认为，赵宋皇帝的祖籍在保州。至迟在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时，赵氏家族已在清苑县生活，因清苑县在北宋升为保州，故有保州赵氏之说。

其实，这些细枝末节对历史的走向并无影响。清苑县在唐末隶属莫州，莫州与涿州同归作为藩镇的幽州镇管辖。因此，无论祖籍是涿郡还是保州，赵氏家族都植根于幽州镇，基因中有着浓烈的幽州特色。

幽州北控燕山，东扼榆关，自古就是中央王朝威慑东北的边防重镇。唐玄宗时，曾在边疆设置十大军区，以节度使作为军事长官，幽州镇便是其中之一。

天宝十四载（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人安禄山在幽州（时称范阳郡）发动叛乱，掀起“安史之乱”。在平叛过程中，节度使制度逐渐从边区引入内地。一方面，唐廷因无力彻底消灭安史旧部，只好同意其归附，并将他们安置在河北做节度使。另一方面，河北的节度使实力雄厚，常与朝廷分庭抗礼。为了对付这些安史旧部，唐廷只好在境内广设节度使，控制军事要塞或经济命脉。这样，听话的节度使与不听话的节度使势力犬牙交错，渐渐形成平衡，唐朝也因此又续了140多年的命。用宋人尹源的话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节度使能够雄踞一方，不仅因为他们手握重兵，更因为他们

[1] 如《唐故涿州司马金紫光禄大夫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次讳述□□回车，二宰大邑，终于涿郡归义县。”此处的涿郡即明确指涿州。

身兼数职。通常，节度使还兼任观察使、支度使、营田使等使职，由此获得辖区内的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节度使的军区，与观察使的监察区，最初都称为“道”。安史之乱后，由于节度使常常兼领观察使，两种辖区逐渐合而为一，成为地方的一级行政建制，这便是藩镇，它们被称为某某军或某某镇；藩镇的长官简称为藩帅、节帅（节度使）或廉帅（观察使）。

幽州地区的藩帅，全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简称幽州节度使或卢龙节度使；其藩镇常被称为幽州镇、卢龙镇。幽州镇辖有幽、蓟、涿、檀、顺、平、营、瀛、莫、新、妫、儒、武十三州，这些州统称为幽州镇的“支郡”，长官为刺史。其中，作为藩镇治所的幽州称为会府，会府的刺史例由节帅兼任。各州之下辖有若干县，长官为县令。

在中晚唐时期，生于幽州镇、仕于幽州镇的赵氏家族，便是通过县令这一官职被载入史册的。

涿郡赵氏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人物是赵匡胤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赵朓。他是一个读书人，做的都是文官，先后在幽州镇内担任永清、文安和幽都三县的县令。

据《隆平集》记载，赵朓“以儒学显”，其子赵珽“少博学，有时誉”，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雅尚儒素”。似乎赵氏家族是一个颇有文化底蕴的书香世家。其实，对这些文字我们不必太认真，因为《隆平集》成书于北宋中期，难免有宋臣缘饰之嫌。“显”和“时誉”多半有水分。

赵氏家族虽然没有什么文化成就，但重视文化传统却大体为事实，日后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都酷爱读书，具备基本的儒学素养，就是最好的证明。

既然是读书人，为什么赵朓不去唐廷考个功名，而甘愿留在幽州镇做一辈子县令呢？

原来，唐朝的科举制度尚处于肇建阶段，不仅考试内容对士族有利，而且取士名额少，作弊严重，甚至即便考中了进士也很难做官。大多数时候，它更像是士族内部竞争的工具。因此，先在藩镇做节帅的幕僚或地方官，就成为很多读书人初入仕途的选择。

幽州镇的情况更为特殊。它与同在河北的成德镇、魏博镇合称“河朔三镇”，镇内高度自治，不仅官员自行任免，税赋不上交唐廷，而且连节度使的选立也往往由藩镇内部决定，朝廷几乎插不上手。而作为“安史之乱”的策源地，幽州镇的独立性更强。甚至在幽州人眼里，安禄山、史思明都是不世出的大英雄，被尊称为“二圣”。

由于常年的隔阂，唐廷对幽州镇有偏见，幽州人也对朝廷不以为然，加之从藩镇入仕途的传统，赵胐一直留在幽州镇做县令，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

然而，赵胐实在算不上什么起眼的人物。兵荒马乱之际，藩镇常在县里设置屯驻军队的“镇”，统领镇中军队的长官叫镇将。镇将由节度使的亲信将领担任，经常侵夺县令的权力，有时甚至凌驾于县令之上。

尽管如此，赵胐的最后一任官职还是透露出积极的信号。幽都县是幽州城的两个附郭县之一，相当于今天省会城市内的核心区。在节度使眼皮子底下工作，这多少给了赵氏家族一点机会。

赵胐的儿子，也就是赵匡胤的曾祖父赵珽，仍然在幽州镇中做官，“历藩镇从事，兼御史中丞”。藩镇从事，是幽州节度使幕僚的统称，究竟是哪种幕僚，就不得而知了。这般模糊的记载，暗示着赵珽的职位无关紧要。

有意思的是“兼御史中丞”。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曾有不少人据此认为，赵珽在长安做了大官。

其实不然。这里的兼御史中丞叫作“兼宪衔”。按唐朝的官制，赵珽的“从事”和节度使一样，都是“临时工”，它只说明你

干的是什么工作，却体现不出你的身份级别。因此，大到节度使，小到赵斑，都需要兼一个其他的官职来表明身份，兼宪衔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只是虚衔，但兼御史中丞的级别相当高。如果是地方官，至少也要做到州刺史；如果是节度使的幕僚，至少要做到高级文职节度判官，或者高级武职兵马使，才有资格兼御史中丞。更有甚者，有的节度使至死都没混到兼御史中丞的级别。

鉴于史书记载阙如，我们实在难以断定，究竟是赵斑只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从事”，“兼御史中丞”是后世子孙给祖宗脸上贴金；还是他真的做到了握有实权的高级幕僚。[1]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赵斑的儿子，也就是赵匡胤的爷爷赵敬，真正让赵氏家族扬眉吐气了一把。

赵敬年轻时就“慷慨有大志”，那时虽然还没有步入仕途，却受到清苑县人刘正的青睐。刘正，一名刘昌，后来在晋王李存勖手下做到平州刺史、幽蓟垦田使。由此推论，在唐末的幽州镇，刘正应该已经有一定地位。刘正认为赵敬器宇不凡，是“非常人”，早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便把女儿嫁给了他。

在刘正的扶持下，赵敬平步青云，先后在幽州镇内担任营州、蓟州、涿州刺史。

与在县中设镇类似，唐末藩镇也常在各州州城和险要之地设“军”，用于屯驻军队，长官为军使。在幽州镇，州城的军使往往由州刺史兼任。比如蓟州刺史，例兼静塞军使。因此，尽管史料中

[1] 也有人认为唐末五代官制混乱，藩镇一般幕僚，甚至军中小头目，都可以获得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的“兼宪衔”。赵斑兼御史中丞就属于这种“滥赏”。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等。”然而，从文献、墓志、碑刻看，似乎没有军中小头目兼御史中丞的实例。洪迈为两宋之际时人，所记也颇为笼统，或有夸张之嫌。

未提及，但赵敬绝不仅仅掌管民政，而是将民政和军政大权握于一手，而营州、蓟州都是边关前线，赵敬坐镇于此，必然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

如果说，在赵胱和赵珽时代，涿郡赵氏还是一个重视文化教育的下层精英之家，那么到赵敬时，赵氏家族在幽州镇崇胡尚武之风的影响下，俨然成为允文允武的新兴中层精英家族。加之幽州镇又是河朔强藩，一个蒸蒸日上的家族在乱世中抱上一条粗壮的大腿，其前途不可限量。

可谁也没想到，大腿突然抽筋了。

晚唐时期，随着黄巢之变爆发，唐朝的统治秩序彻底崩塌，全国各大藩镇间的平衡被打破，激烈的兼并战争也随之而来。而幽州镇长期以来不热衷对外扩张，因此错过了扩充实力的最佳时机。

直到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八月，刘仁恭篡夺了幽州节度使之位后，才改变策略，吞并了比邻的横海军。然而，在唐末混战中，北方已经形成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争霸的局面。幽州镇夹在两大雄藩之间，逐渐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后来，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又篡夺了节度使之位。此人暴戾残忍、狂妄自大，于后梁乾化元年（911）八月自立为帝，定国号为燕，改元应天，史称桀燕。随即，刘守光准备发兵，吞并邻近的义武军。

对此，担任幽州参军的瀛州景城人冯道深感不妥，仗义直谏。彼时的冯道还是个30岁的热血青年，远非后来那个老油条不倒翁。然而，冯道换来的却是被刘守光投入大狱，要不是有人营救，恐怕会死在里面。重获新生的冯道知道刘守光难以成事，便越过太行山，投奔李存勖去了。

不看好刘守光的，还有幽州城里的另一个赵氏家族——宋初名相赵普的家族。

这是一个生活在幽州蓟县的小吏世家。蓟县与幽都县一样，都是幽州城的附郭县。大约在刘仁恭统治时期，赵普的曾祖父赵冀出任三河县令，与此前曾任幽都县令的赵胱地位相当。然而，赵胱的孙子赵敬已做上蓟州刺史，而赵冀仍不过是蓟州境内的一个县令。两家的处境已然拉开距离。

或许是不看好刘仁恭，又或许是为了另谋出路，赵冀的儿子赵全宝、孙子赵迥都没有留在幽州镇任职，而是远走河朔境内的魏博镇，分别做了澶州司马和相州司马。

冯道与赵全宝确实有先见之明。在做了两年皇帝后，刘守光就被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存勖灭掉，刘氏的统治二世而亡，在150年间翻云覆雨的幽州镇也从此丧失了自治地位。还没来得及脱身的赵敬家族，随即卷入历史洪流，差一点就翻不过身来。

旧时代的落幕

处于上升期的赵敬一家急遽衰落，可能与幽州镇被吞并有直接关系。据《资治通鉴》记载，晋天祐九年（912）李存勖发兵征讨幽州镇，先后攻克涿州、莫州和瀛州，出降晋军的瀛州刺史正是赵敬。

但这里有个疑点。在宋朝，赵匡胤的庙号是太祖；他的父亲赵弘殷、爷爷赵敬被追尊为帝，庙号分别是宣祖和翼祖。《资治通鉴》在写到五代时期赵匡胤和赵弘殷的事迹时，会称其为“太祖皇帝”“宣祖皇帝”，同样道理，司马光应称呼赵敬为“翼祖皇帝”，万万不敢大不敬地直呼“刺史赵敬”。因此，瀛州刺史赵敬到底是不是宋翼祖赵敬，学者们莫衷一是。

如果瀛州刺史赵敬另有其人，那么宋翼祖赵敬此时在哪里呢？

根据宋朝官方记载，赵敬的最后一任官职是涿州刺史；而晋军

进围涿州时，出降的刺史名叫刘知温。显然，刘守光覆灭时，赵敬已经不在涿州刺史任上，而且已然消失在史籍之中。

一种可能是，赵敬已经去世。但鉴于他的老丈人刘正仍然活跃在幽州镇，从后来赵敬之子赵弘殷离开幽州镇的时间和大体年龄推算，此时的他当已有十余岁，完全可以在姥爷的扶持下步入仕途，哪怕是个芝麻小官。

可赵弘殷并没有出仕，那便有了另一种可能——赵氏家族无法继续在幽州镇做官，包括赵弘殷，也包括赵敬。赵敬不是死于任上，而是辞职或被罢免。

因为赵氏家族可能摊上大事了。

这事还要从唐哀帝天祐四年（907）说起。这年四月，预谋篡位的梁王朱温对幽州发起进攻。由于刘仁恭正在大安山中的别馆里寻欢作乐，幽州城一时无备，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刘守光率军来援，进驻幽州，一举击退梁军。

死里逃生的刘仁恭还没来得及庆祝，就立即沦为阶下囚。原来，刘守光不仅在幽州城里自称节度使，还发兵攻打大安山。刘仁恭不敌，做了儿子的俘虏，被关押在幽州城中。到了十一月，义昌军节度使刘守文在沧州起兵，讨伐占据幽州的弟弟刘守光，结果却在开平四年（910）正月被刘守光击败。刘守文被杀，他的儿子刘延进避难南逃。

十多年后，刘延进夫妇生下一子刘光义（后为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名刘廷让）。而这位刘光义，恰恰是北宋开国时期的重要将领，不仅深受宋太祖赵匡胤的信任，更是传说中赵匡胤的拜把子兄弟。赵匡胤与刘光义的亲密关系，不知是否折射出当年赵敬与刘守文的关系。如果两家真的世代交好，那么刘守文的倒台，必然预示着新兴的赵氏家族走向衰败。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刘守光在位时，在幽州镇的政治舞台上，再也找不到赵氏家族的影子。

当然，这一切纯属推测。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在赵敬去世或去职之时，赵弘殷兄弟已经生活在莫州清苑县丰归乡东安村。这里是他的姥爷刘正与母亲刘氏的故乡。有刘正这棵大树庇护，赵氏家族最初还算安稳。后来，赵弘殷的兄弟们一直留在这里繁衍生息，比如赵匡胤的堂兄弟赵匡颖、赵匡衡就生长于此，他们的后人赵加超在宋真宗时以宗室身份获得优待。但在此之前，赵加超早已成为一介平民百姓，与赵敬昔日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

据说赵敬去世后就葬在清苑县，这件事在北宋后期获得了宋室官方事实上的认可，可宋朝的官方文件仍称赵敬葬在幽州。无论如何，赵敬的生命终结于幽州镇。他的辉煌，涿郡赵氏的辉煌，就此化为泥土，尘封于幽土之下。

旧时代落幕了，但乱世远远没有结束。

风雪杜家庄

晋王李存勖吞并幽州镇后，刘正出任晋国的平州刺史。由于换了新的统治者，幽州镇的政治格局面临洗牌。或许出于这个原因，刘正没有急于援引赵弘殷入仕。可不久以后，刘正就去世了。赵氏家族因此断了在幽州镇内的仕途，不得不另寻出路。

大约在晋天祐十四年（917）前后，赵弘殷离开莫州清苑县，就近来到与之接壤的定州。

这是赵氏家族四代之中，第一次离开熟悉的幽州镇，到外镇来讨生活。奈何出门不顺，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拦住了赵弘殷的去路。彼时的赵弘殷一定会因为“出师不利”而颇多感慨，他当然不会想到，日后他的三儿子会以皇帝之尊，站在同样的地方，发出同样的叹息。

雪越下越大，在彻骨的寒风中，赵弘殷躲到一座大庄院的门

前。他一面抱紧身子取暖，一面不忘在心里感谢大院的房檐——虽然不避风，但至少没让自己变成雪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老天爷却丝毫没有歇口气的意思。饥寒交迫的赵弘殷开始打起冷战，他几次抬起被冻僵的手，想要敲开大院的门，可终究还是在接触院门的一刹那，哆哆嗦嗦缩回了手。

幽州镇刺史之子，怎么混到这般田地！

可面子终究输给了肚子。这次，赵弘殷终于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再次抬起手来，想要讨口饭吃。不料突然传来“吱呀”一声，庄院的侧门打开了。只见一名家丁偷偷摸摸跑了出来，往他手里递上热乎乎的干粮。

赵家祖上一定是积了德，赵弘殷遇到了好心人，这才没有在路边成为“冻死骨”。

此后，好心的家丁自作主张，收留了赵弘殷，每天都偷偷给他拿来饭菜。赵弘殷自然也不会吃白食，帮家丁做一些力气活。家丁见他人高马大、相貌奇伟，人又勤快，便跑去向庄院的主人打报告，希望能把赵弘殷留下来。老庄主一见，对赵弘殷甚是喜爱。攀谈之际，赵弘殷不免要把家世诉说一番。老庄主当即决定，把赵弘殷留在庄院。

此地名叫杜家庄，庄院主人名叫杜爽。有了栖身之所，赵弘殷一面在院中打杂，一面盘算着日后的去路。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才过了几个月，杜爽就宣布了一个让他十分震惊的决定：做我的女婿吧！

遇到好心人，不被冻死饿死，这已经是赵弘殷的福分了，居然还能天降姻缘！

在连皇帝都被视如草芥的五代时期，民风却空前淳朴开放，门阀门第观念极为淡薄。女方家族择婿，看重的往往不是家庭背景，而是男方的能力、前途。赵弘殷勇武而不失文雅，勤快又努力上进，再加上赵氏家族曾经的辉煌，这让杜爽喜上眉梢。

杜爽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在八个孩子里，长女杜氏排行第四，人称“四娘子”。杜四娘已过笄年，也就是过了15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在杜爽的主持下，赵弘殷做起了上门女婿。杜家庄前有一湾水塘，人称“双龙潭”，后人附会说这预示着赵弘殷与杜四娘将会生下两个天子。

关于赵弘殷入赘这段历史，见于北宋中期名臣范镇的《东斋记事》。据范镇说，这段“八卦”是工部尚书刘涣告诉自己的。

刘涣的父亲叫刘文质，是赵弘殷之母刘氏的从孙。刘文质的父亲刘审琦在宋初的平叛战争中战死，那时刘文质尚幼，赵匡胤便将他母子接入宫中生活。不仅如此，刘家还一直保存着与赵弘殷、赵匡胤父子的五函书信，后来刘文质将其进献给了宋真宗。刘涣从父亲口中得知了“风雪杜家庄”的佳话，又将它讲给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范镇。如此，我们才有机会重见那段风雪奇缘。

在中国古代，上门女婿的社会地位很低。赵弘殷入赘杜家庄，足见此时的赵氏家族已衰落到何种程度。如果没有乐善好施的杜氏家族，历史恐怕就此改写。日后赵宋得了天下，杜氏一门在宋初享有极高的政治待遇。除了大哥杜审琦、二哥杜审玉在宋朝建立前就已去世外，杜四娘的三哥杜审琼及弟弟杜审肇、杜审进，都在宋初政坛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虽然做了上门女婿，但赵弘殷并不想一辈子抬不起头。定州是义武军节度使、北平王王处直的会府。但义武军实力弱小，赵弘殷并没有在此长留的打算。

不久，赵弘殷离开定州，投奔了成德军节度使、赵王王镕，路费和打点的费用当然来自杜爽的资助，赵弘殷的大舅哥杜审琦很可能与他同行。成德镇与幽州镇一样，同属河朔三镇。这时的成德镇，虽然实力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且，王镕与晋王李存勖关系密切，这让赵弘殷抓住了新的机遇。

晋天祐十五年（918）八月，李存勖为与后梁展开战略决战，征发自己控制下的河东、魏博、卢龙、横海、成德、义武、安国、振武、大同等藩镇军队，以及奚、契丹、室韦、吐浑等少数民族军队，总计十余万人。十二月，晋军强渡黄河，进驻胡柳陂，与梁军血战。尽管李存勖取得胜利，但晋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回河北。

赵弘殷投奔王镕后，受其委派，率军支援李存勖，以时间推算，很可能参加了胡柳陂会战。赵弘殷勇猛强悍，擅长骑射，李存勖颇为喜爱，便将他留在帐下效力。

胡柳陂会战使赵弘殷大开眼界。无论是军队的动员数量，税赋的征调规模，还是战争的惨烈程度，均非昔日幽州镇所经历的战事可比。作为这个时代最强的两大势力，晋国与后梁也早已不再是传统藩镇，而是真正主宰全国政局的力量。

河朔藩镇注定与灭亡的唐王朝一样，即将成为历史。五代十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赵弘殷在此时脱离河北，投奔晋国，可谓恰逢其时。

天祐二十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勖在魏博正式称帝。他以唐朝宗室自居，因而定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十月，唐军一举灭掉后梁，并于次月迁都洛阳。赵弘殷因军功升任飞捷指挥使，掌管约500名骑兵；杜审琦也做了义军指挥使。自此，赵弘殷成为中原王朝的禁军低级统兵官，涿郡赵氏也开始在中原腹地开启新生。

乱世会有尽头吗？

后唐同光四年（926）二月初的一个夜晚，贝州城内外，除了点点灯火，四下里一片阴沉。偶尔有火光摇曳，照映在一名守城士兵的脸上，鬼煞般的表情更为这样的黑夜平添了几分阴霾。

士兵名叫皇甫晖，他所属的军队戍卫期满，本当回乡休息，但

因遭到皇帝猜忌，被迫继续屯戍贝州。皇甫晖心情抑郁，在营中赌钱又欠了一屁股债，遂利用士兵的不满，煽动叛乱。贝州的士卒一呼百应，胁迫效节指挥使赵在礼为帅，抄掠贝州，然后黑压压地杀向后唐陪都、河北重镇、皇甫晖的老家——邺都兴唐府。

邺都正在被叛军的喊杀声吞没，后唐的国都洛阳却仍然沉浸在歌舞升平的戏文里。后唐的前身是割据河东地区的晋国，李存勖为晋王时，以励精图治、用兵如神著称。他曾击破契丹、桀燕，威压河朔三镇，吞并后梁、前蜀，缔造了五代诸朝的最大版图。只是自从“晋”变成了“唐”，晋王变成了唐帝（唐庄宗），李存勖也变成了“李天下”。他宠信伶人，让他们做官，整日在听戏与唱戏中醉生梦死，荒废朝政。

混乱中，李存勖起用了备受自己猜忌的宗室名将李嗣源率兵平叛。可当李嗣源率领后唐的精锐之师到达邺都前线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为了邀功请赏，官军的士卒竟然与叛军里应外合，参加了叛乱；更戏剧性的是，叛军新拥立的首领，竟然就是前来平叛的李嗣源。

然而，这样的荒诞剧在当时不过是家常便饭，邺都兵变也不过是唐末五代数不清的兵变之一。

唐朝灭亡后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五个小王朝，分别是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后周（951—960）。其中疆域最大者为后唐，一度将势力扩展到四川，但这个版图很快就崩溃了；最小者为后梁，辖区差不多只有华北南部地区。而以时间论，享国最久的后梁不到16年，最短的后汉更是只有区区3年多——为中国“正统王朝”短命之最。这5个小王朝以正统自居，因而被修史者合称为“五代”。

五代之外，还有“十国”，包括江淮地区的吴（又称杨吴）和南唐，江浙地区的吴越，福建地区的闽，荆湖地区的荆南（又称南平）和楚（又称马楚），川蜀地区的前蜀和后蜀，岭南地区的南

汉，以及山西中部的北汉。这10个割据政权有的自立为帝，与五代小朝廷分庭抗礼；有的接受五代朝廷节制，名义上向“中央”称臣纳贡，接受“中央”册封。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各自为政、世袭罔替的割据政权。

至于十国之外，割据者更是多如牛毛。这些割据者称霸一方，忽起忽灭，令人眼花缭乱。而在割据政权内部，从普通士兵，到藩镇节度使，再到禁军大将，叛乱此起彼伏。

正因为这样的支离破碎，所以一提到唐末五代，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羸弱的中央朝廷与强大的地方藩镇间的矛盾。

这对矛盾确实存在，却不是最致命的。自朱温称帝起，宣武军的藩镇军队摇身一变，成为后梁王朝的中央军队——禁军。同时，为了防范其他节度使也称王称帝，朱温不断扩充禁军，兵力骤增至二十余万。唐末原本羸弱的中央军得到了空前加强。此后的皇帝们不断把自己在藩镇时的嫡系军队加入禁军，不断扩充禁军的力量，到了五代第二个王朝后唐时，禁军实力已经初步在地方藩镇军队之上。中央有了驾驭地方的能力。

但新问题接踵而至。

一个问题是将驾驭不了兵——“骄兵”的“兵”。唐末五代，藩镇兵是由节度使花钱雇佣的职业军人，这帮人时常会逼节度使“老板”给自己额外发钱。老板若不同意，他们就发动兵变，炒了老板，然后再拥立一个肯出更多钱的。李嗣源就是这样被士兵拥上皇位的。现在这帮老兵油子变成了禁军士兵，自然把“优良传统”带了过来。唐末以来“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局势愈演愈烈。

另一个问题是帅驾驭不了将——“悍将”的“将”。禁军力量越来越强，禁军将领的权力亦随之越来越大。五代时期士族门阀彻底衰落，数百年间第一次挣脱血缘门第观念的人们都疯了一样想过把皇帝瘾；这些来自庶族乃至贫民阶层的将领，又都是在战场上舍得一身剐的猛人。悍将安重荣曾大言不惭地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于是，将领们越来越积极地把一个个皇帝拉下马。

士兵要发财，将领要称帝，大家都很过瘾，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子既然沦为人尽可做的皇帝老儿，谁还在乎什么政治伦理、统治秩序。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可谓一语中的。正是由于“王政不纲”，由于秩序的破灭，由于“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皇甫晖才能劫持赵在礼造反，邺都内外的叛军才能劫持李嗣源叛变。

士兵反了，倒霉的是主帅；主帅反了，倒霉的必然是皇帝。但不管谁倒霉，最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因为不管谁赢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苟活如蝼蚁的老百姓在兵乱中被洗劫一空，甚至性命不保。

同光四年（926）四月一日，洛阳被浓浓的黑烟吞噬。在李嗣源开进洛阳的最后时刻，李存勖宠信的伶官将领也倒戈一击。堪称一代战神的李存勖终因寡不敌众，重伤而死，落了个被伶官纵火焚尸的下场。那时，留在李存勖身边忠心耿耿抵抗叛军的，不过李彦卿、王全斌等十余人。

叛乱结束了，但乱世还在继续。无论是发起叛乱的小卒皇甫晖，还是抵抗叛军的将校李彦卿、王全斌，甚至是劫后余生的洛阳百姓们，在这些生于乱世、长于乱世的人们眼中，乱，早已习以为常。

李嗣源做将军时，也不觉得乱世会有尽头。可如今他做了天下之主（称帝后改名李亶），不得不思考结束乱世的可能——至少，他不想成为下一个李存勖。

在李嗣源的努力下，后唐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有“粗为小康”之称，李嗣源也因此在去世后获得“明宗”的庙号。

然而，李嗣源是个斗字不识的文盲，四方奏章都要委托心腹重臣、枢密使安重诲来诵读。但安重诲的水平也不高，李嗣源只好另设端明殿学士，让文士冯道、赵凤担任，给自己出谋划策。

知识结构的局限，终究限制了李嗣源的发展。

有心治乱，无力回天。

据说，做了皇帝的李嗣源每天夜里都在宫中向老天爷上香祷告："苍天在上，臣本异族之人，哪里有能力治理好天下呢？可是这世间的战乱实在太久，愿苍天早日降下一位圣人来拯救苍生吧！"

好巧不巧。就在第二年春天，后唐的都城里，一个被称为"香孩儿"的婴儿呱呱坠地。

二、草根儿逆袭的时代

读书的武夫

自从追随李存勖来到中原，赵弘殷便被安排在洛阳城东北部的骑兵大院夹马营居住。他与杜四娘曾生过一个儿子，可惜还没来得及起名字，小儿子便夭折了。宋朝建立后，赵匡胤给自己这位素未谋面的哥哥追赐名赵光济。

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927年3月21日）夜晚，赵弘殷夫妇再次沉浸在弄璋之喜中，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世了。

据北宋人流传，当晚赵家屋内被光芒照得跟白天一样，小孩儿的胞衣好像荷花花瓣，扑鼻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夹马营里，三天都不曾散去。于是，孩子被取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名字——香孩儿。到了南宋，这故事越传越神，甚至宣称香孩儿出生时遍体鎏金，是定光

佛转世。

所有不同寻常的传说，只因为香孩儿的大名叫赵匡胤。

皇帝出生时伴随着各种奇异现象，这在“二十四史”中司空见惯。但细查之下，与此前历代皇帝的出生传说相比，赵匡胤的传说要接地气得多。近如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有两条龙戏于门外；远如汉高祖刘邦，更是赤龙播种，生出来都是一副龙相。相对而言，赵匡胤这个香孩儿，起码还是个人间的孩子。

不管龙种跳蚤，统统来自人间，尊贵的血统不再是主导社会的主流价值。五代民风淳朴，由此可见一斑。

赵匡胤的出生，带给赵弘殷与杜四娘莫大欣慰。但在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里，赵弘殷的生活淡得跟水一样。他先后换上唐、晋、汉三朝的官服，却没有升过一官半职；他想沙场立功，却只能随着一批批乱臣贼子徒劳奔命。他的命运就像在时代的浪潮中随波逐流的福海，但赵弘殷不是福海[1]，他更不能让孩子也跟着随波逐流。于是，他把赵匡胤送进了学馆读书，读儒家的书。

五代乱世，尽管科举未断，文人寒窗苦读后仍可考取功名，佼佼者甚至可以做到宰相。但是这年头的宰相，大多是朝廷的点缀，谁愿意费劲地去做一个花瓶？

武人倒也不是全然不读书，甚至有些不识字的武人还会找来文化人给自己讲书。但绝大多数武人读书的目的性很强——只看兵书，这自然是为了打胜仗。

武人读儒家的书？见鬼了。

赵弘殷夫妇却另有打算。赵弘殷出于允文允武之家，杜四娘也

---

[1]福海，是老舍所著小说《我这一辈子》中的主人公。福海的一生是旧北平底层小人物在混乱时代中随波逐流的悲剧缩影。他本分要强，从裱糊匠到巡警，勤恳挣扎半生，却屡遭命运嘲弄——手艺被时代淘汰，尊严在乱世中磨损，家庭破碎，生计无着，最终在衰老贫病中无声湮灭，成为混乱时世里一粒被碾碎的尘埃。——编者注

是定州大户千金，有基本文化素养的他们，自然对文化有着朴素的认同。而在那个年代，代表文化最高成就的，自然是儒家的书。

就这样，赵匡胤被送进了陈学究的学馆。

学究是科举考试的一个科目，属于明经科，全称“学究一经”。参加考试的人只要在《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中精通一部即可。这门考试考的是死记硬背的功夫，完全不涉及对经义的理解与发挥，由于简单，所以每年应考的学生特别多。

考中了学究的陈老师，自然也只能把学生教成学究。在陈学究的悉心调教下，赵匡胤对读书深恶痛绝。他不知道每天摇头晃脑背这些“之乎者也”有什么用。再加上在夹马营养成了武人习气，据说赵匡胤在学馆里是“时尤嫉恶，不容人过”，其实就是横行霸道。结果，一心要改造武夫习气的陈学究，对赵匡胤也深恶痛绝。

在赵匡胤与陈学究彻底闹掰后，“青年教师”辛文悦成为“接盘侠”。辛文悦兼通经史，向赵匡胤传授的仍然是儒家五经。但也许是教学方法得当，或者教学内容更有意思，赵匡胤与辛文悦的关系相当好，以至于赵匡胤日后发达了，马上把辛文悦找来做官。

辛文悦成功将厌学的赵匡胤带上读书正途。赵匡胤的成绩未必优秀，但后来他做了皇帝，像《尚书》这样深奥的儒家经典，也能侃侃而谈，可见已具备基本的儒学素养。

北宋人晁说之后来评价说，赵匡胤的治国之道与儒家六经之义不谋而合。这绝非偶然。早年的学习经历，使儒家行仁政的价值观，逐渐根植于赵匡胤的思想当中，这是他与一般武人最大的不同。出身于允文允武之家的赵匡胤虽算不得大族，但在见识上与那些自诩天命的草莽皇帝自有云泥之别。

武夫皇帝却开创出文治天下，良有以也。

兵变的诅咒

作为武将，赵弘殷在重视“文教”的同时，自然不会放松“武教”。赵匡胤小小年纪，就已经弓马娴熟，而且技高人胆大。有一次，他见到一匹烈马，也不上缰绳和马鞍，便硬生生跃上马背。烈马不服，“嘶”的一声长鸣，四蹄生风，直奔一座石门。赵匡胤一脑袋撞在石门上跌落下来。围观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以为赵二哥必被磕得脑浆迸飞。没想到命大的赵匡胤不但一点儿伤也没有，还三步并作两步，一跃而起，再度飞身上马。烈马终于拜服，老老实实地听从赵匡胤的摆布。

由于父亲是禁军统兵官，加之唐明宗是五代时期为数不多的有道之君，托他们的福，赵匡胤的童年平安快乐。他还是个“孩子王”，每天放学，都让小伙伴们排列整齐，给自己当前导，好像哪位大将军凯旋一样。路人们见了都觉得好笑，纷纷配合地给他让路。

安定的生活，让人们渐渐忘记了赵匡胤出生前的那场兵变之祸。

但兵变会迟到，却不会缺席。

应顺元年（934），赵匡胤8岁。一天，朝廷的衙役突然像一群蟑螂一样，铺天盖地涌上街头，挨家挨户破门勒索，谁要是有半句怨言，上去就是一鞭子。整座洛阳城里，鸡鸣声、狗吠声、哭爹声、喊娘声、喝骂声、咆哮声，乱声迭起。

原来，潞王李从珂发动兵变，攻入洛阳，逼死了唐明宗的继承人唐闵帝李从厚，自己登基为帝。李从珂取胜的关键，是争取到禁军低级统兵官的支持，并许诺事成之后重赏军士。可入洛阳后，李从珂才发现国库已空。为了安抚将士，他只好命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部长）竭泽而渔，百般搜刮，连皇宫里的太后、太妃也没能躲

过这场浩劫，更别提寻常百姓了。

五代以来，骄兵悍将为请赏而拥立皇帝，这是为祸最甚的一次。而这种纵兵洗劫城池的做法，在当时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夯市。

幸好赵弘殷是禁军将领，赵氏一门所受冲击不大，甚至可能是受益者。不过，赵匡胤受到的冲击就太大了，这是他第一次目睹大规模兵变。光天化日之下，朝廷官吏在国都之内有组织地打砸抢？一切都超出了8岁孩子的理解范围。

唐末帝李从珂做了两年皇帝，就被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赶下龙椅。石敬瑭以割让边防重镇幽蓟十六州（幽、顺、儒、檀、蓟、涿、瀛、莫、新、妫、武、蔚、应、寰、朔、云）和自称“儿皇帝”为代价，获得契丹的支持，建晋代唐，迁都东京开封府。自此，中原王朝的北方屏障全失，胡人的铁蹄可以沿着广袤的华北平原直下中原腹地。

晋高祖石敬瑭的继任者晋出帝石重贵不甘心继续做傀儡，不惜与契丹一战，恼羞成怒的契丹人发兵南下。可皇帝的口号虽然喊得响，后晋却难以承受如此规模的战争。为了筹集军费，朝廷自然还是老办法，派使者到各地搜刮民财。朝廷公开抢钱，各级官吏自然也不客气，层层加码，中饱私囊。《资治通鉴》上说，当时是“小大惊惧，求死无地”——老百姓被折腾得想死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死。

可就是这样的抢劫，也没能挽救后晋的命运，因为晋军统帅杜威率主力临阵倒戈了。开运三年十二月（947年1月），契丹人在倒戈晋军的带领下攻入开封，后晋灭亡。初来中原的大辽皇帝耶律德光得意忘形，放任契丹人在中原烧杀劫掠，成千上万汉民惨遭暴虐。他还命令，将后晋皇室、宫女、宦官、百工、财宝、书籍等运往北方苦寒之地。这简直就是“靖康之变”的提前“演练”。

作为禁军将领，赵弘殷早已举家迁居开封。好在因为这层身份，赵氏一家所受波及依然不大。

21岁的赵匡胤，又一次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不同的是，潞王兵变时躲在母亲怀里颤颤发抖的赵匡胤，如今已经长成雄伟健硕的青年。8岁的弟弟赵匡义，已经把二哥当作乱世中的依靠。

契丹人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民愤。放眼中原，到处是揭竿而起的民众。耶律德光被迫于次年四月惆怅地离开中原。两个月后，已经称帝的刘知远（称帝后改名刘暠）乘乱取得天下，建立五代的第四个王朝——后汉。

大乱平息，赵匡胤终于走出赵府的大门。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而更现实的问题是，赵府的生活也日益拮据起来。

父亲赵弘殷整日在外奔波，仕途却原地踏步。三弟赵匡义和妹妹年龄尚幼，四弟赵匡美更是刚刚降生。一家上下，全靠母亲杜氏与妻子贺氏苦苦支撑，捉襟见肘。已过弱冠之年的赵匡胤没有理由不去讨个一官半职为家里分忧。

经历了唐末五代大乱后，门阀政治的尾巴被彻底割断，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自南北朝以来逐渐崛起的庶族，终于全面填补了士族门阀崩溃后的权力真空。

这是赵匡胤坚信自己能够闯出一片天地的力量源泉。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一条杆棒闯江湖

《水浒传》里那句“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天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并非无中生有。为了闯荡江湖，赵匡胤精心挑选了一根黑得发亮的铁棒。据后来蔡京的第四子蔡絛说，宋徽宗政和六年、七年间，他曾在宫中亲眼见到赵匡胤早年使用过的铁棒，“棒纯铁尔，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

赵匡胤离开家乡后四处闯荡，中原大地上因此留下许多关于他的真真假假的传说。

相传，赵匡胤向东到过宋州，那里有一座高辛庙，香案上有一对用于占卜的竹杯珓。占卜时，当事人只需要将这对杯珓抛起即可，如果落下的杯珓一俯一仰，就称为圣珓，也就是卜中了。赵匡胤心里默念军职，从小校到节度使，一次次抛出杯珓占卜，结果全部不应。垂头丧气的他自嘲道："难道老天爷是让我做天子吗？"没想到说完再抛，竟然得了个圣珓！

赵匡胤向西到过关中，长安、凤翔、华山都有关于他漫游的传说。他曾在渭州潘原县的一场赌局中大获全胜。结果赌徒们欺他孤身在外，竟然群起围殴，把他身上的钱抢得精光。狼狈的赵匡胤离开关中，回到洛阳，迫于生计而跑到寺院的菜园子里偷菜吃，却被僧人抓了个现行。好在僧人善良，不但没有把他送到官府，反而请他饱餐一顿。

据说，赵匡胤还在北面的河东镇逗留过，当上了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之弟刘崇的镇将。镇将通常都是节帅的亲信，军事"素人"赵匡胤连能不能见到刘崇都不好说，怎么可能一上来就做镇将呢？但这并不妨碍宋人相信赵匡胤曾游历河东，甚至还有传说称赵匡胤喜欢河东的酒。后来明代拟话本小说《警世通言》，更将"千里送京娘"的故事设定在河东。

一再被现实打击的赵匡胤，终于向现实低头。这一次，他转向南方，投奔赵弘殷的老友、复州防御使王彦超。没想到，赵匡胤连王彦超的面都没见着，就被对方送来的一把零花钱打发了。

好在赵弘殷的朋友并不都是这样不给面子。他的老乡、随州刺史董宗本总算收留了赵匡胤。只是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诲根本看不上走后门的赵匡胤，每日盛气凌人。然而，读书没有赵匡胤多的董遵诲，见识始终不如赵匡胤。有一次，二人讨论兵战大事，董遵诲说不过赵匡胤，负气拂袖走人。积怨终于爆发，赵匡胤忍无可忍，拜

别董宗本而去。

离家两年，后汉王朝的东南西北，赵匡胤逛了个遍。他风尘仆仆，又四处碰壁。落寞的赵匡胤来到一个小村，四处找人讨酒，喝得昏天黑地。据南宋人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记载，赵匡胤曾在西湖村向当地老妇讨酒喝。今湖北孝感市的“西湖酒馆”遗址，据说就是当年赵匡胤喝酒处。

潦倒的赵匡胤趴在马背上，摇摇晃晃。这天，他来到襄阳城下，借宿在一座寺庙中。

慈祥的老僧端详着赵匡胤，这个一口正宗洛阳官话的年轻人，衣衫褴褛，满面风尘，凝眉不展，分明是一副怀才不遇的落魄模样。

老僧双手合十，淡然说道：“不如北归。”

襄阳老僧并不是怪力乱神的预言家，他只是敏锐地观察到，有个英雄善交俊杰，善待士卒，劝恶扬善，与其他武夫颇为不同。他即将前往河北，招兵买马。

这位英雄，将改变无数人的生命轨迹，包括赵匡胤和他的父亲赵弘殷。

谁能有这么大本事？

郭威。大汉枢密使郭威。

草根儿的逆袭

在那个允许草根儿逆袭的时代，郭威是一颗明星。

郭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人。因脖子上有一个飞雀刺青，人称“郭雀儿”。这个倒霉孩子不到8岁就成了孤儿，后来由姨妈抚养，生活贫苦。18岁那年，郭威当了兵，加入的却是叛军；四年后，叛军被唐庄宗扫平，军队被收编。郭威因祸得福，摇身一变，成了朝廷正规军的一员。

由于识字，算术也说得过去，郭威在军中还兼任文职。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威成为石敬瑭的属下。石敬瑭是唐明宗的驸马，骁勇善战。命运已经将机会摆在郭威眼前，抓不抓得住，就看郭威自己了。

可在郭威眼里，机会变成了鸡肋。他实在想不出，位卑言轻的自己，如何能让石敬瑭高看一眼。

关键时刻，郭威的夫人柴氏推了他一把。

关于郭威与柴氏的姻缘，宋人总是津津乐道，其传奇程度堪比“风雪杜家庄”。

据说，柴氏与郭威是老乡。可柴家是邢州豪右，与郭威的出身有天壤之别。柴氏也不是一般人，她曾是唐庄宗的侍妾。庄宗崩殂，她被明宗遣返回乡，路逢暴风骤雨，十多天无法渡过黄河北去，只好住在附近的旅馆。一天夜里，柴氏在旅馆偶遇郭威，一眼认定这个气场强大的汉子是个大英雄，便以身相许。而此时的郭威，有的记载说他是骑兵队队长，有的记载说他是邮舍队队长，总之只是个基层小军官。

自从得了贤内助，郭威的人生焕然一新。郭威本来好赌又任性，在柴氏的规劝下，他收敛了不少。柴氏又拿出自己的嫁妆，指点郭威去结交石敬瑭的心腹、牙门都校刘知远。从此，郭威飞黄腾达，直到成为汉高祖刘知远的托孤重臣。

乾祐元年（948），刘知远之子，不满18岁的刘承祐继承皇位，是为汉隐帝。后汉西部的护国军节度使李守贞、永兴军节度使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叛乱，朝廷派去镇压的官军屡战不胜，形势危急。最终，专掌征伐的枢密使郭威受命，亲自挂帅出征。

郭威西征前，专程拜访了太师冯道，向他求教平叛之法。冯道是当时的文士领袖，而且自诩“不谈兵”。一个军人，突然去向手无缚鸡之力且厌恶战争的文人请教如何平定叛乱，这确实匪夷所思。

冯道认为，李守贞是禁军老将，军心归附，战斗力极强。只有

瓦解了他的军心，才能平定叛乱。冯道为郭威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就这样，郭威带着冯道的“攻心之策”，率军西征。他待人以礼，虚怀若谷，对士兵不吝赏赐，人人愿为他效死力。最终，郭威不仅平定了叛乱，还不忘向皇帝汇报当朝权贵与前线将士的功劳，满朝文武都沾了平叛的光。郭威在朝中、军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

在这次平叛战争中，草根儿出身的郭威，给了无数草根儿新的希望。祖籍辽西、生于洛阳的王审琦因军功升任厅直左番副将。副将虽然只是掌管20人的小班长的副手，但厅直左番属于郭威的卫队，王审琦大有前途。

棣州厌次人张令铎也获得了升迁。张令铎本名张铎，因与别人重名，被皇帝改了名字。后唐末年，张令铎已在军中担任小校，起点跟赵弘殷差不多。这次平叛后，张令铎升任奉国军指挥使，做上了精锐步军的低级统兵官。

和张令铎一样，从基层熬出头的还有赵弘殷。在平叛战争中，赵弘殷率军与王景崇的叛军、后蜀的援军在陈仓遭遇。赵弘殷一马当先，虽然被射中左眼，却越战越勇，终于大破敌军。战事平息后，赵弘殷因功升任护圣都指挥使。这已是精锐马军的中级军官，统辖着大约2500人。赵弘殷坐了二十几年的冷板凳，托郭枢密的福，终于高升了。

就在郭威带着草根儿们步步高升之际，那个从襄阳来到西京洛阳的黝黑健壮的年轻人，正骑着小毛驴，拎着黑铁棒，喝着皮囊里的小酒，缓缓朝河北而行。

这头驴子是洛阳长寿寺藏经院的主僧送给赵匡胤的。得益于长寿寺的资助，在阔别三年后，赵匡胤终于回到中原的黄河水畔。

赵匡胤只比王审琦小两岁，家庭背景也比王审琦好得多。可不知天高地厚的他，却阴差阳错，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过，三年的江湖游历，倒是让赵匡胤了解到不少风土人情与民间疾苦。那吃不完的闭门羹，也磨去了他身上的桀骜不驯，让他迅速成熟起来。

郭枢密已经启程去了河北，那里一定还有希望。

远处，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那灿灿的曙光，正以迅雷之势，驱走无边的黑暗。赵匡胤心头一动，用蹩脚的文辞，随口吟出他那首唯一传诵至今的诗篇：

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逐却残星赶却月。[1]

三、澶州兵变，黄旗加身

威名下的危名

乾祐三年（950）四月，大汉枢密使、检校太师、兼侍中郭威兼任天雄军节度使、邺都留守，匆匆赶往天雄军的会府——邺都大名府，统御河北，防范契丹。

在门外汉赵匡胤看来，这是朝廷重其威名的表现。投奔这样的重臣名将，前途一片光明。

坐镇大名府的郭威却如履薄冰。

自从西征平叛，郭威便因功高震主而遭到刘承祐的猜忌。当年刘知远留下的顾命大臣有四个：文吏出身的宰相苏逢吉与其他三个人均不对付；文吏宰相杨邠，以及武人出身的禁军统帅史弘肇与枢密使郭威。在苏逢吉的运作下，刘承祐将郭威调往河北，排挤出了决策

[1]《藏一话腴》甲集·卷上。此诗后来宋人多有润色，如最后两句有的版本作“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心万国明”（一说是写月亮的，如《庚溪诗话》卷上）。陈郁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润色后的诗“文气卑弱”。

集团。

郭威的威名，已然成为危名。

只是不久之后，郭威就要感谢苏逢吉了。

郭威赴任前，在文士首相窦贞固的牵头下，后汉的高层曾开过一次和解宴。应窦贞固邀请参会的不仅有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还有手握财政大权的三司使王章。宴会的主题本来是调解苏逢吉和武人、文吏出身的其他政界军界大佬的矛盾，可谁也没想到，结局却是武人史弘肇和文官王章对骂，史弘肇甚至还要砍了苏逢吉。

武人、文吏，谁也看不起谁。而真正的读书人——文士，就只能在一旁默不作声。

这让一直躲在幕后的刘承祐嗅到一丝微妙的气息。刘承祐虽然贵为天子，却体会不到做皇帝的快乐，因为朝廷大事都掌握在几个大臣手里。杨邠甚至公开表示："陛下您就别吱声了，朝政有我们几个呢。"

杨邠能关上刘承祐的嘴，却锁不住他的心。刘承祐就像一只四处寻找带缝鸡蛋的苍蝇，而现在，鸡蛋真的裂开了缝。

对于朝局的险象环生，郭威心知肚明。

可赵匡胤这样的小人物，当然觉察不到危险正在逼近河北。在他眼中，郭威治下的河北秩序井然，与他游历过的其他地区大为不同。据《旧五代史》载，郭威到达邺都后，"尽去烦弊之事，不数月，阃政有序，一方晏然"。

在防御契丹的旗号下，郭威在邺都高调募兵。不出所料，赵匡胤应募成功。[1]在这里，他不仅认识了在西征平叛中立功的张令铎、

[1] 关于赵匡胤投奔郭威的时间，《宋史·太祖纪一》记在郭威西征时，《东都事略·太祖纪一》记在郭威镇邺时。张家驹先生认为，《宋史》记载赵匡胤"汉初，漫游无所遇"，郭威西征在乾祐元年（948），距离汉初只一年；而从赵匡胤的游历看，他的漫游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今据张家驹说，从《东都事略》。

王审琦和太原府文水人杨光美，还结交了太原人慕容延钊、开封浚仪人石守信、磁州武安人韩重赟、大名元城人李继勋、大名人崔彦进，甚至还遇到了自己的发小磁州武安人韩令坤，以及刘守文的孙子涿州范阳人刘光义。

请记住这些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十余年后，他们将成为缔造大宋的中流砥柱。

郭威在河北招兵买马，刘承祐在河南也没闲着。

在国舅、武德使李业与权知开封府刘铢的怂恿下，刘承祐终于发难。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十三日晨，杨邠、史弘肇和王章在入朝时，被伏于殿门的甲士杀害。事成之后，刘承祐急遣人带密诏去澶州和邺都，命太后的弟弟、镇宁军节度使李洪义杀掉驻守澶州的王殷，又令邺都行营的郭崇威、曹胤（因避宋太宗赵匡胤讳，宋朝建立后改写作“曹英”）杀掉郭威和监军王峻；同时急诏藩镇入朝，护卫京师。

杀红眼的刘承祐还下令将杨邠、史弘肇、王章、郭威、王峻、王殷留在开封城里的家眷全部处死。除了王殷的家人逃脱，其他人全部遇难。血光笼罩着整座开封城，中外惊骇，人心震悚！

刘承祐没想到的是，李洪义并不看好他。接到处死王殷的密旨后，李洪义不但没有动手，反而把密旨交给王殷。王殷大惊，命人火速通报郭威。

郭威闻讯，又惧又怒，他急召枢密院兵房主事魏仁浦商议对策。郭威愤愤不平地说道：“朝廷要杀我，我不怕死。但朝廷一点也不顾念将士们吗？”

魏仁浦答：“主上听信谗言，侍中您没别的办法了，现在只能把将士们激怒。这不仅是为您自己免祸，更是为杨、史诸公昭雪冤情！”

郭威会意，连忙让魏仁浦重写一份密诏，内容是朝廷要诛杀全体将校，又把邺都留守印倒过来盖在上面，假冒玉玺，并将其示于

全部中高级将领。郭崇威、曹胤等人果然激愤，一个个跃跃欲试，请郭威拥兵南向，为自己讨回公道。

决议已定，郭威召集邺都兵马，声泪俱下地说道："郭某与杨、史诸公追随先帝，平定天下。后来受托孤重任，每天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头发都熬白了啊！现在诸公已死，我怎能独生！主上想要郭某的人头，你们不妨拿去，交给主上，郭某绝不连累诸位！"

将士们一听，立刻喧哗成一片。已经有人大喊："我们跟郭公杀回东京，找朝廷问个明白！"此声一出，群起响应。

杀回东京！

时机已经成熟。郭威缓缓举起手中的令旗，朝着南方猛然一挥：出师！

武"威"战文"道"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十八日，河北大军渡过黄河，进驻滑州。为了保证手下将士誓死效忠，郭威接受王峻的建议，向将士承诺：待攻克京城，任凭剽掠十日！

重赏一出，举营欢呼！

二十日，开封北郊刘子陂，郭威与刘承祐的大军终于相遇。两天后，刘承祐死于乱军，苏逢吉自杀。

这天夜里，一颗又长又大的彗星划过天际，浩瀚的夜空仿佛被撕裂一般。在中国古代占星术中，这是彗星里最为凶险的彗孛，"主大乱，主大兵，灾甚于彗"。

开封城内，鬼魅们已经开始狂欢。一座繁华京都，宛若烈火上的油锅。浓稠的血水，被丧心病狂的笑声煮沸，飞溅到城中的各个角落，噼啪作响。

那个宽厚仁爱、温言待人的郭威，此刻却成为面目狰狞的罗刹。

当民心与军心严重冲突时，郭威选择了后者。

鉴于赵弘殷已是禁军的中级将领，这场浩劫对赵氏一家的冲击依旧不大。可惨烈的景象，却在赵匡胤兄弟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郭威大军洗劫开封时，赵匡胤就在军中，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否参与了剽掠。但是在十年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发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严禁将士在城中劫掳，举的反例正是暗指郭威入京。

晚年的赵匡义（彼时已经改名赵炅）也对当年的惨景记忆犹新。他对宰相吕蒙正说："周太祖自邺城南归，京城士庶，都遭到了掠夺。地下火光冲天，天上彗孛横行。人们见了这般情景，深感恐惧，当时都说再也看不到太平的日子了。"

按照王峻的意思，将士本来要在开封剽掠十日，可是刚到第二天，王殷和郭崇威就看不下去了。他们来找郭威说："再这么抢下去，开封就要被抢空了！"郭威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慌忙下令，再有抢劫者一律斩首。即便如此，这场抢劫行动直到黄昏才被控制住。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二十四日，已经控制开封局面的郭威主动上书刘承祐之母李太后，请求早立嗣君，最终决定迎立刘崇的亲子、刘知远的养子、武宁军节度使刘赟。为了表示诚意，郭威特意请出德高望重的太师冯道，让他亲自到徐州迎刘赟入朝。

如今的冯道早已不是当年刘守光面前的愣头青，局势到了这般田地，他根本不相信郭威所谓的"诚意"。

事实正是如此。郭威进入开封后，本以为冯道会率百官前来跪拜劝进。毕竟，当初李从珂叛乱，李从厚外逃，冯道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皇帝，而是率百官拜谒李从珂。李从厚活着，冯道尚且如此，现在刘承祐死了，他哪有不来拜自己的道理？

可让郭威大跌眼镜的是，冯道见了自己非但不拜，反而不怒自

威地说道：“侍中此行，真不容易！”

冯道的强硬态度终于让郭威清醒过来。自己虽然控制了河北和京城，可汉室宗亲却环伺周围。开封南有忠武军节度使刘信，东有武宁军节度使刘赟，西北有河东节度使刘崇。这三大藩镇都由宗室出镇，随时可以借“讨贼”之名，联合围剿郭威。而从河北来的将士是否支持郭威称帝，也还是未知数。改朝换代的时机尚未成熟。正因如此，郭威才退了一步，主张拥立刘赟为帝。

十一月二十九日，受李太后之命，郭威接管了朝廷。可仅仅过了两天，十二月一日，朝廷就收到河北镇州、邢州发来的军报——辽朝数万铁骑入寇。郭威将朝中大事交给王峻和王殷后，自己带着主力军队立即回师河北抗敌。

李太后、刘赟、刘信与刘崇都长出一口气，郭威走了，大汉的江山保住了。

只有郭威和冯道清楚，大汉王朝已经命悬一线。武人之“威”与文人之“道”，将为了大汉的生死，一决雌雄。

十二月四日，郭威的大军再次来到滑州，驻扎不前。已经提前进入皇帝角色的刘赟，派使臣前来慰问，诸将闻听，心中不安，私底下谈论道：“我们屠戮京师，这是死罪。如果刘氏复立，我们还有命在吗！”

闻听议论，郭威表面上诚惶诚恐，当即下令，起营拔寨，继续北进。

十六日，郭威的大军终于来到黄河边上的澶州；十九日，渡河；二十日，继续北上。

包括赵匡胤在内的将士们再也按捺不住，距离刘赟进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再拖延下去就彻底没机会了。数千将士吵闹着，朝着帅府拥来。

郭威当然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可是秀还得作，他把院门死死锁住。将士们干脆翻墙而入，请愿道：“侍中您不能再往北了，我们

杀了皇帝又抢了京城，跟姓刘的已是血海深仇，新皇帝即位能有我们好果子吃吗？请侍中来做皇帝！”

郭威还在假意推托，将士们哪容他再多说，直接把黄色的旗子扯下来，披在他身上，权当龙袍，然后纷纷下拜，山呼万岁。

澶州兵变，赵匡胤可真开了眼。他眼睁睁地看着野心勃勃的郭威，如何一步步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最后被“逼”为帝。

从开封到渡河，郭威用了20天；从河北回东京，郭威仅用了6天。

朱雀门外，一辆小车摇摇晃晃，形单影只地朝城门驶来。远远望去，憔悴的冯道端坐于车上，眼中充满落寞与不甘。这位曾经仙风道骨的老头儿，一夜间便已老态龙钟。

与开封只有一步之遥的刘赟被囚禁在宋州，废为湘阴公；镇守许州的刘信被逼自杀；河东的刘崇鞭长莫及。李太后正式任命郭威为监国，全权掌握整个国家。

四、血战高平

储位风波

广顺元年（951）正月一日，处心积虑的郭威终于正式登基，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

赵匡胤因拥戴之功，补官东西班行首。东西班是禁军中负责皇帝安全的私人卫队之一，行首是这支卫队中的一支小分队的小领班。巧的是，王审琦也出任了相同的职务，与赵匡胤分管不同的小分队。两位行首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和五代时期绝大多数皇帝不同，靠着兵变、抢劫登上帝位的周太祖郭威，却有着扭转五代乱局的雄心壮志。

当年，郭威与柴氏成婚后，柴氏很可能向他讲述过不少在宫中见闻的朝野大事。久而久之，郭威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也说明他重视以冯道为代表的文士绝非偶然。这些变化，让郭威在统治天下时，有了不同于以往一般武人皇帝的思维方式。

郭威称帝后，生活节俭，免除了许多苛捐杂税，放宽了经济管制，也废掉了不少严刑峻法。此外，他还重用了一批以李穀、范质、王溥为代表的，有知识也有能力的文士，大力提升文臣的地位。这是五代以来中原王朝从未有过的景象。

从后汉到后周，当武夫乱政达到巅峰时，终于在这片混乱严苛的土壤中孕育出了文治的萌芽，中国历史也在这时出现了由乱入治的转折。

但如何让文治的萌芽长成参天大树，这还不是郭威要集中思考的问题。因为他眼下最大的麻烦是无法顺利确定继承人。

由于郭威的亲儿子们早就被刘承祐杀戮殆尽，因此不出意外，他的养子郭荣将成为大周的皇位继承人。

郭荣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感到陌生，但他的另一个名字——柴荣，在历史上却赫赫有名。

郭荣本来姓柴，是郭威夫人柴氏的侄子，由于精明干练，郭威甚是喜爱，就收他做了养子。从此，“柴荣”成为历史，“郭荣”则成为他的通用姓名。至于我们今天仍称他为柴荣，实在是宋代以来的一场“误会”。

郭威出镇邺都时，郭荣担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统领郭威在邺都的私人亲兵卫队，已是郭威的左膀右臂。如今后周甫建，论名分，郭荣是郭威唯一的“儿子”；论感情，其时柴氏已故，在郭荣身上，郭威寄托了太多对柴氏的感怀与思念；论能力，郭荣才堪大任；论地位，郭荣是郭威最亲密的心腹。明眼人都知道，不出意

外，郭荣早晚会入继大统。

可偏偏出了意外。

郭荣并没有留在开封，而是以镇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的身份留驻澶州。同平章事是宰相的头衔，以节度使加宰相衔，称为使相，这是武官的最高荣誉。此时的郭荣不过31岁，年纪轻轻就位列使相，当然是出于郭威的优宠。

然而，只要郭荣不能回到京城开封，就接触不到最高权力。酿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正是郭威的亲密战友王峻。

如今的王峻身兼枢密使与宰相，内掌枢机，外执兵柄，位高权重，连郭威都要忌惮三分。王峻执掌朝政，尽心辅佐，对周初政治的稳定大有裨益。只是他性格非常强势，为了保住权柄，竟然三番五次阻挠郭荣进京。

与此同时，朝中还有两人是储君的热门人选。一个是郭威的外甥，祖籍沧州生于太原的李重进，因面色黝黑，人称“黑大王”，现任殿前都指挥使，领泗州防御使；一个是郭威的女婿，驸马都尉、太原阳曲人张永德，现任殿前都虞候，领恩州团练使。两人的待遇虽然不及郭荣，但与郭威的真实血缘关系比郭荣更近。更重要的是，他们分别担任殿前诸班的主副手，是郭威刻意栽培的未来军事统帅，而郭荣对禁军却毫无掌控。

所以，明知道王峻阻挠，郭荣还是不断请求入朝。不能入朝不要紧，至少要让郭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这番心思没有白费，郭威并没有忘记这个养子。广顺三年（953）闰正月十五日，趁着王峻外出视察水患，郭威立即批准了郭荣的入朝申请。可到了二月三日，仅仅过了半个月，郭荣就不得不返回澶州。

因为王峻回来了，而且回来得很高调！他逼迫郭威让自己兼领平卢军节度使，还强硬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撤换其他宰相。

这简直是对皇帝的蔑视，郭威内心愤怒不已。

此刻的赵匡胤心情也差到极点。他得到消息，自己被升任滑州兴顺军副指挥使。虽然级别提升，但却远离权力核心。这不是跟郭荣一样吗！

当年在邺都，赵匡胤很可能与郭荣有过交集。在宋人的笔记中，就有郭荣一见赵匡胤而“奇之”的记载。我们无法确认，赵匡胤是否受到了郭荣的牵连。但赵匡胤倚为靠山的郭荣，此刻已是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朝野上下人人焦虑，只有冯道满不在乎。

年过七旬的冯道总能一眼看穿朝廷的动向，相比之下，二十出头的赵匡胤太稚嫩了。

没过两天，郭威便把冯道找去，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半天，痛诉王峻如何欺负自己。

郭威不仅是皇帝，还是“影帝”。已经与郭威打过数次交道的冯道深信，王峻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

广顺三年（953）二月十四日，王峻被贬出京城。不到二十天，郭荣进京面圣。三月五日，郭荣被正式任命为开封府尹，并封晋王。开封府尹是开封的最高长官。按照五代惯例，以亲王尹国都，郭荣已被视为储君。

郭荣并没有忘记让他“一见奇之”的赵匡胤。开封府尹的屁股还没坐热，他就急忙将赵匡胤调入开封府做马直军使。这个相当于首都地区骑兵连连长的职位，虽然比副指挥使要低一级，但赵匡胤欣然愿往。

显德元年（954）正月十七日，周太祖郭威驾崩于滋德殿，享年51岁。4天后，34岁的晋王郭荣正式继承皇位，是为周世宗。

大周境内，举国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缅怀着这位传奇的草根儿皇帝。

伴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哀告送入了太原府勤政阁。简陋的宫殿里，一位花甲老人随手将奏章扔入身边的炭火，熊熊燃烧的烈

火，映红了他那惨淡的笑容。

儿啊，爹这就为你报仇雪恨！

新皇帝的宿命

这个被仇恨吞噬的老人，正是汉高祖刘知远的亲弟弟、湘阴公刘赟的亲爹刘崇。

郭威刚入开封，准备迎立刘赟时，刘崇还傻乎乎地高兴呢。结果，郭威称帝，刘赟被杀，刘崇追悔莫及。从此，后周与河东刘崇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就在郭威建周后的第十天，刘崇决定继承汉统。

登基大典上，刘崇一脸威容地说："由于高祖皇帝的大业一朝坠落，朕不得不称九五之尊。可是你们看看，我是什么天子，你们又是什么节度使！"

在一片哀歌中，刘崇于太原府即皇帝位，仍用汉为国号，沿用乾祐为年号，只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旻，史称北汉。

开国大典如此凄凉，似已注定了北汉的国运。

北汉位于今山西中部，土地贫瘠，将寡兵少。为了生存，刘旻豁出这张老脸，学起老领导石敬瑭，向契丹人称臣，做起辽朝的"侄皇帝"。只要能够换取辽朝的支持，血洗后周，刘旻什么都肯干。

但刘旻也知道，自己的小朝廷先天不足，支撑不了多久，必须速战速决。登基以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袭扰后周，但每次都被郭威揍得落花流水。天可怜见的，郭威终于死了！郭荣刚刚即位，政局不振，军心不稳，这正是复仇的绝佳机会！

周显德元年、汉乾祐七年（954）二月，刘旻亲率三万倾国之军，以义成军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军节度使张元徽为

前锋都指挥使，联合辽朝武定军节度使、兼政事令杨衮所将万余骑，自太原出团柏谷，沿太行山一路南下，兵锋直捣后周边陲要塞潞州，企图一举打通大路，直扑开封。驻守潞州的宿将、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出城迎战失利，被迫撤回城中死守。

郭荣得知李筠败北的消息，毅然决然地宣布："朕要亲征！"

大臣们没想到，这个才坐了一个月龙椅的皇帝竟然如此冲动，纷纷进谏劝止。

朝堂之上，除了宰相王溥，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支持郭荣。

可这些话，郭荣一句也没听进去，他还在据理力争："先帝驾崩，朕又刚刚即位。刘崇想乘此时机，吞并天下！他肯定亲自来战，朕不能不亲征！"

上朝以来，太师、中书令冯道始终一言不发。这会儿他双手缓缓持起象牙笏板，微微躬身，缓缓奏道："陛下贵为天子，不宜出征。"

郭荣冷哼一声，提高嗓门说："当年唐太宗平定天下，也常常亲征，如今朕怎么敢苟且偷安？"

"不知道陛下能不能当唐太宗！"冯道一反谨小慎微的常态，冷冷回道。

嘿！这不是公然鄙视朕吗！年轻气盛的郭荣咽不下这口气，反驳道："以我军兵力之强，破刘崇就如泰山压卵！"

"不知道陛下能不能安坐泰山！"冯道又回了一句。

郭荣忽地站起身来，指着冯道的手恨不得戳到他的老脸上，恨恨地说道："老家伙少看不起人！"

冯道面不改色，目不转睛地盯着气得发抖的郭荣。

在冯道看来，郭荣所谓的"泰山"不过是那些禁军宿将。他们个个久处贵位，骄恣蛮横，对郭荣这位没有军队背景的皇帝，根本不会买账。何况禁军主力侍卫亲军与大周皇室的关系颇为微妙，郭荣带着他们去跟刘崇拼命，只怕有去无回。

可是，郭荣别无选择。

派别人打仗，按照五代的“惯例”，前方大将有可能会临阵倒戈，甚至来场兵变。当年后晋发生开运之祸，不就是因为杜威率主力大军投降契丹吗？可退一万步讲，就算前方大将没有野心，打了胜仗，得胜还朝，结果也是声望、军心归于其身，到头来不过是再造出一个郭威来。

所以，这场硬仗，郭荣只能自己打，还必须打赢，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是一位合格的皇帝，是一位能在乱世中生存下来的皇帝。这是时代强加给郭荣的宿命，他无从逃避。

高平血战

黄昏，天倾西南。血色的夕阳染红了山岩，阴风在山谷间肆意哭号。不远处，骷髅王庙屹立在白骨堆砌而成的山头之上，黑色的幡旆仿佛招魂的旌铭，阴森森地不停摆动。

此地名叫高平，千年前，它以长平之名成为四十万赵军将士的埋骨处。

刘旻不禁打了个寒战，下令汉军立即通过这个鬼地方，在高平以南驻扎。出师以来，汉军急行五百里[1]舍弃坚城潞州不攻，直下黄河沿岸，再有一天，就能到达泽州，距离开封越来越近。

同样急行的还有郭荣，在调兵遣将安排妥当后，他亲率大军向河东赶来。三月十九日，周军的先锋击退了汉军的先锋。首战告捷，年轻皇帝信心倍增。

直到此时，刘旻才知道，郭荣竟以身犯险。他亲率中军结阵于巴公原，命张元徽驻扎在中军东侧，辽将杨衮驻军于西，严阵以待。

---

[1] 五代至宋代 1 里约合今 560 米，全书作为计量单位的“里”均同此。

郭荣的军队也一分为三，以义成军节度使白重赞、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李重进将左军居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将右军居东，宣徽使向训统率精锐骑兵居中，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统率殿前诸班保护亲自督战的郭荣。

后周建立以来，赵匡胤一直任职于殿前诸班。此刻，他正在张永德的军中。赵匡胤端坐马上，远远望去，汉军黑甲如山，刀戟如峰，赤旗翻滚。敌阵最高处，一面火红的大旗迎风张扬，旗杆顶端的旄牛尾与缀于旗下的五采析羽嚣张地扭动着，肆无忌惮地挑战着周军战士的神经。大旗之下，正是汉主刘旻的所在。

赵匡胤一心想要杀敌建功，像一匹蓄势待发的野狼，随时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只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愿意以生命做赌注，来参加这场胜负难料的赌局。周军右厢，樊爱能与何徽的战马不住地前后挪踏着，马蹄声凌乱。在他们身后，是一张张胆怯、愤懑的脸。

从宿将到士卒，大家本来就对这个没打过硬仗的皇帝没好感，现在竟然还要陪这个冒失鬼来送死，谁干啊？

负责袭击北汉后路的周军还在途中，河阳三城节度使刘词的后续部队也还没赶到。孤军深入，敌众我寡，在这决定生死存亡的一刻，周军上下已被胆怯笼罩。

刘旻站在土丘上，俯视着兵力明显不足的周军，心中也不免懊悔。早知对手如此渺小，自己又何必向辽国请求支援？

不甘心一辈子做“侄皇帝”的刘旻，决定利用这场战役重新赢回中原天子的尊严。他自负地对身边将领说：“我用汉军就足以击败郭荣，何必再借契丹兵！今天我不仅要攻破周人，更要让契丹人对我心服口服！”言罢，刘旻便张乐饮酒，故作闲暇，以示胜券在握。

可辽帅杨衮并不认为敌人那么好对付，他在仔细观察了周军阵营后，向狂傲的刘旻说道：“周军真乃劲敌也！我军不可轻率冒进！”

刘旻捋着美髯，眯起眼睛，不屑地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杨公切莫再言，且在此观我破敌！"

杨衮转身刚要离去，身旁的战旗却正正地打在他的脸上。杨衮心中一惊：方才还是东北风，我军居北朝南，顺风作战，尚需谨慎，现在风向逆转，要逆风出击，对我军更为不利。

心浮气躁的汉将正在鼓动汉主出击；也有精明的谋臣进谏风向不对，切莫草率。刘旻拒听谋臣的劝谏，贸然挥起幡麾，命张元徽率领千余骑士，逆着南风，全力进攻周军的薄弱环节——右厢。

"杀！——"河东战马脱缰，踏起黑风般的沙土，直冲敌阵！

周军右厢，樊爱能与何徽"践行"了冯道的预言，没打两下，扔下兵器撒丫子就跑。骑兵有马，四条腿跑得快，只有两条腿的千余名步兵一看跑不了，只好丢盔弃甲，临阵倒戈，朝着北边大喊"万岁"。

周军上下瞠目结舌。谁也没想到，宿将统领的精锐竟然在顷刻间溃败。首次亲征的郭荣紧握剑柄的右手隐隐发抖，他派出使者令樊爱能、何徽继续率军迎敌。樊、何二人竟然不听，反手将使者砍倒。两人带着逃兵边跑边喊："契丹军至，官军败绩，余众已经投降了！"

周军阵脚大乱，看似坚不可摧的堤坝，瞬间土崩瓦解，汉军犹如滔滔巨浪，席卷着周军的残兵败将，朝着大周皇帝的御帐吞噬而来。

郭荣强作镇定，勉强朝前军和左厢望了望，好在向训、白重赞和李重进依旧稳如泰山，暂无后顾之忧，这让他慌乱的心微微沉静下来。但恐惧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军中迅速蔓延。眼看周军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汉军的兵锋越逼越近。

千钧一发之际，郭荣的亲兵卫队中突然传来振聋发聩的一吼："主上危险，我等怎能不拼死一战！"

郭荣定睛看去，正是28岁的赵匡胤！

紧接着，22岁的内殿直马仁瑀跃马拉弓，大喝道：“使陛下受敌，安用我辈！”说罢挺身出阵，弦声响落，不远处已有数十汉军接连倒下。

士气可用！

郭荣备受鼓舞，在枢密副使魏仁浦的鼓励下，他宝剑出鞘，下达军令，在一片喊杀声中，亲自率领着殿前诸班冲向右翼前线督战。

赵匡胤仔细观察了地形后，指着西面的山坡向张永德建议：“贼寇傲慢，我们全力一搏必然能够破敌！您手下有很多善于左手射箭的士兵，请您率领他们登上高处作为左翼掩护，我率领士兵从右翼出击。国家安危，在此一举！”

好个在此一举！生性豪爽的张永德被这个黝黑汉子的血性感染，也不管什么官位高低，当下分兵给赵匡胤2000人，由他冲阵；自己则率领2000名士兵登上山坡，为赵匡胤打掩护。

一般人射箭都是左手持弓、右手射箭，这种姿势只适合朝左前方发箭，若朝右射就要扭腰屈臂，极不方便。而右手持弓、左手射箭，就能照顾到这个盲点。由这些“左右开弓”的射手组队，攻击范围更大，攻击也更灵活。因而，赵匡胤对张永德特别强调了“左手射箭的士兵”。

赵匡胤跃马扬刀，率军从右翼杀入敌营。他本人一马当先，锐不可当。在赵匡胤的带领下，士兵们无不拼死奋战，以一当百。马仁瑀的骑射手们箭无虚发，31岁的殿前指挥使右番行首马全义也率领着100名骑兵在阵中冲杀。周军的冲锋声第一次压过降军凌乱的哀鸣。

汉将张元徽一心要擒拿郭荣邀功请赏。突然，眼前的汉军士兵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张元徽还没反应过来，马腿上已重重挨了一枪，连人带马倒了下来，死于非命。

汉军大将授首，周军士气大振。郭荣、张永德、白重赞、李重

进、向训诸路并发，乘着南风一路向北杀来。到了下午，刘词的援军终于及时赶到。汉军兵败如山倒，拦都拦不住。长平之战的古战场，再一次成为一边倒的修罗场。

郭荣更是亲自带着50名亲兵突破重围，直冲汉军牙帐。刘旻再也装不下去了，他匆忙扔下酒杯，骑上战马，带着十余名亲信连夜狼狈奔逃，杨衮的辽兵也不战而退。经此一战，汉军损失惨重，“僵尸满山谷”。

刘旻的迅速溃败，激起了郭荣的雄心。在没有充分后勤准备的前提下，郭荣不顾大将们的反对，决定将战争扩大化。周军一路势如破竹，兵临北汉国都太原。赵匡胤甚至杀到城下，放火焚烧城门。

然而，太原城防坚固，汉军严防死守。由于战备不足，导致周军士兵不得不通过劫掠来维持补给，这又使得郭荣的军队在当地大失人心。辽朝也不愿坐视自己的傀儡就此灭亡，迅速派出两支骑兵救援北汉。加上阴雨连绵，瘟疫骤起，周军损失惨重，郭荣不得不下令撤军。

赵匡胤升职，冯道去世

尽管进攻太原失败，但高平一战还是让大周起死回生。

大喜过望的郭荣论功行赏。在张永德的盛赞与保举下，显德元年（954）三月，还在前线的赵匡胤被提拔为殿前散员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殿前散员是殿前诸班中的一支军队，都虞候是这支军队的副统兵官。至于严州远在岭南地区的南汉境内，刺史当然不是实授，只是遥领，用于表示武阶。赵匡胤领刺史，武阶虽然不高，但毕竟算

是有“军衙”的中级统兵官了。[1]

赵匡胤加官晋爵，樊爱能、何徽等70余名“长腿将军”却自食其果。郭荣听从张永德建议，怒斩樊爱能等人。从这一刻起，郭荣确立了在大周王朝的最高权威。

而战前极力劝阻郭荣亲征的冯道，却已经卧病不起。显德元年（954）四月十七日，一代名相冯道与世长辞，享年73岁。郭荣辍朝三日，册赠尚书令，追封瀛王，谥文懿。

冯道的后半生，是夹在武夫与文吏的缝隙间小心翼翼度过的。自从逃过刘守光的毒手后，冯道便苦修“内功”，改变了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

有一次，身在前线的晋王李存勖因赌气要“退位让贤”，冯道力谏：“若让敌人知道，以为我们君臣不和。”由此让李存勖恢复了冷静。

唐明宗李嗣源自恃谷物丰收，颇为自满，冯道只用一首诗，就敲醒了盲目骄傲的皇帝。

辽太宗耶律德光入主中原，纵兵掳掠，冯道用一句“此时百姓，就算佛祖也救不了，只有皇帝能救”，使中原百姓免遭灭族之祸。

曲言达意，文士冯道以自己的方式，忍辱负重，默默影响着武人执掌的王朝。他一面寻找一切机会遏制武人乱政，一面尽己所能实施科举考试、刻印“九经”等有限的文治。在那个武人占据绝对优势的时代，冯道倾尽心力为乱世打着补丁。

---

[1] 在宋朝留下的史料里，包括《资治通鉴》和《宋史》在内，一致说赵匡胤这次破格升任殿前诸班的副统兵官——殿前都虞候。可是在此期间，李继勋、慕容延钊先后担任殿前都虞候，与赵匡胤任职时间重合。因此，张其凡先生推断，赵匡胤此次升任的应该是殿前散员都虞候，隐去“散员”二字，是宋朝史臣有意为之，以此来夸大赵匡胤在高平之战中的不同凡响。

如今，唐庄宗、唐明宗、晋高祖、辽太宗、汉高祖、周太祖，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赳赳武夫，早已魂赴九泉。武夫皇帝既已不在，文士冯道的使命也将完成。

冯道，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道既非永恒之道，那么，它终会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成为令人回味的余响。

第一章

显德风云

一、五代最强禁军的诞生

禁军与统兵官

显德元年（954）六月，郭荣率领大军回到东京开封府。

高平之战的胜利，显著提升了郭荣的政治地位。尽管北伐太原以失败告终，但由于郭荣及时止损，他那刚刚升起的声望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影响。郭荣已经深切感受到军事胜利对于政治权力的意义，他开始思考统一全国、再造中央王朝的可能。

但在此之前，郭荣必须完成一件大事——整顿禁军。

宋朝的缔造过程，在后周统治的延长线上；宋太祖赵匡胤的夺权，又是后周禁军“殿前化”改革的“成果”。不讲明白禁军是怎么回事，我们不但看不清赵匡胤如何在短短10年里，从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的武官之子，一跃成为开国皇帝；更看不清为什么乱哄哄的中晚唐和五代，到了宋朝就突然平静下来。

因此，借着郭荣整顿禁军的由头，我们先来把禁军的问题解释清楚。

首先来看禁军的编制和统兵官的级别。

伍　五代军队的最基层单位，是由5人组成的伍，每伍都设有一名伍长。

将（队）　4伍组成1将，又称1队，总计20人，正副统兵官分别为十将和副将。王审琦在跟随郭威西征后，因功升任的厅直左番副将，就是“厅直”这支军队的“左番”支队的副队长。

都　5将组成1都，总计100人。如果“都”是马军（骑兵部

队），正副统兵官就分别称为军使和副兵马使；如果是步军（步兵部队），正副统兵官就分别称为都头和副都头。赵匡胤和王审琦担任的东西班行首，大体相当于马军军使。后来赵匡胤去开封府担任的马直军使，也属于这个级别。

指挥（营） 5都组成1指挥，又称营，总计500人。指挥级的正副统兵官分别为指挥使和副指挥使。赵匡胤在出任开封府马直军使前，外调的滑州兴顺军副指挥使就是这一级别。赵弘殷做了20多年的飞捷指挥使，同样属于这个级别。

指挥是五代至宋朝军队的基本单位，一支军队所辖的兵力通常都以“指挥”为单位进行统计。一定数量的指挥可以组成带有番号的军队。比如赵弘殷曾经在飞捷军、护圣军、铁骑军、龙捷军任职，“飞捷”“护圣”“铁骑”“龙捷”都属于番号军。

军 当一支番号军统辖的兵力较大时，便会在其与指挥之间设立“军”。理论上由5指挥组成1军，总计2500人，但实际上各军情况不一，并不完全按照这个规则来配置。每个军级单位按照顺序排列，称为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军的正副统兵官分别为都指挥使和都虞候，都指挥使俗称军主。比如赵弘殷在西征后升任的护圣都指挥使，就是护圣军下的某一军的统兵官。后来担任的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也是这种情况。

从军级开始，统兵官有了武阶，自低至高，依次是刺史、团练使、防御使、节度使，类似于今天的军衔。它代表的是统兵官个人的身份级别。同样的军职，统兵官的武阶可能不一样。军主的武阶通常为刺史。

厢 如果一支番号军的规模非常大，下辖的军非常多，那就不容易指挥了。这时候，就会将番号军分成左右两厢，每厢统辖若干军，左厢所辖称左第一军、左第二军……右厢所辖称右第一军、右第二军……

理论上，一厢由10指挥组成，也就是5000人，可实际兵力依然

是“依军而定”。像后周的龙捷军右厢，至少有9个军，显然不可能只有5000人。

厢级的正副统兵官依然分别叫都指挥使和都虞候，都指挥使又称厢主。其武阶通常为团练使、防御使。比如赵弘殷后来升任龙捷右厢都指挥使，是一厢之主，他的武阶最初是团练使，后来升至防御使。

有时番号军的左右厢还会设立统一的统兵官，称为左右厢都指挥使或左右厢都虞候，甚至还有同时兼掌两个番号军的四厢都指挥使或都虞候。后周时期，四厢都指挥使、左右厢都指挥使的武阶为防御使。

再往上，统领所有番号军的，便是禁军最高级的指挥机构和将领了。这些将领武阶通常为节度使，位高权重。

相信读到这里，大家还是一头雾水。没关系，我们列一个更加直观的表（表1-1）。后面大家分不清楚谁是什么级别的时候，随时可以翻回来查阅。

表1-1　五代、宋初军队编制和统兵官级别

军队编制		规模	统兵官		武阶
高级统兵官	—	—	—	—	节度使
中级统兵官	四厢	不固定	正	都指挥使	防御使
			副	都虞候	
	左右厢	不固定	正	都指挥使	防御使
			副	都虞候	
	厢	10指挥（5000人）（理论上）	正	都指挥使（厢主）	防御使 团练使
			副	都虞候	团练使
	军	5指挥（2500人）（理论上）	正	都指挥使（军主）	刺史
			副	都虞候	

续表

军队编制		规模	统兵官			武阶
低级统兵官	指挥（营）	5都（500人）	正	指挥使		—
			副	副指挥使		
	都	5将（100人）		马军	步军	—
			正	军使	都头	—
			副	副兵马使	副都头	
基层统兵官	将（队）	4伍（20人）	正	十将		—
			副	副将		
	伍	5人	正	伍长		—

注：周宋之际，高级统兵官由于时常有职位增载和武阶调整，故未列。

开启禁军“殿前化”的进程

说完禁军编制与统兵官级别，我们再来说说禁军里的两大系统——侍卫亲军和殿前诸班。

侍卫亲军直接脱胎于藩镇兵。随着藩镇变成王朝，藩镇兵也变成了禁军。最初，侍卫亲军是众多禁军中的一支。天福元年（936），晋高祖石敬瑭将各大番号禁军整合到一起，统称“侍卫亲军”，并成立侍卫亲军司（简称侍卫司），作为全国禁军最高统帅机构。

侍卫亲军的正统兵官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统兵官从高到低依次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鉴于这些统兵官的名称太长，我们按照史书惯例简称其为侍卫都指挥使、侍卫副都指挥使、侍卫都虞候。

侍卫亲军所属军队分为马军和步军两大系统，分别以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简称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

使（简称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领。马军和步军中设有众多的番号军，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军中的护圣军、步军中的奉国军。护圣、奉国各分左右两厢，是侍卫亲军的精锐主力，有“上军”之称。郭威在位时，又将其分别改名为龙捷军、虎捷军。

侍卫亲军的各级统兵官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参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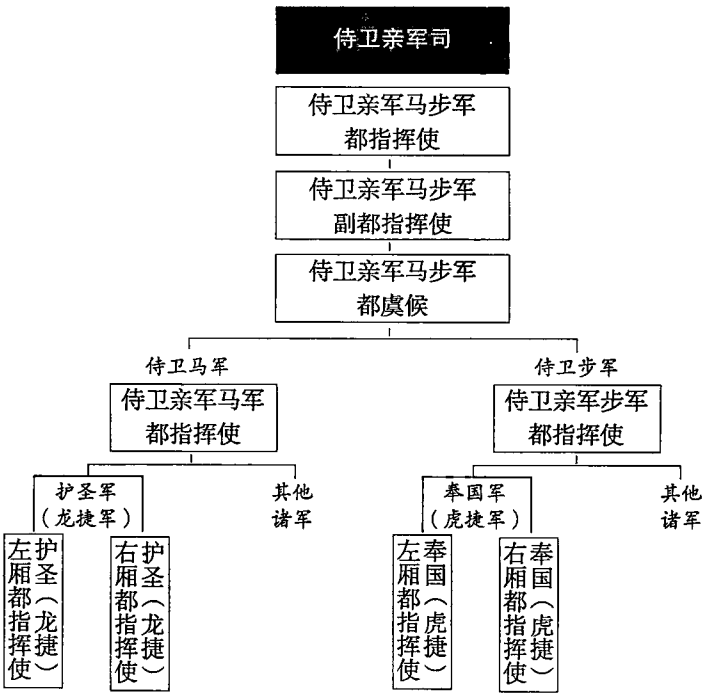


图1–1　侍卫亲军各级统兵官关系图

后晋、后汉时，侍卫亲军始终是朝廷征战天下的绝对主力，郭威西征平定三镇，北上进驻邺都，所率军队都属于侍卫亲军。

可是进入后周，侍卫亲军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

郭威能够成功发动兵变、攻陷开封，离不开王殷、郭崇（即

郭崇威，因避周太祖郭威讳改名）、曹胤这些侍卫亲军将领的支持。郭威称帝后，自然要对他们投桃报李。王殷升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全国禁军的最高统兵官，屯驻在郭威的“龙兴之地”邺都；郭崇、曹胤也分别升任侍卫马军、步军都指挥使。三人显赫一时，连郭威都要让他们三分。

可郭威与他们的关系实在说不上亲密。大家绑在一条船上，全是托了刘承祐的“福”。一旦刘承祐倒台，郭威与他们之间的合作就可能变成竞争。特别是王殷等人出自侍卫亲军，都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在军中各有各的山头。这三位哪里是郭威的臣僚，分明是大周的合伙人。

相比之下，郭威在军中的势力相当薄弱。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开国之君虽然都是武人，但郭威与其他四位大不相同。他虽然早年也冲锋陷阵，但却以文职人员的身份一路升迁，在军中没有做过高级将领。西征虽然为他赢得了空前的威望，但毕竟带军时日尚短。因此，和那些自己统兵打天下的开国之君不同，郭威在军中没有基本盘。

直到屯驻邺都，郭威才临时组建了一支真正听命于自己的嫡系军队。这支军队中，有他的亲属，如养子郭荣、外甥李重进、女婿张永德；有他为数不多的同僚和旧部，如陆万友、慕容延钊；有他在西征北讨中，从侍卫亲军纳入麾下的少数将士，如张令铎、王审琦、党进、杨光美；但绝大多数，都是他在邺都公开招募的新兵，赵匡胤、李继勋、石守信都是其中一员。这些傻小子中的佼佼者，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他们在军中年纪轻、资历浅、职位低，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却又有着急切的建功立业需求，对郭威的依附性最强，自然也就更加忠诚。

可以说，郭威在邺都公开募兵，不仅针对刘承祐，更针对侍卫亲军。这种针对性，随着殿前诸班的崛起，变得越来越强。

“殿前诸班”全称殿前诸班直，是对皇帝私人卫队的统称，脱

胎于藩镇节帅的私人亲兵。班是马军卫队，直是步军卫队。这些各有独立番号的卫队彼此之间互不统属，也不隶属于侍卫亲军司。这意味着，殿前诸班属于皇帝私人，不属于朝廷，他们对皇帝绝对效忠，但朝廷却根本指挥不动他们。

正因如此，殿前诸班与郭威的嫡系军队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从广顺元年（951）至显德元年（954），在短短的三年统治期间，郭威将嫡系将士一股脑儿全塞进了殿前诸班。由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禁军“殿前化”进程。而其中的统治逻辑，与历代皇帝培养秘书班子组建内朝，并最终取代外朝的宰相如出一辙。

同时，郭威又着手扩充殿前诸班的兵力，并在诸班直之上设立统一的统兵官——殿前都指挥使和殿前都虞候，级别相当于侍卫亲军的厢级统兵官。首任殿前都指挥使和都虞候，分别是被他寄予厚望的李重进和张永德。

经过改革，郭威开始将分散的皇帝私人卫队初步整合成一支统一的军事力量。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嫡系的少壮军人必然会熬过侍卫亲军的“老家伙”们，成为郭威在军中的中流砥柱。

然而，“老家伙”们还没趴下，郭威却先熬不住了。自广顺三年（953）入秋，郭威便患了重病，自觉来日无多。为了让养子郭荣顺利继位，郭威决定以雷霆手段处理禁军的最大隐患。

这年十二月，郭威趁着侍卫都指挥使王殷入朝之机，给他扣了个造反的帽子，将其处死；来年正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胤也被罢去军职，出守藩镇，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樊爱能、虎捷左厢都指挥使何徽分别接替了他们的职位。

郭威建周的三大从龙之臣，至此全部从朝廷消失。

与此同时，郭威不忘提升殿前诸班的地位。李重进的武阶升至武信军节度使，这使他开始与樊爱能、何徽三足鼎立。

李重进的年龄、资历、威望都在郭荣之上，为了保证殿前诸班能够继续效忠郭荣，郭威特意把李重进叫来，让他对郭荣行君臣

之礼。

一切安排妥当后，郭威溘然长逝，享年51岁，庙号周太祖。4天后，新即位的周世宗郭荣以李重进为侍卫都虞候，凌驾于樊爱能、何徽之上。这是殿前诸班的嫡系将领首次染指侍卫亲军，郭荣要借李重进的威名来统领、压制侍卫亲军。同时，殿前都虞候张永德升任殿前都指挥使，进阶泗州防御使；控鹤第一军都指挥使、领和州刺史韩令坤补位殿前都虞候。

郭威、郭荣扶持殿前诸班、打压侍卫亲军的做法，引起侍卫亲军将士的强烈不满。因此，樊爱能、何徽一到高平，就弃阵而逃，将郭荣卖给了刘旻。老谋深算的冯道正是看破了这一点，才极力阻止郭荣亲上前线。

好在殿前诸班的卫士没有令人失望，他们最终成为郭荣征战天下的王牌。

显德元年（954），是郭荣扬眉吐气的一年，也是殿前诸班飞黄腾达的一年。凭借军事行动，郭荣多次对殿前诸班的将领加官晋爵。三月，赏血战高平之功；七月，赏北伐太原之功；十月，赏整顿禁军之功。在短短的半年多内，不少殿前系的将领实现了火箭式升迁。

比如韩令坤，三月由殿前都虞候、领和州刺史，升至龙捷左厢都虞候、领容州团练使；仅仅过了四个月，他便升任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泗州防御使；又过了三个月，韩令坤已经接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武定军节度使，实现了“连升三级”。

赵匡胤的升迁更为夸张，他从未明确记载官位的“宿卫将”升任殿前散员都虞候、领严州刺史，再升至殿前都虞候、领永州防御，已成为张永德的副手。

李重进和张永德的地位也空前加强。到显德元年七月时，李重进担任侍卫都指挥使、领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成为禁军中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将领；张永德担任殿前都指挥使、

领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傅，虽然不及李重进，但排名仍在新任的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步军都指挥使李继勋之上。

借助战争带来的空前威望，通过操纵人主权柄，郭荣与昔日殿前系的将领建立起实质性的君臣关系，使他们对自己俯首帖耳，并名正言顺地将部分殿前系将领安插进了侍卫亲军，达到了控制侍卫亲军的目的。

在随后的五年里，郭荣频繁发动战争，不仅因为要重新实现天下一统，更因为他早已窥透军事行动对政治集权的关键作用。

整顿禁军，编练赵家军

让我们回到显德元年（954），回到本章开始的话题——郭荣整顿禁军。

高平一战，郭荣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这让他自信能够通过战争的胜利来驾驭骄兵悍将。然而，樊爱能与何徽的“出色”表现，让郭荣对这支老牌禁军彻底失去信心。是时候重组侍卫亲军，编练一支足堪重任的新军了。

事关军方各派的切实利益，选谁来主持整顿禁军，郭荣陷入沉思。

侍卫亲军的旧将自然不在考虑范围。

至于来自殿前系的将领，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肯定不合适，他们已经分别是禁军两大系统的最高统兵官，再让他们去整顿禁军，会有震主之嫌。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李继勋、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也不合适，这三个人虽然忠于郭威，但与郭荣的关系远没有那么密切。

石守信、王审琦那些人就更不合适了，他们没有足够的军功和

威望，让他们去整顿禁军，军中谁听他们的？

想来想去，郭荣觉得，就只有赵匡胤最合适。

赵匡胤的职位、武阶都不高，不像李重进等人具有威胁性。在高平一战成名，又使他具有石守信、王审琦不具备的声望。他曾是开封府马直军使，是郭荣做皇帝前的幕僚，对郭荣忠心，郭荣也对他熟悉。此外，他的父亲赵弘殷、赵弘殷的好友赵晁正在侍卫亲军中担任厢级统兵官，两人既没有野心，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正好可以配合赵匡胤整顿侍卫亲军。

确实，没有比赵匡胤更合适的人选了。

为了加强赵匡胤的权威，郭荣特让他临时以殿前都虞候的身份来主持禁军的整顿。当时正式的殿前都虞候是慕容延钊，一时之间，军中出现了两个殿前都虞候。

关于禁军整顿的指导原则，郭荣明确指示："侍卫亲军的士兵，历朝以来，有老有少，以致强弱不分。大概因为禁军的待遇不错，很多人托关系走后门进来当兵，结果造成无法选拔训练。今年春天，朕在高平与刘崇和契丹军队相遇，居然有大敌当前却不听指挥者！要不是朕亲自披挂上阵，大军几乎就要溃败！何况一百户农夫，未必养得起一个士兵。兵在精，不在众。朕准备对禁军一一点选，将精锐的将士升为'上军'，老弱病残者任其自便。这样的军队才不会白白浪费军饷。"

针对侍卫亲军，郭荣的话说得很冠冕堂皇，毕竟他也不好把大周皇室与侍卫亲军的爱恨纠葛公之于众。赵匡胤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淘汰侍卫亲军中的老弱病残，另一个是选拔精锐将士编入"上军"。

选拔精锐并不难做到，但是淘汰老弱病残就太难了。因为禁军士兵都是招募的职业兵，他们被淘汰无异于下岗失业。被淘汰的人多了，自然就会聚在一起闹事造反。可是不让他们离开军队，又实在没有地方安置。所以最稳妥的方法，只能是少淘汰。这就难怪郭

荣要说，对这些老弱病残任其自便了。

由此可见，郭荣压根就没对侍卫亲军的选练抱什么希望。

他的希望，全在殿前诸班。将整顿禁军的任务交给殿前都虞候，这样的暗示还不够明显吗？

在郭荣的支持下，赵匡胤首先进一步整合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使、散都头、散祗候、东西班承旨等皇帝卫队，使他们正式以殿前诸班的名义成为即将组建的殿前军的一部分。

殿前诸班的人数并不多，每支卫队少则百人，多也不过数百人。但郭荣要求，军中将士必须都是精锐中的精锐，这就是他所说的“兵在精，不在众”。为此，郭荣下达了各种招募勇士的命令。

他要求从下级军官和军官子弟中选拔“材勇”，编入内殿直，连侍卫亲军的精兵也要参加选拔。他又命令藩镇选拔猛士入京应选。更有甚者，郭荣下诏民间也可以参加选拔，哪怕是十恶不赦的盗匪，只要功夫了得，都可以来殿前诸班参选。

将校士卒之所以愿意披荆斩棘来参选，自然是因为殿前诸班待遇优厚。作为皇帝的近卫军，殿前诸班的普通士兵享受着禁军其他各部中低级统兵官的待遇。将校的级别也更高，一支百人军队的统兵官，武阶就能达到刺史，相当于统率2500人的军级将校。当年赵匡胤担任的殿前散员都虞候便是如此。

话又说回来，殿前诸班无论如何精锐，如何扩编，这支皇帝近卫军也不过万余人。侍卫亲军有马军龙捷军和步军虎捷军两大“上军”，要想与之一争高下，殿前诸班必须也要针锋相对地设置用于征战的马军和步军。

这是郭荣此次练兵最大的手笔。

最佳的备选军队，是郭威时代就备受重视的殿前诸班之一——铁骑军。郭荣比照侍卫亲军的龙捷军，进一步将铁骑军扩编到左右两厢4个军、40指挥、2万人的规模。新任的铁骑左厢、右厢都指挥

使分别是石守信和高怀德。[1]

无独有偶，殿前诸班中的控鹤军也被郭荣独立出来，比照铁骑军的规模扩编，成为一支新兴的步军部队。新任控鹤左厢都指挥使为张令铎，右厢都指挥使未详。

就这样，铁骑与控鹤，成为与龙捷、虎捷一样的“上军”，后来它们被统称为“上四军”，至北宋仍然是禁军中的精锐主力。

经过郭荣的整军，殿前诸班的数量由原来的十余班扩充至二三十班，兵力不下万人；铁骑、控鹤独立成军，总计也在4万人左右。以殿前诸班为核心，以铁骑军、控鹤军为主力，兵力高达5万人的殿前军正式成军。尽管在人数上还逊于侍卫亲军，但殿前军将士的素质却远在侍卫亲军之上。

如今，殿前都指挥使与殿前都虞候，不仅是皇帝私人近卫军的最高统兵官，更是大周精锐之师——殿前军的最高指挥官。殿前军也有了与侍卫亲军司对峙的新机构——殿前军司（简称殿前司）。殿前司的公署设于皇城之内，位于皇宫大门左掖门附近，而侍卫司的公署却在皇城之外。由此可见，殿前司与皇帝更亲近，也更为重要。

从此，后周的禁军格局不再是侍卫亲军与殿前诸班的各自分工，而是两司——侍卫司与殿前司的势均力敌。

在赵匡胤的努力下，殿前军的编练如期完成。郭荣披上戎装，亲自来到校场检阅。但见万马奔腾，动如烈火；甲胄凛凛，不动如山。随从史官提笔记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兵甲之盛，近代无比！”

没人注意到，将台上，发号施令的赵匡胤是如此轻车熟路，挥

[1]《宋史·石守信传》称石守信为“铁骑左右都校”，也就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这一职位同时统领铁骑左厢、右厢军队，五代至宋皆有类似军职，但一般称“左右厢都指挥使”“左右厢都虞候”等，不省“厢”字。此处“右”疑当作“厢”。

洒自如。

毫无疑问，在整顿禁军、编练新军过程中，真正负责具体事务的是临时殿前都虞候赵匡胤。特别是招募新兵、选练新军，更是由赵匡胤来主持。

赵匡胤当兵伊始，遇到的就是与将士同甘共苦的郭威，这让他有了学习的榜样。如今轮到自己，赵匡胤也亲自下场，在选练新军的过程中，与士兵们打成一片。传说他还把自己发明的进攻套路亲自传授给将士们，这门功夫，拳法被少林寺整理成著名的太祖长拳，棒法则成为明代练兵时必备的赵太祖腾蛇棒。武功冠以帝王之名，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这样的赵匡胤，自然受到殿前军将士的拥戴与崇拜。这些被赵匡胤招来的新兵，后来长期追随赵匡胤，有不少人在征战中崭露头角，最终成长为新一代将校，也正是在这种长期的上下级关系中，不少基层统兵官和士兵成为赵匡胤的亲信。如瀛州人杨义（后因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名杨信）、涿州范阳人李怀义（后因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名李怀忠）、幽州人田重进、京兆万年人崔翰、大名馆陶人张琼等，后来都成为赵匡胤的亲兵。

有意思的是，这些亲兵、亲信大多来自河北，甚至不少人的籍贯就在昔日的幽州镇境内，这或许也成为他们与赵匡胤之间的重要关系纽带。

古代官场讲究门生故吏，如今的赵匡胤也有了自己的“门生故吏”。他在禁军中拥有了郭威与郭荣都不曾具备的基本盘。

郭荣与赵匡胤都不会想到，这支大周的新军，在不久的将来，悄无声息地变成了“赵家军”。

二、三征淮南

县令贪污案之争

显德二年（955），完成禁军整顿的郭荣愈发自信。在将领们感受到这位新皇帝雷厉风行的同时，文臣们也开始承受新皇帝对他们施加的压力。

为了一桩县令贪污案，宰相范质正与皇帝郭荣当庭大吵。

郭荣认为，贪污就要严惩："身为亲民之官，竟贪污到如此地步，应当依法处死。"

杀尽贪官，郭荣说出了多少人心中的"正义"。

可范质却回奏："监守自盗，固然有罪，但即使贪墨数额再大，依律也是罪不至死。"

既然是要"依律处死"，当然就要有律法依据。既然律法上说罪不至死，那么"依律"自然就不应"处死"。范质坚守着律法底线，并没有向郭荣的"正义"让步。

郭荣大怒，厉声问道："律法自古为帝王所定，本就用来防范奸邪之辈。现在朕立法，杀个贪官，这不算酷刑！"

范质摇摇头，义正词严地说："以陛下的名义杀他，当然可以。但若交给朝廷，以律法之名处死，臣不敢签字。"

在郭荣看来，立法权在皇帝手里，皇帝要惩恶扬善，对恶人立重法，这难道也不对吗？

可在范质看来，律法就是律法，要修订总要经过讨论，有个过程。皇帝今天能为杀恶人而临时起意，擅自更改律法，明天就能为

杀善人而随时胡乱立法。律法都能随便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自然也是皇帝一句话的事；什么算违法，怎样算犯罪，也全凭执法者的一张嘴。真到了那天，律法还是律法吗？

因此，范质寸步不让。要杀人，皇帝您大可以自己的名义去杀，反正我也拦不住，可是朝廷要遵守律法，决不能知法犯法。范质坚决不在郭荣的命令上签字，拒绝承认郭荣的“乱命”。

范质是读书人，还在科举中考中了进士，属于在五代时期最不受待见的文士。好在范质的业务水平扎实，行政文书写得漂亮，这让他在后晋时受到皇帝与宰相的器重。后周建立伊始，对文士颇为重视的郭威便任命范质兼任宰相和参知枢密院事，范质自此成为后周重臣。

范质与郭荣的争论，记载于宋人王君玉的《国老谈苑》一书，书中未记录争论的最终结果。在这场争论中，我们领略了范质刚正不阿的文士风骨，也看到了郭荣乾纲独断的雄主做派。

郭荣的强势与事必躬亲，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担忧。早在显德元年（954）七月，河南府推官（主管当地司法事务）高锡就曾劝谏郭荣，应该让百官各司其职，皇帝垂拱而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主上您事必躬亲，这是对谁都不信任。可是郭荣根本不听。

在郭荣眼中，自己要完成的是一统天下的大业，这需要调动大周的一切力量。可天下刚刚转危为安，“天子轮流做”的习俗还远未消除，这时候自己去“垂拱”，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即位以来，郭荣一直表现得事必躬亲。硬仗要亲自打，政务要亲自理，当然，亲信更要亲自培养。

只是郭荣对百官颇为刻薄，稍有不顺，即用峻法。一味用重典，让天下人战战兢兢，这不是最好的政治生态。

《平边策》与“三十年之约”

显德二年（955）四月，后周的20余名文士突然接到命令，要求写一篇统一天下的战略规划。

当时的天下仍然四分五裂。北方的幽蓟十六州为辽朝占据，河东地区则由世仇北汉割据；南方的南唐纵横江淮，后蜀雄踞两川，这是可与中原一争高下的两大强国；除此之外，江浙的吴越、闽南的泉漳、荆湖的荆南与湖南、岭南的南汉……这些割据一方的小政权就像一群蟹蚌螺蛳，栖居在大国之间，时不时翻个身，把四海搅得圈圈涟漪。面对这么多割据政权，后周的统一要从哪里下手呢？

在众多的统一方案中，比部郎中王朴的《平边策》脱颖而出。

这篇文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统一的政治前提。王朴认为，天下四分五裂，根本原因是“君暗政乱，兵骄民困”。现在，只要统治者得民心，敌对政权的老百姓就会自愿成为“带路党”。因此，建立一个稳定的文官政府以获取民心，进而将民心转变为军事支持，是建立武功的前提。

第二部分就是具体的统一步骤。王朴提出的总原则是从容易的地方突破。以军事实力来看，进攻南方诸国要比在北方与北汉、辽朝作战容易得多。因此，王朴提出先对南方用兵的战略。

第一步，轻兵拖垮南唐。由于南唐与后周的边境线较长，一定会有守备薄弱的地方，因而最易受到袭扰。王朴建议，后周从南唐守备薄弱处派出轻兵，唐军守东，周军就扰西；唐军守西，周军就扰东。这样唐军疲于奔命，后周却可以乘机一探虚实，然后再发动大军乘虚而入，夺取江北诸州。紧接着，周军就地补给，进而挥师南下，江南自可平定。

第二步，传檄而定蜀桂。王朴认为，后周灭掉南唐后，弱小的

南汉、湖南、荆南、后蜀迫于后周的兵威，一定会因感到惧怕而俯首称臣。倘若他们不肯臣服，再发兵将其灭掉。至此，南方诸国全部平定。

第三步，威压收复幽燕。王朴预想，当南方全部纳入版图后，控制幽蓟十六州的辽人就会望风而逃。

最后一步，武力扫灭北汉。因为北汉与后周是世仇，故而王朴认为，北汉绝不会屈服，只能派出重兵扫荡。不过自高平一战之后，其实力大损，士气低落。既然是硬仗，不如就留到最后。等待时机成熟，可以一战而定天下！

“好！”读了王朴的文章，郭荣拍案叫绝。此次献策，绝大多数文士都在空谈“修文德，来远人”的大道理，只有陶穀、窦仪、杨昭俭和王朴谈到用兵江淮。尤其是王朴，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大战略。

南宋时，朱熹将王朴的《平边策》与萧何、韩信为刘邦制定的战略，邓禹为刘秀制定的战略，以及诸葛亮的《隆中对》相提并论，称它们“以寥寥数语而定天下大势”。可见宋人对《平边策》的评价之高。

当然，王朴的《平边策》只是一种战略构想，并非无懈可击。比如他预判辽人会望风而逃，可谓“迷之自信”。大概王朴觉得，周军的目标是收复幽燕而非消灭辽朝，辽朝的根本也不在此地，因此与辽的冲突有限。可从后来的历史看，王朴显然低估了辽人保有幽燕的决心。

尽管如此，郭荣在读罢《平边策》后，依旧摩拳擦掌，迫不及待。他急召王朴，商议用兵事宜。王朴入宫对策，神气劲峻，声如洪钟：“如今我们兵强马壮，军备齐全，军纪严明，将士效命。一年之后，即可出师。今年夏秋时节，就应在边镇积蓄粮食，以备军需。”这就是一张近期对外作战的时间表。

王朴，字文伯，郓州人，进士出身。郭荣在澶州做节度使时，王

朴便担任掌书记，成为他的重要僚佐。在递交《平边策》后不久，王朴便迁官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十二月，再拜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仍兼知开封府事，成为郭荣的心腹与高级顾问。

有一天，郭荣突然问王朴："听说你精通术数？"王朴回答说："臣略知一二。"郭荣继续问："那依你看，朕还能活多少年？"王朴沉默片刻，伸出三根手指头："三十年以后的事，臣就不知道了。"郭荣闻言大喜，憋在心里许久的雄心壮志终于一吐为快："若如卿言，朕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够了！"

显德二年（955）五月，郭荣首先发动了对后蜀的战争。当时，陇右的秦、成、阶、凤四州为后蜀所占据。这四州既是蜀地北伐中原的重要桥头堡，也是其防御北军南下的战略要地。为了将后蜀扼制在秦岭以南，以解除后周用兵江淮的后顾之忧，郭荣发兵强夺四州。

因为地形险峻，战线太长，周军一度供给不继，战争陷入僵局。到了七月，前线将领要求罢兵。郭荣派出赵匡胤实地调查，赵匡胤认为四州可取。于是，郭荣决定"砸锅卖铁"支援前线。九月，他下诏全国禁用铜器，把民间的铜器都收缴上来用以铸钱，以解决前方因巨额军费造成的钱荒。又过了一个月，周军终于取得突破，攻占了秦、成、阶三州。到了十一月，凤州也被纳入后周版图。

攻取后蜀四州之战，再一次激励了郭荣。一场在他有生之年规模最大的战役，由此拉开了序幕。

进退维谷的南唐

北国白雪犹凝，江南绿茵已遍山。悠长的古钟，静静弹吹着青翠的薄雾，掸起几缕炊烟，萦耳不鸣。初春清晨，暖鸭未呷，郁郁

葱葱，最是养心。

只是清凉山上，却难清凉。

南唐皇帝李璟敬罢禅香，匆匆离开清凉道场。他眼窝深陷，目光无神，两道法令纹犹如铁索，深锁笑颜，不见春暖，唯觉余寒。

一钩初月临妆镜，蝉鬓凤钗慵不整。重帘静，层楼迥，惆怅落花风不定。

已至不惑之年的李璟，却像一位闺中愁春的女子，不闻阁外春音，却思一派春意。

李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他的王朝，已是李渊以来第三个以“唐”为国号的政权。自安史之乱以来，北方便战乱不断，水患不绝，经济遭到致命打击；相反，江北淮南，经济代之而为全国之冠。这里广袤千里，土地肥沃，盐茶盛产，商贾不绝，是富庶的天下都会。

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割据江淮，于唐天复二年（902）受封为吴王，是为吴国之始，历史上又称杨吴。这是一个自建立伊始就与中原分庭抗礼的政权。

杨行密死后，随他起兵的谋臣徐温逐渐掌握了实权。这期间，吴国夺取江西全境，随即将国策转为扬文制武、休养生息、睦邻友好。唐末曾遭战火毁坏的淮南经济迅速恢复，吴国的国势越发强大。

徐温之后，执掌吴国命运的是其养子徐知诰。吴天祚三年（937），徐知诰废黜吴帝，登上皇位，改国号为齐。不久，他恢复本姓，改名李昇，自称唐室后裔，改国号唐，以江宁府金陵城为国都，史称南唐。李昇庙号南唐烈祖，又被称为南唐先主。

吴国本来就以匡复唐朝作为自己存在的合法依据，如今李昇连国号都改了，进取中原、“恢复旧土”更成为南唐招揽人才、对抗

五代朝廷的政治旗帜。

李昪认为与南唐相邻的吴越、闽、楚三国征讨起来耗时费力，得不偿失，不如与他们息兵安境，争取战略时间增强国力。南唐真正的敌人是北方朝廷，中原兵祸不断，早晚还会生变，那时南唐再发兵北上。待平定了中原，南方诸国自可传檄而定。

李昪的统一方略，与王朴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比王朴早了十余年。李昪缺少的，只是中原大乱的机遇。

李昪能等，但他的儿子李璟等不了。李璟继承皇位后，进一步削弱武将的力量，全力扶持文士。在他的朝廷中，宋齐丘、陈觉、魏岑、查文徽、冯延巳、冯延鲁等人皆文学之士。宋齐丘曾是李昪最重要的谋士，但如今早已蜕变成玩弄权势的老官僚。至于陈觉等五人，素有“五鬼”之称，他们虽然文采华丽，却无治国之能，还联合宋齐丘党同伐异，将孙晟、韩熙载等有志之士排斥在决策圈外，并鼓动李璟对外招讨，以建功立业。

如果说北方的五代，特别是后汉，是武人乱政的一个极端，那么南方的南唐，就是文人弄权的另一个极端。

正是在这样的仓皇之中，李璟趁着福建、湖南内乱之机，南并闽，西灭楚，交后蜀，结北汉，联契丹，居然将南唐的版图扩张到史上最大，隐然有席卷江表、并吞八荒之势。

李璟自鸣得意，于是建千春阁，起百尺楼，云衣霓裳，临江赋和，好似千里江山，万里雍容，早随二月春风，尽入他文华锦袖。

然而南唐的金碧辉煌，不过是一场浮华。李璟沉迷风月，不能自拔；将相醉生梦死，文恬武嬉；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征讨闽、楚两国，更是择帅非人，兵骄无纪，又在当地横征暴敛，大失民心。最终，闽中七州，南唐只占其四，湖南地区更是得而复失。

两次军事行动，唐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更重要的是，诚如李昪所料，这时的中原再度陷入战乱，发生了契丹灭晋的“开运之祸”。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李璟的主力却深陷南方泥沼，根本

无力北向。待到后周初建、内有叛兵之时，李璟才抽出主力军队北上，企图浑水摸鱼，结果鱼没摸着，反弄了一身腥。

缥缈十三年，李璟不过赢得“惆怅落花风不定”，他发誓此生再也不对外用兵。

柳堤芳草径，梦断辘轳金井。昨夜更阑酒醒，春愁过却病。[1]

淮水边的一声大喝，终于惊得李璟夜阑酒醒。

赵匡胤“独立团”

按照王朴的计划，周显德二年、唐保大十三年（955）十一月一日，与后蜀的战争还未彻底结束，郭荣便以宰相李穀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线最高军事长官）兼知庐、寿等行府事（前线最高行政长官），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彦超为副，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将出师伐唐。

所谓行营，是一种临时编制。受命外出征讨的军队，皆设“行营”作为战时组织。行营的长官一般叫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副长官叫行营马步军副都部署、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其下还设有行营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等。

由于淮水在冬季进入枯水期，水位下降，这道本就不可靠的“天险”更加脆弱。因此，唐军每年冬天都会专门增兵防守淮水一线，称为“把浅”。可是如今，南唐竟以“疆埸无事，坐费资粮”为由，将“把浅”废止了。周军突袭而来，最初竟如入无人之境。

---

[1] 引自李璟《应天长》。

然而，在寿州城下，周军遭到南唐清淮军节度使刘仁赡的顽强抵抗，月余不克。李璟以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领兵2万增援寿州；以奉化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晖，常州团练使姚凤统兵15 000人进屯定远，[1]号称15万，遥为策应。

次年（956）正月六日，郭荣下诏亲征淮南。他首先以宣徽南院使向训为东京留守，端明殿学士王朴为之副，总管开封境内事务；又以彰信军节度使韩通为侍卫都虞候、权点检侍卫司事、在京内外都巡检，统领京师守备部队。随即命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率军先赴正阳，与屯驻于此的李穀会师，自己则于两天后正式出师。

这次用兵，不仅皇帝亲征，而且禁军14名中高级将领，除了坐镇京师的韩通，以及两名因失载无法确定身份外，其余11人全部出征；此外，还有许多担任节度使、防御使的宿将、名将正在率军向寿州集结。可以说，为了打赢这场战役，后周军队的精锐几乎倾巢而出。

这意味着，尽管郭荣按照王朴《平边策》的战略顺序，向南唐开战，但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王朴的袭扰之策，改为采取战略决战。他要尽快打垮南唐，完成第一个“十年”的目标。

为了渡过淮河，李穀命周军在寿州城西的正阳一带架设了浮桥。唐军向正阳发动反攻，试图摧毁浮桥，切断周军后路。李穀本是文人，虽然素有平定江南之志，却没有统兵经验。为防有失，李穀竟命周军撤回淮河北岸，将战役主动权拱手相让。

关键时刻，李重进抵达前线。尽管唐军的旌旗遮天蔽日，可军前却布满了拒马牌、铁蒺藜。战斗经验丰富的李重进，料定唐帅刘彦贞是个胆怯的纸老虎，于是率领周军发动反击。当时，赵弘殷作

[1] 皇甫晖部具体数字，《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三》作“万五千人”，《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作“三万”，《宋史·太祖纪一》作“众号十五万”。刘彦贞部已达2万，作为主力，不应比作为偏师的皇甫晖部少。

为初征十二将之一，正担任先锋，他与李重进、韩令坤两军合势进击，数万唐军一鼓而溃。周军阵斩刘彦贞，生擒大将数十人，斩首万余级，俘获3000余人，收军资器械30余万、战马500匹；而唐军却伏尸三十里，几乎全军覆没。不久，郭荣也到达正阳，以李重进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代李穀为帅。

正阳大捷后，南唐大为震恐，增援的皇甫晖被迫退保清流关。而刘仁赡却依然神情自若，坚信寿州坚如磐石。

二月，万余南唐水军进驻寿州东北的涂山，与退往清流关的皇甫晖部形成掎角之势。周军一旦疲态稍露，两路唐军就能够联合寿州守军里应外合，把数万周军包围。尤其是涂山水军，可以从水路迅速到达寿州，将淮水两岸的周军截为两段。而周军以骑兵和步兵为主，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郭荣必须派出一支奇兵，打破唐军的反包围，彻底孤立寿州，重新获得主动权。赵匡胤受郭荣之命，率领袁彦、石守信等数千精骑饮马涡水，前去解决涂山的南唐水军。

无论是兵力还是兵种，赵匡胤的“独立团”均占劣势，如果跟南唐水军正面交锋，几无胜算。

在仔细观察地形后，赵匡胤决定让主力军队埋伏在涡口（涡水入淮水处），然后派遣100多名羸弱的骑兵，到涂山唐军大营附近诱敌。唐军一出营，这100多名骑兵便假装战败，丢盔弃甲往西跑。唐军都监何延锡一路狂追，却将1万多南唐水军送入了赵匡胤的包围圈。周军伏兵尽起，双方白刃相交。经过一场恶战，周军全歼1万余唐军，阵斩何延锡，俘获战舰50余艘。

这是赵匡胤从军以来，独立指挥的第一场战斗，打了一个开门红。

钟鸣清流关

皇甫晖接到涂山败报，面如土色，下令紧锁关门，关中15 000名将士未得军令，不得擅自出关。

这位皇甫晖不是别人，正是赵匡胤出生前一年邺都兵变的始作俑者。说来他与赵匡胤还有一点交集，赵匡胤的姨父刘迁就曾在皇甫晖军下效力。

皇甫晖是典型的骄兵悍将，但却很有气节。契丹灭晋后，已经升任刺史的皇甫晖不愿事辽，于是投奔南唐，逐渐成为江南大将。他为人持重，颇得军心，周人对他很是忌惮。

滁州城扼守江宁西北门户，城北的清流关更是地势险要。清流关外，曲亭之山，群峰逶迤，沟壑纵横，石陡林密；雄关两侧，更是悬崖峭壁，山高谷深，仅有一条小路从关下通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端的是“金陵锁钥”。

皇甫晖闭关不久，昼夜兼程的赵匡胤“独立团”便杀到曲亭山。面对金汤之池，大周数千勇士都在心里打鼓，毕竟敌我实力过于悬殊。赵匡胤却很淡定，命令军队借着夜色安营扎寨。他向勇士们拍着胸脯保证：“别担心！明日正午，我带你们破敌！”

次日一早，皇甫晖听说关前有人叫阵，急忙登关眺望，只见关前的周兵稀松，人人面带苦色，就凭这也来攻关？

门轴转动的巨响中，皇甫晖披挂上马，率军出关。他信心满满地在曲亭山下布好阵，忽听身后一阵骚动，回头望去，清流关上一片混乱，赵匡胤神兵天降，从关后掩杀出来。原来赵匡胤早就暗访周围村民，发现了一条绕到清流关背后的小路。他留下部分兵力在关前诱敌，自己则暗中绕过雄关，只待皇甫晖出阵，便一声令下，杀上关来。

皇甫晖方寸大乱，急忙率军向后方的滁州撤退。号称固若金汤的清流关，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当皇甫晖到达滁州后才发现，滁州刺史王绍颜早已弃城而逃。城中人心惶惶，一片狼藉，根本无法组织战斗。

气急败坏的皇甫晖下令毁掉吊桥以自守，可是来不及了，因为紧随其后的赵匡胤已经率领精骑杀过护城河，直抵滁州城下。

无奈之下，皇甫晖登上城楼，朝着咄咄逼人的赵匡胤喊道："喂！你我不过是各为其主！你让我列好军阵再跟你决一生死！"

赵匡胤表示同意，皇甫晖喜出望外。

皇甫晖一步并作三步，从城关上飞奔而下，整饬队伍，迎战赵匡胤。

赵匡胤哪会真给他留时间。眼见皇甫晖和唐兵松懈下来，他突然抱住马脖子，两腿用力一夹，那骏马立刻跃阵而出，犹如一杆飞箭，瞬间突入皇甫晖的军阵。

"我只取皇甫晖，其他人都不是我的敌人！"

雷壑未绝，长剑已落。还没缓过神儿的皇甫晖，脑袋上重重挨了一记，眼前一黑，当即被赵匡胤夹下马来。

唐军见主帅被擒，全无斗志，和皇甫晖双双支援寿州又双双逃回滁州的姚凤，也跟他一起做了阶下囚。

滁州城头，大唐的旗帜被撕扯而下，大周的旗帜冉冉升起。据说，此时正午的太阳正好直射城头，周围的寺庙也都敲响了正午的钟声。

皇甫晖再度醒来，已经作为战利品，被送至郭荣的行营。面对郭荣，受了重创的皇甫晖毫无惧色，欲坐便坐，欲卧便卧。最后，他躺在御帐里，从容地说道："我并非不尽力国事，只是北人骁勇，南人胆怯。我在大晋为将的时候，常与辽人作战，从没见过这样精锐的军队。"说罢，皇甫晖闭上双目，拒绝疗伤，数日而逝。

相传皇甫晖的灵魂化作山神，继续守护滁州。曲亭山也改称皇

甫山，再未易名。只是活皇甫尚不能守住国门，死山神就更无能为力了。

滁州风云际会

滁州城内，战火渐渐平息。前几日还不敢出门的老百姓，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

领兵以来，赵匡胤一直严禁将士夯市。不过，按照唐后期至五代的惯例，这些职业军人打了胜仗，必须给予物质奖励。于是，赵匡胤命一名亲吏到滁州府库里拿取丝绢，用以犒劳浴血奋战的勇士们。

没想到亲吏却空手而归，因为翰林学士窦仪正守在府库门口，拒绝亲吏拿走库中的任何财物。

窦仪字可象，他的本职工作是为皇帝起草诏书、顾问应对的私人机要秘书，这也是范质曾经做过的职位。此次，窦仪奉了郭荣之命，到滁州来清点府库物资，并一一登记在案。

面对赵匡胤的索求，窦仪义正词严地回复道："明公您刚攻克滁州时，就算把府库里的钱财搬干净也无妨。现在，既然府库里的财物已经登记在册，那就是朝廷的财物了。没有圣上的诏书，您是拿不走的。"

窦仪的话铿锵有力，不容辩驳。

现年43岁的窦仪既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又是皇帝的特派员，赵匡胤自然不想得罪他。不过，窦仪儒雅如兰却又凛然不可犯的气质，还是给赵匡胤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匪君子，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这大概说的就是窦仪吧。

说起来，窦仪还算赵匡胤半个老乡。窦仪是蓟州渔阳人。渔阳县是蓟州的治所，也是静塞军的所在地。赵匡胤的爷爷赵敬曾任蓟

州刺史兼静塞军使，因而窦仪祖上曾在赵敬的管辖之下。窦仪的曾祖父窦逊曾任玉田县令，玉田县也是蓟州属县。窦仪的爷爷窦思恭做过妫州司马，父亲窦禹钧在唐末担任幽州节度使的幕僚。尽管官做得都不大，但是窦仪的祖辈与赵匡胤的祖辈一样，籍贯都在幽州镇内，也都在幽州镇内任职。

不过，与赵氏走上允文允武且更偏向武人的道路不同，窦氏家族却转变为书香门第。窦仪的父亲窦禹钧与伯父窦禹锡，已经以词学而闻名，窦禹钧与冯道还是老朋友。到了窦仪这一代更了不得，他与弟弟窦俨、窦侃、窦偁、窦僖都考中了进士，人称“窦氏五龙”。冯道为此道贺，还特意为窦禹钧写了一首诗：

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
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离别窦仪后，赵匡胤一直在想：窦仪一介文人，都敢在这乱世里主持公道，我赵匡胤堂堂武将，还能比窦仪差了？当务之急，是赶紧维护滁州的治安。兵荒马乱之际，不少人乘机作乱。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可不想被盗贼毁于一旦。

在赵匡胤的严厉搜捕下，滁州城里抓了一百来号“盗贼”。

赵匡胤看也不看，大手一挥，全部问斩。

“且慢！”

循着声音望去，但见一个年纪和赵匡胤相仿的人，正站在府衙大门处。那人面颊瘦削，眉峭如崖，目光如炬，一看就是个倔强的主儿。

赵匡胤接过他递上的敕牒，方知这人名叫赵普，是朝廷派来协助自己的滁州军事判官。

在赵匡胤看来，这些“盗贼”罪有应得，但在赵普的强烈要求下，赵匡胤只好对他们一一审讯，结果正如赵普所料，有十七八人

是无罪的。

第一次治理一方的赵匡胤大为惊讶，要不是赵普来得及时，自己得冤杀多少人啊！看来治理一方的门道，远没有那么简单，怪不得一帮武人治国，把国家治得乱七八糟。赵匡胤遂把赵普留在身边，决定与他彻夜长谈。

赵普字则平，今年35岁，大赵匡胤5岁。他的家族就是我们在序章中提到的幽州蓟县的小吏之家。赵普的曾祖父赵冀曾在蓟州境内的三河县做县令，只不过从赵普的爷爷赵全宝开始，这个小吏之家已将仕途寄托在幽州镇之外。再后来，为了躲避战乱，赵普的父亲赵迥先后南迁镇州、洛阳，融入中原王朝。

与涿郡赵氏好武、蓟州窦氏习文不同，幽州赵氏始终以吏事，也就是职业官僚的行政技能立足。赵普也不例外。来到中原后，他与自己的祖辈一样，到藩镇寻求出仕幕僚的机会，最终落脚在西北。那里与幽州镇相似，也是边镇。或许正是这样的环境，塑造了赵普坚毅果敢的性格。

显德元年（954）七月，在高平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刘词移镇永兴军，赵普被刘词辟为幕僚。第二年（955）十二月，刘词因病去世，临终前上遗表向朝廷推荐才干出众的赵普，可惜朝廷并未重视。直到滁州攻克，因宰相范质一再举荐，朝廷才任命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

长谈之下，赵匡胤更为惊讶，赵普的见识与谋略非一般小吏可比。从王朴的眼界与韬略，到窦仪的神采与正气，再到赵普的耿直与干练，赵匡胤渐渐觉得，文官们并非都像陈学究那样，只知道之乎者也掉书袋；甚至也不像恩师辛文悦那样，只负责传道授业。在这个乱世，有更多的事情，恐怕只有他们才能完成。

从这时起，赵匡胤开始对文吏与文士另眼相看。

或许后人觉得，二赵的这次滁州风云际会太过平淡，它本应像三顾茅庐一样，以不世的传奇为后人所仰慕。于是，有关赵匡胤与

赵普初见的各种传说，不胫而走。甚至连《宋史》上都记载，赵匡胤发迹前，赵普曾追随他四方游历。

赵匡胤和赵普都是务实的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们的相遇，根本用不着传奇故事来画蛇添足。

有了赵普的协助，赵匡胤在滁州的善后工作更加得心应手。过了几天，赵匡胤在夜里忽然接到牙校报告：行营前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正在城下，传呼开门。

“爹？！”

来者正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如今的赵弘殷，已在禁军中担任龙捷右厢都指挥使、领岳州防御使，统领侍卫亲军的精锐骑兵，与赵匡胤武阶相同；此次出征，他又担任行营前军的骑兵部队副总指挥。据说，为了让儿子早得历练，他还特意把18岁的三子、右班殿直赵匡义带在身边。赵氏一门，父子三人，全部活跃在淮南战场上，真可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赵匡胤怎么也没想到，老父亲会在这个时候来滁州。他乐得一跃而起，急忙奔出府衙相迎。

就在迈出府门的一刹那，他的脚步突然停住了。

依律，深夜没有特殊情况，城门不能打开。作为禁军将领、滁州统帅，赵匡胤怎能带头犯法？

潮冷的寒风不断钻入盔甲缝隙。城楼上，赵匡胤见到了久别的父亲赵弘殷，他正疲倦地伏在马背上。

赵匡胤咬了咬牙，鼓足勇气说道：“爹，父子虽是至亲，但城门开闭是朝廷大事，儿不敢奉父亲之命……”

彻夜难眠的赵匡胤，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迅速将老父亲接入州衙。

直到此时，赵匡胤才得知，赵弘殷受命与韩令坤攻取扬州，但因染病，被迫北返。听说儿子刚刚打了胜仗，便打算来滁州休息，没承想却在城外冻了一夜。心如刀割的赵匡胤泪眼婆娑，本打算多

留几日，照料赵弘殷。可寿州战事吃紧，郭荣派左金吾卫将军马崇祚前来交接，催促赵匡胤即刻返回寿州。

望着病痛中强打精神微笑的父亲，赵匡胤落下泪水。他握了握父亲那长满老茧的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滁州城。

六合之战

金陵城内，勤政殿的殿檐遮住了正午的阳光，文武大臣个个垂首不语。龙椅上，李璟看着前方的战报，一言不发。

短短一个月，江北十四州沦陷近半，吴越国又从东面趁火打劫，湖南的藩镇政权也受了后周诏命，从西面进攻鄂州，南唐已是三面受敌。为了牵制郭荣，李璟命人携带蜡丸密信向契丹求援，却被后周的静安军使何继筠截获。

唐、周是当时大江南北最大的两个政权。郭荣贸然发动如此规模的战争，让南唐君臣深感意外。为了搞清郭荣的意图，李璟曾于显德三年（956）二月派人致信郭荣，信中写道：“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请息兵修好，愿以兄事帝，岁输货财以助军费。”没想到郭荣却来了个“沉默是金”。

到了三月，李璟又两次派人面见郭荣。他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削去帝号，向大周称臣，每年进贡百万金帛，同时愿意割让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

李璟的条件可谓慷慨。去帝号而称臣纳贡，后周可在政治上取得优势。更关键的是，李璟所割之地皆在淮河沿岸，这意味着，南唐将放弃淮河之险，后周在军事上也会取得优势。特别是，其中还包括周军久攻不克的寿州。

可郭荣却认为，淮南江北的半数土地已经被自己占据，现在更是捷报频传。大周继续展开军事行动，不仅可以让南唐继续进行政

治让步，还可以获取更多实质性好处。于是，郭荣拒绝了李璟的停战请求，并派人给李璟送去书信。在信中，郭荣承诺，只要李璟真心对大周称臣，就可以继续保留帝号，但是要停战，就必须割让江北所有州县。

江南政权有长江天堑，确实能够有效阻止北兵；但长江的防线太长，只要一个点被突破，整条防线便会“破防”，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此，自古就有“守江必守淮”之论。淮南江北守不住，长江防线被突破也是早晚的事。

李璟可以称臣纳贡，但不愿做亡国之君。若江北诸州全失，南唐便社稷不保。李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与周军作战。三月底，他任命皇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元帅，发动新一轮反攻。

淝水对岸，满脸污泥的郭荣正亲自搬起石头，为抛石机装“弹药”。城下周军巨石抛空，城上唐军万弩齐发，寿州内外尸横遍野，淮水上下血水横流。

已经回到寿州城下的赵匡胤，正冒着比雨点还密的箭矢，亲自率兵攻城。一日，赵匡胤乘着皮船，率军攻入寿州城的护城河，正沿河寻找敌军城防的薄弱环节作突破口，却没有发现，刘仁赡的连弩早就瞄准了他的脑袋。

赵匡胤预感不妙，猛然回头，但见一支房椽粗的铁箭已袭到自己面前，心中大叫一声“不好！”却突然被人推倒，唯听得“啊”的一声惨叫，鲜血四溅。

待到赵匡胤缓过神来，一员昏死的牙将正倒在自己身上。刚刚，就在赵匡胤生死一线之际，他的贴身侍卫张琼飞身而出，用自己的身躯生生挡下那支致命弩箭。弩箭深深射入张琼的大腿，箭头扎在骨头里拔不出来。张琼疼得当场昏死过去。

张琼被抬回营帐后，喝了一大碗酒，让人破骨将箭头取出，鲜血流了数斗。倘若这支弩箭真的射中赵匡胤的脑袋，后果可想而知。

寿州城依然牵制着周军主力。面对李景达的援军，郭荣攻打江北州县的兵力已经严重不足；吴越与湖南的军队已被南唐击退，这更让江北沿线的周军压力倍增。在南唐的大军压境下，周军抵挡不住，被迫北撤，泰州、舒州等江北重镇先后得而复失，连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都准备弃扬州而去。

四月二日，面对南唐的全力反攻，郭荣及时调整部署，命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支援韩令坤夺回扬、泰二州；同时，令赵匡胤率2000人进驻六合，与韩令坤所在的扬州成掎角之势，以解危局。

让赵匡胤想不到的是，他在六合遭遇的第一股军队并非李景达的主力，而是来自扬州的周兵。韩令坤在张永德的协助下，刚刚回到扬州，但人心不稳，不少士兵向北溃逃。

赵匡胤大怒，下令道："扬州兵有敢过六合者，一律剁脚！"

韩令坤太了解这个说到做到的发小了，即使是自己逃到六合，也难逃被剁脚的命运。一直在弃城与守城间摇摆的韩令坤终于下定决心：人在城在，城亡人亡！

就在韩令坤去而复返之时，李景达和监军使陈觉已率领自己直辖的2万唐军主力，火速北渡长江。六合是北上的必经之路，也是周军在扬州的立足之地。要收复扬州，李景达不得不首先面对驻军六合的赵匡胤。

唐军兵力虽然是赵匡胤的10倍，可军中却矛盾重重。李景达名为统帅，实际的指挥权却在陈觉手里。原来，当年李昪在世时，一直想立李景达为太子，奈何长幼之序，只好作罢。李璟做了皇帝后，李景达备享殊荣，但要说李璟对他一点防范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此次救援，李璟一面命李景达主兵，以用其声望；一面又用心腹陈觉为监军使，掌握实权。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抗议道："信莫信于亲王，重莫重于元帅，还用什么监军使！"可李璟根本不听。

当然，李景达也没什么作战经验，要是李璟给他派个会打仗的人来帮忙也无可厚非。可这位陈觉并不是什么大将，而是李璟身边臭名昭著的“五鬼”之一。当年南唐灭闽之战，就是被他搞砸的。李景达对他们这群浮夸谄媚的奸佞之臣深恶痛绝，甚至在宴会上当着李璟的面大声痛斥。李璟竟然让这两个人一起带兵，还把实权交给陈觉，南唐援军的命运凶多吉少。

唐军到达距离六合二十余里的地方，便安营扎寨，不敢越雷池半步。毕竟赵匡胤在清流关神出鬼没，在滁州又一骑当千，可谓智勇双全。李景达和陈觉初来乍到，自然不敢孟浪。

可几天下来，这仗依然没打起来，双方将士都按捺不住了。包括石守信在内，周军的将士纷纷要求出阵，把李景达赶走。赵匡胤却摆摆手道：“他们设栅自固，这是怕我。我们还不到两千人，如果主动攻击，必然会暴露虚实。不如守株待兔，让他们先打过来，我军一定会大获全胜！”

赵匡胤越是按兵不动，李景达和陈觉就越是如坐针毡。他们不知道赵匡胤有多少人，也不知道赵匡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样备受煎熬了几天后，二人再也熬不住了，终于率先发起进攻。

时机已到，赵匡胤率两千周军迎头而上。将士蓄势已久，早就等着这天。双方甫一交战，唐军就被如狼似虎的周军杀了个人仰马翻，近五千唐军做了周军的刀下鬼，剩下的也夺路而逃，甚至不顾长江阻拦，跳江而去。结果，不计其数的逃兵被活活淹死在长江里。

两万唐军精锐，就这样被两千周军杀得片甲不留。

仗打赢了，周军将士欢呼雀跃，只有赵匡胤面含愠色。

他命所有参战的将士把自己的皮帽摘下来，只要有被赵匡胤的长剑砍过的痕迹的，一律问斩，就这样处斩了几十个人。原来，当天赵匡胤亲自督战，对于偷奸耍滑甚至企图逃跑者，都暗中在他们的皮帽上做了记号。

此举令全军将士对他且敬且畏。直到此刻，赵匡胤才放下心来，与这群出生入死的弟兄们共庆胜利。

与此同时，韩令坤在扬州、张永德在泗州纷纷传来捷报。至此，南唐的6万精兵损失大半，锐意进取的郭荣迫不及待地打算亲自到扬州督战。范质等人以兵疲食少为由泣谏，这才阻止了郭荣的冒险行动。

此前，郭荣就曾因军中粮草不济大发雷霆，盛怒之下要斩杀负责筹集粮草的窦仪。范质得到消息，急忙入见。郭荣远远望见范质，知道他是来救人的，干脆起身躲避。范质见状，连忙赶上，伏在地上痛哭泣谏："窦仪罪不至死。臣身为宰相，却使陛下枉杀近臣，这都是臣的罪。"郭荣总算给了范质面子，这才饶窦仪不死。

大权在握的年轻天子，虽然机敏睿智，但也浮躁冲动。大周的军事成果，没有因为权力的跋扈而功亏一篑，范质诚有力焉。

三十岁的节度使

范质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周军在军事上再度夺回主动权，但形势仍然严峻。

首要的危机来自政治上。本来，由于南唐在淮南横征暴敛，李璟早就在那里丧失民心，以至于周军攻入淮南，当地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可周军却视民如草芥，杀人越货，挖坟掘墓，甚至杀人杀到"里鼓绝响，殆无炊烟"的地步。

于是，当年在北汉境内的神反转再次在淮南出现。失望的老百姓纷纷聚集在山泽之间，建立堡垒，以农具当兵器，又将纸层层叠积做成厚厚的纸甲，凭借着这身装备跟周军打游击，时人称之为"白甲军"。周军在跟南唐正规军作战的同时，还要跟这些农民起义军交手。结果，在正面战场上，周军屡战屡胜；在镇压时，周军

却是屡战屡败，以至于在不少攻占的州县根本站不住脚。

除了政治上的不得人心，老天爷也来跟周军作对。战争已经延续至五月，盛夏到来，雨季将至。数尺深的积水与泥泞不堪的道路，将成为周军进军与粮草运输的巨大障碍。

在这样的形势下，郭荣只好暂缓用兵。他留下李重进继续围攻寿州，自己率领主力军队陆续北返。

赵匡胤也奉命自六合北还，途经寿州时，与父亲赵弘殷匆匆相聚。

原来，在滁州养病的赵弘殷也接到了北撤的命令，并先于赵匡胤抵达寿州城外的周军行营。那时郭荣尚未北归，因当地人卖给周军的饼子又薄又小而震怒，于是抓了十余个卖家又要开刀问斩。赵弘殷不顾病体，百般苦谏，这才将这些卖家救了下来。

自从赵匡胤离开滁州，赵普就一直替他照顾赵弘殷。赵普不分昼夜，悉心照料，亲自给赵弘殷喂药。几个月下来，赵弘殷对赵普心存感激，再加上同为赵姓，便早已将他视为一家人了。

从滁州到寿州，一路颠簸。赵弘殷病情加重，实在再难承受长途跋涉，只好暂时留了下来。赵匡胤却因有军令在身，在寿州短暂驻足后，便不得不满怀牵挂，离开了重病的老父亲。

没想到，此去一别，竟成诀别。

七月二十六日，赵弘殷病逝。

赵匡胤闻讯号啕大哭，悔恨交加。如果那一晚在滁州他早早开门，父亲的病情也许不会恶化。泪眼中，他仿佛看到父亲正骑着高头大马，率领着凯旋的队伍，缓缓步入开封城门。然而，擦去眼泪，城门外停着的，只有那冷冰冰的棺材和护灵的队伍。

赵弘殷的病逝，在赵匡胤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霾。但淮南硝烟未散，时间不等人。

十月二十五日，守孝仅两个月的赵匡胤被郭荣强行起复，晋升为殿前都指挥使、领匡国军节度使；两个月后，原殿前都指挥使张

永德晋升为新设置的军职——殿前都点检，继续做赵匡胤的上司。

不过，赵匡胤的这次任命尚属“非正式”。按照制度，任命高级官员应由翰林学士起草制书，然后在“正衙”宣制，也就是在上早朝的端明殿正式宣读任命制书。而郭荣对赵匡胤的这次任命，仅仅是“宣授”——只有委任的制书，却没有在正衙宣读。这与赵匡胤以殿前都虞候身份练兵，事后再正式任命颇为相似。

究其原因，可能是郭荣觉得30岁的赵匡胤太年轻，资历不够，仅凭着作为先头部队打了几次胜仗就骤然高升，会引起不必要的舆论压力。

尽管如此，赵匡胤仍旧获得了许多武将奋斗一辈子都未曾得到的节度使官职，并跻身高级将领之列，地位和名望大大提高。

按照制度，赵匡胤要为自己的匡国军幕府辟署幕僚，就像当年的幽州节度使辟署自己的太爷爷赵珽为幕僚一样。让赵匡胤最为心心念念的人，自然是赵普。可时代毕竟不同了。经过五代持续不断的集权，到了后周，节度使辟署幕僚的权力大为削弱。特别是幕府中的高级幕僚，节度使必须向朝廷申请，然后由朝廷任命。

此刻的赵普已经接受朝廷任命，回到西北地区的渭州担任军事判官。赵匡胤连忙向郭荣请命，生生把赵普要了回来，担任自己的节度推官。

一切的一切，恍如当年把自己从滑州要回来的郭荣。

除了赵普，幕府中最善于出谋划策者要数潞州上党人李处耘。李处耘，字正元，生自将门，自幼习武，勇略过人。27岁那年，恰逢辽人洗劫开封。当乱兵寇略他所居住的闾里时，李处耘挺身而出，独当里门，当场射杀数十人，次日又杀数人，闾里因此而免遭兵祸。

此后，李处耘跟随节度使折从阮，折从阮去世前力荐其才可用，李处耘因此被派往河阳三城节度使李继勋的幕府做幕僚。最初，李继勋很看不起他。直到一次宴会上，李处耘连射四箭皆中，

举座皆惊。李继勋更是对他改容相待，升堂拜母，义同金兰。

再后来，李继勋将驻地的政务和黄河渡口的防务都交给李处耘。在李处耘的协助下，李继勋破获一起契丹谍者勾结后蜀、南唐的谍战大案。

李继勋罢镇后，李处耘被郭荣派给赵匡胤，担任都押衙，管理仪仗侍卫，成为赵匡胤的亲从。他“临机决事，谋无不中”，颇受赵匡胤倚重。

此外，长于吏干如吕胤、沈义伦、楚昭辅，优于兵戎如王仁赡，都被赵匡胤网罗至自己的幕府中。值得一提的是，楚昭辅、王仁赡与赵普一样，昔日都是刘词的幕僚。

在后来的岁月中，赵匡胤先后改领义成军、忠武军、归德军节度使，而这些幕僚也始终追随他，成为与节帅私人关系极为紧密的“随府”幕僚。正是这些随府幕僚的佐助，彻底改变了赵匡胤的一生。

南唐俯首称臣

第一次亲征结束后，郭荣率大军北返，仅留李重进、张永德等部继续围困寿州。李璟见有机可乘，再命李景达挂帅、陈觉监军，率边镐、朱元等军数万人，浩浩荡荡卷土重来，屯兵于寿州东北的紫金山，并修筑了通往寿州的甬道（两面筑墙的通道）以运输粮草，支援镇守寿州的刘仁赡。

苦守寿州一年有余的唐军见了援军，士气大振。刘仁赡提出：边镐守城，自己出城决战。可实际主持军政的陈觉早在六合就已被赵匡胤吓破了胆，加上他与朱元等人不和，怕无法节制诸将，于是否决了刘仁赡的方案。刘仁赡积愤成疾。

一来二去，郭荣宣布二征淮南，南唐失去了战机。

显德四年（957）三月二日，郭荣率军连夜渡淮，再度到达寿州城下。第二天凌晨，郭荣亲自披甲，进军紫金山南。赵匡胤接下首战重任，领精兵出战。紫金山一役，赵匡胤痛击唐军先锋，斩敌3000余，切断甬道，彻底断绝了寿州与外部的联系。不久，朱元叛唐降周，郭荣水陆并进，李景达的援军连死带降4万余人。寿州城弹尽粮绝，刘仁赡一病不起。

十九日，在刘仁赡人事不省的情况下，寿州城降。五天后，刘仁赡病逝，郭荣追封他为彭城郡王，李璟也追赠他为太师。刘仁赡为了死守寿州，曾腰斩自己准备叛降的亲儿子，至死受到交战两国的崇敬。

寿州城破，淮南门户洞开。李璟除了每天独坐垂泪，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

五月十一日，端明殿上，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指挥使、领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的制书正式宣读，赵匡胤终于“转正”。检校太保是检校官的第四阶，往上依次是检校太傅、检校太尉、检校太师。虽然只是高级荣誉头衔，却表明赵匡胤已成为大周境内的高层精英。

显德四年（957）十月，在经过近半年的休整后，郭荣发动第三次南征，这是吞并淮南江北的最后一役。在攻拔濠州、泗州的战役里，赵匡胤的骑军所向披靡。随后，郭荣命赵匡胤率马步军，与自己分别自淮水的北、南两岸进击，于显德五年（958）正月二十四日攻破楚州。楚州既下，江北已无大战。

然而，立下汗马功劳的赵匡胤，此刻的心情却极为沉重。

原来，唐军在楚州防御使张彦卿的带领下，曾死守城池，郭荣前后费时一个半月，才攻破城门。但张彦卿仍不放弃，巷战至死，直到最后矢刃皆尽，他还举起绳床[1]与周军拼命。他手下的千余人全

[1] 类似于今天的椅子。

部战死，无一人投降。

愤怒的郭荣一反常态，竟下令屠城！城中军民被杀者万余人，官署民房悉数焚毁。

据说，在楚州城的一条巷子里，一位妇女惨遭杀害。在她身下，尚不知事的小婴儿仍然咬着母亲的乳头，拼命吸吮。

路过此地的赵匡胤正好看到这番惨景，心生恻隐，急命手下救下婴儿，又在巷子中为孩子找了一位奶妈，让她好生收养。而巷子里的男女老少也因此而免遭屠戮。后来，幸存的人们便将巷子改名为“因子巷”；再后来，名字被讹传为“金子巷”。

“王师”吊伐，生灵涂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年春天，周军一直打到长江边上，郭荣亲自坐镇迎銮镇，摆出即将渡江的架势。赵匡胤更是率领水军直抵长江南岸，火烧唐军营寨，扬长而去。

两年里，“赵匡胤”三个字已经成为李璟的梦魇。李璟害怕他真的打过来，黔驴技穷之际，竟派人给赵匡胤送去三千两白金，以此来离间他与郭荣的关系。可是李璟打错了牌，赵匡胤根本不吃这一套，将三千两白金全部上缴。

为了讨吉利，李璟在这一年里连续改元“中兴”“交泰”，可是南唐既没有中兴，也没有交泰，反而江北几乎完全被郭荣占领，长江水道也被赵匡胤控制。李璟无能为力，只得同意郭荣在第一次南征时提出的条件。

周显德五年、唐交泰元年（958）三月，李璟像一只被捏瘪的柿子，遣使渡江求和，许诺削去帝号，改称国主，臣服大周，割让江北十四州所有土地，每年供奉物资十万，甚至为了避郭威高祖父郭璟的名讳，李璟把名字也改作“李景”。

郭荣三次南征，吞并淮南江北，威震南北诸国。而南方第一大国南唐却丧失了近一半土地，沦为一个苟延残喘的二流小国。

三、北伐幽燕的遗憾

军事胜利的政治成果

在南方的主要政权中，吴越、荆南、湖南在名义上都对后周称臣；泉漳名义上归属南唐，实际上却一再向后周表示愿意臣服。相对于这些小政权，南唐、后蜀、南汉各自称帝立国，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如今，南唐已经成为后周的藩属，后周的下一个作战目标，理所当然地落在后蜀身上。

显德五年（958）十月，郭荣开始谋划伐蜀，臣服于周的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保融也积极参与其中。在两次书信劝降蜀主孟昶称藩失败后，高保融自告奋勇，请求以水军进取三峡，配合周军的军事行动。后蜀闻讯，也积极备战。到年底时，大战一触即发。

可郭荣却突然取消了伐蜀计划。

原因是多方面的。后蜀的警觉，加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都为伐蜀带来不少麻烦。而淮南突发的大饥荒，也迫使战争不得不暂时休止。

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三征淮南的军事胜利带来的政治成果，郭荣还没有完全消化，他被一些重要事务拖住了。

法与礼是中国古代王朝的秩序支柱，早在显德五年七月，郭荣便颁布了《大周刑统》，作为新的法典；十一月，窦仪的弟弟窦俨又奉命编集《大周通礼》与《大周正乐》。

同样在七月，郭荣开始筹划均定田租，并于十月正式派遣34名官员分赴各州，重新勘察土地，确定租税标准。这项工作复杂而困

难，以至于到了第二年（959）的二月，也仅有国都开封府汇报了准确的土地勘察结果。

据开封府报告，过去登记在案需要缴纳田税的土地总计11.2万余顷，经过这次勘察，又将新发现的4.2万余顷私人土地登记在案。郭荣最终给予3.8万顷土地以免税待遇，并要求各州勘察完土地后，都按此实施免税政策。

立法、制礼、均田，郭荣从法律、礼制、财税三个重要方面，向整个王朝宣示着大周朝廷的掌控能力，也彰显了他重塑强势中央政府、重建传统帝制统治秩序的决心。

当然，军事胜利最直接的政治结果就是郭荣对禁军的再度改革。经过三征淮南，郭荣数次奖赏军功，禁军中高级将领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表1-2）。

表1-2　显德六年（959）初，禁军主要中高级将领

<table>
<tr><th colspan="2">侍卫亲军司</th><th>殿前军司</th></tr>
<tr><td colspan="2">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领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
李重进</td><td>殿前都点检
领镇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尉、驸马都尉
张永德</td></tr>
<tr><td colspan="2">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无）</td><td rowspan="2">—</td></tr>
<tr><td colspan="2">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领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
韩通</td></tr>
<tr><td>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
领镇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
韩令坤</td><td>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
领彰信军节度使、检校太保
袁彦</td><td>殿前都指挥使
领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保
赵匡胤</td></tr>
<tr><td colspan="2"></td><td>殿前副都指挥使
领淮南节度使
慕容延钊</td></tr>
</table>

续表

<table>
<tr><td colspan="4">侍卫亲军司</td><td colspan="4">殿前军司</td></tr>
<tr><td rowspan="2">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领岳州防御使高怀德</td><td rowspan="2">龙捷右厢都指挥使领岚州防御使祁廷义</td><td rowspan="2">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领常州防御使张令铎</td><td rowspan="2">虎捷右厢都指挥使领阆州防御使陆万友</td><td colspan="4">殿前都虞候
（无）</td></tr>
<tr><td colspan="4">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
领嘉州防御使
石守信</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铁骑左厢都指挥使领某团练使（未详）</td><td>铁骑右厢都指挥使领虔州团练使王审琦</td><td>控鹤左厢都指挥使领某团练使（未详）</td><td>控鹤右厢都指挥使领某团练使（未详）</td></tr>
</table>

侍卫司方面，李重进、韩令坤、高怀德、祁廷义（后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名祁廷训）、张令铎、陆万友均来自周初由郭威亲从组成的殿前诸班。韩通在后汉末也曾是郭威的亲信，我们后面再细说；袁彦则是郭荣潜邸幕僚。

在战前，郭荣尚需要将与赵匡胤关系密切的赵弘殷、赵晁留在侍卫亲军，作为过渡。而经历了三征淮南，赵弘殷病逝，赵晁以赏功之名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侍卫亲军的中高级将领彻底被郭氏父子的嫡系势力所取代。

至于殿前司方面，虽然有三名重要军职失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三名重要将领不是来自周初的殿前诸班，便是来自郭荣的潜邸幕僚。

而随着两司被郭荣的亲信全面占领，过去铁板一块的“亲信”也自然出现了分裂。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李重进与张永德的对立。

如果问郭荣自从当了皇帝，在朝中怕过谁的话，那个人一定是李重进。

在郭荣一朝，李重进可谓风光无限。郭荣甫一即位，便让李重进总领侍卫司，成为禁军中第一人。三征淮南期间，李重进是周军的前线统帅，特别是郭荣不在前线时，李重进更是前线的实际总指挥。

然而，在表面的光鲜背后，隐藏的却是郭荣的忌惮。让李重进统领侍卫司这件事，就很有门道。

郭荣即位之初，侍卫亲军离心离德。要控制侍卫司，郭荣确实需要从殿前系中选一位同时拥有威名、地位和能力的将领去坐镇，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李重进。但是，大周的基本盘在殿前诸班，李重进早早离开殿前诸班，难以再与殿前诸班的将领建立更加稳固的上下级关系，实际上无异于被踢出了殿前系。

然而，李重进要想在侍卫司重建一个新的派系，却难上加难。那些来自殿前系的将领，不是与殿前系日后的灵魂人物赵匡胤关系密切（比如韩令坤是赵匡胤的发小、李继勋是赵匡胤的义兄），就是来得太晚（比如高怀德、张令铎、祁廷义），与李重进难以建立利益同盟关系，要么就是有自己独特的背景而未必肯屈尊（比如陆万友）。而非殿前系的人（如韩通、袁彦），也各有各的资历，各有各的来头。各路人马拼成的侍卫司里，谁也不服谁，很难像殿前司那样，真正拧成一股绳。

这一切，似乎又是郭荣有意为之，目的就是防止李重进和侍卫亲军的做大。一个小细节暴露了郭荣的心思。虽然李重进位高权重，屡立战功，可他的官阶却长期停留在检校太保不动，直到攻克寿春，他才得以晋升检校太傅。而在那次晋升中，张永德已经由检校太傅升任检校太尉了。

尽管如此，张永德仍常年心怀不满。毕竟，殿前军已经与侍卫亲军分庭抗礼，可他担任的殿前都指挥使，仅相当于侍卫马军和步军的都指挥使，级别低于李重进。张永德好生不爽，仗着是天子妹夫，仗着比李重进受宠信，仗着殿前军实力雄厚，他不断找李重进

的麻烦。

显德三年（956）十月，事情终于闹大了。当时郭荣已从淮南前线返回开封，张永德和李重进一个驻军下蔡，一个继续围困寿州。张永德见郭荣已走，李重进成了前线总指挥，多年积蓄的妒恨终于爆发。每次宴请诸将，他都要借酒劲儿，说李重进心怀叵测，吓得在场的将吏无不惊骇。

一不做二不休，张永德干脆派亲信给郭荣上书，密奏李重进谋反。郭荣虽然忌惮李重进，但他也知道，张永德纯属胡说。可他却不干预，不过问，不裁断。只要别闹得太过分，郭荣就会一直淡定地旁观下去。

对于没有军队基础、需要通过层层统兵官掌控军队的郭荣来说，无论是两司之间，还是两司内部，互相牵制、防止一家独大就是最好的控制方式。

然而，寿州久攻不下，淮南战事吃紧，坐拥重兵的两司大帅却在闹内讧，前线将士的心中多是忧虑恐惧的。

关键时刻，作为淮南前线总指挥的李重进，表现得极为汉子。他独自一人轻装来到下蔡大营，与张永德从容对饮。李重进甚至亲自为张永德斟酒，并劝他说：“你我都是主上的心腹，本应勠力同心，共为朝廷出力。你怎么对我有如此深的成见呢？”据说张永德自此放下了心结，军中将士也都安下心来。

这件事影响极为恶劣，以至于南唐李璟都要给李重进写蜡丸密信，诱以厚利。李重进二话不说，差人将密信送给了郭荣。

前线暂时转危为安，郭荣也认识到事态严重。张永德对李重进积怨太深，说不定哪天会惹出大麻烦。李重进为人持重，又位高权重，而官位上矮他一头的张永德制衡不住这样的人物。

十二月十四日，郭荣正式设置殿前都点检一职，由张永德担任。这一军职的级别与侍卫都指挥使相当，苦等多年的张永德终于与李重进平起平坐了。

正当张永德与李重进明争暗斗之时，赵匡胤却在悄无声息地积蓄自己的政治力量。

赵匡胤踏入顶级“权贵圈”

这些年来，赵匡胤虽然常在军旅，但小时候养成的爱读书的习惯却丝毫没有改变。即便是在军中，他也常常手不释卷。要是听说谁家藏有奇书，他甚至会不吝千金前去购买。

自从平定淮南后，赵匡胤回到开封，过上了难得的平静日子。他虽然性格慷慨，但却是个寡言的人。闲来无事，赵匡胤便待在府中的书房里看书。

可这天，突然从宫里来了几名不速之客。

原来，有人向郭荣举报，说赵匡胤私下从淮南运回好几车箱子，里面全是金银珠宝。郭荣很不高兴，急派人来赵府查验。可几个人把这些箱子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几千卷图书，连半个铜子儿都没找到。

郭荣听完使者汇报，十分惊讶。从千里之外费这么大力气，就运回几大车书？！他将赵匡胤召入宫中，大惑不解地问道：“卿是朕的大将，又是封疆大吏，当务之急是整备坚甲，训练利兵，运这些书回来做什么？”

赵匡胤顿首道：“臣没有奇谋良策来辅佐陛下，却担当如此重任，所以臣总是怕把事情搞砸了。这次特地运了一堆书回来，就是想开阔一下眼界，长长见识。”

听了回答，郭荣若有所思地说了一个字：“善。”

其实，运书回来的不仅有赵匡胤，可能还有他的弟弟赵匡义。据赵匡义晚年回忆，他在随父亲赵弘殷出征淮南、攻克州县后，其他将领都忙着争抢女子玉帛，只有赵弘殷到处寻访书籍，后来又

交给赵匡乂带回京师。赵弘殷曾教导赵匡乂说："这是文武立身之本，你要以此自勉啊。"虽然赵匡乂这段回忆的真伪颇具争议，但他爱读书却是古往今来人们公认的。

读书，这确实是老祖宗赵朓留给赵氏家族的传家宝。

阅读的习惯，使赵匡胤有了更复杂的认知结构、更严谨的逻辑思维与更宽阔的观察视野。频繁的兵变，惨烈的战争，残酷的杀戮，绝望的百姓，再度深深刺痛了他。辛先生所讲的"仁"究竟在哪里，这样的魔鬼日子究竟什么时候才算个头？

归来的赵匡胤，总是陷入沉思，他开始思考这些关乎现实的政治命题。然而，作为一个武将，这些政治命题离他是那么遥远。在皇帝郭荣眼中，赵匡胤就应该是个只会在战场上拼命的赳赳武夫。

哪怕，他已经是殿前司的二把手，郭荣眼前的大红人。

这让赵匡胤的思绪重新回到现实，回到禁军的两司。张永德与李重进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禁军中的中高级将领们也开始跑马圈地。作为张永德的得力助手，赵匡胤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关于张永德与赵匡胤的关系，宋代的史书里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比如《宋史》等书里说，张永德遇到一个宋州来的书生，预言赵匡胤将来会做皇帝，从此张永德对赵匡胤格外尊重推崇。这个故事在宋代不仅广为流传，而且越传越神。北宋中期的宰相王曾以及苏轼的弟弟苏辙都曾提到，张永德遇到了一个异士，他告诉张永德：你要是遇见属猪的就要留意，这人是真命天子。赵匡胤正好属猪，张永德从此对他潜加拥戴。

这些鬼话诚然不足信，张永德也没有反过来巴结赵匡胤的道理。但张永德对赵匡胤确实愿意提携帮助，这既源于他对赵匡胤的器重，也源于他对赵匡胤的倚重。平心而论，张永德的军事能力和对殿前司的影响力，其实都略逊赵匡胤一筹。

然而，出身富豪之家、生性豁达的张永德并没有嫉贤妒能，他

与同样豁达的赵匡胤非常投缘，两人不仅彼此敬重，而且配合得相当默契。张永德的提携，很快又给赵匡胤帮了个大忙。

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原配夫人尹氏是殿前指挥使都指挥使尹崇珂的妹妹。尹崇珂曾是郭荣的潜邸幕僚，也是赵匡胤昔日的同事。这桩婚事多半是赵匡胤牵的线。可是成婚不久，尹氏就病逝了。征淮归来，赵匡胤又为弟弟说了一桩婚事。而这一次，当赵匡义听闻自己未来老丈人的名字时，惊讶得连嘴都闭不上。

赵匡义的这位“准岳父”，便是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

天雄军不是一般的藩镇，符彦卿也不是一般的节度使。

天雄军的前身是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镇，会府大名府就是当年魏博镇的会府魏州，也是后唐、后晋、后汉的陪都之一邺都。李存勖因为占据这里而击垮后梁，李嗣源因为占据这里而取代李存勖，郭威也从这里出发推翻了后汉。

后周的天雄军辖有大名府、贝州、博州三个支郡，尽管不再是陪都，但鉴于北有占据幽燕的辽朝虎视眈眈，西北有不甘偏安的北汉袭扰不断，天雄军作为中原屏障的重要地位反而更突出。

坐镇天雄军的五代名将符彦卿，就是当年邺都兵变时，最后仍坚守在李存勖身边的那十余名将校之首。那时他还姓李，因为父亲秦王李存审是李克用的养子，所以他还算是宗室，直到后晋时才恢复符姓。此后，符彦卿被辽人视为天煞克星，以至于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未将他带回北国，辽朝太后认为是重大失策。

如今，年过花甲的符彦卿官拜大名府尹、天雄军节度使、太傅，受封魏王。他还有一个更尊贵的身份——当今皇帝郭荣的老丈人。

符彦卿的大女儿是郭威的养女、郭荣的继室。郭荣继位后，立符氏为皇后，对她颇为敬重。一年后，符氏病逝，郭荣虽然再未立后，却将符皇后的妹妹纳入宫中。符老国丈的地位依然无损，并享受帝王不呼其名的礼遇，天下武臣最尊贵者莫过于此。

与符彦卿联姻，不仅可以获得军界大佬的支持，更使赵匡义与郭荣成了连襟。其中蕴含的政治资源不言而喻。

当赵匡义为拿不出迎娶符家小女儿的巨额聘礼而发愁时，赵匡胤眼都没眨地对他说："张太尉是我老铁，你去找他把情况汇报一下。"赵匡义满是困惑地拿着哥哥的亲笔信来找张永德，张永德果然二话没说，倾囊相助。

因为这样的政治资源不仅属于赵氏家族，同时也属于正与侍卫亲军势不两立的殿前军，属于殿前都点检张永德。

从符家小娘子踏入赵家大门的那一刻起，赵匡胤不再仅仅是大周的高级将领，而是真正进入了武人时代的顶级"权贵圈"。

北伐幽燕，壮志未酬

皇帝郭荣的爱将与姻亲，皇帝妹夫、殿前司长官张永德的挚友与得力助手，国丈、宿将符彦卿女婿的哥哥，征战南北智勇双全的先锋大将，赵匡胤渐渐习惯了自己在这个王朝中的高贵地位，也渐渐有了那招人厌烦的架子。

一天，赵匡胤正在导从（仪仗队）的护卫下前行，突然被一个乘马的殿直（殿前值班的士兵）冲撞。赵匡胤火冒三丈，大斥其无礼，并命人押着殿直，一起去枢密院讨"公道"。

枢密使魏仁浦见赵匡胤盛怒，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让负责相关事务的宣徽院去询问调查。可另一位枢密使王朴——就是写《平边策》的那位，却不以为然。他冷冷地对赵匡胤道："太保，您现在的位子确实很高，不过，也还没高到加使相的地步吧？殿直虽然卑微，但也是朝廷的臣子，与太保您一样，都是为朝廷办事的，何况您还身带军职。太保，您不该这样。"

身带军职，指的是赵匡胤担任殿前都指挥使，这似乎是在提醒

赵匡胤应该安心办差，又似乎是在讥讽赵匡胤以大欺小。

王朴的语气不容置疑，赵匡胤竟被噎得哑口无言，只得悻悻离开枢密院。[1]

对于王朴，赵匡胤打心里有点怕他。其实也不止赵匡胤，满朝文武都怕王朴。王朴智略过人，但性格刚强，每次大臣们讨论问题，他一定正色高谈，说到满座不敢吱声为止。何况他又是郭荣最信任的人，谁也不敢轻易招惹这个咄咄逼人的文臣。

可就在显德六年（959）三月十五日，45岁的王朴突然病逝。[2]

郭荣闻讯“骇愕”，立即前往王朴府第。在灵柩前，郭荣悲恸万分，手中的玉斧一次又一次重重戳在地上，仿佛一记记铁锤，重重砸在郭荣的心房。

自《平边策》以来，王朴辅佐郭荣整整四年。这4年里，郭荣修礼乐，崇文治，变官制，严司法，兴水利，均田租，西取秦岭之险，南夺江淮之富。大周统治下的中原地区，出现了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稳定局势；大周的皇帝，也成为几十年里最有权势的天子。

郭荣本欲与王朴一起，实现30年之约，可如今，39岁的皇帝成了孤家寡人。

三月十九日，王朴去世4天后，郭荣突然宣布：视察沧州。

沧州，位于通往幽州的大运河永济渠之侧，是后周东北部最前线的军事重镇，距离幽州不到六百里。郭荣视察那里，也就意味着，他意在契丹人占据的幽燕！

契丹是生活在今东北地区的古老渔猎民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

---

[1]《五代史阙文·周史·王朴》。原文称赵匡胤为“太尉”，但赵匡胤加检校太尉时，王朴已经去世。王朴担任枢密使时，赵匡胤的官职是殿前都指挥使、检校太保，故笔者将其改为“太保”。

[2]《旧五代史·周书·王朴传》云王朴享年45岁，而《新五代史·周臣传·王朴传》则称54岁，不知孰是。《旧史》修于宋初，距离王朴死时较近，今暂取《旧史》。

秦汉时的东胡。唐初，契丹已经形成了由八部组成的部落联盟，联盟首领称为可汗，各部酋长称为夷离堇，在形式上均由选举产生。

唐末五代之际，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是迭剌部。唐天祐四年（907）正月，迭剌部夷离堇阿保机（当时还没有“耶律”这个姓氏）被选为契丹可汗。随后，他在汉人谋士的劝说下，逐渐废除了可汗选举制。

后梁贞明二年（916）二月，阿保机仿照汉制称皇帝，定国号契丹（后改为辽），建元天册，阿保机就是辽太祖。两年后，契丹又将国都定于西楼，改称皇都。

契丹建国后积极对外扩张，疆域迅速扩大。第二任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更将目标锁定中原。辽天显十一年（936），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因遭到皇帝李从珂讨伐，而向契丹求援。他不仅向辽太宗称臣，认这位比自己小十岁的皇帝为父，还许诺将北方边防重镇割让给契丹。耶律德光见有机可乘，便亲率五万铁骑支援石敬瑭，立其为后晋皇帝，助其灭掉后唐。

石敬瑭割地，对中原王朝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这片土地包括十六个州，宋朝以后统称为幽云十六州、幽蓟十六州或燕云十六州。以太行山为界，十六州可分为两个大板块、三个小板块。太行山以西的地区统称“山后”，以云州为核心。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统称“山前”。山前地区又以益津关、瓦桥关和淤口关三关为界，北部以幽州为核心，称“幽燕”；南部则称为“关南”。

在十六州中，由于幽燕地区的幽州最为重要，因此人们也往往以“幽燕”指代整个十六州。

幽燕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北是太行山北支和燕山山脉，是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民族的天然屏障。契丹获得了幽燕，也就跨过了这道防线。契丹铁骑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上纵横驰骋，可以直接杀到黄河边上。中原从此门户大开。

正因如此，耶律德光极为重视幽州，将其升为南京幽都府（后

改名析津府），作为契丹经略中原的前沿阵地。

石敬瑭死后，他的后继者晋出帝石重贵为了收复幽燕，与契丹大打出手，最终被契丹亡国，史称“开运之祸”。后晋灭亡后，契丹入主中原，耶律德光还将国号改为“辽”，准备长期统治。但因辽朝的统治不得人心，耶律德光很快撤回北方，并死在了撤退的路上。中原被继之而起的后汉收复，但幽燕却始终被辽朝占据着。

按照王朴的计划，郭荣应该在平定南方后，再来解决幽燕问题。可郭荣北伐也并非没有道理。后周三征淮南时，辽与北汉屡屡在北方袭扰。何况，在辽穆宗耶律璟乱七八糟的统治下，辽朝的实力已不如前。

这位耶律璟对处理朝政并不感兴趣，但也缺少历代昏君对于美色的执念，以至于快30岁的人了，连个孩子都没有。

耶律璟最大的问题是嗜酒。他通宵达旦，畅饮狂欢，待到东方泛白，才昏昏睡去，一觉睡到午后，被辽人称为“睡王”。除了爱睡觉，睡王还爱好杀人和打猎。所以大臣们既不愿见他一直睡下去，又害怕他醒来。

遇到这样的对手，郭荣早就动了心。上一年（958）的夏天，当郭荣还在考虑是否伐蜀时，就已经命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率部到北边御敌，又派成德军节度使郭崇攻拔辽国的束城县作为试探，结果睡王依旧置之不理，甚至还上山打猎，两个月不理朝政。这让郭荣下定优先北伐的决心。

显德六年（959）二月，郭荣先后命枢密使王朴、侍卫都虞候韩通、宣徽南院使吴廷祚、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主持疏浚开封以南诸水系的工程，以确保淮南的钱粮能源源不断运达北方。四月三日，率先到达沧州的韩通又将附近河道疏浚完毕，以保证周军主力和粮草的运输通畅。13天后，数万周军在郭荣的率领下，如幽灵一般，入驻沧州。除了大军路过的州县，整个河北的官民竟然对如此浩大的行动一无所知。

郭荣抵达沧州后，顾不上军旅之劳，当天就率军挺进百里外的乾宁军（辽朝占领后在此设宁州）。次日，辽朝宁州刺史王洪举城投降。

二十日，郭荣大治水军，并以赵匡胤、韩通分别为水路、陆路都部署，分率诸军水陆俱下，直抵益津关，守备薄弱的辽人纷纷望风而降。

益津关再往西，河道渐窄，大船无法行驶，周军只好弃船登陆。数万人的军队登陆需要时间，可郭荣却根本等不及，他竟带着不到500人的骑兵警卫队继续向西突进，巡逻的辽兵接连在郭荣附近出没，只是出于谨慎怕中埋伏，才没有贸然进攻。郭荣的护卫们都深感恐惧。

二十八日，赵匡胤率部至瓦桥关，辽守将姚内斌降。

二十九日，辽莫州刺史刘楚信降。

五月一日，李重进兵临瀛州城下，辽瀛州刺史高彦晖降。

距下诏亲征仅41天，距出沧州仅14天，郭荣兵不血刃，将辽朝边地三关（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州（宁州、莫州、瀛州）尽收囊中。五月二日，郭荣大宴诸将，迫不及待地宣布：光复幽燕，更待何时！

可出乎郭荣的意料，将士们竟无一人高呼附议。

因为诸将都已听说，耶律璟睡醒了。契丹精锐正在幽州以北集结，再往北打，就没有望风而逃的辽朝汉将，唯有彪悍勇猛的契丹铁骑。而每个人都还记得，显德元年，乘着高平之胜北伐太原的周军，是如何被耶律挞烈所率领的契丹精锐打得狼狈而归的。

将领们纷纷进谏："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这是不世之功！现在辽军聚集幽州之北，我军不宜深入。"

郭荣不悦。

当天，郭荣便急遣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北据固安，自己亲自到安阳水，指挥军队搭建浮桥，为主力大军继续北上做准备。

郭荣性子急，此为人所共知。可这次北伐却急躁到如此地步，已经超乎诸将的想象。这一切，都预示着将有大事发生。

细心的将士已经发现，出师以来，郭荣的脸色一直不好。而五月二日一整天，郭荣都虚汗如雨，面色苍白。

黄昏，疲惫不堪的郭荣回到瓦桥关。据说这一夜，郭荣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一把郁金宝伞下，郭荣手执《道经》，正襟危坐。远处，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神仙笑眯眯地朝他走来。那老神仙似曾相识，却又不知是何许人也。他双手轻轻一拍，郭荣手中的《道经》和身后的宝伞瞬间化作一缕青烟，消逝在风中。

“啊！”大汗淋漓的郭荣惊叫着坐起，随即又昏死过去……

第二章

陈桥兵变

一、谁来管枪

“点检做”

郭荣已经醒了，但觉浑身潮冷，酸软无力。他终于想起梦中的老神仙为何如此眼熟。许多年前，也是在梦中，老神仙亲手将金伞和《道经》交给郭荣，后来郭荣便荣登大宝；如今，金伞和《道经》已经收回，难道真的是大限将至？

前线的捷报还在零星传来。刘重进已经在固安站稳脚跟，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也攻克了易州。不过，耶律璟在集结契丹重兵的同时，已飞书北汉，命其出兵袭扰大周侧翼。战局依然云谲波诡，但郭荣已经没有精力与耶律璟来一场“三征淮南”式的大决战了。

显德六年（959）五月五日，郭荣下诏以瓦桥关为雄州，以益津关为霸州，命韩通率民夫加固霸州城池。六日，李重进奉命出兵土门，越太行山而进击北汉。七日，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义成军节度观察留后陈思让分别为霸州、雄州都部署，领兵戍守，防止辽军反攻。

在做好防御部署后，郭荣终于决定返京。王峻、刘旻、孟昶、李景、耶律璟，他战胜过那么多劲敌，却战胜不了天命。

此去，恐再不能临阵讨虏矣！

五月八日，大周雄师，黯然离开雄州瓦桥关。

大军行至澶州，突然驻军不前。这是大周发迹的地方，也是郭荣发迹的地方。

六年前，郭荣意气风发，从这里进京，接过养父的玉玺，掀起

五代时期最雄劲的显德风云；现在，郭荣病魔缠身，依然从这里进京，却仿佛看到政治生涯的落幕。

天子不豫，久未还都，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宰相范质闻讯赶来，却被郭荣拒于门外。病重的郭荣把自己关在内堂，谁也不见。唯一沟通内外的，就只有他的妹夫张永德。

大臣们火急火燎地找到张永德，让他见了郭荣，如此这般地说一番。张永德亦觉得言之有理，拍着胸脯就进了内堂。

见到郭荣，按照大臣们的嘱咐，张永德说道："天下尚未平定，朝廷根本空虚，四方诸侯都在观望。澶州距离开封不远，陛下不赶紧回京以安定人心，却在此殚精竭虑，万一不可讳，国家该怎么办？"

不可讳，那是死的婉辞说法。这是拐弯抹角地问郭荣：主上您要是死了，朝廷人事怎么安排？

"谁让你这么说的？"郭荣冷冷问道。

张永德倒也老实，答道："这是众人的意思。"

郭荣目不转睛地盯着张永德，一言不发。

张永德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就这样被郭荣盯着，浑身不自在。

许久，郭荣才有气无力地说："我就知道，是有人教你这样说的。我的意思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可你的资质太差，根本担不起这份责任！"

郭荣把自己关起来，确实在思考"不可讳"以后的事情。而让他一直下不了决断的，正是张永德。

北伐期间，郭荣要求所有军需物资都由京师直接运到自己驻军之处。有一天，他突然在地上发现一条足有两三尺长的木头，形状很像扁担，上面写满了"点检做"。这是当时一种算卦的方式，用来占卜"点检"是不是能"做"什么事情或什么职位。

这显然是有人在装神弄鬼。

点检，毫无疑问，就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殿前都点检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禁军最高统兵官，“点检做”还能做什么？当然只能做皇帝！

张永德确实喜欢捣鼓鬼神之事，素有“张道人”之称。“点检做”的木条，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这样大逆不道的木条“恰好”被郭荣本人看见，郭荣才不信是什么偶遇。这更像是李重进对张永德当年诬陷自己造反的回敬。

平心而论，到底是谁在诬陷张永德，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哪怕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也不例外。邓广铭、李裕民等老先生坚信是李重进所为，但李重进当初既然在淮南能顾全大局，以很低的姿态换取张永德的谅解，就不太像能在北伐期间干出这种无底线事情的人。

蒋复璁、张其凡、顾吉辰等先生则认为，后来接替张永德职位的是赵匡胤，那么诬陷张永德的一定是赵匡胤。但问题是当时李重进、韩通都在军中，赵匡胤难以瞒天过海。即便赵匡胤想取代张永德，北伐期间也绝不是好时机。

王育济先生又提出造木条的正是郭荣本人，理由是郭荣感到儿子年龄太小，索性制造舆论，把皇位传给张永德。五代时期确实流行传位养子，但养子至少也要跟养父一个姓，也要是儿子辈。同辈的张永德姓张不姓郭，郭荣倘若如此慷慨，又何必一直让他去牵制李重进？

是谁想拉张永德下马，已经说不清了。虽然知道张永德是被冤枉的，但那时的郭荣依旧不闻不问，一如往日处理张永德告李重进谋反的密报一样。

可现在形势变了，“点检做”与张永德都成为敏感的焦点。

偏偏在这个时候，张永德还要出风头，给群臣们当枪使，跑来问什么“不可讳”。张永德啊张永德，你让朕怎么放心把儿子交给你！

当天，郭荣心中再无疑虑，起驾回京。

周军击败汉军的捷报依旧接踵而至，昭义军节度使李筠甚至攻下了北汉的辽州。可郭荣却无心理会，因为他的女儿刚刚去世了。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郭荣，他累了，身心俱疲……

河东山谷间，李重进的信使从开封回到行营。北汉连吃败仗，已经撤军，战事可以结束了。李重进送上捷报，等待郭荣召回的命令，没想到，等来的只是宣徽北院使昝居润判开封府事（以宣徽北院使兼任开封行政长官）的消息。

以重臣昝居润兼判国都，这意味着郭荣的身体即将枯竭，朝廷的形势极为严峻，而战功卓著的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却被公然排斥在外！李重进觉得憋屈，郭荣自从继位，一直利用自己统兵作战，却从不给予自己应有的信任。他确实飞扬，但并不跋扈，更没有不臣之心。为什么？为什么自己委曲求全，一心征战，却仍然被猜忌、被怀疑？

“啊！——”李重进拔剑砍石，碎岩飞溅。

把决策权交给文人

六月九日，郭荣宣布立天雄军节度使、魏王符彦卿的二女儿，大符皇后的妹妹为皇后，史称小符后。同日，封皇四子郭宗训为梁王，领左卫上将军；皇五子郭宗让为燕国公，领左骁卫上将军。

郭荣本来有7个儿子，可是前面三个都在后汉刘承祐诛灭郭威家属时遇害。其余的郭宗训、郭宗让、郭宗谨、郭宗诲都还是小孩子，其中，被郭荣选为皇位继承人的郭宗训年龄最长，也不过7岁。郭荣立小符后，当然是要将符彦卿再度与大周皇室的命运绑在一起。

十五日，郭荣对大周王朝的高级官员做了最后的调整。这日清

早，首先在端明殿宣读的是由翰林学士起草的任命宰执的诏命。具体情况如下：

> 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王溥，加门下侍郎，与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范质并参知枢密院事；
>
> 以枢密使、检校太傅、右监门卫大将军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使如故；
>
> 以宣徽南院使、右监门卫大将军吴廷祚为枢密使、检校太傅、行左骁卫上将军。

简单来说，就是首相范质与亚相王溥同时参知枢密院事，兼管枢密院工作；枢密使魏仁浦则兼任宰相；另以吴廷祚为专职枢密使。

先来解释一下这一连串官职。

朝廷名义上的最高决策与行政机构是宰相的办公机构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其官署俗称政事堂。

虽然都是宰相，但实际上身份却有差异。级别最高的是中书令，但一般仅限于任命使相，只有冯道等极少数的宰相到了这个级别；其次是侍中，一般授予元老重臣；再往下便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般简称为“同平章事”或“平章事”。

范质、王溥、魏仁浦的资历尚浅，因而都是以同平章事的身份为宰相。但是这么多宰相在一起，总要有个权重大小、排名先后，这种次序由宰相所带的馆职来体现。所谓馆职，可以理解成名义上在图书馆、史馆等文化机构兼任的职事。

排名第一的宰相称为首相，所带馆职为弘文馆大学士；排名第二的宰相称为亚相，所带馆职为监修国史；排名第三的宰相称为末相，所带馆职为集贤殿大学士。因此，三位宰相的位序依次是范

质、王溥、魏仁浦。

虽然中书门下是宰相机构，可实际掌握最高决策权的却是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

枢密使最早出现于唐朝后期，当时尚由宦官充任，负责出纳皇帝之命，其所执掌的枢密院逐渐成为新的决策机构。到了五代，绝大多数枢密使（后梁称崇政使）均由皇帝亲信的士人担任，枢密院（后梁称崇政院）则从内廷逐渐走向外朝，成为实际最高决策机关。

出于加强集权、维护皇权的需要，枢密使被授予巨大的权力，居宫则传达诏命，临朝则治政选吏；监官则谏劝参劾，察民则刑讯谳狱；入朝则计赋算缗，出征则杀伐决断。凡有权力存在的地方，枢密使几乎无孔不入。

后汉时让皇帝闭嘴的杨邠、发动兵变的郭威，后周时阻止郭荣进京的王峻、斥责赵匡胤的王朴，全部为枢密使。而名义上总领百官的宰相，权力不断被枢密使侵夺。

鉴于枢密使权力太重，郭荣更倾向于用文臣出任此职，并且尝试将枢密院打造成更偏重军事事务的机构，通过控制调兵权来制衡禁军将领。

理解了这一点，郭荣这项任命的意图也就明确了。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时兼管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事务，一方面将军政大权集中收归朝廷，以方便三位宰相会同未来的小皇帝做决策，并制衡禁军的将领，防止其叛变。另一方面，三位宰相全是文人，缺乏军队支撑，有权无军，又可防止他们篡位。特别是兼管枢密院的宰相共有三名，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个武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四个人彼此牵制，同样可以防止出现独揽大权的权臣。

范质，字文素，大名府宗城人，今年49岁，货真价实的才子，这在乱哄哄的五代政坛上绝对是凤毛麟角。范质参加科举考试时，考官翰林学士、典贡部和凝特别欣赏他的文章。由于和凝当初以第

十三名登第，故而也给了范质一个十三名。从此，世人皆称范质得和凝“传衣钵”，范质因此声名鹊起。

范质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慎名重节，廉正奉公，连皇帝都不怕。前面我们提到过，他敢于抵制郭荣的“乱命”，也肯为解救窦仪出头。在乱世里，范质拥有难能可贵的传统读书人品格。

当然，在优点的延长线上，总会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缺点。范质刚正不阿讲原则的另一面，是不容人过，喜欢当面批评人。他曾说：“鼻子里能吸三斗醋，才能当得了宰相。”可见，容人之过、经得住呛对范质而言是多么痛苦的事。

在郭荣眼里，范质的原则性足以匡正朝纲，而他的坏脾气又不利于结党营私，何况他从大周开国就是宰相，有经验，有忠心，没有人比范质更适合来做首席顾命大臣了。

不过，要应对多变的时局，仅靠刚正不阿远远不够。因此，郭荣还要安排王溥和魏仁浦来随时应对棘手问题。

王溥，字齐物，太原府祁县人，38岁，进士甲科出身。早年追随郭威西征，成为主要谋士。那时郭威在平叛后，获得了不少朝臣私通叛党的书信，王溥劝郭威将书信烧掉，以收人心。后来郭荣做了皇帝，北汉刘旻寇边，满朝文武也只有王溥一个人公开支持郭荣亲征。第二年，郭荣准备西取后蜀四州，王溥推荐向训为帅，战事终获成功。大军凯旋后，郭荣设宴赐酒，并对王溥说：“为我选择将帅，扬威边境，全是卿的功劳！”与范质的急躁比起来，王溥沉着冷静，善于分析形势。在日后主少国疑的朝廷里，极需王溥这样的善断宰相。

王溥既聪明又为人宽厚，但也有个致命弱点——好财吝啬。他的父亲王祚更是个守财奴，曾在防御使、刺史任上，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经商，攒下万贯家财。这一家子都掉钱眼里了，捞钱还来不及，哪还有造反的心思？

再说魏仁浦，字道济，卫州汲县人，与范质同岁。魏仁浦不

是科举及第，他小时候家里很穷，甚至连自己的衣服都要母亲借钱买。13岁时，魏仁浦泣别母亲，到洛阳谋生，过黄河时曾将衣服沉入河中，发誓“不显达，不再渡黄河！”

魏仁浦非常擅长应对突发事件。后汉刘承祐大诛辅臣时，正是魏仁浦为郭威出计倒用留守印，将杀他的密诏改为皇帝命他杀尽诸将校，以激怒将校随他一同反叛，从而成就了一代帝业。高平之战，樊爱能、何徽溃逃，也是魏仁浦的主意，让郭荣亲自出阵一战，才有周军反败为胜，力挽狂澜。此外，魏仁浦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郭威曾让魏仁浦查查各州的屯兵数目和将校姓名，结果早就熟记于胸的魏仁浦当场手书于纸，一字不误。因此，当有人说魏仁浦不是科第出身，不能拜相时，郭荣根本不予采纳。

相比于范质的急躁，王溥的吝啬，魏仁浦的毛病是爱和稀泥，凡事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依然不是野心勃勃的个性。

范质守住原则，稳住人心；王溥从大处着手，沉着冷静；魏仁浦既能应对突发事件，又能缓和决策团的内部矛盾。在郭荣看来，这三个人组成的“核心决策团”，配上允文允武的吴廷祚，足以应对未来大周王朝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不会出现专断朝廷的权相。

枪杆子交给谁？

解决了朝廷决策权的问题，郭荣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最敏感的枪杆子了。

就在同一天，禁军高级将领任免的诏命也在端明殿宣出，具体情况如下：

> 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检校太傅韩通，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

使，依前为归德军节度使；

镇宁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检校太傅张永德，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依前为镇宁军节度使，出镇澶州；

忠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检校太保赵匡胤，加检校太傅，充殿前都点检，依前为忠武军节度使。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的军职没变，但是他仍然留在已经无仗可打的前线，郭荣丝毫没有召他回京辅政的意思。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境遇更差，直接被罢免军职，以使相的身份到澶州做节度使去了。两人在郭荣一朝斗了整整6年，最后关头却双双被踢出了最高权力圈。

历史的聚光灯，照向了赵匡胤与韩通。

33岁的赵匡胤顺理成章，接任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之职，检校官加至检校太傅。

韩通新任的侍卫副都指挥使仍然是侍卫司的副长官，但更有权威。他本人也加同平章事，成为与李重进同级的使相；而检校官加至检校太尉，超过了李重进的检校太傅。一切都表明，虽然韩通的军职里有个“副”字，但地位已不在李重进之下，实权更是掌握在他的手里。

在后周的禁军中，现年52岁的太原人韩通最为特殊。他是侍卫亲军的老兵，自20岁从军。后汉刘承祐即位时，韩通出任奉国军某指挥的指挥使。郭威西征平叛前，因为觉得韩通谨慎笃厚，特意将他带在身边。韩通也不负所望，每率先锋敢死队进攻叛军，身被六创，因军功而被提拔为本军的都虞候。郭威出镇邺都后，又向朝廷点名要了韩通，让他担任总领藩镇正规军的天雄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被郭威视为心腹的韩通，在邺都起兵和澶州兵变中也自然十分卖力。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郭威攻占开封后，韩通升任奉国左第六军都指挥使、领雷州刺史；广顺元年（951）正月，后周开国，韩通迁奉国右厢都指挥使、领睦州防御使；到了十月，又改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永州防御使。尽管韩通步步高升，可始终没有进入殿前诸班。这意味着郭威并没有将韩通视为嫡系，隐隐透露着郭威对韩通的某种不满或不信任。

到了广顺三年（953）七月，也就是郭威身体开始不适的时候，韩通突然被罢军职，出为保义军节度观察留后（节度使、观察使缺任时的代理职务，相当于“某藩镇负责人”），并于次年郭威去世前夕，正式担任保义军节度使。

将侍卫亲军的中高级将领罢出京城，这是郭威在当时的常规操作。尽管广顺三年，46岁的韩通年龄确实比较大了，可比他小3岁的张令铎却仍然在殿前诸班任职。

这不仅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推测，韩通没有进入郭威的嫡系序列，甚至还暗示着，郭威对韩通不放心。这或许与韩通的性格有关。韩通脾气暴躁，聊天没两句就能跟人吵起来。他发火时，眼珠子瞪得像两颗鹌鹑蛋，人们私底下都叫他“韩瞠眼”。韩通如果继续留在禁军，很快就会升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而郭威显然不想为郭荣留下这样一位爱瞪眼的高级统兵官。

可让郭威没想到的是，不到两年，韩通便被郭荣召回了禁军。

当年在邺都时，韩通统率天雄军的正规军，郭荣统率天雄军的近卫军，两人有相当多的交集。韩通的谨厚给郭荣留下深刻印象，郭荣也自认为能够驾驭爱瞪眼的韩通。

显德元年至二年（954—955），大周边境不宁，韩通转战南北。他不仅参与了高平之战与北伐太原，还在河北疏浚河道时击退了前来袭扰的辽军。特别是显德二年（955），韩通作为副总指挥率军征蜀，拔得四州，充分证明了其军事能力。韩通也因为战功卓著而徙镇彰信军。

恰在此时，郭荣发重兵征淮，禁军两司的高级将领全部出征。韩通便被郭荣调回京师，以侍卫都虞候的身份主持侍卫司日常工作，又先后兼任京城都巡检、京内外都巡检，确保京师安全。郭荣三征淮南，必留韩通坐镇京师。

除了能打硬仗，韩通的土木工程能力也是一流。从疏通水道、抢险筑堤、筑防河北，再到扩建开封，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而且韩通主持的这一系列土木工程建设，不仅质量好，而且效率高。扩建开封的工程原计划工期3年，韩通半年就干完了；在河北，韩通仅用10天就能筑好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而且一口气修了八九个。

韩通对郭氏父子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成绩斐然。但要长期保持如此惊人的效率，下面的人必然不会好过。因此，韩瞪眼大概率是那种一心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而不会顾及底下人死活的将领，史称他“肆威虐”，大抵指此。

这样的性格，加上侍卫司与殿前司的积怨，他与以赵匡胤为首的殿前司将领的关系就可想而知了。

而这正是郭荣想要的结果。

后周自从建立以来，就奉行以殿前诸班及后来的殿前司为根本的军事政策。在两司激烈的派系斗争中，殿前司因有皇帝的支持而始终占据上风，甚至有一支独大的趋势，这绝非郭荣缔造殿前军的本意。

因此，临近大限，郭荣甚至可以容忍李重进继续保留军职，但张永德却一定要罢职出镇。52岁又性格强硬的韩通，明显是来压赵匡胤一头的。

郭荣的时代即将结束，他要将势同水火的两司交给自己的儿子掌握。

顾命大臣联手废匿遗诏

六月十九日，范质等人被急召入万岁殿受顾命。

这个“等”字非常微妙。通观北宋人编撰的《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也找不到顾命大臣除了范质还有谁。

这很不寻常，因为史书对五代时期其他皇帝的顾命大臣都有明确记载。

直到翻开元代修撰的《宋史》，才在《王著传》中揭开了“等”字的谜团：“及世宗疾大渐，太祖与范质入受顾命。”“太祖”，说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

宋人将赵匡胤的名讳隐去，不仅是因为顾命大臣篡位实在算不上光彩，而且还因为赵匡胤与范质的入受顾命，从侧面反映出后来的陈桥兵变早有预谋。

见到范质与赵匡胤，郭荣拼着最后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王著……曹翰……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以著为……宰相……翰为……宣……徽……使……”

说完，郭荣的双眼不甘地闭上了。

四十不惑，39岁的郭荣不再挣扎。最后一子落定，天下这盘棋局，他已经布完，接下来会怎样，也由不得他了。

“王著整天醉游梦乡，哪能当宰相！曹翰狡诈专断，又怎么做得了宣徽使！千万别把这话说出去。”离开万岁殿，这是范质对赵匡胤说的第一句话。

王著，字成象，单州单父人，汉隐帝刘承祐时举进士。郭荣随郭威出镇大名时，听说王著很有才，就将他召到自己门下。显德三年（956），王著升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近臣。郭荣非常欣赏王著，曾让皇子出拜，而且从不称呼他的名字，只是叫他“学士”。郭荣屡次想以王著为宰相，没想到每次王著都喝得烂醉如泥，郭荣

只好作罢。

郭荣向来对臣僚苛刻，王著嗜酒如此，郭荣非但不闻不问，反而在大渐弥留之际想拜他为相，足见郭荣对王著的器重，也足见王著确有才能。

王著今年32岁，豁达耿直，才华横溢，又好交际，可谓年轻有为，这让年近天命之年的范质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上一个给他如此压力的人，还是王朴。如果王朴还活着，站在这里说话最算数的人，就不会是他范质了。好不容易熬死了王朴，难道还要再来个王著？范质甚至怀疑，王著嗜酒，故意不当宰相，是不是为了避开王朴的锋芒？现在王朴不在了，王著如果真当了宰相，还能嗜酒如命？范质不信。

面对情绪激动的范质，赵匡胤报以礼貌的微笑。

范质做了7年首相，任他道德文章做得再好，也不会任由威胁在眼前滋生。只要自己点头，王著的宰相梦立马泡汤——范质这是有求于我。

自从接掌殿前司，赵匡胤就一直在思考自己在后郭荣时代的处境。郭荣在他与韩通之间埋下的怨恨的种子，早晚都要生根发芽。韩通不是顾全大局的李重进，自己也不是坐等罢黜的张永德。赵匡胤明白，自己与韩通之间，早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谁能先把范质领衔的“决策团”拉拢过来，谁就能在未来抢占先手。既然范质先抛出橄榄枝，何不就此将他拿下！

至于大名人曹翰，则是个粗中有细的武夫。

后周建立后，曹翰便随郭荣去了澶州，担任牙将，因而也是郭荣的潜邸幕僚。一次，郭荣在便厅处理公务，房子的大梁突然折断，曹翰及时抱起郭荣，一把将他抛到石阶之下。虽然后来房子没有塌，但曹翰的忠心颇受郭荣赏识。

后来，郭荣入尹开封，曹翰被留在澶州。就在郭威病危时，曹翰私自到开封面见郭荣，这是违法的行为。郭荣正要责备他，曹翰

却让郭荣屏退左右，密告曰："大王是储君，现在主上寝疾，您应该到主上身边亲自服侍，怎么能还在外面处理公事呢？"在权力交接的节骨眼上，郭荣应该时刻守在郭威身边，以免生变。郭荣恍然大悟，当即入宫侍奉。

从此，曹翰备受重视。郭荣即位后，先后晋升他为供奉官、枢密承旨，在征高平、征淮南、征契丹的战役中，都有曹翰的身影。

然而，曹翰有两大人格缺陷。一是好杀戮，在征淮南时，因为怕降卒叛变，就将800名俘虏全部杀掉，惹得郭荣大为不满。二是性贪侈，以至于连袜子都是用锦织的，鞋都是用金线缝的。朝臣做了首诗嘲笑他："不作锦衣裳，裁为十指仓。千金包汗脚，惭愧络丝娘。"

此人如果入京做宣徽使，按照迁转惯例，下一步就要做枢密副使了。范质固然看不上曹翰的好杀骄奢，赵匡胤也实在不愿再多一个难应付的对手。

主意已定，赵匡胤朝着范质笑了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陛下知。陛下即将大行，天地不会说话。你懂的。

郭荣最后的遗诏，就这样被范质与赵匡胤联手废匿。从两位顾命大臣踏出万岁殿那一刻起，顾命便已失去了意义。

志得意满的范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绑上赵匡胤的船，再也下不来了。

显德六年（959）六月十九日，顾命当日，一代雄主郭荣，带着他未竟的"三十年"，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大周。

侍卫司：谁的支持者？

六月二十日，7岁的郭宗训正式登基，是为周恭帝。八月十七日，郭宗训"宗"字辈儿的兄弟为了避新皇名讳，纷纷改成了"熙"字辈儿。皇帝的五弟燕国公郭熙让进封曹王，六弟郭熙谨封

纪王，七弟郭熙诲封蕲王。

按照惯例，新皇登基要给文武百官加官晋爵，以示恩典。作为顾命大臣，范质和赵匡胤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有更大的发言权。

最先获得恩赏的自然是手握重兵的禁军大将和藩镇节帅，特别是禁军两司的中高级将领。此时的范质兼任山陵使，正忙着主持先帝的治丧事务，再加上军队本来也是赵匡胤的势力范围，范质乐得对这位政治上的新盟友做个顺水人情，以报答废匿王著拜相遗命的“恩惠”。

七月，禁军的人事调整方案最终公布。我们不妨来对调整前后的人员做个对比。侍卫亲军司的情况如下：

表2-1　侍卫亲军司人事调整前后对比

官阶与职务		显德六年（959）六月 周世宗郭荣驾崩前夕	显德六年（959）七月 周恭帝郭宗训即位后
高级统兵官	侍卫亲军 马步军 都指挥使	李重进[不在京] 领天平军节度使、 检校太傅、兼侍中 （敌对）	李重进[出镇] 领淮南节度使、 检校太尉、兼侍中 （敌对）
	侍卫亲军 马步军 副都指挥使	韩通 领归德军节度使、 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敌对）	韩通 领天平军节度使、 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敌对）
	侍卫亲军 马步军 都虞候	无	韩令坤 领镇安军节度使、 检校太尉 （发小）
	侍卫亲军 马军 都指挥使	韩令坤 领镇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 （发小）	高怀德 领宁江军节度使、 检校太保 （密切）
	侍卫亲军 步军 都指挥使	袁彦 领彰信军节度使、检校太保 （潜在对手）	张令铎 领武信军节度使、 检校太保 （密切）

续表

官阶与职务		显德六年（959）六月 周世宗郭荣驾崩前夕	显德六年（959）七月 周恭帝郭宗训即位后
上军厢级统兵官	龙捷左厢 都指挥使	高怀德 领岳州防御使、检校司徒 （密切）	（未详）
	龙捷右厢 都指挥使	祁廷义 领岚州防御使 （中立）	祁廷义 领岚州防御使 （中立）
	虎捷左厢 都指挥使	张令铎 领常州防御使、检校司徒 （密切）	张光翰 领嘉州防御使 （友好）
	虎捷右厢 都指挥使	陆万友 领阆州防御使 （潜在对手）	赵彦徽 领岳州防御使 （义兄）
部分上军军级统兵官	龙捷 左第四军 都虞候	杜汉徽 （中立）	杜汉徽 （中立）
	龙捷 右第一军 都指挥使	王晋卿 领彭州刺史 （潜在对手）	（未详）
	龙捷 右第二军 都指挥使	王廷义 领珍州刺史 （中立）	王廷义 领珍州刺史 （中立）
	龙捷某军 都指挥使	刘光义 领雷州刺史 （义弟）	（未详）
	虎捷 左第一军 都指挥使	马令琮 领建州刺史 （中立）	马令琮 领建州刺史 （中立）
	虎捷 右第一军 都指挥使	解晖 领某刺史？ （中立）	解晖 领某刺史？ （中立）

在侍卫亲军中，明确与赵匡胤对立的，只有侍卫司的最高正副统兵官李重进与韩通。在七月恩典之后，李重进不仅节镇由天平军改为淮南镇，而且被要求出镇，也就是率领一小部分侍卫司的人马，以防御南唐的名义，到远离京师的扬州去驻守。这意味着，李重进在形式和实际上，都已经被踢出了朝廷的核心圈，侍卫都指挥使的军职成为有名无实的安慰鼓励奖。

赵匡胤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驱逐李重进，是因为郭荣削弱李重进的意图早已昭然若揭，而范质自然也不会反对将一个与自己交情不深的高级将领外放。相反，韩通是郭荣生前钦定的侍卫司实际负责人，赵匡胤和范质就不敢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除了李重进与韩通，在七月恩典前，侍卫亲军中还有一些赵匡胤的潜在对手。比如袁彦和王晋卿，都是以郭荣潜邸幕僚的身份，被提拔进入侍卫亲军的。他们从未进入殿前军，自然也不曾是赵匡胤的下属，赵匡胤对他们并没有影响力。

因而，虽然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龙捷右第一军都指挥使王晋卿并没有表现出对赵匡胤的敌意，但赵匡胤仍将他们视为潜在对手，让他们离开禁军。袁彦出为保义军节度使，王晋卿则做了滨州刺史。赵匡胤的顾虑并非毫无必要，后来陈桥兵变，尽管王晋卿欣然接受了新朝，可是袁彦的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不过，侍卫亲军中的绝大多数将领并不关心谁来掌军，甚至不关心谁做皇帝。毕竟，郭威、郭荣父子对侍卫亲军施行了近10年的打压政策。侍卫亲军的高级统兵官和绝大多数厢级统兵官，不是郭威的亲从便是郭荣的故吏。土生土长的侍卫亲军将领，或是从其他地方调来的非嫡系将领，如杜汉徽、王廷义、马令琮、解晖等，如果没有机会调入殿前军，就根本没有获得禁军高位的可能。因此，他们对于拥护大周江山社稷并不上心，如果真对什么事情还上心的话，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挤入赵匡胤的殿前军。对于这些“人畜无害”的人，赵匡胤几乎全部留任本职。

最后要说的，就是侍卫亲军中的殿前系将领了。他们在周初以郭威嫡系的身份进入殿前诸班，在郭荣时又转入侍卫亲军掌军。这些殿前系的将领，并不都是赵匡胤的拥护者。比如祁廷义就保持着中立。陆万友的态度也不明确，而且资历较深，不是赵匡胤能够驾驭的人物，因此也被罢去军职，出任安州防御使。

但这样的殿前系中高级将领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与赵匡胤保持着密切关系。韩令坤是赵匡胤的发小。有一次，两个孩子一起在一间破房里赌钱，玩罢离开房子后，房子竟然塌了。两人就是这样，从小玩到大。这次禁军大调整，韩令坤晋升为侍卫都虞候，实际上成为韩通的副手。但这副手既可以来帮忙，自然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添乱。

高怀德与赵匡胤也颇有渊源。高怀德祖籍妫州怀戎军，高氏家族是能够影响幽州镇走向的武力豪族，高怀德的爷爷高思继是幽州镇名将，其地位尚在赵敬的岳父刘正之上。后来，高氏家族归顺了河东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并随着李存勖来到中原。高怀德的父亲高行周也是一代名将，受封为齐王。周太祖郭威对他极为尊重，甚至下诏书从来不直呼其名。

高怀德甫一成年，就随父北征契丹。开运之祸时，他便以坚壁清野、抗拒乱贼而出名。高行周去世后，高怀德被郭威收入殿前诸班，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高怀德武艺绝伦，后来征淮南时，郭荣曾亲见他追击唐军，夺槊而还。其勇猛可见一斑。

高怀德与张令铎一起，曾长期在殿前司下属的铁骑、控鹤军任职，直到跟随郭荣征淮南，才因功迁至侍卫亲军任中高级将领。由于曾长年在赵匡胤手下共事，高怀德、张令铎与赵匡胤的关系非比寻常。

于是，侍卫司五大高级将领对赵匡胤的态度，由郭荣晚年的2个敌对、1个潜在敌对、1个支持、1个空缺，敌对与支持比3：1，变成了2个敌对3个支持。特别是，保持敌对态度的李重进根本不发挥作

用，实际上侍卫司高级将领的敌对与支持比变成了1：3，形势完全翻转过来。

侍卫亲军龙捷、虎捷的厢级将领，在高怀德、张令铎上调后，赵匡胤立即补上了张光翰、赵彦徽。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个以前是什么职务，属于什么派系，但两人对赵匡胤的态度相当友好。特别是赵彦徽，老家是定州安喜县，与赵匡胤的母亲杜老夫人是同乡。再加上他也姓赵，赵匡胤干脆就拜赵彦徽为兄。龙捷、虎捷上军的四个厢级统兵官，至少有两个持亲赵立场，还有个祁廷义保持中立，赵匡胤对这一层的统兵官仍然有高于韩通的影响力。

至于龙捷、虎捷的军级统兵官，从有记载的几位来看，除了被视为潜在威胁的王晋卿被调离禁军外，其他无派系的中立统兵官全部留任。只要他们不公开在赵匡胤与韩通之间选边站，赵匡胤也愿意与他们相安无事。

郭荣去世仅仅一个月，韩通在侍卫司的水，就被赵匡胤搅浑了。

殿前司：谁的基本盘？

赵匡胤控制侍卫司，与郭荣的办法差不多，是通过中高级将领，将自己的权力从上向下渗透。这样的方式虽然不够牢靠，但韩通对侍卫司的控制力更弱。对于赵匡胤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而殿前司的情况就乐观多了，这本来就是赵匡胤的地盘。在经历七月恩赏后，殿前司（表2–2）简直变成了“赵家司”。

表2-2　殿前司人事调整前后对比

官阶与职务		显德六年（959）六月 周世宗郭荣驾崩前夕	显德六年（959）七月 周恭帝郭宗训即位后
高级统兵官	殿前都点检	赵匡胤 领忠武军节度使、 检校太傅 （本人）	赵匡胤 领归德军节度使、 检校太尉 （本人）
	殿前副都点检	慕容延钊 领淮南节度使、 检校太保 （称兄道弟）	慕容延钊 领镇宁军节度使、 检校太傅 （称兄道弟）
	殿前都指挥使	石守信 领江州防御使、 检校司空 （义弟）	石守信 领义成军节度使、 检校太保 （义弟）
	殿前副都指挥使	无	无
	殿前都虞候	无	王审琦 领睦州防御使 （义兄）
上军厢级统兵官	铁骑左厢 都指挥使	（未详）	（未详）
	铁骑右厢 都指挥使	王审琦 领虔州团练使 （义兄）	刘光义 领涪州团练使 （义弟）
	控鹤左厢 都指挥使	（未详）	（未详）
	控鹤右厢 都指挥使	（未详）	（未详）

续表

官阶与职务		显德六年（959）六月 周世宗郭荣驾崩前夕	显德六年（959）七月 周恭帝郭宗训即位后
部分上军军级统兵官	铁骑左第二军 都指挥使	（未详）	马全义 领播州刺史 （拥护）
	铁骑右第二军 都虞候	张廷翰 （拥护）	（未详）
	铁骑某军 都指挥使	杨光美 领白州刺史 （义弟）	杨光美 领白州刺史 （义弟）
	铁骑某军 都虞候	韩重赟 （义弟）	（未详）
	铁骑某军 都虞候	党进 （拥护）	党进 （拥护）
	铁骑某军 都虞候	李进卿 （拥护）	李进卿 （拥护）
	控鹤某军 都指挥使	（未详）	韩重赟 领虔州刺史 （义弟）
部分殿前诸班统兵官	殿前指挥使 都指挥使	尹崇珂 （姻亲）	尹崇珂 （姻亲）
	殿前指挥使 都虞候	李汉超 （拥护）	李汉超 （拥护）
	殿前内殿直 都虞候	马仁瑀 （拥护）	马仁瑀 （拥护）
	殿前散员 都指挥使	王彦昇 （拥护）	王彦昇 （拥护）
	殿前散指挥使 都虞候	罗彦瓌 （拥护）	罗彦瓌 （拥护）
	殿前散都头 都虞候	（未详）	张廷翰 （拥护）
	殿前东西班承旨 都指挥使	崔彦进 （拥护）	崔彦进 （拥护）

殿前司内的高级统兵官，上军厢级、军级统兵官，以及殿前诸班统兵官，有名可考者，全部属于殿前系。

殿前司的中高级统兵官，拥护赵匡胤的最核心力量就是“义社十兄弟”集团。相传，赵匡胤与李继勋、王审琦、石守信、刘光义、韩重赟、杨光美（一作“杨光义”，后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名杨美）、[1]王政忠、刘庆义、刘守忠义结金兰，号为“义社十兄弟”。

“义社十兄弟”的说法在两宋颇为流行，但这十人的名单直到南宋才出现，时间太晚，因而真伪难辨。不过，赵匡胤与李继勋、王审琦、石守信、刘光义、韩重赟、杨光美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他们在后汉末年，都是郭威的嫡系将士；后周建立后，又全部进入殿前诸班。其中以李继勋年龄最长，在显德初年军职也最高，担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只因后来李继勋在淮南吃了败仗，被郭荣罢出禁军，赵匡胤又在郭荣的扶持下，常年做殿前司的长贰，于是，他便理所当然地接替了李继勋，成为众人的“带头大哥”。

赵匡胤以下的众兄弟中，又以石守信、王审琦军功最著、地位最高，与其关系最亲密。石守信小赵匡胤两岁，在讨伐高平、淮南、幽蓟的战争中屡立战功，郭荣北伐幽燕时，石守信已经作为陆路副都部署，副于都部署韩通，而成为前线的重要指挥官。王审琦大赵匡胤1岁，在淮南以数次率领敢死队冲锋陷阵而闻名。

在五代时期，军队中的将士过的是刀尖舔血、生死与共的生活，这使得结拜之风大为盛行。当年郭威追随唐庄宗后，便曾与李琼等9位士兵拜过把子。[2]当年歃血为盟时，赵匡胤并不会想到，昔

---

[1] 据范学辉考证，杨光义就是《宋史·杨美传》中的杨美，本名光义，因避宋太宗讳改名美。《长编》亦可证。

[2] 有学者认为郭威十兄弟号称“十军主”，不确。“十军主”之称见《宋史·李万全传》：“（李万全）累迁至本军都校，与田景咸、王晖等从周祖入汴，号十军主。”军主是军都指挥使的俗称，李万全为“本军都校”，因而可称军主。当时郭威已为枢密使，又为众将拥立为帝，必不在“十军主”之列。这里的“十军主”指的是随从郭威攻入开封的十位中级将领。

日的结拜竟然成为他今天控制军队的重要保证。

除了“义社十兄弟”集团，纯粹的殿前系将领还有慕容延钊和马仁瑀。慕容延钊自不用说，是殿前系资历最老的高级将领，赵匡胤以临时殿前都虞候身份主持练兵的时候，正式的殿前都虞候就是慕容延钊，说来他还算赵匡胤的老领导。

早在显德三年（956），殿前司内就基本形成了张永德、赵匡胤、慕容延钊依次迁转的次序。因此，赵匡胤虽然后来居上，对年长14岁的慕容延钊却格外尊敬，不仅称他为兄，更是拿他当亲哥哥一样对待。慕容延钊与赵匡胤的关系自然也非比寻常。

至于马仁瑀，与赵匡胤一样，都是汉末在邺都投奔郭威，随后一直被留在后周殿前系的将领。马仁瑀因弓箭功夫了得，一直受到郭荣青睐。高平之战时，他也是同赵匡胤一样，大喝杀敌的勇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殿前系的很多将领都是“外来户”。其中一部分出自郭荣的潜邸幕僚，如马全义、尹崇珂、李汉超和崔彦进；还有一部分来自侍卫亲军，如党进、蔡审廷、李进卿、王彦昇、罗彦瓌和张廷翰。他们虽然进入殿前系的时间有先后，但都赶上了赵匡胤强势崛起。因而，他们与袁彦、王晋卿等人大不相同，反而与马仁瑀辈相似，在与赵匡胤长期的长官下属关系中，形成了对赵匡胤的依附。

在这些“外来户”中，王彦昇和罗彦瓌这对活宝值得大说特说。两人在晋末就已相识，因为共同守城抗击辽军，建立了过命的交情。

别看王彦昇年长罗彦瓌6岁，罗彦瓌的脑子要比王彦昇活络得多。郭威称帝后，罗彦瓌被提拔为散员都虞候，前途无量。看来在邺都与澶州的兵变中，罗彦瓌应该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罗彦瓌后来因为投靠王峻，遭到贬黜。直到在征蜀四州之战中立了军功，才又重回殿前系，迁任散指挥都虞候。

好不容易回来的罗彦瓌，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积极向皇帝的大红人、自己的上司赵匡胤靠拢。而有了罗彦瓌的指点，同在殿前司担任铁骑右第二军都指挥使的王彦昇当然也不会落下。

后来陈桥兵变，据说把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的，就是罗彦瓌。范质与赵匡胤对质时，也是罗彦瓌剑指范质，逼他就范。王彦昇则亲手杀了韩通，还在韩府大开杀戒。

两个人一点也不像赵匡胤真正的心腹，反而像是专门干脏事的狗腿子。由此可见，在郭荣的扶持下，赵匡胤在殿前司有着怎样的地位。这些来自潜邸和侍卫亲军的将领尚且积极向他靠拢，那些被他招入殿前司的士兵就更不用多说了。

当赵匡胤的个人魅力与郭氏两代赋予殿前系的权力交融在一起时，他终于成为一个在殿前司里上下通吃的“克里斯马型人物”。大周朝上下，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他这样坚固扎实的基本盘，来与他一争高下了。

曾经，那个作为大周郭氏父子基本盘的殿前系，在赵匡胤的带领下，开始反噬。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赵匡胤的强大熟视无睹。

最先出来说话的是进士出身的右拾遗杨徽之。早在郭荣在世时，他便上书，说赵匡胤在军中颇有人望，不能再继续掌军了。

郭荣没有在意。

接下来发话的是殿中侍御史郑起。郭荣去世后，他给范质写了一封密信，说赵匡胤统辖禁军多年，又深得军心，恐怕早晚要改朝换代。

范质没有回应。

朝廷陷入可怕的死寂，而军方终于有了反应。

作出反应的并非禁军将领，而是韩通的长子、21岁的尚食副使韩钧。韩钧因年幼生病，落了个驼背的后遗症，人称“韩橐驼”。与刚愎自用的韩瞠眼不同，韩橐驼足智多谋。眼见先帝去世仅一个

月，赵匡胤就将两司洗了牌，韩钧顿感大事不妙，多次劝父亲提防赵匡胤。

韩通置若罔闻。

十一月一日，在首相、山陵使范质的主持下，大行皇帝郭荣安葬庆陵，谥号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

一个时代，落幕了。

二、箭在弦上

抉择

在韩通眼里，比自己小19岁的赵匡胤就是个毛孩子。在论资排辈讲战功的军队里，韩通并不认为一个孩子能比自己更有威望，更不相信他敢对自己发起挑衅。

但韩通不傻，他也知道要在军界站稳脚跟，首先要掌握权力。凭借着资历、战功与独一无二的“瞪眼功”，韩通终究是不负郭荣所望，压了赵匡胤一头。朝中的军事事务，大多由韩通来定夺。

不过，侍卫司的将士并没有表现出多高的热情。毕竟，韩通掌了权，日后要有什么大动作，甜的也只是韩通自己，苦的却是他们这些底层的虾兵蟹将。倒是殿前司的将士颇为不满。打从有大周朝，他们就是“天之骄兵”，什么时候轮到侍卫司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了？

侍卫亲军继续对大周朝事不关己，殿前军却开始对大周朝心生怨愤。韩通这不是在掌权，而是在激将。

可赵匡胤反而很平静。在他看来，经过七月的那次人事调整，

禁军两司已经被亲赵势力所掌握。韩通就是个空架子，暂时让他一让又何妨？

韩通还在紧盯着赵匡胤，防范他来争权，赵匡胤却已经抽身事外，把手伸向了更远的朝堂。

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首相范质已经与赵匡胤结成政治联盟。而善于分析局势的亚相王溥，眼见赵匡胤人望日隆，竟然主动前来交好。以吝啬闻名的王溥，一出手就是一座淮南的花园，这让赵匡胤喜出望外。

“决策三人团”中，范质和王溥是以宰相身份兼管枢密院事务，而真正在枢密院有深厚根基的，反而是末相魏仁浦。魏仁浦自从踏入官场，就没离开过枢密院。他从一个枢密院小吏，一路升到枢密使。长年主持枢密院工作，使魏仁浦在院内有更高的威望。

禁军的人事任免、军队调动，都离不开枢密院的支持。为了拿下魏仁浦，赵匡胤甚至请出了自己的母亲杜老夫人出山。一日，杜四娘亲自登临魏府拜访。魏仁浦14岁的长子魏咸信，此刻正在母亲身边服侍，像个“小大人儿”一样。杜四娘一见“奇之”，便与魏家结为秦晋之好。

按辈分，魏咸信要娶的当然是赵匡胤的女儿，可赵匡胤最大的女儿也才4岁，这显然是一桩娃娃亲。然而，就是靠着订婚之约，魏仁浦这个老好人变成了赵匡胤的准亲家，成为“决策三人团”中与赵匡胤关系最亲密的人。

赵匡胤并没有满足于拉拢“决策团”。在郭宗训统治的半年里，他经常出入各种酒宴，与禁军中的将校饮酒宴集。

有一次，他和同僚们比试射箭，射中之后，竟然有人拿出了金束带和鞍勒马相赠。这本是皇帝赐予武将的珍贵物品，现在这名武将却拿来送给赵匡胤。赵匡胤当然不敢收，还义正词严地训斥道：“人臣宴集，却拿金束带和鞍勒马当礼物相赠，我能不避嫌吗？”说罢便揽住马缰而去。

由此可见，当时有不少人都在明里暗里向赵匡胤献殷勤。当然，也有极少数不为所动的。比如周太祖张贵妃的外甥、引进使曹彬，对赵匡胤就非常冷淡。没有公事，曹彬绝不登赵府的门，也不去参加那些所谓的“人臣宴集”。他不仅不去主动抱赵匡胤的大腿，反而拒绝赵匡胤的主动拉拢。

但拒绝拉拢并不代表反对，曹彬只是独善其身而已。何况，就算是独善其身，曹彬在朝中已经是凤毛麟角。这也就难怪韩钧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劝父亲韩通提防赵匡胤了。

自恃手握军政大权的韩通，依然置之不理。我们已经无法证实，韩通究竟是真的低估了赵匡胤，还是做了一只假装天下太平的鸵鸟。

可韩钧的话说多了，早晚要走漏风声。

关于韩钧的建议，韩通拒绝了一次，拒绝了两次，但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会拒绝10次，拒绝20次。

赵匡胤不得不正视来自韩通的挑战。

为了活命，更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显赫地位，赵匡胤必须赶走韩通，甚至除掉韩通，越早越好。

可是韩通离开禁军以后呢?

当小皇帝慢慢长大，赵匡胤迟早会成为他的眼中钉。万一小皇帝是个刘承祐一样的货色，自己岂不是要步了史弘肇和郭威的后尘。

赵匡胤倒吸一口凉气，越想越后怕。与其到时候被逼成郭威，不如趁现在，主动做郭威!

在中国古代帝制社会的权力结构下，有皇帝的地方，就一定不会劝人行善。

显德六年（959）冬，侍卫都虞候韩令坤奉命率军巡视北边。

时人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次巡边。冬季草场枯萎，北方少数民族容易犯边，历朝历代都将冬季视作北方防边的重要季节。

巡边的具体驻地，当在周世宗郭荣收复的关南地区。这一地区的霸州、雄州、莫州、瀛州直属朝廷，是防御契丹南下的桥头堡。而韩令坤在今年六月郭荣撤兵时，还以都部署的身份留守霸州，可谓有经验在先。如今，他又是侍卫司的副长官，由他率领部分侍卫亲军巡边，确实合情合理。

但谁也没发现，就是这个合情合理的举动，开启了改朝换代的大局。

军报

周显德七年（960）大年初一，东京城内一派肃杀之气。宽阔的大街上还能看见雨后积水结成的冰，映照着天空中那低沉阴霾的滚滚乌云。这场暴雨整整下了四天，直把白天泼涂得与黑夜无异。好在三天前，雨终于停了。

宰相范质肚子里的那条船，却仍被雨水噼里啪啦地乱砸着。他正顶着凛冽的寒风，静候在皇城的东上阁门外。这是新皇帝登基以来的第一个新年。自半年前这位7岁的小皇帝即位，首席顾命大臣范质就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在这样一个以下克上、国家命短、人们对改朝换代习以为常的年代里，主少国疑无疑是一个王朝最致命的弱点。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等待少年天子慢慢成长为一代明君？

范质忧虑地望向北方。边境线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契丹与北汉，不知何时会再度饮马黄河，失去幽蓟十六州的中原竟然一下子变得如此脆弱不堪。

可是更让范质头疼的症结却在萧墙之内。这些日子，范质每天都会想起郑起的密信。半年过去了，赵匡胤在朝中毫不遮掩地拉拢文臣武将，扩充自己的势力，见惯了“五代”风水轮流转的朝官军

将，也开始把赵匡胤视为有能力开创“第六代”的“潜力股”。

但赵匡胤依然很安静，同样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范质选择赵匡胤做政治盟友，不仅因为两人同受顾命，也不仅因为两人一起废匿了王著拜相的遗诏。当年周太祖郭威进开封大肆剽掠之际，范质在民间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对于这群粗暴的武夫，范质且惧且恨。如果非要在韩通与赵匡胤之间选一个来共事，他当然会选择赵匡胤。范质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终能感化赵匡胤，将相同心，继续完成周世宗未竟之业。

范质就像一个赌徒，在拿大周江山社稷做赌注。

而从小就好赌的赵匡胤，此刻正在赶往皇城的路上。这一次，他决定赌上身家性命。

端明殿左侧的东上阁门外，三位宰相已经早早等在这里。由于周世宗郭荣丧期未过，皇帝郭宗训未在崇元殿举行大朝，文武百官依礼到东上阁门进奉贺表。时辰一到，百官就会将贺表递交范质，再由范质转授阁门使，最后由阁门使进呈居住在万岁殿里的小皇帝郭宗训。

没人注意到范质与赵匡胤各怀心事，朝臣早已被喜气洋洋的笑容所融化，仿佛逼人的寒气，早已被其乐融融的新年喜气驱走。

只是突然的一道急报，将喜气打得灰飞烟灭。

镇州、定州急报：契丹大军来犯！汉军经土门东下，准备与契丹合兵，直奔东京杀来！

什么？东上阁门外立马炸开了锅，一时群臣汹汹，不知所措。

范质面如土色，王溥与魏仁浦冷眼旁观。

又是冬天，又是契丹，又是河北，一切都似曾相识。三人不约而同，想到了大周的太祖皇帝郭威。

乾祐三年（950）的岁末，郭威也是被河北传来的契丹犯边的急报叫走的，走着走着，就闹出了澶州兵变，把大汉闹成了大周。明眼人都知道，那次的军报有问题。

这一次的军报会不会也有问题呢？

如果军报真的是从镇、定二州发出的，那倒是作不了假。毕竟镇州成德军节度使郭崇、定州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与赵匡胤没有任何交集，让他们发出帮助赵匡胤篡位的军报根本不可能。

可是河北不止有郭崇与孙行友。与成德军和义武军东部接壤的，正是韩令坤巡边驻军的关南。而军报从成德、义武两镇送出，或经天雄军、镇宁军，或经安国军、彰德军，先抵达义成军，再由此进入东京开封府。大名府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是赵匡胤弟弟赵匡义的岳父，邢州安国军节度使是赵匡胤的义兄李继勋，澶州镇宁军、滑州义成军节度使分别由慕容延钊、石守信兼领，只有相州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全斌与赵匡胤毫无瓜葛。在军报的发出地和必经之路上，到处都是赵匡胤的党羽，天知道军报到底是谁从哪里发出来的。

要验证军报的真伪也很简单，只要找郭崇和孙行友核实一下即可，快马加鞭根本用不了几天。可是“决策团”的三名宰相，就像说好了一样，谁也不肯去捅这个马蜂窝。

既然不能质疑军报的真伪，那就只能按照军报，发兵抵抗辽汉联军了。

而只要赵匡胤提出由自己出征，朝中和军中根本不会有人反对——除了韩通。枢密院中，范质早被赵匡胤拖下了水，王溥、魏仁浦更是站在他这一边，剩下一个吴廷祚也无心与赵匡胤作对，4人至少都不会碍赵匡胤的事。侍卫司中，李重进、韩通、韩令坤、高怀德、张令铎，5人里除了韩通和远在天边的李重进，其余3人全部站赵匡胤的队，就算韩令坤不在朝中，高怀德、张令铎仍然是以两人对韩通一人。至于殿前司，赵匡胤、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4人全属赵匡胤集团。抛开被架空的李重进，赵匡胤11人对韩通1人，周世宗临终前在朝中的制衡布局彻底崩盘。

当然，让韩通留守京师，也不是没有理由。当初周世宗三征淮

南，每次都要留韩通在开封坐镇；而显德年间的历次征战，都少不了赵匡胤的冲锋陷阵。

枢密院最终决定，由侍卫副都指挥使韩通任在京巡检，仍按惯例保卫京师安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组建北面行营，担任北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行营总指挥；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出任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行营副总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分别出任北面行营马军、步军都指挥使，[1]各自统领出征的骑兵、步兵部队。而赵匡胤最为倚重的石守信与王审琦，反而留在了开封城。

侍卫亲军与殿前军都是部分出征，部分守城，彼此互相牵制，这是能让范质满意的部署。但对于韩通而言，侍卫亲军一部随李重进在淮南，一部随韩令坤在关南，一部又随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出征河北，本就人心不齐的侍卫亲军被赵匡胤拆得七零八落，而石守信与王审琦非但不会听他调遣，反而成为楔在开封城里的一根钉子。

赵匡胤已经渐渐亮出了自己的獠牙，韩通必须有所行动。

流言

显德七年（960）正月二日，慕容延钊奉赵匡胤之命，率领第一批先锋部队出发，目标是成德军节度使郭崇驻节的镇州。

五代时期，随着中原王朝移都一马平川的开封，河北对于中原王朝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甚至关乎王朝生死存亡。日后岳飞有言："国家都汴，恃河北为固。"后梁、后晋、后汉的亡国，莫不与失

[1] 张令铎在陈桥之变时的活动，史籍失载。但据史料分析，他应该出任了行营步军都指挥使。

去河北有关。如果河北未稳，赵匡胤根本不敢在开封城里做皇帝。

连接黄河南北的重镇是河北的大名府，而河北内部的枢纽则在镇州。它西连河东，北拒幽蓟，南抵魏博，有“谋河北，舍真定无议矣”之称。当初耶律德光入主中原，曾升镇州为中京，就是看中了它的枢纽地位。

慕容延钊领军进驻镇州，首要任务是与东面的韩令坤形成掎角之势，镇住郭崇与孙行友，以防生变。此外，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南面驻节邢州的李继勋一起，看住符彦卿。

符彦卿的地位实在太微妙了。皇帝是他的外孙，反贼是他女婿的哥哥，帮谁不帮谁呢？在外孙与姻亲那完全不对等的实力面前，在符氏家族的利益面前，符彦卿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慕容延钊即将出兵的消息，惊动了整座开封城的老百姓。十年前，郭威也是到河北去抵御契丹，紧接着回马开封，篡位夺权，纵兵抄掠……眼看着历史正在一步步重演，享受了十年太平的开封百姓再也经不住折腾。一时之间，“出军之日，就要策立点检当天子”的流言传得满城风雨，开封百姓争相逃亡城外。

赵匡胤做贼心虚，他暗中和家里人商量：“外面流言蜚语传成这个样子，这可怎么办？”赵匡胤丧夫寡居的妹妹此时正从厨房出来，听到消息后面如沉铁，抡起手中的擀面杖就朝赵匡胤打来，嘴里还责骂道：“大丈夫面临大事，能不能自己解决？在家里吓唬妇道人家，这是想干吗！”[1]

的确，坐在家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深居皇宫内院的小符后和郭宗训还听不到民间的消息；宰相们也仍然集体保持静默。只剩下一个人，仍然存在着变数。这个人，当然是韩通。

---

[1] 用擀面杖打赵匡胤的，史书中原作“太祖姊或云即魏国长公主”。按太祖之姐为陈国长公主，早已夭折；魏国长公主是赵匡胤的女儿。皆不确。疑此当是赵匡胤的妹妹，即后来的燕国长公主。

得稳住韩通。

按照惯例，大将出征前要拜访朝中重臣。赵匡胤决定亲自登临韩府，探一探韩通的态度。

此刻，韩钧正在劝说韩通摆一出鸿门宴。事情已经明显到这个地步，韩钧认为这是最后的机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趁着赵匡胤拜府，直接做掉他。可惜，关键时刻，韩通不知是缺乏勇气，还是不想同室操戈，抑或过于自信，竟然极力拦住了韩钧。

就这样，韩通失去了阻止赵匡胤篡位的唯一机会。

箭既在弦，不得不发。

三、天命所归

陈桥兵变

正月三日，又是一个寒冷的清晨。擅长天文占候之术的殿前散员右第一直散指挥使苗训，正右手搭在脑门前，顶着寒风，仰望万里苍穹。这勾起了同样“号知天文”的门吏楚昭辅的极大兴趣：大冷天，马上就要出征了，天上有什么好看的，难道能看见俩太阳？

苗训摆摆手，示意楚昭辅不要说话，然后朝着天上的太阳微微一指。只见微薄的卷云，在冰蓝的天空中散开，颇有几分传说中那“天子气”的模样。七绚的日晕仿佛天光，罩住那一轮气紫神灿的朝阳……

等等！一轮？怎么、怎么是两轮？楚昭辅这才发现，在一个太阳下面，真的还有另一个太阳！

在后世，这叫“假日虚像”，不过是由云层折射导致的一种奇

特天象。

在古代，这叫“二日同辉”，人人都知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个太阳一上一下，这是惊变之象。那隐隐泛着的黑光，按照《开元占经》的占卜理论，预示着将有大批士兵在战争中死亡。

苗训诡异地翘起嘴角，神秘兮兮地说了三个字：“天命也！”

接到慕容延钊渡过黄河的军报，赵匡胤亲率数万禁军主力从开封城东北方向的爱景门出征。郊外，宣徽南院使昝居润代表朝廷，设下隆重的酒宴，朝中文武接踵而至，为赵匡胤的大军饯行，其场面颇为壮观，“为一时之盛”。

赴宴的臣僚纷纷向赵匡胤敬酒，预祝大军旗开得胜，其中就包括翰林学士承旨陶穀。陶穀字秀实，邠州新平人。作为皇帝的首席秘书和顾问，他是当朝著名的大才子。此刻，借着酒劲儿，陶穀竟然三番五次表示要向赵匡胤行叩拜大礼。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让赵匡胤大为尴尬。尽管赵匡胤一再拒绝，但陶穀仍然坚持，还说道：“且先受我两拜，等您回来的时候，恐怕咱们就很难像现在这样喝酒了。”

赵匡胤无法确定，陶穀是听说了“点检做天子”的流言，还是觉察到了改朝换代的气息。这确实是个聪明人，他不仅在向赵匡胤表达忠诚，更在炫耀自己早已看透一切的洞察力。可聪明人总是被聪明误。陶穀也不想想，这是什么场合？他的“聪明”举动，只会让赵匡胤感到焦虑不安。

好在这一切都发生在酒席上，陶穀的言行自可以用酒后失态来遮掩，其他人也可能因为醉酒而根本没有把陶穀的异常举动放在心上。但朝中看透一切的“聪明人”，绝不止陶穀一个。只不过，有的人视而不见，有的人则心照不宣。

酒席过后，赵匡胤正式开营拔寨。爱景门外，高怀德、张令铎分别统领着骑兵和步兵阔步出城；李汉超、马仁瑀、王彦昇、罗彦瓌等殿前诸班的统兵将领，也各自率领着本该保卫皇帝的军队，追

随赵匡胤出征；赵匡胤的心腹幕僚归德军掌书记赵普、都押衙李处耘、门吏楚昭辅更是一个不落跟在其左右。

随着时间流逝，1000多年后，“爱景门”三个字早已在人们的脑海中风化。唯独它的俗称——陈桥门，却因陈桥驿的名字流传至今。

陈桥驿，是赵匡胤特意选好的兵变地点。

这座驿站始设于后晋，后来朝廷曾多次在此屯集重兵，有现成的营地设施。军队驻扎于此，既方便又不会引起朝廷猜忌。而且，陈桥驿位于开封爱景门外东北三十里处，距离开封不过半天的路程。[1]兵变发动后，赵匡胤可立即入京控制局面，以防夜长梦多。

当天傍晚，大军入驻陈桥驿。成竹在胸的赵匡胤于当晚早早入睡，据说是因为白天在饯行宴上喝高了。正当他鼾声如雷的时候，两个太阳的奇闻与“点检做天子”的流言在军中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引起阵阵骚动。入夜后，营中将士三五成群，议论纷纷：“主上幼弱，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咱们在外边出生入死，为朝廷杀贼，这谁能知道？不如先拥立都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去杀贼，到时候也不晚。”

负责赵匡胤仪仗和警卫工作的李处耘得到消息，立马找来王彦昇商议，紧接着又派人去叫马仁瑀和李汉超。王、马、李三人都是赵匡胤手下的死党，李处耘叫来他们，这哪里是在商讨对策，分明是要宣布拥立结果。

趁着马仁瑀和李汉超未到，李处耘又来见赵普。赵普闻讯，忙派人到军中打探情况。可还未等那人回来，王彦昇、马仁瑀、李汉超等人便冲进赵普的房门，争着嚷着要拥立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赵匡胤为新皇帝。

---

[1]《玉照新志》认为陈桥驿即上元驿。但实际上这是两个地方，《玉照新志》搞混了。

从始至终，赵普绷着脸，瘦削的两颊刚劲峻冷。将校们犹自纷纭不断，赵普声音高亢地说道："强敌寇边，雄师在此。你们手里才有几个兵，就想自行拥立天子？何况太尉对朝廷忠心耿耿，连老天爷都知道。要是听说你们这帮人如此大逆不道，太尉肯定饶不了你们！"

这就让诸将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尤其是马仁瑀、李汉超，你李处耘叫我们来，不是要商量拥立皇帝吗？怎么现在变成赵普劝退了？大家彼此相顾，无所适从，有的人心里没主意，干脆就离开了。

可是没过一会儿，诸将又都骂骂咧咧冲了回来，亮出白刀子，恶狠狠地说："太尉的功德全天下最高，我们都商定了，就是要拥立太尉当皇帝。在军中私自聚众议论，这是要灭族的大罪。我们既然把话都说出来了，哪还能退回去等死！今天你们必须听我们的，让太尉做皇帝。不然太尉身边的亲信才几个人，挡得住我们这么多人吗！真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是白白送死！"

诸将的话越说越糙，越说越离谱。赵普和李处耘大声呵斥道："你们上无君长，非要拥立皇帝不可。这么大的事，成了大家都是佐命功臣，可要是败了，你我就都是造反的乱臣贼子！这事要成，总得有个周密筹划，你们怎么能这么草率，狂妄悖逆！"

确实，这是把一家人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买卖，嗓门再大也没用。诸将这才坐下来，准备听听赵普和李处耘如何"周密筹划"。

赵普说："如今外寇压境犯疆，诸公此行，本来是奉命征讨。现在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事，北边的强敌谁去对付？不如先出兵，把戎虏杀退，等回来再慢慢图谋此事……"

"不行！"将领们已经失去耐心，举着刀反驳道："当今朝廷政出多门，要是等到杀贼后再回京，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现在趁着京城无备，应该马上进京。等拥立太尉做了皇帝，我们就是朝中的主人，那时再去北边打，杀贼简直易如反掌！太尉要是执意不肯接

受拥戴，兄弟们也绝对不会再向前走半步！”

赵普与李处耘相对而视，会心地点了点头。煽动军中情绪，将军中传言激化为诸将行动，这十有八九是李处耘的手笔，如此，才能解释他何以一会儿叫来一帮肯定同意拥立的将领商量，一会儿又跟赵普一起劝退诸将。而赵普的欲擒故纵，不仅试探出军中拥立立场有多坚定，更进一步让这种态度异常坚决，无从动摇。

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按照计划，赵普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赵普对李处耘表示：“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那就早点约束军队吧。”转过头又对诸将说，“兴王易姓，虽说是天命，但也取决于人心向背。大家知道，副点检率领前军，于昨日已经渡过黄河，节度使也各据一方。京城一旦发生动乱，不仅外寇会长驱直入，四方的藩镇也一定会叛变。到时候就算拥立了新君，这个烂摊子也不好收拾。如果各位能够严肃军纪，禁止部下劫掠，京城的人心就不会动摇，藩镇也自然不会发生变乱。若能立此功勋，诸位一定能长保富贵。”

赵普“勉为其难”，提出了支持拥立皇帝的条件。诸将稍作权衡，即表示接受，对赵普说道：“我们只是想拥立太尉当皇帝，本来也不是为了抢钱。你放心，我们保证不让手下的弟兄胡来，保管开封城平平安安。咱们上下同心，一起拥立太尉做皇帝！”

在前面我们就提到过，五代时期，大兵们发动兵变拥立皇帝，为的就是让新皇帝带自己洗城发财。这种被称为“夯市”的行为，赵匡胤深恶痛绝。为了能让大兵们接受约束，赵匡胤和赵普等人也是颇费心思。

对于拥立皇帝，赵普一开始坚决拒绝，这当然是为了维护赵匡胤的忠臣形象，同时也为谈条件留有余地。而他在开条件时，话里还带着刀子。慕容延钊在黄河北岸，石守信与王审琦就在开封城中，这些人都对赵匡胤死心塌地，为军中所共知。而陈桥驿的大军

正好夹在两部之间，这些大兵要是不同意赵普开出的条件，分分钟可以被南北两路的军队包饺子。

当然，赵普的威胁之所以有用，还有另一个先决条件——这些最先掀起叛乱的将领，几乎全部出身殿前系。殿前军的低级统兵官和底层士兵，很大一部分也是赵匡胤招募进来的。拥立赵匡胤当皇帝，对他们来说确实极具号召力。

至于陈桥驿大军中的侍卫亲军将士，绝大多数对于保护大周的江山并无兴趣，甚至有的人已经开始另寻出路。龙捷左第四军都虞候杜汉徽便是这样想的。在杜汉徽看来，与其保住一个打压自己的郭氏皇室，还不如拥立眼前的赵匡胤。反正自己最坏的处境也不过如此，拥立个新皇帝，兴许还能搭上从龙的顺风，改变自己的命运。

郭氏父子一拉一打的禁军政策，终于酿成恶果。

夜已深至四更。三十里外，一骑飞骏驰入开封，衙队军使郭延赟敲开了石守信的府门。

黄袍加身

正月四日黎明，天尚未亮，四下灰蒙蒙的，寒气彻骨。据说赵匡胤因为爱景门外那一席酒，此刻仍在酣睡。没有人知道他是因万事早已安排妥当，此刻临危不乱，真的在熟睡；还是彻夜不眠，不得不装睡。

自昨晚对拥立天子一事达成一致，赵普和李处耘便部署诸将，各自统领本部人马做好准备。可驿站之外，乱兵犹自喧嚣不绝。赵普与李处耘同入内堂，准备向赵匡胤汇报“变况”。没想到早有数名将士被甲执兵，聚集在驿站门口奋力敲门，声嘶力竭地嚷着：“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

时机已成熟，赵匡胤从容起身，穿好衣服，走出堂门，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还没等他说话，罗彦瓌已将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赵匡胤一惊之下，正要推辞。将士们哪里肯听，齐刷刷在院子里跪拜，高呼："万岁！万岁！万岁！"

赵匡胤依旧推辞，早有人牵来马匹，诸将一拥而上，把赵匡胤扶了上去，声言要拥护着赵匡胤，回开封去当皇帝。

这多像是五代禁军拥立皇帝请赏的老把戏！这多像是赵匡胤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觉醒来就做了皇帝！

可明代岳正那句诗说得好："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当年郭威临时披上的黄旗，变成了今天赵匡胤早就准备好的黄袍。没人注意到，他虽然对拥戴推来推去，但就是脱不下那件黄袍。

军心已定，赵匡胤决定摘下面具，从幕后走向前台。他一改半年里谦恭下士、低眉顺目的神态，一手拉住缰绳，一手挥起马鞭，以一种凛然不可犯的口吻命令全军："你们自己贪图富贵，拥立我为天子，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否则，我绝不做你们的主上。"

众将士齐声应道："唯命是听！"

至此，一场传统的五代式兵变已经成功完成了一半。

而兵变的下一半，则完全脱离了传统的轨道。

赵匡胤接受拥立后，正式下达了第一道命令："主上和太后，我平常北面而事；公卿大臣，都是我的同僚，你们不得伤害他们。当今之世，帝王举兵进京，总是放纵士兵大肆掠夺，称为'夯市'。你们随我入京后，不得夯市，不得抢劫府库。待到局势稳定，我自会厚赏你们。不然，族诛不殆！"

赵匡胤许诺，事成之后，每名士兵赏钱200贯。

"诺！"一声齐应，响彻陈桥驿的天空。

开封有三道城墙防护，从外到内，依次为外城、内城、皇城。

赵匡胤进入外城最方便的城门，当然还是前一日出兵时所走

的爱景门（陈桥门）。此门不仅距离最近，而且守城的部队是东第三班。这支部队隶属于殿前诸班之一的东西班承旨，而东西班承旨的长官崔彦进早已成为赵匡胤的亲信。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特意安排。

赵匡胤以东西班行首起家，东西班承旨是他的“龙兴之地”。一路上，赵匡胤都在想象爱景门守军迎龙出渊的壮丽场面。他坚信，东第三班的晚生见了前辈做皇帝，一定会五体投地，乖乖称臣。

结果，他迎来的却是壮丽的箭如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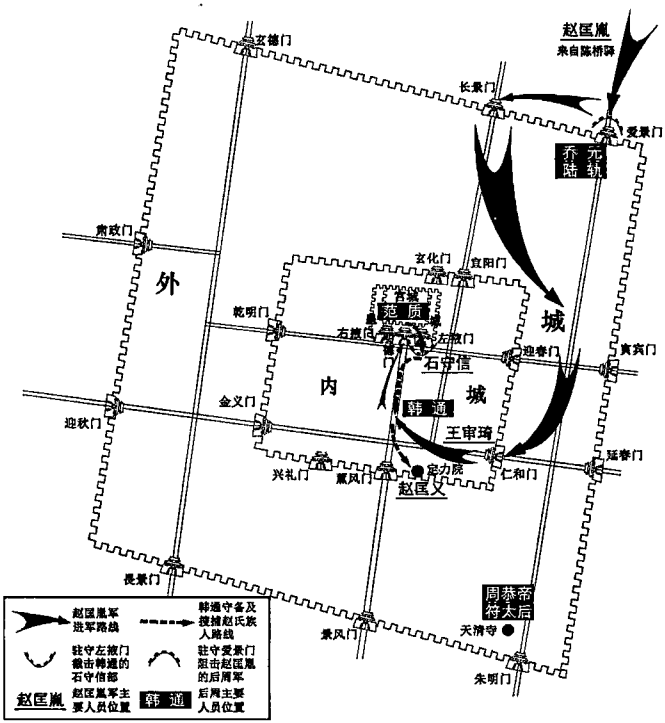


图2-1　陈桥兵变路线图

原来，千弓万弩早就搭在爱景门城头，马军也已在城门后待命。统率守军的卒长乔元、陆轨一声令下，万箭齐发，北面行营的

大军寸步难进。

赵匡胤心中大呼不好。爱景门守备森严，难道韩通已经将石守信和王审琦拿下，开封全城戒备？可皇帝还在城里！全军将士的家属也在城里！我的家属也在城里！要是韩通挟天子以令诸侯，诏令天下藩镇勤王，再以将士家属做胁迫，我赵匡胤大势去矣！

赵匡胤无心恋战，立刻命令全军调头西向，就近前往外城北东起第二座城门长景门。从后来守城部队的结局看，戍守长景门的部队有极大可能隶属于侍卫司。韩通此时兼任着在京巡检，主持京城防务。他虽然被赵匡胤裹挟走一部分侍卫亲军，但剩余的兵力来守几座城门，还是不在话下。

从爱景门到长景门不过三里，赵匡胤却好像走了三千里。他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但他已经没有退路。

可让赵匡胤再次没想到的是，正当自己如临大敌之际，长景门却门洞大开，守城将士望风而降。

赵匡胤顺利进入外城，随即一面派出客省使潘美作为特使，入宫通知后周君臣，以便寻求谅解与合作。一面让楚昭辅迅速给自己的家人送信；一面又马不停蹄地率军绕过内城的北城墙，奔向东南角的仁和门。

力不从心的抵抗

潘美还在路上，皇城内却已经接到兵变的报告。

万春殿里，范质一筹莫展，王溥、魏仁浦一言不发，郭宗训吓得结舌，至于瞠目，就留给韩通吧。

散朝时，范质一把抓住王溥的手，咬牙切齿地说：“匆匆忙忙就派遣大将出征，这是我们的罪过！”

当初一念之差，范质被赵匡胤绑上了贼船。他只想握住执政大权，却从来没想过支持野心家改朝换代。

范质悔恨交加，不由得手劲越来越大，指甲刺入王溥的皮肤，几乎刺出血来。

作为首相，这是他能为保住大周所做的最后贡献。

王溥忍着疼痛，依旧一言不发。在他心里，赵匡胤比一个七岁孩子更能继承世宗皇帝的遗志。可是真要改朝换代了，王溥无法回避对世宗的愧疚。

掐人有个屁用！这几个耍嘴皮子的措大宰相全是废物，要守住我大周的江山社稷，还得靠我韩通！韩通拔出佩剑，带上几名亲兵就朝皇城东南方向跑去。那里正是殿前司公署的所在之地，韩通要先端掉赵匡胤的老巢，阻止石守信和王审琦放叛军进城。

然而，当看到殿前司公署早已人去楼空时，韩通终于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赵匡胤早有准备，自己却一直像个傻子，还一再拒绝韩钧杀他的提议。韩通气急败坏地叫上亲兵，气势汹汹杀向殿前司南面的左掖门。突然，一支利箭擦脸而过，身后的亲兵应声倒地。

韩通大惊，只见左掖门外，石守信正率领殿前军扣动弩机。原来在得到拥立成功的消息后，石守信便秘密埋伏于此，封锁皇城，控制朝廷内外交通，尤其是控制韩通！

韩通一声怒吼，举剑跃起，亲兵们也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

经过一番浴血奋战，韩通总算冲出左掖门。石守信害怕皇城失守，不便追击，这让韩通有了喘息的机会。韩通就此分兵：一路由自己带着，向仁和门狂奔，准备在那里集结兵力，指挥防御；另一路则直扑赵府，挟持赵匡胤的家人作人质，如果真到了鱼死网破的那天，至少也要拉着赵匡胤的家人垫背。

只不过，此刻的赵府也已经空空如也。亲兵们几经打探才知道，早在兵变之前，赵氏一家就去了内城东南角仁和门附近的定力

院，举办向僧侣施舍斋饭的活动。

竟然什么都算在了前头！愤恨的亲兵们扭头便走，沿着御街南去，疾驰到定力院。

当听闻楚昭辅带来的兵变消息后，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赵匡义激动万分。作为家中除赵匡胤以外唯一的青壮年，21岁的赵匡义被留下来保护一家老小。[1]他为二哥的成功而高兴，也为即将面对的危险而紧张。在他身后，18岁的夫人符氏显得有些不安，与符氏同岁的嫂子王氏更是花容失色。

与符氏一样，王氏也出自将门，她是已故彰德军节度使王饶的第三女。显德五年（958），赵匡胤的原配夫人贺氏去世后，王氏便嫁入赵府。王氏如此紧张，倒不都是因为害怕，而是由于牵挂着怀中的两个孩子——她在上一年刚刚生下的赵德芳，以及贺氏生前所生、现年9岁的赵德昭。

在王氏身旁，13岁的赵匡美与那位性格彪悍的“擀面杖”妹妹，正紧紧围坐在58岁的杜老夫人身边。眼见一家上下如此焦虑，饱经风雨的杜老夫人兀自谈笑自若。她胸有成竹地说：“我这个儿子向来特别，别人都说当有大富大贵。你们怕什么呀？”

话虽如此，可韩通的亲兵们转眼就快杀到定力院。定力院的住持连忙让赵氏一家登上阁楼，然后锁上阁门，装作阁楼经久不开的样子。

---

[1]《长编》《宋史·太祖纪一》《涑水记闻》等均有赵匡义在陈桥驿决策兵变的记载，似乎赵匡义为幕后策划人之一，并有劝赵匡胤勿抄掠东京之言。但据《长编》作者李焘自注，在官方首次修撰的《太祖实录》（即《旧录》）中，禁止抄掠东京是赵匡胤自己的主意；所谓赵匡义劝阻，为宋太宗、宋真宗时修订《太祖实录》（即《新录》）所添加。当时赵匡义任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是掌管朝仪、扈卫的小官，不大可能随军出征；而赵氏家人移居定力院，身处险境，身旁也不可能一个主事的男人都没有。今从顾宏义考证，以赵匡义未参加兵变，而往定力院守护家人。

一家人前脚刚躲起来，韩通的亲兵们后脚就闯进了山门。

住持双手合十，心平气和地说："人早都走了，不知他们去了哪里。"

但亲兵们根本不信，要求把定力院搜个底朝天。最后，一名亲兵还是登上了阁楼，用钥匙打开了阁门上的锁……

赵匡胤的主力部队一路狂奔，几乎绕了小半个开封城，终于赶在韩通组织起防御前抵达仁和门。在这里，王审琦早就恭候多时。[1]

不及主力部队进城，王彦昇业已奉命带着手下飞驰在内城的大街上。这场兵变能不能如赵匡胤所愿和平结束，此刻全寄托在王彦昇手中的那柄利剑上。

却说心急如焚的韩通离了左掖门，试图全力组织抵抗，眼看就要到达仁和门，没承想迎面就遇到前来截击的王彦昇。素有"王剑儿"之称的王彦昇将一把宝剑舞得滴水不漏，筋疲力尽的韩通只有苦苦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定力院里的亲兵们还在大肆搜捕，那名登上楼阁的亲兵恶狠狠地踹开了大门。

据说，在这一刹那，亲兵看到的是蛛网密布，尘埃积聚，一看就是很多年没人来过的样子。他下楼汇报："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

搜捕无获，亲兵们扫兴而去。

赵家如何逃过这一劫，一直是个谜。也许是这名亲兵故意放水，为自己留条后路。也有可能是赵匡胤从附近的仁和门入城的消息传到了定力院，亲兵们已放弃与一位新皇帝对抗。

但韩通从未放弃。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明白，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

[1] 王审琦在兵变中的作为，史书不见记载。他极有可能前去仁和门接应，因此在兵变之后骤升为殿前都指挥使。

韩通且战且退，最后退入家中，府门还来不及关上，便被紧随其后的王彦昇带人冲开。寡不敌众的韩通最终倒在王彦昇的剑下，他的妻子以及22岁的长子韩钧、11岁的次子韩保安、9岁的三子[1]惨遭杀害，只有4个女儿和3岁的幼子韩守谅被留了活口。

这是陈桥兵变以来，第一场大型流血冲突。

唯一一场。

定力院的阁楼上，刚刚跟阎王爷打了个照面的赵氏一家，一个个还惊魂未定。

只有一人是例外——杜老夫人。她还是那样面色平和，还是不紧不慢地说："我儿子一直胸怀大志，今天果然成了大事。"

那种平静，就像是皇位水到渠成，就该轮到赵家一样。

赵匡义等人也终于定下神来，一溜烟儿跑出定力院。遥望道路北口，仁和门内的大街上，列列劲旅如铜排铁箫，整齐划一地开进开封内城。在金戈铁马的簇拥下，一个魁梧的汉子身着黄袍，气宇轩昂。

韩通死后，周军已再无有组织的抵抗。在石守信的接应下，赵匡胤顺利进入皇城，登上皇城正门——明德门。这座雄伟壮丽的门楼，非有皇帝特诏，臣僚不得登临。

在各级将校的指挥下，士兵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返回自己的营地；初受惊吓的小商贩们也都陆陆续续回到集市，继续开张营业；其他老百姓依旧安居乐业。于是乎，整座开封城，除了明德门上多了个赵匡胤，韩府里死了个韩通外，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市不易肆，兵不血刃，这简直是兵变中的奇迹。

赵匡胤并没有急于进入皇宫，反而回到殿前司，脱下黄袍。就像当年郭威等待冯道一样，他在等待自己的"盟友"范质。

须臾，入宫多时的潘美归来。在他身后，押解着后周宰相范

[1] 文献中没有记载韩通第三子的姓名。

质、王溥、魏仁浦。范质坚决不肯带头下跪，拒绝承认赵匡胤的帝位。他怒发冲冠，仿佛自己并非阶下囚，而仍然是堂堂宰相，向逆贼赵匡胤兴师问罪。

赵匡胤没有硬来，只是声泪俱下，抽泣着对范质说："我受世宗皇帝厚恩，却为将士胁迫，一旦至此，有愧于天地，我该怎么办？"

范质却一点面子都不给，指着赵匡胤的脸破口大骂："先帝养你如子，现在圣体未冷，你安敢如此！"

赵匡胤听了，捶胸顿足，但这不过是为了掩盖尴尬。他本想抹抹眼泪，赚点同情分，给彼此一个台阶下，可范质指着自己鼻子骂，把搭好的台阶全拆了。

眼看赵匡胤的戏要唱不下去了，站在他身后的罗彦瓌拔剑而起，剑锋直指范质的脖子，怒斥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

赵匡胤呵斥罗彦瓌无礼，可罗彦瓌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

箭在弦上，难道又要用流血破局？

赵匡胤当然不想血溅殿前司，再给自己加个屠杀忠良的骂名。可是他不背这个骂名，对面的宰相们就得背上没气节的骂名。

骂名，总得有人来背。

范质身后，始终默不作声的王溥突然倒身下拜。宰相作为抵抗叛军头子的集体，就此不复存在。孤掌难鸣的范质，不得不屈服。

后来，做了皇帝的赵匡义说，范质欠周世宗一死。如果他说这话时，他二哥赵匡胤还活着，不知会做何感想。

韩通已死，范质已降，距离九五之尊，赵匡胤只差迈上最后一级台阶——皇帝禅让。可是宫里却突然传来一个惊天消息：皇帝不见了！

禅让大典

开封城东南角，天清寺的佛殿里，小符后正搂着7岁的大周皇帝郭宗训，浑身战栗；身旁宫人的怀中，曹王郭熙让、纪王郭熙谨和蕲王郭熙诲，早就吓得缩成一团。这些孩子都是周世宗的骨肉，皆非小符后亲生；但于礼法，她是他们的嫡母。

周世宗的生日曾被称为“天清节”，在天清寺里获得世宗皇帝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是小符后最后的希望。

然而，能庇佑他们的，只能是那个即将成为新皇帝的人。

赵匡胤很快得知了小皇帝的下落，飞马赶到。

如何处理郭宗训和后周宗室，这几乎不是问题。因为540年前，当刘裕建立另一个“宋朝”——南朝宋之时，中国便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血腥传统：新朝开国，必诛前朝逊帝乃至宗室。此后，一统太平如隋如唐，战乱频仍如南北朝、如五代，540年间的14个王朝，没有一家一姓试图摆脱这个传统。

禅让大典还未举行，郭宗训暂时是安全的。但当赵匡胤问到该如何处理其余三位小亲王时，赵普立刻回答：“去之！”左右随即上前，将三个孩子连拉带拽，拖出了天清寺的佛殿。小符后以下，世宗宫人哭成一片。所有人都清楚，等待三位小亲王的将是什么。

清楚，并不等于认同。

此刻，潘美正用手狠狠抓着大殿的柱子，低头不语。潘美字仲询，大名府人。作为周世宗昔日的潜邸幕僚，潘美对世宗皇帝有着更深的感情。他不忍心世宗的骨肉就这样惨遭屠戮，更何况，他们还是孩子啊！

赵匡胤早就发现了潘美的异常举动。他询问道：“你觉得这三个孩子不该杀？”

潘美依旧低着头，不敢应对。

潘美并不知道，赵匡胤也在犹豫。毕竟，没有周世宗，就没有现在的赵匡胤。“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我不忍心这样做。”赵匡胤像是在对潘美的沉默做出回应，又像是鼓起勇气表白自己的心声。

潘美眼前一亮，终于壮起胆子说道：“臣与陛下都曾是世宗的臣子，劝陛下杀了这三个孩子；是辜负了世宗。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对臣心生怀疑。”

“唉。”赵匡胤忙派人把三个孩子追了回来，然后指着其中一个对潘美说：“你带走这个吧，让他给你当侄子。他是世宗的儿子，不能给你做儿子。”

被潘美收留的孩子，应该是郭熙让或郭熙诲，据说改名为潘惟吉，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去世。他的孙子潘夙文武双全，甚有乃祖世宗风范，成为北宋一代名臣。郭熙谨则在乾德二年（964）去世。另外一名孩子不知所终，据《寀卢村志》记载，是被工部尚书卢琰收养，改名卢璇。这虽然是附会之词，但这名前朝皇子确实有可能也被臣僚收养，从而逃过一劫。[1]

这些都是后话。此刻的赵匡胤终于了却一桩心事。让大臣来抚养前朝皇子，这绝对是他的首创，而且空前绝后。赵匡胤不愿踏着前朝皇族的尸体登基，他要让血雨腥风的政治，至少看起来温和儒雅。

可是朝廷里的大臣们却并不那么温和儒雅。

赵普等人已经回到崇元殿，张罗着禅让大典。召集文武的命令

---

[1] 关于潘美收养世宗之子，见宋人笔记《随手杂录》与《默记》（《默记》中“潘惟吉”作“潘惟正”）。《潘承裕及其夫人王氏墓志》中，不言潘承裕（潘惟吉之子）之祖父，而直书其叔祖潘美，有违常理，可从侧面证明潘惟吉即为世宗子。只是惟吉是世宗第几子，就不得而知了。据《新五代史·周世宗家人传·世宗七子》，皇六子郭熙谨逝于乾德二年（964），皇五子熙让、皇七子熙诲不知所终。则惟吉当为熙让、熙诲中的一个。恐怕这三个孩子，赵匡胤都以相同的方式，交给大臣抚养。只是史官讳莫如深，不能留下记载而已。

早就发出去了，但百官稀稀拉拉的，直到傍晚才齐聚殿堂，乱乱哄哄，毫无规矩。赵普会同范质等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把百官参加大典时的位次确定。可抵触新朝的文臣武将还大有人在，翰林学士李昉甚至明确拒绝出席大典，拒绝朝见新天子。[1]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

禅让大典好不容易凑合开始，可这时人们才发现，最重要的文件——禅位制书根本没来得及写！

眼看日头西倾，禅让大典怕不是要变成篝火晚会。

心怀恐惧的小皇帝郭宗训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群臣都在交头接耳，有些人更是幸灾乐祸，要看赵匡胤的笑话，场面一时尴尬至极，赵匡胤强压心中的怒火，催促赵普赶紧想办法。

正在这时，突然有一人摇头晃脑，优哉游哉地走出朝班，一撸袖子，掏出一张黄纸，扬扬得意地说道："制书已经写好了。"

赵匡胤定睛一看，这不是昨天要朝我行叩拜大礼的陶穀吗？

朝廷的高规格制书，向来由供职学士院的翰林学士执笔。能做到这个职位，通常文章都已名冠天下。更何况，陶穀担任的翰林学士承旨还是学士院的首席。陶穀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极具远见。周世宗问对《平边策》时，他是少数几个提出攻取淮南的文学之士之一。

可陶大才子向来不招赵匡胤待见，因为他做人太没底线。陶穀能够仕宦通达，起初全因后晋宰相李崧的赏识提拔。可后汉时，苏逢吉弄权，李崧受其诬蔑，被满门抄斩。陶穀不但参与了诬蔑李崧，甚至还曾跑到李昉面前炫耀此事。

正因如此，每当看到陶穀对自己谄媚的笑容，赵匡胤都感到恶心。但无论怎样恶心，这一次赵匡胤都不得不接受陶穀的献媚，毕

[1] 李昉不朝赵匡胤，见于《后山谈丛》。不过这条记载错误颇多，今只取李昉不朝太祖事。

竟是他救了自己的场子。

有了禅位制书，禅让大典终于可以开始了。礼官以皇帝的名义，宣读制书。宣徽南院使眷居润引着赵匡胤走近龙墀，面朝郭宗训，跪拜并接受禅位。郭宗训在礼官的搀扶下，战战兢兢地离开龙椅，下阶而北面称臣。赵匡胤到东厢房更衣，终于穿上了真龙袍——不仅有龙袍，还有那象征帝王身份的冕冠。当12串珍珠将赵匡胤的视线与群臣隔开时，他终于领略到唯我独尊之贵。在首相范质的扶持下，赵匡胤登上九五大宝。百官下跪叩拜，万岁之声，响彻崇元殿。

第二天，也就是显德七年正月五日（960年2月4日），即将满34岁的赵匡胤正式改国号为宋，建元建隆，大赦天下。

五代兵变的一股清流

完成禅代当天，逊帝郭宗训被降封为郑王，小符太后也被封为周太后，他们以国宾之礼被迁居到皇宫最西侧的延福宫居住。[1]

戍守爱景门的乔元、陆轨得知改朝换代后，义愤填膺。尽管赵匡胤解衣折箭，发誓不杀二人，可两位卒长还是悬梁自缢。赵匡胤闻讯，亲自来到东第三班的直舍，连连感叹“忠义孩儿”。为了表彰乔元与陆轨的忠烈，他下旨为二人立了忠义庙，连东第三班也因此获得“孩儿班”的称号。

南宋时，东第三班的正式名称虽然已改为长入祇候班，但“孩

[1] 关于郭宗训和小符后在逊位后迁居何处，《宋·太祖纪一》《宋会要辑稿·崇儒》说是西宫（即开封的延福宫，后因宋廷在宫中又建了一座延福宫，这座当年的西宫改称“旧延福宫”），《长编》等却说是西京（洛阳）。据《三朝北盟会编》，张邦昌在北宋灭亡、被迫僭位时，曾模仿赵匡胤迎周太后入西宫之礼，迎元祐废后孟氏入宫。因此，笔者取西宫说。

儿班”的称号却仍然代代相传。“孩儿班”将士所戴的帽子也别具特色，在脑后垂下两条长带。一条是粉青色的，象征着为周世宗守丧；另一条则是红色的，代表着为宋太祖登基庆贺。直舍的正门则一直用黄色的罗纱围护着，平时人们出入直舍都走旁边的小门，以此来象征对忠义的旌表。

倒是长景门放赵匡胤进城的士卒，非但没有因为迎驾获得升迁，反而由于没有忠于职守而获罪。关于他们的命运，一说被开刀问斩，一说被贬入下军。可见，他们绝不会来自赵匡胤掌权的殿前军，只可能来自侍卫亲军中的龙捷军或虎捷军。

在这一系列的奖惩之中，最让赵匡胤言不由衷的，莫过于已经死于非命的韩通。

赵匡胤刚刚听说王彦昇杀了韩通时，大为恼火，因为他在陈桥兵变时明令禁止诛杀后周旧臣。王彦昇因为擅杀，差点被赵匡胤砍了脑袋。只是后来赵匡胤表示“受命之初，不忍杀戮”，这才饶了王彦昇一命。

人人都知道，韩通是赵匡胤的死敌，是他登上皇位的最大阻碍，没有人比赵匡胤更希望韩通去死。即便如此，赵匡胤仍然对王彦昇擅杀韩通怒不可遏。看来，以投机而成为赵匡胤亲信的王彦昇，根本不能理解赵匡胤的宽广胸襟与政治智慧，更理解不了大宋朝的立国规模。

真是这样吗？

俗话说得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逃过“死罪”的王彦昇，因“活罪”而受到的惩罚是：军职由殿前散员都指挥使迁至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武阶由刺史升至恩州团练使；韩通昔日担任的京城巡检，也一并由王彦昇兼任。

因为“擅杀”，王彦昇升了。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惩罚吗？

在诛杀韩通时，除了韩通夫妇二人遇难，韩通的子嗣不仅杀男不杀女，甚至还留下了小儿子韩守谅，并没有斩尽杀绝。鉴于此，

有不少学者认为，对韩通一家，该杀谁不该杀谁，是在兵变时已经确定好的。王彦昇不是“擅杀”，而是奉命去韩府做定点清除。

赵匡胤是否有一份死亡名单，王彦昇是不是按照这份名单去韩府大开杀戒，今天已经无从考证。可即便赵匡胤没有明确指示，也一定有过类似的暗示。靠揣度圣意干脏活儿而混迹殿前司的王彦昇，不可能体察不到赵匡胤的心思。王彦昇不管是不是擅杀，都杀到了赵匡胤的心坎里。

因此，赵匡胤要砍王彦昇，不过是做给天下看的，就像他在范质面前委屈痛哭一样。

既然要做戏，赵匡胤索性就做全套。在大宋开国第四天，韩通被追赠为中书令，并以礼安葬。

韩通生前，已经是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也就是使相。按照使相的递升次序，他应该自同平章事先升至侍中，然后才能升为中书令。也就是说，追赠韩通为中书令，是一种超迁。

据宋朝追赠韩通中书令的诏书说，韩通受此殊荣的理由是“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应期；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尽管赵匡胤已经与韩通你死我活，但仍然要利用韩通来表彰忠义，树立典范，在安抚后周官员的同时，也教全天下的文臣武将都来忠于赵氏江山。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诏书中，赵匡胤与韩通的关系，还被说成是“夙定交于霸府，遂接武于和门，艰险共尝，情好尤笃”，好像他俩也是兄弟一样。

可不管赵匡胤怎样粉饰，都遮掩不住他内心对韩通的厌恶。后来，当赵匡胤在开宝寺的墙壁上见到韩通、韩钧父子的画像时，竟勃然大怒，下令立刻把画像挖去。

那时的赵匡胤已经坐稳了皇位，确实再也不需要强逼着早已死透的韩通与自己表演“兄友弟恭”了。

不过，对于那些曾压制自己的人，赵匡胤并不都是如此厌恶。

有些人，他甚至由衷地表示钦佩与敬服。

在开封的皇城里，有一座郭荣修建的功臣阁，里面挂满了当时名臣的画像。一日，赵匡胤途经功臣阁，不知是上天有意撩挑，还是清风无心拨弄，紧闭的阁门忽被吹开，一个雄峻的面孔映入眼帘。赵匡胤大惊，连忙整饬衣冠，正立站好，然后躬身行礼，不敢有半点马虎。

一旁的侍从满脸困惑，忙朝功臣阁望去，只见迎面挂着的正是王朴的画像。侍从不解地问道："陛下您贵为天子，王朴不过是个前朝臣子，怎么对他行这般大礼？"

赵匡胤用手指了指身上的龙袍说："这个人要是还活着，朕就穿不上这件袍子了。"

从市不易肆、兵不血刃，到对乔元、陆轨、韩通的褒奖，再到对王朴的敬畏，陈桥兵变成为五代兵变中的一股清流。

那么，为什么赵匡胤能够缔造这股清流呢？

首先，当然是赵匡胤在军中拥有巨大权威，能够有效管住军队。

其次，郭宗训在位的这半年里，赵匡胤为兵变做了充分准备，把抵抗力量降到最低，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赵匡胤虽然出身武将之家，但却具有基本的儒学素养。他在主观上想改变乱世法则。

正因如此，赵匡胤才能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发动一场完全不同于五代传统的兵变。

第三章 大宋开国

一、稳住人心，京城肃静

稳住军心：禁军“殿前化”的最终完成

尽管一波三折，但大宋朝终究还是取代了后周。按照惯例，赵氏一门自然是鸡犬升天。杜老夫人被尊为太后，赵匡胤的弟弟们做了高官，妹妹也变成了长公主。赵氏祖庙成为大宋宗庙，包括赵弘殷在内早就驾鹤西游的各位祖宗也有了皇帝名号。

和前面的五个小王朝一样，宋朝诞生于忧患之中。内有禁军腹心之患，外有藩镇肢体之危；南有列土分茅之祸，北有契丹破国之倾；民有旰日倒悬之苦，官有朝夕累卵之急。

从开平元年（907）到显德七年（960），短短的53年间，统治中原的王朝换了6个（后梁、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皇帝换了15个，平均每个王朝统治中原不到9年；每个皇帝在位才3年半。这些皇帝有一半是靠兵变上位的，有一半直接或间接死于兵祸。

没有人相信，靠兵变篡夺皇位的赵匡胤能够在位17年，更没有人相信，靠兵变开国的大宋王朝能够延续320年——甚至包括赵匡胤自己。

做了皇帝的赵匡胤，当然希望赵氏皇朝益寿延年，成为真正的“宋朝”，而不是步了五代后尘，变成第六个短命小王朝“后宋”。当务之急，便是稳定人心，稳住政权。

靠军队上台的赵匡胤，首先当然要稳住军心。正月五日，在改定国号、建元、大赦等例行程序完成后，赵匡胤的第一道皇命，便

是大开府库，犒赏支持他的两司将士。这是维持部属忠诚的最佳途径，也是当时防止军心不稳引发骚乱甚至兵变的唯一方法。6天后，便是关乎江山社稷的禁军高级将领的人事调整。我们不妨还是来比较一下周末宋初的禁军主要将领。

殿前军司方面：

表3-1　周末宋初殿前军司人事变动对比

官阶与职务		显德六年（959）七月 周恭帝郭宗训即位后	建隆元年（960）正月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
高级统兵官	殿前都点检	赵匡胤 领归德军节度使 （本人）	慕容延钊［不在京］ 领镇宁军节度使 同中书门下二品 （称兄道弟）
	殿前副都点检	慕容延钊 领镇宁军节度使 （称兄道弟）	高怀德 领义成军节度使 （密切）
	殿前都指挥使	石守信 领义成军节度使 （义弟）	王审琦 领泰宁军节度使 （义兄）
	殿前都虞候	王审琦 领睦州防御使 （义兄）	赵光义 领睦州防御使 （皇弟）
上军厢级统兵官	铁骑左厢 都指挥使	（未详）	王彦昇 领恩州团练使 （拥护）
	铁骑右厢 都指挥使	刘光义 领涪州团练使 （义弟）	马仁瑀 领扶州团练使 （拥护）
	控鹤左厢 都指挥使	（未详）	罗彦瓌 领某团练使 （拥护）
	控鹤右厢 都指挥使	（未详）	崔彦进 领果州团练使 （拥护）

续表

官阶与职务		显德六年（959）七月 周恭帝郭宗训即位后	建隆元年（960）正月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
部分殿前诸班统兵官	殿前指挥使 都指挥使	尹崇珂 （姻亲）	（未详）
	殿前指挥使 都虞候	李汉超 （拥护）	李怀义 领开州刺史 （拥护）
	殿前内殿直 都指挥使	（未详）	杨光美 领白州刺史 （义弟）
	殿前内殿直 都虞候	马仁瑀 （拥护）	李进卿 领贵州刺史 （拥护）
	殿前散员 都指挥使	王彦昇 （拥护）	马仁瑀 领贵州团练使（拥护） 旋即迁铁骑右厢都指挥使
	殿前散指挥使 都指挥使	（未详）	李汉超 领绵州刺史 （拥护）
	殿前散指挥使 都虞候	罗彦瓌 （拥护）	（未详）
	殿前散都头 都虞候	张廷翰 （拥护）	（未详）
	殿前东西班承旨 都指挥使	崔彦进 （拥护）	（未详）

侍卫亲军司方面：

表3-2　周末宋初侍卫亲军司人事变动对比

官阶与职务		显德六年（959）七月 周恭帝郭宗训即位后	建隆元年（960）正月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
高级统兵官	侍卫亲军马步军 都指挥使	李重进[出镇] 领淮南节度使、兼侍中 （敌对）	韩令坤[不在京] 领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 （发小）
	侍卫亲军马步军 副都指挥使	韩通 领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 （敌对）	石守信 领归德军节度使 （义弟）
	侍卫亲军马步军 都虞候	韩令坤 领镇安军节度使 （发小）	张令铎 领镇安军节度使 （密切）
	侍卫亲军马军 都指挥使	高怀德 领宁江军节度使 （密切）	张光翰 领宁江军节度使 （友好）
	侍卫亲军步军 都指挥使	张令铎 领武信军节度使 （密切）	赵彦徽 领武信军节度使 （义兄）
上军厢级统兵官	龙捷左厢 都指挥使	（未详）	韩重赟 领永州防御使 （义弟）
	龙捷右厢 都指挥使	祁廷义 领岚州防御使 （中立）	刘光义 领江州防御使 （义弟）
	虎捷左厢 都指挥使	张光翰 领嘉州防御使 （友好）	（未详）
	虎捷右厢 都指挥使	赵彦徽 领岳州防御使 （义兄）	（未详）

先对两个名称做个小注解。同中书门下二品，其实就是同平章事。因为慕容延钊的父亲名叫慕容章，为了避讳，官名改称为“同中书门下二品”。赵光义，就是赵匡义，为了避赵匡胤名讳，皇帝“匡”字辈的兄弟都改为“光”字辈。

在两司的九名高级统兵官里，赵匡胤做了皇帝，韩通丢了性命，李重进罢了有名无实的军职，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凭借从龙之功次序升迁。支持兵变的厢级统兵官张光翰、赵彦徽分别升任侍卫马军、步军都指挥使，皇弟赵光义超迁为殿前都虞候。这样，九人组成了全新的禁军最高指挥系统。而除了赵光义，其余八人可谓宋朝开国的八大禁军元勋。

有意思的是，作为两司最高统兵官的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都指挥使韩令坤，此刻仍然领兵屯驻于河北。虽然这是兵变时期以重兵钳制河北藩镇的政策延续，但多少让人联想起那位再也没能回到开封的前任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

两司上四军八位厢级统兵官，除了两位失载外，其余六位也都是我们熟悉的名字：王彦昇、马仁瑀、罗彦瓌、崔彦进、韩重赟和刘光义。以他们为代表的各级殿前系将领几乎全部升迁。

而在兵变前被视为中立派的中级统兵官，则几乎都被调离了两司。祁廷义和马令琮分别被外放做了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和怀州刺史，王廷义和解晖则在军头司做了挂名闲差。

倒是杜汉徽和尹崇珂值得一说。作为非殿前系的将领，杜汉徽不但保住了在侍卫亲军内的军职，而且由龙捷左第四军都虞候升至都指挥使，而且一干就是三年；而赵匡胤的前亲家尹崇珂却外放做了淄州刺史。看来，在对待兵变的问题上，两人的态度与身份并不一致。

从郭威到郭荣，后周皇帝试图通过打造和壮大殿前系，来实现对禁军的掌控，从而摆脱后周皇帝在禁军中没有基本盘的危险处境。至此，殿前系彻底取代了其他班底，成功实现了禁军的“殿前

化”。郭氏父子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

可也正因为成功，他们失败了。

如今，殿前系走出了自己的皇帝。而且，至少在建隆元年这个时间点上，禁军从两司大帅到基层士卒，几乎没有人敢不对皇帝效忠。这是五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赵匡胤和大宋王朝，成为郭氏父子对禁军“殿前化”的最大成果，这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

稳住官心：一朝天子两朝臣

大宋甫一开国，禁军将领们早早成为新王朝的新贵，而前朝旧贵们还在提心吊胆地等待未知的命运。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世人眼中，以赵普、李处耘为代表的归德军幕僚，必然要取代旧时宰辅，入主中书、枢密院。

然而，在二月公布的宰辅名单中，依旧是人们熟悉的老面孔。范质、王溥、魏仁浦依然是宰相，吴廷祚依然做枢密使。范质的正式官职是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宋朝避宣祖赵弘殷讳，改“弘文馆”为“昭文馆”），宰相的级别由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升至侍中。王溥的正式官职是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魏仁浦的正式官职是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两人的官阶都有所提升。吴廷祚则以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比肩使相的枢相。

除了三相一枢，前朝国丈符彦卿，前朝驸马张永德一并加官；吴越、南唐、荆南、湖南等外藩各有恩赐；早就退休的前宰相窦贞固、李穀等人也获得了丰厚赏赐。甚至连当年在复州拒绝收纳赵匡胤的王彦超、在随州欺凌赵匡胤的董遵诲，以及劝周世宗、范质罢免赵匡胤兵权的杨徽之、郑起，赵匡胤也没有去找他们的麻烦。

后周旧臣一律留用，皇亲国戚恩宠照旧，新仇旧怨一概不提。

赵匡胤在向全天下传达一个信号：虽然改朝换代，但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人事调动。

别小看这个信号。当时从朝臣到节帅，抵触新朝者大有人在。当赵匡胤的使者到藩镇宣读改朝换代的诏令时，许多节度使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朝中谁当宰相，谁当枢密使，谁在统军？当听说“皆不改旧”后，他们才肯下拜，至少在形式上承认了大宋对大周的取代。

一朝天子二朝臣，不仅稳住了朝臣的心，更稳住了整个王朝的形势。

不过，范质、王溥和魏仁浦虽然还是宰相，却统统被罢黜了枢密院的职务。宋初沿袭五代旧制，枢密院才是决策中心。赵匡胤这一手，无疑是剥夺了三人的决策权，只让他们安安心心奉命办事。

对此，范质等人当然心知肚明。

依照旧制，宰相与皇帝讨论问题，要看座赐茶。可范质自知和赵匡胤闹得太僵，不敢摆出宰相的谱儿。他上书言事，改用中书门下处理日常事务的札子，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打报告，而且一定要拉上王溥和魏仁浦一起署名，有责任要大家“雨露均沾”。

结果，每次汇报工作，范质都带来海量的中书札子。赵匡胤看都看不完，自然没有时间与他坐而论道。从此，赐茶之礼废止，宰相成了站着汇报工作的“传话筒”。

关于废掉赐茶、撤掉座位的事，这是比较官方的说法，坊间还有另外两说。

一种说法是，上朝时，相关负责人按照旧制，给宰相们准备了座位。结果赵匡胤非常愤怒，大声呵斥，让他们把座位撤掉，史称“叱去之”。

另一种说法更具戏剧性。赵匡胤与宰相们论事时，突然说：“朕眼睛看不清楚，把文书递上来吧。”范质等人便起身上前。这时，早就受赵匡胤吩咐的宦官们趁机撤掉了座位。等范质等人回

来，一看没地方坐了，只好站着说话，从此成了新的规矩。

平心而论，赵匡胤是有五代时期的武夫习气，脾气也不怎么好，但坊间传说的情形，怎么也不符合这位一心笼络周臣的皇帝的心思。此说不足为凭。

相对于中书门下的事无巨细一概上报，枢密院走了另一个极端。独掌枢密院的吴廷祚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理念，继续和稀泥。入宋以来，他的作为并不多，简直成了一个盖章的活戳子。

吴廷祚之所以活得这样“佛系”，是因为他手下突然来了三个下属——给事中、端明殿学士吕余庆，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赵普，以及客省使、枢密院承旨、右卫将军李处耘。

吕余庆，就是前面提及的吕胤，本来余庆是他的表字。因“胤”字须避赵匡胤名讳，因而他改以表字行。吕余庆是幽州安次人，与赵普一样出身于文吏之家，但家族地位要高于幽州蓟县赵氏。吕余庆的爷爷吕兖是横海军节度判官，父亲吕琦官阶已至兵部侍郎。

从后晋开始，吕余庆就一直做藩镇幕僚，这一经历与赵普颇为相似。赵匡胤做匡国军节度使时，因听闻吕余庆能力出众，便奏请朝廷任命他做自己的首任掌书记。此后，吕余庆始终追随赵匡胤，位居随府幕僚之首。

端明殿学士是皇帝和枢密使的高级顾问；枢密直学士在处理枢密院的文件之余，兼为皇帝和枢密使的顾问；枢密院承旨则堪称枢密院的“办公室主任”。枢密院为朝廷决策重地，这三个人来枢密院，显然不是给吴廷祚当跟班的。

除了以上三人，沈义伦、王仁赡、楚昭辅也都把控着一方实权。沈义伦担任的是户部郎中，与后来六部长贰常常作为官阶虚职不同，沈义伦拥有掌管朝廷钱粮的实权。而担任武德使的王仁赡，不仅统领着武德司中护卫禁中的禁军，更在不久后将这一机构打造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特务机构。楚昭辅则为军器库使，顾

名思义，掌管着朝廷的武器装备。

在赵匡胤看来，以吕余庆为首的霸府幕僚资历尚浅，故而官职不高，但朝政大权却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避虚就实，不图虚名，这大大缓解了初建的大宋王朝来自官场上的压力。

稳住民心：三道惠民的诏令

建隆元年（960）二月十六日，赵匡胤迎来了34岁生日（古人按虚岁）。全国子民为自己庆生，这还是第一次，何况这个日子还有了新名字——长春节。相国寺里，群臣赐宴，百官庆贺。赵匡胤身着龙袍，美不自胜。

杜太后却面带忧愁，左右问道："臣闻'母以子贵'，现在您的儿子贵为天子，您怎么还不高兴啊？"

杜太后说："我听说'为君难'，天子位居普天百姓之上，如果治理天下能得其道，这个位子当然尊贵无比，可如果江山不在，那时就是想当个匹夫都不能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中国两千年政治智慧里最具闪光的一面。杜太后之言，与此意不谋而合。

听闻杜太后的话，赵匡胤恭恭敬敬地起身叩拜，郑重其事地说道："谨受教。"

赵匡胤深知，得军心者得权柄，得官心者得朝廷，而只有得民心者，才能真正得天下。

大宋开国第三天，赵匡胤连下了三道诏令。第一道诏令有关劳役。当时沟通黄淮水系的汴河，是开封的生命之河。城中官民的粮食供应主要来自南方，因此朝廷年年都要征发民夫来疏浚汴河。只不过此前的历代王朝，都视其为老百姓的劳役。老百姓来疏浚汴河不仅是"义务劳动"，而且这么多天的路费、伙食费也要自己出。

这种朝廷法令无异于一种变相的掠夺。赵匡胤下令，以后来疏浚汴河的民夫，一概由朝廷提供干粮。若干年后，他干脆将大多数治理河道的工作交给了军队，将普通百姓彻底解放出来。

第二道诏令有关粮价。去年河北粮食丰收，本是好事，但也可能导致谷贱伤农。赵匡胤动用了朝廷这支“看得见的手”，采取宏观调控，以高出市面的价格收购谷物。

第三道诏令有关治安。赵匡胤发动兵变，入驻开封。有些地痞土匪以为又要天下大乱了，于是乘机打家劫舍。但赵匡胤的军队对官民秋毫无犯，号称“市不改肆”，故而一下子就暴露了他们的罪行。在新政权的干预下，数日之间，多名罪犯被绳之以法，斩首于市。紧接着，赵匡胤下令打开国库，用朝廷的钱来补偿那些受害者。

三道诏令下去，朝野欢呼雀跃。可是进宫朝见的潘美却发现，赵匡胤并不高兴。

赵匡胤对潘美说：“前朝的时候，老百姓欠了朝廷不少租税。早晨三司的人来了，求我开恩，把这些欠账一笔勾销。我又问了问二府的意思，二府却说应该督促地方官吏把欠税收回来。”

三司，是大宋的财政部门；二府，指的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

眼下除了河北，很多地方正在闹灾荒，老百姓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还还什么欠租？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8岁那年，李从珂搜刮洛阳，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那惨境，突然又浮现在赵匡胤的眼前。

赵官家越想脸色就越阴沉，突然恨恨地道：“这三司是管财政的，都知道跑来求朕蠲免欠税；二府是主持德政的，反倒要朕去督索！近臣们都是如此这般，天下还怎么太平得了！”

听了这话，潘美已经明白，赵匡胤心里早就有了决断。从禁止夯市，到优待逊帝，再到如今要蠲免欠税，看来天下太平有盼头了。

潘美深深一拜，由衷地称赞道：“陛下用心如此，天下如何会不太平！”

开国后的第十一天，到各州去赈灾的官员就从开封府出发了。饱受蹂躏的老百姓终于可以暂时松口气了！

可惜总有人不开眼。

四月的一天晚上，宰相王溥的府门突然被敲响，打开一看，是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王彦昇。相府上下异常紧张，这个王彦昇现在接替韩通，负责京城治安。他大半夜来府上作甚？

王彦昇只是说讨酒喝："今晚巡逻，实在太困了，索性来找相公讨杯酒喝。"

树大招风，钱多招贼。王溥明白，王彦昇想要钱，但他决定装傻，只是静陪王彦昇喝酒。

王彦昇自讨没趣，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要，只好怏怏而归。第二天，王溥便将此事密告赵匡胤，赵匡胤勃然大怒：王彦昇你是管京城治安的，你都带头打家劫舍，这京城还安定得了吗！今天你去找宰相勒索，明天你手下那帮兵就敢把老百姓的家搬空！更何况王溥何许人也，是朕要笼络的前朝重臣，你王彦昇是耳朵聋了还是眼睛瞎了，敢去找王溥要钱！赵匡胤越想越气，把王彦昇找来臭骂一顿，然后打发他到唐州做团练使去了。

二、逼反二李，藩镇称臣

符彦卿上表称臣

通过一系列的恩威并施，赵匡胤总算安稳地控制了京师的局面。为了向京城的臣民宣示统治权，登基不久，赵匡胤便乘驾出宫，巡视开封。

皇帝出巡，本来有一套极为烦琐的礼仪制度。可是经过五代乱世，这些礼制早已不备，皇帝卤簿（仪仗队）非常简略。

在卤簿的最前面，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便是赵匡胤乘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打着伞扇的导从。紧随其后的是，由百余名亲事官组成的“禁卫”。亲事官是宋朝建立后新选拔组建的军队，最受赵匡胤信任。

百官公卿紧跟在禁卫后面，虽然是跟随皇帝出巡，可他们却拿不出半点精气神，一路上松松垮垮，倒像是出来逛大街的，以至于连打杂的差役都与这些大官们混杂在一起，穿行而过。在队伍最后，还跟着殿前诸班的精锐骑兵，只是因为中间隔着官员和禁卫，他们距离皇帝的步辇实在太远了。

皇帝出巡，自然少不了看热闹的士庶。一些围观者不仅跟着卤簿走了一路，甚至还时不时穿行在队伍之中，喧闹不止。卤簿所过之处，民不封门，商不禁市。亭台楼阁上也挤满了看客，把皇帝的队伍看了个真真切切。只是这些窗户上往往都悬挂着窗帘，倒是皇帝和禁卫们，看不清窗帘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如此混乱的局面，负责维持街道秩序的官员也不去管管。

80年后，宋仁宗的副宰相宋庠对于这样没有威严的卤簿颇为不满。一方面，他认为这样的礼仪不能体现皇帝唯我独尊的威严，把皇帝的身份等同于节度使；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严重的安保漏洞。

其实，沿袭自五代的宋初卤簿之所以如此简略，自有它的历史原因。武人出身的藩镇节帅大多来自行伍之间，与士卒同甘共苦。如果他们过于讲排场，就会大失军心。比如唐后期的幽州镇，甚至因此而发生过节帅被军队驱逐的事件。五代皇帝有不少做过藩镇节帅，在某种程度上依旧继承了这一传统。这与赵匡胤的出生神话一样，都折射出五代宋初平民化社会的特点。

但凡事有利必有弊。皇帝礼仪的简化，也暴露出安保漏洞，这

确实给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

就在赵匡胤的步辇通过御街，跨过大溪桥时，一支利箭突然飞来，正中赵匡胤身后的黄伞。禁卫们在惊骇中迅速抽出白刃，将皇帝团团围住，严阵以待。倒是赵匡胤颇为镇静，他不屑地一笑，随即解开衣服，指着胸口，朝着箭来的方向笑道："让他射，让他射！"

回到宫中，左右密启抓捕刺客，却被赵匡胤拒绝了。禁军两司的武将都是自己人，不可能派人行刺；朝中的文臣就算对宋朝有抵触情绪，谅他们也没这个胆子。因此能在开封行刺皇帝的刺客，十有八九是藩镇派来的。不要说开封这么大，一个小小的刺客早就跑得没影了，就算真的抓住了刺客，知道了主使者是谁，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公布谋反罪状，跟藩镇真刀真枪干一仗吗？赵匡胤不怕打仗，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大宋开国之初，藩镇的形势实在不容乐观。

成德军节度使郭崇因感念周室恩遇，时常落泪。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以术惑众，带甲一方。保义军节度使袁彦心怀怨气，日夜缮甲治兵。忠正军节度使杨承信据说正在谋反。武宁军节度使郭从义似乎也有怨言。建雄军节度使杨廷璋是周太祖郭威的小舅子，有极大的叛乱可能。昭义军节度使李筠甚至一度打算公开拒绝承认宋朝。而赵匡胤的老对头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更是让人放不下心。

这些藩镇正好在开封外围了一个圈，如果联合起来造反，赵匡胤都不知道该发兵先去讨平哪一镇。

而最让他揪心的，还是天雄军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魏王符彦卿。

正月二十三日，正当赵匡胤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节帅们的态度时，突然收到符彦卿的表章。符彦卿以臣僚的身份请求，取消诏书中对自己不呼姓名的礼遇。

作为大、小两位符皇后的父亲，符彦卿在后周享有各种礼仪上

的特权，诏书不呼姓名就是其中之一。如今符彦卿上表请求取消这项礼遇，无异于与自己在前朝的身份划清界限。他虽然还是新朝皇弟赵光义的岳父，但毕竟不再是皇帝的岳父。

符彦卿在用实际行动，向赵匡胤上表称臣。这让赵匡胤悬在嗓子眼儿的心暂时又咽了回去。

符彦卿的向背，决定着大宋是否开局即进入死亡模式。

这不仅仅是因为天雄军的地理位置直接关乎开封朝廷的生死，更因为天雄军的地缘特征及符彦卿的影响力。

倘若符彦卿以周室外戚的身份起兵讨伐赵匡胤，天雄军就会与北面接壤的成德军郭崇、义武军孙行友连成一片，与隔太行山而望的昭义军李筠成掎角之势。李筠又可以与保义军袁彦、建雄军杨廷璋连成一片，东南一带的淮南镇李重进、忠正军杨承信、武宁军郭从义亦可以连成一片。到那时，北有周世宗的岳父、周逊帝的姥爷符彦卿，西有周太祖的小舅子杨廷璋，东南有周太祖的外甥李重进，天下藩镇可以以讨逆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共同起兵推翻宋朝，尽管他们没有一个是真心想要匡复周室的。

而如今，符彦卿选择上表称臣，便与安国军节度使李继勋，以及驻军关南的韩令坤、驻军镇州的慕容延钊一起，南北钳制住了郭崇和孙行友，使他们不敢轻易造次。稳住了河北，赵匡胤就能够更加从容地拉拢藩镇，实在拉不过来，也可以背靠河北，对反叛者各个击破。

但符彦卿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藩镇绝不会主动效忠宋室，赵匡胤必须要拿个办法出来。

正当此时，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李重进请求入朝。

什么？李重进要入朝？

有天命者，我不汝禁也！

没错，天下藩镇，第一个申请入朝的，居然是赵匡胤当年的头号政敌李重进。

李重进已被罢落军职，连最后一点点名义上的禁军军权也被收缴了。虽然使相头衔从侍中升到了中书令，但这次与实权毫不沾边的升迁，只能算是新王朝对他的一点敬重和补偿。

在昔日禁军九大高级统兵官中，除了做了皇帝的赵匡胤和已经死去的韩通，被罢黜军职的就只有李重进，这让李重进十分焦虑。为了进一步搞清赵匡胤对自己的态度，李重进这才申请入朝。

节度使上表入朝，这是藩镇对新皇帝最高形式的认可，通常都会获得皇帝的批准。五代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皇帝与藩镇在彼此极度缺乏信任时，会用“入朝”和“移镇”来试探彼此的态度。如果赵匡胤同意让李重进入朝，就说明他接受了李重进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效忠，李重进暂时就不会有危险。可如果赵匡胤拒绝李重进入朝，甚至是将李重进迁移到其他藩镇，那么李重进就很可能沦为待宰的羔羊，这无异于让李重进在缴械与造反之间做抉择。

李重进当然希望自己平安无事，可等来的，却是赵匡胤无情的拒绝。

赵匡胤并非不知道其中的玄妙，只是他实在没想好，该如何面对李重进。毕竟以两人的关系，以君臣之礼相见实在太尴尬了。而且，完全殿前化的禁军两司，根本不会再让李重进担任任何军职，总不能让他也去军头司挂个闲职。何况，跟张永德、赵匡胤明争暗斗这么多年的李重进，真能踏踏实实做一辈子大宋的臣子？

朕才不信！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见。

“君为元首，臣作股肱，虽在远方，还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契永图，修朝觐之仪，何须此日。”一份由翰林学士李昉起草的诏书，送到了淮南节度使府上。如今的李昉已经服了软，成为赵匡胤的笔杆子。

李昉的诏书写得很有意思。前边说，皇帝是脑袋，大臣是胳膊腿，咱们都是一个身子上的，话说得很亲近。可后面一句就绵里藏针了：你想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就老老实实做你的臣子，用不着搞形式主义，急着进京朝见。

接到诏书，李重进目光黯然：别做梦了，郭荣尚不容你，何况赵匡胤！

李重进的事暂时压了下来，但是想到那些令人不安的节度使，赵匡胤就如坐针毡。自从大溪桥遇刺后，赵匡胤非但没有躲进皇宫不出来，反而更为频繁地微服出宫，暗中观察京中的反对力量。

皇帝身边的人急忙劝谏道：“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如今数次轻装出宫，万一发生意料之外的变故，岂不是悔之晚矣？”

可赵匡胤只是报之以大笑，他说道：“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没这命的人硬求也求不到，有这命的人想拒绝也拒绝不了。周世宗当年见了方面大耳的大将就杀，可是我在世宗皇帝身边侍奉多年，还不是好好的？我若是真命天子，谁害得了？如果不是，就算我把大门一关深居简出又有何益？”

“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不汝禁也！”

你们谁要是有天命，大可以去称皇帝，我赵匡胤绝不拦着！可是真命天子，只有我赵匡胤一个！

史书记载，自此中外慑服，人心大安。这实在是宋代史官为了证明天命在宋，强加上的一条自娱自乐的评语。

那些靠着兵强马壮就敢称王称帝的节度使，谁会怕你赵匡胤的所谓天命？

赵匡胤心里当然也清楚，这个牛吹给那些讲道理的文臣，估计

还管点用；而对于那些舞刀弄枪的节度使，就得另想办法了。

五代时期，随着朝廷对藩镇控制力的加强，在各地都派有兵马都监。作为节度使的下级，兵马都监要协助节度使统率、训练屯驻在本镇内的禁军。

但作为朝廷的代表，兵马都监有独立的奏事权。药继能、陈思诲、潘美、周光逊便分别以兵马都监的身份，监视着孙行友、郭崇、袁彦、李筠等节度使的一举一动。得益于他们的汇报，赵匡胤随时掌握着各大节帅的态度变化，从而为他对藩镇分而治之提供了决策基础。

比如义武军辖境内出现了神秘的佛教领袖，民众趋之若鹜，节帅孙行友怕他们闹事，尚且自顾不暇，完全没时间与大宋朝廷对抗。

成德军节度使郭崇尽管整日以泪洗面，但除了感念郭威，也没有什么出格举动。何况镇州周围还有韩令坤、慕容延钊、李继勋、符彦卿的重兵屯驻。所以，当陈思诲密奏，说“镇州与契丹相邻，郭崇有异心，应该谨慎防备他”时，赵匡胤胸有成竹地说：“我素知郭崇义薄云天，他不过是有感而发而已。”

保义军节度使袁彦对赵匡胤且恨且怨。作为周世宗昔日的潜邸幕僚，袁彦本来就没有对赵匡胤高看一眼。何况，他好好的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赵匡胤说罢就罢。如今，赵匡胤做了皇帝，自己却在这里受气。袁彦越想越愤懑，于是日夜招兵买马，俨然就要打响反宋的第一炮。赵匡胤派潘美去做兵马都监，让他在适当的时机除掉袁彦。潘美却单骑入城，对袁彦晓以利害。在潘美的规劝下，袁彦的态度有所缓和，看来一时半会也反不起来。

可并不是所有的兵马都监都能传回好消息，派驻在潞州的周光逊，就为赵匡胤传回一个大新闻。

逼反李筠

潞州，号称天下之脊，俯瞰中州，肘臂河东，早在战国时代，就以“上党”之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驻守潞州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原名李荣，太原人，唐明宗时加入军队，能轻松拉动百斤大弓，弹无虚发。虽然读过一点书，但李筠仍是一个典型的五代武夫，他狂妄自大，粗暴蛮横，刚愎自用。

当然，李筠也有狂妄的资本。自当兵起，他先跟着秦王李从荣反唐明宗，后反契丹人，再跟着郭威反刘承祐，一路反下来。直到郭威建立大周，将潞州交给他，才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郭威对李筠有知遇之恩，李筠报之以死力。镇守潞州期间，李筠几乎以一军之力，扛北汉举国之兵，成为后周西北不可逾越的屏障。可郭威一死，他仗着军功，飞扬跋扈，目中无人，连周世宗郭荣也入不了他的法眼。李筠在潞州擅征赋税，招纳亡命，郭荣虽然不满，但无暇顾及，只能下诏谴责而已，这更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

所以，李筠接到赵匡胤加封自己兼中书令的诏命时，内心的不平可想而知。

李筠最初并不想承认周宋禅代，亏身边将吏好说歹说，他才勉强下跪，算是认了大宋皇帝。

紧接着，李筠按照惯例，宴请朝廷使臣。可在宴席上，李筠却挂起了郭威的画像，还对着画像号啕大哭。满堂将吏，目瞪口呆。幸好还有反应快的，急忙跟使者说：“令公（对中书令的尊称）喝高了，举止失常，请您多多包涵。”

李筠有心造反，却不敢贸然起兵。他也知道出头鸟不好做。

和李筠比起来，北汉皇帝刘钧就痛快多了。刘旻在高平战败后不久便一命呜呼。他的次子刘钧继承皇位，也接过了北汉的烂摊子。刘钧颇有几分眼光，知道要维持这个烂摊子，只能以攻为守。于是，很自然地，后周与北汉的“血海深仇”，也被传承下来。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当李筠痛哭的消息传入太原后，刘钧决定，和这位怀念杀兄仇人（郭威杀刘赟）的李筠做个朋友。

几天后，赵匡胤收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刘钧，收信人是李筠，信的内容是刘钧劝李筠造反，而把刘钧的信交给赵匡胤的，居然是李筠本人。

李筠也学起李重进，表忠心来了？李筠交出密信，别说表忠心，连试探都称不上。他只是没有做好造反的准备，需要拖延时间，所以面子上的事总要做做。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李筠在要挟赵匡胤。我李筠是边镇大藩，内有太行、黄河之险，外有北汉刘钧之援。现在北汉正在拉拢我，你这个什么宋皇帝最好识相，否则……

的确，李筠有可能倒向宋，也可能倒向汉。他投靠北汉，赵匡胤与李筠、刘钧难免一战，可是他投靠大宋，大宋就会太平吗？

不会。因为让李筠承认大宋，就要姑息藩镇，承认其半独立地位。过去朝廷羸弱，为维持运转，这也不失为一种临时性策略，但后遗症也是非常顽固的，那便是藩镇一言不合便造反。

总之，横竖都要造反。

赵匡胤当然不会继续姑息李筠，他见招拆招：李筠公忠体国，不为伪邦所动摇，此乃藩臣典范、节帅表率，理应褒奖，就让李筠的儿子李守节入朝来当皇城使吧。

明眼人都知道李守节是来做人质的。李筠决定将计就计，派李守节去开封打探消息。

可怜李守节，他一再劝李筠不要造反，结果反而里外不是人。

赵匡胤亲自迎接李守节的到来，并开门见山地问道：“太子，

你怎么来了？”

李守节是太子，那李筠是什么？李守节吓得腿都软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脑袋磕得“咚咚”作响，涕泗横流地说：“陛下何出此言！这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离间！”

赵匡胤笑了笑，扶起李守节，说：“我也听说了，你都劝了好几次，可恨那老贼根本就不听你的，而且对你心怀怨愤。他现在让你来，是想借我的手杀了你，可我为什么要杀你？回去跟你爹说，我没当天子时，随他折腾。我既然当了天子，他就不能让着我点儿？”

这话说得多温馨啊！简直就像两个老朋友在唠家长里短。可李守节听了却一点也不温馨，此话戳中了他的软肋。没错，赵匡胤的话有一部分是说给李守节的，用以分化他们父子。至于另一部分，他是说给天下藩镇的。你们看，李筠都要反了，朕还在包容他。大家各退一步，有话好好说。如果你们再不识好歹，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但归根结底，赵匡胤让李守节回潞州传话，是要让李筠听的。

朝廷已经准备就绪，就等李筠竖起叛旗了。既然李筠造反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赵匡胤乐得往火里再添把柴，好让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早点造反。毕竟，李筠准备得越充分，后面平叛就越难。

而李筠就这样中了赵匡胤的激将法。

赵匡胤，你别以为放我儿子回来，我就会感激你！很好，守节回来了，我也不用投鼠忌器了！

跟着别人造了一辈子反的李筠，终于下定决心：我李筠，自己反了！

稳住李重进

赵匡胤所料不错，李筠之所以一直没反，确是因为准备不足。他仓促间被逼反，却尚缺30万贯钱和30万石粮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用常规手段根本救不了急。于是，李筠动了歪心眼。

李筠恰好听说，有个和尚素为人们信服。他便把和尚秘密找来，告诉他："现在军中粮饷不足，我想借着大师的名气来募集粮饷。我为大师您做个道场，您来发个愿，就说募捐到60万钱粮后，愿坐到柴堆里自焚升天。我预先在柴堆下挖个地道，火一着起来，您就从地道里逃出来。这60万钱粮，暂时先存放在我的仓库里，事成之后咱们五五分成，一人一半。您看如何？"和尚一听，天上掉下30万，那我以后还做什么和尚啊！当即应允。

募捐当天，李筠倾家荡产，前来捐赠。老百姓不知是计，还以为他带头行善，于是也来捐纳钱粮。仅仅10天，30万贯钱和30万石粮就已充足，连仓库都装不下了。

于是和尚履行诺言，举火自焚，然后借着火光钻进地道。可他却再也没能出来，因为李筠把通往府中的地道出口封死了！

建隆元年（960）四月十四日，距离大宋开国仅98天，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成为第一个造反的实力派。

李筠起兵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幕僚搜集赵匡胤的种种丑闻，写成檄书，昭告天下。看看吧，你们的皇帝忘恩负义，卑鄙无耻，大家快随我杀入东京，匡复大周！

李筠可能以为，檄文一出，全国云集响应。然而，大概是幕僚没有陈琳、骆宾王的文笔，檄文虽发，响应者却寥寥无几。李筠有点傻眼了。郭崇，你不是天天哭吗？袁彦，你不是厉兵秣马吗？我反了，你们倒是跟进啊！见公开煽动不行，李筠又改用私下策反。

他派人去周围的藩镇游说，结果响应者无几。

直到这时，李筠才发现自己被全天下的藩镇当枪使了。如果自己不能打败宋军，这群老滑头不可能跟进。开弓没有回头箭，孤掌难鸣的李筠想起了刘钧。他赶紧绑了大宋派驻潞州的兵马都监周光逊，送到北汉，请求支援。刘钧赐来诏书、金帛和善马，表示愿做李筠的后盾。

李筠的胆子越发壮了，立刻发兵南下，攻占泽州，杀刺史张福。这时，幕僚闾丘仲卿前来进策："令公孤军举事，形势非常危险。即便有北汉为援，恐怕也靠不住。开封城里兵甲精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二州，塞虎牢关，据守洛阳，东向而争天下，这是上上策！"

宋军精锐，如果打战略决战，我军现在根本不是对手。不如迅速南下，在洛阳建立根据地，与宋军形成对峙之势。因为一旦取了势，李筠也就有了争取郭崇、袁彦等大藩的资本。赵匡胤能不能坐稳龙椅，就真不好说了。

但李筠却说："我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兄弟，禁卫都是我的旧人，必将倒戈来降。何况我有儋珪枪、拨汗马，平定天下有何堪忧！"

禁卫宿将、敌人倒戈，当年后汉的李守贞不也曾如此痴人说梦吗？结果还不是被郭威釜底抽薪？

儋珪枪，说的是李筠的爱将儋珪，有勇力，善用枪；拨汗马，是李筠的坐骑，日行七百里。在赵匡胤设法笼络人心时，李筠的脑子里还只有儋珪枪、拨汗马。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李筠在潞州大话连篇，赵匡胤却在广德殿大宴群臣。他能够在此安心吃饭，是因为听了枢密使吴廷祚的进言，命石守信、高怀德火速行军，扼守太行关隘，勿纵李筠南下。

听人劝，吃饱饭，赵匡胤这顿饭吃得很饱。酒足饭饱后，他开始全面部署防御措施。

首先，命户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边光范为前军转运使，负责粮草的调度和运输。又听从宰相范质建议，让怀州刺史马令琮继续留任，负责粮草供应。宋朝开国不久，马令琮便被从禁军调任怀州刺史。他与三司使张美都料到李筠必反，因而在怀州、孟州之间囤积了大量粮草，以待王师征讨之用。

随后，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润赴澶州巡检，稳定河北，防范契丹南下；又遣慕容延钊与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全斌率兵，由东路与石守信、高怀德会合；再升洺州团练使郭进为防御使兼西山巡检，防备北汉从河东出太行山攻击河北。

细心的人已经发现，无论是后周旧臣还是霸府故吏，大宋开国以来，他们第一次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

通过军事事件来实现政治目的，这是赵匡胤从周世宗那里学来的。

李筠帮助赵匡胤把满朝文武打造成铁板一块，自己却与北汉貌合神离。北汉皇帝刘钧应邀，亲自率军，倾国南下。高平一役，北汉精锐减损大半，因此，刘钧想让契丹出军援助，但李筠却坚决反对辽军入境。从这个角度上讲，李筠还是晓大义的。

刘钧带着自己的老弱病残，到太平驿与李筠相见，并封李筠为西平王，位在宰相卫融之上，还给了不少赏赐。可是李筠嫌弃刘钧兵力寡弱，于是又端起了大周故臣的架子，说什么“受周氏恩，不忍负之”。

刘钧闻言，脸色立刻沉了下来。然而大敌当前，刘钧只能保持冷静与包容。不过，北汉是君、李筠是臣，这一点必须确定。于是，刘钧派宣徽使卢赞到李筠那里做监军。结果李筠和卢赞闹得不可开交。刘钧只好让宰相卫融去李筠军中息事宁人。

李筠留李守节驻守潞州，信誓旦旦亲率3万大军南下，号称要直捣开封。然而在往返太平驿之际，石守信的急行军已经进入昭义军的地盘。结果，就在当年刘旻败北的地方，李筠被石守信迎头痛

击，损失3000多人。宋军首战告捷，赵匡胤立即下诏削夺李筠的一切官爵。李筠的退路彻底断了。

五月十七日，赵匡胤又在广政殿大宴群臣，这次宴会的主题是：褒奖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杨承信来朝。

与此同时，建雄军节度使杨廷璋也上书表忠。杨廷璋是郭威的小舅子，李筠造反，第一个便想拉他入伙。没想到，杨廷璋不但把李筠的使臣送到了开封，还另上一书，大谈破敌之策。

二杨相继表态，赵匡胤心中更添底气。然而，远在扬州的李重进却非常不踏实。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想入朝却吃了闭门羹，而杨承信却能吃上国宴？其实理由很简单——时机不同。李筠叛乱，赵匡胤最怕其他藩镇跟着造反。杨承信与杨廷璋这时上表，无疑是雪中送炭；李重进呢，以他的身份在开国之初请求入朝，在赵匡胤看来纯属添乱。

如果李重进在这时再次上表入朝，赵匡胤无论愿意与否，都只好答应。可惜心中不满的李重进早已对赵匡胤失去信任与耐心，他竟派出亲吏翟守珣，前往潞州与李筠结盟。如果真要造反，这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尝试，至少好于坐以待毙。

可没承想，翟守珣没有去潞州，而是进了开封府，将李重进的计划和盘托出。赵匡胤惊出一身冷汗。二李联叛，南北夹击，那就更难对付了。万一郭崇、袁彦、孙行友、郭从义等人也趁火打劫，大势去矣！

赵匡胤试图稳住李重进，他问翟守珣："我想赐重进铁券，他能信任我吗？"翟守珣回答："重进终无归顺之志矣。"翟守珣之言是真是假，已无法验证，但这样的回答正中赵匡胤的下怀，他命翟守珣返回扬州，想方设法拖住李重进。

据说翟守珣和赵匡胤是旧识，这次他到了开封，先是找到李处耘，再通过李处耘见到赵匡胤。有人说，他是李处耘甚至赵匡胤布在李重进身边的眼线；有人说，他是看懂了天下大势，不愿逆势

而为的智者；也有人说，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惜出卖上司的小人。

无论翟守珣是眼线、智者还是小人，李重进都没有发现丝毫异样，甚至听取翟守珣“养威持重，未可轻发”的建议，按兵不发，准备看着李筠和赵匡胤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

在叛降逆顺之间反复不定，黑大王的前途，越发黑暗了。

五月十九日，在稳住李重进后，赵匡胤正式宣布，御驾亲征。他以吴廷祚和端明殿学士、知开封府吕余庆为正副东京留守，主持政务；以赵光义为大内都点检，负责开封城防；又命韩令坤率兵先发开道。

留守京城的，本来还有赵普。可赵普不甘寂寞，急于立军功。于是，赵普决定，亲登皇弟赵光义的府门。

提到赵普，赵光义又敬又怕。这些年来，赵普为赵匡胤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当年，赵普对赵弘殷更有侍药之情。杜氏对赵普也颇为欣赏，就没拿他当外人，甚至将两个爱子托付给他。赵普曾任掌书记，杜氏便叫他赵书记，每次见了他，都免不了一番嘱咐：“我儿子阅历尚浅，还请赵书记多多费心。”至于赵光义，杜老夫人更是直接要求，出门必须与赵书记一起，而且还要在赵书记的监督下，按时回来。

赵普比赵光义大了近20岁，所以他与赵匡胤虽有君臣之分，却拿赵光义当孩子看，加之与赵家关系密切，又得杜老夫人重托，在赵光义面前，赵普免不了一副好为师长、严厉刻板的姿态。而在赵光义眼里，赵普自然也是一位严苛的长辈。

出乎赵光义预料，今天的赵普格外平易近人。简短的寒暄过后，赵普步入正题：“我托身于藩镇之间，已经整整十五年了。好在我遇见了官家，跟着他变家为国，创立基业。现在反贼势头正盛，天子遭遇罹难，正是大臣效命之时。所以，赵普这份忠心，还请代为启奏，普愿到军前效力。”

受宠若惊的赵光义，立即进宫去找他的皇帝二哥。赵匡胤一眼就看出赵普急于立功的心态，便嘲笑道："赵普一介书生，甲胄那么沉，他穿着受得了吗？"但前线吃紧，李筠又是宿将，此战胜负，实在难料。他又看了看身旁的赵光义，脸庞尚显稚嫩，但眉宇间透着一股昂扬与机灵劲儿，真是我赵家的好孩子！赵匡胤拍拍赵光义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这次出征，我打赢则罢，万一不利，就让赵普分兵驻守河阳，再与李筠一争高下！"

二十一日，赵匡胤正式出征。开封有流言传出："你们还记得吗？'点检作天子'诶！这是又要出一个天子吗？"直到这时，大内都点检赵光义才明白皇兄的话。"万一不利"，能有什么不利？为什么要跟我交代"不利"后的安排？除非……除非二哥战死沙场，然后让赵普辅佐我继承皇位！自古以来，为夺皇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比比皆是。可是二哥不但信任我，更把后事托付给我……二哥，我不要江山，我只要你平平安安回来！

张永德入朝

尽管赵匡胤在周世宗手下战功赫赫，可几乎都是作为先锋，打得也都是小规模战斗。如此大规模的战役，赵匡胤还是第一次亲自指挥。这也就难怪，他在赵光义面前显得并无必胜把握。

赵匡胤显然高估了他的对手。由于丧失战机，李筠被石守信堵在泽州，动弹不得；河北、陕西、京西（今河南西部一带）诸道的宋军也已从四面八方赶来。西京留守向拱（就是向训，后周末年避周恭帝郭宗训讳改名向拱）正建议赵匡胤迅速渡河，翻过太行山，趁着李筠大军没有集结时出兵灭掉他。赵普也说："反贼李筠认为我大宋刚刚开国，不会发兵讨伐他。陛下如果背道而行，打他个措手不及，可以一战而克！"

赵匡胤听从二人的建议，火速进军，于六月一日到达泽州，亲自督战攻城。十三日，泽州城破，李筠自焚而死。十九日，李守节举潞州而降；刘钧率汉军北撤。至此，为时两个多月，搞得天下汹汹的李筠之乱，以大宋天子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赵匡胤以胜利者的身份，对失败者展示了宽宏大量的气度。李守节因屡次劝父归顺，被擢升为单州团练使，是为接纳叛降；北汉宰相卫融宁死不屈，被授以太府卿，是为表彰忠义；前朝宰相李穀曾收受李筠贿赂，中书舍人赵逢半路装病，赵匡胤也假装不知，是为安定人心。

但此刻，赵匡胤最重视的不是这些官员，而是惊慌失措的潞州百姓——他们害怕自己遭到屠城的报复。赵匡胤不但没有惩罚叛城，反而免除潞州附近一年田租，作为对老百姓的补偿。然后调义兄安国军节度使李继勋坐镇昭义军，自己率大军凯旋东京。

平定李筠，宋朝军威大震，对藩镇的威慑立竿见影：心怀怨愤的郭崇、袁彦乖乖随宋廷的使者入朝，雪中送炭的杨承信、杨廷璋奉旨徙镇。大棒加胡萝卜，雄藩大镇们终于默许了新政权的合法性。

然而，还少一个人。

八月仲秋，凉意渐浓。滚滚麦浪已然退去，徒留赤裸的黄土，一望无垠。玉津园割麦的场景蔚为壮观，可惜，如今只留下一片光秃秃的田野。

忠武军节度使、兼侍中张永德站在皇帝身后，一言不发。赵匡胤本以为他会是第一个入朝的节帅，却没想到他竟姗姗来迟。

自从赵匡胤做上殿前都点检，有关他用木条把张永德搞下去的流言就从未间断，这多少让此前无话不谈的两人心生芥蒂。一年多来，赵匡胤与张永德第一次相见，场面竟有些尴尬。

赵匡胤正愁如何打破寂静，却发现张永德腰间不大顺眼。张永德有一条通天犀带，以犀角为饰，那犀角纹理有如鱼子，黄中带黑

花，弥足珍贵，只有获皇帝特旨的人才能佩戴。朝见天子这么隆重的事，张永德却只用了一条普通的金带。

赵匡胤有些茫然，问道："驸马，你的通天犀带呢？"

"驸马"二字，让张永德心生温暖。他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在后周时加官驸马都尉。当年作为下属的赵匡胤，最爱称他为"驸马"。没想到，下属如今做了皇帝，自己也早就不是什么驸马，皇帝对自己却仍用旧时称呼。

张永德微微欠身，面露苦色："当年征淮南时，用了二十万贯官钱，臣后来拿通天犀带还钱了。"

什么？赵匡胤一惊，出手阔绰的张永德，怎么穷到靠典当还钱了？且不说他当年一直提携自己，仅为赵氏兄弟俩娶媳妇儿，他往里砸了多少钱？而且他在淮南挪用官钱，多半也是为了打赏士兵。谁都知道，张永德在征淮南时，曾将自己的金腰带赏给了作战勇猛的战士。

"还欠多少没还？"赵匡胤关切地问道。

"五万贯。"

"不用还了，我再另送你二十万贯。"苟富贵，无相忘。驸马，你的大恩大德，我赵匡胤一刻也未忘。

王著哭世宗

随着一阵清脆的鞭声，万春殿内外一片肃静。赵匡胤戴幞头，服绛袍，系排方玉带，从后阁缓缓入殿，身临御座。文武近臣屈身小步，在礼官接引下，从东西两侧走进殿庭，横行北向立定。

这时，首相范质双手执笏，出列于前，率领群臣，躬身奏道："圣躬万福。"赵匡胤稍稍点头，示意文武近臣分东西两班，各自就坐。

这是大宋开国以来，赵匡胤主办的第九次国宴。先前的宴会要么是按制必办的，要么是节帅来朝临时应酬。这次不同，此宴称为“曲宴”，完全是皇帝根据自己的心情临时安排的，所以规模较小，规矩也简单了许多。

除掉李筠，群臣同体，藩镇来朝，确实值得庆祝。

赵光义以皇弟之尊，居坐西班，他以殿前都虞候兼领泰宁军，是大宋境内最年轻的节度使。赵普的班位则明显提前了，他因从征之功，如愿以偿升迁兵部侍郎、充枢密副使，以枢密院二把手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处理起军国大事来。韩令坤与远在河北的慕容延钊进位兼侍中；好兄弟石守信加同平章事，成为新的使相。心腹大将高怀德还不适应“驸马”的新称呼，他现在是皇帝的妹夫，娶了那位著名的“擀面杖姑娘”——昔日的赵家小妹，今日的燕国长公主。皇帝之妻王氏，也已贵为大宋国母，凤临百雀，母仪天下。

酒过数巡，月上柳梢头。赵匡胤正准备散宴，东班里却传来孤鸿哀鸣。翰林学士王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靠在一根柱子上，喃喃自语，不知所云。

“他醉了，快扶他下殿休息。”赵匡胤温和地说道。

左右赶到王著身边，却被王著一把甩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借着酒劲，迈着八仙步，一下扑倒在玉阶侧的屏风旁，泣下沾襟，号动天地，其凄其哀，如丧考妣。武将们攥紧拳头，准备把这个捣乱的家伙暴揍一顿，却被赵匡胤用目光阻止。文臣们连拖带拾，总算在皇帝发怒之前，把烂醉如泥的王著拽出了万春殿。

第二天，有人幸灾乐祸地跑到赵匡胤面前告状：“王著昨天逼近宫门号啕不止，说他想念世宗……”

听闻此言，在场的人脸色都吓得煞白。公然思念前朝故主，在哪朝都是大忌，何况还在皇帝的宴席上大闹了一场。近几十年来的皇帝，都是好杀的主儿。王著危矣！

可赵匡胤却显得很平静，他漫不经心地说：“不用管他。他就是个酒鬼，在世宗幕府时朕就知道。何况一介书生，即使哭哭世宗，又能搞出什么名堂？”

是啊，王著什么名堂都搞不出来了。但倘若周世宗能够早一天下达敕命，王著当上了宰相，现在搞不出名堂的，恐怕就是赵官家了。

众人皆醉，王著独醒，这让赵匡胤不得不重估形势。目前庆功似乎为时过早。消灭李筠，不过是在军事上消灭了后周的肉体。而军事压力下的临时团结，也会随李筠的灭亡而松弛。王著是后周的精神脊梁，在这个节骨眼哭世宗，足以在松弛的人心上再掺把沙子。

可赵匡胤目前还不打算惩戒王著，同样因为王著是后周的精神脊梁。五代以来，最乏气节，王著的气节，自在冯道之上，即便是范质，恐怕此刻也羞愧难当。王著就像一颗忠义火种，让赵匡胤看到臣僚效忠赵氏江山的可能。

不过，在完全控制这颗火种之前，赵匡胤可不想引火烧身。此刻，必须切断拥周派内外相交、文武勾结的可能。王著可以留下，但有一个人，必须解决。

前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

英雄是英雄的坟墓

李重进站在淮南节度使府衙的正堂，手捧皇帝所赐铁券，拇指摩挲着铁券上每一个赤红的楔字，琢磨着凹凸间蕴含的深意。六宅使陈思诲坐在一旁，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和表情，这更令李重进彷徨失措，难下决断。

九月十一日，赵匡胤令李重进移镇平卢军。徙镇可能只是正常

的军事调动，也可能与入朝一样，是一次态度的试探。只要表现出服从朝廷的态度，至少从最近两个月来看，如郭崇、袁彦者倒都相安无事。

可是李重进觉得，自己早就申请入朝，表示归顺了。造成如今这种局面的，明明是你赵匡胤。赵匡胤既然不想让自己入朝，那么让自己徙镇就是出自真心吗？这难道不是调虎离山的老把戏？

赵匡胤也料定李重进必增疑惧，所以扇完嘴巴后，又喂了颗红枣，让陈思诲前往淮南，颁赐铁券，以表诚意。

何为铁券？免死金牌也！从前朝逊帝到藩镇节帅，五代时期被皇帝赐予铁券，号称有免死特权的人不在少数，可哪个最后也没得好死。李重进又不是小孩子，赵匡胤的铁券根本不能带给他任何安全感。

即便如此，李重进仍然犹豫不决。因为他清楚，自己早已不是当年纵横南北的“黑大王”。李重进出镇淮南，不过一年有余，人心未附；经历过三征淮南之役，扬州早已成为残破的孤城，而淮水又浅窄，这些都难作防御屏障；南唐李景畏中原如虎，未必会来应援；而最重要的是，淮南兵力羸惫，就算加上李重进带来的少得可怜的侍卫亲军，也根本无法与朝廷的大军相抗衡。

李重进又犹豫了。说实话，他从来没真想过造反。否则，他早就成为第一个造反的节度使，而不是第一个请求入朝的藩帅。

但李重进有顾虑。这顾虑并非来自他的血统——郭威的外甥。前朝皇亲国戚如符彦卿、张永德自不必说，就是杨廷璋也已安全着陆。他所顾虑的，是自己的政治身份——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他的威望太高，军功太著，赵匡胤怕他。李筠的军事威胁只是一时的，他的政治隐患才是一世的。

在帝制时代，皇帝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强。让皇帝害怕的人，多半没有好下场。

于是，那个征江北时果断刚毅的黑大王不见了，余下的，只有

这个坐困淮南、优柔寡断的李重进。

权衡再三，李重进还是答应随陈思诲入朝谢恩，然后徙镇平卢军。如果李重进乖乖从命，赵匡胤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毕竟，对于昔日的政敌如李重进、韩通，赵匡胤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豁达。在五代宋初这个盛行快意恩仇的时代，他必要除之而后快。

逼反李重进，这是早就提上日程的“阳谋”。

淮南镇的幕僚们，也不相信赵匡胤会就此放过李重进，何况还有翟守珣这个“内鬼”。还没等李重进收拾好行李，幕僚就来“哭丧”了：令公入朝，恐怕有去无回，三思啊！

于是，在幕僚的煽风点火下，心有不甘的李重进放下行囊，终于提起长枪——他这次真的反了！

反报传入东京。九月二十二日，赵匡胤钦点石守信挂帅、王审琦为副、李处耘监军，另委善于水战的保信军节度使宋延渥为都排阵使（负责根据主帅要求指挥军队排成各种军阵，有时也参与军事指挥），南下讨叛。

自这天起，淮南的情报，如雪片般飞入开封城：

李重进求援于南唐，唐主李景不纳！

扬州都监、右屯卫将军安友规踰城来奔！

李重进疑心重重，囚杀军校数十人！

然而，没有一条有关李重进主动出兵的战报。在竖起反旗的一刹那，李重进似乎就料定了自己的结局。

李筠已死，李景拒绝救援，这意味着对抗大宋精兵的只有孤零零的一座扬州城；安友规逃跑投靠朝廷，这意味着扬州城内人心浮动。

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

慌乱，浮躁，猜忌，不知所措……李重进只能用杀人的办法，勉强发泄心中的压抑。昔日镇定的李重进永远回不来了。

扬州城里一片混乱，开封城内却步步为营。安友规的到来，为朝廷进一步提供了扬州的情报。既然灭掉李重进只是时间问题，那么赵匡胤要考虑的就不再是如何击败李重进，而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平定淮南。

枢密副使赵普进言："李重进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

赵匡胤听出了赵普的意思：李重进内外交困的程度，可能超乎我们的预估，取之易如反掌。正面强攻扬州，不会造成很大损失；反而战争拖得太久，大军耗粮，力役扰民，得不偿失。

赵匡胤当即采用赵普的急攻战略，再次下诏御驾亲征，以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吴廷祚权东京留守，吕余庆副之。值得一提的是，大军路过徐州附近时，武宁军节度使郭从义请命从征。赵匡胤虽然没有同意，但进一步感受到军事胜利带给自己的政治权威。

赵匡胤一面安抚扬州戍卒在北方的家属，告诉他们不会搞连坐，以使扬州戍卒怀朝廷之恩、亲属之情，不欲为李重进死战；一面找来李重进在京师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去扬州传话："重进，你何苦造反？江淮兵弱，又无良将，谁能陪你一起拼命？"

这无异于当年放李守节回潞州，是在人心上架起一把刀。

果然，自从李重进的两个儿子来过后，江淮将士再无心恋战。扬州城内，粮尽多时；兵不能战，城不能御。这里就像一座失去栋梁的阁楼，轻轻一推就会坍塌。可是石守信愣是在城外守了几天几夜，只围不攻，意欲何为？

突然，西北天际，擂鼓震天，宋军将士山呼万岁！李重进拄着枪杆，勉强攀上城头，不远处，天子旌旗迎风招展。

呵呵，原来石守信在等你……赵匡胤，你还真给面子，居然还亲自来送我一程。你我的恩怨，到此为止……

此前来送丹书铁券的使者陈思诲尚被扣留在扬州，李重进的亲军恨之入骨，眼看自己已无生路，都劝李重进杀掉他做个垫背的。

李重进却淡淡地说："杀他，又有什么意义呢？"

李重进带着全家，慢慢走进自己的衙署，几个月来，他从未像今日这般坦然与镇定。节度使府的大门慢慢闭合，须臾，府衙里燃起了熊熊烈火……

李重进的兄长深州刺史李重兴自杀，弟弟解州刺史李重赞与儿子尚食使李延福在闹市被斩首，数百名李重进的死党被诛杀。次年正月，曾向李重进献计的泽州刺史张崇诂亦遭诛灭。至此，李重进的势力被连根拔除。

陈思诲在黎明中没有迎来曙光，被李重进的亲兵私自杀害。命大的翟守珣则被赵匡胤征入宫中，成为皇帝的侍卫。

十一月十一日，象征着武人至高荣誉的节度使府，瓦砾叠弃，焚尽成灰，成为英雄的坟墓。

正如李重进本身是个政治问题一样，赵匡胤这次"貌似多余"的亲征，不仅是为了军事上的速战速决，更是为了政治而来。禁军将士自石守信、王审琦以下，目睹曾经的禁军第一人如何灰飞烟灭；节度使们也再一次领略了新皇帝改天换日的雄心。赵匡胤以此举向天下武人宣告：持兵抗命的时代结束了！

严冬已至，朔风又起。与扬州一江之隔，李景已经感受到深深的寒意。

再临长江

当年周世宗三征淮南，南唐痛失江北，国势一落千丈。原来淮南产盐，南唐借此而富；如今江北交割，别说靠着卖盐赚钱，连江南人自己都没盐吃了。食盐是生活必需品，与粮食一样，属于战略资源。李景曾派陈觉出使中原，想让周世宗通融通融，将江北产盐的海陵监还给南唐。没想到郭荣不同意，只是下旨说每年赐给江南

30万斛盐。至于江南够不够吃，那就管不了了。李景像个乞丐，颜面尽失。

眼见着南唐从堂堂大朝，沦为“虽未即亡，而亡形成矣”（陆游语）的小国，李景痛定思痛，终于做了几件看起来像点样子的事。

第一件是消灭“宋党”。淮南战败后，陈觉和李徵古见李景皇威不振，便建议将国政全部交给宋齐丘，似有仿效徐温之意。对丧失权力极端恐惧的李景终于痛下决心，铲除宋齐丘集团。就在唐周议和当年，“宋党”的魁首宋齐丘被勒令“归隐”，随即自缢于九华山中；多年把持朝政的陈觉、李徵古被罢职流放，最后死于路上。严重左右南唐内政外交的“宋党”终于告一段落。这是李景执政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

第二件是修缮城池。李景臣服后周之后，轻易不敢练兵修城，怕引起郭荣的误会。然而郭荣自觉江南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还得让李景帮自己统治这片土地，于是告诉李景，放心修城治兵，这都是为了子孙后代。李景这才修固城池，增兵防守。

第三件是确立太子。李景的继承人，本来是皇太弟李景遂。显德五年（958），随着李景嫡长子燕王李弘冀军功卓著，威望日高，李景遂很知趣地让出了皇位继承权。李弘冀却猜忌心重，派人毒死了李景遂，以绝后患。然而，他做贼心虚，在病中看见景遂的冤魂，结果才做了一年太子，就一命呜呼了。远离政治的皇六子李从嘉阴差阳错，成为太子，他后来有一个至今仍响彻中国文坛的名字——李煜。

第四件是筹备迁都。江宁府与后周一江之隔，时不时还能看见北方的水师在长江巡游，李景整日提心吊胆。因而，他不顾群臣反对，升上游的洪州为南都南昌府，准备迁都于此。

然而李景还没来得及离开金陵险地，就被突如其来的赵匡胤吓到！

在李景眼中，北方有三个人极其恐怖：第一个，周世宗郭荣，死了；第二个，“黑大王”李重进，死了；第三个，大宋天子赵匡胤，还活着，而且就在扬州！

登基伊始，赵匡胤对南唐还算友好。新生的宋朝向原后周的从属势力一一发出诏命，告知改朝换代。其中，对藩镇和半独立政权的诏命是同一天发出的，对南唐的诏命则是在正月八日单独发出的。赵匡胤想通过这件事，先给李景吃一颗定心丸：你与世宗皇帝之间的约定，我大宋仍然遵守。你安安心心做大宋的属国，我也不会随便找你的麻烦。

正月十三日，赵匡胤下诏将曾经投降后周的34名唐将释放回国。这个举动并不引人注目，却有值得一提的理由。唐将的家人都在江南，让他们天各一方，实在是不人道。何况这种情况下，这些降将也很难忠心为宋廷效劳。与其将他们扣在北方，不如放归南方，做个顺水人情，让他们在江南宣扬大宋的美德，对于日后争取江南官民之心，也是有好处的。

总之，赵匡胤对南唐采取怀柔之策。一方面可以稳住南唐，避免它铤而走险，去做藩镇叛乱的后援；另一方面则可以改善自己在江南官民中的形象。

赵匡胤的怀柔换来了李景的投桃报李。贺登基、贺长春节、贺平李筠、贺凯旋东京、贺平李重进。南唐恭贺大宋的使者络绎不绝。

然而，当南唐的使者再度来到扬州时，遭遇的却是赵匡胤的黑脸。

五代时期有一种宴会叫“买宴”，即大臣、使臣觐见皇帝时，由皇帝出面设宴，大臣、使臣出钱。李景的八子蒋国公李从镒与户部尚书冯延鲁，此次就是来向赵匡胤买宴的。

赵匡胤仔细打量着二位使臣，这李从镒虽然文质彬彬，双眼却透着灵气，一看就是机敏之人；那冯延鲁气宇轩昂，亦不失使臣尊

严。二人以弱邦出使上国，仍能持节聚势，够胆略！在欣赏之余，赵匡胤决定先杀杀他们的锐气，突然板起脸来，厉声责问：“你们国主为何要与我朝的叛臣交往？”

在宋军攻破李重进的一刹那，宋唐间的地缘政治就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随着两次征讨、多次徙镇，宋朝国内的藩镇暂时不会再染指皇位。李重进的败亡，更使得南唐与藩镇勾结反宋的可能降至最低，南唐在大宋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个时候，赵匡胤已经没有理由再一味迁就李景了。怀柔久了，也许南唐君臣就会产生错觉，忘掉自己的身份。

冯延鲁瞬间揣摩出赵匡胤的心思，他没有狡辩，而是答道：“陛下您只知道我们国主与李重进私下交往，却不知道我们早就参与了造反的图谋。”

“嗯？”这个回答倒是大出赵匡胤意料，他以为冯延鲁会诚惶诚恐地辩解或者谢罪，却没想到会有此回答。据可靠情报，李重进向李景求援，李景确实是拒绝了。冯延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面对赵匡胤的疑惑，冯延鲁胸有成竹地说：“重进的使者当时就住在臣家，国主让臣对他说：‘男子不得志，固然有造反的。但是造反的时机，却有可反、不可反之分。陛下刚刚登基，人心未安，与李筠战于上党，那个时候你们不造反。现在人心已定，境内无事，你们却想凭借残破的扬州，数千疲敝的士兵，去对抗朝廷的万乘之师，就算是韩信和白起复生，也必然无成！即使我们有兵有粮草，也不敢资助你们。’重进随即因为没有外援而战败。”

冯延鲁的话暗含杀气，言外之意，李重进失败是因为没有南唐的支援，而南唐不支援他不是因为不敢，而是因为时机不对。如果李重进在李筠造反时也反了，南唐是可以出兵的，那时在火中自焚的就可能是你赵匡胤了。

赵匡胤本以为冯延鲁会吓得屁滚尿流，没想到他却如此不卑不亢。这个治国无方、打仗无能的南唐“五鬼”之一，虽然此刻的话

纯属虚张声势，但确实为南唐保住了尊严，不辱使臣之命。

赵匡胤仍想在气势上压过南唐一头，继续说道："即便如此，诸将皆劝我乘胜渡江，你看如何？"

冯延鲁依旧没有被吓倒，反而威胁道："陛下神武，统御六师威临小国，我蕞尔江南，怎敢抗拒天威？然而我国主也有侍卫数万，都是先主（指李昇）的亲兵，誓同生死。陛下若能舍弃数万将士的性命与这些亲兵血战，还是能拿下江南的。不过江上大风大浪，如果进不能攻克城池，退又被断了粮道，这也足够让大国担忧了。"

赵匡胤闻言大笑。冯延鲁所言非虚，且有理、有利、有节，赵匡胤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饭桌上，自己无法在气势上盖过冯延鲁。他赶紧换了话题，来打破剑拔弩张的尴尬："朕只是跟卿说笑罢了，难道真的把卿当成了说客，来听卿游说吗？"随即说出了冯延鲁此行最想要的保证："我与江南大义已经明确，何至于此？"

赵匡胤承诺，宋唐君臣大义已定，大宋现在不会攻伐江南。江南人都说，这是冯延鲁凭三寸不烂之舌，阻止了宋军南渡。

其实赵匡胤本就没打算渡江，他的目的只是吓唬李景，让南唐对大宋不敢有二心。用罢餐后，赵匡胤命战舰开到迎銮镇演习，那是当年郭荣坐镇的地方，也是赵匡胤上次渡江的出发之地。

长江对岸，不仅李景日夜难安，朝野上下也是心惊胆战。有个低级臣僚名叫杜著，误以为赵匡胤真的要南下，便化装成商人渡江投宋；彭泽县令薛良更是带着《平南策》来到了大宋军营。李景听说后，更加恐惧。

然而时机不到，赵匡胤还不能接纳这些叛臣，否则既无益于宋唐今后正常交往，也无益于大宋日后进取江南，更无益于对忠诚的弘扬。因此，在迎銮演习之际，杜著被斩、薛良充军。

一抚一镇间，李景彻底折服于大宋皇帝脚下。而冯延鲁在得到赵匡胤大量赏赐后，也渡江回国。冯延鲁在朝为奸佞，在军为庸

才，在外交场合却能不辱使命，大放异彩。可见人各有才，关键是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李景把一流大国治成了二流小邦，败就败在用人不明。

现在，即将北返的赵匡胤也面临着选人的问题。扬州既平，赵匡胤立刻下令开仓赈济，并赦免了李重进的家属、部曲，对死于战事的将士、役夫也给予抚恤，为的就是尽快将扬州的创伤抚平。

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宣徽北院使李处耘受命权知扬州。为确保万无一失，赵匡胤不惜将心腹谋臣放在这座残破小城。他相信，李处耘一定能够体会圣眷君心。四天后，赵匡胤安心地起驾还朝了。

属国藩镇叛乱的威胁已渐渐消除，宋朝在后周旧境内的统治日益巩固。一场悄无声息却又翻天覆地的改革，已经提上日程。

三、杯酒释兵权

暂时做稳了皇帝的人

平定二李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各地节帅纷纷表示愿与新王朝合作，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挑战赵匡胤的权威。就像高平之战后的周世宗，如今的赵匡胤终于成为暂时做稳皇帝的人。

但赵匡胤知道，在这个皇帝人尽可做、朝廷威信扫地的时代，举国上下都充斥着另一种人——想做皇帝而不得的人。

五代兵祸的直接源头是禁军和藩镇，前者是腹心之患，后者是肢体之祸；前者关系生死存亡，后者关系长治久安。

目睹、参与过多次兵变，最终也是靠兵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

要保住大宋江山，摆脱短命厄运，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禁军，或者说是能够左右政局的禁军高级将领的问题。

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这些统领禁军的八大开国元勋，在后周时就已是禁军的重要将领，甚至绝大多数已是高级统兵官。换句话说，他们手握重兵，在军中有一定威望，与赵匡胤的地位不相伯仲。他们是否位列禁军高级将领，与赵匡胤的提拔赏识关系也不大。与其说他们是赵匡胤的心腹大将、开国元勋，倒不如说是大宋朝的合伙人。

再换句话说，他们同样具备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潜质，却并不受赵匡胤个人恩惠的约束。合伙人一旦想独立，赵匡胤根本拦不住。他们就是大宋版的王殷、郭崇和曹彬。

想做皇帝而不得的人，首先指的就是这统领禁军的八位开国元勋。

对于这样的人，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当然是像刘邦那样，兔死狗烹。这是五代时期的惯用伎俩。

但对赵匡胤来说，这实在是下下策。

首先，皇帝猜忌功臣将帅，动辄诛杀，结果搞得人人自危，人心不宁，反而造成政局更大的动乱。对一心求治的赵匡胤而言，开国元勋不能杀。

其次，开国元勋可能居功自傲，甚至弄权枉法，但毕竟还不是谋逆作乱。只要能够遏制这些人的野心，使他们不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么，开国元勋就不必杀。

最后，开国元勋个个跟赵匡胤交情深厚。对于重感情的赵匡胤而言，这样的开国元勋他自然也不愿杀。

不能杀、不必杀、不愿杀，赵匡胤决定不杀，改而尝试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解决八大元勋对大宋的潜在威胁。

前面说过，建隆元年（960）八月一日，为了庆祝平定李筠，赵匡胤曾在万春殿大宴群臣。五天之后，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

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分别出任永清军节度使、建雄军节度使，此二人原本的官职则由赵匡胤的义弟韩重赟，以及在陈桥兵变中表现异常突出的罗彦瓌取而代之。

张光翰和赵彦徽成为八大元勋中第一批被解除兵权的人。[1]

与其他六人相比，张光翰、赵彦徽与赵匡胤的关系相对疏远，陈桥兵变前夕，他们也仅是禁军厢级统兵官，并非高级将领。骤升高位，舰居元勋，两人惶惶不可终日，生怕皇帝秋后算账。现在罢落军职，外放藩镇，这反而说明皇帝给自己留了一条活路。

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又一场酒宴在广政殿隆重举行，这次的主角，是刚刚罢落军职的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与前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是两司一把手，但早在陈桥兵变之前，二人就先后领兵出巡河北。韩令坤从平二李，断断续续地留在京城，勉强还能坐一坐侍卫司的衙署；慕容延钊却常年在外，对殿前司的事根本无从过问。

一个像极了韩通，另一个像极了李重进。

毕竟，对皇帝赵匡胤也好，对两位曾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大将也好，为了避免尴尬，相见不如不见。

这就注定了两人的命运。

罢免军职后，韩令坤与慕容延钊一北一南，分别出任成德军节度使和山南东道节度使。

不过，赵匡胤并没有让二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草创未稳的宋朝而言，北有契丹威胁，南有诸国待战，仍需良将镇守国门。韩令坤与慕容延钊待在朝廷，那就是架在赵匡胤脖子上的刀，可去

[1] 据《景定建康志》所载《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张光翰于建隆元年八月罢军职。《长编》记录建隆元年八月“复贝州为永清军节度使”，《宋史·刘载传》称“建隆四年，贝州节度使张光翰来朝”，则贝州复使之日，当为光翰罢军职之时。

了边镇，就成了一对活门神。

因此，二人出守藩镇的地点也是赵匡胤精心选择的。镇州是河北枢纽、北疆门户，韩令坤兼任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威名赫赫，日后成为太祖朝著名的十四边将之一；襄阳则是江汉枢纽、南疆重镇，慕容延钊兼任西南面兵马都部署，雄视南陲，后来成为统一战争的主帅。

为了表达对宿旧元勋的尊重，也为了化解情感上的尴尬，赵匡胤在广政殿大摆宴席，亲自为即将赴镇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饯行。此后，节度使到藩镇履职，皇帝都依据这次酒宴的规格，举办送别会。

觥筹交错间，八大元勋已去其半。

按照赵匡胤的计划，禁军的人事调整到此暂时告一段落。毕竟宋朝要统一天下，还需要依靠这些大将带兵打仗。

然而，枢密副使赵普却不同意。他数次向赵匡胤进谏说："不能再让石守信和王审琦统领禁军了。"

"这俩人怎么可能造反呢？"对赵普的话，赵匡胤非常不屑。在他看来，石守信、王审琦，包括高怀德和张令铎，这些真的都是自己的兄弟，靠得住。

赵普却回答："石守信和王审琦确实不会造反。可据臣观察，他们两个驾驭不了手下的官兵。万一哪天下面的人想拥立他俩搞兵变，恐怕到时候他们两个不想造反也不行了。"

赵普的话说得很委婉，但赵匡胤依旧不信，他反问赵普："朝廷如此重用他们，这两个人怎么会辜负朕？"

没想到赵普硬邦邦地答道："那陛下又怎么能辜负世宗？"

赵匡胤不再争辩。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赵普是对的，只是这次要罢免自己最亲近的弟兄，面子上太难看了。

酒宴，也只有酒宴，才能再一次帮赵匡胤化解尴尬。

杯酒释兵权

人间还没太平，天上又起风波。建隆二年（961）四月一日，日有食之，白昼如夜。五月三日，天狗星堕入西南。在古人眼里，这实在不是好兆头。

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病逝，享年60岁，谥号明宪（后改谥昭宪）。

按照儒家礼法，父母去世，做儿子的应当守丧三年。可天下事权集于皇帝一身，让皇帝3年不理朝政，显然有违实际。因而，杜太后在临终前，特意叮嘱赵匡胤，要按照过去通行的变通之法守丧。具体来说，皇帝三天便可以脱下丧服，并且“以日易月”，守孝24天即出丧期。地方官员三天释丧服，在京文武百官13天释丧服。只是在24个月内，不要奏乐。

由于杜太后的去世，赵匡胤为兄弟们准备的那场酒席不得不延期举办。到了六月二十五日，守丧结束，解决最后四位禁军元勋的时机终于到了。

六月底七月初的某一天，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和张令铎接到邀请，结伴入宫，参加皇帝老大哥举办的酒宴。兄弟五个开怀畅饮，把酒言欢。

酒至半酣，赵匡胤悄悄屏退左右，跟四位兄弟感慨道：“要不是哥几个卖力，我老赵绝对没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一刻也没忘记呀！”

可说着说着，赵匡胤突然叹了口气：“唉，我太难了，这皇帝当得，还不如当节度使时候快乐呢，我现在天天失眠，睡不着觉。”

石守信等人直愣愣地看着赵匡胤，心说老大喝多了吧，哪有当

皇帝不快乐的道理啊？于是大家便问："陛下，您这皇帝当得好好的，怎么睡不着觉了呢？"

赵匡胤答道："这也不难理解，谁不想当皇帝呢？"

此话一出，四人吓得立马从椅子上滚落，跪在地上拼命磕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您就是真命天子，谁还敢有二心？"

赵匡胤却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当然没有二心，可一旦你们那些贪图富贵的手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做不做皇帝，你们说说，还由得了你们自己吗？"

四人吓得魂飞魄散，以为皇帝要大开杀戒，一个个痛哭流涕，苦苦央求道："臣等太蠢了，没想到这一点。求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条活路吧。"

赵匡胤见火候已到，这才徐徐劝导说："人生犹如白驹过隙，一晃就过去了。那些想要大富大贵的人，不过就是想多攒点钱，让自己和子孙享福。既然是这样，兄弟们，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出守藩镇，多买好地好房，留给子孙后代。然后，再多置些歌儿舞女，每天喝酒唱歌，以终天年。我跟你们结为亲家，从此君臣一体，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很好！"

四人得知捡了条命，连忙拜谢："陛下这样为臣等着想，真是让臣等死而复生啊！"

第二天，四人集体递交辞呈，赵匡胤见了非常高兴。

七月九日，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出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出为忠正军节度使，侍卫都虞候张令铎出为镇宁军节度使，全部罢落军职出守藩镇。侍卫副都指挥使石守信虽然在迁领天平军节度使的同时，升任侍卫都指挥使，但他很知趣地只管在侍卫司打酱油。到了第二年，石守信也卸掉了"吉祥物"的空头衔，一身轻松地到地方藩镇赴任去了。

这为巩固皇权的最后一场酒宴，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履行了诺言，至死也没有为难石守

信等人，他与诸将结为亲家的承诺也得到兑现。除了高怀德已经做了赵匡胤的妹夫外，石守信的儿子石保吉娶了赵匡胤的次女延庆公主，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娶了赵匡胤的长女昭庆公主，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光美。

不过，“杯酒释兵权”仍然有一个尾巴尚未解决。离开朝廷的前禁军高级将领们，短期内就像李重进一样，对朝廷的威胁已无足轻重。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雄踞一方的节度使，谁又能保证在足够长的时间后，他们不会变成李筠呢？

赵匡胤能保证。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留到后面再说。

继续回到杯酒释兵权。

我国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评价说，杯酒释兵权“是一种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运用。一席酒宴解决了不断兵变和不断改朝换代的祸根”。

柏杨先生只说对了一半。杯酒释兵权确实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运用”，赵匡胤用一席酒宴，化解了君臣间情感上的尴尬，减少了被罢兵权者的抵触情绪。

但仅靠一席酒宴根本不可能解决“不断兵变和不断改朝换代的祸根”。赵匡胤罢免八大元勋，都动用了酒宴，但不是一席，而是三席。何况最后一场“杯酒释兵权”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也一直有争议。

酒席上的皆大欢喜，隐藏了置换兵权的真实逻辑。赵匡胤固然没有强硬地从石守信等人手中“夺”兵权，但也绝不是轻飘飘的“释”兵权。用“赎”兵权来形容这个过程，可能更加贴切。作为收回兵权的代价，赵匡胤不仅与禁军大将们结为亲家，还放任他们到藩镇聚敛财富，将他们的兴趣从军国大事引导向个人的奢侈生活。对于石守信等人来说，赵匡胤是厚道的，他非但没有兔死狗烹，反而给予自己巨额补偿。

然而，对于藩镇内的老百姓而言，至少是在藩镇还存在的那

些年里，赵匡胤又是极不厚道的。禁军大将在被罢去军职、出任节度使后，有不少人成了一方祸害。石守信、高怀德、赵彦徽，以及后来罢出禁军的韩重赟，都以横征暴敛为能事，甚至连符彦卿、向拱、李继勋这些早就与禁军无缘的节帅，竟然也争相贪污聚敛。备受猜忌的大将节帅们通过这种方式，向赵匡胤表白自己胸无大志、只想保命的心迹，赵匡胤也乐见他们在纸醉金迷中消磨斗志。

“杯酒释兵权”无异于一张“腐败许可证”。为了皇帝的江山永固，不妨再苦一苦百姓。

当然，石守信等人甘愿就范，自然也与赵匡胤的实力有关。赵匡胤统领全军上下，即便石守信等人不交兵权，赵匡胤也完全有能力绕过他们指挥全军。只是到了那时，皇帝既然撕破了脸，石守信等人再想到藩镇去做个富家翁可就不可得了。

对于石守信等人而言，摆在眼前的，是金灿灿的真金白银；架在脖子上的，是明晃晃的大刀。是你，你又怎么选呢？

至于酒席，全当是皇帝大哥给兄弟们的一个交代吧。

抑制与制衡

在罢免禁军八大开国元勋的同时，赵匡胤对禁军两司的人事做了新一轮调整。建隆二年（961）七月十一日，皇弟殿前都虞候、领泰宁军节度使赵光义罢落军职，改任开封府尹、同平章事。同月，靠着政治投机熬到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的罗彦瓌，也出为彰德军节度使。

在新的禁军主要将领中，殿前军情况如表3-3。

表3-3　殿前军主要将领

殿前都指挥使	韩重赟（领义成军节度使）
殿前都虞候	张琼（领嘉州防御使）
铁骑左厢都指挥使	李进卿（领团练使）
铁骑右厢都指挥使	未详
控鹤左厢都指挥使	张廷翰（领果州团练使）
控鹤右厢都指挥使	尹勋（领某团练使）

侍卫马军情况如下：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刘光义（领宁江军节度使）
龙捷左厢都指挥使	马全义（领江州防御使）
龙捷右厢都指挥使	王继勋（领恩州团练使，不久升至永州防御使）

侍卫步军情况如下：

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崔彦进（领武信军节度使）
虎捷左厢都指挥使	马仁瑀（领岳州防御使）
虎捷右厢都指挥使	党进（领睦州防御使，不久改阆州防御使）

除了王继勋以王皇后弟弟的身份，超迁成为禁军中级统兵官外，其余诸人基本都是赵匡胤的旧部。

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禁军八大开国元勋之罢免，充其量只是一次性的人事调动，要永久性解决兵变隐患，赵匡胤最终还要依靠制度。而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抑制与制衡。

首先来看抑制。在杯酒释兵权后，9个禁军高级统兵官职位中，5个级别最高的被长期空置。其中，赵匡胤曾经担任的殿前都点检，以及其副职副都点检被正式废除。侍卫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职位虽然保留着，但在赵匡胤一朝却始终没有再授予任何人。

这一政策贯穿两宋始终。到了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正月十九日，侍卫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三个职位被正式废除。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正式成为禁军主帅。

可是这一制度也没有维持多久，三个都指挥使不仅时常阙员，甚至即便任命，也往往是作为前方将帅的加官。于是，禁军主帅又变成了殿前、马军、步军副都指挥使。再后来，副都指挥使也很少任命了，干脆让级别更低的殿前、马军、步军都虞候，甚至比他们还要低的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1]，以“管勾”“权管勾”“同管勾”的名义来主持禁军事务。而到了南宋，禁军主帅连都指挥使、都虞候的名号都不要了，直接改叫主管某司公事。

按照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的官品来衡量，昔日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都至少是正二品的大员；殿前都指挥使是从二品。而殿前副都指挥使只有正四品；马军、步军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则为正五品；殿前、马军、步军都虞候更是只有区区从五品。至于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级别就更低了。

与禁军主帅地位下降相适应，新的主帅人选自然也远不及此前威名赫赫的大将。年轻的韩重赟、刘光义、崔彦进此前虽然名列厢级统兵官，但军功与威望其实与禁军主帅还差很远。至于张琼，更是破格超迁的殿前都虞候。

张琼来自民风彪悍的大名府，勇力过人，善于弓箭，还舍身救过赵匡胤的命。赵光义罢军职后，赵匡胤便表示：“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下万人，除了张琼，没人能统制得了。”

韩重赟、刘光义、崔彦进和张琼，都是势单力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他们忠心、听话、老实，因而获得赵匡胤的青睐。当年威震天下的禁军主帅，就这样一步一步，卑微到尘埃里。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大大降低，政治野心迅速萎缩，被永远锁死在小人物的位置上。

---

[1] 宋太宗对上四军的军号做了改动，铁骑改名捧日，控鹤改名天武，龙捷改名龙卫，虎捷改名神卫。

接下来看制衡。赵匡胤的制衡之制，层次分明，结构复杂，从两司三衙内部，到京师禁军的不同系统，到权力结构，再到内外屯驻，可谓处处有制衡。

第一层制衡，是两司三衙内部的制衡。与禁军统兵官级别越来越低相伴随的，是禁军两司变成了三衙。由于赵匡胤常年不设置侍卫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实际上不再被统一管理，彼此分立的倾向越来越重。特别是乾德五年（967），赵匡胤增设侍卫马军都虞候、侍卫步军都虞候之后，马军、步军的指挥机构更加充实。这被宋史学者范学辉称为“从两司向三衙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性节点”。到了宋真宗时，随着侍卫亲军三帅被彻底废除，统一的侍卫亲军司正式不复存在。至此，后周以来的禁军两司彻底分裂为三衙，彼此的制衡性明显加强。

第二层制衡，是京师禁军不同系统的制衡。后周时，禁军指挥机构只有侍卫司和殿前司，对外由两司以上四军为主力，负责征战；对内则由殿前司的核心力量殿前诸班负责宫廷守备。陈桥兵变能够成功，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石守信控制的殿前军封锁了左掖门，拖延了韩通组织防御的时间。

有鉴于此，宋朝建立后，赵匡胤将宫禁内的部分近卫事务从殿前司剥离出来，交给重新组建的武德司。赵匡胤时，武德司已设有亲事官部队，到了太宗赵光义时，武德司的职能并入皇城司，并又从亲事官中选拔精锐，组成亲从官。太宗朝皇城司禁军的正式编制约为3000人，但据记载，赵匡胤曾号称最多时有数万之众。这些部队负责保卫皇宫，殿前司、侍卫司完全不得插手。

武德司（皇城司）之外，赵匡胤还组建了一个叫军头司的新机构。军头司手中也有一部分禁军，驻守于宫中的后殿。赵光义时，军头司的兵力也有所增加。

这样，守备京师的禁军就分散在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武德司（皇城司）、军头司五个机构内，不同的系统互不统

属，彼此牵制。

第三层制衡，是禁军权力结构的制衡。赵匡胤继承了周世宗的做法，进一步强化枢密院对禁军的牵制力量。枢密院手里无兵，但却拥有根据皇帝命令调动军队的权力。禁军三衙虽统率千军万马，但只负责日常训练、禁卫戍守、升降赏罚，没有枢密院的调令，连一兵一卒也调不动。至于行军打仗时任命谁当将帅，派遣哪支军队，这更是皇帝亲自执掌的权力。枢密院的职能最终在宋太宗晚年稳定下来，从而形成“枢密院—三衙体制”。

第四层制衡，是军队内部命令体系的制衡。赵匡胤在军中实施“阶级之法”，特别重视军队内部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要求军中下一级必须对上一级的管制绝对服从，违反军令者，轻则流放，重则问斩，以此来缓解五代以来军队目无法纪、动辄犯上作乱的问题。

赵匡胤终其一生不遗余力地维护阶级之法。开宝四年（971），他曾给从属于殿前诸班的御马直士兵增加赏赐，而川班内殿直的士兵因为没沾到光，颇为不满。这些在后蜀灭亡以后才加入大宋的士兵，仍带着一身五代老兵的痞气。他们结队去敲登闻鼓，要求朝廷给自己加赏。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对于他们的要挟，赵匡胤不但没有买账，反而大发雷霆，将敲鼓要钱的40余人一并斩首，都校军官也都挨了板子，降职留用。其余的士兵被赶出京城，分配到许州的骁捷军，整个川班内殿直的番号就此撤销。

赵匡胤曾表示：“朕抚养士卒，根本不吝惜封爵赏赐。但是，谁要是敢触犯法律，等着他的唯有剑耳！”

除了对禁军统兵官的抑制和管军体制的四层制衡，赵匡胤还采取了严禁军中结社、[1]在军中安置密探等办法，防止军中再生兵变。

---

[1] 据《长编》，乾德四年（966）才正式禁止选拔牙兵，开宝四年（971）有禁军民男女结义社之命。但观张琼坐私养部曲而被审讯，此禁令恐怕在开国初年即已实际实行。

抑制和制衡的原则被北宋贯彻始终。禁军高级统兵官发动兵变的道路被彻底堵死，五代时期禁军大将威风八面的风采彻底成为历史。陈桥兵变的善后工作终于完成，五代时期兵变不断的传统彻底终结。

四、收复荆湖与湖南改革

“先北”还是“先南”？

翻滚的浓云，犹如万匹脱缰烈马，在天地间奔驰。有的昂首长嘶，有的俯首前冲，有的振鬃摆尾，有的踏风扬蹄。尾一扫，扬起漫天大雪；蹄一动，踏破万朵银花。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迎着鹅毛大雪，赵匡胤独自在东京城里漫步。登基已近两年，藩镇称臣，禁军纳款，两匹烈马已然驯服，萧墙之内，暂无大乱。卧榻之主终于得暇，然环视榻侧，酣睡者依旧。南唐、后蜀、北汉、南汉、吴越、荆南、湖南，还有辽人盘踞的幽燕……郭荣主政时的割据者们，仍然生龙活虎；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依然未有改观。

王朴当年的《平边策》，赵匡胤虽然早就烂熟于胸，但与郭荣一样，他也对北国情有独钟。唯一的不同是，郭荣打算先收复幽燕，赵匡胤则希望先攻灭北汉。

南方诸国，虽然国势不振，但也非朝夕可得，好在它们与宋朝或友好相处，或不相往来，倒也井水不犯河水。大宋的军事威胁，仍然来自北方。辽人若破三关，可直取河北，北汉也可沿着太行，径下洛阳。而且，北方两国与大宋烽火不断，尤其是北汉，就像一

只臭虫，虽然不足以颠覆大宋社稷，但却牵扯了宋军不少精力。留着北汉，肯定会拖南征的后腿。与其南北两线作战，不如先把敌对国灭掉，再打那些友好者的主意。至于辽汉两国，倒是仍可按照先易后难的总方针，先取北汉，再讨契丹。

赵匡胤自以为理由充分，可他的方案却到处碰钉子。

第一个反对者是张永德。去年（960）八月，张永德入朝，赵匡胤曾以伐汉事秘密相问。张永德还记得，当年郭荣决战高平后，也曾一路北伐，兵临太原城下，甚至一度控制了太原以北的代州，然而由于准备不足，国力不张，最终还是铩羽而归。这是他与赵匡胤都亲历的战事，赵匡胤还因此负伤。于是，张永德建议："太原兵少却凶悍，又有契丹为援，仓促间很难攻灭。臣以为，每年应多派军队游击边境，破坏其农业生产；再派人到辽国离间，切断其外援，然后再行进取之事。"

"善。"赵匡胤只回了一个字。

张永德不支持，前线将领总该支持吧？于是，赵匡胤又召华州团练使张晖进京，咨询北伐计策。没想到张晖的回答一样，不宜北伐。张晖认为："泽州、潞州刚刚经历了李筠之乱，还未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这时兴兵伐汉，人民恐怕会吃不消。不如休养生息，等到经济恢复后再作打算。"

二张的建议，综合起来，就是恢复大宋民生，破坏北汉的生计，从而慢慢把北汉耗死。

可赵匡胤不想等到北汉油尽灯枯。于是，他约上赵光义，一同往赵普的府上走去。

赵匡胤有个爱好，晚上没事就到大臣家串门，他是赵普家的常客。按照礼仪，见皇帝要穿官服。所以赵普平时回府，不脱官服，生怕圣上驾到，自己来不及更衣。眼看今夜银装素裹，赵普自认主上必不会来，正思量间，叩门声响起。他赶紧踏雪开门，谁料皇帝竟然立于雪中。

诚惶诚恐的赵普匆忙跪拜。赵匡胤哈哈一笑，说：“我还约了光义，他一会儿就到。”皇帝与皇弟双双驾临，赵府顿时蓬荜生辉。赵普在堂上架起木炭，生火烤肉，又让妻子和氏亲自斟酒，丝毫不敢怠慢了贵客。和氏，就是当年将范质点为科举第十三名的和凝的女儿。

赵匡胤见了和氏，就像登基前一样，很自然地喊了声“嫂嫂”。一府上下，融融和暖，温馨如家。

赵普嚼着烤肉，悠然地问道：“这大半夜里，天寒地冻的，陛下怎么还出门？”

赵匡胤喝了一杯温酒，暖了暖身子，无奈地说道：“我睡不着啊。你看，一榻之外，全是别人的地盘。所以我来找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赵普一听，心下盘算：王朴的《平边策》，主上也知道啊。看来对于如何平定天下，他还有自己的看法。在弄清主上的想法前，自己不便乱说。于是，赵普试探性地问道：“陛下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天下太小了？南征北伐，现在正是时候，臣愿洗耳恭听。”

“我想收复太原。”赵匡胤几乎脱口而出。

赵普默然不语。宁静的雪夜，时间仿佛凝结，唯余噼啪的炭火声。良久，赵普摇摇头说：“此非臣能知道的事情。”

赵匡胤叹了口气，他已料到这样的结果，但他还是想问一句：“为什么？”

赵普回答说：“北汉西有党项，北有契丹，如果一举灭掉北汉，则来自党项、契丹的边患就由我大宋独挡了。不如先留着它，等削平诸国后，北汉不过弹丸之地，拿下它简直易如反掌。”

这话倒是说进了赵匡胤的心坎里。赵匡胤想过，讨伐北汉，必然会同时与汉辽两军交战，即便取胜，消耗也会不小。但灭掉北汉，可换取京畿的和平稳定，然后经过几年休养生息，就可以更加自如地征讨南方。然而若如赵普所言，在灭掉北汉后，大宋以疲惫

之师独自应付党项、契丹，那时何谈休养生息？又何谈南征诸国？万一被南方诸国乘机偷袭，岂不是得不偿失？

一语点醒梦中人。赵匡胤终于想通了，他哈哈大笑，赶紧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我也是这个意思，刚才不过试试你罢了。"然后回头对才来不久的赵光义说："中原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府库耗竭。我必先取西川，再取荆、广、江南等地，国家自然就会富足起来。我们的劲敌，只有契丹一国，自开运以后，契丹人越发轻视我们。河东控扼着党项和契丹，如果取了河东之地，我们就要与党项、契丹接壤了。不如先留着河东，为我作屏障，等我大宋扫灭群雄，取之未晚！"

总的来说，赵匡胤与赵普基本沿袭了周世宗和王朴"先南后北"的大战略，只是对灭国次序做了微调。

但对于这个大战略的争议，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束。

争议的焦点在"先南"还是"先北"，后世反对先平南、后扫北的大有人在，更有甚者连赵匡胤先取北汉的策略都表示不能苟同，而执意认为应当如郭荣一样先取契丹。北宋著名文史巨匠欧阳修便是其中之一。

欧阳修认为，打仗应该寻求战机，有些机会失不再来。郭荣南征淮南、北伐契丹，取得巨大战果。就北伐的成功而言，世人都只见郭荣用兵神速，却不知道这是因为有可乘之机。当时的耶律璟认为后周所取之地，此前是汉人的地盘，用不着去跟周军抢夺。由此可见，幽燕之地可指麾而取。不幸的是郭荣突然生病，大志未成矣！

作为深受契丹之祸的北宋士人，欧阳修发出这样的感慨可以理解，却并不代表言之有理。

耶律璟确实不太重视关南，但保有幽燕的决心，并不亚于他之前或之后的辽朝皇帝。郭荣北伐时，耶律璟正在调集大军，如果周军继续北上幽州，那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强悍的契丹精锐。以后周

与北汉作战的经验来看，在契丹干预下，周军尚不能灭汉，面对辽人视若生命线的幽燕，郭荣就有必胜的把握吗？

后周如此，开国伊始的大宋又如何能够胜过后周？

何况不论是郭荣还是赵匡胤，国内的禁军和藩镇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而单纯依靠北方的经济，也尚难以支撑一场大决战。新得的淮南千疮百孔，短期内也无法有效改善中原财政。反观辽朝，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耶律璟之所以有恃无恐，正因“其资富强之势以自肆”。

因此，仅就是否北伐而言，与审时度势坚持“先南后北”的谋臣赵普及武将张永德、张晖相比，具有浪漫情怀的文人欧阳修不过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措大耳。

建隆三年（962）十月十七日，枢密副使、兵部侍郎赵普升任枢密使，加检校太保；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

自雪夜定策后，赵匡胤苦苦等了一年，机会终于来了。送来机会的人，名叫周保权。

假湖灭荆

盘踞湖南的周保权，官职武平军节度副使、权知朗州，听起来和一般的藩镇毫无区别。

但也只是听起来而已。唐朝末年，武安军节度使马殷割据湖南。开平元年（907），后梁建立，马殷被梁帝朱温封为楚王，后唐时加封楚国王，正式建国，以潭州为都，号长沙府，史称马楚。马殷统治时期，楚国保境安民，依靠农桑纺织和茶叶种植，经济快速发展。可惜马殷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统治权连年内战，南唐皇帝李璟乘机发兵，于保大九年（951）灭楚，吞并湖南。

但好景不长，李璟用人不明，导致湖南政治混乱，人心不附，再度爆发兵变。马氏旧将收复故土，几经厮杀，武平军节度使周行逢脱颖而出，稳住了局势，建立起周氏政权，史称湖南。周、宋朝廷只负责对这个称臣的周行逢封官，其余事务概不过问。于是，湖南成为十国之外又一割据政权。

周行逢有九个结义兄弟，其中八人均在争夺湖南统治权的厮杀中死了，除周行逢外，硕果仅存者名叫张文表，他与周行逢一时倒也相安无事。然而，建隆三年（962）九月，弥留之际的周行逢却料定，自己死后，张文表一定会叛乱，于是告诉11岁的儿子周保权，文表若叛，当以亲军指挥使杨师璠征讨，要是打不赢，就婴城自守，归顺大宋吧。

在周行逢看来，赵匡胤对前朝旧主尚且放了条生路，周保权穷极往投，应该会有好的归宿。可若是落到张文表手里，周氏一门必死无疑。

张文表很给兄弟面子，果然周行逢刚死，就起兵造反。他一发难，小孩儿周保权马上慌了，老将杨师璠竟然也慌了。他们对战胜张文表毫无信心，慌张间，把周行逢的两条锦囊妙计合为一条，一面发兵平叛，一面火速向赵匡胤求救。

事实证明，周行逢的锦囊妙计并不妙，周保权的求救信递到宋廷一个半月，才等到宋廷正式册封自己为武平军节度使的任命。至于赵匡胤对湖南是个什么态度，仍然云遮雾罩，看不明白。

而赵匡胤却在听酒坊副使卢怀忠带回的其他消息："高继冲甲兵虽整，但军队不过三万；年谷虽登，可民困于暴敛。荆南南通长沙，东连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我大宋，臣观其形势，日不暇给，取之易耳！"

"好！"一直对湖南战事不冷不热的赵匡胤，在听到关于荆南的报告后，终于燃起了斗志。

荆南是正儿八经的十国之一，又称南平、北楚。后梁曾以高

季兴出任荆南节度使，下辖江陵府、归州与峡州。后唐同光二年（924），高季兴受封南平王（死后又追封为楚王），建都江陵府。

与湖南一样，荆南算不上完全独立的国家。但又与湖南不同，荆南只有一府二州，国力贫瘪，地狭兵弱。为了维持统治，高季兴和他的继任者们只好靠着劫掠来往使臣商贾、对周边国家称臣骗赏过活，时人称之为“高无赖”。

高氏所据的江陵府是交通要道。由于位置太重要，四面八方的政权反而不敢攻占。因为一旦占领荆南，割据的平衡就被打破，免不了遭到他国围攻。

现任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是第五位统治者，乃高季兴的曾孙。他上任不足一月，才20岁，夹在烽火硝烟的湖南与虎视眈眈的大宋之间，实难保境。宋军借着出兵湖南的机会，大可把荆南也一并拿下。赵匡胤一直没有给周保权回信，就是在等荆南的消息。如今，卢怀忠的情报证实了他的想法，一箭双雕正当时。

建隆三年（962）十二月二十日，赵匡胤正式下达第一道有关处理湖南兵变的命令：遣中使赵璲等宣谕周保权、张文表，让张文表归顺朝廷；命荆南发兵协助周保权。建隆四年（963）正月，宋朝以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遣使11人，发诸州兵会襄阳，讨伐张文表。

朝中文武闻讯大为惊讶。大家吃惊的理由倒不是发兵荆湖，而是大宋首次对外军事行动中，皇帝居然没有亲征。

整整10年了，他们早已习惯了跟着天子东征西讨。从周世宗的高平之战、北伐太原、三征淮南、收复关南，到赵匡胤讨平李筠、讨平李重进，哪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不是皇帝亲自上前线指挥？可如今，大宋官家居然不再上马了。

天下，居马上得之，安可马上治之乎？看着满朝文武的惊讶，赵匡胤有点小得意。乱世的逻辑要改一改了，谁说打仗一定要御驾亲征？朕已经让大将们远离朝堂，自己这个皇帝，也该摆脱军人的

身份，做个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了。朕是治天下的皇帝，不是上战场的将军。

退居庙堂的赵匡胤只对前线做了唯一的战略部署，他对即将赴军的李处耘说："江陵乃四分五裂之国，如今我们借道出师，要乘机把它拿下。"

假途灭虢，不，应该叫"假湖灭荆"，不仅算不上诡计，简直连阴谋都不算，只能勉强叫阳谋。

这样明目张胆地抢地盘，荆南能老实就范？

能！

不久前，赵匡胤向荆南下了一道诏书，命高继冲发水兵三千，与宋军一道南下潭州。

这是一个试探。荆南不是一直对中原奉表称臣吗？如今朝廷找你一同平叛，你出不出兵？出兵，当然好；不出兵，我正好以此为由，灭掉你这个乱臣贼子。

高继冲很快给出了反馈：荆南同意出兵。不同意也不行，高继冲与幕僚们很清楚，现在给宋朝留下的任何把柄，都会成为宋朝消灭荆南的正当理由。

不久，李处耘的使者丁德裕率先进入江陵城，宣读王命：王师借道伐叛，请贵府提供沿途补给。

高继冲回复：老百姓怕当兵的，粮饷我们可以供给，但请另行别路。

丁德裕再入江陵：王师借道伐叛，请贵府提供沿途补给。

一模一样的话，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

谁都明白宋军不怀好意，可又能怎么办？高继冲连忙召集幕僚，商议对策。

兵马副使李景威说："给我三千兵马，我可以在荆门设伏，击走宋军；然后回师收张文表，再交给朝廷。功罪相抵，大事可成。"

节度判官孙光宪说："自周世宗起，天下有混元一统之势。如今圣宋受命，规模更加宏远。现在宋军借道灭湖南，难道还有借道回师的道理？干脆献土投降算了。"

正在高继冲犹豫不决之际，孙光宪劝说道："公亦不失富贵。"

高继冲动心了，他并不关心荆南能否割据一方，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前途。于是，高继冲命叔父掌书记高保寅与衙内指挥使梁延嗣前去宋军大营犒师，顺便探探口风。

李景威闻讯，当日自尽。

使臣一去未归，等待命运的高继冲陷入空前的恐慌，他以犒劳宋军为由，在境内大肆搜刮钱财，这是"最后的疯狂"。好在赵匡胤听闻后，即时下诏，命高继冲停止搜刮，荆南百姓才算逃过一劫。

当晚，高保寅的使臣回报：宋军距江陵百余里，慕容延钊、李处耘待己甚厚，借道而已，并无他意。慌乱的高继冲终于安下心来，只待叔父等人平安归府。

次日一早，睡眼惺忪的高继冲没有等来叔父，却等来了李处耘。宋军兵临城下，毫无准备的高继冲仓皇出城十五里迎接。李处耘让他待在原地等着慕容延钊；自己却率兵先行入城，登上北门。待高继冲陪着慕容延钊的大军来到江陵时，城中战略要地早已为宋军所控制。

这是怎么回事？说好的先"假途"后"灭虢"呢？你们怎么不按典故出牌？高继冲懊恼不已。

建隆四年（963）二月九日，荆南1府2州16县，[1]142 300户民户，和平划入大宋版图。

---

[1]《长编》所记其版籍所录州县数为3州17县，此处据当时实际情况对数据做修订，参见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

荆南归附后，赵匡胤做了一些善后工作。高继冲继续留任荆南节度使，这让作为降臣的他喜出望外，对自己的性命再无担忧。后来高继冲举家归朝，他本人则徙镇武宁军，至开宝六年（973）去世，颇有政声。

朝廷另派地位与吕余庆旗鼓相当的枢密院承旨王仁赡任荆南巡检，实际管理荆南地区。荆南幕府的旧僚也各有升迁。

赵匡胤对李景威特别惋惜，评曰："忠臣也。"并命王仁赡厚恤其家。李景威无力阻止荆南的灭亡，但以死证明乱世自有正气在。

吞并湖南

趁着宋军跟荆南斗心眼儿的工夫，杨师璠已经击灭张文表。显然，这位与周行逢齐名的张文表被严重高估。杨师璠这时才发现，引狼入室是多么愚蠢的决策。请神容易送神难。号称帮助周保权平叛的宋军，在叛乱平定后，不但没有撤军，反而日夜兼程，直驱湖南会府朗州。

周保权吓得不知所措。观察判官李观象认为唇亡齿寒，荆南已亡，湖南也投降算了。指挥使张从富却坚持拼死一搏。他壮起胆子，把宋军入湘必经之路上的桥全部毁去，船全部凿沉，以断宋人进军之路。

结果湖南收到一道毫无风雅可言的诏书："你们来求援，朕这才发兵帮你们平叛。现在妖孽已死，朕对你们有再造之恩。你们不图回报，反而抗拒王师，这是自取灭亡！"

赵匡胤下了最后通牒，湖南幕府一筹莫展。张从富既已开战，周保权只能一面吞掉泪水，一面让他率兵抵抗。

抵抗的结果，却是湖南军队一败涂地。慕容延钊攻破岳州，直

捣潭州。而澧州方向，被宋军放回的俘虏们正抱着脑袋四处呐喊：宋军把俘虏都吃了！

原来在朗州之北，澧州城下，李处耘正在举办一场“食肥宴”。他从湖南战俘中选出数十个白白胖胖的，当着所有战俘的面，让自己的士兵把这些人吃掉了。

战争年代，饥荒连连，为了活命，人被迫吃人的事并不少见。但刻意举办吃人宴会，吃的还是俘虏，这已难用“残忍”二字来形容了，简直是丧心病狂。

丧心病狂的心理战，令湖南守军的心理全线崩溃，他们一把火烧了澧州，驱赶着民户弃城逃亡。宋军乘胜进击，于三月十日攻破朗州。张从富枭首，周保权被擒，在告别江陵一个月后，宋军再收10州39县3场，[1]97 388户民户。湘西由溪洞诸蛮控制的溪、锦、叙等羁縻州及下属羁縻县，也表示愿意向宋称臣。

与高继冲一样，周保权也受到了优待。他摇身一变，成了大宋的官员，被授以右千牛卫上将军的虚职，并在太宗朝出知并州。高继冲与周保权入宋，后来均得到朝廷授命，成为地方官。可惜，大概是整日里担惊受怕，二人都不长寿。高继冲去世时年仅31岁，周保权年仅34岁。

荆湖一役，大宋不仅得了13府州、58县场、24万余户民户，扩张了大宋的版图，壮大了大宋的实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大宋在长江以南打下了一枚楔子，下瞰南唐，上阻后蜀，南压南汉，在对南方用兵的战略上抢占了先机。

战事结束，荆湖地区迎来德音。所谓德音，是当时诏书的一种，专门用于下达宽恤之命。大宋朝廷宣布，荆湖地区的死刑犯免死，流刑（流放）以下的罪犯释放，已经因获罪而被发配官府罚充

[1]《长编》所记其版籍所录州县数为14州1监66县，此处据当时实际情况对数据做修订，参见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

劳役的人全部放还。此外，将三年以前所欠的田税和地方场院的赋税全部蠲免。荆湖地方官吏仍然官居原职，有功的还会加官晋爵。参加讨伐的军队将士也有丰厚赏赐，而在战争中被抓的俘虏则全部释放回家。

十多年前，南唐也曾占领湖南，但李景下达的诏命却是将湖南财物悉数运往金陵，又派遣为人苛刻的官员到湖南征税以供应驻湖大军，同时征发当地的人力、物力与南汉争夺原属楚国南部的土地，加之湖南统帅边镐驾驭无方，政出多门，终于导致湖南人造反，唐军无功而返。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安居其所，众星拱之。李景为政不德，祸害一地；赵匡胤传来德音，造福一方。帝制社会，朝廷专事汲取掠夺。但多有节制的“坐寇”，总好过抢完就跑的“流寇”。毕竟，要维持长久稳定的统治，统治者需要赢得民心。

当战争的目的由直接掠夺变为长久统治，帝制时代的太平就为时不远了。

南方的捷书连绵不绝地递入东京，群臣纷纷上表称贺，恭喜赵匡胤转型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军事胜利。不久，他们就会切身体会到，这场军事胜利将成为整个大宋朝转型的起点。

湖南改革试验

慕容延钊和李处耘忙着在荆湖攻城略地，开封城里的赵匡胤与赵普也没闲着。

此前，赵匡胤搞定了禁军，掌控了朝廷，基本解除了腹心之患。然而，为了在全国实施更具控制力的统治，他还需要把朝廷的权力延伸到地方，通过集权收夺地方权力。

而地方权力，掌握在藩镇手里。五代以来，中原王朝依靠强大

的禁军，虽然迫使藩镇称臣纳贡，但对藩镇控制下的地方官府却鞭长莫及。藩镇一旦野心膨胀，就可能起兵叛乱，这就是当时的肢体之患。

在平定二李之后，赵匡胤曾向赵普咨询："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个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现在想平息战乱，使国家长治久安，应该怎么做？"

赵普回答："原因无他，不过是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对其统治，也别无他巧，只要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太祖不待他说完便接道："卿不要再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赵普的对策，今人常称其为"削藩三策"或"三大纲领"。"稍夺其权"是指逐渐收夺藩镇的行政权、人事权、司法权；"制其钱谷"是指收缴藩镇的财富，收夺藩镇的财政权；"收其精兵"是指收编藩镇的精锐部队，收夺藩镇的兵权。

赵普的对策可谓切中要害，不过提出三大纲领并不需要太高的政治眼光。因为自中唐以来，历代在这些方面已经下了很多工夫。所以赵普刚一提议，赵匡胤马上就心领神会了。

真正需要政治智慧的是对三大纲领的落实。要落实三大纲领，就一定会触动藩镇利益，如何在此过程中不激化朝廷与藩镇的矛盾，对赵匡胤和赵普着实是个考验。

唐末五代，节度使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控制了地方的州政、县政，而要收夺藩镇的行政权，自然就要收夺州、县的行政权。这种在老虎嘴里拔牙的事情，必须等待时机。

宋太祖一等就是三年。

建隆四年（963）三月，荆南、湖南被宋朝消灭，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赵匡胤抓住机会，没有再在这一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而是在四月间推行了一场试验性质的行政体制改革。

改革的第一项措施是取消支郡，设置直辖州。

节度使控制的支郡越多，权势就越大。按照惯例，宋朝吞并湖南，应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立多个节度使。当年南唐攻灭楚国时，就是这样处置的。

然而，赵匡胤并未在湖南任命节度使，原本应该成为节度使支郡的州则全部直隶朝廷。这也并非无例可循，周世宗收复关南，便将雄、霸、莫、瀛四州直隶朝廷。更何况，节度使的辖区从来就不是一级正式的地方行政单位，那不过是朝廷对分裂这一既成事实的默认。如今，赵匡胤不再默认这个事实，改变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始了。

此后，随着宋朝逐渐吞并南方诸国，越来越多的州级行政区在行政上直属朝廷，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

改革的第二项措施是朝官知州。

州的行政长官本来是刺史。唐末五代，刺史的任免虽然需要朝廷确认，刺史在部分事务上也有独立向朝廷上奏的奏事权，但节度使以观察使的身份，仍然主导着下辖支郡中的绝大部分事务。

赵匡胤既然取消了支郡，改革直辖州的行政长官也就成了配套举措。虽然名义上，刺史仍然是直辖州的正式长官，但在一些治安较好的州，刺史已经不到地方赴任，或者根本就不授予人；而改派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的差遣官，实际到地方主持州务。

从唐朝开始，官职发生了重大变革。许多官职仅仅用来区别品级高低、俸禄多少、官员资格等，没有实际掌管的事务，成为虚衔，而真正主管事务的官员，则另行委派，称为差遣。

知州作为一种朝廷委派到地方的差遣官，最早始于唐代宗时，五代时期日渐流行，只是那时的知州文武兼用。而赵匡胤改良后的知州则完全不同。这些知州不仅由朝廷正式委派，而且均由高级文官——朝官担任。朝官隶属于中央，而非地方官，他们直接受朝廷领导，而不受地方藩镇节制。

“湖南模式”毕竟是要向全国推广的，日后难免要对藩镇下手，知州们自然要与节度使分庭抗礼。以朝官任知州，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知州的权威，有朝廷为他们撑腰，他们在面对节度使时，脖子更硬，腰板更直，更敢分割藩镇之权；另一方面，这也打破了州官听命于节度使的惯例。

最重要的一点是，朝官都是文臣。与武人相比，他们更容易受到儒家忠义观的约束，造反的概率大大降低。他们没有自己的军队，甚至与武将、士兵互相看不顺眼，也就缺乏在地方进行军事割据的基础，而他们长期处理政务，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比武人更精通地方治理。

对于大宋第一批新型知州的人选，赵匡胤也煞费苦心。他以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给事中李昉权知衡州，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薛居正权知朗州。这些都是腹有诗书、办事干练的有识文士。

改革的第三项措施是知州分权。

赵匡胤仍然担忧知州们大权在握，早晚会变成新的土皇帝。于是，他在州中又援引南唐创设的通判一职。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俨然是一州的二把手；通判还对知州有监察权，俗称“监州”。二者互相制约，都难以一支独大。第一位有史记载的宋朝通判是刑部郎中贾玭。通判还握有一州的财政权。此外，掌控地方财政权的官职还有转运使，这本是战时负责筹运军粮的临时职务，赵匡胤后来却将它常态化，让它协同通判总揽地方财权。

赵匡胤的爷爷赵敬曾做过蓟州刺史，并按照惯例兼任静塞军使，州中民政军政大权一把抓。而刺史的军事权力并没有被知州继承。在文臣掌握一州行政权的同时，州中的军权却交给了由武人担任的兵马都监。

如果说，唐末五代，朝廷羸弱，地方从节度使到州刺史，都是集各种权力于一身。那么要重塑中央权力的赵匡胤便是反其道而行

之，将地方权力拆了个七零八碎，而且每项零碎的权力都要由朝廷赋予。

由于战后的湖南是一片没有藩镇的“净土”，因此，赵匡胤的三项改革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迅速在湖南展开。通过改革，朝廷的权力延伸至地方，为今后的政权结构搭好了新架子，节度使赖以割据的政权基础正在走向分崩离析。

第四章

内斗外争

一、幕后的京尹

最后的周臣

夕阳西沉，天际处已升起冉冉红霞。然而高高的宫墙，却挡住远眺的目光，只能从钩心斗角的殿阁间，一瞥晚霞的芳容。角楼迤逦着几块金丝条般的霞彩，宛如披上艳丽夺目的锦缎。

但那不过一时幻景，灿灿云霞自淡而浓，自金红而碧紫，自紫而暗，自暗而漆黑一片……

天色已晚，正在值班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王著，拿着京城名酿流霞酒，跌跌撞撞，从学士院晃荡而出。他扶着宫墙，步履蹒跚，穿过一道又一道宫门：右长庆门、右嘉肃门、右银台门……

嗯？怎么到了这里？出右银台门左转，是去往西宫的路……

西宫……郑王……我要去见郑王……想到这里，王著突然伏在右银台门外，呜呜哽咽起来。

自从上次醉闹曲宴，王著也曾打算戒酒，一心一意起草诏书、主持贡举、备问答对，也算报答赵匡胤的宽容大度——不仅是对自己的，更是对郑王的。郑王郭宗训虽然失国，但赵匡胤毕竟信守诺言，没有难为他，这最让王著欣慰。然而，欣慰不过是短暂的幻想。就在上一年，也就是建隆三年（962），赵匡胤一纸皇命，将这幻想打得粉碎。

10岁的郑王郭宗训被迁出西宫，安置在偏远的房州。那里四面环山，是一座天然监狱，是历代贵族政治犯的归宿地。

陛下，您不是说要善待周宗室吗？王著又开始酗酒了，而且酗

得更凶。他甚至曾趁着酒醉，卧宿青楼，这在当时是违法犯禁的，结果被巡吏逮个正着。说也奇怪，巡吏没有把他交给朝廷处置，而是直接密奏天子。赵匡胤只是让巡吏放人完事。

王著明白，这个巡吏多半是赵匡胤派出监视自己的密探。陛下您大可放心，您说对了，我一介书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可我对世宗皇帝的忠心，天地可鉴！日月可昭！

王著擦干眼泪，掸掸身上的灰尘，晃晃悠悠，朝着右银台门的斜对面走去。

滋德殿里，赵匡胤躺在床上，想起与郑王离别时的情景。那道外迁的诏书，不仅打碎了王著的幻想，也打破了自己的天真。他曾简单地认为，只要作为皇帝的自己坚持，他与郑王便可同城而居，相安无事，这必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可惜，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对前朝逊帝完全释怀，因为前朝逊帝永远是一面可以号召反对现任皇帝的旗帜。

赵匡胤想起了梁武帝萧衍。宅心仁厚的萧衍在受禅后，曾模仿上古故事，对前朝逊帝萧宝融优崇有加，甚至准备以一郡作为萧宝融的封国。谋臣沈约见此，急忙谏道："古今之事大不相同。曹操曾经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萧衍欣然接受建议，派人秘密杀掉了萧宝融。

"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这句话足以撼动任何帝王的心。就像赵匡胤当年必须篡位一样，现在，又必须处理郑王郭宗训。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帝制时代里，任何接近或站在权力巅峰的人，都无法抗拒这极致的排他性权力对自己的异化与重塑。还是那句话，在中国古代帝制社会的权力结构下，有皇帝的地方，就一定不会劝人行善。

中使忽然来报：王著叩门求见。

深更半夜，他不会是为郑王之事吧？赵匡胤稍事狐疑，还是从御榻上坐起。王著才干卓越，博闻广识，品德高尚，美中不足是对

世宗念念不忘。对于这样的人，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早晚会受朕感化，对朕忠心耿耿。

赵匡胤尽量让自己心平气和。

但王著没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

烛光摇曳中，王著蓬头垢面，衣衫不整，东摇西晃地走进来，嘴里还不忘一直念叨着他的“世宗”。

赵匡胤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王著！朕一次又一次原谅你，你何以厚世宗如此，薄朕如此！

次日一早，怒不可遏的赵匡胤翻出王著醉宿娼家的老账，把他的官衔一撸到底，责授比部员外郎。以御史中丞刘温叟为首的御史们集体躺枪，坐失于弹劾之罪，夺两月俸。

建隆四年（963）二月一日，朝中最后一位大周的忠臣，黯然离开学士院。

金匮之盟

郑王出迁房州，不仅刺激了王著，也刺激了开封府尹赵光义。

如今的赵光义，再也不是二哥赵匡胤和“赵书记”赵普身后的那个小跟班了。

赵匡胤称帝伊始，便对这个小自己一轮的弟弟另眼相看。在宋朝最初的一年半里，赵光义是禁军九大高级统兵官里唯一一位超迁空降的。

在那段时间里，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一直留驻河北，连开封都进不来；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也在平定二李期间外出征战。赵光义因此成为殿前司的实际掌军人，赵匡胤两次亲征，赵光义先后以大内都点检、大内都部署留守皇宫。显然，赵匡胤有意通过亲弟弟赵光义加强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961）闰三月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后，慕容延钊、高怀德、王审琦都已罢落军职，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的职位也已罢废。按照迁转次序，赵光义理应进位殿前都指挥使，从而成为殿前司的最高统兵官。

可是，以宠爱弟弟著称的赵匡胤，却并不希望赵光义在军中的势力过于庞大，他对自己的弟弟甚至也有一丝提防。

一个小细节暴露了赵匡胤的心思。

赵匡胤亲征李筠时，赵光义担任的职务是大内都点检。这是后唐以来，在天子亲征时设置的临时军职。结果赵匡胤出兵之日，“点检做天子”的流言再次满天飞。那时的赵匡胤对战局没有把握，对自己的生死未卜，甚至暗示万一自己战死，就由赵普辅佐赵光义继位。因而，对这样的流言，赵匡胤并不在意。

可是随着皇位的稳固，赵匡胤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他亲征李重进时，赵光义的临时军职已经改称大内都部署。而且赵匡胤后来亲征北汉，依然没有任命过大内都点检。

看来，殿前都点检也好，大内都点检也罢，只要是可能“做天子”的点检，统统都不能存在了。

建隆二年七月十一日，也就是高怀德和王审琦罢落军职两天后，赵光义也被“释兵权”。宋史学者顾宏义认为，“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之所以没有在北宋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留下只言片语，应该与赵光义被罢兵权有直接关系。

不过，赵光义虽然被赵匡胤调离了禁军，但就在同一天，他获得了一项更为劲爆的任命——开封府尹、同平章事。他的弟弟赵光美，也在同一天，由嘉州防御使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关于这次任命，据说与范质有关。此前，范质曾上奏道：“光义、光美的品位还不够优崇，礼遇也有所欠缺。臣乞求陛下对他们一并册封，或列为宰相，或委以藩镇。皇子、皇女即使还在襁褓之中，也应该一并恩赐官职。”赵匡胤颇以为然。

可细品之下，赵光义和赵光美的册封完全不同。山南西道节度使的会府远在兴元府，那是后蜀的地盘。也就是说，赵光美的节镇属于虚领，只代表他的官阶身份而已。赵光义则不同，他在后周时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凭借宗室身份，仅仅一年半就成为大宋的使相，可见他在宋朝地位之特殊。而以宗室尹开封，更隐隐透露出他不平凡的身份。

事情还要从建隆二年六月二日说起。那天，大渐弥留的杜太后急召赵匡胤与枢密副使赵普到滋德殿入见。杜太后面色平静，淡然问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君临天下吗？"

赵匡胤涕泗交颐，哪有心思回答这种问题。杜太后轻抚着爱子的头，说："我自然会衰老而死，哭也没用。不要伤心了，我要和你说说朝廷大事，你就只会哭吗？"

赵匡胤擦了擦满脸的泪水，哽咽道："这都是祖宗和娘积德所致。"

杜太后摇摇头道："瞎说。你能取天下，那是因为周世宗让一个小孩儿坐江山，导致人心不附。如果周有长君，你又怎能坐上皇位？你和光义都是我生的，以后你就传位给光义，这样连你的儿子也会平安。国有长君，这是社稷之福。"

赵匡胤闻言大诧，本已哭得睁不开的泪眼，瞪得好似铜铃。但既是母亲遗命，他不得不从，只好跪地叩首，郑重其事地答着："我一定听从娘的教诲！"

随后，杜太后又把赵普召至榻前，对他交代道："你也记好我说的话，不要违背。"赵普便在床前将杜太后的话写成誓书，并在末尾署名"臣普记"。君臣二人将誓书放入金制的盒子，交给生性严谨的宫人掌管，杜太后这才安心。

这就是后来赵光义继位以后，赵普讲述的"金匮之盟"。

金匮之盟还有另一个版本，认为杜太后的遗言并非让赵匡胤独传赵光义，而是由赵匡胤传至赵光义，再传至他们的弟弟赵光美，

最终传回赵匡胤的次子赵德昭。相对于独传赵光义的“独传约”，这个版本被称为“三传约”。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压根就没有什么金匮之盟，这不过是后来赵光义和赵普为了统治合法性，炮制出来的政治谎言。

金匮之盟的真实情况如何，这里不做考证，因为现有史料根本无法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无论金匮之盟真伪，赵光义在当时都无从得知杜太后的遗嘱。然而，他还是嗅到了自己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的气味，这气味正来自他的新职务——开封府尹。

表面上，开封府尹只是宋朝国都开封府的行政长官。可按照五代惯例，皇帝不立太子，出任首都行政长官的宗室，往往被当作皇位继承人来培养。

在后来的日子中，赵光美与赵匡胤之子赵德昭、赵德芳的官位迁转，始终遵循着光美尊于德昭、德昭尊于德芳的顺序。而赵光义的官职远远尊于光美，完全不在光美、德昭、德芳的迁转序列中。

看来，金匮之盟的传说并非完全无中生有。

符彦卿掌军之争

作为大宋皇帝倚重的皇弟，赵光义与前朝宗室本无瓜葛，却因为当年二哥做主的婚姻，与郑王的姥爷符彦卿绑在了一条船上。

赵光义与符氏伉俪情深，虽多年未有子嗣，然亲于胶漆如故。有件事就很值得一提。雍熙二年（985）三月，也就是符氏去世后十年，高南金参加贡举，为其父高颐请求怜恤。时已为皇帝的赵光义立刻想起，高颐曾为符彦卿的掌书记。当年赵光义赴大名府迎娶符氏时，即由高颐接迎。此事触动了赵光义的亡妻之痛，因而特别厚待高氏父子。人故尚且如此，何况是在甜蜜期。

因此，爱屋及乌，爱老婆的赵光义，自然也把符彦卿当作自己人，不愿看老泰山受半点委屈。

更重要的是，尹京两年，赵光义尝到了权力的甜头。有一个做靠山的二哥固然好，多一个当后台的岳父也不错。所以，一旦“靠山”与“后台”有了摩擦，敏感的赵光义立刻警觉起来。皇帝动了郑王，接下来是不是要动符彦卿？

魏王符彦卿也在嘀咕这个问题。

符彦卿坐在大名府的正堂里，一面百无聊赖地翻着账本，盘算着有多少新钱入账；一面把玩着手中的铜钱，那枚铜钱平滑光亮，揉搓日久，一眼便知。

自从上表效忠后，符彦卿一直很低调。然而，随着二李的灭亡，大宋朝廷在中原的威望日渐高涨。符彦卿觉得，必须让皇帝明白，自己不但忠于朝廷，而且胸无大志。于是，符老爷子突然高调起来，在辖区内滥取民租，中饱私囊，还克扣上缴朝廷的赋税。大名府的帅案上，曾经摆放公牍、兵录的地方，现在却改放了账本。

帝制时代，皇帝确实爱清官廉吏，而且越是基层官员，越要严格要求。但对于权臣虎将，皇帝不怕他们贪，反怕他们不贪。不管你贪财贪色贪虚名，只要不贪权，一切好说。

所以在古代，位高权重的“聪明人”总是想法给自己抹黑。王翦灭楚前，要始皇赏赐美田宅院；萧何做丞相时，曾公开抢夺民田。现在，符彦卿镇大名，要高调敛财。

符彦卿懂赵匡胤，赵匡胤也懂符彦卿。不过，赵匡胤毕竟想长治久安，还需要清官廉吏。你符老头儿身为皇室姻亲，带头敛财，朕若不加以颜色，何以堵天下人之嘴？

建隆二年（961）二月，赵匡胤选拔了几名朝官赴任大名府，专门负责收税事宜，符彦卿当年的私房收入就此落空。赵匡胤在朝官奏回的账册上，勾了几个圈，并对朝官说：“勾圈的这些粮食，全部给符彦卿送去，朕要让他心生愧疚。”

其实这些粮食是赵匡胤因削夺符彦卿的财权，而给予的物质补偿。这次朝官去大名府，表面上在惩治符彦卿的聚敛，实际上却在尝试收夺藩镇的财权。由于符彦卿积极配合，赵匡胤在天雄军很是威风。借着风头，赵匡胤在这年八月平定了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的叛乱，又敲打了在藩镇多行不法的彰信军节度使袁彦。

符彦卿本以为征敛可以就此停止。然而郑王迁房，让他不得不考虑是否要“重操旧敛”。

建隆四年（963）二月三日，距离王著被罢免仅两日，符彦卿主动朝见赵匡胤。

朝会的地点选在广政殿，这里与西宫唯有一墙之隔。墙西阴冷昏暗，墙东却张灯结彩。文武两班按次侍立殿侧，诸班卫士手持斧钺，仪仗威严。赵匡胤正襟危坐，双目如炬，隆重迎接符彦卿的到来。

多年未见，符老爷子已须发尽白，但步伐矫健，身板坚挺，气势仍不输那诸班年轻的天子仪仗。

符彦卿此来，不仅为了表忠心，更想试探一下皇帝对自己的态度。见赵匡胤待自己还算热情，悬着的一颗心稍稍平静，恭恭敬敬跪拜于阶前，双手捧接皇帝亲赐的一套服饰和玉带。

赵匡胤走下御阶，将符彦卿缓缓扶起，握着他的手，笑道：“卿入朝一次不容易，就在京城里多陪陪朕吧。”

热情如此，不仅让符彦卿受宠若惊，也让赵光义喜出望外，更令赵普大吃一惊。因为朝会过后，赵匡胤告诉赵普：“我想让符王来掌管禁军。”

以符彦卿的威望与地位，虚位以待的，便只有上一年石守信刚刚辞去的侍卫都指挥使一职了。

赵普立刻表态：“不行不行，符彦卿名位已盛，不能再让他掌军了。”可任他怎么劝谏，赵匡胤就是不听。

不久，赵匡胤又找来枢密院属员，令其背着赵普，草拟任命符

彦卿执掌禁军的宣。宣，是枢密院用于付授重大命令的文书。按照赵匡胤的要求，枢密院的属员在写好宣后，经皇帝批准，便要交付有司颁布。可没一会儿，枢密使赵普又来了。

“又是为符彦卿的事儿吧？”赵匡胤开门见山。

“啊，不是。”赵普尴尬一笑，汇报完其他事务，他缓缓从袖中取出一张写满黑字的白纸，那正是符彦卿的“任命状”！

这下轮到赵匡胤尴尬了：“这宣怎么在你手里啊？”

废话，我是枢密使，宣要发布，得先有我签字，你说这宣怎么会在我手里？

但赵普不好对皇帝发作，他只好深深一揖，恭敬答道：“臣托词说，此宣的文辞还有待完善，然后便将它扣留了下来。请陛下深思利害，日后别后悔！”

赵匡胤反问：“卿干吗总跟符彦卿过不去？朕待彦卿甚厚，彦卿怎能负朕？”

“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

……

这话是不是很眼熟？当年赵普劝赵匡胤罢去石守信等人兵权，最后的对话也是如此，几乎一模一样。

与石守信等人相比，符彦卿的威望更高，能力更强，还是前朝国戚，赵匡胤对其的控制力也更弱。符彦卿是下一步必须解决的人！石守信等人尚且不能掌兵，符彦卿如何就能执掌？

何况任命符彦卿的宣要由赵普签署，否则发不出去，赵匡胤不会不知。他又如何背着赵普，将宣命颁布出去？

这不由得让人怀疑：赵匡胤让符彦卿掌兵，可能根本就是一场双簧戏。赵匡胤扮红脸，赵普扮白脸。两人倒不一定事先有过商量，但赵匡胤知道，以赵普的脾气，一定会极力反对这件事。

能让赵匡胤动这么大心思去拒绝符彦卿掌军的人，当然不是符彦卿本人，而是他的好弟弟赵光义。

大概是赵光义并不甘心失去军权，特别是成为开封府尹，做起皇帝梦后，他更清楚军权的重要性。于是，赵光义推荐了岳父符彦卿掌兵，赵匡胤不好直接拒绝，只好让赵普出面得罪人。

让赵匡胤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次双簧，埋下了赵光义与赵普几近你死我活的权斗祸根。

建隆四年（963）四月十七日，符彦卿归镇。尽管没有让他掌军，赵匡胤仍对他圣眷隆恩。只是这圣眷并未维持多久。

六月的最后一天，符彦卿迎来四位不速之客。皇帝任命大理寺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祐知魏县，监察御史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

要知道，建隆元年（960）张光翰出为节度使时，天雄军的贝州、博州已经改属永清军。现在的天雄军只有大名府这一个支郡，府中辖有17个县，其中的大名县和元城县又同为会府的附郭县。如今朝廷一下就拿走四个县，削掉了符彦卿四分之一的统治权。

况且，监察御史是名义上的监察官，大理寺正更是握有审判实权的法官，以这样的官员来和节度使抢地盘，朝廷的强硬态度可想而知。派遣四位强干官员去知县事的理由也很充分——符彦卿在天雄军“专恣不法，属邑不治”。既然你治不了，朕来帮你治。

符彦卿真是哭笑不得，明明是韬光养晦之计，却屡屡成为皇帝开刀的理由。圣眷隆恩？这可真是“圣眷隆恩”！

然而，四位知县毕竟是朝廷的高级文官，符彦卿在礼仪上丝毫不敢怠慢。比如知魏县的王祐，每次前来拜谒，符彦卿都会让幕僚臧令图代摆筵席，安排住处，以示自己对知县个人和朝廷的友好。

符彦卿好不容易跟四位知县混熟了，可是谁知过了大半年，为防止节度使与知县关系过密，赵匡胤一纸皇命，四位知县全换人了。一切公关工作，又要从头再来。

新来知永济县的朝官是右赞善大夫周渭，但他对符彦卿的态度，可谓既不赞也不善。周渭去大名府上任时，符彦卿亲自到郊外

迎接，这是极大的礼数。但周渭连马都没下，只是朝符彦卿拱拱手，算是还了礼。随后，周渭在公馆与符彦卿正式相见，却毫无下属初见长官的礼数，对符彦卿完全平礼相待。

主持县政后，周渭更是直接听命于朝廷，根本不把符彦卿放在眼里。当时县里有强盗伤了人，周渭立即派人追捕，然后连同藏匿强盗的同伙一并正法。这么大的案子，他连招呼都不向符彦卿打一个。其蔑视符彦卿的权威如此，符彦卿却一声不吭。

就这样，“符彦卿们”在辖区内的权威逐渐萎缩。随着朝官知县制度的推广，赵匡胤开始将中央的权力渗透到各大藩镇的底层，并在此基础上，派遣朝官知州。北方原后周辖境内的雄藩巨镇，开始被一步步架空。

张琼之死

“巫婆！简直就是一对老巫婆！”殿前司衙署内，殿前都虞候张琼指着两个跪着的军校破口大骂。

两名军校一个叫史珪，一个叫石汉卿，都是殿前司的低级统兵官。史珪出身将家，后周时便追随赵匡胤，很得信任。大宋开国后，他曾多次受命侦察外事，因而得到重用。

石汉卿则为人狡猾，善于揣度圣听。经过一番抽丝剥茧，他确定，主上不信任禁军将领，时刻想掌握他们的动向，而一旦有人心怀不轨，举报者必然加官晋爵。

恰好，史珪最擅长刺探个人作风，二人勾结，整日琢磨打小报告，颇受赵匡胤重视。

在刀枪火海里摸爬滚打的张琼看不下去了，便把二人找来臭骂一通。

史珪与石汉卿怀恨在心，一条毒计涌上心头。

宫中大殿，不见阳光，阴森森的，冰冷的石板上冒着寒雾，煞气逼人。张琼跪在殿中，眉宇间一派不服的倔强，愤怒地盯着一旁的石汉卿。

赵匡胤也很愤怒，只不过怒的是张琼。他厉声责问："张琼，石汉卿说你擅选官马私乘，还收纳李筠的仆人作部下，可有此事？"

张琼默不作声。这事目前看来真假难辨。如若属实，按照《宋刑统》的规定，张琼免不了被贬官甚至蹲大牢。但相比接下来要审讯的罪名，这实在算不上什么。

赵匡胤沉着脸继续问道：他们还说你私养部曲百余人，作威作福，禁军的人都怕你！

赵匡胤从没有这般冷酷地与张琼说过话，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张琼真的私养部曲，那就是威胁国本的大罪，因为私兵是武将坐大势力甚至反叛朝廷的根本。

陛下明鉴！我张琼忠心耿耿，天地可证！我什么时候私养部曲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养没养部曲，去我府上查查自然就清楚了！张琼怒吼着。

石汉卿暗叫不妙，告张琼私养部曲，本来就是投主上所忌，纯属诬告。要是真去张府查，那哪查得出来？好在主上盛怒，还没反应过来。要置张琼于死地，还有一道撒手锏……

石汉卿连连磕头，一面磕一面说：陛下，臣无半点虚言。臣还有一事相报，张琼曾诬陷赵京尹，说赵京尹为殿前都虞候时，做过一些不法的勾当……

什么诬陷！我说的都是实情！不等石汉卿把话说完，张琼抢言道："赵京尹天日之表，恐怕人心早晚会依附他。他现在为开封府尹，肆意妄为，连他的仆役都敢横行霸道！而且，赵京尹广结豪杰，招纳亡命，陛下应早做准备！"

"够了！"赵匡胤拂袖大怒，"朕与光义乃情深手足，共享富贵。你一个粗鄙小人，也敢离间我们兄弟！"

我赵匡胤不是李世民，不是为了皇位不要弟弟的人！赵匡胤越想越气，当即下令：石汉卿，给我往死里打！

石汉卿得了皇命，举起杖棒就往张琼身上抡，直打得张琼鲜血横流，奄奄一息。

怒发冲冠的赵匡胤尚保有一丝理智：就算张琼犯有死罪，也应当由朝廷依律判决。于是，他让石汉卿住手，又命侍卫把张琼拖出去，送往御史台继续审讯。

自己只是说了句实话，主上何必如此动怒？是了，主上护着赵京尹，说到底人家才是一家人……大丈夫固有一死，即使不能马革裹尸，也绝不能辱于狱吏之手！将近明德门，张琼用尽最后的力气，将腰带解下，委托侍卫交给母亲，然后趁着侍卫不注意，一头撞向城墙……

就在血浆飞溅的刹那，他隐隐看见，寿春城下，赵匡胤一脸焦急，将人事不省的自己，抬回后方大营……[1]

张琼很快就被证明是冤枉的。

“人呢？你们说张琼私养部曲一百人，这一百人现在在哪儿！”面对家无余资，只有奴仆三人的张琼府，赵匡胤直眉怒目。

“张琼……张琼所养者……以一敌百……”石汉卿低着头，哆哆嗦嗦，用蚊子大的声音强词夺理。

确实，养没养私兵，搜查一番自然真相大白，犯不着那么急赤白脸地将张琼赐死。

说赵光义几句坏话，也实在罪不至死。后来说他坏话的，也不止张琼一人，也没见谁因此被赵匡胤赐死。

张琼真正的死因，不在于他说了赵光义的坏话，而在于这坏话

[1] 张琼自杀而死，最早见于《太祖实录》的《旧录》，《长编》从之。而《新录》及《国史》则称赵匡胤将他赐死狱中，《宋史》从之。《长编》作者李焘认为，赐死之说，是后来太宗时期由史官“润饰”的结果。

是他说的。

张琼是一个暴躁又没什么城府的粗人，这也是赵匡胤超迁他为殿前都虞候的重要原因。可现在，张琼竟然对赵光义这个准皇储指手画脚起来了。这让赵匡胤颇为警觉。

毕竟，赵匡胤与郭威、郭荣一样，只想让禁军成为为自己看家护院的恶狗。就连赵匡胤自己，都曾经是恶狗之一。只是郭氏父子没有养好，最后把赵匡胤这条恶狗养成了狼。如今，张琼也来干预朝政，这是恶狗要觉醒啊！

从狗变为狼的赵匡胤，决不允许其他的恶狗也变成狼。

尽管张琼指摘赵光义，全出自一片忠诚，但本质上与日后岳飞劝宋高宗立储一样，都为人主忌惮。因此，张琼必须死！

但张琼毕竟救过赵匡胤的命，冷静下来的皇帝念起张琼的好，一时悲从中来。张琼的家人得到抚恤，丧事由朝廷出钱办理。由于其子尚小，于是授予其兄张进为龙捷副指挥使。

至于史珪与石汉卿，如履薄冰地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后，又重新狐假虎威起来。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于是便心安理得地继续到处举报，继续做张琼嘴中的“巫婆”。

在黑夜的掩护下，赵光义暗暗得意：张琼死了，下一步，可以在王继勋身上做文章了。

龙捷军的械斗

王继勋是侍卫马军的龙捷右厢都指挥使、领彭州防御使。能坐到如此高位，并非王继勋战功卓著，只因他有一个好姐姐——大宋国母王皇后。

与史珪、石汉卿一样，王继勋是赵匡胤布在禁军中的另一耳目，比起史珪和石汉卿，王继勋有着更可靠的身份、更高的官职，

唯一缺少的，是更优秀的刺探能力。王继勋长了一张帅脸，却揣着一副赖脾气。自从履职禁军，他几乎就没向赵匡胤提供过有用的情报。王继勋整日仗势欺人，绝大多数的将士都知道他不好惹，早就离他八丈远，自然也没有情报可供他收集。

但也有人敢不买他的账，这就是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汉州防御使马仁瑀。马仁瑀与他的老乡张琼一样，虽然胆大心粗，但是能征善战，所向披靡。他16岁就投靠郭威，是军中的神射手，后来跟随周世宗征战南北，为其倚重。陈桥兵变时，马仁瑀更是重要的拥戴功臣。就这样，马仁瑀靠着真刀真枪与对赵匡胤的忠诚，一步步爬上了现在的位子。他当然看不起靠裙带关系空降而来的王继勋。

马仁瑀是个直性子、暴脾气。他小时候被逼着上学，因为总逃课，被老师用鞭子抽了一顿。谁能想到当天晚上，他就火烧学堂，那位老师仅以身免。

脾气如此，马仁瑀怎容得王继勋吆五喝六。一次，他与王继勋发生争吵，实在气愤不过，抡圆胳膊就要揍王继勋。这王继勋欺软怕硬，自知绣花枕头扛不住实心石头，抱着脑袋逃之夭夭。然而二人的梁子就此结下了。

建隆四年（963）八月，赵匡胤正在筹划伐蜀，特诏三衙率军聚集郊外，讲武阅兵。可王继勋和马仁瑀竟然都在私下里命令本部将士去买大木棍，准备利用阅兵的时机调动人马，干场大仗。幸好赵匡胤及时获得消息，立即取消了阅兵。否则，大宋京师里一半的精锐骑兵跑到郊外去参与群殴，后果不堪设想。

两天，张琼死了才两天！禁军又出事了！朕从编练殿前军到现在，什么时候出过这么大的事！张琼、王继勋掌军也有些年月了，怎么碰巧全在这两天出事！

赵匡胤怒不可遏，他仔细回想最近发生的事，很快想到军中这一切的不太平，都是从年初符彦卿入朝掌军失败开始的。

张琼救过朕的命，禁军里无人不知。史珪、石汉卿不过两个跳

梁小丑，如果不是有人指使，给他俩一百个胆子，他俩也绝不敢诬陷张琼，且置张琼于死地。

王继勋是朕的小舅子，虽然跋扈了点，但毕竟是国戚。马仁瑀功劳再高，脾气再暴，胆量再大，充其量不过去找王继勋打一架。谁给他的胆子，竟然想乘着阅兵时调动军队之机，拉着精锐马军去械斗？

“赵京尹天日之表，恐怕人心早晚会依附他。他现在仅是开封府尹，就肆意妄为，连他的仆役都敢横行霸道！”

张琼的那句话，在赵匡胤的脑海里掷地有声。光义与符彦卿是一家人，推举符彦卿掌军不得，光义必然心有所怨……另外，光义对禁军如此热衷，难道是开始为继承皇位布局了？想到这里，赵匡胤只觉得有一张漆黑的大网，在漫无止境的黑夜里，正朝自己撒来……

难道真的是光义？他还是个孩子啊……

赵光义当然不是孩子，再过两个月，他就年满25岁了。赵匡胤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史珪、石汉卿、马仁瑀的所作所为，均已超出他们个人正常的举动范畴。如果没有后台，他们怎敢如此胡来？

数十年后，当赵光义成为宋太宗，除石汉卿早死外，史珪以太祖朝被贬官员而被太宗召回重用，马仁瑀虽是太祖亲信旧将却没有像其他将领那样受到太宗猜忌。史家如蒋复璁、何冠环先生皆怀疑，二人其实早就投靠了赵光义。

还是先回到建隆四年（963）的开封府。此刻，开封府尹兼同平章事赵光义正立于书案前，优哉游哉地写着小草。落毫处，笔笔飞丝萦带，圆转如圜；却又字字独立，毫无牵连。

小草是一种很有趣的书法，它看似端庄优雅，纯留隶法；实则单字相带，上下相应。后来终于连绵纵逸，成于大草，一发不可收拾。

赵光义仔细看了看自己的杰作，摇摇头，放下了笔。

眼看着皇帝二哥与赵书记唱双簧，让符彦卿掌军的计划泡了汤，赵光义又气又无奈。既然直接掌军不成，推荐岳父掌军还是不成，那就只有让掌军的人来主动投靠自己了。张琼对皇帝忠心耿耿，又对自己指手画脚，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留着；王继勋作为国戚，在军中飞扬跋扈，也不是赵光义能掌控得了的。

想到王继勋，赵光义的手突然一抖，笔下的字也倒了下去。

龙捷军械斗，可以打王继勋一个措手不及，但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不但王继勋毫发无损，马仁瑀还被调离禁军，出为密州防御使。看来，皇帝是铁了心要让自己的外戚来掌军。

不过，马仁瑀并没有因为背了组织械斗的黑锅而被严惩。看来，通过械斗事件，赵匡胤已经了解到军中对王继勋的不满，为了防止进一步激化军中矛盾，也只能将马仁瑀外放了事。

既然有人出来挑头与王继勋对着干，就不怕越来越多的人公开抵制王继勋。到了那时，皇帝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将王继勋调离禁军，赵大京尹自然便有机可乘；要么让王继勋继续留在军中，那么不满王继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地聚集到赵大京尹身边。

无论如何，赵光义都有取胜的机会，现在需要的，只是默默等待机会的降临。[1]

[1] 关于赵光义在符彦卿、张琼、马仁瑀三个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史书没有明言。事实上，屡经修撰的宋朝史书也不会明言。宋初高层党争，既有太祖、太宗、赵普之间的争斗，也有赵普与李处耘、陶穀与窦仪等的博弈。

二、台前的相公

李处耘贬出东京

脆玉玎玲，金石珑璁。赵匡胤腰间的挂饰，正随着他踱步的节奏，清脆击触。

皇帝身后的御案上，摊放着两份奏章。一份来自山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慕容延钊，弹劾李处耘“近臣护军，临事专断，不顾群议”；一份来自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湖南道行营前军兵马都监李处耘，状告慕容延钊不束将士，纵兵凶恣。赵匡胤很为难。一个是金兰宿将，一个是荆玉谋臣，金玉相击，其声如铿。真是坑死朕了！

事情还要从南征荆湖说起。李处耘以监军身份，与慕容延钊会合。他去街头买饼果腹，却发现商人哄抬物价，对军士高价卖饼。疾恶如仇的李处耘当即将饼贩收押，最后把抬价最高的两人送交慕容延钊处置。

没想到慕容延钊的反应是：怒！不受理！李处耘再送，慕容延钊依旧怒不受理。再送，依旧怒不受理。

慕容延钊的反应实在有违常理。按理说，饼贩高价售饼，受损的是慕容延钊的军队，李处耘收押饼贩，使饼的价格回归，慕容延钊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要发怒呢？

因为饼贩高价卖饼，损失的是朝廷的钱。可要是饼子的价格回归正常了，那损失的就是慕容延钊的钱了。从慕容延钊的反应来看，他一定没少拿回扣。

李处耘自然也想到了其中的缘由，作为监军，整肃军纪自然是他的职责。但慕容延钊是皇帝敬重的统兵大将，李处耘也不能太打慕容延钊的脸。于是，杀鸡儆猴，将那两个抬价最高的饼贩就地正法。

作为兵马都监，李处耘已经给慕容延钊留了颜面。可对慕容延钊而言，初来乍到的强龙，就敢在地头蛇的头上闹事，慕容延钊很不高兴。

宋军拿下荆南后，慕容延钊的小校司义，仗势强占荆州客将王氏的宅子，还借酒行凶。王氏很聪明，知道找主帅慕容延钊告状，只能越告越黑，于是转个弯，拐进了都监的府门。

和赵匡胤一样，李处耘也因亲身经历而对军人劫掠深恶痛绝。早年平定李重进后，扬州残破，赵匡胤特命李处耘权知扬州。李处耘勤于抚绥，轻徭薄赋，扬州迅速安定，以至他升任枢密副使离开时，扬州老百姓夹道痛哭，使他累日不能离去。这也正是赵匡胤起用李处耘监军的深意，他希望慕容延钊主导军事征伐，李处耘代自己约束将士，避免大宋人主荆湖时，重蹈南唐的覆辙。

所以李处耘接到投诉后，立刻把司义召来。和上次一样，碍于慕容延钊的面子，李处耘的惩戒措施仍然有所保留，也只是将司义痛斥了一番。可司义却怀恨在心，跑到慕容延钊面前搬弄是非。慕容延钊更不快了。

宋军攻占朗州后，屯驻白湖。李处耘出门巡视，远远望见一个军士，一头钻进民舍。李处耘顿感不妙，连忙朝民舍跑去。果不其然，民舍里传出呼救声。

李处耘来不及多想，一脚踹开房门，冲进民舍。待把大刀架上军士的脖子后，他才发现这人竟然是慕容延钊的马夫。

马夫一见是监军，脸色吓得煞白！慕容延钊闻讯匆忙赶到，只觉脸上火辣辣的，恼羞成怒，当即拔刀砍了马夫。于是，两人的梁子越结越深。

未经允许，就敢杀了饼贩，就敢训斥军校，如此专断横行，这也太不把我慕容延钊放在眼里了！皇帝当年好歹也叫我一声大哥，你李处耘又是个什么东西？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撒野！

怒不可遏的慕容延钊上奏弹劾李处耘，可李处耘却理直气壮。

既然是兵马都监，整肃军纪本来就是我李处耘的职责所在。何况你慕容延钊屡次犯法，我看在皇帝的面子上，一再为你保留颜面。你还参我？那我们就让陛下看看，到底是谁更有理！

于是，赵匡胤便收到了前面提到的两份奏章，这确实让他犯难了。支持慕容延钊，处置李处耘，无异于告诉以后的兵马都监，不要得罪主帅；可支持李处耘，处置前任殿前都点检，那些和自己杯酒释兵权的兄弟们又会如何想？

其实，造成今天这种两难局面的，正是赵匡胤自己。在出征前，赵匡胤并没有申明主帅与监军的权责。在他看来，这是宋朝第一次没有皇帝亲临的大规模征战，权责越模糊，主帅与监军之间就越方便互相牵制，自己与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就越容易。慕容延钊与李处耘的纷争，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正是他想看到的吗？

想来想去，慕容延钊毕竟影响力太大，而且年事已高，又带病出征。而李处耘，不过是天子陪臣。为了安抚那些交出兵权的大将，赵匡胤还是决定忍痛割爱，暂时委屈一下李处耘。

帝王心术终究还是战胜了律法与道理，赵匡胤很快便会在宋朝的下一次出征中自食其果。

建隆四年（963）九月十八日，李处耘被贬为淄州刺史，连其子李继隆荫补的供奉官也被一并革去。诏令上说，因为他从战有功，所以对他从宽处理，贬为刺史，以示优恩。原来贬官还是“皇恩浩荡”。

当然，李处耘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举办吃人宴会，导致宋军形象大坏、湖南守军火烧澧州，这也一定是他“临事专断，不顾群议”的罪状之一。

“吃人”这个事确实有悖人伦，但在当时又时常被拿来作为威慑手段。比如那个造反的张文表，兵败后就做了湖南庆功宴上的菜品；还有那个找王溥勒索钱财的王彦昇，后来担任原州防御使镇守边区，也曾吃了数百个党项人的耳朵，吓得党项人不敢袭扰作乱，而王彦昇最后居然也寿终正寝，没受到任何惩罚。

因此，李处耘这个事，在当时可大可小。不想治他的罪，这事就是征讨有功；想治他的罪，这事便成了罪不容诛，那么贬官刺史，确实就成了法外容情、皇恩浩荡了。

将李处耘贬官的决定，出自朝议。慕容延钊远在荆湖，通信全靠白纸黑字，显然对朝议的影响有限。那么，究竟是谁，抓住了李处耘的小辫子，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呢？

赵普，与李处耘同为皇帝左膀右臂的赵普。

赵普走上前台

乾德元年（963）闰十二月，慕容延钊去世。朝廷赠官中书令，追封河南郡王。据说赵匡胤闻延钊死讯泪涌不止，自言不知为何会如此悲哀。

慕容延钊虽死，但在赵普的主导下，李处耘翻案仍然遥遥无期。

如今，在朝廷的中枢，再也没有一个与赵普势均力敌的人。

乾德二年（964）正月十一日，连续辞了四年职的三大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终于得到批准。两天后，赵普升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正式入主政事堂。

在正式任命赵普出任宰相前，赵匡胤私下对他说：“你即使做了宰相，见到前任宰相，也要让一让他们。”

赵普却慨然道：“陛下初创帝业，以臣为相，正是为了威压四

方。臣见了前任宰相，班位必须在他们之上，这件事不容更改。”

周是周，宋是宋。既然后周故相已经罢免，何须在礼仪上再高过大宋宰相一头？你我君臣，再不用遮遮掩掩，是时候放手一搏了！

赵普霸气侧漏，赵匡胤精神抖擞。得相如此，君复何忧？

可是任命赵普为相的制书刚刚写好，赵匡胤就忧愁了。

按照制度规定，拜相制书由翰林学士撰写。在制书宣读后，需要由宰相再签署一份敕牒，制书才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各级官府才能够奉诏执行。可是范质、王溥、魏仁浦已经罢相，赵普在获得敕牒前又无法走马上任，一时之间，竟然没有宰相来为宰相签署任命状。

这都是什么破规矩？赵匡胤漫不经心地说：“你只管呈进敕牒，朕给你签字，怎么样？”

这个建议确实不怎么样。制度是秩序的保障，要重建社会秩序，制度程序怎能轻率变更？赵普回答说：“这是宰相的职责，不是帝王该做的事。”

可赵匡胤实在想不出办法，于是，资深“顾问”翰林学士承旨陶穀、翰林学士窦仪被急召资福殿，皇帝让他们拿出个有理有据的办法来。

作为皇帝机要秘书和高级顾问的翰林学士，某种意义上是当作未来宰相培养的。在众多翰林学士中，资历最久者称为翰林学士承旨，有学士院长之称。

素以博通自负，一心想宣麻拜相的陶穀，当然不会放过卖弄学问的机会。

陶穀利用自己首席学士的身份，抢在窦仪开口前答道：“臣以为，自古以来，宰相之位从未空虚。只有唐朝大和年间，甘露之变后，数日之内没有宰相。当时是由尚书左仆射令狐楚等人奉行制书。现在的左右仆射也是尚书省长官，可以在敕牒上署名。”

陶穀自鸣得意，没想到窦仪却在皱眉，他启奏道：“臣以为，陶穀所陈，不是承平之日的典章法度，不足援引。”

陶穀所说的典故，窦仪再熟悉不过。唐朝中后期，宦官掌管禁军，干涉朝政。大和年间，唐文宗用宰相李训之策，谋诛宦官，不料为宦官所觉。宦官遂发兵滥杀朝臣，血淹皇宫，史称“甘露之变”。由于宰相在变乱中全部被杀，才出现了辅臣虚位的情况。

哗众取宠，自取其辱。赵匡胤轻蔑地瞥了陶穀一眼，陶穀哑然失色。

自王著罢职，赵匡胤始终找不到接替他的人选。时任宰相的范质推荐窦仪，但窦仪曾以翰林学士升任端明殿学士，本官也已至兵部尚书之阶，再任翰林学士，形同贬官。可赵匡胤认为，“禁中非此人不可”，于是让范质为窦仪做好思想工作，再度命窦仪担任翰林学士。

事实证明，赵匡胤的禁中确实“非此人不可”。

此刻，窦仪端执笏板，正襟持立，威仪不减当年，他说道：“现在皇弟身兼开封府尹、同平章事，这正是宰相之任。”

好！好！好！赵匡胤大喜。这个书生窦仪，关键时刻总能不失朕望。

赵光义的同平章事，虽然只是使相虚衔，但名义上也是宰相。而且，自唐末以来，拜除宰相的敕牒上，也确实常常署上使相的名字。更重要者，赵普为相，光义署敕，这多少在面子上缓和了二人的矛盾。百废待兴之际，赵匡胤不想让两大股肱闹得太僵。

窦仪的提议，既符合制度，又有政治深意，深得帝心。如此人才，赵匡胤对他甚至有几分宰相的期许。

而深失帝意的陶穀，对窦仪越发仇视。窦仪不仅是他未来宰相之路的有力对手，还在眼下的学士院里动摇了他的权威。怎样将窦仪赶出学士院呢？以自己的力量，恐怕够呛。倒是这位赵相公，似乎可以“同舟共济”。

赵普虽然身居宰相，可肚子里却撑不起船。当初赵普身份卑微，得罪他的人不少。一朝拜相，便想以牙还牙。赵匡胤及时制止道："不可！要是世人都能一眼认出谁是天子宰相，那还不都去寻了。"

赵匡胤胸襟宽广，赵普小肚鸡肠。所以陶穀料定，胸襟宽广的赵匡胤对窦仪越尊崇，小肚鸡肠的赵普就越不快，只要抱住赵普的大腿，窦仪就别想爬到自己头上。

陶承旨归心，赵相公当然欢迎。不过，赵普现在对窦仪的事并不上心，眼下他在想方设法找赵光义的晦气。去年赵光义三番五次地挑衅，令赵普大为恼火。他决心替皇帝好好教训教训这个皇弟。在陶穀一党中，屯田员外郎、知制诰高锡的出现，让赵普眼前一亮。

这个高锡，正是批评过周世宗事必躬亲的那个人。入宋以后，高锡曾让弟弟高铣参加进士科的贡举考试，并暗中找到开封府推官石熙载，希望能走走后门。可是高铣的文章太差，石熙载不允。从此，高锡深恨石熙载。

有了赵普的暗中支持，高锡整天在赵匡胤面前揭发石熙载的黑历史，赵匡胤也终于开始对石熙载产生怀疑。作为开封府的主要幕僚，如果石熙载如此不堪，那就不仅坑害了弟弟，更坑害了朝廷。

于是，赵匡胤对赵光义说："我当为你选拔人才，以代替石熙载。"赵光义早有准备，回复道："熙载为官谨慎勤奋，这一定是高锡造谣中伤。"

大抵赵光义又据理争辩，赵匡胤终于恍然大悟。他悟的不是高锡诬陷石熙载，而是高锡背后有赵普。这年五月，高锡被派往青州办事，旋即因私受节度使郭崇贿赂、途中为非作歹、委托刺史向僧人索求紫衣等罪名，贬为莱州司马。

有鉴于陶穀、高锡辈实在上不了台面，赵光义这一次毫发无损。但甫一上台，赵普便咄咄逼人。这不仅打了赵光义一个措手不及，更让身处淄州的李处耘倍感压力。

翻案无望

乾德二年（964）四月，天气渐热。江汉平原水雾遮天，闷如蒸笼。兵部侍郎、知江陵府吕余庆刚刚离开闷热难耐的荆北，初回北方，凉风清爽，人也不由得精神起来。

自入宋以来，吕余庆先后充端明殿学士、知开封府；荆湖平定，转知潭州、江陵府等要地，参与湖南改革，深得皇帝信任。

此次入朝，吕余庆将出任一个新官职——参知政事（简称“参政”）。目前，这个官职尚等同于宰相助理，或者说，赵普的助理。

赵匡胤一反隋唐以来“群相”的传统，以赵普为独相，也就是除了赵普，再没有同时任命其他宰相。但考虑到政务繁多，怕赵普一人忙不过来，便为他设立了两名助理——参知政事。新官职的名称是陶穀起的，据他称，唐朝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位在宰相之下。陶穀其实是冠履倒易，因为唐朝时，参知政事与同平章事都是宰相的加官，而且参知政事高于同平章事。

后周末年，吕余庆在赵匡胤的霸府里，一直居于随府幕僚之首，可如今，却要给赵普作助理，这未免难堪。而与吕余庆同为参政的薛居正，根本就不是幕府旧人。若是换作赵普来做参知政事，早就气得一蹦三丈高了。

好在吕余庆不是赵普。赵普干练，他自愿让贤；薛居正资高，他敬重有加。赵普像一坛酒，泼辣刚烈；吕余庆却是一盏茶，温醇甘润。

赵匡胤爱喝酒，但有时更需要茶。比如想起李处耘时。吕余庆从荆湖返京，赵匡胤最关心的不是前方的改革情况，而是李处耘与慕容延钊相争的真相。

吕余庆不偏不倚，据理力辩。

在外人看来，赵普与李处耘一文一武，辅佐赵匡胤。李处耘又曾是赵普的副手，没得罪过他。就算二人关系不甚亲密，至少也应融洽，何至闹到水火不容？

顶着压力为李处耘说实话的吕余庆，起初也不太明白，直到他入职中书门下，一切疑惑才迎刃而解。

政事堂内，万马齐喑，除了指点江山的赵普，人人缄口不言，噤若寒蝉。吕余庆与薛居正一样，只按规定，做好分内之事，不敢越雷池半步。

他们从不宣读诏命（宣制），不在朝会领班（押班），不用宰相之印（知印），甚至办公地点也不在政事堂，而是搬到了宣徽使厅。每次朝见皇帝，他俩皆站在赵普身后，敕令署名时也比赵普的名字低了数行，俸禄也只是赵普的一半。

赵匡胤独尊赵普，赵普也乐得独享。但若李处耘在，赵普的荣耀就只能与他分享。

赵普为人耿直无畏，责任感强，对后辈人才的提携更是不遗余力。但一切提携都有前提：必须是后辈。若是有人威胁了他的地位，他脸翻得比书还快。

满腹韬略的李处耘，正是他的心腹之患。

平定荆湖，李处耘居功甚伟，一旦回朝，必然升任枢密使，那么赵普就必须与李处耘分享权力。一个赵光义已经够头疼了，但他毕竟只是开封府尹，不能直接把手伸进中枢。倘若李处耘回到朝廷，待他战功卓著而天下太平时，会不会也宣麻拜相，甚至取代自己？

淄州郊外，一马平川。这里距东京八百里，远离是非，不见硝烟。李处耘背挎长弓，驾马奔驰，像一只刚放出笼的飞鸟，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谪居淄州已大半年，他从未有只字辩护之言。李处耘一直在等，静静地等。

直到他听说慕容延钊已死，听说吕余庆入朝，听说高锡被贬。

慕容延钊已死，李处耘被贬官的最大动机便不复存在。吕余庆入朝，朝中便有人为李处耘说话。高锡被贬，说明皇帝没有完全被赵普左右，赵光义也没有遭到打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要东山再起，李处耘需要赵光义的帮助。

但赵普仍然自信，李处耘一时半会儿根本回不来。建隆四年（963）十一月，赵匡胤改年号乾德。第二年正月，赵普便得拜相。在建隆的四年里，赵匡胤平定了二李之乱，拉拢了前朝旧臣，解除了元勋兵权，攻灭了荆南湖南，开启了集权改革。种种迹象表明，赵匡胤的皇位已经坐稳，以稳定时局为特征的建隆初政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他必然要放开手脚，实现削藩三策、天下一统。在这个过程中，出身行伍的赵匡胤，可以没有李处耘为战争运筹帷幄，却不能缺少赵普来经国济世。

赵普心里清楚，只要自己坚决反对，赵匡胤就一定不会召李处耘还朝。因为皇帝已经离不开他赵普了。

顺带一提的是，乾德二年（964）九月二十八日，太子太傅、鲁国公范质病逝。赵匡胤闻讯，哀叹惋惜，册命赠官中书令。

范质一生清廉节俭，奉公职守，被赵匡胤称为“真宰相”，可在他心里，永远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范质临终前，告诫儿子范旻：不要向朝廷申请为我加谥号，也不要给我刻墓碑。因为无论是溢美之词还是不讳之语，范质都承受不起。

伴随着范质的罢相与去世，宋初笼络周臣的政策至此告一段落。后周三大宰相让位霸府幕僚，曾经提醒世宗、范质提防赵匡胤的杨徽之、郑起也被贬为县令，赵匡胤甚至一度对杨徽之起了杀心。

那层虚伪的窗户纸，终于被赵匡胤亲手捅破了。

本官与差遣

宋代的官名既多且怪，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些官职的作用，有必要对北宋前期，特别是宋初的官制做一个系统的介绍。

隋唐时期曾确立了三省六部的中央行政体制，但由于皇帝加强皇权的需求，以及三省六部制自身的缺陷，自唐朝中期，这个体制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到宋朝前期更是面目全非。宋朝初年，由省、部、寺、监等行政部门构成的三省六部体系虽仍然存在，但绝大部分已经形同虚设，其所属官员更是几乎无事可做。因为，在三省六部之外，另一套握有实权的行政体系正在替代它来维持朝廷的运转。

北宋前期，中央最高国务机构为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前面我们提到过，中书门下是宰相的办公机构，下设办事机构制敕院，包括孔目房、吏房、户房、兵礼房、刑房等正五房，以及生事、勾销二房。

宰相的官职，最高为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其次为门下省长官侍中，再次为以门下省副长官门下侍郎、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般简称为“同平章事”或“平章事”。如果担任同平章事的宰相有家讳，比如父亲的名字里带个“章”字，那么就改称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是正二品）。

中书门下的官署俗称政事堂，门口的匾额上写着“中书”二字。因此，时人往往将“中书门下”简称为“中书”。当时的朝廷机构中仍然设有中书省，因此作为中书门下简称的“中书”，与中书省完全是两个概念。

五代时期的中书门下，本来已经大权旁落，朝廷的决策大权掌

握在枢密院手里。但随着李处耘罢免出京、赵普入主中书，枢密院的权力空前衰落。赵匡胤借着赵普拜相的机会，不动声色地将枢密使的决策大权归还给宰相，使中书门下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国务机构，既完成了五代后期削弱枢密院的努力，又重新规范了朝廷机构的权力。

但枢密院的军事权力却被保留下来，作为长官的枢密使仍然参与军事决策。枢密院还专掌兵符、武官的选拔除授、兵防边备和军队屯戍的政令，与中书门下合称“二府”或“两府”。因中书门下位于东，枢密院位于西，故两府分别称东府和西府；又以执掌的区别，分别称为政府和枢府。后来，作为宰相助理的参知政事被升为副宰相，与枢密院的正副长官合称“执政”，执政与宰相又合称“宰执”。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宋朝的二府体制。

与枢密院有关的一个部门是宣徽院，总领供奉官事务，为宫廷机构。长官分别是宣徽南院使和宣徽北院使，两使执掌相同，但南院使地位高于北院使。两使位尊而职闲，实际上成为通往枢密院权力的跳板。只要熬到这个位置，距离枢密副使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除了二府，当时朝廷最主要的部门还有负责财政的三司，负责监察的御史台，负责司法的大理寺和尚书省刑部，负责军事的三衙与武德司等，各个机构各司其事。

宋朝实行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官制，除此之外，还有一堆各种名目的官阶、封爵。这是中国历史上官制最为复杂的时代。

直接关系到宋朝官员迁官涨薪的是文武阶，其中文阶分为京朝官和选人阶官两种。京朝官又分为朝官和京官两种。

朝官又称升朝官，是在常朝（皇帝在“正衙”接受有上朝资格的文武百官朝拜的一种仪式）时可以觐见皇帝的高级文官，而非“朝廷任职官员”；京官则不参加常朝，而非“在京任职官员”。

在北宋前期，被真正叫作“官”的正是这种京朝官，又称本官、正官、本官阶，主要用来记录官员的级别、资历、俸禄，因此

又被称为寄禄官。在三省六部体制下，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那些掌有实权的仆射、尚书、侍郎、卿、监、大夫，甚至是两周秦汉时期贵为宰相的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如今都成了没有多少实际权力的本官阶。宋朝建立时，赵普曾任的右谏议大夫就是本官阶。

京朝官以下的低级官阶为幕职州县官。幕职官是藩镇州府辟署的幕府职事，比如赵匡胤的太爷爷赵珽所任的“从事”、赵普担任的节度掌书记，都属于幕职官。州县官是州县的僚佐。只是到了宋初，幕职官与州县官已经趋同，于是被统称为幕职州县官。赵匡胤后来收夺了藩镇的人事权，这些幕职州县官的任免、考核权力由一个叫“吏部流内铨”的中央部门管理。这些幕职州县官既有实际工作，又作为低级阶官来用。

随着宋朝历史的发展，京朝官和幕职州县官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京朝官才被视为真正的官，而幕职州县官只是候选官——选人，后来干脆就被称为“选人”，位卑而人众，在做满一定任期后，需要经过五名官员的推荐，才能升级为京官。而只有进入京官序列，仕途才能通达，待遇才会显著提高。这与唐代视藩镇幕僚为显途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的是宋代的高度集权。

除京朝官和幕职州县官（选人）外，武官、内侍宦官，乃至掌握专业技术的医官和天文官，都有自己的阶官体系。不过，宋朝初年，它们还并不完善。如后来用于武阶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在赵匡胤统治时期仍然具有职权，还处于向阶官过渡的阶段。

既然原有的官职都用于寄禄了，那么各部门的事务又该交给谁做呢？

宋初，掌握实权的官职有两种：一种是职事官，顾名思义，就是有职责可担当、有事情可做的官；另一种是差遣，而许多职事官又是从差遣转变而来的。这个制度称为使职差遣制。

这种临时性质的差遣始于唐朝，最初往往称为“某某使”。安

史之乱后，使职设立越来越多，原有的机构被架空，原有的官职沦为寄禄之用，逐渐形成了中书门下直接领导诸使的行政体制。

名义上，差遣仍然是临时委任的职务名，常常带有“判”“知”“勾当”“管勾”“权”“直”“提举”“提点”“提辖”“签书”“监”等限定词。比如在湖南改革中被派出担任权知潭州的户部侍郎吕余庆，户部侍郎就是他的本官，表示他的官资和俸禄，并不代表他是户部的副长官，更不代表他在户部掌管财政事务；差遣“知潭州”才是他的实际职务。

北宋前期这套极其复杂的行政体制和官制，继承自唐朝中期，是对之前一两百年间的行政机构和官制的规范化。它不仅彰显了那个年代对官员不同身份、待遇的区别对待与重视，更突出表达了人们对于为官资历的高度尊崇。

但是，由于机构层搭叠架，官职名不副实，这套体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所以到了元丰五年（1082），宋神宗对此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在削弱宰相权力、保留枢密院的前提下，重建了新型的三省六部制度，并对原来混乱的官名重新厘定。

三、反击的官家

禁军再起风波

建隆、乾德之际，大宋的朝堂争斗不休，一会儿是王著闯宫哭世宗，一会儿是符彦卿掌军之争、张琼之死、龙捷军械斗，一会儿又是慕容延钊与李处耘互相弹劾、高锡攻讦石熙载。中书、枢密院、学士院、开封府、两司三衙，大宋朝最核心的几大机构，几乎

没一个消停的，简直是按下个葫芦浮起个瓢，把赵匡胤折腾得焦头烂额。

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四日，赵匡胤好不容易偷得半分闲暇，正在宫中听琴诵经，这是王皇后生前的两大爱好。两年前，王皇后病逝，自此琴声乍断，舞曲凋残，唯余伊人旧影，时萦梦畔。

不思量，自难忘。

这个清晨，赵匡胤特别思念王氏。他翻开佛卷，像王氏生前那样诵读经文。他又命宫人拨动琴弦，万岁殿里响起她生前最爱的曲子……

突然一份奏报，打断了赵匡胤美好的回忆。

雄武卒强抢民女，城里乱套了！

雄武卒！唉！这个王继勋！

赵匡胤如梦初醒，怒气冲冲地迈出了殿门。

这支在九月份新编练的军队，步军番号雄武，马军番号骁雄，分别隶属侍卫步军和马军，而侍卫步军的实际负责人，正是那个扶不起来的王继勋。

当时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已随军出征后蜀，王继勋因此摇身一变，从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升至虎捷左右厢都虞候、权侍卫步军司事，武阶也从彭州防御使晋升保宁军节度观察留后，暂时接管步军司事务。

赵匡胤对雄武卒非常看重，特别表示了关怀："继勋啊，你看这批新招募的士兵，有些还很年轻，没老婆给热炕头。你去打听打听，有没有哪家姑娘，愿意嫁给我这些壮小伙儿。也不用下聘礼备嫁妆，有酒有肉就行。"然后，"天才"王继勋就放任新兵到民宅里抢媳妇儿去了……

赵匡胤已经气得连气都生不起来了。

抢媳妇儿的百余名雄武卒就这样因罪被砍了脑袋。当兵才两个多月，甚至连敌人都没见过，就做了二百五上司的替死鬼。

赵匡胤既要维护军法，又狠不下心去处置这个二百五小舅子。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禁军有隙可乘，一股阴风顺着门缝，又溜进了三衙。

乾德四年（966）三月十日，殿前司的副长官、殿前都虞候杨义突然变成了哑巴。这位既没多大军功，也没救过皇帝的杨义，接替张琼不过两年半的时间，怎么说哑就哑了？

有人说，杨义遭人暗算了。也有人说，暗算杨义的就是他自己——为了避免重蹈张琼的覆辙，他在装哑。

这可不是空口无凭。后来在太宗朝，杨义在临死前一日，竟突然会说话了！

不管杨义真哑装哑，此刻他确实是不说话了。幸好杨义有个名叫田玉的家奴，能够看懂他的手语，将他的心思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完全不影响日常工作。

而赵匡胤也没有歧视“身残志坚”的杨义，在赐给杨义两百万心灵损失费后，让他安心照样开他的哑巴衙门。

杨义这边刚安抚好，状告王继勋的诉状又被他的部下递了上来。大概这次王继勋闹得实在不像话，赵匡胤也不得不把他交给中书审讯，结果证据确凿。其实哪用得着审，王继勋的恶行随手一抓就是一大把。

当时西蜀正在闹叛乱，朝廷自然不能再乱。为了让禁军早点稳定下来，赵匡胤痛下决心，罢了这个惹祸精的军职，改为彰国军节度观察留后。步军司的军权，暂时交给了老舅舅、左金吾卫大将军杜审琼。

禁军多事，看来不是好兆头。

冯瓒案背后的政治角力

乾德四年（966）八月中秋，日渐清凉。上罢早朝，赵匡胤回到讲武殿批阅奏章。忽听得一阵闷雷般的鼓声传来，急促激越，与这神清气爽的季节毫不相映。

一向肃穆静谧的皇宫，顿时紧张起来。各司官员探头探脑，连皇城外的开封府衙门都被惊动了，开封府尹、兼中书令赵光义急命属下到皇城里打探消息。

只有一个人不慌不忙——宰相赵普。

至晚在晋朝时，朝廷就有了登闻鼓。这是一面置于宫门外的大鼓，无论官民，皆可敲击。宋朝规定，凡是上诉申冤的、举报不法的、议论政事的、集体请愿的，甚至是毛遂自荐的，都可以擂鼓而鸣。宋朝还首次设立鼓司（后改称登闻鼓院），作为受状机构。鼓司若认为诉状应当受理，便会转交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登闻鼓响起，必是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问题，因此备受朝廷重视。

赵普之所以波澜不惊，是因为敲鼓之人是他的亲信。被告乃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权知梓州冯瓒，敲鼓之人状告他与梓州兵马都监、绫锦副使李美，以及梓州通判、殿中侍御史李樾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冯瓒风神俊爽，善论国事，办事干练，且不乏正义感，被赵匡胤称为“当世罕有”的“真奇士”。宋朝初年，他拜左谏议大夫，出知舒州。当时舒州境内水产丰富，百姓采捕以为生计。结果防御使司超对水产征税，老百姓怨声载道。冯瓒将此事上奏赵匡胤，并说这是与民夺利，应该废止。赵匡胤不仅批准了冯瓒的请命，还对他印象颇佳。建隆四年（963），冯瓒改知庐州。后来，他又被征辟还朝，以左谏议大夫的本官充枢密直学士。

去年（965）二月，西蜀动乱，群盗蜂拥迭起。赵匡胤为了稳定局面，派了一批文官权知府州，冯瓒即为其一。据《宋史》记载，这是赵普的主意。因为冯瓒才干出众，遭到赵普的忌恨。因而，赵普向赵匡胤推荐他出知动荡不安的梓州，隐隐有借“盗”杀人之意。

然而，同时到西蜀知州的还有赵逢，他追随陶穀党附赵普，难道赵普也要借“盗”杀他？

因此，赵匡胤命冯瓒出知梓州，实为重用。冯瓒也确实没令皇帝失望，甫一进州，就以三百骑兵，连逐带诈，击退了三千乱民，稳住梓州局势。其办事干净利索如此。

然而，就在冯瓒为自己的业绩扬扬得意时，却没发现，身边有双眼睛，始终在紧盯他的一举一动。此人乃是赵普的亲信，受赵普之命，化作奴仆，混迹在冯瓒身边，专门收集他的不法证据。

因为在赵普看来，冯瓒站错了队。

如今的朝臣，无外乎分为三派。一派依附宰相赵普，打击异己，比如陶穀、赵逢之流；一派以开封府尹赵光义为首，主要成员是开封府的幕僚，还有一些朝臣，他们是赵普的死敌；还有一些高风亮节或是不愿掺和事儿的人，他们两不相帮，窦仪就是其中的代表。

对赵普而言，依附自己的，他自然乐得帮上一把，从而壮大自己的势力。那些两不相帮的，能拉拢过来最好，拉不过来就得区别对待。像窦仪那样的，虽然对自己构成了潜在威胁，但不显山不露水，赵普便采取压制策略；而对于李处耘那样锋芒毕露的，则使尽浑身解数，一撸到底，绝不手软。

对待李处耘尚且如此，赵光义的人在赵普这里，能有好果子吃吗？偏偏不巧，赵普已暗中查知，冯瓒与赵光义有往来。

因此，赵普精心策划了这起举报案。首先，他要派一个人去冯瓒身边盯梢，搜集冯瓒的犯罪证据。赵普怎么知道冯瓒一定会犯罪

呢？因为冯瓒为人好谈论，善取巧，这种人一不小心就会出事。

其次，赵普既然决定对结交赵光义的冯瓒出手，就绝不是罚俸罢官、小打小闹，而是要一拳打得冯瓒起不来，还要把他背后的赵光义卷进来。至于皇帝怎么处置光义，那是另一回事。

因此，要举报冯瓒，必须抓住他的大把柄。果然，冯瓒到任才一年半，赵普的亲信便发现了他有经济问题。

作为一州之长，经济问题足以让冯瓒万劫不复。

五代时期，大江南北的大小官员贪腐成风。如果将武人乱政视为乱世之乱，那么官员贪腐则是治世之乱。乱世之乱，祸害有时；治世之乱，国无宁日。

赵匡胤虽然对文武高官的贪墨自晦睁只眼闭只眼，对中下级官员的腐败却严惩不贷。这些涉腐官员动辄被弃市、腰斩，处以极刑。至于脸上刻个字、身上挨棍子，然后流放海岛、遇赦不得还的，都是罪行较轻或者命大的主儿。而且，对于贪腐案件，赵匡胤往往要求一查到底。不仅涉案人员要一一挖出来，而且连负有监察检举责任的官员、贪官的上司甚至是贪官的保举人，都会牵连其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因此，冯瓒如果陷入腐败的泥潭，就一定难以脱身。赵光义受其牵连，自然也不会太舒服。

至于在最后的举报环节，赵普自己不出面，而命人去击登闻鼓，有三个好处：第一，引起赵匡胤的高度重视；第二，防止上诉环节被赵光义的人上下其手；第三，赵普自己也能洗脱党同伐异的嫌疑。一举三得，机关算尽。

果然，在收到鼓司报告后，赵匡胤立即命冯瓒等人即刻还朝。

经过赵匡胤亲自质问，冯瓒被御史带走，接受调查。

而经过御史台审讯，冯瓒罪名不立，似要无罪释放。

赵普心有不甘，于是暗中调查，竟然得到了两份截然相反的审讯结论。一份是御史台正式发布的：奴仆状告冯瓒的言辞多有诬

陷；另一份却是他私底下探问来的：在主上面前，冯瓒言语错乱，理屈词穷，所以才会被送进御史台。

这就太有名堂了。既然皇帝那里已经证据确凿，何以御史台又审出一个无罪？既然御史台一口咬定冯瓒是受人诬陷，那么“诬陷”他的“奴仆”何以没受到半点惩罚？

这只能说明，赵匡胤有意为冯瓒开脱，却也不想冤枉无辜。

为冯瓒开脱，就是为赵光义开脱。

的确，赵匡胤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然赵普能够查到冯瓒暗通赵光义的蛛丝马迹，赵匡胤当然也对二人的关系心知肚明。虽然目前还没有赵光义直接参与冯瓒案的证据，但这个案子一旦深查下去，万一失控，会不会查到光义的头上？事关重大，赵匡胤决定把案子压下来。

基层反腐，是为了防止官逼民反；高层不追究腐败，是为了收买高级官员将领别造反。能不能腐败，取决于你以何种形式，威胁了大宋皇帝的皇位。而比起节度使，作为准皇储的赵光义更为特殊。把他扯出来，无异于政治地震。而且事涉光义，赵普绝不会放过机会。二人若是彻底撕破脸，下不来台的反而是护弟弟的赵匡胤。

在赵匡胤眼里，无论这个弟弟给自己惹出多少麻烦，无论他曾让自己的政治局面多么被动，无论他日后会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他永远都是个孩子，永远是在强敌面前需要自己保护的弟弟。

赵普的如意算盘难道就此落空？不，这不是他狠辣的风格。于是，费尽心机的宰相不再躲在暗处，中书门下的密使远赴潼关，公然截获冯瓒运回开封的行李，其中金银玉软无数，外边还贴条注明“刘赞”二字，连傻子都能琢磨出来，这是准备送给开封府推官、工部郎中刘赞的厚礼。

真相大白，纸再也包不住火。

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意见的赵匡胤终于现身了，御座对面，弟弟

赵光义夹肩而立。皇帝铁青着脸，将一条金带扔到他面前。赵光义强作镇定，沉默不语。

这条金带也是从冯瓒包裹里搜出来的。除了皇帝皇后，有资格用金带的只有朝廷大员，这条镶金的腰带是送给谁的，不言自明！

赵匡胤背着手，走到赵光义身后，没有发怒，只是淡淡地告诉他：冯瓒等人全部认罪。冯瓒和李美免官削籍，流放海岛；李榖和刘熙，朕也让他们卷铺盖回家了。说罢，拂袖而去。

赵光义瑟瑟发抖。他知道，李榖没有被判流放，是因为他曾给王皇后的父亲做过幕僚。至于刘熙，那更是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没有深究。

光义，你干的那些事，朕心里跟明镜儿似的。朕还拿你当弟弟，好自为之吧。

敲打开封府尹

赵光义好自为之了吗？当然没有。他把一腔愤怒撒在了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身上。

这年冬天，有人密告韩重赟私养亲兵。这次密告似乎选准了时机。因为就在闰八月间，赵匡胤刚刚下诏，要求殿前、侍卫诸军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中军骁勇者自为牙队。虽然忌养私兵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但将之正式公开作为朝廷的禁令还是第一次。可见，随着权力日渐向朝廷集中、向皇帝集中，万岁殿里的赵匡胤不但没有放下心来，反而对军权盯得更紧。

然而与举报冯瓒不同，这次密告韩重赟私养亲兵，纯属诬告。当年的义社十兄弟和参与陈桥兵变的元勋故旧，如今掌禁军者唯韩重赟与刘光义。不明所以的人，只道是二人捡了便宜，而其中的苦闷，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至少韩重赟过得很不开心，整日里战战兢兢。作为殿前司的一把手，他却对军队建设毫不上心。修城墙、塞河堤，这才是他这些年的主要工作。眼看着自己前一个副手张琼被逼上黄泉路，后一个副手杨义莫名成了哑巴，他哪敢过分插手军政？又怎么可能去私养亲兵，触犯皇帝的忌讳？

但是，谨慎至此的韩重赟，依旧难逃躺枪的命运。按理说，有张琼的前车之鉴，赵匡胤应该长了记性，派人明察。但他没有。他听到举报后大发雷霆，竟然不分青红皂白，执意要砍韩重赟的脑袋。

赵普直言劝谏道："这些亲兵将士，陛下必然不能亲自统领，而必须选择合适的人选，赋予他领兵的权力。如果韩重赟因为一句谗言就被诛杀，满朝的武官肯定人人害怕获罪，那以后谁还敢为陛下领兵啊！"

可发飙的赵匡胤依然不依不饶。最后，还是靠着赵普坚持不懈地恳切相劝，赵匡胤才算冷静下来，放了韩重赟一马。

或许，在赵普的苦苦哀求中，赵匡胤终于想起了昔日弟兄间的款款深情，又或许是看到了张琼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

但在次年（967）二月，已经引起皇帝猜忌的韩重赟还是被罢免了军职，出为彰德军节度使。

大难不死的韩重赟择日前往宰相府拜谢。赵普也颇有几分风度，对韩重赟拒而不见。

韩重赟离开了京城，谗言案终于结束，好在没有酿成大的遗憾。但禁军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在此之前，上任仅三个月的杜审琼病逝，赵匡胤用外戚掌军的计划随之破灭。韩重赟落职后，殿前都指挥使也不再授人，而将殿前司的管理权交给了殿前都虞候杨义。堂堂天下第一雄兵殿前军的总司令，武阶竟然才是防御使，而且还是个哑巴。

而禁军指挥层的一再动荡，终于引起了军中的动乱。就在韩重

赟遭谗言攻击但尚未离开殿前司时，已有禁军卫士密谋叛乱，所幸事件很快被平息。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诬告韩重赟的人与赵光义有关。但就像当年提议符彦卿掌军、诬陷张琼致死、鼓动马仁瑀与王继勋械斗一样，敢对皇帝的把兄弟动手，这不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而满朝文武，有这个能量也有这个意愿的，只有皇弟赵光义。

看来，一条金腰带还不足以让光义警醒。面对弟弟的不知好歹，赵匡胤必须有所反应。

赵官家一出手，先从开封府衙揪出了陈学究。没错，就是夹马营教书的那个陈学究。现在的陈学究今非昔比，被赵光义召入幕府，做了心腹，对开封府的政务指手画脚。

按照制度，开封府尹辟署幕僚，需要由朝廷任命。可光义辟陈学究，竟然连招呼都不跟皇帝和朝廷打一个。这种不拿朝廷法度当回事的做法，本来就已令赵匡胤恼火；再一听被辟署的是陈学究，他更是火冒三丈。赵匡胤把赵光义叫来，就私辟陈学究一事大动肝火。

别看在皇帝背后捣鼓得有声有色，真见了龙颜震怒，赵光义立刻吓得魂飞魄散。于是，震惊不已的赵光义回到开封府，赶紧赏了些值钱东西打发陈学究走人。

还没等赵光义喘过气来，开封府后院又出事了，一个叫安习的人正在哭爹喊娘叫祖宗地求他救命。原来不久前，有个青州人带着自己的小闺女上京打官司。小姑娘才十多岁，却被赵光义一眼相中，他急命人买来。俗话说“一入侯门深似海，浓香吹尽有谁知”。青州老爹不图荣华富贵，只求女儿幸福平安，断然拒绝了开封府的“美意”。

求之不得，赵光义辗转反侧。“好”在开封府不仅有王佐辅弼之才，更有鸡鸣狗盗之士。那些登不上台面的小人物，要想在东京城里吃香喝辣，只能拼命讨幕主欢心。其中这位安习，竟然成功将

小姑娘拐骗进了府衙。

堂堂京尹，竟干些什么勾当！赵匡胤这次真的发火了，你收受贿赂，你搅乱禁军，你招兵买马，朕都随你。现在好了，你竟还在一国之都拐骗小女孩！真有出息！

赵匡胤当即下令，通缉安习，全力搜捕。

不过他还是为弟弟留了面子，至少没去开封府搜人，也没让赵光义把小姑娘送回去，更没有治赵光义的罪。

他只是要让赵光义明白：开封府，是大宋的开封府；赵京尹，也是我大宋的京尹。府上有国法，尹上有皇帝。你自己看着办吧。

赶走陈学究和通缉安习，未触及赵光义的任何政治利益，看起来管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可越是鸡毛蒜皮，越让赵光义触目惊心，因为这表明，他的皇帝二哥对自己的私生活了如指掌。

自此以后，赵光义确实老实多了。他不再去禁军惹麻烦，闲下的大把时间，都用来研究围棋。他还发明了一种“独飞天鹅”的棋势。楸枰残局，玉子交错，如天鹅展翼之状。那黑棋已陷绝境，但若取先手，即可转败为胜。

赵光义悠然对弈。建隆二年（961），杯酒释兵权，自己掌军的希望也被判了死刑。最近四年，他利用二哥的卧榻心理，屡屡发起攻势，虽未能直接得手，但已把二哥的羽翼剪灭殆尽，重新抢占先手。

心腹张琼，外戚王继勋、杜审琼，义社兄弟韩重赟，这些对皇帝忠贞不二的人，或死或贬，硕果仅存的刘光义，自然也独木难支。余下的将领，目前虽还是皇帝的爱将，但与之前那些人已大不相同。他们与二哥没有特殊的关系，为了防止伴君如伴虎的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必须再寻找一位关键时刻能救自己命的靠山。因此，他们不会毫无原则地倒向任何一边，而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游走在大内与开封府之间。

所以，已经用不着再逼着二哥逐将杀帅了。他的，也将是

我的。

赵光义落下最后一枚棋子，黑棋全盘走活。

四、六十六天平蜀

大蜀出了个王昭远

茫茫两川，峻岭群山。东塞三峡，北绝终南。悬壁险滩，林立雄关。黄鹤难越，猿猱愁攀。难怪太白见此而惊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但蜀道那边，却是沃野千里、丰饶五谷的成都平原。

天府之国，真天赐之土也。

每逢乱世，四川就成为割据者的天堂。成家、蜀汉、成汉、前蜀、后蜀……仗着外有天险，内有粮仓，这些政权把秦岭与三峡的两道大门紧闭，管他天下多乱，这边风景独好。

然而，难以逾越的天险，虽然挡住了外敌的入侵，但也阻止了自己出征的步伐。并非所有割据两川的豪杰都甘于作“成”作“蜀”，自强不息争衡天下者不在少数。但除了一个刘邦，谁也没杀出去。

杀不出去，就只有死路一条。

此刻，大蜀的君臣就在醉生梦死中。

九月的成都，芙蓉满城，望如锦绣。浣花溪畔，亭榭夹江，男男女女，携伴出游。但见珍珠绮罗，与百花争艳；名芳馥香，牵起丝竹管弦，缠绵梁间，昼夜不眠。大蜀皇帝孟昶，游乐于锦绣之间，不觉如醉，心旷神怡地对左右说道：“自古就称成都为锦城，

今日观之，真乃锦城也！”

宋乾德二年、蜀广政二十七年（964），46岁的孟昶，已经做了三十年皇帝。

唐朝末年，王建割据两川，建立前蜀。其子王衍昏庸荒政，国家遂为后唐所灭。唐庄宗派侄女婿孟知祥接管蜀地。应顺元年（934），乘着后唐内乱，孟知祥南面称帝，国号为蜀，建元明德，史称后蜀。孟知祥在位仅七个月就撒手人寰，他16岁的儿子孟昶继承皇位。

孟昶即位之初，权臣悍将飞扬跋扈。对此，小皇帝隐忍不发，待到时机成熟，先诛宰相兼判六军（禁军最高统兵官）李仁罕，再罢昭武军节度使李肇，干净利落，丝毫不亚于16岁擒杀鳌拜的康熙皇帝。

十五年后，孟昶故技重施，将那些嚣张旧臣全治得服服帖帖。朝廷大权以相对平缓的方式，正式移交到孟昶手里。

孟昶不仅有夺权的办法，更有治国的本事。就在各路君主为了巩固权力，大唱“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陈词滥调时，孟昶却说出了“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的名言。

与许多治世明君一样，孟昶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他专门在朝堂上设了一个举报箱，欢迎广大臣民上书批评。一次，有个人上书说，朝廷官员应当选用清流。孟昶感叹道：“为什么不提出具体人选呢？”左右要求责问上书者。孟昶却说：“唐太宗即位之初，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得到褒奖和采纳。你们干吗要劝我拒谏呢？”

一心想当唐太宗的孟昶，一举打破唐太宗的纪录。当时蜀国境内农业丰产，米价比贞观年间还便宜。全国上下歌舞升平，成都城内更是繁花似锦。称这一时期的蜀国为“广政之治”，绝无半点虚夸。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蜀国，那就是“富”。不仅国富，而且民富。

然而仅有花香，未免轻浮流俗，唯书香萦郁，才可称真国色。在孟昶的支持下，宰相毋昭裔与赵崇祚辑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间集》，又雕版刻印儒家“九经”，自此蜀中文化复盛。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蜀与东面的南唐一唱一和，共举大业，这让分不清“参知政事”与“同平章事”孰高孰低的土豪大宋，颜面扫地，无地自容。

早年的孟昶也曾志存高远，奋发图强，与中原一争高下，颇似当年的李璟。晋末中原大乱，蜀国乘机向北扩张，获得秦、成、阶、凤四州土地。孟昶还支持了后汉时期的三镇叛乱，可惜遭遇了郭威，主力大败而归，而后郭荣更从蜀国身上割下秦凤四州这块肥肉。

成都城里的芙蓉花开得再惊艳，终究不能当枪使。

可孟昶没有摘下芙蓉，插上铁戟，而是坠入花香，纸醉金迷。他将国政全部交给了小伙伴王昭远。

王昭远，成都土著，家庭穷苦，13岁做了和尚。有一次，小昭远跟着师父到孟知祥府上蹭饭，大概因为骨子里透着机灵劲儿，竟被孟知祥看中，留下来给孟昶做书童。就是凭借这个身份，王昭远青云直上，直到执掌枢密院，坐上通奏使、知枢密院事的高位。孟昶将国家大事一以委任，甚至连国库的金银也让他随便来拿。

诏命一出，举国皆惊。反对最激烈者，是孟昶的母亲李氏。这位唐庄宗昔日的侍妾见多识广，对儿子的行为极为不满：“你娘我当年见过庄宗跨黄河击梁，见过你爹北逐契丹南收两川，所用大将无大功者不让掌军，所以士兵对大将都很畏服。”

孟昶举目望天，假装没听到。

李太后犹在滔滔不绝：“你看看你现在用的这些人，王昭远就是个打杂的奴仆，赵崇韬那几个人都是花拳绣腿的野小子，向来不会打仗，还不是靠着跟你关系铁才爬上来的。平时大家不敢说，真在前线打起仗来，这几块料能顶事？我看举国上下，只有高彦

俦是你爹的旧将，忠心耿耿，绝对不会辜负你。其他人，不足以掌军。”

孟昶听完，笑而不语。

李太后就不明白了，同样曾为唐庄宗的宫人，同样辅佐出一位开国帝王，怎么人家柴氏就有个满腹韬略的养子，我就只有一肚子草的儿子？

其实李太后不明白，五代时期，最没安全感的就是皇帝，哪个皇帝都不愿用宿将。

孟昶欣赏王昭远，并非全无理由。和大多数得志小人不同，王昭远没有作威作福打击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你们不知，我也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王昭远日夜埋头苦读，自比诸葛亮，誓要北伐中原，逐鹿天下。

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可要是块石头，到哪儿也发不了光。

在李昊眼里，王昭远就是块石头。这位嘲笑王恺、石崇是叫花子的富翁宰相，眼睛和府库里的金子一样亮。广政二十六年（963），宋平荆湖，蜀国北、东两座国门全部与宋接壤，压力倍增。这年五月，李昊便向孟昶建议：“臣观宋之国运，不像汉、周。看来上天也厌倦长久的战乱了，恐怕要将一统天下的重任交给宋人。不如我们向大宋称臣纳贡，此乃保全大蜀长治久安之策。”

孟昶觉得言之有理，正准备派使臣与大宋接触，却被人突然拦下。不用猜也知道，这个人是王昭远。大蜀知枢密院事王昭远。

蜀国秀才遇见大宋兵

王昭远认为，派使臣去宋国，不如屯重兵守三峡，并在东南部的长江上游增置水军，作为后援，加强防御。

其实王昭远和李昊的建议都不差，而且并不冲突。对于大宋而

言，蜀国称皇称帝，不臣服不纳贡，政治独立，影响极坏；蜀国稻米漫天，黄金铺地，吸引力极强；蜀国地处长江上游，居高临下，威胁极大。当大宋一统天下的野心路人皆知时，蜀国便首当其冲。

蜀国要想保持独立，唯有自强。所以王昭远建议增兵，乃睿智之举。李昊的外交策略，则能够拖住大宋的后腿，为蜀国争取战略时间。一内一外，一武一文，一急一缓，对于孟昶来说，双管齐下，非常有利。问题在于，王昭远太急了，他不仅急着增兵，更急着打仗。东南增兵防守，却对北部防线不闻不问——他要从北边打到大宋去。王昭远不是要拖延蜀宋战争，而是要加速战争的爆发。

山南节度使判官张廷伟曾对王昭远说："明公一直没有拿得出手的功绩，现在身居要职，再不想办法折腾出点功名来，怎么堵得住那帮人的悠悠之口？"这话正说到王昭远的心坎儿里去了。小诸葛我忍辱负重、挑灯夜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王昭远敢肆无忌惮地祈求暴风雨，还因为张廷伟早就为他设计了一份北伐蓝图：交好北汉，南北夹击。尤其是张廷伟提出兵出子午谷，更戳中了王昭远的命门。这是曾经放弃子午谷奇谋的诸葛亮，想要假我之手，完成当年的遗憾吗？

于是，枢密院大程官孙遇与兴州军校赵彦韬、杨蠲拿着装有联络北汉密信的蜡丸，偷偷摸摸地出了蜀国。

出乎王昭远所料，三人团里出了张松。

寒风摧木，严霜结庭，开封城里的家家户户都点燃了炭火，缩在屋子里。赵匡胤却心如火焚，口干舌燥。乾德二年（964）即将远去，伐蜀的号角却始终没有吹响。

伐蜀是统一天下的既定方针，如果不是湖南周行逢突然病逝，第一个被大宋灭掉的政权，本该是蜀国。

早在去年（963）四月，赵匡胤便以华州团练使张晖为凤州团练使、兼西面行营巡检壕寨使，打起了后蜀的主意。大宋不少武官都遥领境外军州，称领某军节度使、领某州防御使等，用以区分官

阶。起初，赵匡胤让将校们遥领湖南诸州，结果不到一年，湖南就归入大宋。有点迷信的他，索性把武官的遥领州又改成汉州、彭州等西蜀地名。这次任命，更暴露了野心勃勃的帝王的心思。

到了八月，赵匡胤下诏阅兵。虽然被马仁瑀和王继勋搅黄，但伐蜀的决心已昭告天下。

最近一段时间，张晖的密报一道接着一道，将西蜀的山川险易、灭蜀的进取之计，尽着墨于纸上。从荆南来的翰林医官穆昭嗣也说，荆南是西川、江南、广南都会，既已攻克，则水陆皆可进取蜀地。赵匡胤闻言大悦。

但伐蜀还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从西蜀回来的谍者报告："成都正在'全城苦热'。满城的老百姓都在吟诵朱山长的《苦热诗》，诗中的'烦暑郁蒸何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之句最流行"。"烦暑"，实为"烦蜀"。蜀国的老百姓，对孟昶的统治已经如暑热般厌烦，凉爽的清风何时才能吹入两川？

赵匡胤听后，自言自语："这是蜀民在召唤我。"

赵匡胤正想找伐蜀的理由，所以一切情报都能成为理由。其实谍者搞错了，这诗是李尧夫写的。李尧夫隐居梓潼，喜欢批评时政。有一次，他去见宰相李昊，李昊嘲笑他说："你这名字起得也太没时代感了。"谁知李尧夫当即大发雷霆："我甘愿作唐尧的民夫，也不乐意当蜀国的宰相！"

这时蜀国的政治确实在走下坡路，社会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李尧夫是个有担当的文人，他的《苦热诗》反映出部分底层民众的心声。

然而，支持孟昶的蜀民也不在少数，其中包括大量的城市百姓。大概赵匡胤也觉得理由太过牵强，感慨了一通吊民伐罪，就又没动静了。

万事俱备，亟须东风。自称诸葛亮的王昭远，却千里迢迢为大宋送来了东风。在赵彦韬的带领下，王昭远派出的访问北汉三人团

进入了大宋的朝廷。

孟昶勾结北汉，图谋大宋，得到蜡丸密信的赵匡胤终于喜笑颜开："吾西讨有名矣！"更让他高兴的是，王昭远还送来了地图。赵彦韬将蜀中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全部画为地图，交到赵匡胤手里。

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二者皆得，蜀可伐矣。

宋乾德二年、蜀广政二十七年（964）十一月二日，赵匡胤沙场点将，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为副都部署，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率北路禁军步骑两万、诸州兵万人，自凤州沿嘉陵江南下。

宁江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则担任西川行营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领东路步骑两万，溯长江西上。

另以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全权负责粮草运输。

伐蜀主帅王全斌是太原人，12岁时，唐庄宗怀疑其父想造反，下诏召见。王父大惧，不敢前往。王全斌说："您把我当人质送给主上，主上必然对您释怀。"王父听从了儿子的计谋，王家上下数口才得以存活下来。

后来李嗣源发动兵变，洛阳城乱作一团。当时庄宗身边的人几乎跑光了，只有王全斌和符彦卿等十几个人还在护主力战。王全斌把重伤的庄宗扶到绛霄殿，直到庄宗咽气，才大哭而去。此后，王全斌效力于禁军，又出为节度使，作战勇猛。在大宋与北汉的边境上屡立战功。

王全斌有智谋、有节操、有胆略，加之他曾参加过攻取秦凤四州的战役，与孟昶交过手，赵匡胤几经思量，决定将西蜀这块硬骨头交给他。

临出征时，赵匡胤对王全斌说："凡是攻克的城寨，只把兵

甲、粮草登录在案，钱帛一律赏给将士。朕要的，只有土地耳。”蜀地艰险，如果遇到强硬对手，大宋近六万将士很可能有去无回。这种玩儿命的活儿，没有重赏，哪来勇夫？何况要保证军队不剽掠屠城，总要给将士们些好处。

当然，这话看似慷慨，但本意并非真的让将士把府库分光。大宋缺钱，灭蜀首先是为了取财。其实，如何赏赐士兵，早在陈桥兵变中已有范例可循。不过这次不是自己坐镇，李处耘又被雪藏在淄州，赵匡胤心里总不踏实。他暗中跟沈义伦打了招呼：“平蜀以后，府库的钥匙你可要握紧。赏赐将士以外，诸将再来求取，一律不给。”他相信，当年窦仪能阻止自己，沈义伦也必然能阻止伐蜀诸将。

十一月三日，不足六万的宋军，浩浩荡荡，开入蜀境，朝着成都杀奔而去。

密谋被戳穿后，王昭远反而激动不已。

大兵压境之下，王昭远得偿所愿，当上了北面行营都统，他那一群统兵的小伙伴也分授将职。孟昶还不忘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王诸葛啊，娄子都是你捅的，你可要努力为朕立功！”

出师当天，宰相李昊亲自为王昭远饯行。王昭远风度翩翩，英姿飒爽，不像个统兵打仗的将军，倒似个进京赶考的书生。他还刻意模仿诸葛亮。传说诸葛亮手执羽扇，王昭远大概嫌羽扇太轻，于是打了一把铁如意，挥斥方遒，好不过瘾。

将相之间酒兴正酣，王昭远突然搭着李昊的肩说：“我此行，何止破敌，率领这两三万脸上刻字的恶小儿，取中原易如反掌耳！”

在王昭远的朦胧醉眼前，黄土漫天，杀声震地。蜀军横扫千军，气吞万里；宋军狼奔豕突，一溃千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战场上，王昭远的壮志豪情终于化为现实，只不过主客倒置：一溃千里的是蜀军，气吞万里的是宋军。王全斌一破蜀军于兴州，再破于西县，三破于大小漫天寨，缴获粮饷七八十万石。王

昭远亲自引兵来战，结果三战三败。王全斌进占利州，再获军粮八十万斛。

送完名誉送地图，送完地图送粮食，王昭远才是大宋的西南转运使。谈笑间，数万蜀军灰飞烟灭。王昭远的酒终于醒了，一路狂跑退保剑门。

战事过于顺利，顺利得让王全斌等人都不敢相信。出征前，赵匡胤曾在崇德殿大宴诸将，问王全斌："西川能打下来吗？"王全斌等人豪气万丈，立下誓言："臣等仗天威，遵妙算，按约定的日子，必然克蜀！"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更是夸下海口："西川若在天上，我们肯定取不了，可是它在地上，我大军所到之日即可平定！"

大话谁都会说，但实战还得靠本事。王全斌本已做好鏖战的准备，没想到一路势如破竹。当年蜀汉没大将，还有廖化做先锋。现在这个蜀国，连廖化也没有了？

没学过兵法，就别装孙子。王全斌对王昭远嗤之以鼻。

小诸葛我学过兵法，照样被打成孙子。王昭远躲在剑门里缩脑缩头。

情势紧迫，孟昶急命太子孟玄喆为元帅，率兵万余支援剑门。

运去"英雄"不自由

倒霉孩子孟玄喆是个书法家，对美有着执着的偏爱。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但生在安逸中、长在富贵里的孟玄喆对磨枪毫无兴趣，他把精力全投入到对美的追求上。孟玄喆下令，所有旗帜都要用锦缎绣成，连旗杆都要用锦缎包好。

锦旗大军出锦城，锦绣太子要出征。孟玄喆正得意扬扬，却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扫了兴。他怕旗子被浇湿，急忙命人把旗子全摘

下来，等大雨停止，再把锦旗挂上去。结果忙中生错，锦旗全挂倒了。围观的人暗自发笑，孟玄喆却浑然不知，因为他正忙着挑选姬妾和戏子，跟随自己北上剑门。

成都下了一场锦绣雨，开封却下了一夜鹅毛雪。赵匡胤身披紫貂裘，头戴紫貂帽，坐在讲武殿，正阅读前方战报。读到王昭远与孟玄喆这一对儿活宝时，他再也憋不住，哈哈笑起来："孟昶连个股肱之臣都没有，其亡不晚矣。"

鉴于蜀军将校有很多北方人，赵匡胤下诏，有愿意给宋军当向导的，供给军粮；率众而归、举城而降的，给予厚赏。蜀军的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自己人不杀自己人，快回家吧。于是蜀军军心大乱。

赵匡胤又要求，宋军要严肃军纪，禁止烧杀掠夺，违令者斩。此事关系到拿下蜀国后，能不能统治蜀地。得民心者得天下，与孟昶争夺民心，赵匡胤倍感压力。

赵匡胤还命八作司在右掖门外南临汴水的黄金地段，为孟昶盖了五百余间大房子，家居供应一应俱全。用他的话说："朕听说孟昶家族人多，房子多盖点，别让他们不够住。"

赵匡胤伐蜀，志在必得。他来到殿门前，掀起毡帷，殿外狂风怒吼，大片大片的雪花凝冻成粒，时而飞打在脸上，好像突然抛来一把粗沙，皮肤如扎裂般疼痛。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一日不平蜀，一日不得安。

剑门关外，王全斌收到了一件礼物——紫貂裘帽。前来送礼的低级宦官中黄门告诉他，主上说，自己穿着这么厚的衣服，尚且觉得冷，想想你们这些西征的将士，冒严寒披霜雪，怎么受得了呢？于是，主上脱下紫貂裘帽，让我给您送来了。主上还说了，不能每个人都照顾到，心中惭愧……

陛下！王全斌感动得热泪盈眶，捧起裘帽，朝着东京的方向拜

了三拜。三军将士热血沸腾，随着王全斌跪倒，朝着东北方拜去，宋军士气空前高涨。

王全斌开始商议进讨剑门，他对诸将说："剑门天险，古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各位有什么良策？"侍卫军头向韬道："听俘虏说，东南的山里有条小路，名叫来苏，直通剑门南二十里的青疆店（一作青疆店）。若大军行此，则剑门之险不足为恃。"

身披紫貂裘、头戴紫貂帽的王全斌气血上涌，准备率军东去来苏，却被马军都监康延泽拦下："蜀人数战数败，胆气已夺，可急攻而下。来苏路险，主帅不宜自行，派个偏将去即可。"

脑袋发热的王全斌冷静下来，命史延德分兵从来苏绕到剑门后方，自己则率军猛攻剑门。

望着关前前赴后继的宋军，王昭远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些宋军真是自寻死路，《兵法》云："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

报！宋军从青疆店杀来了！

啊？你们！你们应该在关下强攻啊！怎么跑到剑门后边来了！

看来王昭远并不知道，十年前，赵匡胤就是以同样的手段袭取了清流关。

慌得找不着北的王昭远，留下偏将守剑门，自己率主力退往汉源坡。没想到剑门瞬间被攻克，王全斌的宋军如溃堤而出的怒潮，向汉源汹涌而来。蜀将赵崇韬连忙布阵，率领将士杀入敌阵。

关键时刻，王昭远却看似临危不惧，手执如意，安坐帅椅。这份气定神闲，颇有传说中诸葛武侯退司马宣王的遗风。

王昭远却要哭了：我这哪是安居退全斌，我是两腿哆嗦得站不起来……

赵崇韬虽然打仗不行，但生性勇猛，眼看败局已定，犹自斩敌数人，算得上一条好汉。王昭远就没这份霸气了，他勉强收拾好双腿，丢盔弃甲，连滚带爬地跑到东川的民舍里躲避。他双眼哭得

像俩核桃，仍死死抱着铁如意，哆哆嗦嗦地说着：“运去英雄不自由……运去英雄不自由……”然后，就被宋军逮个正着，彻底失去了自由。

那位锦绣太子孟玄喆一路上嘻嘻哈哈，游览名山大川，大发感慨。半路听说剑门已失，扔下彩旗撒腿就跑。一路跑，还不忘一路放火烧房。

坚壁清野，在垂死挣扎之际也不失为无可奈何之策。老将石奉颉就持此看法，他劝孟昶说：“东兵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坚守，把宋军拖垮！”

可孟昶不想为了这无谓的挣扎，让蜀中百姓陪葬。他很清楚，既然王昭远没做成诸葛亮，自己就只能做蜀后主了。

孟昶长叹息道：“我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我东向放一箭，我就算想坚壁清野，谁肯为我而死?”

其实，孟昶不是无兵抵抗，而是不知道用谁抵抗。除了王昭远、孟玄喆这有数的几个人，他不相信任何人。

称孤道寡，到头来成了孤家寡人。

五、竹篮打水一场空

打造一个亡国君主模范

孟昶并非无人可用。在大蜀东部，重镇夔州锁住水路咽喉，戍守那里的，是蜀中名将高彦俦。

刘光义所率的东路宋军，乘着战舰，逆袭三峡，一路前进，杀到夔州附近。可眼前的景象，却令他瞠目结舌。

狭窄的江面上，搭满了浮桥。浮桥之上加盖三重栅栏，俨然一座江上浮城。最绝的是，沿江两岸，石炮高架。任你铜头铁臂，也穿不过炮垒防线。

刘光义从没见过这种阵仗，一时无措，他忙打开赵匡胤给的地图，原来如此这般……

于是刘光义下令，宋军在锁江处三十里外停船靠岸，步骑一冲而上，拿下炮垒。然后重新上船，夹江石炮全成了哑巴，一声不响，目送宋军进讨夔州。

原来，早在发兵之前，赵匡胤便已经掌握了夔州防线的情报，并据此制定了突破方案。如此至关重要的情报，很有可能是从赵彦韬那里获得的。

宋军兵临夔州，守将宁江军节度使高彦俦面色冷峻，对身边人说："北军涉险远来，利在速战，我们应当坚守城池，以逸待劳。"

三峡险窄，粮运不便，何况大宋新建，打持久战，他们吃不消。一旦宋军撤退，借着水势，蜀军即可轻松破敌。

监军武守谦却不服："敌人都到我们城下了，还等什么？"于是他率千人出战，在猪头铺被打得大败。

宋军乘机攻入夔州，高彦俦力战不胜，身被十余创，蜀军大散。大势已去，高彦俦决定殉国。判官罗济劝高彦俦单骑归蜀，他却说："我当年已失秦川，现在又不能守住夔州，就算主上不杀我，我又有何面目去见蜀人？"罗济又劝他归降，高彦俦摇摇头道："家中老幼百口，都在成都。我为了自己偷生，难道要负了整个家族吗？今日只有一死。"言罢，将符印解下，交给罗济，嘱咐道，"君自为计"。

高彦俦独自一人，将屋门反锁，整理好身上那沾满鲜血的铠甲，正了正头鍪，朝着西北成都的方向，拜了三拜。

眼泪像源源不断的山泉，滑过罗济的面颊。可惜，泪水无法浇灭节度使府那熊熊燃烧的烈火。

蜀中义士，何其壮哉！

数日后，刘光义等人在灰烬中搜集到高彦俦的骨灰，以礼安葬。大蜀境内，最后一颗耀眼的孤星，陨落了。

孟昶只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投降。投降的主意是宰相李昊出的，写降表的"重任"当然也落在他的肩上。对他而言，这不过是重操旧业，40年前前蜀灭亡时，李昊就亲手写了降表。李昊出马，降表一挥而就。次日，当他走出家门时，却见门上被人写上六个大字："世修降表李家。"

宋乾德三年、蜀广政二十八年（965）正月七日，蜀国的降表正式送入王全斌的大营。自王全斌出征，至此才66天，全天下最富庶的2府45州、238县，[1]以及534 029户民户，完好无损地划入大宋名下。

---

[1]《长编》所记其版籍所录州县数为46州240县，此处据当时实际情况对数据做修订，参见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成都御道两侧，挤满了男女老少。

锦城无锦，唯有泪千行。

这年三月，蜀国末代皇帝孟昶离开了成于斯败于斯的成都。昔日的卤簿雅乐，却作今日的川民悲歌。老百姓们追随孟昶的船舸，一路哭送三百里，直到眉水畔的犍为，才不得不与旧主诀别，将一腔凄凉与不舍，泣作江水急湍而去的蜀王滩。

望着渐渐远去的蜀中百姓，47岁的孟昶老泪横流。只是繁华已成旧梦，前路明灭，不知死生。船舸沿江而下，渐渐驶入三峡。孟昶身着素服，出立船板之上。坐拥天府30年，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自己的东大门。但见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蔽日隐天。怪柏舞爪，高猿张牙。渺小的孟昶，如入狰狞血口，只需夹山微动，自己便粉身碎骨。

孟昶对自己的未来毫无信心，虽然赵匡胤已经白纸黑字答应保全孟氏一族，不会食言。可皇帝说话能算数吗？大约40年前，前蜀后主王衍也曾得到唐庄宗不杀的许诺，结果走到秦川驿，就被一纸皇命灭了门。

孟昶并不知道，赵匡胤也在为他的安全担忧。自从平蜀的消息传回，赵匡胤就收到许多关于如何处置孟昶的奏章。其中一份写道："孟昶割据蜀地三十年，而蜀道有千余里。请将孟氏一族满门抄斩，而将伪蜀旧臣全部赦免，以防生变。"

起初，赵匡胤还以为奏章出自赵普、王全斌、王仁赡等人之手，可是一看署名——曹彬？！曹彬乃彬彬君子。此次东路军入川，士兵嚷着要屠城剽掠，全靠这位君子监军约束，刘光义的兵马才能秋毫无犯。连他都要杀孟昶，可见对于稳定西蜀局势，孟昶确实是巨大威胁。

然而，赵匡胤对曹彬的建议不以为然。他用朱笔在奏章后批了六个字："你好雀儿肠肚。"

赵匡胤站在明德门上，遥望那500间豪宅，对左右笑言："孟昶

守千里之国，战十万之师，却被我擒住，孤身远客住在东京城里，以后还能造反不成？”

赵匡胤说过，“人命至重”。降王自然已降，就已经是大宋的臣僚，他们的命同样至重。五代杀人如麻，杀得太多了。是时候洗一洗五代的戾气了。

孟昶是一面旗帜，要坚决竖起，绝不能倒下。

西来的船舸驶出三峡，眼前豁然开朗。孟昶平安在江陵登陆。从东京到荆州，皇家的中使络绎不绝，赵匡胤既要给孟昶无与伦比的待遇，又要暗中保护他的安全。

五月十五日，孟昶到达开封近郊，开封府尹赵光义在玉津园隆重迎接。十六日，赵匡胤免去一切侮辱性的献俘之礼，在久未临御的崇元殿召见了孟昶君臣33人，随后带着孟昶到明德门检阅三军，并在大明殿（原广政殿）大摆筵席，为他接风洗尘。

十九日，赵匡胤给孟昶3天小长假，整理自己的新房。假期一过，马上又把孟氏一家接到大明殿吃国宴。

六月五日，赵匡胤封孟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这几乎是当时所能加封的最高官职。孟氏子弟和西蜀旧臣也纷纷加官晋爵。

孟昶的母亲李氏也得享尊荣，每次见李氏，赵匡胤都尊称她为“国母”，还特命李氏进宫时可以乘坐肩舆。赵匡胤曾对李氏许诺：“日后一定送国母返回故乡。”

李氏问：“陛下是要让妾身回哪儿？”赵匡胤答：“当然是蜀中。”

李氏摆摆手，说：“妾身家本在太原，要是能再回到那里，妾身就心满意足了。”赵匡胤听了大喜，当即打了保票：“等平了刘钧，即如国母所愿。”

自人开封近郊，短短20天，梦幻般的享受。

从古至今，亡国之君如果没被杀死，不是灰头土脸，就是装疯

卖傻。孟昶现在也有点傻，他是被眼前的待遇惊傻的。如此风光体面的亡国之君，若非亲身经历，打死他也不会相信。

可赵匡胤坚信，有了这样的亡君“模范”，其他各路诸侯早晚会放下顾虑，放下抵抗，与他共享一统太平。

只是赵匡胤有点兴奋过头，他忘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这般高瞻远瞩。比如，大宋蜀地前线总指挥王全斌。

一句承诺引发的血案

西蜀平定，赵匡胤照例发布德音：减免租税，废除苛政，下调盐价，开仓济粮，释放俘虏，登庸蜀官，招安盗贼，搜访明贤；又下令由朝廷出资，修葺前代帝王、名士的祠庙、坟墓。

与稳定荆湖相比，这次的惠政内容更加详细，范围更加广泛，具体措施也更加理性。平定西蜀迅速，破坏较小，加之善后得当，这块天底下最富饶的土地，几乎原封不动地并入了大宋。民心、财物尽入官家彀中矣。66天平蜀，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赵匡胤都取得了全胜。

可惜，这样的全胜并没有维持多久，进驻西蜀的宋军险些步了南唐在湖南的后尘。

问题最初出在王全斌身上。一夜之间名扬四海的王全斌，并未因平蜀大功而忘乎所以，相反，他此刻心烦意乱，顾虑越来越多。

西蜀能够成就一代名将的威名，而这威名又足以砍了名将的脑袋。远如攻灭蜀汉而被诛杀的邓艾、钟会，近如征服前蜀而遭处死的郭崇韬，无不如此。王全斌已经得到威名，他现在要想的是如何避祸，保住脑袋。

王全斌知道，赵匡胤对自己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信任，不然也就不会派王仁赡来监军了。

王仁赡出身军校，是赵匡胤霸府时代的心腹旧僚，与李处耘并为赵匡胤军事上的重要谋臣。但与李处耘不同，王仁赡为人阴鸷，善于刺探私情，因而大宋立国初期，他做了第一任武德使，执掌特务机构武德司。王仁赡在武德司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令满朝文武皆心惊胆战，甚至连赵普都畏其三分。

赵普尚且如此，王全斌怎能不小心对付王仁赡？万一他在皇帝面前告上一状，王全斌又岂能有全尸？更何况，蜀国灭亡后，赵匡胤马上在蜀地设立了一个武德司的分支机构，名义上是负责监察接管蜀地后的宋朝官员是否有贪污行为。可实际上，这个武德司分号的最根本任务与王仁赡一致，就是来监视宋军将领，防止他们叛变的。

在王全斌看来，自己真的别无选择。而要证明自己胸无大志，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横征暴敛。毕竟，石守信、符彦卿等人早就给他做了示范。

与此同时，王全斌与刘光义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自从刘光义率军进入成都，两路将士就不断争功。王全斌出征前，赵匡胤曾告诉他，有事多和诸将商量。可是现在两军相争，将领互相拆台，开会能解决什么问题？

一气之下，王全斌撂挑子不管了。不是开会商量吗？好，老子不跟你刘光义开，老子自己开！于是，王全斌拉上崔彦进、王仁赡，日夜饮宴，任凭手下夺财劫色，一概不问。圣上不是说了，他只要土地，金银玉帛全是将士的……

不知王全斌是真没听懂，还是有意曲解，这句话，几乎要了大宋的命。

而说出这句话的人，此刻也陷入深深的悔恨。这日退朝后，赵匡胤坐在便殿里闷闷不乐。“你们以为当天子容易吗？早上我一时兴起，处理了一件事，结果办错了。所以我心里难受啊。”

一时兴起说错话办错事，这是赵匡胤的老毛病了。此刻，赵匡

胤还并未预知王全斌这帮大老粗敢在蜀中乱来，可想起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心里就不踏实。

后悔已经没用，当务之急是赶紧派出文官，接管西蜀政务，并将自己颁布的德音落实下去。在他们到任前，但愿曹彬、王仁赡与沈义伦能够撑住局面，保住西蜀的民心。

可王全斌手下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被派出护送孟昶的右神武大将军王继涛，竟然向孟昶索要宫女、钱财。幸好王全斌还知道害怕，将王继涛罢免，孟昶躲过一劫。可是蜀中的百姓就没那么好命了，宋军日夜抄掠，百姓惊慌难眠。而最有资格阻止王全斌的刘光义，却坐在一边看热闹。

曹彬坐不住了，他跑进帅府，请王全斌班师。醉醺醺的王全斌手一摆，坚决不回去。一旁的王仁赡更是满脸不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凤州路的事，轮得着你归州路的监军管？

曹彬也不想越俎代庖，可谁让你王仁赡尸位素餐？

以枢密副使监军，王仁赡坐在当年李处耘的位子上。用他来监军，赵匡胤也是有意为之。鉴于王仁赡的背景，军中大将对他颇为忌惮。这有两个好处。一来，此前对李处耘一案的处理有失公允，监军威信扫地，起用王仁赡，有助于重塑监军的威望，从而制衡这些将帅，约束军纪。二来，西蜀险远，赵匡胤也确实担心军中有人叛变割据，王仁赡有特务工作的经验，可以随时刺探军中情况。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有李处耘的前车之鉴，王仁赡竟然一反常态，非但不敢对主帅指手画脚，反而亲自加入抄掠的滚滚人潮。

不过，当官的毕竟与当兵的不同。士兵们抢散客，吃力不讨好；王仁赡却利用职务之便，以巡查军资为由，盯上了一块看似肥肉的人——原蜀国使相李廷珪。李廷珪曾以副元帅身份，跟着锦旗太子孟玄喆支援剑门，并参加了太子撤军焚粮事件。王仁赡抓住李廷珪的小辫子，一口咬定要秋后算账。李廷珪急得团团转，一下就转到了康延泽的房里。

大概因为自己也是做监军的，康延泽非常明白王仁赡的用意。他给李廷珪出主意说：“王公没别的意思，就是手头有点紧。你只要想办法帮他宽宽手，他就不会找你麻烦了。”

王仁赡还真看走眼了，李廷珪不是李昊，为人节俭，家无余资。可为了活命，李廷珪只得遍求亲戚，好不容易凑了四个姑娘，又借了一些金银珠宝，一并送到王仁赡那里，总算留下了自己的脑袋。

王仁赡开了坏头，致使原来蜀国的官吏为了少惹麻烦，抢着破财免灾，到处送礼。偶尔也有些清廉的宋朝官员拒绝收礼，掌管府库钥匙的沈义伦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人能律己，难以律人，沈义伦无法阻止宋军的恶性循环，索性搬到佛寺里，素食寡居。

沈义伦每日焚香祈祷：朝廷的救兵，快来吧。

吕余庆“救市”

成都城的药市，草药撒了一地。几名酒气冲天的宋军军校手执大刀，正在行凶抢掠。在这一个月里，这样的灾难每天都在重复。只是一个月前，蜀人眼中还满是恐惧的目光，如今却已充斥着仇恨。几个商人暗中拿起武器，为了保护妻儿老小，准备在迫不得已时奋力一拼。

突然，一阵整齐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成都百姓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整齐的步伐了。商人们抬头望去，一队井然有序的军人手执利刃，跑入药市，迅速控制了闹事的军校。在这队军人身后，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人，宛若一道清风，吹入污浊的蜀城。

当天，闹事的军校就被枭首示众。满城百姓拍手称快，这是孟昶出降以来，成都城里唯一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

吕余庆来了！

王全斌瞪大眼睛，酒气全无。没错，参知政事吕余庆，奉命权知成都府。

不仅是他，朝廷一班文臣也全来了。枢密直学士冯瓒权知梓州，枢密直学士赵逢权知阆州，连那位把符彦卿整得不敢吭声的周渭，也前往兴州担任通判。

赵匡胤尤其看重权知成都府的人选，不仅因为这里是西蜀的中心，是赵匡胤与孟昶争夺民心的核心地带，更因为征蜀大军便驻扎于此。

按理说，王全斌捅了这么大娄子，赵匡胤应该立即调他回京述职。然而，赵匡胤又不得不把他留在成都。一方面，西蜀政局已经开始动荡，为了维持稳定，征蜀的军队不得不继续留在成都，要安定军心，就不能随意更换主将。另一方面，王全斌自知闯了祸，必然害怕朝廷治罪，这个时候令其还朝，只能增加他的疑虑，搞不好会逼得他铤而走险，自立为王。就算他不愿背叛朝廷，可他手下那帮人为了活命，也极有可能胁迫他乱来。

因而，权知成都府要恰当处理与王全斌等将领的关系，既要制止王全斌等人胡作非为，又不能过度刺激王全斌，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想来想去，赵匡胤把这个重担交给了吕余庆。

据说，在不久前的除夕，孟昶曾命学士辛寅逊在桃符上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1]这副中国最早的春联，在当时被视为政治谶语。"余庆"说的是吕余庆权知成都，"长春"说的是赵匡胤的生日长春节。这春联的意思就是过完新年，后蜀并入大宋。

但对于蜀中的老百姓而言，宋军的暴行丝毫没有"长春"之意。倒是吕余庆的到来，确实为他们留了一点"余庆"。

---

[1]《隆平集》称题词者为孟昶，《杨文公谈苑》《宋朝事实类苑》则记载题词者为孟昶的学士辛寅逊，所题文字为"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或"新年纳余庆，佳节契长春"。

吕余庆权知成都府，使王全斌生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这次玩儿大了。官家下旨减免蜀地赋税，可老百姓的钱都进了将士的腰包；官家赦免亡命盗贼，可蜀中最大的盗贼就是他王全斌。自污韬晦也得有时有晌，动静要是太大，自己照样没法交差。

王全斌摸着自己的大脑袋，终于想起了曹彬的话。他喃喃自语道："我听说古代将帅多不能保全功名。不如我就说自己病了，赶紧回京面圣，免得日后后悔。"他身边的人却说："现在到处都是亡命之徒，没有主上的诏旨，不可轻易离去，否则就是擅离职守。"

为了安定蜀中，防止发生变乱，赵匡胤命令原来的蜀国将士全部调往东京，每名士兵皆获得丰厚的赏赐。

愚蠢的王全斌再度出现理解障碍：自古只有奖王师的道，哪有赏俘虏的理？

可惜，吕余庆的职责只是管理成都府的政务，而征调旧蜀将士属于军务，他无从过问。赵匡胤以为，只要吕余庆接管了政务，军事上的事，王全斌是不会出岔子的。可是他忽略了一点，对旧蜀将士的善后工作也是一件政治任务，这远远超出了军事将领王全斌的理解范畴。

抢钱抢出惯性的王全斌私扣赏钱，放纵部曲虐待俘虏，蜀兵大怒，走到绵州，终于反了，还把以前蜀国的文州刺史全师雄劫来当主帅。

全师雄本打算去东京领赏，并谋求高升之路，没想到一朝成了匪首。正当他想着逃脱时，家中却突然传来噩耗。

原来，王全斌派马军都监朱光绪去招抚叛军，可朱光绪招抚的方法却是将全师雄一家抄家灭门，将他的女儿占为己有。

禽兽！

全师雄怒发冲冠！他振臂一呼，正式揭竿而起：全蜀的弟兄们，宋狗欺我太甚！我蜀民安忍其暴？大家举起手中的武器，把宋

狗赶出蜀中！

全师雄的呼声，唤起了所有蜀民的愤怒，星星之火瞬间燃成燎原烈焰。须臾间，十万军民齐暴动，十七蜀州共发难。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开幕府，置僚属，其军队号称兴国军，誓与大宋不两立。

顷刻之间，剑门隔断，邮传不通，孤坐成都的王全斌被熊熊叛火包围。蜀中震恐，局势倾颓，王全斌却用了最为简单粗暴而毫无效率的办法——杀人。

杀全师雄吗？不，杀成都的降兵。慌不择路的王全斌，把成都城里两万七千名降兵全赶进了夹城。

康延泽苦苦哀求：把其中那老弱病残的七千人放了吧。

王全斌回应：无论老弱病残，一视同仁。

四月一日，王全斌手起刀落。落地的不仅是两万七千颗人头，还有宋军最后的节操，他们甚至干出割掉民妻乳房的勾当。“吊伐”之师，彻底沦为野兽兵团……

卧龙跃马终黄土，一将功成万骨枯！

“模范”亡国君死了

更可怜的是孟昶。六月十一日，享受无上尊崇仅仅七日，孟昶暴卒。

斯宅已空，徒留尚书令、楚恭孝王的追认哀荣。赵匡胤辍朝五日，并命朝廷为他出了丧葬费。

开封城里，流言四起。

有人说，孟昶有一位冰肌玉骨、清凉无汗的美人儿妃子，人称“花蕊夫人”，曾被赵匡胤召见朝堂。花蕊当场吟诗一首：“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

儿！”一派豪情，赵匡胤为之折腰。然后，花蕊入宫，孟昶呜呼。

也有人说，自从花蕊入宫，赵匡胤坠入温柔乡，不理朝政。为了让花蕊死心塌地缠住赵匡胤，孟昶必死。这可能是赵光义的杰作。开封府的幕僚里，不是有位善医术的程德玄吗？能医人者，必能杀人。

其实，关于后蜀花蕊夫人的传言真假难辨，“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作者也颇有争议。

孟昶能活着，那是因为他是赵匡胤招降纳叛的旗帜。可现如今，他却成为蜀人反抗赵匡胤的旗帜。

孟昶只有死路一条。

右掖门外的豪宅，国母李氏默然不语。

自古以来，纵然没有把亡国之君捧上天的皇帝，可也难见被臣民送行三百余里的后主。大宋要接管西蜀，孟昶是道永远迈不过去的坎儿。

你既然得了民心，为何不守住天下！李氏没有流一滴眼泪，她静静地将酒洒在地上，自言自语道：“你不能为社稷而死，贪生至今日。我苟且偷生，全是为了你。现在你死了，我还活什么！”李氏自此绝食，数日而卒。

“模范”亡国君已死，现在，不能再让西蜀也变成焦土了。

赵匡胤先拿割乳的西川行营大校祭旗，后用向旧蜀军校索取贿赂的殿直成德钧开刀，一并斩首示众。

当时，有人想为西川大校说情，赵匡胤怒斥道：“兴师吊伐！妇人何罪！竟然残忍至此！速依法处置，以偿民妇之冤！”

杀人已经令人发指，何况还用如此惨绝人寰的方式！

这是怎样的宋军！这是怎样的兴！师！吊！伐！作为宋军的最高负责人，赵匡胤悔恨、愤怒、耻辱！他必须采取措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赵匡胤一面急命客省使丁德裕为西川都巡检使，入援王全斌，

率领宋军讨贼平叛；一面想方设法，拯救宋朝在西蜀的形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赵匡胤三次下诏抚恤原蜀国官僚将士，七次发令减免蜀中赋税。他日夜不停地在宰枢二府的奏章上圈点勾画，将朝廷的效能发挥到最大，以保证西蜀的一切事务尽快得到处理。

可惜破镜已难重圆。虽然两年后，兴国军全军覆没。但三十年后，蜀中一场更大规模的民变正在酝酿。

伐蜀一役，赵匡胤获得了土地，获得了十余年都用不完的财富。唯独那面辛辛苦苦竖起的大旗，却随着西蜀兵乱、孟昶身死，化作竹篮中的清水，再也打不起来了。

乾德五年（967）正月，天气晴朗。西蜀这个火盆终于被浇灭，虽然还在冒着青烟。惴惴不安的王仁赡埋头缓步。西征军队还朝，作为监军，王仁赡“有幸”成为皇帝第一个召见的人。一心避免做李处耘第二的王仁赡，发现自己押错了宝。李处耘弹劾慕容延钊，不过是坐贬淄州。可这次王全斌犯下的事儿，足以让自己掉脑袋。

必须与王全斌划清界限。王仁赡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讲武殿前，王仁赡整理好衣冠，稳了稳情绪，大义凛然地迈步入殿，恭恭敬敬地叩拜在赵匡胤面前：圣躬万福。

赵匡胤头也不抬，一面继续批阅奏章，一面不冷不热地让他起来。

心虚的王仁赡强作镇定地站起身来，开始汇报工作，将他的酒友王全斌、崔彦进干的那些好事，一件不差地抖搂出来。

我是证人，我检举，坏事都是他们干的。王仁赡不断地安慰自己。

可是话讲完了，赵匡胤却没说什么。王仁赡只好咬紧牙关，弓着身子，等待赵匡胤的回应。

讲完了？赵匡胤问。

讲完了。王仁赡答。

赵匡胤放下奏章，终于看了王仁赡一眼。他不屑地问：“纳取

李廷珪的姬女，私取丰德库金贝，这事也是别人干的？”

啊！王仁赡扑通一下跪趴在地，哆嗦得连磕头声都凌乱了。

武德司的分号不是白开的，蜀中的情报早就送到了宫中。王仁赡，你真是自作聪明！赵匡胤没再接着说王仁赡的事，而是问道：“就没有干净的人了吗？”

王仁赡再不敢满口乱说，哭丧着脸说：“有，有。清廉谨慎，不负陛下重托的，只有曹彬一个人。”

赵匡胤铁青的脸上，总算拂过一缕阳光。曹彬，字国华，姨母是周太祖郭威的贵妃张氏，后周时他也算与外戚沾亲。赵匡胤在郭荣手下做小兵时，曹彬正负责管理茶酒。馋酒的赵匡胤曾跑去找他讨酒喝，他却因为所掌为官酒，拒绝了赵匡胤的请求。但让赵匡胤意想不到的是，曹彬竟然自己花钱买了一坛酒，给他送来了。这事让赵匡胤记忆犹新。

后来赵匡胤掌管禁军，曾拉拢曹彬，但怎么都拉不过来。做了皇帝后，赵匡胤问曹彬：“我以前总想亲近你，你干吗老躲得远远的？”曹彬回答说：“我是周宗室近亲，又是朝廷命官，平时办事小心谨慎，还怕出问题，哪敢随便结交大臣呢？”

在党同伐异的时代，能够有这样不偏不倚的大臣，真是难得。赵匡胤龙颜大悦，授予曹彬客省使。从这时起，曹彬已经进入了枢密使的预备队。

此刻，曹彬正与王全斌等人跪在殿下，等待皇帝发落。赵匡胤从御座站起，气急败坏地走到王全斌面前，劈头盖脸地质问：“三万降卒说杀就杀，谁给你的胆子？”

王全斌面如死灰，沉默不语。

赵匡胤正要发作，咦？曹彬怎么也在。他早就听人说，曹彬坚决反对杀降，连杀降的命令都不肯签字。赵匡胤遂指向曹彬道：“曹彬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要是王仁赡，一定会兴高采烈地起身出殿，出殿前，恐

怕还要埋汰王全斌两句。但曹彬就是曹彬。曹彬不退，只管伏地磕头道："臣与诸将一起商议杀戮降兵，朝廷问罪，应该第一个杀臣。"

好你个曹彬，这是来跟朕讨价还价来了。王全斌啊王全斌，你当初要是听了曹彬的只言片语，能落到这步田地吗？

王全斌被移交中书门下审讯。他松了口气，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

赵匡胤很清楚，王全斌一反常态，抄掠蜀中，就是怕自己步了郭崇韬的后尘。而赵匡胤也一直小心谨慎，尽量避免把王全斌逼上绝路。西蜀动乱两年，王全斌还能平安回到东京受审，赵匡胤保他的心思昭然若揭。

左右见状，顺势进言道："西蜀刚刚平定，如果因为劫掠杀人就严惩王全斌，今后陛下还怎么用人？"没想到赵匡胤却回道："不行！现在河东、江南还没收复，如果对王全斌不闻不问，今后任命的大将，恐怕都会无法无天！"

不久，中书门下的审讯有了结果：诸将总共贪污、劫掠钱六十四万余贯，另外私藏蜀宫珍宝无数，克扣兵饷，杀降逼反，王全斌等人对此供认不讳。

正月二十三日，赵匡胤令御史台集合百官，朝议王全斌等人该当何罪。次日，百官上表：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论罪当死。赵匡胤却表示，这次暂且饶过。随后，朝廷专门升随州为崇义军、金州为昭化军，将王全斌、崔彦进分别贬为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和昭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王仁赡罢出枢密院，贬为右卫大将军。三人及其元从军将所掠财物一并退还，至于诸军将士，法不责众，也只好息事宁人。

至此，北路凤州军的将官"全军覆没"。直到开宝九年（976），赵匡胤巡幸西京时，这些人才先后重返朝廷。

相对于北路凤州军，东路归州军的将官却托曹彬的洪福，因祸

得福。刘光义没升没降，平安无事，大概是征伐西蜀之功与不能劝谏兵乱之过两相抵消；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张廷翰、虎捷左厢都指挥李进卿分别升任侍卫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并领节度使。这是朝廷新设置的职位，是马军、步军仅次于都指挥使的重要统兵官。沈义伦在曹彬的举荐下，升至兵部侍郎，并接替王仁赡，出任枢密副使。

收获最大的是曹彬，连升两级，从内客省一跃而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军节度使。曹彬自认为没能阻止兵乱，愧不敢当，入宫请辞道："诸将都判了重罪，唯独臣受赏，心中怎能自安？臣不敢奉诏。"

赵匡胤和颜悦色地挽起曹彬，说："卿有功无过，又不恃才夸功。你要是有半点过错，那个嘴上不留德的王仁赡能放过你吗？惩恶扬善，这也是朝廷制度，卿就别推托了。"

赵匡胤在曹彬身上，看到了李处耘的影子。他现在多么思念李处耘，又多么后悔未起用李处耘征蜀。

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乾德四年（966）闰八月二十四日，郁郁寡欢的李处耘病逝于淄州刺史任上，享年四十有七。

其实早在乾德二年（964）二月，李处耘长子李继隆随母入朝，庆贺赵匡胤生日时，赵匡胤便顾念旧情，特恩恢复李继隆的供奉官。

李处耘死了，赵匡胤很悲痛。他特别下诏废朝，赠官宣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赐地葬于洛阳偏桥村。以李处耘当时的刺史之位，这样的待遇堪称殊礼。

因为赵匡胤对李处耘有愧，他不杀李处耘，李处耘却因他而死。若非他一开始过分强调统帅与都监的彼此制衡，就不会生出后来的那些是是非非。

伐蜀之役，至此总算草草收场。

最后，还有一则有关孟昶的"八卦"值得一提，那便是"七宝

溺器”。

宋灭后蜀后，赵匡胤遣右拾遗孙逢吉到成都，接收蜀地的图书法物，运回京城。其中的一万三千卷图书，被收入史馆珍藏。那些无用的法物，被悉数焚毁。此外，还有几幅精美的画卷，赵匡胤询问这些平时作何用途，得到的回复是“奉人主一人而已”。赵匡胤不屑地卷起画卷，交给左右说：“一个人看有什么意思，不如让大家都来看看。”于是，他把这些画赐给了东华门外的茶肆。

在运回的这批物品中，最著名的要数“七宝溺器”。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嵌满珠玉金石、细琢精雕的夜壶。据说赵匡胤看到以后，便狠狠地将它扔到地上，并命人赶紧毁掉。他还不无唾弃地说了一句：“日子过得这么奢侈，不亡国更待何时？”

“七宝溺器”的故事在北宋流传甚广，自北宋前期的杨亿，到北宋中期的欧阳修、司马光、曾巩，再到南宋的江少虞，莫不记录。可偏偏在宋初官修的《旧五代史》里，找不到“七宝溺器”的蛛丝马迹。这不禁使人怀疑，“七宝溺器”的故事，源自北宋坊间对孟昶的妖魔化想象。

六、“宋挥玉斧”的传说

不温不火的宋理关系

还有一件与宋灭后蜀息息相关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广为流传的“宋挥玉斧”的传说。

据说，王全斌在乾德三年（965）灭蜀后，便献上蜀中地图，并建议渡过大渡河，继续向西南用兵，收复越嶲之地。

所谓越嶲，指的便是以大理国为主体的今云贵一带。因汉朝曾在这一地区设越嶲郡，后世遂以越嶲称其地。

赵匡胤却认为，唐朝长期与云贵地区的南诏国交战，国力严重耗损，这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之一。因此，他拿起玉斧，在地图的大渡河上一划，随口说道："大渡河以外之地，朕不取。"

这则赵匡胤害怕与大理国交战导致亡国，于是主动放弃大渡河以南土地的故事，自宋代流传至今，已经有900多年了。"宋挥玉斧"四个字，更是因写入昆明大观楼长联而闻名于世。

故事虽然传奇，但越传奇的故事往往越做不得真。

宋理之间确实长期以大渡河为界，王全斌的征蜀大军也确实止步于大渡河，但这并非由于赵匡胤划了一条"停火线"，而是因为自唐朝后期以来，大渡河就是北方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天然分界线。

其实，就在宋灭蜀后不久，大理便主动向宋廷表达了善意。乾德三年夏天，建昌城演习爽（城主）向大渡河北岸的黎州递交牒书，恭贺大宋平蜀。建昌城臣服于大理，是大理北部会川都督的核心辖区，而会川都督所辖正是大渡河南岸。

然而，此时的蜀中，全师雄已经起事，王全斌被围在成都城里，邮传不通。贺信送至成都乃至开封的时间必然延迟。而王全斌疲于应付蜀乱，又哪有精力去管大渡河以南的事？

乾德六年（968）二月，大理建昌城再度递牒到宋朝黎州，请求通好。很不巧，这一年赵匡胤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付北汉上，并将在下一年亲征北汉。因此，大理通好的牒文自然又石沉大海。

此后，吃了两次闭门羹的建昌城演习爽不再出马，而是找了一帮小弟继续向宋朝进贡。在会川都督辖区的北部，杂居着许多少数民族，其中以邛部川、风琶、两林三部实力最强。这些少数民族从宋朝的角度看，生活在黎州之外，因此被称为"黎州诸蛮"。

黎州诸蛮往往同时臣服于大理和中原王朝。由于黎州诸蛮杂居

在大渡河之外，因此其地成为大理国与宋朝的缓冲区。大理在两次请求通好不成的情况下，便利用黎州诸蛮的特殊身份，与大宋维持着外交往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理通过黎州诸蛮进贡宋朝，总算得到回应。开宝二年（969）六月，就在宋朝刚刚结束与北汉的战争不久，两林蛮首领勿儿、邛部川蛮都鬼主（首领）阿伏均向黎州提出入贡。这一次，宋廷终于同意，“至是来朝，赐以器币”。

到赵光义做皇帝时，双方的关系有了实质性进展。

雍熙二年（985），邛部川蛮都鬼主诺驱遣王子入贡，因封怀化将军，后又封忠顺王。淳化（990—994）末年，宋廷下了一道诏书，直称诺驱为“大理国主”。显然，宋廷也知道，邛部川蛮进贡的背后是大理国的派遣。

淳化五年（994），蜀中又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声震川西。起义失败后，李顺下落不明，宋廷怕李顺逃入大理，于是在至道元年（995），派辛怡显出使邛部川蛮，辛怡显并未止步于大渡河南，而是一路走到了大理国的国都羊苴咩城。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此前大理与宋朝打交道，无论是以地方官府“建昌城”的名义，还是以代理人“黎州诸蛮”的名义，都非直接以大理国为名。而代表宋朝与大理打交道的，也始终是黎州地方官府。辛怡显出使羊苴咩城，虽然目标是找寻李顺，但仍可谓宋理两国第一次国家级别的友好往来。

从开宝二年（969）二月，宋廷接受朝贡开始，历经太祖开宝四年（971）、六年（973）、八年（975），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八年（983），雍熙二年（985），端拱二年（989），淳化元年（990）、二年（991），至道元年（995），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景德二年（1005）、三年（1006），大中祥符元年（1008），仁宗天圣八年（1030），宝元元年（1038）和庆历四年（1044），黎州诸蛮始终作为大理国的代表，与宋朝保持友好往

来，或朝贡，或有军事合作，双方关系极为密切。

当然，在黎州诸蛮朝贡之时，大理国也不忘提出请求册封的要求。宋朝则一如既往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在一封回复大理国的诏书中，宋廷便以辽夏边患、中原闹灾等借口，婉拒了大理的请求。宋朝希望继续维持“黎州诸蛮模式”的宋理关系。

由此可见，在宋初，一则蜀地频繁骚动，二则北方先后有北汉、契丹、西夏的威胁，大理悬远，宋朝根本鞭长莫及，甚至连对大理的朝贡、请封都不甚积极。因此，王全斌用兵西南的请求纯属子虚乌有，而赵匡胤不欲征服大理倒是事出有因。

阻止“西南开边”

宋朝与大理关系的再次升温，已经要到宋徽宗时代了。当时，徽宗以变法派自居，刻意模仿宋神宗的“熙河开边”，于是也搞出了一个“崇宁开边”，最著名者，当属一度把西夏逼入绝境，以及“收复幽蓟”的闹剧。

在这样的氛围下，政和七年（1117）二月，宋徽宗正式册封大理中宗段正严为大理国王，大理国150余年漫长的请求册封之路终于有了结果。

顺便一提，段正严还有个别名——段和誉。没错，他就是《天龙八部》里段誉的原型。

受册封大理国王一事的鼓舞，政和末年，宋廷内部又有了更加积极的建议，请求在大渡河以南设置城邑，以便与大理国互市。这是要正式跨过这条唐后期以来的天然边界，重新在大渡河外建立行政建制。

但是，许多朝臣对徽宗的西南开边不以为然，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以徽宗好大喜功的性格，一定会将“互市”演变为强取豪

夺。在开边激励的刺激下，西南开边又怎么会止步于和平的人贡与互市？

为了阻止徽宗跨过大渡河，知黎州宇文常在上书中提到："孟氏入朝后，太祖皇帝取来蜀地地图，画大渡河为国界。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一百五十年了，一直都没有西南夷之患。"

关于赵匡胤画界一事，此前不见于任何记载。宇文常在宋理以大渡河为界的既成事实上，赋予了"祖宗之法"的权威。事实证明，宇文常的手段相当有效。宋徽宗最终认同了这条"祖宗之法"，停止了越过大渡河的举动。

有关"祖宗之法"，我们在后面再专门展开说。

宋徽宗的"崇宁开边"看上去硕果累累，实际上却是回光返照。北宋收复幽燕后，招来了金人南下，最终使得北宋在靖康之难中覆灭。

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后，南宋君臣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无论是积极北伐还是消极防守，都把金朝作为首要对手。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多年来"唐亡于南诏"论的流传，南宋君臣对大理国更是严于防范。仅高宗绍兴年间，就有翰林学士朱震、知黎州唐矩重申"太祖画大渡河为界"，他们明确提出，"太祖画大渡河为界"的动机是有鉴于"唐亡于南诏"。

再到后来，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个完整版的"宋挥玉斧"故事逐渐成形。南宋人周煇在《清波别志》中援引了《西南备边录》的说法，这是目前所见有关"宋挥玉斧"最早的记载。

《西南备边录》又称《西南备边志》，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6记载，该书作者是绍兴末年嘉州的进士邓嘉猷。此书成于孝宗乾道时期（1165—1173）。

与此同时，南宋官方也在积极推进对"宋挥玉斧"故事的构建。据《清波别志》记载，黎州大渡河畔后来建起了"划玉亭"，这显然是黎州当地官府所为。"宋挥玉斧"从一个政治传统，到一

个文人故事，至此又有了实物，也就是在南宋中期，逐渐被朝野各种身份的人士所接受认同。

南宋理宗时期，祝穆撰《方舆胜览》。作为本朝地理书，《方舆胜览》在“黎州”“嘉定府”下四次提及“宋挥玉斧”。其中一条写道：

> 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复越嶲，艺祖皇帝以玉斧画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

至此，再加上“唐亡于南诏论”，就有了我们今天广为流传，“赵匡胤怕攻打大理招致亡国，于是用玉斧在地图上以大渡河划界，主动弃大渡河外土地”的“宋挥玉斧”的故事了。

然而千百年后，谁还记得当年最早编造这个故事的宇文常，是为了阻止一位好大喜功、好高骛远的专制皇帝胡作非为呢？

第五章

再造中央

一、实现削藩三策

将基层纳入朝廷管辖

以湖南改革为起点，赵匡胤在南方新征服的土地上广泛实行朝官知州和通判制度，将州政收归朝廷，又以天雄军为代表，在北方旧藩镇中推行朝官知县制度，将县政乃至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纳入朝廷的行政体制。

这样，作为高层政区的藩镇权力开始萎缩；作为中层政区的州、底层政区的县，权力开始由朝廷掌控。但赵匡胤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将皇帝与朝廷的手伸向基层。

早在建隆三年（962）十二月四日，赵匡胤便下诏，在县中设立县尉，负责县内的诉讼、治安、消防等事务，而这一切过去都是由镇将负责的。我们在前面讲过，五代时期，节度使派亲信去县中担任镇将，名义上负责治安，可实际上由于手中掌握着弓手等基层武力，因此常常凌驾于县令之上。他们甚至有独立的奏事权，能够绕过县令，直接向州刺史乃至节度使汇报工作。因此，赵匡胤的高祖父赵朓做县令时，常常要面对来自镇将的挑战。

而赵匡胤的这道《置县尉诏》，将藩镇控制的镇将的权力，全部移交给朝廷任免的县尉。特别是，镇将统率的基层武力弓手，也被移交给了县尉，纳入朝廷的基层行政体制。一方面，藩镇在县里的权力，被朝廷收夺；另一方面，与州刺史的权力被知州、通判、兵马都监拆分一样，镇将的权力也被知县（或县令）、县尉拆分，即将军政和民政分离，避免武人干政，又使县中再也不会出现像镇

将这样大权在握的长官。最重要的是，县尉所统率的基层武力——弓手，由县中的农民组成，通过设置县尉，朝廷不仅将手伸到了县里，更伸到了社会的基层。

就这样，通过州、县官员的层层任免，层层权力分割，不仅皇权将地方管辖重新纳入自己的行政体系，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也大大加强。整个两宋时代，在地方割据力量被削弱的同时，被迫揭竿而起的农民也再难成大气候。这样的“稳定”结构，早在宋初，便已埋下伏笔。

收夺藩镇人事权

除了行政权外，藩镇的人事权和司法权也是朝廷要“夺”的对象。

在赵匡胤篡夺皇位、缔造宋朝的过程中，最为倚重的一直有两股力量。一股就是我们在前面特别关注的禁军，另一股则是他的藩镇幕僚。

唐末五代以来，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都有自己的幕府，在幕府中供职的便是幕僚，他们所任的官职便是幕职官。这些幕职官的名号很多，如文职有节度副使（节度使副职）、行军司马（掌军政后勤）、判官（总掌府事）、掌书记（掌文书）、推官（掌司法）、巡官（掌财政）等，武职有兵马使（掌兵）、都押衙（掌仪仗、警卫）等。

节度使辟署幕僚，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朝除，就是由朝廷自上而下派人去做幕僚；第二种是奏荐，也就是节度使向朝廷推荐某人，朝廷认可后即正式批准任命；最后一种是自辟，也就是节度使自己辟署幕僚，朝廷完全不干预。

唐朝末年，中央瘫痪，节度使的幕僚几乎都是自辟。进入五

代以后，朝廷不断加强集权，表现之一就是不断扩大幕职朝除的范围。

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八月，曾经对幕职官的辟署形式做过明确划分，大体上是高层幕职官朝除，中层幕职官奏荐，低层幕职官自辟。可到了显德二年（955）六月，周世宗乘着军事余威，打破了这一规定，大批原属奏荐的中层幕职官也被纳入朝除范围。当然，律法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另一回事。但总体上，在朝廷的军事优势压力下，藩镇的人事任免权越来越少。

不过，还有一类幕职官是例外，这就是随府幕职官。简单来说，就是节度使走到哪里，这些幕僚就跟到哪里。由于传统的惯性太大，连周世宗都不得不做出妥协，在显德二年扩大幕职官朝除范围的同时，特别规定，大部分高层随府幕职官仍然可以奏荐。

谁掌握了人事任免权，官员自然就对谁负责。

赵普、李处耘、吕余庆、沈义伦、王仁赡、楚昭辅，这些在前面一再被提及的人物，当年都是赵匡胤的随府幕僚。他们与赵匡胤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与朝廷的关系反而若即若离。正因如此，节度使们都有一群运筹帷幄的智囊团。

所以，稍夺其权，夺的不仅是行政权，还要夺人事权，只有这样，朝廷才能从藩镇手中夺取人才。

乾德二年（964）三月九日，赵匡胤打破了显德二年的幕职辟署制度。新制规定，藩镇不得私自辟署幕职官，幕职人员一律由朝廷委派。换句话说，低层幕职官也改为朝除，所有的幕职官都成为中央人事部门统一除授、统一管理的“朝廷命官”。

七月二十一日，赵匡胤又下诏，规定掌书记不得由初任官担任，而必须由历经两任的文学之士担任。

这里解释一下“任”。任是当时差遣、职事官的除授单位，任内除掌握相应的权力、负责相应的工作外，也享有相应的俸禄、权益。满任后，相应的工作就要停止，而且也不给差遣、职事官的俸

禄。这时，官员要等待朝廷人事部门授以新的差遣或职事官。一任的期限因差遣、职事官的不同，或时代不同而异。有两年、两年半的，甚至还有四年的。任是重要的官资，许多差遣、职事官规定，必须满一定任数才能担任。

在幕职官中，掌书记相当于朝廷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他们既掌握着文书的起草收发，也是节度使处理政务时的重要参谋。规定官资为两任者才可出任，是为了保证掌书记均有治政经验；规定文学之士，则是为了提高掌书记的文化水平，保证其能胜任，从而提高地方官府处理政务的水平。

乾德三年（965）三月二十七日，宋廷要求节度使不得以亲吏代为署理地方事务，以防节度使把官衙开成私家店铺导致地方吏治腐坏。

这年十二月，赵匡胤的义弟北海军使杨光义任期已满，理当还朝改授他官。但由于杨光义为政简易，深得当地民心，所以北海军（此处的“军”是州级行政单位）的数百名百姓不辞辛苦，自发到开封请愿，希望能够让杨光义留任。

赵匡胤拒绝了百姓的请愿。对待自己的义弟、一个州级官员尚且如此，赵匡胤改革地方官员逾期留任的决心可见一斑。次年（966）七月二日，朝廷正式下发诏令，规定从节度使到州县官，所有地方官员任期满后，吏民不得到京师请求官员留任。此举旨在防止以节度使为首的地方官员，通过煽动民意来长期待在一个地方，发展其势力。

人事权上交，距离架空节度使就为时不远了。然而，各大藩镇真的甘心拱手将权力交给朝廷？当然不甘。只是鉴于强藩如符彦卿、郭崇、孙行友、李筠，或对朝廷低眉顺首，或为朝廷和平召回，或被朝廷武力剪灭，其余的藩镇并不敢公开跟朝廷叫板。不过，他们心中有怨，不吐不快。于是，有些人忍不住，成了消极抵抗朝廷削藩的出头鸟。

这只出头鸟名叫高从志，供职武宁军。这年九月，他因受贿而遭到流放。武宁军的节度使是高继冲——没错，就是那个被“假湖灭荆”的前荆南节度使。高从志不是武宁军一般的属员，而是高继冲的元从军将——打从高氏割据荆南时就跟着他们。因此，高从志正是朝廷要着力打击、不许干预地方政务的节度使“亲吏”。

按理说，正在削藩的风头上，高从志又是重点打击对象，高继冲又是降人身份，他们本该低调。可偏偏高从志不知收敛，高继冲也未加阻止。如果不是高从志对高继冲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以至于高继冲全然不知他犯案的事儿，那就只能说明，高继冲在以这种方式向赵匡胤提出抗议。

赵匡胤的回复当然是抗议无效。只不过对于节度使，尤其是高继冲这样身份复杂的节度使，赵匡胤有些投鼠忌器。因此，他以流放高从志的方式来敲打高继冲，并下诏给所有节度使、州刺史：你们要恭谨遵守朝廷之前所发的诏令，以免后悔！

在朝廷的力量绝对压过藩镇之前，赵匡胤仍不愿过分刺激节度使，改革仍需安和稳定、循序渐进。但他一定要让节度使明白，只要我想，随时可以对你们这些藩镇予取予夺。

慎刑与“人命至重”

五代时期，司法权也掌控在武人手里。这些人要么不熟悉律法，要么没有公平执法的概念，导致司法领域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有法不依，随意执法，动辄判处重刑。

这一点，赵匡胤体会最深。毕竟，当年一征淮南时，他初到滁州，也差点让无辜百姓做了自己刀下的冤鬼。

这件事给赵匡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而在做了皇帝后，他便吸取教训，采取了慎刑的态度，尤其对死刑，非常谨慎。建隆二年

（961）五月发生的金州案就是其中的代表。

宋初，金州有个老汉名叫马从玘，为人忠厚。可他的大儿子马汉惠却是个泼皮无赖，不仅为祸乡里，甚至还谋害自己的族人。乡亲们对他是又恨又怕。马从玘拿这个儿子实在没辙，只好与妻子和次子一起杀掉马汉惠，为乡里除了一害。

中国传统社会遵从儒家推崇的孝道，反映在律法方面，便是对“父杀子”罪行的从轻惩罚。宋初，相关法律仍然沿用《唐律疏议》的条文，条文规定：对于违犯教令的子孙，如果祖父母、父母将其殴打致死，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如果是用刀砍死的，判两年；如果杀死的是没有违犯教令的子孙，惩罚要加一个等级；如果是过失杀死子孙的，则判无罪释放。

因此，按照法律，马从玘夫妇以父母身份杀死作恶多端的儿子，应该判处一年半至两年的有期徒刑，至于他们的次子，因为是从犯，所以也罪不至死。然而，金州防御使仇超与他的主要僚佐判官左扶在明知律法条文的情况下，仍然故意以谋杀罪处决了这一家三口。

赵匡胤闻讯勃然大怒。他不仅将二人罢去职位，除去官员身份，还在施以杖刑后，流放海岛。这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四个月后，赵匡胤发布诏令，要求各地平反冤假错案，国家的司法状况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

以此为契机，赵匡胤开始大力推进政策，完善司法体系。

首先是推进立法工作。

宋初律法以二三百年前的唐律为基础，兼用唐朝中后期及后唐、后晋、后周的相关律法，律令繁多混乱，使得执法者没有统一的律法可依。这简直就是有法不依、随意执法行为的温床。虽然周世宗时曾编撰了《周刑统》，但是条文仍然繁复，也不够严谨全面，使用起来依旧不便。

因此，建隆四年（963）二月，赵匡胤命判大理寺事（相当于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窦仪等人，再度修订法律，于当年十二月编成《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三十卷，作为固定的律典；同时，又将自《周刑统》编成后，皇帝针对特定人和事发布的敕条编成《建隆编敕》四卷，作为《重详定刑统》的补充，颁行天下。

《重详定刑统》和《建隆编敕》使宋朝首次有了可供全国统一遵循的律法，也基本奠定了宋朝的法典体系。一方面，它反映了由唐至宋这两三百年间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更加适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另一方面，它又贯穿着赵匡胤“宽仁”“慎刑”的司法理念，对两宋三百年间的法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推进立法的同时，赵匡胤又推动了司法机构改革。

五代时期，各地民事审判机构普遍遭到破坏，负责审理民事案件的几乎都是军事法庭。在中央，刑部和大理寺形同虚设，实际主持司法工作的是军巡院；在地方，则有马步院、子城司这些机构负责审理案件。只是看名字就能知道，这是一堆武人把控的部门。

因此，有多少冤假错案，不在于有多少个仇超和左扶，而在于军巡院、马步院、子城司。开宝五年（972）七月，子城司被禁止从事司法活动；开宝六年（973）六月以前，军巡院从侍卫司划给了开封府，改造成常规的司法机关；开宝六年七月，马步院则被司寇院取代。而且凡是负责司法工作的官员，一律用文官，严禁武人干涉司法。

建隆三年（962）三月，赵匡胤又宣布恢复死刑复核制，要求地方如果要判决死刑案，就必须将审判的卷宗上报朝廷。朝廷的大理寺对案件依法决断后，报送刑部复核；刑部审核无误，才能将案件转交给宰相机构中书门下，做最后的裁决。以死刑复核制为代表，宋代的司法体系在太祖朝初步形成，宋人重视证据的司法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在恢复死刑复核制前夕，赵匡胤语重心长地说道：“五代诸侯飞扬跋扈，经常枉法杀人，朝廷竟然置而不问，刑部的职能几乎废

止。况且人命至重，朝廷要如此姑息藩镇吗？”

以“人命至重”为核心的统治理念，以慎刑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为日后大宋三百余年的政治文明划出了准线。

用金融手段“制其钱谷”

作为大一统王朝，中央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地方征收的。因而，如何对这些财税进行分配，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问题。

在众多的税收中，作为农业税的两税及其附加税是最重要的一项。自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起，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两税三分制，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两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朝廷，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或留使；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

黄巢起义以后，唐朝的统治秩序崩溃，两税三分制也随之瓦解。脱胎于藩镇的五代开始建立新的财税体制。一方面，藩镇和州县的大量钱物，包括两税、商税等，在名义上“系省”，也就是在名义上都属于朝廷，对于这种国家正常预算范围的收支钱物，宋人称为“系省钱物”，这与唐后期的两税三分制有了本质区别。

另一方面，朝廷对系省钱物的掌控却相当有限。藩镇、州县既有驻军，又有官员，军有军饷，官有官俸。这些开支，绝大部分由系省钱物担负。这部分来自当地财政收入的系省钱物，藩镇和州县自然无须上供给朝廷，直接从税收中支出就可以了。可因为有这样的口子，藩镇和州县总是想方设法过量占有系省钱物。更有甚者，连应该上供的钱物也被节度使截留。再加上藩镇手中握有大量征收商税的场务，节度使依旧富甲一方。而只要有钱，藩镇就不愁养兵。

财税的征收包括现钱、粮食、布帛等多种形式。藩镇要养兵，当然需要囤积大量粮食布帛，以供士兵吃穿。可相较于此，节度使们对现钱的需求更紧迫，这种需求是由兵制决定的。

当时，无论是中央的朝廷还是地方的藩镇，都在军队中普遍实行募兵制。士兵完全脱离生产，与朝廷或藩镇建立雇佣关系。士兵为雇主卖命打仗，雇主给士兵发兵饷。这些职业军人本质上与今天拿工资的上班族没有区别。作为货币的现钱方便购买生活用品，因而绝大多数士兵都要求以现钱作为报酬。

结果，谁拥有更多货币，谁就有能力笼络更多士兵，操控军队，呼风唤雨。而五代的财税体制，显然更有利于藩镇聚敛货币，这就成为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为了聚敛更多的现钱，藩镇还大收商税，操纵金融，无所不用其极。

宋初，这样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当时国家初立，赵匡胤不可能去跟节度使“抢钱”，于是，只好“曲线救国”，于建隆元年（960）四月下令宽征商税，以变相减少藩镇的货币收入。[1]

到了乾德二年（964），随着“稍夺其权”开始在南北同时落实，赵匡胤将“制其钱谷”提上了日程。在赵普的建议下，赵匡胤下诏，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商税，除了留在州中用于日常开支外，其余的货币一律送往京师。次年三月，赵匡胤又重申了这道命令。

两道“乾德诏令”，不仅重申了藩镇钱物的系省，更在事实上剥夺了节度使对货币收入的合法占有。因为这一次，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币都要送入京师。

如此抢夺藩镇的钱袋子，赵匡胤就不怕节度使造反？

当然怕，所以赵匡胤做了妥协。尽管各州要将自用经费以外的

[1] 据《宋大事记讲义》，宽商税的命令于建隆元年（960）二月颁布；《宋会要辑稿·食货》记此事在是年四月；《文献通考·征榷考一》载有此事，但未记月份。

财税全部上缴，可是自用经费有多少，全由各州说了算，各州完全可以虚报经费。更何况，当时绝大多数州府的行政权还握在节度使手里。两道诏令，充其量还是对钱物系省的老生常谈。藩镇并没有太大损失，自然不会有抵触情绪。

可这就意味着，朝廷的国库依然没多进多少钱。

别着急，赵匡胤还有后手，这一次，他动用了金融手段。

早在唐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大宗贸易中越来越依赖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可是作为货币的现钱太笨重，运输携带极为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社会上出现了飞钱业务。

在京经商的商人，可以将大量现钱交给节度使的进奏院（相当于驻京办事处），或交给京城富商开办的连锁金融机构，然后拿着进奏院或富商开出的票据，到相应的藩镇取款办事，这种汇兑业务就是飞钱。

通过飞钱，藩镇吸纳了巨额货币，操控金融，大发横财。唐朝朝廷虽屡下禁令，但由于飞钱符合市场需求，因此屡禁不止。

一心收夺藩镇财权的赵匡胤，当然不会放纵节度使靠飞钱敛财，但也知道再下禁令于事无补。他干脆自己做起了飞钱业务。开宝三年（970）五月十七日，赵匡胤在开封开设便钱务，规定商人可以将现钱交给国库，然后由便钱务发给票据，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

由于此前赵匡胤的两道“乾德诏令”已经重申了钱物系省，并要求货币送入京师，这就为便钱务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便钱务成立时，大规模的节度使迁调、罢免工作已经开始，自顾不暇的节度使既不敢也无力公然反抗。

这样，国库不断吸纳商人的货币，而各州以留州名义虚报截留的货币却被商人兑换走，地方的货币变相流入了朝廷的国库。在专业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合下，“制其钱谷”完美收官。

在制其钱谷的过程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个是朝官知场务。建隆元年（960）十一月，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后，便派枢密直学士杜铎监扬州税务，直接掌控一地的征税大权。这是朝官知场务的开始，甚至比朝官知县还要早。到了赵匡胤统治中期，朝官知场务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另一个是杯酒释财权。据说，赵匡胤曾在便殿举行酒宴，席间问一位节度使："你除了上缴给朝廷的钱帛外，每年自己能留下多少钱？"节度使报了一个数额后，赵匡胤又问："你看这样行不行？这笔钱我来出，算你个人收入。你也不用守在藩镇了，干脆入朝为官，与朕日日宴乐。你以前每年收的钱，我照数发给你。怎么样？"节度使欣然同意。

"杯酒释财权"颇为传奇，很像是仿照杯酒释兵权杜撰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反映出的基本逻辑却是真实的。"杯酒释财权"后，朝廷的收入虽然没有增加，但节度使却因个人收入没有减少，而对朝廷收缴藩镇财权的抵触情绪大为下降。这与杯酒释兵权一样，都是通过一种经济补偿，来达成赎买的目的。

收夺藩镇精兵

失去行政权和财政权的藩镇，兵权自然也握不长久。

与"制其钱谷"类似，为了"收其精兵"，赵匡胤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早在建隆二年（961）五月，他便下诏，要求藩镇提升那些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这道诏令获得了广大藩镇的积极响应。因为藩镇登记的精锐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财税，从而就越有财力雇佣更多的士兵，供养更多的军队，然后对抗朝廷。

藩镇想得很美，却没想到因此掉进了赵匡胤的陷阱。

乾德三年（965）八月，赵匡胤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发布了开国以来第一道收编地方精兵的诏令。收兵令要求藩镇将精锐士兵送至开封，由朝廷的军头司负责拣选，符合标准的就留下补入禁军，不符合的就退回藩镇。由于有了四年前的准备，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镇精兵的实际人数，使得藩镇无法瞒报。就这样，全国的精锐部队被征集到首都开封，藩镇军队走向衰落。

此后，地方精兵源源不断被送入中央，驻扎在京城的禁军迅速膨胀到几十万人。几十万人的军费开支成了严峻问题。

募兵制下，军人的工资以及军队的粮饷、装备全靠朝廷支付。对于朝廷而言，既没钱养这么多人，也不需要这么多人，最佳的解决之道就是裁军。可传统募兵体制下，军队根本就裁不下去。因为对职业士兵而言，被裁员就意味着失业，意味着一家老小要喝西北风。这帮人本来就是刀尖舔血的亡命之徒，真被逼到悬崖边上，分分钟给你再上演一次唐末五代炒老板、抢首都的传统兵变。

既要裁员，又不能裁员，这个矛盾恐怕早就被五代时期不少掌兵者看穿了。可是在兵变之祸此起彼伏的年代，谁也不敢轻易去捅这个马蜂窝。强势如周世宗，当年整顿禁军时也只能对裁员一事徒叹奈何。

直到宋朝建立。

建隆元年（960），赵匡胤尝试用一种新方法协调矛盾。他在禁军中设置剩员，专门安置军中的老弱病残。剩员仍然保留军籍，但不用再上前线，平时只负责铺道路、盖房子、疏河道之类的劳役，因此领取的兵饷也只有一般士兵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剩员的设置巧妙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首先，让老弱病残退下来，使禁军的战斗力大为提升；其次，剩员开支小，朝廷养兵压力大为缓解；再次，由于剩员负责劳役，朝廷就能减少雇佣或征调民夫，原来的劳役人工成本实际上抵冲了剩员的养兵经费；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剩员保住了饭碗，于其个人不至于家破人亡，于国家不

至于诱发兵变民变。

在军中小范围设置剩员后，并没有在军中引起波动。于是，赵匡胤下定决心，到第二年的五月，正式为整个禁军设置剩员。由于有了剩员，当数十万的藩镇精兵齐聚开封后，赵匡胤也有了解决办法。

此后，他严格执行对禁军士兵的甄别拣选，不合格者全部淘汰为剩员，禁军兵力一度被精简到12万人。

随着精兵不断内调，地方军队渐渐只留下了老弱病残。他们也和剩员一样，变成了不再出征的劳役之兵，被称为“厢军”。由于功能相近，“厢军”逐渐取代“剩员”，成为从禁军淘汰的士兵的代名词，这种淘汰被称为“落厢”。禁军与厢军的分别，从中央与地方，变成了是否作战。作为战斗序列的地方军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至此，赵匡胤和平收编了藩镇军队，这也标志着他不动声色地实现了削藩三策，再造了一个久违的强势中央。

再造中央的制度安排

实现削藩三策，其实和杯酒释兵权一样，只是“收权”。那么，又该如何保证收回来的权力不再失去呢？

还得靠制度。

针对地方行政权与财政权，赵匡胤将湖南改革以来的文官知州、知县制度，通判制度，转运使制度推而广之，以分权为特征的宋代地方制度逐渐形成。

与收夺行政权和财政权相比，收夺地方兵权后，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浮出水面：地方军队消失了，谁来维护地方治安和边镇安全？

既然厢军不行，那就只能靠禁军了。

到赵匡胤晚年，随着宋朝疆域的扩大，禁军兵力增长至19.3万。对于这近20万禁军的使用，赵匡胤采取两个原则。

第一原则是内外相制。赵匡胤将10万禁军驻京，10万禁军外派地方。一旦京师生变，各路兵马就能联合起来，讨伐不臣。而一地一州的禁军，又不足以发动颠覆天下的兵变。与此同时，京师及周边地区同样遵循内外相制原则。皇城内外，分别由武德司（后为皇城司）与殿前司的军队分别驻守，相互制衡，而整座开封城的军队，又与开封府地方的“府畿之兵”（开封府及其属县的军队，驻扎在开封城郊）相互牵制。如此，就达到了强干弱枝、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的目的。

第二原则是更戍法。其实让禁军进驻地方的办法，五代时期也用过。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禁军能够对当地藩镇形成威慑。可是久而久之，屯驻在地方的禁军成了地方军队，与藩镇兵合二为一，反而加强了藩镇的实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在禁军中实行更戍法。屯驻在地方的禁军每隔一两年，最多三年，就要更换一次驻地，或者调入京城修整。更戍法换兵不换将，这样既能保证将领长期驻守一方，熟知地利风俗；又能防止士兵与将帅结成根深蒂固的私人效忠关系，从而降低地方叛乱割据的概率。

对于赵匡胤来说，宋初面临的最大的历史命题，便是如何使宋朝免于沦为第六个短命小朝廷“后宋”，如何使宋朝彻底摆脱五代改朝换代、兵祸不断的诅咒，从而为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奠定基础。赵匡胤的一系列集权政策和制度组合拳，彻底解决了这些历史难题。中唐以来的兵祸，以及兵祸引发的政治动乱，至此彻底根除。

而此前“杯酒释兵权”留下的尾巴，至此也就迎刃而解。

昔日的禁军高级将领到地方担任节度使后，尽管久踞雄藩，备

受优待，却根本没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李筠。

在渐进式集权的大氛围下，他们甚至相当配合和知趣。

最突出的要数王审琦，他在忠正军做了八年节度使。当时，他管辖下的某个县的官员犯了法，县令自行免了这名官员的官职。可按惯例，这种人事任免，县令必须请示节度使。忠正军的幕僚大为不满，向王审琦汇报，要求巡察县令。王审琦却说："五代以来，藩镇强横，使得县令不能专心处理县政。现在天下太平了，我勉强来当节度使，而辖区内的县令能够罢免不称职的官吏，这本来是值得奖赏的事情，有什么好巡察的？"

像王审琦这样深明大势的原禁军高级将领虽然不少，不过大多数没他这么好的素养。比如石守信，担任节度使期间专事聚敛、大兴土木；最早被罢军职的赵彦徽，在藩镇内也是不恤民事，成了敛财的土财主。

因此，杯酒释兵权后的禁军大将不可能成为威胁朝廷的强藩，这在君臣之间是相当默契的。

集权走向反面

通过渐进式集权，赵匡胤逐渐实现了再造中央，唐末五代藩镇混战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然而，集权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顶层集权和基层活力的关系，集权一定会走向反面。

在这个问题上，赵匡胤是理性的，并没有因噎废食，可历史的惯性，却是他无法逆转的。

在完成"制其钱谷"后，地方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的政策当然被继续留用。不过，赵匡胤并没有"立额"。也就是说，并没有要求地方官府必须上缴固定数量或比例的财税。当时各州府上缴朝廷的税收之数，完全由通判根据当年的收支之数，上报给统管财政的

部门三司，称为“应在”。

但这个政策在宋代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时发生骤变。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司明确规定了各个转运使辖区内每年要缴纳的税收额度。此后，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并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这个岁额越来越高：王安石变法，增加一倍；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更增加至十几倍；到了南宋时期，地方能够留用的财赋已经所剩无几。

竭泽而渔的后果是朝廷账目上的收入越来越多，但可供地方支配的钱却越来越少。脑子再发达，只要四肢抽筋麻痹，王朝必然走向瘫痪。

而朝廷水涨船高的岁额，必然源自各级官府对百姓变本加厉的压榨。哪怕是号称政治清明、社会富足的宋仁宗“盛治”时代，老百姓也是备受盘剥。司马光后来吐槽，北宋的“财用羡溢百倍于前。”南宋的朱熹更是忍无可忍地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而“刻剥之法”能够永无休止地持续与扩张，前提条件正是大宋皇帝与朝廷那停不下来的权力集中。

除了民政，在军事上也是一样。为了使军队保持活力，赵匡胤在收夺地方权力的同时，授予边镇将领诸多特权。

边将可以照旧截留地方财税，甚至还可以公开从事边境贸易，以此来壮大边镇财力，招募猛士、间谍、保镖等特种人员，提高军队战斗力。

同时，为了保证边帅对所统战区山川地理、民宿风貌的熟悉，也为了保证边防政策的延续，赵匡胤轻易不变易边帅，在同一个地方驻守十几年者大有人在。

最重要的是，赵匡胤给予边帅临阵指挥权，杀伐决断全凭边帅主张，朝廷绝不干涉。甚至当边帅犯了法时，赵匡胤都不予追究。

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赵匡胤对李汉超违法之事的处理。李汉超时任齐州防御使兼关南巡检使，负责防御契丹。他是一介武夫，

懂得用兵之道，却不知理政之妙，做了许多不法之事，其中包括跟老百姓借钱不还、掠夺民女为妾。

关南的老百姓实在忍不下去了，跑到东京城里告御状。

赵匡胤闻讯，急忙把百姓召入便殿，赐了酒食慰劳，然后和颜悦色地问道："自从汉超镇守关南，契丹入寇过几次？"

百姓来告状，皇帝请吃饭，在帝制时代是十分罕见的。何况二者地位有天壤之别，这位老百姓还没有从惊慌中反应过来，面对皇帝的询问，他也不敢多说话，只是说："没有。"

赵匡胤又问："以前契丹入寇，边将防御不了，河北的民众年年被劫持。那时你能保全自己的财产、妻女吗？现在汉超所取，比起契丹打家劫舍，谁抢得更多？"

百姓听后，心中嘀咕：官家您这是什么逻辑啊？李汉超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就得交"保护费"？可是面前的是九五之尊，老百姓不敢说半个"不"字，只好唯唯诺诺。

赵匡胤假装没看出百姓的心思，又问："你家有几个闺女？都嫁了些什么人？"

百姓如实回答。

赵匡胤一笑，说："嫁的都是些普通的村夫嘛。你看，汉超可是我的贵臣。他喜欢你家的闺女，所以才纳为妾。你家的闺女，与其嫁给村夫，还不如跟着汉超共享荣华富贵！"

史称百姓"感悦而去"。

面对这样强词夺理的流氓皇帝，告御状的老百姓没哭就不错了，哪来的"感悦"？由此可见，在老百姓面前，赵匡胤对李汉超有多包容。

但包容不是纵容。赵匡胤虽然帮李汉超解决了麻烦，但一定也要让李汉超知错就改——特别是让他明辨是非，千万别去找这些老百姓报复。

赵匡胤派人带了数百两银子速往齐州，并告诉李汉超："你缺

钱为什么不管我要？干吗去拿老百姓的钱？这些银子你拿着，赶紧还给那些老百姓，好让他们对你心存感激。”

使辽人不敢南窥的汉子李汉超，一时间百感交集，竟至落泪。自古以来，有替自己背黑锅的皇帝吗？他决定洗心革面，对赵官家以死相报。

李汉超没有找告御状的老百姓的麻烦，反而归还了钱财和民女。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打老百姓的主意，为政简易，深得民心。当地百姓甚至要为他立碑，歌功颂德。李汉超对将士也颇为慷慨，宁可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厚待这些跟着自己拼命的将士。后来他去世于屯驻之所，三军将士无不痛哭流涕。[1]

这样优宠边将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比如镇守西山的郭进，他属下的军校诬告他谋反，赵匡胤根本不信，直接把军校交给郭进，让郭进自行处置。恰巧这时北汉入寇，郭进认为军校敢告自己，也是有胆，于是让他上阵杀敌：如果胜了，就保举他升官；如果败了，就叫他投降北汉去。军校感郭进之恩，一举杀退敌军。郭进则兑现承诺，真的举荐他升迁了。

后来赵匡胤命有关部门在开封为郭进盖房子，全部使用筒瓦。有关部门表示，按照旧制，只有亲王、公主的宅子才能用筒瓦。赵匡胤闻言大怒：“郭进在西山守了十余年，使我没有北顾之忧。我待郭进，难道能不如对待自己的儿女吗？”遂命有关部门赶紧去给郭进盖房子。

深受信任的郭进得以排除诸多政治干扰，在军事上一显身手，频频击败北汉和辽朝的军队。

还有当年处处不给赵匡胤面子的董遵诲，自从入宋以来，整日战战兢兢，生怕遭到报复。然而赵匡胤不但不念旧恶，还重用董遵诲为边将。他命人暗中贿赂边民，将董遵诲的母亲从辽人治下的幽

[1]《涑水记闻》记此事为沧州节度使张美所为，《长编》从之。

州迎了回来。董遵诲感激涕零，在西北边疆一守就是十四年，当地党项人对他又敬又怕，两地军民秋毫无犯。

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完全明白打仗是怎么回事。要对付边关强敌，就要从制度上给前线将领充足的指挥权；要保证边将不反，他又不得不采取策略，笼络人心。在统一天下的非常时期，赵匡胤实施了非常政策。

结果，在太祖朝，出现了十四位名垂青史的边帅：

> 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镇州，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镇棣州，以拒契丹；
>
> 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北汉；
>
> 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通远，王彦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戎。

可赵匡胤的后继者们，无论是皇帝还是那些文臣士大夫，却一味强调猜忌制约武将的祖宗之法。对于武将，宋朝君臣沉迷于“将从中御”的驭将之术，直到发展出让前线将领按照既定阵图排兵布阵的荒唐举措。无数名将横遭掣肘，甚至在猜忌中不得善终。两宋名将抑郁而终者如狄青、王坚，被迫自尽者如郭进、余玠，当然还有妇孺皆知的杨业、岳飞。宋朝常年武功不振，实不足为奇。

朱熹曾说：“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如果集权行为本身无法受到律法和制度的约束，那么作为集权者的朝廷权力会越来越大，被集权的州县权力会越来越小，社会受到的控制也会越来越多。然后，朝廷开启新一轮集权，州县也好，社会也罢，则越来越没有招架之力。最终，在停不下来的朝廷集权中，不但州县日渐紊乱，社会也被吸干榨尽。宋朝的统治者本意是想加强朝廷力量，防止地方割据和社会反抗，从

而使赵氏江山永固，却未承想，后来反而导致了国家混乱，民不聊生，直至王朝彻底崩溃。

二、号召读书与宽仁政风

宰相须用读书人

宋初的政治进程，可谓“去五代化”。从削夺兵权，到再造中央，再到慎刑宽政，处处流露出统治者对武人的抑制和对文臣的倚重。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去五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崇文抑武的过程，就是以文臣抑制武人的过程。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创造的大宋“文治”，似乎就是以此为起点的。

事实却是，宋初的“崇文”与“抑武”只是相对五代而言寻找新的文武平衡，远非两宋后来那样搞得“登峰造极”。宋初文臣的主体，甚至也很难说是文人士大夫。

从秦汉开创大一统帝国、开创皇权-官僚政治开始，文臣就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大体可以划分为文吏和文士两大类。文吏是职业官僚，以专业的理财、断案、文书运作等能力，承担着维持统治机器运转的基本职责；文士则是一群知识精英，他们或以儒学为业，或以文翰为资，是意识形态的守护者和文化的传承者。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环境，文吏和文士有时融为一体，有时却彼此对立。从五代到宋初，正是二者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又一个轮回。

先来说一个五代时期的鄙视链：武人鄙视文吏，文吏鄙视文士。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汉隐帝时，武人与文吏的矛盾极为尖

锐，文士宰相窦贞固还特意办了一场酒宴，希望化解文武之间的矛盾。可是在酒宴上，武人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却厉声大呼："安固朝廷，平定战乱，需要的是长枪和大剑。至于毛锥子，哪里用得着！"

负责财政事务的三司使王章是文吏出身，听了史弘肇的话大为不悦，回怼道："即便有长枪大剑，要是没了毛锥子，军队的粮草军饷从哪里来？"

作为兵器的长枪大剑，指代的是武人；而毛锥子其实就是毛笔，指代的是文吏。五代时期，武人执政，但统治地方、筹集军费等事务他们实在干不来，只好委任具备职业官僚素养的文吏来代劳。文吏时常要拿着毛笔记账，所以被史弘肇称为"毛锥子"。"毛锥子"的说法明显具有贬义。

王章作为三司使，已经是文吏里的上层人物，尚且被史弘肇视为毫无用处的毛锥子，其他文吏在这些武人眼里的地位可想而知。

可就是这位王章，对文士也极为蔑视。他曾说："这种人你给他一把算子（估计是算盘一类的计算工具），就算上下放颠倒了他也不知道，他们能对做事有什么帮助？"

史弘肇看不上王章，是因为王章不能打仗；王章瞧不起文士，是因为文士不会算账。总而言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百无一用是书生。

不过，文士处于鄙视链最底端，也不都是环境需求使然，文士中也有不少人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巴。当时，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文士，常常承担不了文化工作，甚至有不少还是自己专业领域里的"文盲"。

有干不了文化工作的。比如后晋的翰林学士承旨崔梲，文章倒是写得不错，专业素养突出，可稍微让他管点别的，比如主持科举考试，他就完了。

有知识水平太差的。比如《旧唐书》的挂名作者、后晋宰相刘

晌，对典章制度一窍不通，以致遭到时人的耻笑。

有搞不定儒学礼教的。比如后唐时的文士刘岳，以好学著称，可真让他去主持编修一部《书仪》（士人私家关于书札体式、典礼仪注的著作）时立马露怯了，刘岳只能拼凑些粗俗鄙俚的内容了事。

最极端的是干啥啥不行的。后唐时有个叫卢程的宰相，早年间做基层官员时曾受命去管仓库出纳，他说自己干不了，这还算情有可原，毕竟跨界了；可后来让他去写文章，他竟然还是干不了，气得他的上司张承业直骂道："哥们儿，你到底能干啥？"

面对一群这样的文士，后唐末帝李从珂的评价极为形象："这简直是一群'粥饭僧'！"粥饭僧，换个词——吃干饭的。

在一个兵祸不断的乱世里，哪个皇帝敢把身家性命交给一群吃干饭的？文士出任的宰相长期大权旁落，良有以也！

文士吃干饭，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毕竟那个时代并不重视文化。但并非所有的文士都在吃干饭。正是有一批认真自我改造和改造他人的文士，才为后面文士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

自我改造最成功的文士，当属大名鼎鼎的冯道。这位"长乐老"因为韬光养晦和效忠过多个朝代和多位帝王，被后来宋朝修史的欧阳修、司马光辈骂得狗血喷头。但毋庸置疑的是，冯道不仅私德颇佳，好学能文，而且也擅长治国，被唐明宗盛赞为"真士大夫也"。

不过，大多数文士没有冯道的际遇，只能选择下沉，到基层去做文化传播。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当属李琼和辛文悦。

李琼是个历史爱好者，因为走投无路跑去从军，结识了大老粗郭威，两人关系好到拜了把子的地步。李琼没事儿就给郭威讲讲历史上的兴亡治乱，使郭威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郭威建立后周，努力革除乱世弊政，这里多少有李琼的影子。

辛文悦的学生更牛——宋太祖赵匡胤。辛文悦就是前面提到的

那位让儒家仁政思想根植于赵匡胤内心的启蒙教师。

冯道、李琼和辛文悦只是文士们的一个缩影。在他们的努力下，时人对文士“吃干饭”的刻板印象正在消解。到了周世宗时，他所重用的王朴、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都是一手拿着书卷，一手拿着“毛锥子”的综合型人才。文臣的素质能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然，冯道以降的这些文臣都是过渡式的人物。他们或是有吏干的文士，或是有文化的文吏，还没有完成最后的融合。他们自身的气质仍然给人以不同的直观感受，在这方面，赵匡胤本人就很有发言权。

前面讲过，后周显德三年（956），赵匡胤以周军大将身份攻克并接管滁州后，曾准备将抓捕的盗贼全部处死。幸亏幕僚赵普及时阻拦，并对盗贼一一审讯，才使不少人免做了刀下冤魂。

赵普是文吏出身，但也读过一些书，在给赵匡胤献计献策时往往也引经据典，绝非南宋文人编出来的段子那样，只读过《论语》。但在滁州案中，赵普给赵匡胤印象最深的，还是断案工作的专业性——这正是文吏的技术职能。

同样是在滁州，持重的窦仪制止了赵匡胤搬运府库财物，让他领略到文士的别样风采，赵匡胤不禁肃然起敬。

这种对文吏的欣赏和对文士的敬意，随着赵匡胤成为大宋皇帝，开始在国家层面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

乾德三年（965）的一天，赵匡胤急赤白脸地召见宰相赵普，并递给他一面铜镜。只见铜镜背后刻着五个字：“乾德四年铸。”赵匡胤没好气儿地问：“怎么现在就有乾德四年铸的镜子了？”

赵普咧咧嘴表示：臣不知啊。

于是，赵匡胤召来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和翰林学士窦仪，询问镜子的问题。两位饱读诗书的学士见了铜镜，想都没想，异口同声：“这一定是蜀地的物件。当年伪蜀王衍曾以此为年号，这面镜子应该是那时所铸。”

伪蜀就是十国之一的前蜀，王衍是前蜀的末代皇帝。早在40年前，前蜀就已经灭亡了。那一年，赵匡胤还没出生呢。

听了回答，赵匡胤恍然大悟：没错。镜子的女主人最近刚刚入宫，她就是西蜀旧人。

“乾德”是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使用的第二个年号，这个年号是当时的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定下的。赵匡胤对年号只有一个要求：自古及今，从来没人用过。范质、王溥都是科举进士出身，是文化人。没想到，宰相们千挑万选，最后拟定的“乾德”，竟然与几十年前偏安一隅的亡国之君的年号重复！

面对无言以对的赵普，赵匡胤只得无奈地叹道：“宰相须用读书人！”

读书人，说的当然是文士。“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句足以垂范后世的警句正是宋初的一种导向，它成为由乱入治、由重武转向崇文的起点，也被后世不少人追溯为士大夫政治的源头。

这也就难怪，宋代三百年间，士大夫们会对“宰相须用读书人”的金句推崇备至，甚至拔高到决定两宋文治成就的地步。南宋学者吕中就无不自豪地宣称：

> 我朝以儒立国，故命宰相读书，用儒臣典狱，以文臣知州，卒成一代文明之治。

可惜，这种自豪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宰相须用读书人”是一种导向，这种导向确实有强劲的一面，连宰相赵普在赵匡胤的劝导下都去埋头读书，手不释卷了。

但导向终究是导向，“宰相须用读书人”的高姿态，依旧掩盖不了武人出身的赵匡胤与文臣之间的距离感。

号召读书的真实意图

乾德四年（966）十一月二十三日，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窦仪，卒。

赵匡胤怅然若失道："上天不肯眷顾朕，何以这么快就把我的窦仪夺走了……"

自从滁州初见，赵匡胤便对窦仪敬佩不已，并改变了自己对文士的看法。大宋开国后，赵匡胤甚至不惜将已经升任端明殿学士的窦仪又找了回来，继续做翰林学士。

窦仪给赵匡胤最大的好感，莫过于稳重有持守。有一年夏天，赵匡胤在后苑乘凉，赤脚跣足，衣冠不整。窦仪正好奉召，前来草拟内制诏书。走到苑门，见天子如此随意，窦仪便驻足不前。

阍门使赶忙通报，赵匡胤匆匆穿好衣服。窦仪这才进了后苑，劝谏道："陛下创业垂统，应该以礼宣示天下。臣虽不才，不足以得到陛下的眷顾，但恐怕英雄豪杰听闻陛下所为，会一哄而散。"赵匡胤收起笑容，对窦仪躬身而揖。

然而，作为宰相的热门人选，窦仪至死也没能荣登相位。"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话，并没有兑现。

据宋人说，这是因为赵普忌惮窦仪，因而一面援引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一面又拉拢陶穀、赵逢、高锡等人，共同排挤窦仪。

这就实在太高估赵普了。

在赵匡胤看来，与文士的知识素养相比，文吏的吏道更为重要。文士窦仪无缘宰辅，而文吏出身的赵普，却在太祖朝做了十年的宰相。在文士与文吏中，赵匡胤明显更需要后者，而且对文士的一些学问，颇不以为然。

有一次，赵普陪着赵匡胤过明德门，赵匡胤突然对门上的匾额来了兴趣。但见那匾额上写着“明德之门”。

赵匡胤问赵普：“‘明德之门’，干吗不直接写‘明德门’，为什么用‘之’字？”

赵普回答说：“语助。”也就是助词的意思。

赵匡胤冷笑道：“‘之乎者也’，能助得了什么？”

还有一次，赵匡胤向宫中的侍讲询问，自己的小儿子赵德芳学业如何，当对方回答说德芳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时，赵匡胤却说：“帝王家的孩子不一定非要会写文章，只要通晓儒家经义、了解古今治乱得失就可以了，他日免得被那些舞文弄法的官吏蒙蔽。”

这或许才是赵匡胤对文士更真实的看法。

可即便对文吏，赵匡胤也不时露出蔑视之情。

在阐述用文臣取代武人治理地方时，赵匡胤曾对赵普解释道：“朕现在选用一百余名治理能力优越的文臣出治地方，就算他们全都贪污，也不如武人一人造成的危害大。”

这种言论赵匡胤说过不止一次。比如赵匡胤包容哭世宗的王著，理由便是：“一介书生，即使哭哭世宗，又能搞出什么名堂？”

还有一次，赵匡胤跟赵普在讨论政务时产生了分歧。赵匡胤长叹：“怎样才能跟桑维翰那样的宰相共事啊！”桑维翰是五代时的名相，不过却贪财，因而赵普不服气，反驳道：“就算桑维翰在，陛下也不会用。”赵匡胤却说：“既然用了他的长处，就要给他护短。措大没见识，给他十万贯钱，他能把房子给塞破了。”

“措大”是当时对文人的蔑称。可见，在赵匡胤眼里，不管是文士还是文吏，全是“措大”。与他们这些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动不动就搞个大事情过把皇帝瘾的武人相比，“措大”们能做的也不过是把屋里塞满铜钱而已。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一群“措大”何足道哉？

那位曾建议周世宗解除赵匡胤兵权的杨徽之，入宋后曾向赵

匡胤建议，应推崇儒学，以促进形成宽厚的民风。具备基本儒学素养、在开国之初便积极修缮、亲自拜谒孔庙的赵匡胤，竟然认为杨徽之胡说八道，将他一贬再贬。杨徽之被贬与窦仪去世，都发生在赵匡胤讲出“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句话的乾德年间。

在赵匡胤看来，真正的人才应该是文武兼备的。开宝八年（975），赵匡胤亲自主持当年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场——殿试，没想到王嗣宗与陈识在殿前争状元。赵匡胤的解决办法是，让两人打一架，谁打赢了谁当状元。结果王嗣宗一拳打掉了陈识的幞头，凭武力拿到了文人心目中尊贵无比的状元称号。

“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背后，不是用人标准的取向，而是意识形态的导向。这里的重点不是“读书人”，而是“读书”。

其实早在建隆三年（962），赵匡胤就曾对身边的近臣说：“朕希望武臣也能读读书，好让他们知道天下治平的道理。”

五代宋初，读兵书的武人并不十分罕见。但赵匡胤要让武人知道天下治平的道理，显然不是让他们读兵书，而是读史书、读儒家的经书。这也就难怪，近臣们听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别说，赵匡胤的号召还真有人响应，党进就是其中之一。

党进生于边地朔州马邑，又是少数民族，斗大的汉字一个也不认识，甚至连名字都胡乱写。他名叫党进，却自称党晖。有人问他怎么改叫党晖了，他却回答说：“我就图自己省事儿。”

当时，禁军官位在都虞候以上的将领，都把自己军队的相关信息记在手中的大棒上，以备查阅，称为“杖记”，类似于官员把事情记录在笏板上一样。有一天，赵匡胤突然问党进：你带了多少兵？党进不识字，木棒上的字也都是让别人写上去的，自己根本不知道上面记了些啥，于是便举起木棒说：“全在这上面记着呢。”

这么一位看似忠厚老实的文盲老粗，心眼儿却多得很。就在武人们对赵匡胤的号召不知所云时，党进却蹦出来汇报自己的读书成果。

某年秋天，朝廷派党进到边塞巡视，防范少数民族袭扰。按规定，大臣出京赴任，要进宫面圣，致辞表达自己的离别之情。阁门官知道党进是文盲，就劝他："您是边臣，就不用走这个形式了。"

党进不依不饶，一定要展示自己的读书成果。于是在阁门值班的知班只好把致辞拟好，教他背熟，并写在笏板上以备不时之需。结果党进见了赵匡胤，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低头看看笏板，知班你逗我玩儿呢吧，我哪儿看得懂啊！

党进灵机一动，突然大声说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

在场的人闻言，全都忍不住偷笑。这话莫名其妙，都是哪儿跟哪儿？

事后有人问他："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两句？"党进志得意满地说："我以前听措大们喜欢掉书袋，我也掉两句，让官家知道我也读书来着。"

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像党进这样的武人，即便读了书，或者找人给自己讲了书，也不大可能理解天下治平的道理。如果理解了，那就变成郭威、赵匡胤了，这绝非赵匡胤所愿看到的。

显然，赵匡胤口中的"天下治平的道理"，不是让武人去理解如何统治一方，而是让他们明白，只要你们忠君，只要你们不造反，这天下就不会乱，这天下自然会治平。

其实，无论文臣武将，赵匡胤号召他们读书的最终意图只有一个，那就是明晰君臣大义，端正君臣之道。这实在与真正的"崇文"相去甚远，更跟士大夫政治毫无关系。

即便如此，赵匡胤倡导读书，还是开了风气之先，这为宋太宗时期文治发生质变奠定了基础。

不杀言事者的宽仁政风

闷雷凌顶，暴雨瓢泼。水线如针，穿心而过。大殿之外，陈设狼藉，乐人们抱着乐器，淋成了水人儿，却又不敢吱半点声——没有皇帝的命令，谁敢避雨？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搅了帝王的国宴。殿中缦帐横飞，好似无数只手，硬要掀翻群臣的食案。

人间天子赵匡胤很生气，走到殿门前，顺手扯下一块缦布，朝着左右大发雷霆，要用嗓门盖过老天爷的雷鸣雨落。

“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正此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皇帝身后响起。

赵匡胤回头看去，东班的赵普已经走到殿中，躬身启奏。

赵普心中暗度：去年黄河决口，今年雨水失调旱涝无度。主上大怒，这是担心天灾又来，民不聊生。要为主上排忧解难，当然要对症下药。所幸京畿之地，未受洪涝，大雨急来，也可减缓旱情。

于是，赵普接着说道：“这雨不过是浇坏了一点陈设，浇湿了几个乐人的衣裳，反正湿了，不如就让他们在雨中表演杂剧。此时的雨水最难得，老百姓得雨，必然欢天喜地。陛下也正好，吃酒娱乐，与民同乐。”

赵普这马屁，拍得又轻又响，了无痕迹，却给赵匡胤戴了顶高帽：您看，下雨没关系，该干吗还干吗，雨中奏乐，别有一番乐趣。而且您与民同乐，这是爱民之举，明君之政。

赵匡胤回嗔作喜，知朕者，则平也。借你吉言，但愿老百姓乐此及时雨吧。想至此，他回到殿里继续劝群臣喝酒，兴致极高。

赵普的兴致也极高。乾德五年（967）三月十七日，他刚刚升了官，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加官尚书左仆

射，充昭文馆大学士。虽然大宋只有他一个宰相，但有了昭文馆大学士的职名，他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第一宰相。

入宋以来，赵普的仕途顺风顺水。赵匡胤不仅对他十分倚重，而且非常宽容。也正因如此，以天下为己任的赵普，经常为了国事顶撞赵匡胤。

有一次，赵普提议任命某人为某官，赵匡胤不同意。第二天，赵普又奏此事，赵匡胤仍然不答应。第三天，当赵普再度强硬地提出这一议题时，赵匡胤震怒，将赵普的奏章撕裂，一把摔在地上。赵普却神态自若，缓缓捡起奏章，回家后修补完整，第四天又呈到赵匡胤面前。这次，赵匡胤终于批准了赵普的奏章。赵普推荐的这个人后来也非常称职。

还有一次，某位官员立了功，赵普建议按规定提拔。可是赵匡胤因为不喜欢这个人，便怒气冲冲地拒绝了。赵普毫不妥协，声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这是古今的大道理。赏罚是天下的，不是陛下您一个人的！哪能全凭您高兴不高兴，就来定天下大事？"赵匡胤气得扭头进了皇宫，赵普就追到宫门口等着。最后，赵匡胤只好答应了赵普的请求。

这就是真实的赵普，对待政敌心狠手辣，对待仇人小肚鸡肠，对待皇帝忠心耿耿，对待朝政刚直不阿。他上斗天子下斗群臣，权倾朝野，气焰熏天，却以一己之智，率百官之才，辅佐赵匡胤开创了一个没有内臣乱政、没有藩镇造反的时代。于是，后世宋臣大搞"抬普运动"，甚至不惜编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奇故事，将赵普打造成文臣楷模。

冲动易怒的赵匡胤，却能够容忍甚至接受赵普的反对意见。这种政治上的宽容不仅体现在赵普个人身上，更反映在对整个宋朝政治生态的塑造上。

相传，赵匡胤在太庙里藏了一块石碑，碑上刻了三条誓言。第一条说，不得对后周柴氏子孙动用刑罚，哪怕他们有一天谋反，也

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公开处决，更不能株连亲属。第二条说，不得杀害士大夫和上书言事的人。最后一条说，赵氏子孙如果违背前两条誓言，就要天打五雷轰。这三条内容，被称作“太祖碑誓”。

关于太祖誓碑是否真实存在，自古以来就有争议。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太祖誓碑的内容确实反映出宋朝真实的政治环境，这离不开赵匡胤本人奠定的基调。

如前所述，赵匡胤打破了540年间的血腥传统，在陈桥兵变后，妥善安置了逊帝郭宗训与周室三王。不仅如此，他对降王也尽量采取不杀政策，而且这一政策被后来的宋代君主继承。作为后周宗室后裔，柴氏子孙始终受到优待，以至于小说《杨家将》里的柴郡主、《水浒传》里的柴进，都被说成柴氏后人。那些曾称帝称王者，如南汉后主刘铱、北汉英武帝刘继元、吴越忠懿王钱俶，都于亡国后在开封安享晚年。至于荆南高继冲、湖南周保权、泉漳陈洪进这些半独立的割据者，后来更做起了大宋实职官员。

当然，这一切仍然要以不威胁到大宋江山为前提。

受到传说中的太祖誓碑庇护的柴氏子孙，实际上与周世宗、与后周并无关系。因为周世宗早已过继给周太祖，也早已改姓郭，从未认祖归宗。真正的世宗子孙并非“柴氏子孙”。后来，司马光和王安石还为此产生过争执。司马光强烈要求以郭姓后人作为周室代表，而王安石却执意要求继续以柴氏为世宗后裔。最终，宋朝官方站在了王安石的一边。在柴氏子孙光鲜耀眼的背后，不仅周世宗的后代湮没于茫茫史海，甚至连周世宗郭荣的大名，也被以“柴荣”的名义遗留在人们的脑海里。

至于在蜀地影响极大的后蜀后主孟昶，思念故国的南唐后主李煜，更成为当权者不得不除的眼中钉，至今都广泛流传着二人被毒死的传说。

看来，不杀逊帝降王依然是有条件的。但比起五百年间光明正大的政治杀戮，宋初对逊帝降王不仅杀得极少，而且就算是杀也只

偷偷摸摸地杀，因为这种事情已经上不得台面，历史多少还是披上了一层温情的薄纱。

相比之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真实性更强，影响也更大。

纵观赵匡胤在位的17年间，除了杀贪官污吏，确实没有杀过文臣，更没有因为别人的言论不合己意而杀人。以此为出发点，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逐渐成为宋代皇帝和官员的共识。即便是在北宋后期政治极为动荡的年代里，这种共识仍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宋神宗在位后期，曾因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杀掉一名转运使，遭到宰相蔡确的抵制。蔡确指出："祖宗以来，没有杀过士大夫。没想到这种事要从陛下开始了。"神宗又打算将这名转运使发配充军，门下侍郎（副宰相）章惇反对说："如此，还不如将他杀了。"神宗问为什么。章惇答："士可杀，不可辱！"神宗气愤地说道："痛快的事真是一件也做不得！"章惇继续顶撞说："像这样的痛快事，做不得也好！"

到了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亲政时，变法派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猛烈抨击反对派，甚至罗织了反对派大臣吕大防、刘挚等人的诸多罪名，欲置之于死地。哲宗接到章惇等人的奏章后问道："这些人果然要造反吗？"章惇等回答："确实有这样的心思，只不过行迹还没有暴露。"哲宗据此反驳道："朕遵循祖宗的遗志，从来没有杀过大臣。把他们放了吧。"

正因为有了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这样一条祖宗之法，士大夫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史学家普遍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王朝。正是这种开明，将宋朝的文治推向顶峰。而开明的奠基者，正是赵匡胤。

五代遗留的弊政阴霾，开始在治世的曙光中消散。

扳不倒的赵普

乾德六年（968），在皇帝的力挺下，赵普已经做了五年独相，朝政局势空前稳定，可满朝文武也是趋之若鹜、攀龙附凤，丑态尽出。

御史出身的雷德骧鄙视他们的谄媚，更气愤他们的作为。

雷德骧，字善行，同州郃阳人。进士出身，宋初做过殿中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底层官员。他性子急躁，但为人正直，因而得到赵匡胤的青睐，升任屯田员外郎、判大理寺事，成为一名法官。[1]

雷德骧的法律工作做得很到位，专业素养也不是盖的。有一次，他到便殿奏事，身着便服的赵匡胤听完雷德骧的报告，突然好奇地问道："古代朝廷把国有的奴婢赏赐给臣下，这些奴婢要随新主人改姓，这是为什么？"

雷德骧回答："古人的制度是为了区分贵贱。让奴婢随主人的姓，由于同姓不能结婚，即使日后家族的谱牒混乱了，他们的后代也不能与主人的后代喜结连理，这样主奴尊卑的秩序自然就不会被亵渎了。"

赵匡胤大悦，夸奖道："卿深得古人立法意。"从此以后，他对雷德骧颇为优待，即使是在消闲的地方，只要听说是雷德骧来了，也一定要换上官服正式接待。

---

[1]《宋史·雷德骧传》《长编》《东斋记事》《东轩笔录》等皆称雷德骧差遣是判大理寺事。但按当时官制，以六部尚书以上的台省长官管理部寺公事，差遣才能用"判"字，如窦仪曾以工部尚书判大理寺。雷德骧本官为尚书省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即使兼管大理寺，也不当称"判"；何况以他本官之低，似乎也不能来主持大理寺事务。而判大理寺事，大约可理解为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笔者怀疑此处记载有误，故只称雷德骧为一个普通法官。

赵匡胤欣赏的是雷德骧懂得用律法维护尊卑秩序。

可是雷德骧会错了意，他以为这是皇帝对自己法律工作的勉励。特别是，当发现皇帝的大红人赵普，正带着手下的一帮“猢狲”干着违法的勾当时，正义感爆棚的雷德骧决定报答皇帝的这份“知遇之恩”。

当时，中书门下负责起草文件的堂吏，与大理寺的属员们相互勾结，纷纷依附赵普，擅自增减刑罚名目。赵普本人还强买过别人的房子，聚敛财物。

雷德骧对此虽然怒目切齿，但鉴于赵普一手遮天，党同伐异，只好隐忍不发。

可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法官，对违法犯罪行为都会忍无可忍。最终，雷德骧决定弹劾赵普，只是奏章写了一半，他又把笔放下了。连大理寺的属员都趋附赵普，谁能保证通进司、鼓司、阁门司能够把奏章顺利递到圣上面前？

怒从心头起的雷德骧，终于大胆决定：面见天子，当面弹劾赵普！

要面见赵匡胤，雷德骧有四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日常奏事。按照规定，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可申请在早朝时上殿，向皇帝奏事。可惜，雷德骧的品级不够。

第二个选择，召对。皇帝想找自己聊天时，自然就会召见自己了。这得等到猴年马月。

第三个选择，轮对。每隔五天，皇帝会在长春殿（即以前的万春殿）召见一次文臣，但每次只见两人。还是等不起。

最后一个选择，请对。直接去阁门递交约见申请，等皇帝同意后，由阁门官引入后殿，面见皇帝。

但无论哪种选择，还是有可能被一手遮天的赵普“截胡”。

就没有更快、更有效的办法了？

当然有！不等阁门通报，满腔热血、一身正气的雷德骧竟然硬

闯大内。

就算是一般的百姓人家，你进去之前好歹也要敲个门，不然就成了私闯民宅，何况这还是皇帝的家。

果然，赵匡胤勃然大怒，大骂雷德骧道："鼎铛还有个耳朵，你的耳朵让狗吃了吗！赵普是朕的社稷之臣！"说着，抡起手中的玉斧，"咚"的一声闷响，两颗大牙从雷德骧嘴里飞了出来。

满嘴喷血的雷德骧没有博得天子的丝毫同情。赵匡胤大为光火，大吼道："把他给我拖出去！叫赵普砍了他的脑袋！"

直到消了气，赵匡胤才想起来，雷德骧除了举报赵普，还硬闯皇宫，遂以此为罪名，把他贬到商州当司户参军，管理地方户籍财务去了。

政事堂里，赵普放下公文卷宗，心中满是得意。私闯大内的罪过，可比举报宰相大得多。但主上似乎毫不介意，反倒是对状告自己一事恼怒异常。哼，你们有胆子就接着告吧。

开封府里，听闻消息的赵光义不禁摇了摇头。雷德骧啊雷德骧，天下还没统一，藩镇也还没削干净，官家现在要是离得开赵普，当年就不会把李处耘贬到淄州去了。再说了，赵普不就是搞点强买强卖嘛，比起我那位岳父大人，还有二哥那几个好兄弟在藩镇上干的事，可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高官自污养晦之策，你一个小员外郎懂个屁！更何况，赵普现在是皇帝眼前的红人，参赵普就是参皇帝，等于公开指责皇帝用人不明。

在赵光义眼里，雷德骧是愚蠢的。在皇帝的面子和位子面前，所有的正义都显得无足轻重。

不过，赵书记，自古以来，没有哪个独相能够受恩宠长久的。等到那天，你猜猜二哥是相信你这个外人，还是我这个亲弟弟？不着急，我们慢慢等，这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需要耐心。

赵光义落下最后一枚棋子，这次的棋势叫作"大海取明珠"。

三、新经济政策

不抑制土地兼并

慎刑和宽仁，影响的还只是大宋一朝。赵匡胤制定和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则影响了此后千年间的社会经济形态。

赵匡胤的新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不抑制土地兼并，另一个是振兴商业。

不抑兼并，就是国家不再干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之相反的政策称为抑制兼并，也就是国家限制土地买卖。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但不让土地过分集中在私人手中，以致动摇国家权威，是朝廷的基本倾向，绵延了大概一千年之久。国家始终没有完全承认土地私有权，这表现在土地不能完全自由买卖上。

到了唐朝前期，朝廷实施了号称是历代“最好田制”的均田制。在这一制度下，唐朝土地分为国有和私有两种类型。国有土地，源自战乱时期产生的无主荒地。唐朝建立后，按照惯例宣布荒地国有，然后按照一定规则将它们授予农民。除非有特殊情况，国有土地不能随便买卖。至于农民的私有土地，名义上也被说成是国家授予的，因此买卖也受一定限制。

均田制在短期内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农民在授予的国有土地上耕种，向国家缴税，承担劳役和兵役，因此国家掌握了稳定的财源和兵源。对一般农民而言，国家授予的土地使他们有田可耕，得以依靠小农经济维持生计。由于土地买卖受到限制，土地集中的

速度被大大放缓，由此也就放缓了拉开贫富差距的速度。看起来，均田制使国家和贫苦的农民都受益。

然而，这种所谓的受益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从长期来看，均田制的后果相当严重。首先，国家为了财源和兵源的稳定，将农民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农民擅自离开土地是违法的。这种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社会活力大为减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虽然国家限制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但对于束缚于国家均田土地之上的农民而言，国家的剥削压迫却并不轻。这也导致小农经济极为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农民就可能大量破产。而国家再招揽新人耕种，行政成本又太高。

最后，普通农民遇到婚丧嫁娶或天灾人祸时，急着用钱，希望出售土地；握有社会财富的特权阶层也热衷于购买田产，而让卖地农民租种自己的土地。由于真实的市场存在，国家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土地私有和买卖自由，放弃对农民的直接控制。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控制的土地进一步流失，可用来分配的土地进一步减少，又加剧了土地分配的矛盾。

到了唐朝中叶，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必然增多，可同时，朝廷手中的土地却是有限的。因而，伴随着人口增长，能够分配的土地必然越来越少，直至无地可分。不仅大批得不到土地的农民会沦为流民，那些得不到足够土地耕种，却还要背负沉重税赋的农民也可能破产。于是，国家逐渐丧失了对土地及依附于其上的农民的管控，均田制彻底崩溃。而这只不过是此前近千年里，抑制兼并不断失败的一个缩影。到了唐末五代，中央集权羸弱，各路藩镇更无力干预土地买卖。土地产权的私有和土地买卖的自由，逐渐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观念。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中央集权重新加强。不过，他没有退回到抑制兼并的老路，而是选择顺应时代潮流，接受时代观念，成为第一个公然声称不抑兼并的皇帝。

乾德四年（966）闰八月，赵匡胤下诏宣布，战乱过后由国家控制的荒地，不再以国有土地的形式颁授，而是对社会全面开放，谁开垦就归谁，并对开荒提供免租政策。这等于放弃了通过土地国有来抑制土地兼并的传统手段。

开宝二年（969），赵匡胤又要求，私人买卖土地时，需要到有关部门进行公证，由有关部门向买卖双方出具盖有官印的契约，并收取一笔手续费。这一次，朝廷不仅不再反对土地兼并，而且还做起了土地买卖的公证人。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正式以法律形式获得确认。

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最终成为一条祖宗之法，被宋代后继者们继承。到了北宋中期，私有土地已占全国土地的95.7%甚至更高。此后的近千年里，历代王朝再也没有全民性的国有土地政策，土地私有得以确立，由此产生了正反两个方面极为深远的影响。

先来看反面的影响。在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后，土地开始按照经济规律快速集中，大批农民破产，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极易激化，从而诱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这成为后来元明清三代王朝更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不抑兼并也有正面的影响。由于国家放弃干预土地经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得以自由流动。有些农民流向地广人稀的区域，在那里承租土地耕种，并把精细化的农业技术带到那里，促进了农业发展。另一些人则流入手工业和商业部门，商品经济开始从宋代走向繁荣。

振兴商业与垄断经营

自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历代王朝遵循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士农工商四大传统身份中，商人的地位最低。哪怕是在以开放性和国际

化著称的唐朝，商人也备受歧视。比如，商人不许骑马，穿衣服不能超过限制，商人子弟不能参加科举，甚至不能做官。

即便是有限的商业活动，官府往往也加以管控。例如唐代只允许在州县以上的中心城市里设立市场。而且市场和居民区要分开，市场外有围墙，还有军队把守，早上开放，傍晚关闭。其他时段或者地点的商业活动，都属于违法行为，这就是坊市制度。

不过，到了唐代中叶，市场需求和规模不断扩大，坊市制开始松动。当时的乡镇出现了自发的市场，称作草市，城市中也出现了夜间经营的夜市。五代战乱频仍，从朝廷到藩镇，士兵都是领工资的职业军人。维持军队就需要大量货币，从现实角度出发，放任商业的发展，从中征税，可以直接解决军饷问题，大为有利。

因此，五代时期，各方势力设有专门征收商税的机构。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权，更是利用地理优势，大力鼓励海外贸易，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认识到商税的重要性，于是推出了振兴商业的四个新政策。

第一个新政策是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建隆元年（960）四月，也就是宋朝开国当年，赵匡胤下令，各地关卡不得随意扣留、刁难商人，对铜钱之外的货物不得搜查。

商人地位提高，体现在开封罢市事件中。赵匡胤有一名非常宠信的特务叫史珪，就是将张琼诬陷致死的那个人。不少商人与张琼的命运一样，也被史珪诬告犯法，甚至丢了性命。开宝七年（974）五月，开封的商人突然在大白天集体罢市，抗议史珪的迫害。赵匡胤得知消息后，立刻组织调查，随后下诏书，表示会为商业出台专门法律，以后再犯法就要受到严惩，而在法律公布前的违法行为，则一概既往不咎。赵匡胤还因为此事疏远了史珪。

可见，在赵匡胤心中，商人已经不再是予取予求的贱民了。这一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士农工商开始被同等对待。比如商人子弟

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状元出身的北宋副宰相冯京，父亲就是商人。到了明代，内阁首辅张思维更是出自晋商家族。

第二个政策是针对国内市场，开放对商业经营的限制，草市和夜市都是在赵匡胤时期取得合法地位的。

宋初，赵匡胤下令，草市贸易都要顺从民间的便利，官府不予干预。草市合法后，乡镇市场迅速崛起，与大中城市一起，构成了全国商业的市场网络。

到了乾德三年（965）四月，赵匡胤又规定不得禁止开封城里的夜市。每逢元宵、端午、七夕这些节日，城中的夜市甚至会通宵达旦。这样一来，城市对市场的限制越来越少，北宋中期，坊市制彻底瓦解。

赵匡胤振兴商业的第三个政策是针对海外市场的，也就是设置市舶司，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五代时期，南方沿海政权就积极鼓励海外贸易，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开宝四年（971）二月，赵匡胤派遣潘美率军进入两广，攻灭盘踞当地的南汉政权，并任命潘美出任广州最高行政长官。到了六月八日，赵匡胤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司的长官市舶使，由潘美兼任。从市舶司成立之快、规格之高可以看出，赵匡胤对海外贸易极为重视。市舶司的重点任务是吸引外国商人。为了鼓励海外贸易，赵匡胤还对离境船舶实行举办大型宴席来送行的制度。

市舶司机构和赵匡胤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后来作为祖宗之法，被宋朝历代皇帝继承。此后，宋朝在多个沿海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等海外贸易管理机构，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与中国建立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遍及亚非欧三大洲。宋朝由此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最发达的黄金时期。

提高商人地位、开放国内商业经营限制、促进海外贸易发展，

归根结底还是通过促进商业发展，增加朝廷的商税收入。赵匡胤振兴商业的最后一项新政策，就是颁布《商税则例》。

五代时期，商业税的征收十分苛重混乱，这成为商品流通的一大障碍。建隆元年（960）开国伊始，赵匡胤就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行全国的商业税务法规——《商税则例》，并要求各地的商税税务部门都要公开张贴。

在赵匡胤四项振兴商业的政策的影响下，宋代商业空前繁荣。到了北宋末年，已经有了《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中描绘的，以首都开封为代表的繁荣的城市商业场景。商人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北宋末年，仅开封城里向官府贷款的商户就多达2.7万人。这也使得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商税所占比重迅速提高，我国古代的财政结构由此发生变化。

宋朝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也赚得盆满钵满。到北宋中期，宋朝每年从海外收入中获得财政收入50万贯；到嘉祐四年（1059）的南宋，增额已高达200万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

商品经济繁荣，巨型商业城市兴起，商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持续增高，出现于宋代的这些经济变化，成为此后元、明、清三朝社会经济发展高峰时的一种常态。

土地政策和商业政策一起，构成了赵匡胤独具时代特色的新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顺应时代潮流，既反映了宋初社会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实际，又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由此也开启了完全不同于前代的宋元明清社会经济形态，在这样的新形态中，人身更自由，社会更开放多元，工商业更加繁荣。而这一切变化的政策起点，正是宋太祖赵匡胤。

不过，在商业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朝廷对商业利润的追逐。

按照财经作家吴晓波的理论，在大一统帝国时代，支撑集权政体的“大厦”需要四大“支柱”：其一是郡县制度，属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保证帝国的稳定；其二是尊儒制度，属于全民

思想的控制模式，保证全民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其三是科举制度，属于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保证社会精英尽可能被吸纳入体制内，为我所用；最后是国有专营制度，属于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实现重要资源的国家垄断化经营，以控制国计民生。

国有专营制度，其本质是由国家垄断重要资源（比如盐、铁）的生产与经营。由于这些资源老百姓不得不买，因此国家可以从中获利，且旱涝保收。又由于这项收入隐藏在垄断利润里，没有增加税额，因而不会遭到老百姓的抵触和反抗。这项制度开始于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管仲，在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手里发扬光大，历经两宋，达到登峰造极。

宋初，赵匡胤基本继承前代政策，对盐、茶、酒、矾实行国家垄断专卖，严禁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对于违法私营者往往处以极刑。他曾规定，商人私自贩运矾超过一两、私自销售矾超过三斤，就要处死；私自煮碱三斤，处死；私自酿造酒曲十五斤，处死；贩运私酒三斗进城，处死；私自贩盐十斤，处死。这些政策后来被继承下来，最后连醋、香料、象牙都被国家垄断经营。

就这样，上游产业由国家垄断经营，下游产业由民间自由竞争。历经宋、元、明、清四朝，中国的商业空前繁荣，却也始终没能有所突破，使社会发生质的飞跃。

整顿赋税征收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朝廷掌握的户籍严重滞后。国家四分五裂，各地各自为政，赋税制度极度混乱。赵匡胤即位当年，便及时掌握户籍情况；第二年又继续开展周世宗时期的土地丈量工作；到建隆四年（963），又全面开启整顿税籍的工作，以作为征税的依据。

那时，田赋（两税）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被称为“正

赋”；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税收项目。五代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为了维持战时割据，税目越来越繁杂，数额也越来越大，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而征税工作也越来越烦琐和困难，各级官员倒是利用这个机会上下其手。于是，老百姓交钱交得越来越痛苦。

为了缓解百姓负担，当然更为了朝廷有税可征，赵匡胤从四个方面对赋税的征收进行整顿。这四个方面分别是杜绝新税、废除苛税、整顿税目、规范征税。

杜绝新税，就是不再添加新的税收项目。五代时期，各地小朝廷将增加税目作为一种“潮流”，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比如跟朝廷租牛耕地要交牛租，牛死了许多年，租金也照交不误。耕牛死了，要将牛的皮和骨头上交；后来不用交牛皮牛骨了，改为交牛皮税；再后来家里没牛也要交牛皮税。耕田的农具要交税，房子的房梁要交税，闺女嫁人的嫁妆要交税，诅咒贪官也要交税，甚至有时朝廷直接明目张胆地搞“括率”——一连名目都懒得想了，直接开抢。

面对如此凌乱的苛捐杂税，赵匡胤下定决心将添设税目的“潮流”截住，将五代税制混乱的根源、百姓负担沉重的根源刨掉，不再添加新税。

废除苛税，就是废除各地旧政权普遍实行的比较过分的苛捐杂税。新税不再增加，旧税逐渐减少，这是一次赋税体系的减量改革。

整顿税目，就是清理整顿税收项目。虽然赵匡胤废除了苛捐杂税，但许多税目仍被保留下来。对于这些税收项目，朝廷进行了统一的分类合并。比如以身丁为对象的税统称“丁口之赋”；以羽毛皮革等物为名的税统称“杂变之赋”，既方便征税，又使得赋税的征收更加透明。

规范征税，这是赵匡胤最下功夫的地方。五代时期，朝廷明文规定的税收项目就已经数不胜数，各级官吏通过税收来巧取豪夺的办法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潜规则”甚至到了官民皆知的地步，可

见当时风气败坏、腐败横行之甚。

首先，征税器具有问题。有的地方征税用大号的斗，本来应该征粮一石，实际上却收了一石八斗，老百姓的负担几乎翻了一番。

其次，考核办法不科学。税收数量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官员害怕税收不足，影响政绩，因此遇到民户逃亡，就将欠税均摊到邻里各户，逼着他们把税交足。

再次，征税惯例有问题。按照五代惯例，在征税以后，州吏还会以“会州”的名义，勒索县吏；县吏则将这笔经费压力转到里胥（里长）身上；里胥不愿出或出不起这笔钱，最后就又摊到老百姓头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征税的人有问题。地方征税，往往直接将册籍交给孔目官。“孔目官”虽然名为“官”，其实是吏。他们到处敲诈勒索，老百姓苦不堪言。

这样算来，百姓的实际税务负担，可能是苛捐杂税规定数额的数倍。老百姓交不起税，就去借高利贷；最后连高利贷也还不起了，只好逃亡。民众水深火热，社会动荡不堪，朝廷的统治成本上去了，征税的效率却一路下滑。于是，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中。

8岁就见识过朝廷逼税的赵匡胤对此印象深刻。解开恶性循环，关键在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因此，他将这些横亘在国与民之间的征税之弊一一剔除。比如建隆元年（960）甫一开国，赵匡胤就命全国征税统一使用一石的斗，保证征税准确无误；另外，征收的粮食在运输、储藏中会有损耗，赵匡胤则按照前朝惯例，明确规定每石粮食额外征收两升“鼠雀耗”，使得税收更加透明，避免以此名目横征暴敛。摊派税额、会州勒索的做法一律叫停，征税的职责也规定由国家正式任命的幕职州县官录事参军具体履行。

为了将这些政策贯彻下去，赵匡胤还派出专员到各地监督征税。有勒索舞弊的均给予严惩，额外多收的甚至会被处以死刑。

赵匡胤的“统一赋税”政策为老百姓减轻了一定负担。但是客观地说，这不是因为赵匡胤的税轻，而是因为五代的税太重。实际上，大宋的税目仍然五花八门。五代十国各种割据政权的苛捐杂税，除了部分实在莫名其妙的，其余大多以“沿纳”的名义成为大宋的税目。而且，各地税项也往往不同，一个地区以前征什么税，入宋后可能还在征什么税。

更有甚者，为了征收更多的钱物，后来的宋朝统治者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最为常见的就是折变与和预买。

折变和我们今天说的“折现”意思差不多，就是在征收两税过程中，官府任意地要求将一种钱物折合成另一种钱物，可以是将一种实物折成另一种实物；也可以先折成钱，再将钱折成其他实物。

别小看折变，每折一次，都会割一轮韭菜；如果折了好几次，那可能就要多交数倍的税了。宋仁宗嘉祐年间，三司使包拯就曾写过一份调研报告，据这份报告反映，当时陈州在征收夏税时，大小麦每斗要折成现钱100文，再加上其他附加费40文后，每斗实际折合现钱140文，而当时市面上的价格是每斗50文。这只是折变了一次，就要多交1.8倍的税。

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宋朝有配给蚕盐的制度。在每年二月的育蚕时节，官府按户向民户配给食盐，到了缴纳夏税时，民户再随夏税一起缴纳盐款。陈州官府给农民配盐时，按照每斤100文折价，而市面上不过二三十文。即便按30文算，配给的食盐也已经是市面价格的3.3倍。

紧接着，陈州官府又将100文折成小麦，为了让折得的小麦更多，这次官府采用了低于每斗50文的市面价格，按每斗40文折合，这样一斤盐在折为100文现钱后，又被折为2.5斗小麦。

事情还没完。陈州官府继续折，将刚由现钱折成的小麦，又折回了现钱。只不过这次是按缴纳两税时的折合价格，以每斗140文折现，2.5斗小麦折成350文钱。

好了，到这里陈州官府总算收手了。最终结果是，市面上30文一斤的盐，在陈州官府反复折变后，变成了350文一斤，已经是市面价格的11.7倍！

和预买是宋真宗时开始实施的预购绢帛的制度。官府在春天预先借钱给需要钱的民户，民户拿到钱后生产绢帛，然后随两税一起缴纳给官府，这实际上是一种官府预购绢帛的行为，只不过预购价格比市面价格略低，但民户提前得到了收益，因此实际上是官民两便。

但慢慢地，和预买就变味儿了。宋仁宗时，官府预买只有三成给现钱，剩下七成折成了盐；后来，又要求民户为官府预支的本钱支付利息；再后来，官府不仅不给盐，甚至连钱都不给了。和预买实际上变成了附加税。

这些虽然是发生在赵匡胤之后的事，但宋朝开国之初，整顿赋税的不彻底，本身就预示着，中央王朝为了维持统治，绝不会放弃重税的政策倾向。我们不妨再提一次朱熹的那句名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而“刻剥之法”的祸根，早在宋初就已经深深埋下了。

第六章

威震寰宇

一、北汉还是南汉?

拖死刘钧

河东的峰峦连绵起伏，一眼望不到边。头顶上那勉强能见的一小块蓝天，不过是被群山紧紧箍住的一个残念。

太原府勤政阁，昏暗的光线将眼睛压得肿胀涩痛，令人头晕目眩。粗糙的幔帐挂在阁中，一动不动，好似悬梁自缢的吊死鬼，直直坠了满地。

这座简陋的房间是北汉天子的寝宫，皇帝刘钧躺在床上，瞪着双眼，喘着粗气，像头落难的狮子，发出沙哑而狰狞的声音。侍者跪在一旁，端着药碗，小心翼翼地将药汤送入皇帝口中，生怕有一滴落在嘴外，被吝啬的皇帝责备惩罚。

刘钧手中还拿着一份两天前的军报：又有一百余人投靠了宋朝。这是今年第三次大规模叛逃事件，刘钧已经见怪不怪。大汉国内，每年至少有几百号人叛逃，这还是呈报上来的数字，若是赶上天灾，数量更甚，一些村子恐怕要因人口逃亡而撤销编制了。

刘钧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可是邻国之民愈多，寡人之民愈少。河东土地稀少而贫瘠，人要吃饭，种不出粮食，只好跑到有粮食的地方。即使是孟子再世，又能开出什么救国良方呢?

然而，面对人口流失，刘钧尚能从容。让刘钧直面死亡的，是大宋军队。

自李筠之乱以来，汉宋两国交兵不断，而且弱汉主动攻击强宋者不在少数。以弱逞强，连赵匡胤都纳闷。他派了一个谍者给刘钧

捎话："我说兄弟，你们家跟大周是世仇，确实不该屈服于他们。可是咱们两家又没过节，你何苦要困扰河东的百姓呢？契丹人狡猾，根本靠不住。你要是真有志向称霸中原，现在就南下太行山，与朕一决胜负！"

刘钧苦笑，他命谍者回告赵匡胤："我河东的土地和兵力，还不到中原的十分之一。守此弹丸之地，是怕汉室的宗庙断了香火。你要是想一决胜负，就来团柏谷吧。我自当与你背水一战！"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刘钧走上了诸葛亮的老路，主动出战，偏霸一方。

赵匡胤却没有走司马懿避而不战的老路，而是选择迎头痛击，甚至见缝插针，见机会就打。八年来，宋军主动进攻八次，但除北伐辽州一次外，其余规模都不大，不过是割割粮食，抢抢民户，烧烧县城。

这种小打小闹，宋人不费力，辽人懒得管，却苦了汉人。这种吞食的方法不仅使河东原本凋敝的经济雪上加霜，更给北汉君臣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当年张永德和张晖耗死北汉的战略，耗惨了刘钧。

刘钧永远不知道，赵匡胤何时会灭掉自己。但是他无权抗议，他能做的，只有去遥远的大辽，恳请干爹为自己出气。

可是干爹不搭理他。

并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做傀儡。刘旻为了报杀子之仇，不得已而为之。饱读诗书的刘钧又何尝愿意如此呢？于是，刘钧在即位后，不再像父亲那样恭谨对待辽朝。睡王耶律璟大怒，借着酒劲，在信里把刘钧劈头盖脸一顿痛骂。从此，无论刘钧怎样卑躬屈膝，怎样送钱孝顺，辽朝的反应都是两个字：不报。派往辽朝的使臣更是个个失联，死活不知。

没爹的刘钧像棵草，赵匡胤似乎起了恻隐之心。他承诺刘钧，

只要刘钧不死，自己就不会北伐汉国。

刘钧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是个好皇帝。想起早年同是好皇帝的孟昶，赵匡胤对刘钧投鼠忌器。虽然比起富庶的后蜀，北汉就是贫困线以下的最不发达国家。

可赵匡胤这话是北汉天会七年（963）说的，那一年，大宋的兵锋直逼荆湖，统一的战火燃遍南方。待到南方群雄芟夷殆尽，他还会记得自己的承诺吗？

汉天会十二年，辽应历十八年，宋乾德六年（968）七月二十日，北汉第二代皇帝刘钧，在勤政阁郁郁而终，享年43岁，谥号孝和皇帝，庙号睿宗。

一只灰褐色的鹘正在天空中盘旋。它那双招子极为敏锐，犀利的目光死死盯住地面，偶尔扇动厚劲有力的翅膀，却将锋利的爪子隐在腹下。

蓝天下，一个身材魁梧的英俊汉子穿着戎装，冷冷地仰望着这只鹘。突然，那鹘身子一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下云霄。汉子的目光尚不及离开天空，地上一只野兔已被掀翻在地，被死死地钳在一副钢爪中，抽搐两下，不动了。

鹘再度拍动翅膀，抓起野兔，飞至汉子面前，才松了爪子，将野兔重重扔在地上，然后安安稳稳地落在汉子伸出的左臂上。

汉子命随从割下一大块兔肉，亲自喂到鹘的嘴边。那鹘兴奋地拍拍翅膀，不知是对赏赐的恩谢，还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肉太少，不够吃。

嘿嘿，就只能喂你这么多，要是把你喂饱，你可就飞了。

那汉子正是大宋皇帝赵匡胤，八月七日这天，他带着近臣与侍卫，来到开封北郊按鹘。鹘，就是后世所称的隼。按鹘，是一种纵鹘行猎的活动。

这是八月以来赵匡胤第二次按鹘了，最近他兴致颇高。得知刘钧的死讯，赵匡胤未免有些小激动。对刘钧的承诺到期了——可以

对北汉出兵了！

赵匡胤回头看了看脸色阴沉的赵普，看来自己的心思已被看穿。则平一向主张先平南再扫北，恐怕正琢磨如何说服自己暂时放弃北汉。

赵匡胤又看了看和颜悦色的赵光义。刘钧之死意味着什么，光义不会不明白。只是这些年来，他似乎只专注于开封府的地方事务。至于朝廷大计，自从建隆四年（963）推荐符彦卿失败后，光义就极少再主动表达意见。

赵匡胤露出一丝神秘却又无比自信的笑容。无论是反对北伐的赵普，还是事不关己的赵光义，他们都不知道大宋在北汉问题上的底牌。兔起鹘落，最关键的是鹘能拿准时机；而要拿准时机，全靠它那双敏锐的眼睛。

赵匡胤对北汉国情了如指掌，因为他的两只眼睛已经死死盯住了太原府内的勤政阁。这双眼睛，一只叫惠璘，一只叫侯霸荣，他们都是大宋潜伏在北汉的谍者。

对了，还有一个人不能忘记，那就是北汉宰相郭无为，永远喂不饱的郭无为。[1]

两个酒徒的赌局

郭无为曾是个道士，在武当山修炼。但这个方额鸟嘴的老道心既不清，欲也不寡，置老庄之学于一旁，以纵横之术为绝学。

在很多人眼里，“纵横之术”等同于靠嘴吃饭、搬弄是非。当年郭威西征平叛，郭无为前去投奔并得到赏识。郭威本想把他留

[1] 史未明载赵匡胤直接以侯霸荣、郭无为从内部瓦解北汉，但从蛛丝马迹尚可见其端倪。参见王育济、白钢《宋太祖遣使行刺北汉国主考》一文。

下做幕僚，怎奈左右劝道：“明公身为大臣，手握重兵居外，而招揽纵横之士，这可不是避祸之道。”闻言，郭威拒郭无为于门户之外。

郭无为的自尊受到严重伤害，他拂袖跑到郭威死对头刘崇的地盘，在太原城外的抱腹山，继续做道士。道士郭无为隐姓却不埋名，他要走一条“抱腹捷径”。越是隐居，他的名声反而越大，最后惊动了大汉的内枢密使段常。在段常的推荐下，郭无为被求贤若渴的刘钧录用，一路平步青云，身兼宰相与枢密使，一国大政，悉以委之。

刘钧对郭无为是如此信任，直到奄奄一息之际，仍拼着最后一口气，将这个注定灭亡的国家和自己不中用的儿子，全部托付给郭无为。

他没有看到，接受托孤的那一刻，郭无为的脸上隐隐透着笑意。拿到最后的权力，顾命重臣郭无为如释重负，打道回府。那里，两名皇帝身边的供奉官已经等候多时。其中，长相魁梧者名叫侯霸荣，由土匪招安而来，但只做了散指挥使的小官，还被安置到荒凉的乐平戍边。

天会七年（963），王全斌率宋军来攻，心怀怨念的侯霸荣率部投降，后被补入内殿直。职位虽然不高，但这支皇帝卫队战斗力极强，有时甚至由赵匡胤亲自训练，所选将士更是天下精英，可见宋人对侯霸荣的重视。

士为知己者死。对于赵匡胤的知遇之恩，绿林好汉侯霸荣决心以身相报。报恩的方式是千里走单骑，逃回太原府。

真是活见鬼了！不仅宋人埋怨侯霸荣忘恩负义，连刘钧都感到莫名其妙，没想到我大汉还有如此忠义之士。侯霸荣得到表彰，补为供奉官，成为天子近臣。

可惜，此时的侯霸荣早已成为一名谍者，窥伺在大汉天子的左右。

郭府内另一位稳重的供奉官，名叫惠璘，自称曾在大宋殿前散指挥使中任职，因犯了事逃到汉国。在侯霸荣的引荐下，郭无为将他也保举为供奉官。因为郭无为已经知道，惠璘也是大宋派来的谍者。

谁会想得到，堂堂一国宰相，会被敌国特务发展成为下线。

也许，郭无为狡兔三窟，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也许，在攀上权力顶峰的路上，郭无为被两位谍者抓住了把柄：宰相赵弘外放，枢密使段常被杀，人们有理由相信，口若悬河的郭无为在背后搬弄是非。

但无论如何，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惠璘向两位下线传达最新指示：刺杀北汉新皇帝——刘继恩。

刘继恩的生父名叫薛钊，是一名普通士兵。那时刘崇也是一名普通士兵，于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薛钊。时过境迁，刘氏一门飞黄腾达，薛钊也跟着鸡犬升天。

升天的薛钊衣食无忧，但才能低劣，什么也干不了。做了公主的老婆刘氏看不起他，索性搬回宫里居住。后来，积怨已久的薛钊借酒疯拔剑，刺伤刘氏。大概念及夫妻一场，薛钊没有杀死刘氏，反而抹脖自尽，结束了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生。

刘氏很快又改嫁给一个姓何的人，生了个儿子名叫何继元。可没过多久，刘氏与姓何的双双死掉。眼见同母异父的两个外甥成了孤儿，没有子嗣的刘钧把他们一并接入宫里，收为养子，改姓为刘。就这样，孤儿变成了皇子，薛继恩变成了刘继恩，一夜之间，薛家再度鸡犬升天。

刘继恩长相奇异，大肚子，浓胡子，身子长，腿短，上马便魁梧，下马变侏儒。但这都不要紧，刘钧仍旧让他出任太原府尹，作为皇位继承人培养。

然而，刘继恩办事优柔寡断，把太原治理得乱七八糟。他唯一能够打动刘钧的，只剩下恭谨孝顺。刘钧曾对郭无为说：“继恩是

个好孩子，淳厚孝顺，可惜没有经国济世之才，恐怕继承不了我家的事业。奈何，奈何……”

能言善辩的郭无为一言不发。刘继恩不成事，这谁都看得出来。可郭无为不是赵普，他对江山社稷毫无使命感，他只对自己的前途负责。在弄清皇帝用意之前，他决定保持沉默。

但刘继恩怨恨上了郭无为，因为郭无为在关键时刻没有力挺自己，害得自己差点与皇位无缘。刘继恩更厌恶郭无为，因为他操纵朝政，把自己当成了傀儡。

刘继恩咽不下这口气，他一面给郭无为加授司空，让他位居三公，以示优崇；一面却对郭无为有意疏远。

赵匡胤紧盯着沉默的北汉。郭无为精明自私，党羽甚众；刘继恩刚刚即位，最聪明的办法是对他明以笼络，暗待时机。可是刘继恩不够聪明，暴露了自己的不满却又毫无作为。赵匡胤料定，郭无为必会先对刘继恩下手。所以，他给郭无为下达了刺杀令。他相信，即便不为未来的荣华富贵，仅仅为了继续执掌大权，甚至仅为活命，郭无为都不会对刺杀皇帝有任何异议。而在北汉经营多年的郭无为，在侯霸荣和惠璘的协助下，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

老皇帝病故，新皇帝若再被杀，北汉人心将惶惶不可终日，正是用兵时。

负责协助郭无为的，除了两位大宋谍者，还有赵匡胤的老大哥李继勋。在他的统率下，宋军一路势如破竹，仅仅用了一个月，就于九月二十日攻至太原城下。[1]

内忧外患，看起来，北汉的命不长了。

赵匡胤唯一的担忧来自北汉以北。睡王耶律璟最近伸了个懒

[1] 关于李继勋进围太原的时间，《长编》认为在刘继恩遇刺、刘继元即位之后；但据《宋史·太祖纪二》，则在九月二十日以后，其时刘继恩尚在。

腰，跑到距离太原五百余里的云州，在附近的深山里打猎。[1]这个不理朝政的辽国皇帝，每在千钧一发之际，绝不忘以特殊的方式，宣示自己的存在。

在耶律璟身后，西南面都统、南院大王耶律挞烈正在征发诸道兵马，随时准备进入汉境，与宋人一战。那是曾经击败周世宗、让中原人闻风丧胆的契丹名帅。

赵匡胤喝了满满一碗酒。与辽人作战，身经百战如他，也不得不壮壮胆。两个酒徒，两个赌徒，围绕着一个名叫“天下”的赌桌落座，短腿胖子刘继恩被五花大绑，扔在桌上，成为这场赌局的彩头。

赵匡胤正要出牌，人群中突然蹿出一朵奇葩，他吹着喇叭，张牙舞爪，甚至拿根小棍儿去敲敲赵匡胤的脑袋，费尽心思，引起这个赌徒的注意。

这朵奇葩，就是南汉皇帝刘铁。

让南唐对付南汉

与北汉皇帝在生命线上下挣扎不同，南汉皇帝特别会享受生活。

南汉的奠基人刘隐曾任静海军节度使，受梁朝册封为王。他死后，弟弟刘岩继承节度使之职，并于后梁贞明三年（917）称帝，建元乾亨，国号越，升广州为兴王府作为国都。第二年，他又将国号改为汉，史称南汉。

---

[1] 据《辽史·穆宗纪下》记载：“是秋，（耶律璟）猎于西京诸山。”辽朝以云州为西京，在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十一月。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认为，“西京”二字，或是将“京西”写颠倒了，或是对云州的追称。今暂采后者。

刘岩很迷信，一个天象或卦象，就能勾起他改名字、改年号的欲望。尤其是名字，先后改成刘陟、刘龚，最后直接取《周易·乾卦》“飞龙在天”之意，生生造了个“龚”字，作为自己最后一个名字。

最初，刘龚也曾励精图治，他为接纳士人而开科取士，开疆拓土后又能睦邻友好，岭南这片人烟荒芜的不毛之地，竟被他治理得“晏然小安”。但刘龚很快发现，自己与大多数胸无大志的皇帝一样，更适合骄奢淫逸。他宣称，自己成不了尧、舜、禹、汤。

也许吧，对于这个与中原隔绝的国度，皇帝可能更适合做鸟生鱼汤。刘龚遂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享乐中去。

发明酷刑，是刘龚的一大乐趣。他曾发明一种水刑，命人把毒蛇放入水里，然后把犯人推下水，看着他们活生生被咬死。还有一种酷刑，把犯人扔到锅里煮，煮到半死不活时再捞出来，放到烈日下暴晒，再在犯人身上撒盐，让肌肉慢慢腐烂。那犯人疼得嗷嗷大叫，却要等到很久以后才能咽气。商纣王的蚕盆与炮烙，与刘龚的酷刑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刘龚不仅设计了这些变态酷刑，每次行刑时还要亲自观摩，人们背地里都叫他“真蛟蜃”——活生生一只恶魔野兽。

待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就是南汉历代皇帝的治国信条。

刘龚临终时曾说过：“朕的子孙没一个能成事，大汉的天下就像老鼠钻进了牛角，路越走越窄，势力越来越小！”

刘龚的话说对了一半。治国，他的子孙确实不行；享乐，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刘龚的孙子、南汉第四任皇帝刘钅张，可谓集祖宗之大成。诛杀兄弟、滥施酷刑、大建宫室、横征暴敛，这些毫无新意的日常行为，已勾不起他的兴趣。他需要更刺激的生活。

刘龚有一个奇葩的理论，他认为士人都有家有妻，有儿有女，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子孙后代，因此不会为皇帝卖命。只有宦官，无牵无挂，才可能对皇帝忠心耿耿。因此，宦官是可靠而值得重用的，士人是靠不住的。

这个理论经过不断发展创新，到了刘铱这里，有了质的飞跃——男人想当官，哪怕你是科举状元，也要先把自己阉了。这样，你们再也不用拖家带口，可以专心致志做“王的男人”。阉割业也迅速蹿红，成为极有前途的行业。到南汉灭亡时，宋军一次就砍了500多个阉工的脑袋。

自此，从官府到军队，两万阉人充斥朝堂，南汉成为“太监大国”，空前绝后。阉人们在宦官龚澄枢的带领下，与卢琼仙统率的宫女狼狈为奸。后来，又来了一个自称“玉皇大帝下凡”的女巫樊胡子，刘铱将国事一以委任，国家乌烟瘴气。

不理政事的刘铱自称“萧闲大夫”，他把萧闲下来的力气，全用在了一位波斯女郎身上。这位女郎长得又黑又胖，但是聪明绝顶，深得刘铱欢心。皇帝还为她量身制作了一个昵称——“媚猪”。南汉刘氏一家逻辑奇葩，口味独特，连起名字都逃不出这奇怪的审美。

国家如此，皇帝如此，岂止令人发指，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北方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这朵奇葩为何会跑到大宋身后搅局——用正常的思维，根本无法理解这不正常的南汉皇帝。

早在建隆四年（963）宋灭湖南时，刘铱就乘乱派兵北伐，想要浑水摸鱼。结果不但鱼没摸到，他老爹刘晟当年做皇帝时，趁南唐灭楚而攻占的郴州也被宋人抢走了。可是刘铱不长记性，乾德六年（968）又派兵攻打道州。他似乎在以实际行动提醒赵匡胤：在大宋“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里，谁才是下一个既定目标。

道州刺史王继勋（与赵匡胤的小舅子重名）忍无可忍，上奏朝

廷，请求迅速把这个不正常的国家灭掉。然而赵匡胤正在与契丹较劲，分身乏术。他决定把对付南汉的重任交给一个玉面书生。

这个玉面书生就是李煜，一位不世出的风流才子，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一位治国无能的国主，一位倒霉的亡国君。

李煜，原名李从嘉，字重光，李景第六子（一说第五子）。他是“重瞳子”，即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据说，在中国古代有史记载的重瞳子，算上李煜可能也超不过十人（包括北汉世祖刘旻），这在当时是大富大贵的帝王之相。

可是李煜不想要大富大贵，更不想当什么帝王。当年太子李弘冀如日中天时，仁慈恭孝的李煜却自号钟隐，取钟山隐士之意，每日以琴棋书画为乐。

然而，想做皇帝的李弘冀突然病逝，不想做皇帝的李煜成为李景活着的诸子中最年长者，被迫以尚书令知政事，入居东宫。李景逃命似的迁都南昌府后，更是将他立为太子，留在金陵监国。不久李景病逝南昌，在获得赵匡胤同意后，被尊以元宗的庙号，后世称为南唐中主。而命中注定的后主李煜，被迫登上国主之位。

和刘龚一样，刚刚接手南唐的李煜也曾励精图治，广开言路，罢废弊政，选贤任能。然而不久，李煜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治国的料。于是，李煜也学着刘龚，投入声色犬马中。

但与喜欢酷刑的刘氏祖孙不同，李煜有着极高的审美情趣。他和自己的娇妻周娥皇把盏玉京，调素琴，阅金经，重按《霓裳》歌遍彻。

《霓裳羽衣曲》乃盛唐显乐，可惜历经中唐兵乱，曲谱失传。李煜寻寻觅觅，于坊间求得残谱，付与佳人。娥皇操持烧槽琵琶，一番轻拢慢捻抹复挑，竟使盛唐遗音，复响南唐。

李煜看得出了神，手拍栏杆，神驰心醉，随口吟道：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栏干情味切。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1]

只是小楼昨夜又东风，吹得李煜魂悸魄动。正如后来南唐大臣徐铉所说，一曲清商音，本是开元太平曲，却又偏偏唱出别离声。[2]

李煜和父亲李景一样，无法纵情，游弋在长江水道的大宋水师是他永远的担忧。他更像北汉的皇帝们，日夜等待南唐的末日。

然而，相对于北汉皇帝的现实，南唐国主却很傻很天真。他以为只要自己听话，就可以苟延残喘，安心做一条居家的小犬。

所以，自从建隆二年（961）即位以来，李煜始终小心侍奉大宋。即便在南唐丧失江北财源、经济日益凋敝时，他的贡品也依旧送往开封，从未中断。

李煜的良苦用心，终于得到回报。大宋南征北战，却始终没打南唐的主意。不是不打，是暂时没有必要。

正是鉴于李煜的恭顺，赵匡胤才决定给他一个任务——给刘钅张写封信，劝他归还湘南旧地。李煜命人认认真真地写好书信，派使者送到南汉。

大战在即，赵匡胤不想节外生枝。他派李煜写信给刘钅张，目的有三：其一，试探李煜的忠诚，以确保大宋北伐时，南唐不会北上作乱；其二，万一刘钅张翻脸，这账要算在李煜头上，与我大宋无干；其三，即便刘钅张不翻脸，想必也不会给南唐好脸色，两国关系欠佳，日后征刘钅张，也好叫李煜隔岸观火。

赵匡胤多虑了，且不说李煜日后不会难为大宋，就说刘钅张，

[1] 李煜《玉楼春》（又名《惜春容》）。

[2] 徐铉《又听〈霓裳羽衣曲〉送陈君》："清商一曲远人行，桃叶津头月正明。此是开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别离声。"

接到书信后竟然毫无反应。这位27岁的皇帝故步自封，对于南唐关注甚少，对于大宋的强大也毫不在意。什么唐国主，什么宋皇帝，老子才是天子无双。刘钹用息兵不修好，表达着自己的抗议。

可是赵匡胤不能再给予刘钹更多关心，因为太原城里，郭无为已经下手了。

二、最后一次亲征

无为，无不为

刘继恩确实是个孝子。李继勋的大军兵临城下，刘继恩却仍然守在勤政阁里披麻戴孝。他搬进宫里已有六十多天了，可是亲信却还留在太原府的衙署里。

有人劝他：至少应该把侍卫招来护驾。

刘继恩不听：守丧之阁，岂容刀剑？

刘继恩的迂腐，给了郭无为可乘之机。一声大哮，十来个彪形大汉手执刀剑，冲进勤政阁，随即“咣当”一声，反锁大门。

刘继恩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他刚刚与诸位大臣和宗室子弟吃罢国宴，正卧榻而眠。没想到酒意未醒，悍将促至。

一个狰狞的面孔映入眼帘，供奉官侯霸荣！他不是大忠臣吗？然而刘继恩没时间多想，他连滚带爬地从地上起身，绕着屏风玩儿命跑。

就您那小短腿，歇歇吧。侯霸荣一个箭步上前，一刀捅入了刘继恩的胸膛。

但“咣当”又是一声，反锁的大门突然被踹开。侯霸荣惊讶地朝门口奔去，还没等看清情况，脑袋上已挨了好几刀。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勤政阁外，被侍卫围了个水泄不通。勤政阁内，十几具刺客的尸体倒在刘继恩身旁。一个仙风道骨的身影，缓缓从侍卫身后出现，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郭！无！为！

侯霸荣拼着最后的力气，看清了那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没错，杀死侯霸荣的，正是他的盟友郭无为。

难道郭无为良心发现？还是他临阵反水？都不是，郭无为忠实地执行着大宋的任务，只不过，为了自身利益，他自行添加了一个支线任务：杀人灭口。

郭无为虽然投靠了大宋，但并非义无反顾。北汉亡国是迟早的事，但一定会亡于今日吗？万一杀了刘继恩，宋军攻不下太原怎么办？万一侯霸荣逃不出去，落到大臣们手里怎么办？与其等他日后把老夫供出来，不如现在就让老夫亲自送他上西天。

郭无为，字无不为。为了性命和前途，他无所不为，无所不能为。

刘继恩死了，北汉朝中群龙无首。李继勋很配合地在延夏门放了把火，太原城内人心惶惶。

侯霸荣死后，那个惠璘突然不见了。但是无妨，郭无为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距离大功告成只差最后一步——投降。

不过，郭无为虽然是北汉权相，却还没有只手遮天的影响力。率领百官，出城拜谒李继勋？郭无为不是不想，而是实在办不到。

因此，北汉的皇帝还要有人来做，这个人最好脾气平和，性格懦弱，容易控制。郭无为早就物色好了人选。这个人就是刘继恩同母异父的弟弟，刘钧的养子，太师、兼太原府尹刘继元。

朝堂廷议，群臣哑然。只有宰相张昭敏发出了仅存的反对声：

“少主（指刘继恩）并非刘氏血肉，因此嗣位后不得善终。现在举国上下提心吊胆，应该迎立刘氏宗族，以安众心！”

众心难安，这才是我立皇帝的目的！我欲立便立，尔能奈我何？不解释，不反对，不争辩，郭无为拂袖而去。直到此刻，刘继元的表现都让郭无为称心。这位英俊的刘氏养子倾心佛学，庄重大方，清心寡欲。

又是朝会的日子。

宰相郭无为身着朝服，再无半点品清格高的世外仙韵。在他身后，自平章中书事张昭敏以下，百官依尊卑次序追随。平日里秩序井然的朝班，今天却像一群皮滑毛亮的老鼠，密密麻麻朝勤政阁拥去。

郭无为为自己袖中的信而得意扬扬。这是当今大宋皇帝的亲笔墨宝，信中承诺，只要刘继元来归，大宋必授他以平卢军节度使。

平卢军是个好地方。大名鼎鼎的符彦卿，当年就做过平卢军节度使；郭威的权相王峻，想要的也是平卢军节度使；还有李重进，大宋最初给他安排的归宿，同样是平卢军节度使。北汉小国，辖地本就与节度使无异，若能迁出这贫困潦倒的河东，到那平原大镇享乐快活，刘继元，那时你可别忘了我郭无为的功劳，哈哈哈！

郭无为忘形大笑，他不仅在嘲笑刘继元，更在为自己的前途高兴，因为赵匡胤已经保证，事成之后，让郭无为做安国军节度使。北汉的宰相算什么，在人家大宋眼里，不过是个节度判官。哎呀，刘继元，以后咱们见面，可就得平起平坐咯！

本来，赵匡胤一共秘密交给郭无为四十余道手谕，除了他与刘继元外，自宣徽使马峰以下，全部许以节度使的高官，志在将北汉的高官与将领彻底打成一盘散沙。然而，郭无为却将这四十余道手谕藏了起来，只留下自己和刘继元的。我郭无为操着掉脑袋的心，凭什么让你们当上节度使？

吃独食的郭无为大概忘了，如果没肉吃，大家凭什么还要跟着他？

但郭无为依旧筹志满怀，直到他走到勤政阁门前时，才突然警觉起来。怪了，这些侍卫看着真面生啊。刘继元才当了几天皇帝，贴身侍卫就都换上太原府衙的人了？满腹狐疑的郭无为迈步入阁，眼前这个小皇帝高居御座，气沉息稳。

郭无为有点心虚，收起跋扈，率领百官下拜叩首，恭恭敬敬地道：圣躬万福。

刘继元伸出右手，做了一个抬起的动作，示意百官平身。

怎么回事？刘继元表现出与年龄完全不相符的稳重，不急不躁。这令郭无为更加急躁，他急忙掏出赵匡胤的手谕，呈上御前。

刘继元不为所动。

郭无为瞠目结舌。难道嫌官小？没关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

但一直怀疑郭无为杀死上任皇帝的刘继元，根本不想与他废话。

郭无为像咬了舌头一般，说不出话来。这还是那个刘继元吗？

郭无为不敢说话了，他四处张望，期盼着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帮自己说两句劝降的话。

可是没有，一个人都没有。

聪明反被聪明误，要小聪明的郭无为终于明白，藏起那四十余道封官许愿的保证书是多么愚蠢的行为。此刻，他只能孤零零地，在皇帝的密切关注下不知所措。

城外的李继勋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此次奉命“北伐”，他的任务是虚张声势，围而不攻，据说时机一到，太原城的大门就会自动打开。果然，自己的大军没到多久，就听说北汉的伪主被杀了。看来这位天子义弟早就把城内的一切打点利落，李继勋遂驻军城下，安心等待。

这一等就是小两个月，太原城的大门始终紧闭，倒是听说雁门关的大门打开了——耶律挞烈受命为兵马总管，率着契丹铁骑，踏风破关而来。

风紧，扯呼！李继勋就像与耶律挞烈约好的一样，听到风声，马上撤军，他已经领会了皇帝的意图。北汉有机可乘，赵匡胤绝不会放过。但投机不是投命，眼下南方未定，大宋还没到放手一搏、跟契丹人玩儿命的时候。何况这次出兵，意在不战而屈人之兵，根本没有做好周密的部署。仓促去跟契丹人肉搏，太不划算。

赵匡胤的手缩回来了，刘继元的手却伸了出去，更确切地说，是伸出了刀子。听闻宋军撤退，刘继元连说了三个字：杀！杀！杀！

第一个“杀”字，落在了养母郭太后头上，据说是刘继元为死去的前妻段氏报仇。

第二个“杀”字，落在了刘旻的儿子们头上，北汉正宗血脉几乎断绝，从此没人敢来抢夺皇帝的皇位。

第三个“杀”字嘛……郭无为抱头鼠窜，他越来越后悔，怎么就看走眼，立了个活阎王。

郭无为多虑了。刘继元暂时还没想把他怎么样，他的第三个“杀”字，落在了大宋头上。仗着契丹援军已到，刘继元一声令下，汉军竟然越过边境，在晋州、绛州抄掠一番，扬长而去。

赌桌上的彩头换成了刘继元，他不仅挣开了绳子，还依附在耶律璟身旁，居然回敬赌徒赵匡胤一记老拳。赵匡胤大怒，蕞尔小国，焉敢如此！

随着刘继元拳头南挥，日光也走到天际最南。冬至这天，赌桌上的新酒已然饮尽，是开启陈年宝酿的时候了。

赵匡胤郊祭天地，改元开宝。他不畏严寒，从袖中重新伸出双手，洒酒祭天。

耶律璟回銮临潢，驻跸黑山。他不受朝贺，从身后抽出一把长刀，借酒杀人。[1]

重返战场

光秃秃的黑山上，北风凛冽而过。阴谋诡计并没有被吹散，翘首盼春的人们，只能在春节的喜庆中，找回一点余温。

辽朝上京外，嘶声如电，蹄声如雷，黄烟过处，数百精骑如疾风般席卷而来。辽应历十九年，宋开宝二年，汉天会十三年（969），大辽皇帝耶律璟皮衣束带，顶毡挂绒，背宝弓，执辔策，率领契丹狼儿，回到阔别已久的国都临潢府。

建国半个世纪，契丹人依旧保持着渔猎民族的传统，皇帝很少居住在宫里，而是在捺钵（契丹语，意为“行在”）的宫帐中处理国事。但是像耶律璟这样，一年到头睡在深山老林，不问朝政，也着实罕见。

因此，百官听闻皇帝元旦入京，都准备借机廷议朝政。尤其是北汉使臣，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刘继元即位后，马上派出使臣觐见辽朝，请求干爷爷皇帝正式册封自己继承皇位。

由于正在对外用兵，耶律璟不受朝贺，不过，宴还要摆，酒还要喝，有什么事，喝完酒再说吧。汉使被拒于门外，因为宴会过后，醉醺醺的睡王又睡去了。

赵匡胤也因用兵的缘故，没有接受朝贺，但同样的，宴还要

[1]《辽史·穆宗纪下》：“冬十月辛亥朔，宋围太原，诏挞烈为兵马总管，发诸道兵救之。十一月癸卯，冬至，被酒，不受贺。十二月丁丑，杀酒人搭烈葛。是冬，驻跸黑山东川。”上京临潢府为辽朝国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辽朝境内黑山有两处，此处所指黑山当在上京西北。

摆，酒还要喝。不过，开封城里的国宴，比上京城中的宫宴气派多了。不仅珠服玉馔，满目琳琅，而且四方藩镇，鹰扬而聚。

因着去年郊祭天地，不仅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再度入朝，而且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镇宁军节度使张令铎也同来助祀。多年未见，兄弟情深，赵匡胤一时百感交集，欢声笑语充盈大殿。

东班座上，头发早已花白的右仆射魏仁浦默默喝着小酒，与喧嚣保持着距离。如今，59岁的魏仁浦依旧挂名朝中，时不时奉旨而来参加此类聚会。

赵匡胤见魏仁浦独自一人，颇为清冷，便举杯相邀："道济，何不劝我一杯酒？"魏仁浦的脸上，仍然保持着招牌似的平静，他举起酒杯，缓缓来到御阶前。赵匡胤却突然压低声音，郑重其事地问道："朕想亲征北汉，你觉得如何？"魏仁浦面不改色，缓缓回答："欲速则不达，陛下还是谨慎为妙。"

魏仁浦的酒并没有劝住赵匡胤。刘继元的挑衅不仅重燃他的倔强，更令他越发觉得，北汉近在京畿咫尺，不灭何以安心。面对凶悍的契丹与坚毅的北汉，八年未上战场的赵匡胤决定亲自披挂上阵。他要在河东续写不可战胜的神话。

更何况，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郭无为，最近的情况似乎不太妙。不尽快发挥他的作用，恐怕以后就再也用不上了。

郭无为确实不妙。失踪已久的惠璘终于重现江湖，只不过是在北汉的囚车里。原来，刘继恩死后，惠璘趁乱离开太原，一路向西北狂奔，不幸在岢岚军被捕，解送太原问罪。

岢岚！郭无为大吃一惊，那是岚州的属地。而岚州刺史赵弘，就是被自己赶出朝廷的前任宰相。惠璘落在他手里，我郭无为还有好果子吃吗？

而且郭无为很纳闷，惠璘去岢岚做什么？逃跑？似乎不像。宋军兵临城下，要是逃跑，他干吗不直接投奔李继勋？岢岚之地，濒

临府州，那里是宋朝的飞土，也是插入大汉背后的钢刀。惠璘去岢岚，难道是要暗通府州，偷袭大汉？

郭无为越发坚信，惠璘不简单，绝对是个特务头子，在大汉有一张特务网。有惠璘在，外可结交大宋，随时准备做献土功臣；内可利用谍网，剪除异己，巩固权势。郭无为将惠璘扣留了下来。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宋军降将李超对惠璘知根知底，把惠璘的事告诉了国丈马峰。郭无为大怒。他必须抉择，杀掉惠璘，向刘继元表忠心；或者杀掉李超，堵住他的嘴。

郭无为做出了最心狠手辣的选择——将惠璘与李超一并灭口！只是这一次杀人灭口，郭无为再没有杀侯霸荣时的从容。

郭无为在太原城里搞小动作，赵匡胤与耶律璟却在广袤的土地上大动干戈。正月十一日，春气东来。耶律璟醉饮大内，月余不听国政。赵匡胤亲临飞龙院，视察骏马良驹。这场赌局，渐渐就要亮出底牌。

二月七日，汉使再度飞奔上京城，乞求册封，同时急报：宋军诸州人马正在向潞州、晋州、磁州聚集，有再讨汉国之势。

二月八日，大宋宣徽南院使曹彬、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等，各领所部作为先锋，出征北汉。

二月十一日，大宋皇帝赵匡胤，下诏亲征北汉！

二月十二日，大宋以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建雄军节度使赵赞为马步军都虞候，率领第二批军队进发太原。

种种严峻情势下，耶律璟仍醉眼迷离，不知所云。

刘继元和北汉的满朝文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唯有郭无为暗暗窃喜。

当然，窃喜的还有东京留守赵光义，他终于可以摆脱皇帝与宰相的阴影，在开封城里做一次主。

二月十四日，一声惊雷响过，醉眼迷离的耶律璟终于翻了个

身，命韩知范（一作韩知璠）到太原正式册立刘继元为皇帝，顺便在两天后杀了两位导从，将其挫骨扬灰。

可是，当耶律璟准备再度入眠时，却发现外面吵闹得很，根本睡不着。

因为大宋密州防御使马仁瑀，正在幽州附近纵兵大掠，把幽燕腹地搅得人仰马翻。[1]

耶律璟猛然惊起。连续两个月的醉饮昏睡，让他头痛欲裂。殿外的疾雨被狂风吹得横行，像一条条钢索，紧紧捆住门窗。耶律璟披上衣服，缓缓起身，可就在双脚沾地的瞬间，只觉头重脚轻，眼前发黑，“扑通”一声，栽倒在床头。

大雨连绵不停，潞州官道两侧，雨水积蓄成沟，生出一个个豆大的水涡，仿佛骤发的水疱。雨点砸落下来，水疱“噗”然破裂，随即又化作新的脓疮。河东脊梁，好似长满白毛，在闷湿的淫雨中发霉腐烂。

赵匡胤被暴雨困在潞州的州衙，数日不得出屋，也快捂得长毛了。此次出征，他没有西进洛阳，从泽州直抵潞州，而是取道滑州，绕行河北，再驻潞州，以便亲自部署对辽国的防务。这原本就耽搁了一些时间。屋漏偏逢连夜雨，宋军刚刚踏入潞州地界，罕见的暴雨连日来袭，赵匡胤被迫驻跸，时间又耽误了。

更让赵匡胤恼火的是，各地运来的粮饷，横七竖八地堵在潞州城里。如果再不及时采取措施，这批粮食就和潞州城一样，非发霉腐烂不可。气急败坏的赵匡胤下令，将负责押运粮草的转运使革职

[1] 据《长编》及《宋史·马仁瑀传》，“上征晋阳，命密州防御使马仁瑀率众巡边，至上谷、渔阳，敌素闻其名，不敢出，因纵兵大掠，生口、牛羊数万计”。但渔阳县为蓟州治所，在今天津市蓟州区。上谷县当时不置，旧地当在北京市延庆区一带。两地距离宋辽边境过远，上谷更近深山；而自从周世宗退兵后，辽军便驻守涿州范阳县，马仁瑀似乎不能如此深入敌境。且此事《辽史》亦无记载。故笔者但称其在幽州附近的宋辽边境纵兵。

拿办。

将官们纷纷下跪求情，气头上的赵匡胤哪里肯听。随军的宰相赵普捋了捋胡须，心中暗道：你们还是不了解官家。他要惩办转运使，是因为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震慑人心以解决粮车塞路的问题，才能对战局有利。你们这样傻劝，劝到太原城被打下来也无济于事。

想到此，赵普起身，劝谏说："不妥，不妥。如今各路大军刚刚会师前线，准备讨贼。现在我们惩处转运使，贼人必会以为我军粮草储备不足。这种事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依臣看，不如选用精干的人来处理潞州事务。"

赵普的话，果然一击命中。刚才还在咆哮的天子，瞬间冷静下来。赵普说得对，那就让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权知潞州，枢密直学士赵逢为随驾转运使。潞州是战时大后方，务必保证粮饷不乏，输运无阻。

赵普又一次成功了，因为他深知：赵匡胤是个武人，脾气大，有点事往往就大发雷霆，甚至做些冲动的决策。赵匡胤又是个智者，关键时刻只要有人提醒，他往往能"猛醒"，即使真的一时醒悟不过来，待到火气消了，也能拨乱反正。

君臣相得，赵匡胤又一次被赵普点醒了。

然而，赵普能点醒人间的皇帝，却点不醒老天爷。十余天过去了，暴雨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近臣们已经奔赴寺庙，焚香祷告，祈求速晴，但似乎并不奏效。难道是北伐杀气太重，上天示警？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叫天天不应的赵匡胤，只能跟自己较劲。他亲自跑到寺庙里，躬身对佛像拜了三拜，默默祷告："此行止以吊伐为意，誓不杀一人！"

"誓不杀一人"，自古以来哪有这样打仗的？但这是赵匡胤的心声，他希望将战争中的残酷控制在最低范围。话虽说得夸张，但并非满口胡诌。因为，赵匡胤仍对郭无为抱以厚望。

守在北汉南大门团柏谷的汉军再度被击退，李继勋挥师急进，又一次兵临太原，北汉迎来建国以来第三次都城被围。可是刘继元却大不以为意，李继勋来了不要紧，重要的是，韩知范也来了！这不仅意味着，大辽已经承认他的帝位合法；更意味着，大辽没有抛弃大汉，辽朝的援军必会随后而至。刘继元总算松了口气，他即刻下命，于次日举办大宴，为韩知范洗尘接风。

并非每一位汉臣都像刘继元这样乐观，比如郭无为。他竟然在宴会上号啕大哭，拔刀自刺。左右早已将郭无为拦下，刘继元也赶忙起身，一把夺下他手中的匕首，又扶着他落座，好声安慰。

郭无为却犹自哭诉："奈何以一座孤城，抵抗百万雄师啊！"说罢，捶胸顿足，放声哀号。满座文武面带凄然，好不容易被刘继元鼓起的人心，又泄了下去。郭无为也并非完全演戏，每当想到宋军败退，刘继元来找自己秋后算账时，他就急得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与郭无为完全不同，坐困潞州十八日的赵匡胤，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他召见了一位被俘的北汉谍者，那谍者告诉他："刘氏不得人心，太原城内的百姓忍受暴政已经很久了，他们日夜都在盼望陛下的车驾入城，就恨您来得太晚。"谍者机智聪明，为了活命，专挑赵匡胤爱听的说。

还有更令人振奋的消息！就在宋军入驻潞州前几天，39岁的大辽皇帝耶律璟被近侍和仆人杀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无论继任的耶律贤是否贤明，眼下，契丹人都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稳定国中局势。刘继元，你的干爷爷帮不了你了！

三月十五日，大宋的旌旗再度迎风招展，卷带着雨后的神清气爽，浩浩荡荡，踏入了北汉国境。

权力教人生死相许

辽使韩知范披甲执锐，掩藏在太原城墙的城垛背后，仔细勘察着战场形势。如今的太原城外，已是一片汪洋。二丈余的城墙，早就变成了防洪的岸堤。宋人的舟楫在城外游弋，耀武扬威。这已经是赵匡胤到达城下后，第二次决开汾水，倒灌太原。

远处的陆地上，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堡垒。宋军在城外加筑长连城，将整座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宋军的四大将领党进、李继勋、赵赞和曹彬，分镇东南西北；汉国大将刘继业数次试图突围，都败军而归。如今，大汉除了太原及北部的疆土外，其余州县几乎全部降宋，就连前任宰相赵弘也将岚州拱手相让。

太原已成孤城，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契丹铁骑。这也是赵匡胤最关心的事。跟他博弈的人并非太原城里的刘继元，而是草原上的耶律贤。十五年前，乘着高平之战的声势，赵匡胤曾随周世宗一路打到太原城下，甚至连北部的州县也纷纷归附中原。就在大周将士胜券在握之时，契丹的援军彻底打碎了他们的美梦。

契丹，这才是大宋在河东的劲敌。

四月十二日的正午，身披铠甲的赵匡胤略显烦躁。他登临军营北台，不言不语，只管向北方眺望。他在等一份军报，一份决定宋军去留的军报。

终于，远处的地平线上扬起黄土，节奏规律的马蹄声渐行渐近。赵匡胤紧紧握了握腰间的佩剑。

阳曲报！……

不等来者说完，赵匡胤一个箭步从他手中夺过军报打开，一边读着文字，一边难掩喜悦，终于忍不住右手一用力，将军报“啪”的一声合上。

赢了！我们赢了！辽国的援军遭到大宋伏击，大败而归！

就在前一天，赵匡胤收到军报，辽军正在火速增援北汉，其中一路欲通过石岭关而入。十万火急，赵匡胤急命驿站传旨，命屯驻阳曲县的棣州防御使、石岭关部署何继筠迅速到行在相见。赵匡胤向何继筠面授方略，拨给他精骑数千，命他无论如何要将辽人拒于关外。

时值盛暑，赵匡胤特命太官做了麻浆粉，赐给何继筠消暑。何继筠得皇帝赐食，雄心更壮。临行，赵匡胤特以豪言相赠："明日中午，我等卿的捷奏传来！"果然，何继筠在阳曲县北大破辽军，擒其武州刺史王彦符，斩首千余级，俘获百余人，得马七百余匹，铠甲更是数不胜数。

二十出头的耶律贤咽不下这口气，一个月后，大辽的援军卷土重来。这一次，辽军取道定州。赵匡胤闻言，心都放到肚子里了。韩重赟在那里坐等很久了，辽人必败！

自从罢为彰德军节度使，韩重赟更加小心谨慎，在相州只管修佛寺诵佛号，不再理会军务。只是今年赵匡胤北伐途经相州，韩重赟不敢怠慢，亲自前往朝见。

对于赵匡胤来说，当年那场误会早就烟消云散。但他对韩重赟的近况也略有耳闻，心中不免有愧。这次见韩重赟入朝行在，赵匡胤大喜。这位义弟有多大本事，他再清楚不过。以前为求自保，他不显山不露水，未免叫人小瞧了他。赵匡胤决定给韩重赟一次扬名立万的机会，也算是对这位多年效忠自己的义弟一个补偿。

赵匡胤对韩重赟说："契丹知道我亲征，必发兵救援伪汉。他以为镇州、定州没有防备，必会由此路进入河东。你可为朕领兵，倍道兼行，待其路过镇、定时，出其不意破之！"遂以韩重赟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义武军节度使祁廷训为副，关南巡检使李汉超为都监，全面负责河北前线的守备。

阳曲惨败后，辽军果然自定州入援。没想到进了嘉山，四周山

谷突然插满了大宋的旗帜。见宋军有备，辽人大惊，马上前军变后军，准备突围而去。韩重赟岂肯错过机会，当即发兵，把辽军杀得溃不成军。赵匡胤听了捷报大喜，亲自写诏书褒奖韩重赟。

气势汹汹的契丹人气短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向来不堪一击的南朝兵马怎么如此骁勇。十几年前辽军逼得周军放弃太原的英勇事迹，辽朝的新老将兵无人不晓。然而今日，他们从宋军那里，第一次见识了中原重整旧山河的决心与气魄。

当宋军将辽军将士的铠甲和首级纷纷抛上城墙时，汉人简直要崩溃了。完了，辽人不会来了，我们孤立无援了！

没有友军，没有外援，堡垒锁路，洪水逼城。太原彻彻底底沦为一座孤城。

可是，它依旧固若金汤。自北朝以来，太原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多次成为王朝的陪都。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皆龙兴于此，从没有人打下过这座墙坚垛固的铁城。连倥偬一生、所向无敌的郭荣，唯一一次失败也是在太原城下。

这里是北汉的天堂，是中原王朝的地狱。

赵匡胤穿过大军驻扎的甘草地，登临堤坝，遥望太原。只见宋军的小舟一队接一队游近城墙，在盾牌的掩护下，机弩仰攻。但是，城上密密麻麻的箭矢就犹如潞州的那场暴雨，无止无休，无穷无尽。决口的汾水中，不断打起猩红的血花。刺鼻的血腥气与甘甜的甘草香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诡异的味道。

留在堤坝上的宋军一字排开，架起一架架制作精良的床子弩。只见弩床高架，弩箭的箭杆粗直锃亮，箭镞锋利。但听得“砰”的一声，万弩齐发，如雷霆乍惊；既而一串“呲”“呲”的长鸣，犹如万道闪电，撕破太原城际的空气，直捣汉军心腹。

这是由作坊使魏丕改良的床子弩，其射程由七百步增加至一千步，是当时最先进的远程攻击装备。汉军虽然见过床子弩，却从没见过这么远、这么快的。在弩雨箭林中，无数汉兵应声而倒，只留

下一道道血迹横贯天空。

赵匡胤以为，在铁桶合围与改良床弩的攻势下，汉军必然军心大乱，收复太原只在须臾之间。然而，眼前的战局却丝毫没有好转。大宋的将士一个个倒下来，一个个又扑上去。连那个以打小报告为生的石汉卿，这次都豁出命去，战死在太原城下。显然，北汉人抵抗宋军的决心，比太原的城墙还要硬。河东民风之果敢、坚毅、彪悍，果非他地可比。

但郭无为除外。郭无为开始为自己做最后的安排。他既希望宋军早点入城，好结束自己这无依无靠、不知死活的煎熬；又希望宋军不要入城，因为这个时候入城，他不但做不成献土元勋，甚至寸功未立。买卖没做成，拿什么去换安国军节度使的位子？

郭无为决定放手一搏，孤注一掷。他要将北汉的精锐军队连兵带将，全部拉到大宋去。这绝不亚于献出一座太原城。

月明星稀，云开雾散。刘继元点选一千名精锐甲士，交给郭无为。与其坐困等死，不如就信郭无为一次，听由他深夜率兵偷袭宋军。

病急乱投医的刘继元亲自登临延夏门，目送郭无为率军出城，眼中充满期待。

对于刘继元的重托，郭无为没有丝毫愧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从未违背这个原则。他只觉得刘继元太抠门，才给了区区一千人，这样投奔赵匡胤，自己的身价大打折扣。

郭无为只顾着打小算盘，却没发现自己身后，一双雪亮的眼睛死死盯住他的一举一动。此人名叫刘继业，他后来还有一个震古烁今的名字——杨业。

刘继业本名杨重贵，父亲杨信是麟州土豪，乘着五代天下大乱，占据麟州，自为刺史；后来他投靠后汉，遣20岁的长子杨重贵为人质，让他到刘旻身边效力。杨重贵骁勇善战，颇得刘旻喜爱，遂赐姓刘氏，赐名继业，待之如孙。

当时，北汉虽然受辽朝“保护”，但辽人仍时常到两国边境“打草谷”。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刘继业镇守北疆，多次击退辽人，屡立战功，国人称他“杨无敌”。然而，在契丹人面前无人能敌的刘继业，却备受汉主猜忌，以致战场上寡不敌众，在宋军面前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如今，他官居侍卫都虞候，与殿直都知郭守斌共同作为郭无为的副手，统军出城。

自从刘继恩遇刺，郭无为的举止日渐反常，刘继业早对他起了疑心，尤其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夜晚搞偷袭，生怕敌军看不见我们的行踪吗？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太原城上，天雷滚滚；汾水河畔，风雨大作。郭无为咧着嘴，呆呆地被浇成了落汤鸡。四下里一片漆黑，雨雾遮住了最后的视线。

刘继业！刘继业！——郭无为在雨中大喊，丝毫不怕被宋军发现。他现在最怕的是连这一千人都被雨水冲散了，他得尽快整合人马，逃离太原这个鬼地方。

郭相公——我的马蹄子受伤了——走不了了——雷雨交加中，刘继业的声音从漆黑的远方传来，渐行渐远。

啊？刘继业，你给老夫回来！郭守斌，郭守斌在哪里！——郭无为骑在马上，原地转圈，朝着黑暗大嚷大叫，可郭守斌连个影子都没有。

从未领过兵出征的郭无为目瞪口呆，两员副将临阵“逃跑”也就算了，那些士兵居然也一哄而散，跟着二将回城。身边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随从，才几十个人。难道我暴露了？郭无为越想越怕，带着数十骑随从拔马便往宋营逃去。

可是跑了没两步，郭无为又把马收住了。节度使，我的安国军节度使！他不甘心，把马一兜，又跑进了太原城。

问世间权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无为，无能为矣！

开宝二年（969）闰五月，距离赵匡胤离开京城已有三个半月。经过一夜暴雨，太原的铜墙铁壁终于被撕开一道裂缝，滔滔汾水从延夏门的瓮城涌入，穿过两重外城，瞬间将城墙下淹成一片汪洋。

北汉军民的哀号冲上九天，又狠狠落在远处的长堤上。赵匡胤披甲登堤，攥紧双拳，咬紧牙关，死死盯住那道裂缝。

宽了，宽了，宽了！

汉军疯了一样，抱着滚木巨石扑向裂口，但宋军密集的箭网将他们的努力悉数兜入决口的汾河。用不了多久，牢不可破的太原，将会颓倒在战无不胜的神话下。

郭无为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太原城终于要沦陷了！胜利，从未离自己这样近；安国军节度使，从未离自己这样近。我们最后的倚恃即将崩溃，陛下，投降吧！陛下，陛下、陛下、陛、陛——刘继元！刘……

刘继元手一挥，郭无为被甲士们拽下勤政阁。看在宰臣元老的份儿上，刘继元赐了郭无为一尺白绫，给他留了一具全尸。

阁门外，宦官卫德贵松了口气。郭无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节度使梦会毁在一个告密的阉人手里。

太原城里的军民闻听诛杀内奸，义愤填膺，拍手称快。越来越多的军民涌向延夏门，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城墙！

宋人的箭网越来越密，城墙的缺口越来越宽。声嘶力竭的喊杀声铺天盖地，无数汉人乱箭穿身，无数宋人卷入洪流。

赵匡胤闭上了眼睛。朕妄自托大，在佛祖面前誓不杀一人，可河东城下的尸体堆积如山！朕失信于神明，恐不得长寿矣！

万岁！万岁！万岁！

突如其来的欢呼声，惊动了赵匡胤。

那震耳欲聋的声音来自城墙上的守军；舟楫里的宋军却像烂在地里的柿子，瘫卧小舸，心如死灰。

原来，就在汉人陷入绝望之际，城里忽然飘出一大团野草，不偏不倚，正挡在城墙的缺口处。那草团极大极厚，弓箭不透，机弩难穿，简直是一面天然的盾牌。北汉军民躲到草团后面，乘机疯狂抢修缺口。城上的弓箭手也士气大振，弯弓搭箭，掩护军民。

无为，无为，无能为矣！赵匡胤默默走下长堤，消失在军帐中。

不久，汉军的谍者诈称刘继元归顺，险些诈开寨门，攻入宋军营地。辽国五朝老臣、北院大王耶律屋质作为先锋，率军赶到太原城西，鸣鼓为信，点火为号；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的后继军队也疾驰而来。汉国军民，举城欢庆。

可是大宋营内，一派凄凄惨惨戚戚。随军参赞军事的魏仁浦半路染疾，被迫折返，病逝途中，享年59岁。东西班承旨都指挥使李怀义身负重伤，不省人事。而广大宋军将士更因常驻甘草地，暑潮侵袭，大多患上了腹泻。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然而，赵家天子还有最后一件秘密武器。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赵廷翰率领诸班卫士，跪在御帐营前，叩首请缨道："蕞尔小城，久未攻拔，全因将士不效死力！臣等请为先登，自往力攻，必取下太原城！"

赵匡胤走出御帐，但见眼前的猛士们瞋目裂眦，青筋暴起，有崩山之势，真乃我大宋的虎痴恶来！

鏖战，谁能熬到最后，谁就是最后的赢家。和小小的太原城熬，大宋熬得起！而这些勇士们，就是熬垮刘继元的王牌！

但是，赵匡胤却阻止了猛士们的请求："你们都是我亲自练出来的，无不是百里挑一，以一当百。我宁可不得太原，也不忍心让你们冒锋刃之险，蹈必死之地！"

对于大宋而言，还没到一决生死的地步。调动宋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赵匡胤觉得不值得。

刘继元已被折腾得元气大伤；辽人新主立威，对他的"保护费"也必然少收不了。纵使再给刘继元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年，以河东这个"贫困户"，根本恢复不了国力。

北汉虽是肘腋之患，但国本已残，再难攻入大宋腹地。辽人自从耶律德光客死中原后，似乎也无意南下，只想管好他的代理人。而且，耶律璟一死，辽国政局动荡，急需稳定环境。只要不去招惹辽人，他们在短时间内也无法对大宋构成威胁。

况且，这次出兵北汉，纯粹是因势利导。先南后北的战略并未动摇，南方尚有汉唐未平，现在把精锐拼光，大宋拿什么收复江岭之南？更何况，鏖战几个月，城里的汉军疲了，草地里的宋军更疲了。难道要让倦惫之师，去喂契丹的豺狼虎豹？即便能胜，也不过惨胜，面子好看而已。

对于务实的赵匡胤而言，这场战争已经毫无意义。但堂堂帝王御驾亲征，就这么灰头土脸地班师回朝，总得有个台阶下。

大臣们看出了皇帝的心思。太常博士李光赞上书，请求撤兵；宰相赵普也深以为然。还有个叫薛化光的人更为赵匡胤出策：将北汉太原城外的老百姓都迁徙回大宋。这样大宋有了新的人口，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北汉则人去楼空，从此无民无粮，无兵无饷。不出数年，北汉休矣！

面子保住了，北汉也被釜底抽薪了。赵匡胤当机立断，下命班师还朝。福大命大造化大的刘继元，终于保住了太原城，保住了大汉的国号，并且趁着宋军匆忙撤退，劫掠了一批辎重，勉强拯救了濒临崩溃的汉室经济。可是他心里明白，他终究保不住大汉的江

山。河东境内，满目疮痍；保卫大汉的军队，锐减至不到三万；大汉的立国之本——编户齐民，更是被大量迁徙入宋，仅余三万五千余户。举全国之力，以一户养一兵，自古未闻国家能久矣。

就在宋军撤退不久，刘继元派人排出城中积水。水落之后，早被泡酥的城墙大量坍塌。辽使韩知范尚未回国，看到化为废墟的太原城墙，侥幸地感慨道："宋人引水灌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是早就知道先用水来灌城，再将水排干的办法，太原城里肯定就没有活口了！"

太原的城墙倒下去了，开封的城墙依然屹立不倒。

三、大宋皇威浩荡

赵光义受阻宪台

赵匡胤不在开封的这段时间，有人在城里挖起了墙脚。这个人，就是堂堂的东京留守、开封府尹、兼中书令赵光义。

被挖的墙脚名叫刘温叟，现任御史中丞，执掌御史台。御史台俗称宪台，负责监察百官，肃正纲纪。台长为御史大夫，从唐朝开始很少除授，实际管理台务的是副长官御史中丞。这个官职虽然难比宰相、枢密使的尊贵，但却统领三院御史，纠察百官，小事则上奏弹劾，大事则在朝廷、皇帝面前辩论抗争。弹劾官员时，御史们甚至不用掌握充足的证据，只要听闻小道消息，就可上奏天子，请求立案调查，这叫"风闻言事"。御史台本身还有对疑难大案审讯和判决的权力。因此，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小看御史中丞。

拿不下三衙二府的赵光义，将目光转向了御史台。

刘温叟，字永龄，洛阳人，胥吏出身。宋朝建立以来，他独掌御史台近十年。这些年里，围绕着赵普与赵光义，朝中处处惊涛骇浪，唯独御史台风平浪静，清正肃风，丝毫不受派系争斗的影响。这和刘温叟的性格与修养有直接关系。刘温叟不仅超然于党争之外，而且为人刚直不阿，连皇帝的面子也敢驳。

一天晚上，他路过明德门西楼，马夫来报，圣上正与数名中黄门在楼上。

刘温叟闻言，略加思索，便让导从照常喝令行人，回避让路。

于是，在导从的喝令清道声中，刘温叟的队伍大摇大摆地从明德门前走过。见了皇帝，不但不来叩见，反而扬长而去。城楼上的赵匡胤看在眼里，倒也没说什么。可没想到，第二天刘温叟自己找上门来，请求召对。

刘温叟说："按照惯例，陛下若无赏赐，是不能随意登临明德门的。昨日陛下无故登楼，百官、将士、侍从乃至百姓，都以为您要有所恩宥赏给，无不企盼。臣之所以命导从喝道而过，就是为了告诉天下，不在规定的时间，陛下不会登楼。"最后，刘温叟还不忘说一句："非礼勿动，臣负责维护风纪法度之职，不敢不言。"

赵匡胤闻言，心生愧疚，下命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拨出三千贯钱，交给有关部门，算是对自己的惩罚。[1]

敢公然与皇帝叫板者，除了仗着与皇帝关系硬的赵相公，就属这位刘中丞了。但赵普对公事兢兢业业，对私事也一丝不苟；刘温叟则是一位纯臣，他像一棵参天古柏，遮蔽着大宋的江山。

---

[1] 综合《长编》《宋史·刘温叟传》《东都事略·刘温叟传》《国老谈苑》《邵氏闻见录》，其言略有不同。另外赵光义收买刘温叟事，史书未记是何时，今系于此。

所以，赵光义觉得，这些年赵普权势熏天，明目张胆地排除异己，藏污纳垢，必为高风亮节的刘温叟所不齿。只要自己保持清明干练的形象，就不怕刘温叟不会渐渐向自己靠拢。到那时，自己掌控了御史台的言官，可以随时发起弹劾，朝廷就不再是他赵普的朝廷了。

刘温叟素有廉名，本来就家无余资。按规定，御史台每个月还会发放一万钱的伙食补贴，钱不够时，就用追赃处罚的款项来填补。刘温叟厌恶这笔款项的来源，因此放弃了巨额补贴，这使得他府中更为困窘。

为了向刘温叟示好，赵光义曾特意派人送去五十万钱，没想到刘温叟毫不犹豫地全部收下。

赵光义高兴坏了！天下第一清官收了我的钱，看来在刘温叟眼里，我赵光义是个值得结交的人。

端午节，赵光义又派先前送钱的属吏去给刘温叟送角黍、纨扇。角黍，就是粽子；纨扇，就是用细绢制成的团扇。

这次，属吏耷拉着脸回来了。尽管刘温叟依然收下了赵光义的礼物，可属吏却发现，上次送去的五十万钱，还在西厢房里，不仅原封不动，而且贴着封条。

赵光义长叹一声。

中丞府内，刘温叟将角黍、纨扇恭恭敬敬地放入西厢房，放在那箱钱旁边。那些跟着他吃穷的亲信，看看赵京尹送来的礼品，再看看封存的铜钱，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没好气地说："赵京尹送您钱，就是觉得您日子过得太清苦了。您也真是的，这钱不花白不花，就应该拆了封条，让府里的人过两天好日子。"

刘温叟摇摇头说："赵京尹的兄长是天子，我是御史之长，拒绝他的好意，于礼不敬；可是收下钱，又如何激励百官清廉？"国法不能废，倡廉不能止，但赵光义也不能得罪。得罪赵光义，那就是得罪皇帝。

正说话间，开封府的那位属吏又回来了。这次他两手空空，不是来送礼，而是来把礼物和礼金收回去的。送出的礼还有收回去的道理？这也太不给我们中丞面子了！完了，这下得罪赵京尹了！中丞府的亲信们既生气又恐惧。

刘温叟却如释重负，任由吏人将礼物礼金拿走，他感谢赵大京尹的成全。

赵光义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与其让刘温叟为难，不如成人之美，这样至少还能让他心存好感。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儿清心寡欲，难怪能在御史中丞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小十年。御史台的大门，看来也敲不开了。

绕着被送回的钱箱子，赵光义忧心忡忡，这下可弄巧成拙了。刘温叟如果收了钱，自然会守口如瓶。现在，刘温叟拒收财物，而且是当今皇弟的财物，这样一段佳话，他不说，他府上的人也会说。二哥怕是瞒不过去，赵普更会借此大做文章。

赵光义无可奈何地捏着眉心。话语权，一定要抢在赵普之前，夺取话语权。

开宝二年（969）六月十八日，疲惫的赵匡胤率领着铩羽之师，回到东京城。

大宋出师半年，北汉虽未被攻灭，但已大渐弥留；宋军虽有大量损耗，可仍保存了实力，没有伤筋动骨。所以从战略角度来说，这次北伐，宋军仍是胜了。

然而赵匡胤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从一征淮南起，他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出兵荆湖起，即便遇到西蜀那种降而复叛的局面，他也能够从容应对。可是这次北伐，大宋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赵匡胤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七月十九日，赵匡胤大宴广政殿，赵光义自然奉命侍宴。皇帝的脸色很不好看，所以他说话格外小心。他甚至想把刘温叟的事情放一放，然而当看到赵普那张削峻的脸时，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

选择的余地。

于是，赵光义聊起了当朝名士，借这个由头，他称赞道："刘温叟真是个好官。"然后，便将刘温叟如何清贫、自己如何看不过去、如何送钱又如何被拒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当然，这一切都是以"自己看不过去刘温叟的清贫"为前提，并没有其他意思。最后，他还不忘说一句："我的钱他都不肯收，更何况是别人的呢。"

赵匡胤闻言，对刘温叟大为赞赏。

赵光义无暇再去思考刘温叟。此刻，他正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皇帝二哥的动静。

脸色毫无变化的赵匡胤心中冷笑：光义，你这点小聪明，难道朕还看不出来吗？我不在的这几个月里，你到底都在做些什么？我在含辛茹苦地砸北汉的城墙，你却煞费苦心地来挖我的墙脚？

自负善战而败北的赵匡胤，本已心情不悦，如今更是火上浇油。他不会对自己的弟弟怎么样，但是这股火不发出去，如何解得胸中闷气？

很好，你敢动朕的老头儿，朕也要动动你的老头儿！

两天后，赵光义的岳父、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徙镇凤翔。

符彦卿罢退洛阳

符彦卿徙镇的公开理由是，他镇守大名十余年，委政于牙校刘思遇，横征暴敛，军府久不治。开宝二年（969）八月二十四日，朝廷又正式任命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权知大名府，接管当地的一切行政事务。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赵光义探得的消息，与朝廷正式公布的完全不同。符彦卿徙镇

的真正原因是有人密告他谋反。而王祜此去大名的任务，就是搜集符彦卿犯上作乱的证据，然后将他彻底打倒。

善于指示别人告密的赵光义终于遭到了报应。至于告密者是不是赵普的属下，目前来看已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保住老岳父的命，王祜是他唯一的希望。

王祜确实接到密令。赵匡胤还告诉他，只要坐实符彦卿的罪名，就让他跟赵普担任同样的官职。一句话就可以做宰相，多么诱人！

但在王祜看来，这却是一块烫手的山芋。皇帝之命固然不能违背，但赵京尹也开罪不起，还有那位赵普，不知在此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大宋立国十年，凡是卷入这三个人是非的大臣，几乎都没好果子吃。当宰相？不被宰了就阿弥陀佛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王祜决定，在临走前，到开封府衙向赵光义请辞。符彦卿没有反心最好，要是谋反证据真的确凿，好歹也要让赵京尹知道，我王祜是奉旨查办，绝非故意刁难。

在王祜心中，赵光义是一棵不能撼动的大树。

而在赵光义心中，王祜是一根足以救命的稻草。

听闻王祜前来辞别，赵光义既激动又感动。他要向王祜问明白，二哥到底想怎样对待岳父；他更要向王祜交代，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岳父的性命。

赵光义屏退左右，正要开口。王祜见状，急忙深深一揖，扭头便走。因为一旦赵光义开了口，有些事情就再也说不清楚了。到那时，即便符彦卿是被冤枉的，自己如实禀报，可谁还会相信自己没有接受委托而为符彦卿洗白？

赵光义是聪明人，立刻会意。清者自清，赵光义希望王祜能够顶住压力，秉公办事。

赵匡胤却极希望王祜折腾出点动静，哪怕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亲征归来，赵匡胤变了。变得神经敏感，变得小肚鸡肠。他曾说，自己的心就像宫中的大道，少有邪曲，人皆能见。可如今的他，心却好似羊肠小道，崎岖颠簸，难见坦荡。稳坐皇位十年，权力已将他心中的那条宽敞大道，腐蚀得面目全非。

对于符彦卿，赵匡胤又是嫉妒，又是害怕。符彦卿能征善战，屡立战功，又能亲撰《人事军律》《五行阵》等兵书，是个出能统兵作战、入能著述兵法的全能武将。刚刚打了败仗的赵匡胤不仅自愧不如，而且对他产生了畏惧：有朝一日，一旦符彦卿作难，无论是作为光义的外援，还是自己另起炉灶，朕能胜得了他吗？

何况，符彦卿的势力一天不除，赵光义的野心一天不会收敛。与其兄弟二人最后兵戈相向，不如从一开始就将赵光义压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显然，北汉一役使赵匡胤发现，天下远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过去他可以信心满满地任由赵光义、符彦卿生长，如今却有了忌惮之心。

于是，赵匡胤选择了最不光彩的办法，来对付这位光彩夺目的宿将名臣。而王祜正是那个去掠夺光彩的人。

王祜是大名本地人，又曾知魏县，对大名府一带的情况比较熟识。而且，王祜名声好，能力强，如果让他来检举符彦卿，别人就算心里不服，嘴上也说不出什么。

赵匡胤很期待王祜的奏章，可是一个月过去了，大名府杳无音讯。倒是西京洛阳，符彦卿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嚷着要在洛阳养病。

符彦卿病了，得的是心病。他知道自己早晚要离开大名府，然而凤翔远在关陇，官家不顾自己72岁高龄，去受风餐露宿之苦，难道是想让自己在旅途颠簸中一命呜呼？

符彦卿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赵匡胤。作为郭荣与赵光

义的岳父，自己的身份异常敏感。可是他老了，老到不想再搅和朝廷的是非，只想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顺便给后代留一条活路。因此，当他乘坐肩舆路过洛阳时，就再也走不动了。西京洛阳，对于那些一意往上爬的人，如同政治上的冷宫；但对于想远离庙堂的前任高官，这里是真正的天堂。无论是横行霸道的柴守礼（周世宗生父）、王祚（王溥之父）、韩伦（韩令坤之父），还是醉心山水的窦贞固（后汉宰相），在洛阳，他们都找到了平安的归宿。

符彦卿不走了，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荒郊野外。他一口气请了一百天的病假。王祜的奏章也到了：符彦卿谋反，纯粹子虚乌有。赵匡胤仍不死心，质问王祜："你敢担保符彦卿没有反心？"正直的王祜斩钉截铁地回答："臣与符彦卿的家里都有百口人，臣愿以自己的百口之家，担保符彦卿的百口之家！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引以为戒！"

赵匡胤咬牙切齿，王祜则自动脱下官帽。没有完成任务的王祜改知襄州；没有谋反证据的符彦卿则捡回一条命，以"假满百日，受俸如故"的罪名，罢免节度使。从此以后，他遍游佛寺名园，不谈世务，不伐战功，优哉游哉。直到开宝八年（975）病逝，赵匡胤再也没找过符彦卿的麻烦。[1]

在赵光义眼里，符彦卿是一个信号，他的宠辱关系到自己的政治生命。

而在藩镇眼里，符彦卿则是另一个信号，他的荣辱关系到自己的节度生涯。

就在符彦卿倒台前后，西京留守向拱、灵武节度使冯继业、忠

[1] 据《长编》《宋史·王祜传》《东都事略·王祜传》（后两书皆把"王祜"作"王祐"），符彦卿徙镇是因为军府不治；但据《石林燕语》《邵氏闻见录》《能改斋漫录》，徙镇原因却是有人告发谋反，派王祜权知大名府也是为了揭露符彦卿的反证。

正军节度使王审琦等名将重镇相继徙节。

开宝二年（969）十月，赵匡胤又故技重施，再度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不过，这次跟他喝酒的不再是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而是一群桀骜不驯、资历比皇帝都老的节度使——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安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定国军节度使白重赞，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璋。

酒酣之际，赵匡胤很从容地对他们说：“卿等都是国家的宿旧，却常年镇守藩镇，劳苦疲惫，这可不符合朕礼遇贤臣的本意啊。”

王彦超眼看着符彦卿被强令去接自己的班，已经揣摩出皇帝的心意，便主动请辞道：“臣本来也没什么功劳，长期冒受荣宠，如今岁数大了，希望能够退休，回家去过田园生活，这是臣最大的愿望。”

然而，其他的节度使却不以为然，竞相炫耀自己的战功，以示自己根本没老。赵匡胤却冷冰冰地应道：“都是前朝旧事，有什么好提的！”

酒宴过后，包括王彦超在内，五位与会的节度使一日之内同时被罢，留在开封城里养老。

将节度使调离自己苦心经营的大本营，这在五代时期是极为敏感的大事。据说周世宗时，每调离一位节度使，往往如临大敌，甚至要先发兵做好应对叛乱的准备，然后才敢发布调令。

而如今，赵匡胤让符彦卿徙镇，符彦卿便不敢在大名府逗留；让王彦超等人回家养老，王彦超等人也只好认命。当藩镇的权力被大肆削弱后，昔日跋扈的节度使现在只能忍气吞声。

这次被罢免的郭从义，便是“忍气吞声”的代表。五年前，时任武宁军节度使的郭从义入朝。赵匡胤听说郭从义善于击马球，特意让他在殿廷中表演。郭从义以为得了表现机会，于是将自己的击球之术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想到，赵匡胤却不屑地说：“卿的击球技巧相当绝妙，不过这不是将相该做的事情。”

那次朝见后，郭从义徙镇河中府任护国军节度使。他累金巨万，仆童千人，厩马千余匹，富甲一方，却总是闷闷不乐。郭从义对幕僚说："从义是个龌龊的藩臣，失意到这步田地，肯定要为天下英雄耻笑了！"

开宝三年（970），随着北汉衰落，戍守河东重镇的昭义军遭到削弱，其支郡泽州直隶朝廷，李继勋接替符彦卿改驻天雄军。至此，赵匡胤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终于将大宋内部的统一事业——削藩基本完成。

于是，卧榻之侧的酣睡者们，再也难以安睡了。

刘后主俯首东京

赵匡胤将新一轮军事征伐的首要目标定为岭南的南汉。乾德二年（964）大宋收复郴州时，曾俘获南汉宦官十余人。其中有一人名叫余延业，长得十分矮小。赵匡胤见后，大概出于好奇，便问道："你在岭南是做什么官的？"

余延业扭着水蛇腰，翘着兰花指，嗲声嗲气道："做的是扈驾弓官。"

赵匡胤听了，差点失态大笑。扈驾弓官，就是保卫皇帝的弓箭手。就你这副德行，也能护得了皇帝？

于是，赵匡胤命人给余延业弓箭，让他练练。结果余延业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还是拉不开弓。赵匡胤这下实在忍不住了，哈哈大笑。

赵匡胤强憋住笑意，定了定神，继续问起南汉的国事来。余延业把南汉历代皇帝骄奢淫逸、残忍暴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这下赵匡胤笑不出来了，他瞠目结舌道："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然而，西蜀兵变和北汉时局拖住了赵匡胤，待到他腾出手脚

时，已经是开宝三年（970）了。这年九月，在唐国主李煜再度寄书劝降无效后，赵匡胤以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为副都部署，道州刺史王继勋为行营马军都监，兵伐南汉。宦官主政、丧失民心的刘铱根本无力抵抗。宋军势如破竹，于次年（971）二月平定岭南，得2府58州、206县2场1监，[1]以及170 263户民户，

此次征讨，宋军约束极严，未再发生灭蜀之惨剧。倒是汉主刘铱，闹剧频出。

开宝四年（971）正月，听闻潘美的大军节节胜利，刘铱开始为逃跑做准备。他调来十余艘大船，将金银珠宝和妃嫔媵嫱统统弄到船上，准备带着她们乘船逃跑。没想到，负责守着船队的宦官与千余名卫兵却私自开着船逃跑了。刘铱急得不知所措。

二月，宋军已经开到兴王府郊外，南汉再度大败。眼看南汉就要玩儿完了，掌握朝政的宦官龚澄枢等人却出了个馊主意："宋军进攻我们，不过是看中了国中的珍宝罢了。现在把它们都烧了，留下一座空城，宋军必不能久驻，届时自然就退兵了。"刘铱居然信以为真，一把火把宫殿府库烧了个精光。可是第二天，潘美的大军就兵临城下，逼得他不得不素服出降。

南汉亡国，刘铱入京后，赵匡胤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以这种屈辱来惩戒刘铱的暴虐。随后，刘铱被任命为右千牛卫大将军，获封恩赦侯。

或许是作恶太多，刘铱整日担心被赵匡胤斩首以谢天下。有一次赵匡胤与他单独相见。为了表达对降王的善意，赵匡胤赐了他一杯酒。以前经常用毒酒毒死大臣的刘铱，见了这架势，当场就吓哭了。他举杯抽泣道："臣承祖父的基业，抗拒朝廷，劳烦王师征

[1]《长编》所记其版籍所录州县数为60州214县，此处据当时实际情况对数据做修订，参见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

讨，罪孽深重，固然当死……陛下不杀臣，让臣见到了大宋的太平天下……臣想在开封当个普通老百姓足矣，求陛下放臣一条生路，臣不敢喝这杯酒啊……”说完号啕大哭。

看着刘钅张那没出息的劲儿，赵匡胤不禁笑道：“朕与你推心置腹，怎么会毒死你呢！”说完，命人拿过刘钅张的酒，一饮而尽。

刘钅张的闹剧一直闹到宋太宗时。当时，赵光义正要发兵北汉。在一次宴会上，刘钅张觍着脸说：“朝廷威名远播，四方僭号窃位者如今都在座。不久平定太原，刘继元又要俯首称臣。臣是第一个入朝的，希望能做降王之首。”赵光义听后大笑。

南汉灭亡，刘钅张服罪，可是赵匡胤在岭南的工作远没有结束。刘氏三代在岭南祸害了五十余年，恢复起来并非易事。

在平定南汉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废除苛政、缉捕盗贼、教化民风成为大宋在岭南的重要任务。尤以废除苛政最为艰巨，“媚川都”即为其一。

南汉时，刘钅张在海门镇招募了2000名能够采珍珠的士兵，号“媚川都”。这些人在采珠时，在脚腕拴好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则固定在岸上。然后，采珠人沉入大海深处去采珍珠，最深时可达五百尺。就是水性再好的人，在没有潜水设备的古代，这也无异于送死。大量采珠人因此而丧命。

可是老百姓的死活，刘钅张根本不在乎，他的宫殿全部用玳瑁、珍珠装饰，穷极侈靡。这些宫殿在南汉即将灭亡前被焚毁，留驻岭南的潘美特地在灰烬中寻得没有烧坏的玳瑁、珍珠献给赵匡胤。但潘美的用意并非讨好主上，而是要趁机进言采珠的危苦。赵匡胤见了潘美的奏章，马上降诏废除“媚川都”，禁止民众以采珠为业。

废止“媚川都”，只是大宋在岭南的德音之一。在残暴统治中挣扎了半个世纪的岭南民众，终于回到了文明的社会。

卢多逊重修图经

大宋，开封府，万岁殿。兵部郎中、直学士院卢多逊小心翼翼地随赵匡胤走进这座皇帝的寝宫。

卢多逊，字子元，怀州河内人，原河南府少尹卢亿之子，出身书香门第，入于贡院及第。这位考中进士的才子，从建隆三年（962）担任知制诰，隶属中书门下舍人院，负责起草外制诏书。大概由于诏书写得漂亮，他引起皇帝的关注，先后两次担任权知贡举，主持贡举考试，并于乾德六年（968）兼任史馆修撰、判馆事，负责史馆的管理与修史工作。

卢多逊是个有心人，掌管史馆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赵匡胤爱读史书，卢多逊就利用职务之便，要手下的小吏务必把赵匡胤每次所取的书目汇报给自己，然后他通宵达旦地把这些书卷读完。过几日，赵匡胤问起书中之事，卢多逊对答如流，这让号召百官读书的赵匡胤大为称赞。

自此，卢多逊飞黄腾达。开宝二年（969）赵匡胤亲征北汉，以卢多逊知太原行府事，后来又权知镇州。秘书下放地方，这是准备重用的信号。从北汉回朝后，卢多逊改属学士院，做了直学士院。

直学士院仍然是秘书，但秘书与秘书大不相同。当时皇帝的诏书分为两大类，称为“两制”。两制里，一类叫外制，内容只涉及一般官员的任免和普通政务的发布，由舍人院负责，起草诏书时由宰相传达主要精神；一类叫内制，内容涉及内政外交、高级官员任免等，由学士院执掌，草诏时由皇帝亲自召学士院人员入宫授命。卢多逊在河东、河北转了一圈，一跃成为真正的皇帝秘书。

南唐，江宁府，澄心堂。一位僧人正缓步而行，只见他披着大红绫罗织成的佛衣，绫罗间镶嵌着金丝线，真真一袭锦襕袈裟。

僧人来自淮北，自号小长老，听闻南唐国主李煜笃信佛教，于开宝初年特至金陵求缘。小长老佛法精深，每日入朝讲解六根、四谛之说，李煜大喜，称赞他是“一佛出世”。

不过，李煜对小长老的佛衣一直不大满意，责备他太过奢侈。小长老却说：“陛下不读《华严经》，怎能知道佛的富贵？”自此，小长老在李煜面前大谈崇佛敬佛之事，他要说服这位李国主，倾举国之力去做那“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梁武帝。

万岁殿。青灰色的幔帐，粗布做的帘子，与赵匡胤身上那已洗得毫无光泽的龙袍相得益彰。唯独能勉强入眼的，是龙床上那一条紫色绫罗的褥子，可是与那些富贵人家所用的面料相比，简直拿不出手。

这就是富有四海的皇帝？！卢多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赵匡胤指着这青帐紫褥，淡淡地说：“你在宫外，肯定以为朕过得很奢侈吧？就是用这青帐紫褥，朕都时常感到愧疚啊。”在赵匡胤的心里，最好宫中用度都像当年在夹马营一样，省下来的钱全存到封桩库里去。民不加赋，而欲使国用充足，他这个做皇帝的，舍不得无谓的开销。

赵匡胤不禁感慨，拿起了几案上的毛笔，舐毫吮墨。

澄心堂。这里位于皇家深苑，乃是李煜藏书、校书、读书之所。小长老一路走来，梅香萦绕。迈步堂门，迎面扑来的是红光金彩。原来宫中墙壁全部用镶嵌金线的红罗裹了起来，这种销金红罗被小长老用来做佛衣，尚且被视为奢侈，何况是用来做宫殿的“壁纸”。

销金红罗之上，还点缀着耀眼的宝莹，或白灼如雪，或剔透

如晶，那是为将销金红罗固定在宫墙上而使用的银制钉子和玳瑁宝石。红罗墙中，偶有小窗，砌以翠玉，缭以红纱，朦胧间的窗外梅艳，如团团雪绒，沾轻染薄。

繁华而不失雅趣，璀璨而不落庸俗，真乃一派人间圣境。境中的主人李煜，缓缓卷起帛绢，要把这锦绣天地化作一缕浓彩。

万岁殿的御案上，御用的笔墨纸砚品质俱佳，但亦无特别处。赵匡胤悬腕泼墨，豪情一挥，直抒胸中快意："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十二个大字醇厚凝重，如山如瀑，掷地有声，苍劲有力。

澄心堂的书几前，侍者刚刚将那细薄光润的澄心堂纸平整地铺开。纸旁摆放的是一方由朝廷砚务官采龙尾山之石监制而成的龙尾石砚。石砚长一尺，前面耸立着三十六座"石峰"，大小与手指无异；左右环如矮山，中凿一池为砚。那石砚润笔温莹，发墨如油，抚似肌雪，叩似金声。更兼砚中所研，乃是号称"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李廷圭墨。后世所谓"澄心堂纸、李廷圭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李煜的文房四宝清切雅致。

然而，与李煜手中之"笔"相比，这三大"天下之冠"未免雅而无灵。李煜所用并非毛笔，而是卷起的绢帛，世称"撮襟书"。但见他行笔颤掣，袖带当风，字字削瘦，如松如竹。李煜用这世间无觅处的"金错刀"笔法，写下"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的佳句，笔笔含情，字字留香。

赵匡胤所书之字，语出国子博士致仕王昭素。王昭素精通儒家九经，兼习道家老庄，德高望重，深为乡里所敬。只是他不求仕途，隐居在家，直到77岁，才被举荐给赵匡胤。追求文治的赵匡胤但觉与这位鹤发童颜的长者相见恨晚，向他求治世养身之术。治世，乃为大宋

江山社稷，乃为两千万宋民太平；[1]养身，则为修身养性，既可延年益寿，又可养个好脾气，以尽量少地做出错误决策。

于是，清雅的王昭素说出了这句清雅却又醇厚的名言："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赵匡胤大爱其言，常常书写这十二个大字。

李煜所书之字，却出自为爱妻小周后所作的《菩萨蛮》。小周后是大周后周娥皇的亲妹妹，史籍中未留其名。她才思敏捷，端庄秀丽，更胜乃姊。乾德二年（964），娥皇卧病，香消玉殒，年仅29岁。李煜肝肠寸断，悲伤欲绝。然而在此前不久，尚未及笄的小周氏早已被接入宫中，与李煜常相私会，李煜为她写下那首艳丽多情的《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开宝元年（968），李煜正式立小周氏为皇后，婚礼极尽奢华。金陵城中数万官民围观纳采，甚至有人爬到房顶观礼，因跌落而亡。

李煜又在宫里群花中，为小周后亲自设计了一方雅亭。檐栏之间，雕镂玉砌，又以红罗为幕，钉以玳瑁，遮绝流俗。亭中极小，仅能容下这对才子佳人，饮酒对诗，擦耳磨鬓。小周后的柔仪殿更是璀璨夺目，仅焚香的香炉就有数十种，皆为金玉所制。

对天下人的关怀，更坚定了赵匡胤缔造太平治世的雄心。在他

[1]《册府元龟校订本·邦计部·户籍》《旧五代史·食货志》载，后周显德五年，登记在户者2309812户（不包括淮南地区）。《长编》及李焘自注：建隆四年，宋平荆南得142 300户，平湖南得97388户；乾德三年，平蜀得534029户；开宝四年，平南汉得170263户。总计325万多户。若以每户6人计，当时宋朝编户人口近2000万。

手旁，一部百卷的《唐会要》和三十卷的《五代会要》已然翻旧。那是国初王溥监修国史时，组织编撰的两部记录典章制度的著作。赵匡胤从大唐之治与五代之乱中，找到了大宋的前途。

对小周后的宠爱，却掩盖不了李煜对南唐与自己前途的担忧。在他身旁，是他供若神明的《华严经》。面对李景留下的残破山河，李煜无从重整旗鼓，他只希望在佛陀的加持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赵匡胤翻阅着《五代会要》，当他翻看《州县分道改置》，读到那支离破碎、残破不全而又早已过时的各道、州、县的信息时，若有所思。他给卢多逊一个新任务：迅速组织人手，重修天下图经！

图经，是记录各地地理的方志。百年间，已无人能够为全天下修一部完整的图经。赵匡胤自知在统一前图经难成，但重修天下图经，无疑显示了大宋一统天下的雄心。

赵匡胤开始为天下一统做最后的准备。

李煜并不关心天下图经，此刻，他忧心方定，正沉醉于《华严经》的世界。就在小长老讲经的时候，他刚刚再次应允，要广舍梵台宝刹，广营佛塔佛像。

然而，李煜对礼佛的虔诚，对典雅生活的向往，却使得摇摇欲坠的南唐愈加贫瘠。

南唐没钱了！

李国主困顿金陵

李景的多次征伐，耗尽了徐温、李昇两代人的积蓄；割让江北，又痛失煮盐厚利；每年向中原王朝的纳贡，动辄数百万。南唐以一半的土地，承受此前数倍的财政负担，国库不堪重负。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巨额岁贡导致铜钱大量外流，南唐境内爆发空前严重的钱荒，商品经济迅速凋敝，令即将崩溃的财政雪上加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李煜大搞苛捐杂税，甚至连民间鹅生双子、柳条结絮都要纳税。

李煜不忍苛政，但更不愿放弃声色犬马。于是，他也学起了宗主赵匡胤，在国内搞起“李煜经济学”。

为李煜经济改革规划蓝图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潘佑，一个叫韩熙载。潘佑是赵普的老乡，幽州人，祖父潘贵是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帐下将领，后被刘守光所杀。其父潘处常避祸南奔，追随李昇。这身世与赵匡胤的祖辈有几分相似。

李景时，在中书舍人陈乔和户部侍郎韩熙载的推荐下，他正式出仕南唐。潘佑的文章独步江南，深得李煜喜爱。他因此成为李煜的东宫旧臣，在李煜即位后更是得到重用，以中书舍人之位负责起草重要诏书，给刘钅张的第二封劝降信便出自他手。李煜对潘佑敬重有加，尊称他为“潘卿”。

潘佑为李煜开出的药方，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强制进行“劫富济贫”的土地再分配，将富民兼并的土地归还给贫民。他甚至搬出《周礼》的井田制，恐怕下一个目标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化。这是通过直接掌握土地和人口，解决财政和民生问题的老办法。

显然，在土地问题上，书生潘佑虽有理想，却没赵匡胤看得透彻。李煜同意了潘佑的规划，但当户部侍郎李平实际推行改革时，却寸步难行。土地改革失败了。

名士韩熙载接过了改革大旗。韩熙载，字叔言，潍州北海人，唐庄宗时的进士，胸有谋略，志向高远，是王朴、赵普一样的人物，因父亲被唐明宗所杀而南下江南。他与李穀关系极好，临走时，他密告李穀说：“如果江南任我为相，我必能长驱北上以定中原！”李穀则笑对：“中原若用我为相，取江南如探囊取物耳！”

李穀后来做了大周宰相，在周世宗征淮南时相当于皇帝的军师，打得南唐一蹶不振；韩熙载却因宋齐丘等人的排挤而未得李昪、李景重用，远见卓识的建议一次次遭到否决，他眼睁睁地看着江南颓唐，郁郁寡欢。

韩熙载曾代表南唐出使后周，称赵匡胤“顾视非常，殆难测也”。及至大宋开国，许多人都佩服他的见识。李煜即位，韩熙载升任中书侍郎、百胜军节度使，终于得到重用。他认为整顿南唐财政，当务之急是解决钱荒问题，因为货币经济的衰退直接导致南唐经济萎靡不振。

韩熙载与潘佑一样，对于经济问题的症结能够一针见血，却没有办法治愈此症。韩熙载的蓝图是铸造铁钱，实行货币改革。因为铜钱大量外流，国内的铜又不够铸币之用。乾德二年（964），南唐开始铸铁钱，规定六铁钱等于四铜钱。然而，这项措施通过行政手段硬性规定钱价，脱离了铁和铜的价值。结果铁钱大幅贬值，十个铁钱才值一枚铜钱，导致物价飞涨，韩熙载痛悔不已。

两次经济改革均告破产，刚刚看到点曙光的李煜又重新坠入深渊。李煜这才发现，自己的父亲已经把南唐败得病入膏肓。而由于自己缺乏治国才能和驭臣之道，加之常年浸于风花雪月与暮鼓晨钟，朝政早已混乱不堪。潘佑为人清高，在朝中颇受孤立；重臣清晖殿学士张洎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老臣徐铉、徐锴兄弟倚老卖老；门下侍郎兼枢密使陈乔倒是个老实人，可是他过于老实，连手底下的人为非作歹都约束不了。

李煜决定起用韩熙载为相，重振朝纲，却发现韩熙载已经变了一番模样，生活放荡，酒色人间。宫廷画师顾闳中受到李煜委派潜入韩府，窥探韩熙载放浪的夜生活，凭着记忆绘成千古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但见那图中姬妾宾客欢声笑语，唯独韩熙载始终闷闷不乐。

韩熙载看破了李煜的无能为力，看破了南唐的积重难返。他不想做亡国宰相而贻笑千古，却也无法对壮志难酬释怀。他羡慕李

毅，因为有郭威和郭荣的赏识而终成大业；他更羡慕赵普，因为有赵匡胤的倚重而一展宏图，成为千古名相。他甚至有点后悔，后悔在建隆二年（961）出使大宋时，用一句“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1]拒绝了大宋的挽留，以报答李煜的知遇。

开宝三年（970）七月，在悲愤与绝望中，韩熙载离开了让他牵肠挂肚的江南，享年63岁。李煜哀叹：“吾终不得熙载为相也！”乃手书诏令，追赠韩熙载同平章事。

韩熙载放弃了江南，但并非所有人都放弃了李煜。就在韩熙载去世当年年末，赵匡胤发动攻灭南汉的战争。有识之士都明白，南汉很快就会亡国，而大宋也将完成对南唐的战略包围。到那时，南唐四面楚歌，再无翻盘的机会。

南都留守林仁肇坐不住了。他本是闽国旧将，后来归顺南唐。周世宗南征时，他曾在寿州数破周军。后来南唐溃败，他连躲张永德数箭，深得张永德钦佩。林仁肇给李煜上了密表，奏道：“宋军在淮南各州屯戍的兵力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掉蜀国，现在又发兵岭南，往返数千里，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愿陛下给臣数万人马，自寿春北渡，占据战略要地正阳。然后利用当地怀念我大唐的民众，就可一举收复江北旧境！宋人纵使派兵来援，臣拒守淮水与其对垒，那宋军必然难以进取。起兵那天，陛下就将臣举兵叛乱的消息告诉宋朝。大事若成，我大唐可以享其利；万一失败，请陛下族灭臣家，以向宋帝表明陛下绝无二心！”且不说林仁肇的战略是否可行，单就这奇兵突袭的智谋、以弱伐强的胆略、精忠报国的忠义和视死如归的气概，就足以令万岁殿里威加海内的赵匡胤双手发抖、五内俱焚。

可惜，第一个双手发抖、五内俱焚的是南唐国主李煜。

---

[1] 韩熙载全诗为：“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舟到江北来，举目无相识。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林仁肇的密奏尚压在一旁，枢密院承旨卢绛又来献计。原来，执掌中枢的枢密使陈乔早就看出卢绛是个人才，特地把他调入枢密院，又命他为沿江巡检，巩固江防。卢绛到任后招纳亡命，练习水战，屡次在海门击败吴越的军队，掠夺船舰数百。

眼看着宋朝留给南唐的时间不多了，卢绛建议李煜："吴越是我们的大仇，日后必作北朝的向导，与北军互为掎角，攻击我们。应该先把它灭掉！"

李煜还没有从林仁肇的密奏中缓过神来，又听得卢绛要动兵，大为惊恐，问道："吴越乃大朝的附庸，我们怎么敢加兵？"

卢绛回答："臣请诈言宣州、歙州叛乱，陛下就声称讨伐二州，同时向吴越求援。吴越的大军入境后，陛下即可发兵破之。而臣率大军紧随其后，一路追着溃败的吴越军，必可灭之！"

李煜惊慌失措地摇摇头，不再答话。

卢绛的方略虽然避开了宋朝的兵锋，但吴越既为大宋属国，攻打吴越就等于背叛大宋。南唐国力有限，如果真动兵，与其耗费精力灭吴越，不如从林仁肇之计，兵锋直指江北。

不过，林仁肇的计划并非无懈可击。当宋军平定蜀乱、北伐太原时，南唐搞偷袭，使得大宋四面受敌，或可有为。如今虽然宋军疲惫，毕竟强敌或束手就擒，或元气大伤，南唐恐怕孤掌难鸣。再说，林仁肇夺回江北的条件之一是利用"当地怀念我大唐的民众"，可生活在赵匡胤时代的江北臣民，凭什么去怀念李景时代的南唐？

当然，如果横竖都是死，那倒不如奋力一搏。然而李煜不相信自己会死，不相信南唐会亡。自从即位以来，他对赵匡胤卑躬屈膝，礼数周到，贡奉不断。在李煜眼里，自己是一个好臣子，好藩属，赵匡胤不会为难自己——即便想为难，也根本抓不到把柄。

李煜当然不会明白，赵匡胤怎么会把顺从作为阻碍统一的

理由。赵匡胤知道，南唐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煜又专心“事大”，从来不给自己惹麻烦，因此，他乐得给李煜卖个人情，让他开开心心享受几年“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然而，当华夏版图上的群雄越来越少时，李煜的好日子也就不长了。尤其是当辽国也被大宋打怕了时。

耶律贤铩羽定州

自从经略中原失败，耶律德光病逝在归国途中，辽朝便不得不放弃了征服中原的打算，转而以长期稳定地统治幽燕作为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辽朝积极扶持北汉小朝廷，以此作为自己与中原王朝的缓冲区，用以阻碍中原的统一，从而防止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来争夺幽燕。为此，辽朝在北汉境内与宋军大打出手，动辄发兵六万。

但是，在宋辽直接接壤的河北北部，辽朝反而不轻易派出如此规模的部队。辽朝需要维持与中原王朝的现状，避免因幽燕问题爆发激烈冲突，因此始终保持着克制。

无独有偶，继承了“先南后北”大战略的宋朝，也倾向于维持宋辽关系的现状。

乾德元年（963），侍卫司龙捷军军校王明进献了一张收复幽州的阵图。赵匡胤虽然大为喜悦，但却依旧不动声色。他在加强河北防线、反击辽军袭扰的同时，将防线切割成一个个小防区，避免与辽军在河北发生大规模战争。

乾德三年（965）十一月，辽军曾侵扰易州，掠夺当地居民。赵匡胤闻讯，决定以牙还牙，命监军李谦昇跨过国境，按照辽人所掠夺的人数，大掠当地民户。当时还健在的大辽皇帝耶律璟只好同意

归还宋民，这才将辽民要了回来。这一次“万不得已”的反击，严格控制用兵规模，防止冲突升级。

总体而言，除了辽军支援北汉，十年里，宋辽之间虽然摩擦不断，却从未直接爆发过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两国边境的人民互通有无，倒也相安无事。宋辽双方维持现状的共同需求，使得双方在处理边境冲突时都尽量保持着克制。

然而这种克制还是险些擦枪走火。

内忧外患中即位的辽景宗耶律贤，或许是为了试探宋辽关系，又或许是希望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来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于辽保宁二年、宋开宝三年（970）十一月，罕见地派出六万铁骑，乘寒风南征，进攻宋朝河北防线的重镇——定州。

河北与河东地区，共同构建起保卫中原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以幽州、云州为中枢，依托北部山脉及长城天险，是历代王朝防御塞北边患的根本。可惜自石敬瑭割地后已不复存在。

第三道防线，以天雄军会府大名府和昭义军会府潞州为重镇。然而这道防线险峻不足，如果前两道防线全面崩溃，这道防线也很难守住。

保证第三防线与京师万无一失的，正是第二道防线。其以瀛州、定州、太原府为核心，东凭河北“三关”（即益津关，周世宗设霸州；瓦桥关，周世宗设雄州；淤口关）及关北拒马河、滹沱河之羁绊，西倚河东雁门关之雄固。这道防线东部的瀛州和三关也曾因石敬瑭割地而失，好在周世宗及时收复，然而太原与雁门关却因北汉分裂而落入敌手。赵匡胤曾一再打北汉的主意，收复太原、续补第二防线也是原因之一。

在第二道防线中，镇州与定州，犹如一个棋眼，关系到整个河北的局势。镇、定二州北去三关，为边关之后方；东连瀛州，为边防之枢纽；西阻土门（即太行山井陉关），为御汉之雄镇。更重要的是，此乃辽军入援北汉的必经之路。

因此，耶律贤这一手，也堪称有胆有识。如果拿下定州，既可威胁到大宋防线的后方，又可打通北汉东部的援助通道，顺便也缓解了大宋对北汉的压力。其战略价值绝不亚于林仁肇的偷袭寿州之策。

然而，与林仁肇一样，耶律贤也冒着巨大危险。镇州和定州不仅互为掎角，周围还有群山起伏。加之此地深入宋境，胜负诚未可知。

耶律贤的手心里捏了把汗。

赵匡胤气定神闲。这辽人可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田钦祚，你带三千兵马去会会他们。

三千？！

对！就三千！现在调集大军根本来不及，在定州阻止辽人进犯，三千将士人援足矣！赵匡胤又吩咐田钦祚："记住，彼众我寡。你只背对城池列阵，以待辽军。他来了你便战，走了也莫追。"

判四方馆事、领贺州刺史田钦祚是近年来军界的新秀，何况去年还随何继筠在阳曲大破辽军，只要他不好大喜功去追击辽人，保定州万无一失。

没人能够确定赵匡胤何来的自信。

但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这天，所有人都已确定，赵匡胤的信心是有足够道理的。定州捷报传入大内，田钦祚以三千宋军痛击六万辽军，边关都在传言"三千打六万"！

"三千打六万"显然是虚报战功，但中原臣民都已亲眼看到，战无不胜的契丹铁骑一败再败，直到以传说中二十倍于宋的兵力败北。中原再不用对辽国战战兢兢，契丹不是不可战胜的罗刹，而只是普普通通的人。

这一次，连赵匡胤自己都无法抑制感情的波澜。他跃跃欲试地说："辽人屡次侵边，我以二十匹绢悬赏一个辽人的人头，其精兵

不过十万，我只需要费两百万匹绢，辽人就被杀干净了！”

在赵匡胤的计划里，收复幽燕有文统与武统两个战略。

所谓文统，就是向辽朝和平赎买幽燕的构想。乾德三年（965），赵匡胤攻灭后蜀之际，在讲武殿（后殿）后设立了封桩库。此库不隶属于三司，而直属皇帝。赵匡胤将消灭南方诸国后获得的财富，以及自己日常节约下来的钱财都存入其中。按照他的构想，当封桩库存满500万贯钱后，便用这些钱去向辽朝赎买幽燕，这是寻求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宋辽的核心问题。

当然，赵匡胤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如果辽朝拒绝接受文统，他就用这些钱财招募战士，通过战争来收复幽燕。这是武统战略。

两个战略可以概括为：外交手段优先，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

然而，定州之战，辽军首次在河北出动六万人规模的军队——哪怕这号称的六万不过是虚张声势，这隐约代表着宋辽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

看来，仅靠宋辽双方维持现状的默契，并不足以维持脆弱的和平。耶律贤既已铩羽定州，赵匡胤决定借势将他从战场拉到谈判桌上，宋辽之间的第一场谈判开始酝酿。

第七章

烛影斧声

一、中书外，权相落马

贩木案宰相受惊

开宝四年（971）三月，春夏之交的清晨尚称爽朗，骑马入朝的宰相却略显焦躁。

大宋王朝进入第十二个年头，寿命已经超过后晋、后汉、后周，政局比后梁、后唐更稳定。如今，禁军对皇帝俯首听命，藩镇也不再飞扬跋扈；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并入版图，南唐、吴越、泉漳也供奉日谨；仅剩的强敌，北汉残破，契丹铩羽。兵权释了，藩镇削了，天下也快要统一了，眼看就要太平了。大宋天子赵匡胤威震寰宇，如日中天。

可是，宋朝的权力越来越向朝廷集中，向皇帝集中，大宋天子对这权力也运用得越来越顺手，脾气也越来越大。开宝二年，符彦卿罢镇，这对于赵普来说本是一场巨大的胜利。然而，此时此刻，赵普竟然对符彦卿生出一丝同情。当皇帝手中的权力越发不容别人挑战时，自己是否会成为皇帝眼中最大的挑战？

正胡思乱想着，马突然停了，前方传来叫骂声。只见原左监门卫将军赵玭拦住导从，正在大骂赵普贪赃枉法。

怎么又是这个疯子……赵普不想节外生枝，示意导从绕行。但这时他才发现，四周早就围满了人。

事情闹大了，赵普又生出不好的预感。

说起来，这个“疯子”赵玭也颇有意思，他比赵普大1岁，脾气极其暴躁。赵玭曾以左监门卫大将军判三司，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知道了一件事：那时，秦、陇地区是著名的木材产地，朝廷将当地的木材贸易全面垄断，严禁私贩，以获取国家专营的利润。权相赵普既为韬晦计，又图荣华气派，命心腹亲吏前往当地，买了许多上等木料，结成巨大的木筏，从水路运回东京，给自己营建宅第用。本来，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就算偶尔有一两个人知道，慑于宰相的权力和皇帝对宰相的宠信，也不敢多嘴。然而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个贩木的亲吏私自扣留了部分木材，在开封城里偷偷贩卖，被暴脾气的赵玭逮个正着。

赵玭眼睛不揉沙子，心里憋不住事。自从探知赵普贩大木案，他整个人都不好了。举报，害怕权势熏天的赵普对自己报复；不举报，实在是吃不香睡不着。最后，赵玭于乾德五年（967）以脚上受伤行动不便为由，自请辞去判三司的差遣，守着左监门卫将军的阶官，躲清静去了。

但赵玭连闲官都当不痛快。罢三司后，他积极发挥余热，不断给朝廷写密信。没人知道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因为这些密信全部被留在禁中，赵匡胤既不交给大臣们商议，也不给赵玭做批复。

赵玭怀疑是赵普从中做了手脚。乾德六年（968）八月，他抱着一打朝廷曾颁发给自己的拜官诰命，怒气冲冲地跑到阁门，一股脑儿将这些任命状全部丢给阁门官。

赵匡胤当即下诏：勒令赵玭归第。赵玭被开除了。

从此，赵玭彻底沦为怨夫，每天咒骂不停。可是他不敢骂赵匡胤，只好骂赵普：要不是知道了你私贩木头的事，我至于被开除吗！终于，他忍不住了，他要把憋在心里四五年的话，公之于众。

赵玭是幸运的，如果他早两年跑出来骂街，依着赵普的脾气，他绝对讨不到好。好在，今天的赵普顾虑重重。果然，当听说赵普涉嫌违禁贸易后，赵匡胤急命使者把二人叫到朝堂对质。

核查案情，这不是很正常吗？但对于赵普，想想当年雷德骧的待遇，就知道眼前的一切是多么不同寻常。

赵匡胤当了十多年皇帝，每天都要面对别人的三跪九叩、唯唯、诺诺，偏偏这个赵普，总是跟他唱反调，把他搞得颜面无存。

如果说在创业初期，赵匡胤能保持恭谦的姿态和孜孜以求的心态，那么在大事初定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来摆摆皇帝的谱。赵匡胤对赵普的容忍，慢慢变成积怨。平时疏导不得，就总有爆发的一天。

于是，赵匡胤眼中的赵普，不再是以前的赵普。

便殿内，大宋高官云集。赵普跪在石板上，目光坚毅如常，只不过刻意避开了赵匡胤的眼睛。赵匡胤坐在御座上，气急败坏，见赵普这副模样，更加怒不可遏，下令将赵普逐出朝廷！

官员们都愣了。赵普虽然蛮横，不招人喜欢，但是对大宋有缔造之功，对朝廷事务废寝忘食、一丝不苟，这是有目共睹的。私贩秦陇大木，这事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就算要惩罚赵普，也用不着这般小题大做吧？

然而天子盛怒，谁敢在这时站出来说话？

太子太师王溥敢。自入宋以来，王溥明哲保身，一直把自己藏得很深。但事关赵普安危，王溥决定不藏了。他躬身奏道：“赵玭诬陷大臣。”

王溥出面，不仅给“挺普”的官员们壮了胆，更在赵匡胤心头重重敲了一下：老宰相都出来说话了，陛下，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您要三思啊！

赵匡胤再一次“猛醒”，他开始权衡利弊。他与赵普的交情，远非普通君臣关系。赵普的忠心，似乎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天下尚未一统，改革尚未完成，这个时候应该抛弃赵普吗？再者，光义最近又开始蠢蠢欲动，赵普一去，又有谁来制衡光义？

皇帝终于被自己拉回到赵普这一方，而孤身一人的赵玭就倒霉了。他被武士臭揍一顿，下御史台审讯，凶多吉少。

向来心胸狭隘、心狠手辣的赵普，这次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

而积极斡旋。毕竟，在这样的情形下，赵普不敢再造次。何况，赵玭并非赵光义党羽，看来纯属举报不法或发泄私愤，赵普犯不着为了这样一个人，再于赵匡胤面前巩固自己专权跋扈的形象。于是，在赵普的营救下，赵匡胤法外开恩，把赵玭贬黜汝州牙校了事。

赵普回到政事堂，闭上眼睛，仰靠在椅背上，久久喘不出一口长气，因为麻烦接踵而至。

这日，吴越国的使臣入京面圣，顺便给赵普带了十罐生猛海鲜。这些海物前脚运进宰相府，还没来得及启封，皇帝的车驾后脚就到了。

赵匡胤似乎是有备而来，进了院子，直奔那十个罐子走去，还特别好奇地问道："哟，这是什么啊？"

赵普一脸尴尬，回答说："这是吴越国送来的海鲜。"

赵匡胤说："打开瞧瞧吧。"一边说着，眼睛一边紧紧盯着赵普的脸。

皇帝既然开口，赵普哪敢违背，忙命家丁启封。一缕阳光扫过，十道金光夺罐而出，直把赵匡胤和赵普晃得睁不开眼。这哪里是什么海鲜，是整整十罐瓜子金！

赵普惊得目瞪口呆，一下跪伏在地，磕头谢罪："臣还没来得及查看，实在不知道这里面全是金子。要是早知如此，臣肯定会上奏陛下，推掉这十个罐子。"

听着赵普那略带颤抖的声音，赵匡胤只是笑了笑，很轻松地说："没事，这些金子你收下吧。吴越国的人大概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这些书生说了算吧！"言罢，拂袖而去。

赵普仍旧跪在原地，他感到自己的双腿瘫软无力，根本站不起来。隆冬时节，他却汗如雨下，冷风一吹，心里拔凉拔凉的。

多年前，李煜也曾送来五万两银子。当时自己上奏朝廷，赵匡胤也是让自己照单全收，但语气全然不同。那时的赵匡胤说："我堂堂大国，不可妄自菲薄，这些钱你收下吧，也好让李煜安心。"

那时的官家在跟自己唠家常，而今天的皇帝却话里带刺。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官家却不是那个官家了。坐在大内里的那个人，不再是赵二哥，而是大宋天子赵匡胤。

赵普两手撑地，总算勉强站起身来。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主上早不来晚不来，怎么瓜子金刚一入府，他紧跟着就到了？难道有人通风报信，我相府里有内奸？

曾在冯瓒身边安插眼线的赵普当然相信，只要别人想，一定也可以让奸细混入相府。敢在宰相身边安插眼线，不用想，赵普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

一道寒光划过，那个心狠手辣的赵普又回来了。

弃市案疑云密布

夜阑寒寂，冷月当空。京尹府内传来清幽的琴声。那是隋朝名将贺若弼所作十小调之一的《清夜吟》，为赵光义最喜。今夜，赵光义无眠，索性生起炭火，借着月光，抚奏古琴。闭目闻听，只觉明月当空。那孤寂的琴客，兀自四顾，却唯有夜雾朦胧，令人生寒。

十年了，二哥、赵书记，咱们斗了整整十年。这十年里，二哥你虽然给我开封府尹的地位，给我继承皇位的希望，却始终偏袒赵普，帮着他打压我。还好，你还知道我是你亲弟弟，关键时刻还知道护着我。

这些年里，无论有多少事情的源头指向我，不好意思，你们查不到我参与其中的证据。你们防着我，怕我，这都是你们逼的！

好在二哥你总算明白过来了。赵普跟咱们家关系再密切，也密切不过我这个亲弟弟。无论你是否要将皇位交给我，咱们才是亲兄弟。我的权力再大，也是大宋的权力，我只会维护大宋的江山。可

是他，赵普，一个外人，权力过大，掌权过久，就会侵蚀我赵家的天下！

想到这里，赵光义略有激动，手上的力道不免加重几分，那曲子已由幽静转向壮阔，仿佛黑夜将尽，东方既白。

如今禁军再无悍将，藩镇业已交兵，群雄芟夷指日可待，皇帝下一个要消灭的，就是大权独揽的赵普。赵光义心中一阵狂喜，突然“嘣”的一声，琴弦断了。

属吏来报：“姚恕死了……”

“什么？”赵光义猛然从榻上蹿了起来，古琴重重摔在了地上。

姚恕是开封府的判官，颇得赵光义重用。一日，他奉光义之命，拜谒宰相赵普。不巧，那天赵普正在宴请宾客。不知姚恕说了什么，惹得门子非常不快，死活不进府通报。姚恕在开封城里嚣张惯了，哪里吃得了闭门羹？他袖子一甩，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相府。

门子一看势头不对，这才匆忙向赵普通报此事。赵普命人急追姚恕，向他道歉。毕竟，身为宰相，赵普知道什么时候该小气，什么时候该大方。至少姚恕前来，说明开封府有公事要办。公开因私废公，这是授人以柄。

没想到姚恕很牛，仗着自己是开封府的红人，连宰相的面子都不给：什么道歉，一概不接受。

姚恕忘了，这位宰相虽然不是小人，但也不是君子。

开宝三年（970）春，镇宁军节度使张令铎去世，赵匡胤任命舅舅杜审肇出知澶州。杜审肇已经68岁了，而且上一年刚刚致仕，谁料突然被自己的天子外甥“返聘”。

澶州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澶州的安防直接关系到开封的安危。赵匡胤让杜审肇知澶州，就和当年让王继勋、杜审琼去统领禁军一样，都是用外戚来加强对关键环节的直接掌控。

然而，杜审肇虽然年近七十，却从来没做过地方官。因此，赵匡胤要为他选择一位经验丰富的通判，在赵普的推荐下，姚恕走马

上任。

姚恕升官了，而且辅佐外戚，看来是深受天子重用，赵普居然有这么好的心肠？

当然没有。姚恕现在正在为“升官”苦大仇深，他深知，澶州通判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澶州虽然重要，却是个多事之地，原因就在于黄河特别容易在这里决口，以至于从乾德五年（967）正月开始，澶州的长官例行兼任本州河堤使，成为澶州防范黄河水患的第一责任人。鉴于杜审肇什么都不懂，治河防洪的重任肯定由姚恕实际承担。

可问题就在于，杜审肇是皇帝的老舅舅。澶州治理得好，那是杜审肇的功劳；澶州万一出什么事，就都是姚恕的罪过了。本来通判与知州相互制约，但杜审肇身份特殊，姚恕显然又没法真的去监督杜审肇；反而是杜审肇如果胡来，姚恕根本管不了。这真是没地方说理去。

想想当年替王继勋背锅掉脑袋的那些雄武卒吧！

想到此，姚恕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为了保住心腹，赵光义亲自入宫，请求将姚恕留下。毕竟秦陇贩木案事发，赵普差一点被逐出朝廷。当年赵普炙手可热时，自己尚能留下石熙载；赵光义相信，这一次也一定能留下姚恕。

没想到，赵匡胤竟然一反常态，拒绝了他的求情。

赵大相公把开封府的判官夸上了天，赵大京尹却亲自出面来留人，其中的玄妙，赵匡胤自然心知肚明。但他显然不想因为秦陇贩木案，向赵光义传达赵普失势的信号。让姚恕通判澶州，成为赵匡胤维持赵普与赵光义之间那脆弱的权力制衡的筹码。

就这样，姚恕战战兢兢地上路了。他深刻体会到得罪赵普的后果，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开宝四年（971）十一月十八日，朝廷突然发布公告，知澶州、右骁卫上将军杜审肇罢官，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弃市！就在这个

月，黄河在澶州决口，洪水甚至泛滥至郓、濮二州。由于澶州没有及时上报灾情，导致大量民居、良田被洪水淹没。

在此之前，黄河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在澶州决口了。而且，十一月是冬季枯水期，并非洪水的高发季节。这不同寻常的黄河决口表明，澶州的治河防洪事务出现了严重疏漏。

一切就像姚恕预感的那样，毫无地方官经验的杜审肇一定会出岔子，自己一定会背黑锅。唯一在他预料之外的是，自己真的为此丢了性命。

弃市，就是在民众聚集的闹市实施死刑。太祖朝被判处弃市的地方官，不是贪赃枉法，就是制造冤假错案草菅人命。而姚恕被弃市的原因，却是没有及时上报灾情。依据《宋刑统》的法令，遇到天灾不及时上报，主管官员要处以“杖七十”的刑罚，也就是挨板子。加之事发突然，又或有回护杜审肇之嫌，对姚恕处以罢官乃至流放都足以严惩，何以要对他弃市呢？

还有更离谱的。

王子融在他的《百一编》中提到，姚恕弃市后尸体被投入黄河。姚恕的家人还不知道姚恕犯罪遭诛，只是偶然在黄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当时姚恕还穿着朝服。几天后，姚家人才知道了姚恕的死因。

王子融是真宗朝、仁宗朝宰执王曾的弟弟，他是青州益都人，姚恕是青州博兴人。因此，王子融的这条记录，既可能是王曾任职中书期间，从朝中宫中得知的秘闻，也可能来自乡里的道听途说。比如说姚恕死时还穿着朝服，这就不太可能，因为朝服只有参加大型典礼时才会穿，而十一月十八日之前的一段时间都不曾有这样隆重的典礼。因而，姚恕死时不太可能还穿着朝服，倒是有可能穿着平日办公时所穿的常服，也就是坐在衙门里时穿的那身官服。

奇怪的是，既然已经弃市，那就应该是当众处死，皇帝和朝廷怎么可能让姚恕穿着官服弃市呢？总不能像电视剧里一样动不动就

直接“推出午门斩首”吧？更奇怪的是，姚恕被投入黄河的尸体，怎么就那么巧，被他的家人发现了呢？而姚恕被弃市这么大的事，他的家人居然一无所知，即便考虑到古代信息传递的延迟，难道姚恕身边就没有一个人给他的家人通风报信？

如此多的疑点，说明姚恕弃市案绝非那么简单。

一种可能是，赵匡胤和朝廷出于某种原因，在决定将姚恕弃市后，马上派人将正在州衙里的姚恕抓获并诛杀，然后投尸黄河。如果是这样，那么姚恕身上一定藏着什么秘密，而官家急于封口，不给他任何辩白的机会。

另一种可能是，姚恕早在被判决前就已经被杀，投尸黄河。所以姚恕的家人发现他的尸体时，尚不知道他因何而死。几天后，赵匡胤和朝廷才宣布将姚恕弃市，因此看起来就成了姚家人后知后觉。如果是这样，那么赵匡胤和朝廷则是在尽力遮掩姚恕的真实死因。

姚恕弃市案涉及外戚杜审肇，姚恕本人又与赵普、赵光义关系复杂，在朝廷的刻意掩饰下，记录下来的案子竟然已经面目全非。但当时舆论一致将罪魁祸首指向赵普，认为是赵普在报仇。

还是那句话，大宋立国以来，凡是卷入赵匡胤、赵光义和赵普之间是非的大臣，几乎都没好果子吃。

而大权在握的赵匡胤，似乎也开始厌倦与另两个姓赵的无休止地争斗。

御史台的刘温叟驾鹤神游，学士院的窦仪、陶穀也先后撒手人寰，现在，连重新起用的翰林学士王著也去见了他的周世宗。举目之下，还有谁堪重用？

十二月十七日，兵部郎中、直学士院卢多逊，正式充任翰林学士。

救三司光义添翼

政事堂正厅，缕缕青烟正从一个硕大的瓦壶中冒起。瓦壶里，一本本来自各部门的文书，在熊熊烈火的吞噬下化作纸灰。宰相赵普还在查看各地各部上报中书门下的文书，有不合自己意见的就随手扔在瓦壶里烧掉，皇帝根本就没机会看到。他已经做了八年独相，隋唐以来，文臣之恩宠难出其右。他作为赵匡胤的第一智囊，为大宋再造中央出谋划策，深得皇帝倚重。然而，他的权力欲望也在不断扩张。他党同伐异，权势熏天，甚至把手伸到了万岁殿里。如今，中书门下的堂帖（以宰相名义签发的公文）与皇帝的敕令（以皇帝名义签发的公文）并驾齐驱，甚至比敕令更具效力。

相权盖过了皇权，不是最终取代皇权，就是被皇权削掉。

在皇帝打击赵普的事件里，赵普都是当事人，是直接被打击的对象；而在皇帝敲打赵光义的事件中，赵光义一如既往，躲在幕后。也许赵匡胤是无意为之，但是做者无意，观者有心。比如左骁卫大将军、权判三司楚昭辅。

开宝四年（971），霸府故吏楚昭辅接管三司，主持全国经济工作。可到了第二年（972）七月，他就遇到大麻烦。因为以当时每月的粮食消耗速度，到了明年二月，京城粮仓里的粮食就都吃完了。所以，三司恳请皇帝调用军队，征用民船，以协助江淮地区的漕运工作。

赵匡胤勃然大怒，急召楚昭辅入对，言辞切责道：“一国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就称不上富足。你平时不好好筹划，现在粮仓快见底了，才来请命让军队、民船协助漕运。朕问你，这是仓促之间能解决的事吗？朕要你这个官有什么用？你听着，如果明年二月无粮可吃，朕必拿你问罪，给天下一个交代！”

踉踉跄跄走出明德门的楚昭辅，茫然不知所措。调集军队、征用民船，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佳办法了。既然远水救不了近火，那就只能在京城里就近找水源。楚昭辅想到的第一个救星是赵普。毕竟，三司仍归中书门下管辖，两人又是霸府时代的老同僚，这个忙赵普一定会帮。

等等！赵普已经不是当年的赵普了，他有能力，有官职，但是在官家面前还有以前的地位吗？搞不好官家听说自己找他帮忙，还会引火烧身。官家对赵普的心态，在贩木案中再明确不过。这姚恕案虽然不明不白，但凭为官多年的直觉，楚昭辅明白，官家表面上对赵普的包庇，其实是海啸前那异乎寻常的平静。

不行不行，得换个救星……赵普不行，能够摆平这件事的，就只有赵光义。

楚昭辅与赵光义并无太多交情。大概关系最密切的一次，是陈桥兵变成功后，他去定力院通知赵光义等人兵变成功。所以，赵光义会不会相助，他心里实在拿不准。何况，楚昭辅为人正直，多年来一直游离于派系斗争之外。如果赵光义真的出手相救，恐怕自己今后都要成为京尹一派的人了——这人情还不起啊。

开封府衙内，61岁的楚昭辅拜在年近34岁的赵光义面前老泪横流：赵京尹，求求您了，您跟主上解释解释，我楚昭辅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把粮食的事解决了。

赵光义心中暗笑：您要是真舍得拼掉老命，还跑到我这儿来求个什么劲？平时不知道烧香，现在知道我赵光义是尊佛了？但他表面上却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赵光义连忙起身，关切地安慰着楚昭辅，并表示一定尽力帮他渡过难关。

赵光义的姿态，很让长他20多岁的楚昭辅受用，他甚至觉得，自己以前对这位皇亲不冷不热，真是惭愧。从这一刻起，楚昭辅的心，倒向了开封府。

楚昭辅走后，赵光义找来右知客押衙陈从信，让他拿出个办

法。开封府衙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陈从信想都没想，当即开出了治病良方。第二天，赵光义据此上报，赵匡胤非常满意。当年冬天，十万石粮食自江淮运抵京师，赵光义与楚昭辅皆大欢喜，唯余赵普一人，在政事堂里默不作声。

逐枢密赵普失势

与政事堂中的清冷幽寒不同，大内却是一片喜气洋洋。开宝五年（972）七月，皇三女永庆公主即将出嫁，驸马是魏仁浦的儿子魏咸信。尽管魏仁浦已仙逝多年，但对于他的后代，赵匡胤仍旧给予照顾，希望他们与朝廷同为一体，对大宋披肝沥胆。

这天，永庆公主随皇后宋氏入宫面圣。宋氏是赵匡胤的第三任妻子、节度使宋延渥的长女，乾德六年（968）被立为皇后，可惜至今未有子嗣，也便将赵匡胤之前的皇子皇女们，当作亲生的看待。

即将成为新娘子，永庆公主心花绽放，越发爱打扮起来。只见她的衣服上绣着花，缀着翠羽，煞是美艳动人。

可是赵匡胤看了却一脸不快，对公主说："这衣服就放在我这儿吧，以后不要再用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做服饰了。"

公主知道，老爹的节俭病又犯了。从小娇生惯养的她哪管这些，撒着娇说："爹爹，你看嘛，一件衣服而已，能用几枚翠羽？"

没想到赵匡胤却绷起脸来，极其严肃地说："话不能这样说。你穿成这样，那帮宫人外戚肯定争相效仿，京城里翠羽的价格就会随之飙升。老百姓一看有利可图，都跑去倒卖逐利，被杀的翠鸟也会越来越多。这些事全是你一个人引起的！你从小在富贵之家长大，应该珍惜这份福气，哪能开此恶端？"公主闻言，吐着舌头扮了个鬼脸，默默走开。

说话间，御辇已到殿外，赵匡胤准备出门办事。公主看了那

寒酸的御辇，禁不住又小声和宋皇后嘀咕："爹都做这么多年天子了，怎么还不用黄金来装饰自己的御辇？"

不料这话被赵匡胤听见了。赵匡胤回过头来，笑着说："你这孩子。你爹坐拥四海之富，就算是用金银珠宝来装饰整座宫殿，也不过举手之劳。但是，一想到要为天下守财，我就不敢乱用这些钱财。古人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如果皇帝只知道自己享乐，那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以后你可不能这样说了。"

以天下奉一人而失国，曾经的"好皇帝"孟昶就是这样由俭入奢而亡的，赵匡胤当然不想步他的后尘。

皇帝赵匡胤要为天下守财，宰相赵普其实也不为后人谋私利。当时，朝廷官员可让自己的亲属子侄荫补为官。开宝五年（972）四月，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枢密副使沈义伦各有一子，补为西头供奉官。然而，赵普却从未让朝廷为自己的儿子荫补为官。直到临死前，他出于对亡弟的友爱与怀念，才勉强为侄子求了一次恩泽。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赵普还有意抑制家族发展势力。他权倾朝野十余年，兄弟子侄却官微权轻，不值一提。但是，这年九月，赵普却做了一件与自己言行极不相符的事：让儿子赵承宗迎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

难道赵普打算发展家族势力了？并非如此。楚昭辅投奔赵光义，赵普深为警觉。三司已失，不能再让枢密院落入开封府之手。最近赵匡胤紧密的联姻活动，倒是为他提了醒，可以用政治婚姻，将枢密院与中书门下牢牢捆绑在一起。

只是，备受猜忌的赵普难以左右逢源。他防了赵光义，就防不了赵匡胤。一旦赵匡胤发难，赵光义又会紧随其后推波助澜。最后他被左右夹击，里外不是人。

赵普与李崇矩联姻，犯了赵匡胤的忌讳，或者说是所有皇帝的忌讳。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别掌管庶政和军政，本来就是帝王防范宰相权力过重的制衡措施。赵普独相近十年，恩宠有加，军事决策

权实际上在他手里，枢密使对他马首是瞻，倒也无妨。然而，当皇帝忌惮赵普的权力时，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就必须泾渭分明。一切试图二府合一的努力，都是对皇权的严重挑衅。

赵匡胤很快对两府的联姻做出反应：从今以后，宰相与枢密使在长春殿外等候答对时，不许在同一间屋子里休息。这是防止在答对前，赵普与李崇矩“串词”。

赵普与李崇矩既为儿女亲家，赵匡胤这种举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防止他们“串通一气”，还有待商榷。但无疑，这一举动传达了一种信息：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于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适时地蹦出来为皇帝“创造”了后果。李崇矩的门客郑伸击登闻鼓，告李崇矩收受贿赂，操纵贡举，还找了军器库使刘审琼做证人。

赵普马上找到对策，无论这个郑伸是否受人指使，必须要做刘审琼的工作，不能任由他诬告。

刘审琼是赵普的老相识了。早在后周时，刘审琼便是永兴军节度使刘词的亲兵，与赵普是同僚。刘词去世后，他们又都进入了赵匡胤的幕府。因此，经过赵普的一番威逼利诱，刘审琼当庭反水，一口咬定郑伸诬陷李崇矩。

但真相有什么用呢？赵匡胤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理由。诬告高官的郑伸被赐同进士出身，前往酸枣县担任主簿。而被人诬告的李崇矩却被罢为镇国军节度使，次年再被贬为左卫大将军。

赵普又输了，枢密院一失，他成了坐守政事堂的光杆宰相。而他要面对的，是空前强大的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的联盟。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赵光义病了，病得连人都认不清了。倘若赵光义就此病死，是不是一切都会出现转机？

但这只是赵普的侥幸梦呓。赵匡胤在听闻赵光义的病情后，连衣服都来不及换，穿着粗绸袍子和麻鞋，六神无主地奔向了开封府尹的后堂。病榻侧，赵匡胤紧紧握住赵光义的手，凝重地问道：还

有什么办法能治病?

有人建议：或许可以试试灼艾之法。灼艾之法，就是用点燃的艾绒直接放在相应的穴位进行灼烧。据说灼艾之法的治疗效果不错，但是治疗过程中，病人相当痛苦。光义不是习武之人，细皮嫩肉，哪受得了这种苦?

医官点燃艾绒，缓缓朝赵光义的手臂点去。赵匡胤目不转睛地盯住绒柱，那白烟仿佛一根钢锯，在他的心间来回拉扯着。

“啊！”赵光义吃不住剧痛，发出困兽般的嘶吼，身体剧烈地抖动，本能地躲避着艾绒，按都按不住。赵匡胤一手按着挣扎中的赵光义，一手也举起一根点燃的艾绒，急切地说：光义，光义，忍一忍！哥在你身边呢，别怕！

说着，他将艾绒朝自己手臂上狠狠戳去。

“嗯——”赵匡胤咬紧牙，憋着不让任何声音发出来。

虽然不能从肉体上分担弟弟的疼痛，但赵匡胤希望昏迷中的弟弟知道，他没有被抛弃，他的二哥还在身边，就像当年契丹人洗劫开封时一样，义无反顾地保护着他。

光义，你是我弟弟，我亲弟弟！

也许是兄弟间心有灵犀，也许是赵光义在昏睡中听到了赵匡胤的呼声。他渐渐不再挣扎，咬紧牙关，承受灼艾之痛。赵匡胤也始终伴着医官的节奏，每当艾绒灼在赵光义的皮肤上，他便随即灼在自己的皮肤上。

就这样，从辰时到酉时（约为今日早七点到晚七点），眼见得赵光义大汗淋漓，缓缓苏醒，赵匡胤才不舍地离去。此后数日，他每天都要亲自探望光义，直到光义康复为止。

他是我二哥，我亲二哥！赵光义的眼眶湿润了。如果一切能够回到从前，我跟在二哥身后，去城外的树林里打鸟，那该多好啊！

赵普默默叹着气。血浓于水，兄弟永远是兄弟。倘若病得不省人事的是自己，赵匡胤会不会顺势让自己致仕养老呢？金匮之盟，

那不过是人家兄弟的家事，不是我这个外人该操心的。

反贪案架空中书

开宝六年（973）三月一日，赵匡胤素服发哀，辍朝十日。去世的是一位重要人物——刚刚21岁的郑王郭宗训。

四年前，赵匡胤的老师辛文悦受命出知房州，负责监视日渐长大的周郑王。有人说，郭宗训在监视下，整日提心吊胆，郁郁寡欢，因此年纪轻轻就上了奈何桥；有人说，辛文悦收到皇帝密令，暗中加害了前朝逊帝；也有人说，辛文悦为了讨好天子学生，自作主张，将郭宗训杀害。

周世宗的三个儿子早夭；郭宗训、郭熙谨早逝无后；郭熙让、郭熙诲已经更名改姓。至此，世间再无郭荣的直系子孙。大周郭氏再无后裔矣！

而在岌岌可危的宰相赵普眼里，郭宗训的死，赵匡胤难脱干系。他只觉得皇帝对那些威胁，哪怕只是他想象出来的威胁，越来越难以容忍。

乌云压顶，看来要下雨。赵普回到政事堂，抬头愣住了。诶？我走错门了吗？怎么具体处理事务的十五名堂后官，除了四人外，其余十一人一个都不认识？

堂后官，全称制敕院五房堂后官，虽然名为“官”，实际属于“吏”。他们隶属中书门下，主要职责是起草文书，是宰相的秘书班子。

一名小吏来报：陛下有诏，说先前的十五位堂后官从来没更换过，特命吏部流内铨重新选任十五人到任，不再用吏人，改用士人。以后每隔三年，堂后官就要换一次人。可是流内铨也选不出这么多合适的人来，只好先派来十一位堂后官，另有四位旧吏暂时

留任。

赵普紧闭双目。终于，外围的党羽被剪除殆尽，就要对中书门下内部下手了。

“咔——”闪电将天空撕裂，惊雷从裂缝中滚落，震得中书门下的门窗柱瓦为之发抖。

好大的雷！

劈在赵普头顶的雷，名叫雷有邻。此刻，他把登闻鼓敲得洪如雷声，响彻京城。

雷有邻是雷德骧的儿子。当年，雷德骧因为举报赵普，被贬黜商州，做了小小的司户参军。但他毕竟曾为朝官，当地刺史对他还是颇为礼遇的。几年后，刺史调任，改由奚屿来知州。奚屿曾任大理正，知馆陶县，他连符彦卿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是雷德骧？而且，那时的赵普还权倾朝野，为了向宰相表忠心，奚屿决定，好好整一整这个没事乱说话的雷德骧。

傲慢的奚屿到达商州后，马上让雷德骧行参拜礼。一直从事监察和法律工作的雷德骧，本来就不把行政官员放在眼里，更何况这个奚屿，当年曾与自己共事大理寺，哪有给同事下跪的道理？

雷德骧不满，口出怨言。奚屿怒而不发，直到他发现雷德骧把对朝廷的不满都写了下来。一日，奚屿把雷德骧叫到州厅谈话，暗中却叫人到他家里搜查，结果诽谤朝廷的文章一搜一个准。奚屿当即把雷德骧绑了，上奏朝廷。大概赵匡胤也觉得当年理屈，这次对雷德骧倒相对宽容，只是将他削除官籍，发配到灵武去了。

奚屿没想到，他讨好赵普的举动，后来却促成了赵普的倒台。因为雷有邻认准，父亲的一贬再贬，完全是赵普授意为之。

雷有邻恨赵普，他要彻底毁掉赵普，为父亲报仇。

雷德骧有个同年考中进士的同窗，名叫王洞，时任秘书丞，雷有邻曾多次拜谒他。大概是同情雷德骧的遭遇，又见雷有邻如此乖巧，王洞渐渐对雷有邻信赖有加，把家中之事都托付给他打理。

一日，王洞委托雷有邻去买半铤白金，并告诉他："这些白金，准备送给胡将军。"胡将军，并不是哪位带兵打仗的将军，而是中书门下的堂后官，名叫胡赞。

事涉中书门下，雷有邻来了精神。胡赞乃是赵普亲信，与另一位堂后官李可度一起，仗着自己长年任职政事堂，多次对官员索取贿赂。当然，这些钱恐怕有不少得孝敬给他们的上司赵普。

为了拿到胡赞贪污索贿的证据，从而进一步扳倒赵普，雷有邻曾主动与胡赞打交道，并多次拜谒胡府。只是这位"胡将军"做事滴水不漏，根本查不出问题。

如今王洞托自己去贿赂他，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自己就是证据，还找什么证据？

但这恐怕还不足以让赵普倒霉。雷有邻又将目光转向人事问题，这在哪个朝代都是极敏感的问题。

这次提供帮助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名叫刘伟。

按照当时规定，担任摄官（临时代理的官职）满三任，同时解由（官吏调任时的证明文书）齐全者，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参加考试，通过后即可转正录用。

刘伟曾经担任摄上蔡主簿（上蔡县的代理主簿，负责县内官物出纳、注销簿书），虽然已满三任，却把其中一任的解由弄丢了。刘伟的哥哥刘侁中过进士，他给刘伟铸了一方伪印，并做了一份假解由。由此，刘伟得以顺利转正。

作为朋友，雷有邻很快就套出了刘伟造假的证据。人事考核任免的相关部门，本来就隶属中书门下，因而此事与赵普是有关系的。何况刘伟兄弟上下请托，中书门下更难逃其咎。

除此之外，雷有邻还探得一个消息。乾德年间，朝廷曾命宗正寺丞赵孚到西蜀地区任职。当时西蜀的治安乱得一塌糊涂，赵孚害怕有去无回，于是贿求宰相赵普，以生病为由，躲过了这次任命。

直到此时，雷有邻才觉得证据充分，他敲响登闻鼓，在赵匡胤

面前细数赵普罪状。比起郑申诬告李崇矩，雷有邻掌握的都是第一手证据，甚至有些事情就是他的亲身经历，言之凿凿，不容辩驳。比起赵玭和雷德骧所告发的经济问题，赵普在人事任免方面一手遮天，更令帝王忍无可忍。

其实赵普早就在赵匡胤心里挂了号，就算他清正廉洁，不党不群，赵匡胤也一样会以“沽名钓誉”的眼光来看他。何况赵普确实不干净，雷有邻又证据确凿，公然发难，就算赵匡胤有心再来一次姚恕葫芦案，也堵不住天下人的嘴了。

宰相弄权，威胁皇权；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赵匡胤保不住赵普，更不想保赵普。十年，整整十年，从最初的言听计从，到隐忍不发，再到忍无可忍，赵匡胤终于发怒了。

开宝六年（973）六月二十日，赵匡胤下诏，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到政事堂办公，与宰相同议政事。这是剥夺赵普独相权力的开始。

赵普异常冷静。雷有邻能量之大，出乎他的意料。不过，如果他是得到赵光义的支持，那这件事也就没什么好吃惊的了。赵普望天兴叹：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也无须怨天尤人。

封晋王相星陨落

赵普已经放弃挣扎，等待赵匡胤的审判。

可是赵匡胤却在煎熬中。事到如今，把赵普赶出朝廷，似乎已经没有回头路。但真让他做决定，却又下不去手。

自显德三年（956）滁州城风云际会，两人相交十七年。他们一同抵抗周世宗的疑心，开创大宋基业；一同讨乱平叛，稳住大宋江山；一同推动改革，成就大宋文治。如今，天下即将大定，君臣却要分道扬镳，必须如此吗？

未必。满朝文武，“倒普”的呼声此起彼伏，然而参知政事吕余庆不以为然，公然为赵普说话。

可吕余庆也无法左右朝局，最终左右赵匡胤想法的，是翰林学士卢多逊。

卢多逊最近很受宠。但翰林学士的位子满足不了他，他和陶穀一样，眼睛早就盯住了中书门下。不同的是，陶穀选择依附赵普，等待时机，结果等到他死，赵普也依旧独掌中书。卢多逊则选择推翻赵普，他明白，只有把赵普彻底赶下台，自己才有拜相的机遇。所以，每当赵匡胤问起赵普的事来，卢多逊都极尽诋毁之能事。

然而，卢多逊的父亲卢亿却日夜担忧，他曾对卢多逊说：“赵普是开国元勋！你今天诋毁他，早晚有遭报应的时候，到时候肯定会把我也牵连上！但愿我早点死，死在你身败名裂之前，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赵普有功劳，有威望，有朋友。你看看那些开国大将与他的关系，你看看王溥、吕余庆这些随龙人，为了保他不惜顶撞皇命。卢多逊，你有几个脑袋？

卢多逊却心中傲然：要为非常之人，必做非常之事！像您这样规规矩矩，难怪一辈子当不上宰相！怕什么，我身后有人！

没人知道从何时起，貌似“无党派”的卢多逊，身后屹立起堂皇的开封府。仗着“身后有人”，卢多逊的胆子更大了。到后来，即便赵匡胤不再刻意询问赵普的事，他也会在答对时顺便说两句赵普的坏话，甚至举报赵普曾用空地调换皇家的菜园，以便扩建自己的宅子。赵普还私开货栈、店铺，与民争利……

够了！赵匡胤只觉血气上涌，心中一阵恼怒。赵普啊，赵普！你太令朕失望了！赵匡胤气急败坏，找来另一位翰林学士李昉，要把卢多逊举报的这些罪名坐实。李昉，就是大宋开国时不肯朝见天子的那位。如今，他也变得圆滑了。赵普危在旦夕，既然吕余庆说话都不管用，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得罪卢多逊，甚至得罪赵光义？

然而，让李昉依附权势，他又实在办不到，只好模棱两可地回答："臣的职责是草拟诏书，至于赵普做过什么，臣不得而知。"

赵匡胤陷入了沉默。李昉的言外之意，他当然明白。王溥、吕余庆、李昉，这些文臣或进谏，或沉默，只为了一个目的：留下赵普！

然而赵普还能留吗？从古至今，除了亡国之君，哪个皇帝能够容忍宰相的权力有凌压皇权之势？没有！更何况，赵普，你干的坏事还少吗？你不要说这一切是自污韬晦之策！难道朕就真的是一个为了巩固权位，逼着宰相去藏污纳垢，不惜以吏治为代价、以百姓为代价、以天下为代价的昏君？岂有此理！

赵普坐在宰相的椅子上，度日如年。他有点舍不得政事堂的小屋。十年了，他在这里劈风斩浪，也在这里避风躲雨。他在这间小屋里的时间，甚至比待在自己家中的时间都长。只是天下没有无终的曲，曲终人散，那又何必空愁暮。

六月二十八日，皇城终于有了音讯。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与宰相赵普轮流知印，押班奏事。从这一天起，参知政事正式从宰相助理提升为副宰相。赵普一人执政的局面，彻底结束了。

又过了两个月，八月二十三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赵普，接到了被罢免的制书：特授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孟州诸军事、孟州刺史、充河阳三城节度、孟怀等州观察处置管内河堤等使，仍改赐推忠佐运同德翊戴功臣。

简单地说，赵普和当年那些禁军大将一样，挂着同平章事的虚衔，外放地方去做节度使了。

诏书写得很温婉，说赵普一直操劳国事，身心俱疲，朝廷不忍。所以，给宰相放个长假，到地方上去休息休息。

赵普苦笑，虽然诏书说得假大空，但皇帝还是给自己留了面子，至少没有在诏书里痛斥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而不往非礼也，赵

普也写了一封叩谢皇恩的信——就算是对你我君臣一场，有个交代吧。在这封信里，赵普特意写道：“外人都说臣对皇弟开封尹轻视非议，皇弟忠孝全德，哪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赵匡胤读信至此，心中五味杂陈。

赵普走了，他最后一次回望东京，是那样的不舍与不安。陛下，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我们都低估了光义，以后，你多加小心吧。

没有赵普，以赵光义的威望和身份，再没有不封王的理由。

九月十九日，赵光义加封晋王，位居宰相之上，成为大宋开国以来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亲王。晋王，这是当年周世宗身居潜邸时的王号。

亲王尹京，王号为晋，内涵所指，不言自明。

赵光义终于走出阴霾的开封府，在温暖的阳光下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看起来，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二哥的意志非常坚决：宁可罢掉赵普的相位，也要保住弟弟的皇储之位。从今以后，他赵光义都不用再躲在背后了。

只是，兴奋过度的赵光义没注意，赵匡胤一面在东京开封封他为王，一面却暗中抬高了西京洛阳的规格，诏命西京诸殿门列戟的仪制与东京相同。他更没注意，与自己同时进封的三弟赵光美，检校官的官阶竟然低于赵匡胤之子赵德昭。

二、卧榻侧，岂容他人

江南自毁长城

赵普走后，赵匡胤大赏群臣，重收被赵普夺走的人心。除了皇弟赵光义、赵光美与皇子赵德昭加官晋爵外，其他官员也跟着赵氏家族荣升了。

吏部侍郎、参知政事薛居正为门下侍郎，枢密副使、户部侍郎沈义伦为中书侍郎，两人并同平章事，担任宰相（时吕余庆已因病解职）。

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石守信加兼侍中，使相的官阶再升一级。

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忠武军节度使王审琦，并加同平章事，成为尊贵的使相。

翰林学士、兵部郎中卢多逊为中书舍人、参知政事，进位副相，距离他的宰相梦仅有一步之遥。

左骁卫大将军判三司楚昭辅为枢密副使，追随赵光义的他，终于转危为安。

静江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杨义为建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自韩重赟罢军职后，六年来，这是首次除授殿前都指挥使的职位。

这是大宋开国以来，对朝廷文武官员做出的最大一次集中性调整。

然而，离开开封的赵普是洒脱的，守在金陵的李煜是恐惧的。

这种恐惧自两年前起愈发不可收拾。

开宝五年（972）二月，江南入春已半。别致雅静的金陵宫城里，绿草繁盛，落梅如雪，水暖凝香，蜂蝶正忙。花香深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宫人们也在忙碌着。只见一双双纤纤细手扶花而起，正将各色的花枝，插遍金陵玉府。

在南唐的皇宫里，梁栋窗壁，柱拱阶砌，都有插花的隔筒。每年春季，李煜都会命宫人折下新艳的花枝，插满宫中的隔筒。远远望去，凌空绽香，万芳斗艳，仿若仙园，真不知是人在花中，还是花在人畔。这幅诗画，李煜名之曰“锦洞天”。

洞天深处，笙箫曲悦，木笛悠扬，一朵金黄色的莲花迎歌绽放。金莲高六尺，坠以璎珞，饰以琉璃，又有轻带当风，细绸萦绕，看那金莲好似浮于薄纱之上。在金莲的中心，品色瑞莲香蕊吐露，娇艳而出。一只纤细娇嫩的玉足，缠着薄如蝉翼的纱帛，一弓一挑，一颦一蹙，宛若朦胧月色下轻盈灵动的少女。

这少女名叫窅娘，是李煜最为宠爱的宫人之一。此刻，莲花上的她婀娜多姿，真真是“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仿佛仙霞初露云端，又似花容掩蔽明月。难怪南唐名臣唐镐有诗赞曰：“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

李煜看醉了。这座南唐国主的寝宫名叫武德殿，平定祸乱，乃曰“武德”，这曾是大唐皇帝李渊开国的年号。如今，“武德”的殿名与窅娘的舞姿是如此格格不入。

眼见大宋蒸蒸日上，江南国势日颓，李煜却整日躲在温柔乡里醉生梦死。他拒绝了林仁肇、卢绛的自强之策，坐观赵匡胤平灭岭南、屯重兵于汉阳。当时有商人来告，说宋军正在荆南营造数千艘战舰，并自告奋勇，密往荆南火烧战舰，以效国恩。可惜，李煜没有勇气，尤其是当他听说辽朝也连续为宋军所败时。李煜害怕任何招惹宋军南征的举动，他放弃了军事对抗，代之以派遣九弟吉王李从谦、七弟郑王（一作韩王）李从善朝贡大宋，珍宝器币比过去增

加了一倍。他还去掉了“唐”的国号，改称“江南”，并乞求大宋皇帝不要再称呼自己为国主，改为直呼自己的名字。

从“唐”到“江南”，李煜正式取消了名义上独立的国号。他相信，只要坚持侍奉大宋，看在自己勤劳恭谨的份上，大宋会给江南留条后路。

李煜在歌舞升平中，却等来一个坏消息：郑王被大宋扣留了！

李煜吓得瘫在了御座上。从善为什么被扣留？哪里惹大宋皇帝生气了吗？大宋会不会来灭江南？是了是了，既然去了国号，我怎么还留着大朝的制度？

当月，李煜下令，减损江南一切制度。他所下的诏令改称“教”。中书省、门下省改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为司会府，御史台改为司宪府，翰林院改为修文馆，枢密院改为光政院。又贬七弟郑王李从善为南楚国公，八弟邓王李从镒为江国公，九弟吉王李从谦为鄂国公。

还有皇帝御用的建筑装饰鸱吻，过去李煜总是偷偷使用。若有宋使到来，他就命人拆掉，等宋使走了，他再把鸱吻装上。这次，他彻底除去了鸱吻。

窅娘已经退下，莲花也已不在。金陵城，锦洞天，一下子昏暗起来。

赵匡胤正在盘算，何时对江南下手。

江南对于大宋的战略意义太大了。首先从安全上，日后能否从容对阵契丹和北汉，江南的地位举足轻重。倘若宋辽开战，李煜真的在大宋背后来一手偷袭寿州，宋军被逼得两线作战，北伐就可能功败垂成。

其次从经济上，江南虽然严重衰退，但尚未崩溃。自唐朝以来，江南地区就是一座大粮仓，且不要说供应北伐的粮饷，就是顺着运河运到开封的粮食，能解决多少人的吃饭问题！这样一片大好

疆土，留在治国无能的李煜手里，根本作践了天下粮仓的美名。何况为了削弱江南国力，大宋又不得不对其采取经济制裁。时间拖得越久，江南的经济衰退越严重。对于大宋而言，不如早早收回为妙。

再次从文化上，江南是文化圣地。李煜的朝廷里，从已经离世的冯延巳、韩熙载，到还活着的徐铉、徐锴、顾闳中，尤其是李煜本人，个个精通经史子集、琴棋书画。这样的人留在江南做官，不一定能把当地治好。但如果让他们做顾问，修史校书，可谓得其所用。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政治上。一个太平天下，怎能允许国土支离破碎，山河分崩离析？而且，两百年的战火纷飞，最遭殃的还是老百姓。百姓都渴求着全国统一，渴求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江南，注定没有存身的理由。

所以，收复江南不是问题，如何收复才是问题。冯延鲁的话，赵匡胤记忆犹新。与李煜动武，血染长江，江南焦土，这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江南的官民也是大宋子民。何况，他希望获得一个能够迅速恢复活力的“活江南”，一个能助大宋迅速崛起的“活江南”，而不是像周世宗那样，得到一片破坏殆尽的“死淮南”。

金陵东郊，开善道场的钟声沉闷深远。李煜与小周后一身袈裟僧帽，口诵佛经，跪拜叩首，直叩到脑门肿赘。

李煜终于收到李从善的来信，内容却让他大为惊骇：从善以大宋泰宁军节度使的身份，劝李煜入朝。

入朝……这是李煜最害怕的字眼。以堂堂国主之躯，入大朝之都，岂有放还之理？我江南的社稷岂不毁于一旦？我李煜的生命岂不就此终结？还有小周后，还有窅娘，还有那么多花容月貌、才华横溢的宫人，又有谁再对她们怜香惜玉？

李煜是纯粹的文人，文人有文人的懦弱，文人也有文人的倔强。李煜懦弱，他不敢与大宋为敌；李煜倔强，他坚决不肯将自己、将宫人、将江南的命运交给别人掌握。

李煜又深深磕了一个响头：愿佛祖明我李煜虔诚之心，救我江南于水火。

不远处，小长老望着李煜虔诚的身影，满脸肃穆。如今江南境内，到处是释寺佛院。仅金陵城里就有僧人数千，即便是近年饥荒不断，李煜对他们的粮米绢帛供应仍然不绝。江南的钱荒越发严重，而李煜不惜以宝贵的铜材铸造大量佛像。江南自李昇主政便崇佛，但李煜如此变本加厉，恐怕多是拜小长老所赐。

如今的小长老也是一派法师气象，在牛头山大起千余兰若，广聚门徒，其受李煜宠信，可见一斑。然而，谁也不知道，小长老还有另一个身份——大宋谍者。他是赵匡胤派来江南的卧底，也是从内部削弱瓦解江南的利器。

于佛而言，赵匡胤虽对佛教礼敬有佳，终不敌李煜的举国事佛。李煜确实虔诚，然佛有好生之德，若为天下苍生故，安能舍匡胤而救李煜哉？

小长老扬了扬眉，国势困窘，朝廷是时候来拯救江南百姓了。

赵匡胤收到消息，李煜不但拒不入朝，而且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内实缮甲募兵、阴为战守之计。看来和当年的冯延鲁一样，赵匡胤低估了文人的骨气。不动用一些非常手段，李煜不会拱手让国。

这个非常手段，就是要李煜自毁长城。江南第一大将，莫过于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若要李煜入朝，林仁肇一定会从中作梗；若要对李煜动武，林仁肇更是大麻烦。而且林仁肇出身行伍，虽为将帅，却仍然与士兵同甘共苦，真乃当世项燕也。

当年，江南的枢密使陈乔推荐林仁肇时曾说：“若让仁肇外将军士，让乔内掌机务，我国土虽然褊狭，别人想打我们的主意也没那么容易。”陈乔内掌机务，固不足虑；但林仁肇外将军士，赵匡胤就得深思了。

自从林仁肇谋袭寿州，赵匡胤日夜难安，对他越发忌惮。不

过，他打听到一个消息，江南的“军二代”皇甫继勋、朱令赟等人与林仁肇不和，时常跑到李煜面前说他坏话——林仁肇勾结大宋，要在江西自立为王。

这种小把戏，不禁让赵匡胤想起了当年张永德、李重进互相拆台，李景暗使离间计的事。不过，周世宗英明神武，现在的李煜却昏聩无能。李景的离间计能被周世宗看破，赵匡胤的离间计李煜就未必识得。

开宝五年（972）闰二月，赵匡胤突然带李从善来到一间屋子。只见屋子里悬挂着一幅人物画，画中人身材魁梧，气宇轩昂。骤然见之，李从善大为惊讶。

赵匡胤故意问道：“你看这画如何？”

李从善似乎答非所问：“这画……好像是臣国的林仁肇。”

赵匡胤笑了，李从善眼力不错，这图画的正是林仁肇。为得他一张肖像画，朕可没少花工夫。赵匡胤漫不经心地说：“仁肇就要归降大宋了，特以此画作为信物。”紧接着又指了指这间空荡荡的屋子，“朕准备将这间屋子赐给仁肇居住。”

李从善不知该回应什么，只好堆笑一番，掩盖心中的尴尬、恐惧与忧愁。现在看来，李从善也是个呆子。如此机密之事，赵匡胤为何毫不遮掩地对他说？

没过多久，赵匡胤就得到反馈。林仁肇被李煜毒死，李煜对他没有半点惋惜。

“形势紧迫如此，却杀忠臣！我要死无葬身之地了！”陈乔望江哀叹。

卢多逊的城府

开宝六年（973）四月，卢多逊即将北归的小船停靠在宣化口。

此行，他以翰林学士（其时赵普尚未倒台，卢多逊也尚未晋升参知政事）的身份，代表大宋天子出使江南，李煜对他极尽款待，盼望他能在赵匡胤面前代为美言。

然而，好揣度圣意的卢多逊却在打江南的主意。赵匡胤吞并江南的雄心已经昭然若揭，绝不想听什么有关江南的美言，他想听的定是平灭江南的策略。

卢多逊又猜对了。虽然翰林学士出使属国是朝廷惯例，但赵匡胤命卢多逊出使江南，确有特别考虑。江南向以文化繁荣著称，那些文学之士不免要刁难宋使，以争国格。所以，大宋一定要派出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者，不能丢了大宋颜面。

但这些还是面子工程。过去陶穀、窦仪都出使过江南，陶穀人品欠佳，被韩熙载抓住把柄玩弄于股掌，不值一提。窦仪却是堂堂学士，大朝风范。然而，即便是窦仪，他的使命也仅止于此。如今大宋吞灭江南在即，急需刺探江南虚实。卢多逊机敏聪慧，心有城府，又一心求上进，保不齐会有出其不意的惊喜。

赵匡胤选对了人，急于证明自己才干的卢多逊想到了“图经”。两年前皇帝让他组织人手编撰新图经，江南资料欠缺。没有“图经”，日后如何对江南用兵？当年张晖画了后蜀的形势图，我卢多逊要是搞到一份完整的江南形势图，天子定会对我刮目相看！

主意既定，卢多逊命人返回金陵告诉李煜：“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

李煜正愁没有表忠的渠道，听闻卢多逊有求，他竟然兴高采烈地派人去抄写全国十九州的资料，还令内史舍人徐锴等通宵校对，保证万无一失后，才将这抄写本恭恭敬敬地送给了卢多逊。

天底下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李煜更天真的人了！

卢多逊还朝，赵匡胤开怀大笑。卢多逊啊卢多逊，可真有你的！对江南用兵，朕最愁的就是没有图经，现在好了，江南十九州地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一夕之间

全部为我掌握。朕果然没用错人！

卢多逊见龙颜大悦，赶紧趁热打铁，进言江南倾颓，应发兵取之。赵匡胤点点头，吾不喜得江南图经，吾喜见多逊之识也！

五个月后，参知政事吕余庆因病请求解职，得到批准。卢多逊入职政事堂，正式成为大宋的副相。

就在赵匡胤重用机巧的卢多逊时，李煜却在金陵城里大开杀戒。被杀者，正是当年主持土地改革的内史舍人潘佑与户部侍郎李平。

当初李煜娶小周后，命徐铉与潘佑制定婚礼仪制。徐铉援引古制，提倡节俭；潘佑则主张铺张。两人相持不下，最后请出徐温之孙、元老徐游裁定。那时潘佑受宠，徐游以为铺张之意必出自李煜，于是力挺潘佑。最终，李煜的婚礼极尽奢华，徐铉与韩熙载作诗讥讽，徐铉从此与潘佑划清了界限。

徐铉不搭理潘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人过于自以为是。只要是他认为对的，那就一定是对的；万一“不对”了，那是因为别人错了。比如那根本推行不下去的土地改革，规划本身就有缺陷，李平在执行时又操之过急。结果，这个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改革，反而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李煜得知此事后急忙将土地改革叫停，可是潘佑却认为改革没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说他改革有问题的人。

土地改革失败后，潘佑没有反思，反而越发自命清高，说要想免于亡国，非令自己为宰相不可，还推荐了一批人给李煜，李煜未曾任用。这一下潘佑可恼了，上书请诛宰相汤悦等数十人。李煜亲自写信劝诫他，他竟然就此不再上朝，还说什么“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万助大朝收复河东，然后率领百官入朝，这也是保国之良策”，李煜震怒。

后来潘佑请求致仕，入山避难。李煜觉得他一定是疯了，也没有追究他。然而，开宝六年（973）十月，面对江南的摇摇欲坠，

面对李煜的昏招尽出，潘佑再度上书。这次言辞异常激烈，甚至说李煜比夏桀、商纣和吴国孙皓这些残暴的亡国之君还不如。李煜终于忍无可忍，先把潘佑的“同党”李平下狱。潘佑听说后，随即自杀；其家属被李煜流放；李平也被缢死狱中。

不作死就不会死。潘佑之死，有作死的成分，但他上书言事，罪不当死。特别是说李煜“既不能强，又不能弱”，可谓一语中的。李煜号称仁慈，自言思考了十多天也没下决心杀死潘佑，谁料那时潘佑已死。次年，他又赦免了潘佑的家属。然而，观潘佑家属流徙之刑，就算当时潘佑不自杀，也难逃厄运。

因为说话而随意杀人，甚至不说话也会被以所谓“腹诽”的罪名杀掉，这是帝制时代最野蛮的传统之一。仁慈如李煜，嗜佛如李煜，一旦掌握了生杀大权，也没能摆脱这传统的强大惯性。

江南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中，这为岌岌可危的国家更增添一份阴霾。李煜心神不宁，他开始无心享受那梦里贪欢的锦绣世界了。

为了保住江南，李煜再次遣使入朝。

一次是到大宋谢救济之恩。当年江南饥荒，赵匡胤听闻后立即下诏，让李煜借船到湖南去运粮食赈济灾民。为江南地区的老百姓赈灾，赵匡胤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其实是在效仿郭威，不过当时考虑到周唐对峙，郭威曾对赈灾大米的运输工具、运输数量做过限制，防止粮食落入南唐军队的手里。

赵匡胤却不同，他不但不对这些做限制，反而直接让李煜自己到大宋来运米。毕竟，如今的江南已不是当年的南唐，赵匡胤有足够的信心，不怕这些粮食喂了江南的兵。人命至重，这在赵匡胤心里是一道永远的道德底线。

至于另一次派使者入朝，则是李煜来要弟弟李从善的。李从善当年也不是省油的灯，李景病逝时，他跑到宰相徐游那里去要遗诏，颇有抢班夺权之意。幸好徐游有操守，正色相对，才没让李从

善得逞。李煜对于弟弟的所作所为一概不问，而且待他越来越好。这次李从善被扣在开封，李煜整日悲伤不已，生怕从善有个闪失。由于悲伤与思念，他甚至罢废了各种宴会，留下千古名作《却登高文》，更留下那首至今仍被传唱的《清平乐》。

>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护从善，犹如赵匡胤护光义。权力场里，没有明主昏君之别，秦二世杀过亲兄弟，唐太宗也照杀不误。难得皇家深院，还能留住那份宝贵的人伦之情。

李煜拒绝入朝

开宝七年（974年）七月六日，大宋东京开封府城东南，陈州门外西侧，赵匡胤坐镇讲武池，检阅水军。这支中原水军成军十七年，屡立奇功，让南方凭借水势的割据政权闻风丧胆，谁说北人不能水战？如今江南李煜，所恃者不过长江天堑。大宋有“水虎捷”在，所谓长江天堑，何足道哉！

但是，赵匡胤仍然不想放弃让李煜入朝，不想放弃和平收复江南的希望。检阅水军不久，他再度派出閤门使梁迥出使江南。

之前，李煜曾遣使表示，愿意接受大宋的册封。他没想到，自己这样卑躬屈膝，等到的却是梁迥的问话：“朝廷今年冬天要举行祭天大典，国主何不来助祭？”助祭？那不过是入朝的另一种说法。

李煜唯唯诺诺，他既不肯答应，又不敢撕破脸当面说自己不

去。但是梁迥已经知道了答案，没有多话，回朝去了。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赵匡胤拿起卢多逊带回的图经，沉默不语。

打破赵匡胤沉默的，是两个来自长江畔的南方人。

第一位南方人是江南国的樊若水，[1]曾参加贡举考试不中。在那个仕途才是正途的时代，如果翻看黄巢、洪秀全的早年履历，就知道对于一个王朝，这种考试不中的人有多可怕。更可怕的是，对于萎靡不振的江南，樊若水给金陵的朝廷上书针砭时弊，朝廷却对他不理不睬。在小长老的暗中操作下，满腹怨气的樊若水最终投靠了大宋。

听闻樊若水所献取江南之策，赵匡胤当即命学士院对樊若水进行考试，然后赐予进士及第，成全了他考中进士的夙愿；随后授以舒州团练推官；又命李煜将樊若水的母亲和亲属送至江北。李煜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不惹赵匡胤生气，还是恭恭敬敬地将叛臣亲属送过了长江。他哪里知道，这一送，送掉了李氏江山最后的气数。

第二位南方人是吴越国的孙承祐，他奉吴越国王钱俶之命前来入贡。当时，钱俶的世子钱惟濬身兼镇海军、镇东军节度使。名义上，孙承祐官至镇海、镇东两镇的行军司马，是幕府中的幕僚长；实际上，他却是钱俶宠妃的哥哥，在江浙把持国政，人称“孙总监”。钱俶派他入贡，看来也嗅到了长江的火药味儿。

最近两三年间，赵匡胤一直有南征的打算。他在频频召李煜入朝之际，也没有忘记钱俶。由于钱俶当时受大宋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故而赵匡胤敬称他为“元帅”。就在李从善被扣留开封

[1] 有关樊若水的名字，《宋史》本传等多数史籍作“若水”，《长编》《隆平集》《玉壶清话》则作“若冰”。据《玉壶清话》，他曾称自己的名字出自唐宰相倪若水，故今取“若水”。

那年，钱俶派元帅府判官黄夷简入贡。赵匡胤对黄夷简说："你回国后告诉元帅，要勤于练兵。江南李煜倔强不朝，我准备发兵讨伐他。元帅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千万不要听信他人说什么'皮之不存，毛将安傅'的话。"

吴越与江南一衣带水，虽因同据江东而为世仇，但相对于北方王朝而言，确实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赵匡胤估计，就算李煜不急着找钱俶尽释前嫌、同仇敌忾，吴越国也必有有识之士劝他联李抗赵，那样局势可就太不妙了。因此，赵匡胤早早就放出南征的风，尽快将钱俶绑上自己这条船。

后来，吴越进奉使钱文贽又来入贡，当他即将进入开封内城的南城门——薰风门时，看到新盖了许多大宅子，连亘数坊，栋宇宏丽。赵匡胤告诉钱文贽："朕在几年前，曾令翰林学士承旨陶穀草诏，挨着城南修建离宫。如今，朕赐其名礼贤宅，就等着江南的李煜和你家元帅入住了。谁先来入朝，礼贤宅就赐给谁。"

赵匡胤胸怀坦荡，钱俶也深知自己所处的局势，因而派孙承祐前来，实是表示吴越有归附之心。

趁着这次朝贡，赵匡胤秘密告诉了孙承祐发兵的日期。

吴越国据金陵东面，像一把插入江南后背的利刃，使其无法集中精力于长江北岸。但吴越战场只是第二战场，第一战场则在溯江而上的荆南。

荆南重地以江陵府为中心，东蔽夏口，西锁三峡，南通湘潭，北连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对于定都金陵的江南王朝而言，荆南雄踞上游，可顺水而下，迎风破浪，直捣江宁。正因如此，曹操、刘备、孙权为得此地大打出手；王敦、桓玄也唯有据此才敢拥兵造反；杨行密、徐温、李景更是觊觎荆楚，以争上游。可惜，李景连湖南都得而复失，就更不要提荆南了。江南无法取得上游，这也是李景、李煜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之一。

从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宋将曹翰、曹彬、潘美等人先后入

驻荆南，南征主力的将官任免与军队调动完毕，战争一触即发。

赵匡胤却喘了一口长气：事不过三，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也给朕一次机会！

不杀人的利剑

赵匡胤仍想让李煜入朝。

林仁肇蒙冤被杀，李煜无御敌之将；钱俶整顿兵马，江南有肘腋之患；水虎捷士气正盛，荆南军杀气腾腾；舒州、和州、滁州、扬州、潭州，大宋与江南的交界处，到处是正在集结的宋军。

李煜难道还不怕？赵匡胤不太相信，这个文弱书生仍会誓死不朝。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攻破李煜的心，也就攻破了整个江南。

当然，李煜对大宋臣礼周全，贡奉也丝毫不敢含糊。赵匡胤真要讨伐江南，也实在没有借口。没有借口没关系，那就生生造出一个来。赵匡胤三番五次召李煜入朝，李煜五次三番不肯。作为发兵的理由，没有什么比抗旨不遵更合适。

理由很合适，但谁去传旨呢？还是卢多逊？不行，以卢多逊现在的高位，已经不适合做前往江南的使臣了。

参知政事卢多逊推荐了自己的同窗，左拾遗、知制诰李穆。

李穆？不行不行，赵匡胤急忙摆手说："这个李穆，性格仁善，除了文采好，别的都不行。"

卢多逊道："李穆品行端正，遇到大事，宁死也不会失节，是一个大仁大勇之人。"

赵匡胤想了想，此去江南召李煜入朝，既要让李煜知道害怕，又不能失了大朝的风度。而且如果李煜不入朝，要以此作为出兵的借口，又不能显得我大宋强词夺理、构陷于人，以免有损大宋在江

南的形象，确实需要一个有勇略的儒者。想到这里，他说道：“李穆若诚如卿所言，我一定要试试他的本事。”

九月二十二日，就在潘美等人赶赴荆南时，李穆作为江南和平统一的唯一希望，踏上了南去的路。

李煜怕了，他见不得舞刀弄枪，他仍活在他那销金红罗的梦里，他不想就这样醒来。

固执的李煜终于服软，同意入朝。李穆欣喜，作为仁者，他与赵匡胤一样，都希望江南能够和平归宋。

可惜，李煜却做不了江南国的主，甚至做不了自己的主。替他做主的，是澄心堂的两位权臣——清辉殿学士、左内史舍人张洎，光政使、右内史侍郎陈乔。

张洎，字师黯，后改字皆仁，滁州全椒人。清辉殿学士、左内史舍人相当于宋朝的端明殿学士、中书舍人，但权势远在端明殿学士之上。

张洎是南唐进士，才华与机敏不下于卢多逊。与卢多逊在史书上下功夫以讨好赵匡胤一样，张洎也通过谈佛论道投李煜所好。所以，张洎成为李煜的第一宠臣。当时，张洎与徐温的孙子徐辽、徐游在澄心堂办公，执掌全国大政，而江南原有的中枢决策机构名存实亡。

张洎好投机，人品不怎么样。最初，他与潘佑交情颇深，形影不离。后来两人都升任中书舍人，却从此势不两立。潘佑看不起张洎的假“皆仁”，曾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没想到，张洎在背后捅了潘佑一刀，潘佑之死，张洎实是出了大力。这简直就是江南版的陶穀。

与张洎不同，陈乔颇为厚道。陈乔，字子乔，庐陵玉笥人。光政使、右内史侍郎相当于宋朝的枢密使、门下侍郎，是大权在握的职位。

陈乔也是个文采飞扬的笔杆子，还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早

在李昪时，陈乔就颇受重视。而李景更是曾对诸位皇子说：“这是个忠臣。以后国家有急难，你们母子可托付于陈乔，那么我死也无憾了。”

如今李景已死，陈乔这个忠臣依旧柄政，李景似乎可以无憾了。然而，眼下国家有急难，陈乔却开不出药方。他只能尽己所忠，要李氏的社稷延得一日是一日。

所以陈乔极力反对李煜入朝，他对李煜说：“臣与陛下皆受元宗（指李景）顾命，现在陛下入朝，肯定会被扣留，那江山社稷怎么办！臣就是死了，也无以见元宗于九泉啊！”陈乔说得痛心疾首，他对江南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张洎也随声附和，劝李煜不要入朝。至于他是忠于李煜，还是恐居陈乔之后，就不得而知了。

李煜改了主意，就像当年江对面的李重进一样，被劝止入朝。他自称生病不能北行，还异常坚决地说：“我恭敬地侍奉大国，只是为了感谢大国保全我江南社稷的恩德。如果非要让我入朝，唯死而已！”

摊牌的时刻要到了。李穆自知没有必要再搞外交辞令，坦然对李煜道：“是否入朝，国主自己做决定。然而朝廷的军队精锐，财力雄厚，江南恐怕不是对手。还是早点做打算吧，千万不要日后后悔。”

大宋的军队要打来了，国主您还是赶紧想想怎么防御吧，要不就来不及了。李穆说了大实话，李煜知道他没有骗自己，赵匡胤也觉得他说到了点子上。

子曰：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李穆做到了不忧不惧，赵匡胤做到了不忧不惧。李煜，能做到吗？

李煜做不到，他打肿脸充胖子，说了几句豪言壮语，但内心的恐惧与日俱增。他又派了八弟江国公李从镒等人带着重礼入贡，结果又一个弟弟被扣在了开封。

有这个钱，干吗不打造一支雄师一决雌雄呢？

开封城东水门的汴河之北，赵匡胤正意气风发地站在迎春苑的汴堤上，在大战开始前最后一次检阅水军。只见旌旗蔽空，气吞万里如虎。赵匡胤拔出宝剑，朝着东南水天相接的地方猛然挥去，数不清的巨舰扬起红旗，踏破河浪，朝着万里长江奋然开进！

赵匡胤的宝剑并没有收回剑鞘，他在等一个人，他要将宝剑亲自赐予那个人。

和平“谈判”破裂了，赵匡胤迫不得已选择了下下策，用武江南。但是他的初衷没有变，他要将对江南土地的破坏、对江南百姓的袭扰降到最低。不能再让王全斌、王仁赡的悲剧重新上演。

曹彬、潘美、曹翰、李汉琼、刘遇、田钦祚、梁迥……赵匡胤的目光从诸位南征大将面前扫过，心中想着大事。军纪能否严明，能否尽量让无辜之人免于杀戮，大宋能否在江南获得民心，关键是全军统帅和监军。

曹彬，为人宽厚，当年西蜀那么混乱，他仍然能够约束将士；潘美，救过周世宗的儿子，有仁爱之心，征南汉时的军民关系也搞得不错。我大宋能否打一场破坏较小的战争，希望就全在二人身上了。

想到此，赵匡胤仔细打量起曹彬与潘美。论独立统军的作战经验，潘美显然更胜一筹；但在纪律约束方面，曹彬更让人放心。这次就让他去吧。

做出决定后的赵匡胤，心情异常轻松。不过这次随军出征的都是悍将，潘美独当一面自不必说，杀人不眨眼的曹翰也不是省油的灯。要让曹彬拥有绝对的权威，朕得助他一臂之力。

想到此，赵匡胤来到曹彬面前，以坚定的口吻道：“南方之事，一以委卿！”

听闻此言，连曹彬自己都感到惊叹：这可能是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战，何以让我这个没有统领过全军的人来带兵？

赵匡胤知道大家都很意外，于是语重心长地接着说："切勿巧取豪夺，你一定要广泛树立朝廷的威信，让江南自己来归顺。不用急着进攻。"说罢，解下腰间佩剑，郑重其事地交给曹彬，又扫视了诸将，一个字一个字，铿锵有力地说道，"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潘美等闻言，大惊失色，纷纷低下头，再也不敢仰视。

曹彬下拜，双手过顶，虔诚地接过宝剑。这柄剑太重了，他的剑锋系了江南无数军民的性命。

安民重于攻城。在赐剑的一刹那，五代时期的作战规则逆转了。

第一座长江大桥

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如今大宋有备而去，江南却是坐以待毙。

开宝七年（974）十月十八日，曹彬率领南征主力正式从荆南出发，一路沿江北顺水急行，至蕲阳渡到长江南岸，在峡口寨大败江南兵，杀守卒800人，生擒270人。曹彬被正式任命为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

吴越国王钱俶也应约举兵。赵匡胤命他为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赐战马200匹，又以客省使丁德裕为监军，率禁军步骑千人作为东路军的前锋。

昇州，就是金陵，就是江宁府。大宋以旧称称呼，其实已经取消了江南存在的合法性。东西两大战场同时开仗，江南又走上当年被四面合围的老路。

曹彬数舰并行，好似铁锁横江。旌旗有如夜幕，高大的船楼遮住云层后的阳光，长江南岸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江南的士兵见宋船游弋，纷纷躲进水寨。十多年了，北方大朝的水军天天都在长

江上巡逻，他们早就习以为常，还以为又是日常巡视的大宋水师，甚至还有军队遣使带了酒肉去犒师。数百里间，大宋舰队如入无人之境。

然而，当江南人看到曹彬身后那数不清的黄黑大龙船时，心里打鼓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船，而且放眼望去，根本看不到舰队的尾巴，整条长江似乎都淹没在舰队之中。

不好！这是宋军攻进来了！池州守将戈彦遂终于反应过来，他应对这支巨大舰队的方法是逃跑。不费吹灰之力，闰十月五日，距离出征才半个多月，曹彬已经占领池州，随即在池州东北部的铜陵轻松击破江南军，俘获战舰200余艘，生擒800余人。浩瀚的船队卷着滚滚江浪，直逼金陵的战略重地——采石矶。

采石矶是金陵附近最重要的渡口。采石矶附近，江面较窄，南岸凸向江心，最易渡江。因此，无论是和平年代秦始皇巡视东南，还是战乱时期的孙策取江东、西晋灭东吴、隋朝灭南陈，莫不是自此渡江。曹彬若在此站住脚跟，北方的宋军将源源不断地进入江南，围攻金陵。

李煜虽然不懂军事，但也知采石矶重要。趁着曹彬东下的功夫，他已在此布置了2万余守军，尤其是将江南最为精锐的骑兵派来做前锋。然而，当曹彬登陆采石时，2万江南兵瞬间被击溃，1000余人做了宋军的俘虏，300余匹战马全部被俘获。

开封城里的赵匡胤已经收到战报，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这300多匹战马，说起来也算物归原主。江南不产战马，宋廷每年会赐予100匹。曹彬这次俘获的战马，匹匹烙有朝廷当年所作印记，显然全部是大宋所赐。

用大宋赐马来镇守采石重镇，看来李煜这些年确实很本分，没有从别的渠道购入马匹。要知道，当初李景志在四方时，就曾设法从契丹购入战马。

只是李煜这样卑躬屈膝，换来的却是大宋的金戈铁马。江南之

不堪一击，赵匡胤心里更有数了。

李煜却始终对他的敌人心中没数。

澄心堂里，他与张洎犹自谈笑风生。起因是有人传闻，说宋军正在采石矶搭建浮桥。这真是前所未闻！以长江水面之宽，水流之急，乘船渡江尚且危险，现在居然还想搭建浮桥？曹彬一定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清辉殿学士张洎不屑地说："有史以来，从来没人这么干过。搭建浮桥，必不能成！"李煜也轻蔑地说："我也觉得，这简直如同儿戏。"

但事实证明，真正儿戏的是李煜。采石矶外，成百上千的黄色、黑色巨舰横亘长江，仅仅用了三天，就被绳缆捆绑结实，而且浮桥与长江两岸的契合分毫不差，士兵走在上面，如履平地。大宋真的在长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这是开天辟地头一次！

这就是樊若水献给赵匡胤的见面礼，这就是樊若水的平灭江南之策。自从樊若水有了投宋之心，就每天假装到采石矶外的江面上钓鱼，暗中划着小船，牵引丝线，穿梭于长江南北两岸之间，测量江面的宽度。就这样来来去去几十次，终于测量到精确的数据。

樊若水以数据为基础，建议赵匡胤在采石矶搭建浮桥。对于这个闻所未闻的大胆提议，赵匡胤并没有做出李煜那种"如同儿戏"的判断，而是以樊若水为太子右赞善大夫，赐更其名为"知古"，并遣使赴荆南、湖南，命人按照樊若水的要求，建造黄黑色的龙船巨舰数千艘。随后，这些巨舰载着巨大的竹索，随曹彬一路东下。

按照计划，本来巨舰要到达采石矶后再搭建浮桥。但和李煜一样，大宋的文武官员们也对这项空前的计划充满狐疑。有人甚至提出，江阔水深，波涛汹涌，自古就没有浮梁渡江的先例。面对质疑，最高决策者赵匡胤并没有保守，他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樊若水的计划。不过考虑到风险性，在曹彬占领池州后，改在石牌口试架浮梁，并派兵把守。待到曹彬入驻采石矶，才将浮桥迁移过来。

采石附近，居然早就为捆绑浮桥而准备好了石塔。原来，除小长老外，还有一位由北方入江南的僧人。与小长老不同，这位北方僧人操守很好，对李煜的斋供一概不受。他只是建议李煜在江边建座石塔，李煜就照办了。不承想，这又是一位大宋派来的间谍。

就这样，在赵匡胤的支持下，江南的落第文人樊若水与大宋的间谍里应外合，一举建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长江大桥。

不可思议！李煜有点慌神，这意味着金陵之外的长江天堑如今成为万里平原，任由大宋步骑自由来去。关键时刻，李煜终于拿出点气魄，钦点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率领水军万人，天德都虞候杜真率领步军万人，一同袭击采石矶的大宋水陆军。如果能够摧毁浮桥，那么曹彬就是空悬江南的孤军，宋人便无胜算。

郑彦华与杜真临行前，李煜特别嘱咐："两军水陆相济，无不捷矣。"然而杜真率军先战，似有争功之嫌；郑彦华拥兵不救，坐观成败。结果李煜亲自指挥的战斗以大败告终，金陵危矣。

李煜不仅在军事上寻求战机，还在外交上寻找突破口。金陵戒严前，他曾给钱俶写了封亲笔信，大致是说："别打了。今日没有我，明天哪有您？他日英明的天子一旦以酬劳您功勋的名义来迁徙您的封地，大王您也不过是开封城里的一介布衣罢了。"

国家倾覆之际，李煜竭力对钱俶晓以利害，以分化瓦解大宋与吴越的联盟，也算得上尽心尽力。然而，他的动作太晚了，钱俶早被赵匡胤打了预防针，也早就明晰了天下大势。他不但没有听信劝言，反而把李煜的书信递交给大宋朝廷。

这年十二月，金陵正式戒严。李煜下令，不再使用开宝年号，而称"甲戌岁"；同时招募民众当兵，有为朝廷捐献财物和粮草的，授以官爵。

李煜终于下定决心，与赵匡胤撕破了脸。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报！宋军破我水军3000余人于鄂州！

报！吴越军破我3000余人于常州利城寨！

报！曹彬等破我军于新林港口，我军战死2000余人，600余艘战舰被焚毁！

报！我军败于常州、池州、鄂州、宣州、溧水，都统使李雄战死沙场！

报！报！报！曹彬杀到秦淮河了！

再报！曹彬在白鹭洲大破我军万余，我军战死5000余人，战舰50艘被俘获！

报！大事不好！宋军攻破江宁府关城！天德军都知兵马使张进等9人投降北国去了！

报！报！……

江南国的败报如雪片般飞入澄心堂。陈乔、张洎愁眉苦脸，不知所措。眼瞅着宋军就要破城而入了，这仗还怎么打！最后，枢机重臣决定，将败报暂时压下，将守卫金陵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身上。

皇甫继勋是皇甫晖的儿子，年纪不大，却被委任掌兵。当时江南宿将皆死，国人将对皇甫晖的敬仰之情转移到皇甫继勋身上。但皇甫继勋从小娇贵，不会打仗，甚至连死战的意图都没有，整日想着怎么向大宋投诚。听说江南兵败，他反而面露喜色。其子巡检使皇甫绍杰则受乃父之命去劝说李煜投降，然而李煜就是不肯。

更糟糕的是，有裨将招募死士去偷袭宋营，皇甫继勋知道后居然用鞭子把这些裨将乱抽一顿，然后关押起来，搞得众情愤怒。大概害怕李煜问起军中的情况，皇甫继勋索性以军务繁忙为由，几乎

不再入朝，即便李煜召见，他也推托不去。就是这样，李煜对他的心思居然丝毫没有察觉，仍然将金陵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他。

李煜以为，有陈乔、张洎和皇甫继勋，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关注军务没几天，李煜又撒手不管了。他把精力放在了自己更擅长的文化教育方面。开宝八年（975）二月，宋军包围下的金陵城仍然开科取士，录取进士30人。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在自注中这样嘲笑李煜："王师已至城下，而贡举犹不废，李煜诚不知务者，故特书之。"

作为一国之君的李煜，纵然多有"不知务"之举，但就坚持贡举这件事来说，恰恰反映出李煜对人才的重视。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江南）是在中原之外，唯一常年坚持贡举考试的国家。虽然李煜与其父李景一样，有用人不明的问题，但他主观上还是重视人才的。举行贡举就是选拔人才，李煜还是希望通过贡举制度，为江南选拔出一批称职的官员来。

问题在于，李煜视为人才的，多是文学之士。

就在李煜开科取士的同时，赵匡胤也点了新科状元。

同样是在这年二月，大宋的贡举考试也刚刚结束。赵匡胤御讲武殿，亲自对合格的举人进行复试。两年前，由于负责主持考试的李昉徇私舞弊，数名考生集体敲登闻鼓申冤。从那时起，赵匡胤在贡举后都会亲自复试合格考生，亲自在讲武殿批阅考卷，钦点进士。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殿试"。殿试虽始创于武则天，但其后没有形成制度。赵匡胤重建殿试，并使之固定下来，成为贡举考试最后一道程序。而考中进士的读书人，自此全部成为天子门生。

开宝八年这次殿试，赵匡胤依照传统，仍以诗赋为考题，最后亲自录取了30名进士，其他科目录取34人。进士科的状元名叫王嗣宗，文章深得天子器重。但仅擅诗词歌赋的文学之士，是难以被赵匡胤认可的。前面提到过，王嗣宗与陈识在殿前争状元，赵匡胤便让两人打架，最后王嗣宗一拳打掉陈识的幞头，凭武力胜出。

在看似无厘头的背后，赵匡胤有自己的逻辑。他需要文治，但需要的不是文弱书生，更不是自废武功。看看江南李氏三代的一边倒政策，导致文治畸重而武功畸轻，结果连文治也难以搞好，最后只好国将不国。

赵匡胤曾让时任宰相的赵普推荐“儒臣有武干者”，正在西蜀平定叛党、做善后重建工作的右补阙、权知彭州辛仲甫受到推荐后，立刻得到重用。

文武双全，这才是赵匡胤心目中的人才。

后来王嗣宗官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辛仲甫更成为参知政事，他们都没有辜负赵匡胤的一片苦心。

让我们还是先回到开宝八年的金陵。曹彬兵临城下，六军不发。小长老蛊惑李煜修建的寺庙，今日全部成为宋军的遮风避雨之所。曹彬深刻领悟了赵匡胤的精神，为使战争造成的伤亡和破坏降至最低，他对金陵围而不攻。

而江南其他地区，江南军队的败报仍然持续不断。这年五月，李煜突然亲自巡城，一见之下，旌旗蔽野，终于知道自己危在旦夕。惊惧的李煜立刻杀掉了皇甫继勋父子，江南军士抢着分割其肉。

李煜被迫打起精神，再度亲自指挥防守。他一面急召屯驻湖口的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率十余万大军入援，一面继续拒绝赵匡胤的招降，并派人去找赵匡胤讲道理。

八月暑热，南方潮湿，军中开始流行疫病。眼见李煜倔强不降，赵匡胤甚至一度做出撤军的决策。天子眼前的第一红人卢多逊磨破嘴皮子，也没有让赵匡胤回心转意。恰巧，左司员外郎、权知扬州侯陟因为出了经济问题，被征召回京。侯陟跟卢多逊关系不错，派人哀求卢多逊救命。鬼机灵的卢多逊再度展现了无人能及的急智，他抓住时机，让侯陟极言金陵危在旦夕，不可仓促撤兵，并做出“臣若误陛下，请夷三族”的保证。

赵匡胤得知前线情况，又来了精神，遂停止撤军之议。侯陟不但没有因受贿罪被惩罚，反而被擢升为判吏部流内铨。

赵匡胤的刀枪剑戟略有小怯，李煜趁机反攻。十月一日，江南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与给事中、道士周惟简北上中原，欲凭三寸不烂之舌拦住赵匡胤的三尺长剑。

徐铉已经破釜沉舟。在徐铉入朝前，李煜本来打算让朱令赟停止入援，以防止赵匡胤因此事难为徐铉。然而徐铉却极力反对，他对李煜说："臣此行，未必能排难解纷，金陵所能依靠的只有朱令赟的援兵，怎么能阻止他入援！要以社稷为计，置臣度外耳！"

李煜听了徐铉之言，泪如泉涌。

徐铉是江南名流，听说他来了，大宋的文臣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劝赵匡胤要有所准备。赵匡胤却笑道："都下去吧，如何对付徐铉，可不是你们能想出来的。"

不几日，徐铉到了东京，直入大殿。那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根本不像是乞求议和，倒像是来兴师问罪的。

"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徐铉单刀直入，话锋直逼高高在上的赵匡胤。

赵匡胤并不着急，这种气势，他早在冯延鲁那里见识过了。何况给李煜强加一个"倔不入朝"的罪名，确实难以服人。他让徐铉上殿，具体讲讲道理；同时，寻找机会，把讨伐李煜的合理性坐实。

徐铉继续义正词严地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没有过失，为什么要遭到讨伐！"随后，徐铉逐条逐项论证李煜无罪，大宋发兵无理。

赵匡胤耐着性子听徐铉讲道理，不禁暗笑：徐铉，你从一开始立论就错了。于是回应道："你说说看，父子有能分为两家的吗？"

徐铉被噎得不说话了，确实，真要是分家了，那还是一家吗？

天下本就该是一家，李煜的请求，遭到无情拒绝。

但对于李煜，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更坏的消息是，在赵匡胤的亲自授计下，朱令赟入援金陵的大军全军覆没，朱令赟本人投火自焚。金陵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十一月，徐铉与周惟简再度来到开封。见到赵匡胤，徐铉仍是老生常谈，说李煜事大之礼甚恭，只是因病不能入朝，并非抗旨不遵，求大宋留江南一条活路。言辞凄切，几乎就是在跪地乞求，赵匡胤死活不同意缓兵。徐铉恼羞成怒，豁出一条老命，朝着赵匡胤大嚷起来。

如果是在一个月前，背靠着十余万援军，徐铉尚勉强有资格与赵匡胤据理力争，如今李煜手里没兵了，徐铉拿什么来谈条件？弱国无外交啊！

徐铉忘了，赵匡胤是武人出身。见徐铉如此肆无忌惮，赵匡胤大怒，手按宝剑，厉声训斥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徐铉终于停止了斥责。赵匡胤一统天下之心已定，大势如此，他以螳臂如何当车？至于那个周惟简，吓得连句正经话都没说，直接乞求赵匡胤饶过自己，然后跑到终南山继续隐居去了。

折戟沉沙，李煜再无更多的武器。

十一月二十七日，金陵城破，陈乔殉国，张洎、徐铉等随李煜降。大宋再得2府17州3军、110县1制置院1场1监，[1]655 065户民户。

江南，平。

曹彬、潘美曾因久围金陵无功，动过杀念，向赵匡胤奏道："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

赵匡胤批复："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更特别嘱咐，

---

[1]《长编》所记其版籍所录州县数为19州3军108县，此处据当时实际情况对数据做修订，参见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

“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

曹彬也在下达总攻令前发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金陵城民躲过一场浩劫。

当平定江南的捷报传入宋廷时，百官纷纷上表祝贺。江南灭亡，统一南方的军事战略就基本完成了。如今所余，不过江浙的吴越、闽南的平海、云贵的大理、交趾的静海。大理、静海地处边陲，属于不发达地区，暂时不在统一目标之内；吴越、平海则早就称臣纳贡，实则已在大宋掌握之中。李煜降服，秦淮以南无大战矣。

在一片道贺声中，赵匡胤脸上竟无喜色，他反而满面凄色，沉声说道：“寰宇之内，州县分割，民众因此而受祸，他们日夜盼望着得到朝廷的声威教化，盼望能够得到朝廷的抚养。可是朝廷用兵攻城之际，肯定有许多人死于屠刀之下，这真是可哀啊……”

赵匡胤想起北伐太原时夸下海口“誓不杀一人”，结果尸骨如山。这次他终于直面现实，想尽各种办法把杀戮减至最低，可想到还是有不少人死于非命，心中不免难过。好在，天下就快统一了，战争就要结束了。

杀人的五代渐行渐远，不杀人的宋朝方兴未艾。

受困金陵的饥民得到了朝廷发放的十万石大米，他们与江南其他地区的百姓一起，获得了废除部分苛捐杂税和一至两年的免租补偿。

李煜则带着江南百官平安入朝。鉴于此前李煜对宋朝一直恭恭敬敬，赵匡胤特意免去极具屈辱性的献俘之礼，李煜受赐右千牛卫上将军，封违命侯，因其文采飞扬被赵匡胤称为“翰林学士”。其子弟、宗属，及江南重臣汤悦、徐游、徐铉、张洎皆成为大宋官员。

操着不同口音、有着不同文化的文臣武将汇聚一堂，南北一家人，终于团聚。

曹彬以功进位枢密使，潘美出任宣徽北院使，二人皆兼领节度使以示尊贵，这是从来没有的惯例。自后周王朴起，这是第一次以统兵的武人执掌枢密院。只是这位武人已经不是昔日的赳赳武夫，他心中有仁，心中有人，与那些知州、知县的文官没什么两样。

不过，赵匡胤对曹彬也有所保留。出征前，他曾许诺，若凯旋，当以使相为赏。可是当曹彬还朝后，赵匡胤却说："如今寰宇之内还有据土割据的势力，你要是当了使相，尊贵至极，还能再奋力率兵征战吗？再等等吧，等为我取了太原，朕一定为你加官使相。"

曹彬心里委屈。这皇上重信义、讲承诺是出了名的，怎么到我这里就出尔反尔了？曹彬正一肚子气无处发泄，可到家一看，满屋子的赏钱。原来赵匡胤怕曹彬难过，又秘密赐给他五十万钱。曹彬做人向来低调，平定江南如此大功，还朝时却自称"奉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说自己不过是奉了皇帝旨意去江南办公事了。因此，见赵匡胤也并未亏待自己，曹彬叹道："再大的官也不过多得些钱罢了，又何必做使相？"

其实若真封给曹彬使相，曹彬恐怕会愧不敢当。因为他并没有彻底完成赵匡胤的命令——他也有滥杀的案子。

在吴越的东路军攻克润州后，曾将数千江南的降兵送往金陵城下的宋军大营。这些俘虏有好多在路上逃跑，只因曹彬发布檄文招诱，又想到曹彬一向口碑不错，才又重新回到宋营。然而，这时的曹彬与当年的王全斌一样，面对这么多降卒，生怕他们兵变造反，于是，他选择了与王全斌同样的办法——杀降！事后，他谎称击败润州溃卒数千人，斩首七百级。

曹彬自己尚且如此，他所节制和不归他节制的军队，就更不可能避免滥杀。曹彬帐下的曹翰在攻克江州后残忍屠城，满载金帛而归；东路的吴越军更是在金陵攻克后杀人放火，有许多躲避兵乱的老百姓竟被活活烧死。

然而赵匡胤对此置若罔闻，不闻不问，这与他因怜悯江南百姓而流的眼泪形成鲜明对比。

也许，北方开战在即，在用人之际，他与当年的郭威一样，在军民之间选择了前者。

应天广运，一统太平

就在宋军席卷江南之际，北方硝烟犹然未靖。

开宝三年（970）十一月的定州之战，虽然宋军大胜辽军，但却给赵匡胤提了个醒。宋辽冲突随时可能升级，仅靠双方维持现状的默契，并不足以维持脆弱的和平。看来，有必要尝试与辽国缔结盟约，将双方和平对峙的局面稳定下来了。

宋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974）三月，正在部署对江南用兵的赵匡胤，为了防止辽军乘机偷袭，主动派出使者到辽朝商议和谈。这次出使打破了开运之祸以来，中原王朝与辽国关系的桎梏，成为一次“破冰之旅”。

赵匡胤敢于跟耶律贤谈和平，也是有资本的。虽然当初太原没打下来，但宋军的英勇，辽人有目共睹。何况在阳曲、定州，宋军截击辽军三战三胜，最后一次更是号称“三千打六万”。对于这个在大江南北纵横驰骋的王朝，契丹人再也不敢小觑。

此后，赵匡胤多次派遣使节入辽。辽人虽然没有马上回复，但在大宋南征期间，确实没有再发兵南下。

到了这年十一月，辽朝涿州刺史耶律琮以侍中身份，向宋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自古以来，南北两个政权共存就是常态。我们两国并无嫌隙，如果能互通使节，向天下表明两国君主的心意，从而使两国疲于战乱的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使两国成为长期友好的邻邦，岂不是大善大福？”

耶律琮还与孙全兴在雄州北门外会面，磋商和议的具体细节。不久，两国朝廷都宣布承认和议有效，并互相递交了国书。十一月二十七日，宋辽正式达成了历史上第一份和平盟约，史称雄州和议。

由于史料失载，雄州和议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不过在和议达成后，双方不仅在边境上的军事骚扰大为减少，还在节日、皇帝生日等重要日子里互派使节道贺。一度在大战边缘的宋辽两国，被一纸协定拉了回来。

就在赵匡胤用兵江南之时，垂死挣扎的北汉没有放过最后的希望，屡次兴兵南下，次次大败而归。北汉皇帝刘继元甚至收到耶律贤的警告："强弱势异，无妄侵伐！"刘继元闻命，大哭。

自从宋辽两国议和建交，双方的外交活动便接连不断。赵匡胤曾带辽国使臣检阅大宋军队，组织辽国卫士与大宋将士比试骑射。一次，赵匡胤带着大辽使者到郊外打猎，他亲射走兽，箭无虚发，弓弦响处，一箭致命。向来崇尚武功的辽使不由得叹服，高呼万岁！他们私下里还对宋朝的翻译说："皇帝神武无敌，射必命中，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神射手！"

曾经不可一世的契丹，终于承认与大宋暂时平分天下。后晋以来，中原王朝第一次与辽国势均力敌，和平对峙。大宋赢得了取天下的"大势"，距离天下一统不远了。

开宝九年（976）二月二日，赵匡胤拒绝了群臣为他所拟的尊号"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皇帝以决绝的口气告诫天下臣民："幽燕未定，何谓一统！"

天下这盘大棋，就要收官了。

只是，赵匡胤在外如日中天，对内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赵普走后，大宋已经无人能阻止晋王的崛起。

三、雪夜中，烛影斧声

晋王崛起

开封城如往日一样祥和。一些老百姓玩着鹰，遛着鸟，正在街上闲逛。突然，这些人抱起自己的飞禽走兽撒开腿就跑，跑不掉的，就躲进别人的坊门里。

大家都在喊：党进来了！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正在奉命巡逻都城。养鹰遛鸟的老百姓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一旦被党进遇到，这些宠物肯定会被他放生，他们还免不了挨顿骂："你不去买肉供养父母，反而在这里养什么禽兽！"

久而久之，只要党进一出现，养宠物的人就自动回避，党进也习惯了。可是今天的开封城比较奇怪，不远处，居然有一个人，从容镇定地逗着自己的鹰，旁若无人，根本就无视党进的存在。

新来的？党进有些好奇，大步走上前去，伸手就要将雄鹰放生。养鹰人依旧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说："晋王让我养的。"说完，转身就要回晋王府汇报。

党进闻言，慌得忙把手缩了回来："哎呀，我说老兄，你怎么不早说？"随即掏出一大把钱，塞给养鹰人，一个劲儿地赔笑叮嘱，"你可小心看管好了，别让阿猫阿狗把鹰给伤了。"

养鹰人掂了掂党进塞过来的钱，也不与他多言，仰着脖子慢悠悠地朝晋王府走去。

晋王府内，赵光义拿过用党进的钱买来的肉，亲自喂起了那只

鹰。没有赵普的日子真是太逍遥了，现在，他不仅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开封府里扩张势力，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地试探拉拢，而且可以把手伸向城外。老岳父符彦卿虽然已经不在，但其他藩镇都在纷纷向自己示好。

“晋王”两个字确实妙不可言，所有的人都在向未来的皇帝讨好卖乖。但也有人是例外——控鹤都指挥使、领濠州刺史田重进。

田重进是赵匡胤在后周整顿禁军时，亲自招入麾下的。他力气很大，为人质朴，凭借战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位置。

对于这样一位殿前军中的资深将领，赵光义当然不会放过，何况两人还有点渊源。宋朝开国之初，赵光义做了一年多的殿前都虞候，说来也算是田重进的老领导。

赵光义派使者给田重进送去酒肉，田重进却力辞不受。使者恼怒，傲慢地责备道：“这是晋王赐给你的，你怎么敢拒绝！”

没想到田重进冷冷回答：“我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晋王何许人也！”

放肆！听闻使者回报，赵光义怒不可遏。

让他大怒的事，还远远不止一件。吴越国王钱俶即将入朝，经验丰富的赵光义正在准备接待工作。这种事情，向来都由他做主。

但又是没想到，此次奉命迎接钱俶的人，竟然是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德昭。

赵光义大为恐慌，因为赵德昭是赵匡胤年龄最长的儿子！立国十余年，大宋皇室逐渐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职位系统。皇室成员出阁后，先为防御使，再以府尹领节度使，再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再进位侍中、中书令。不过，赵光义比较特殊，从一开始，他就基本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身居高位，位同皇储。

然而，一切似乎都在改变。开宝六年（973），四弟赵光美再度晋升，侄子赵德昭继承了四叔的旧职，与此同时，二人都加了检校官。这本来是没有特别含义的荣誉头衔，但赵德昭的检校太傅却高

于赵光美的检校太保。如果不是记载有误，那么这就意味着，赵匡胤打破了之前的顺位体系，暗中抬高了赵德昭的地位。

现在，26岁的赵德昭更是爬到38岁的赵光义头上，去迎接钱俶！

惯例一再被打破，那就不再是惯例。

而以亲王尹京为准皇储，恰恰也只是一种可以被随时打破的惯例。

对于赵匡胤而言，当初之所以要培养赵光义做继承人，是出于对长君的需要。在改朝换代异常频繁的五代时期，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应拥立长君。“长”既指年龄偏长，又指政治经验丰富、能力出众。只有这样的人做皇帝，才能应付五代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形势。因而，老皇帝让亲儿子靠边站，把皇位交给弟弟、养子，在当时并不是新鲜事。

宋朝开国之初，没有人相信这个王朝能延续320年，甚至没有人相信宋太祖能在位17年。那时皇帝的儿子赵德昭10岁，赵德芳才两岁。相比之下，22岁的赵光义当然更适合做未来的“长君”。

可开宝六年（973），35岁的赵光义封王时，赵德昭已经23岁了——这几乎和赵光义做开封府尹时一般年纪，而赵德芳也15岁了。

兄终弟及？赵匡胤并不甘心。

有一个小细节暴露了赵匡胤的心机，那就是赵德昭的出阁。出阁，就是皇子在成年后从宫中迁出独立居住，相当于皇室的“成人礼”。唐代以来，皇子出阁的年龄通常在十六七岁，随即封王。可对礼仪制度颇为尊重的赵匡胤，在出阁的问题上却一再“出格”。

一是对皇子出阁的年龄动了手脚。乾德二年（964）赵德昭出阁，开宝八年（975）赵德芳出阁，都是17岁。然而，出阁时官方公

布的赵德昭“17岁”居然是假的，他当时的真实年龄是14岁！[1]赵匡胤提前三年让德昭出阁，似乎急着让他成年，为日后分担政务做准备。这件事在后来的史书里留下了破绽。

二是对皇子出阁的待遇动了手脚。按说皇子出阁理应封王，赵匡胤却说现在皇子还没有成年，因而故意贬损其礼仪，在出阁时只加封为防御使。但仔细想想，赵匡胤似乎又是故意为了不封王，而让皇子们提前出阁。因为一旦赵德昭、赵德芳封王，那么担任开封府尹的赵光义也要封王。赵匡胤实在不想让这位准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更高了。他表面上贬损的是自己儿子，实际上贬损的却是赵光义。

与赵光义相比，从未参与过军政事务的赵德昭、赵德芳，简直就是小白。而现如今，满朝文武中的“聪明人”，都在明里暗里向赵光义靠拢。甚至在晋王府里，赵光义还养了一批死士。没有了赵普，朝中再也没有人能够制衡晋王，这令赵匡胤感到一丝恐惧，不仅为自己，也为儿子们。

高不胜寒

吴越国王钱俶已坐上马车，踏上生死未卜的朝圣之路。

江南国灭亡后，南方还有两个割据政权，一个是吴越国，一个是平海军。唐朝末年，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钱镠割据两浙，并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国王。经过多年的扩张，吴越控有13州1军，世代实行向中原称臣的政策，国君受中原王朝加封吴越国

[1] 据《长编》，赵德昭出阁时年十七。但《东都事略·吴王德昭世家》却说，德昭薨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仅29岁，那么乾德二年（964）德昭的实际年龄为14岁。《宋史》的编撰者可能发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干脆就不写德昭的年龄。

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境内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平定江南的战争中，吴越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于平海军，建立在被南唐灭掉的闽国的废墟之上，只有泉州、南州两州领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开宝八年（975），就在江南平定前夕，赵匡胤曾经命人给吴越国王钱俶带话："元帅攻克毗陵（指常州，原江南国重镇）有大功，等到平定江南，可暂来与朕相见，以抚慰朕的思念之情。你放心，朕向上天发誓，咱们见过面之后，你即刻就可回国，朕不会久留你的。"

眼看着李煜因为拒绝入朝被大宋灭掉，钱俶哪敢说半个"不"字。开宝九年（976）二月，钱俶带着自己的儿子钱惟濬奉诏来到东京。这是赵匡胤称帝以来，第一次以绝对和平的方式，"邀请"一"国"之君，"访问"开封。

在皇子赵德昭的带领下，钱大元帅终于见到对他"朝思暮想"的赵匡胤。和他想象的并不太相同，这位太平天子精神抖擞，爽朗大方，丝毫没端皇帝的架子。自从进了开封，赵匡胤整天拉着钱俶东游西逛，日日宴饮，夜夜高歌，好不快活。

让钱俶更意想不到的是，赵匡胤频繁下诏，给予自己无与伦比的地位。此前他就曾得到大宋册封的尚书令——这个冯道至死才得到的朝廷最高职位。钱俶入朝，赵匡胤又宣布，吴越国王可以剑履上殿，诏书不名，继而又要册封钱俶的夫人孙氏为吴越国王妃。宰相薛居正、沈义伦表示，异姓诸侯王的妻子没有册封为妃的典礼。赵匡胤却说："以前没有，那就从本朝开始，这是我大宋对元帅的殊礼。"

一日，众人喝酒正酣，赵匡胤突然说："元帅啊，你看你也是王，晋王也是王。以后，你就跟我这两个弟弟叙兄弟之礼吧。"

钱俶听了，吓得立刻叩头，哆哆嗦嗦地说："臣是燕雀微物，让臣与鸾凤同列，是驱臣于速死之地啊。"和赵光义、赵光美称兄

道弟，那岂不是与皇帝称兄道弟？钱俶一个准亡国君，哪有这个胆量？

赵匡胤见钱俶执意不肯，略有失望，但也不想强人所难。

赵光义喝着酒，眼睛却暗中瞥向赵匡胤。二哥这是怎么了？见了这个钱俶，好像一见如故似的。难道又想义结金兰？赵光义正寻思着，耳畔已传来了琵琶声。钱俶今天也多喝了几杯，听得曲声，不由得忧从中来，随口应和道：

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行即玉楼云雨隔。

才和罢，钱俶自觉失语，赶忙闭了嘴，低头不语。

听得这词，赵匡胤也有点悲伤起来。他缓缓起身，来到钱俶身旁，抚了抚他的后背，语重心长地说："誓不杀钱王。"钱俶闻言，热泪盈眶。

转眼到了烟花三月，正是下江南的好时节。钱俶却不想走了，他突然有一种错觉，觉得眼前这位皇帝似乎不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而是一个行走江湖的侠客，一个豪气冲天的兄长。这位天子雄才大略，可是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钱俶自告奋勇："听说皇上要西幸西京，臣恳请扈从。"

赵匡胤摇摇头："南北风土不同，眼看天要热了，你早点回去吧。"

钱俶说："那让惟濬留下，陪同皇上祭祀。"

这次赵匡胤没有拒绝。钱俶本以为自己有去无回，甚至做好了喝毒酒的准备，没想到大宋的皇帝说到做到，竟然真的肯放他回去。不仅他没想到，大宋的臣子们也没想到。数十人纷纷上书，恳请赵匡胤将钱俶扣留，逼着他献出土地。

然而赵匡胤一概不纳："你们不必忧虑，钱俶若不肯归附于我，此次也不会入朝了。放他回去，还可以与钱俶结心。"

赵匡胤要结的不仅是钱俶的心，还有吴越十四州军民的心。钱氏经营江浙八十年，广施善政，民心归向。只有善待他们的国王，他们才会真心归附。赵匡胤希望感化他们，让他们真心诚意地归附大宋。

三月的清晨，微风拂面。面对赵匡胤，钱俶再度叩拜，哭着说："臣愿三岁一朝。"

赵匡胤弯下身，将钱俶扶起，拍着他的手和蔼地说："道路遥远，等有诏命再来吧。"说完，他转过身，从侍者手里拿过一个封好的匣子，交给钱俶，又言："回到吴越以后你再看，路上别打开。还有，你自己看看就行了。"赵匡胤紧紧握住钱俶的手，郑重承诺道："尽我一世，尽你一世。"

钱俶带着这个匣子上路了。一路上，他每天都会把匣子供奉起来，焚香叩拜。直到他回到西府杭州，才按照赵匡胤所说，打开了匣子。里面满满的，全是宋臣请求扣留自己的上书。

钱俶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他后怕，自己能够回到杭州，这真是侥幸中的侥幸；他又感激，感激赵匡胤放自己归来。"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热泪纵横的钱俶在府中跪倒，朝着西北方深深一拜。

吴越虽土飞邦外，却已心归大宋。

钱俶走了，前几日还热热闹闹的大内，瞬间又变得冷冷清清。

最近两三年，赵匡胤不仅对外开疆拓土，而且政绩依旧斐然。比如继续鼓励开荒，废除苛捐杂税。

比如遵从《尧典》中的上古司法精神，进一步完善立法，改革司法，放宽刑罚。

比如宰相、监修国史薛居正率领史馆的官员，编修完成《五代史》150卷。这部史书日后将以《旧五代史》之名，列入二十四史，成为乱世最真实的见证。

比如废除朝臣以个人名义推荐举人的"公荐"制度，又开创

天子主持考试的殿试制度；在临时主考官权知贡举外，增设多名权同知贡举，使其互相牵制，防止舞弊；继续实行国初颁布的禁止考官与考生结成师门、门生关系的禁令。这使贡举考试更加公正，也抑制了贡举滋生的党同伐异，更将考试权收归帝王，日后的举人进士，一概都是天子门生。

然而，改革已经出现瓶颈。赵匡胤为了和平解决武夫乱国之弊，大肆采用赎买权力的方式，虽然效果显著，却使朝廷财政负担加重。这些武夫也获得了“腐败许可”，在地方上大肆敛财，导致民怨沸腾。

赵匡胤犹豫了。如果他将这些武夫的特权收回，无异于过河拆桥，他将失信于天下。然而，如果继续任由武夫胡来，那么他的改革就是将刚刚敉平的乱世之乱，又带入治世之乱。乱世之乱，祸害有时；治世之乱，国无宁日。最后，他的改革还会步上老路，改革成本全部沉积到下层百姓那里，然后百姓不堪重负，于是社稷土崩瓦解。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要让舟船稳稳当当，赵匡胤需要一个与自己一起掌舵的助手。可惜，那位助手因成为“治世之乱”的制造者，被轰出了朝廷。

想到赵普，就会让赵匡胤想起很多人。政绩与功绩，都阻止不了太平天子的情绪向低谷滑落。当年一起开创大宋基业的兄弟们，赵普被赶出开封，张永德、高怀德与义社十兄弟大多分落各地，王审琦、李处耘、张令铎、韩重赟、罗彦瓌、慕容延钊、韩令坤都走了，张琼也走了，甚至陪他从点检一步步走上天子之位的王皇后也走了。眼下，身边就只剩下一个宝贝弟弟赵光义，可今天的赵光义再也不是昨天的赵匡义了。

赵匡胤很孤独，空前的孤独。

赵光义最近也很痛苦，不过与赵匡胤的痛苦不同。这两天，赵匡胤宣布要西巡洛阳，他在琢磨二哥的用意。官方的理由看似很

靠谱：祭祖。也许是二哥想“家”了？二哥生于夹马营，长于夹马营，对洛阳的感情犹如自己对开封一样。可是为什么登基16年，哪怕是西征李筠时，也未曾顺路去洛阳看看？

又或许，他要暗中就近去看看赵普？可是我这位哥哥现在如日中天，即便他真的要见赵普，直接召赵普进京就行了。可赵普就算回来了，他在开封府也寸步难行，如今的开封府，已经彻底是本王的地盘……

赵光义突然惊醒，本王的地盘……难道二哥要另起炉灶，离开开封？

石马落沉

在赵匡胤的御案上，多了一份起居郎李符写的奏章。

赵匡胤冷笑一声。四年前，李符受命知京西南面转运事时，赵匡胤亲自写了“李符到处，似朕亲行”八个字赐给他，全力支持他。怎么，这才几年，你也投靠晋王了？

当年的赵匡胤赐给李符八个字，这次李符还给赵匡胤八个难。李符提出，西幸洛阳有八难：“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这是说洛阳的基础设施不完备。赵匡胤摇摇头，洛阳宫室刚刚在知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的主持下修整完毕，李符难道不知道？

李符又写道：“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百官不备？朕一纸皇命，你们谁敢不去？畿内民困？下诏免除一两年的税赋，这也不难解决。壁垒未设？洛阳四周山河拱戴，开封城外一马平川，洛阳要是壁垒未设，开封岂不等于敞开大门迎敌？至于千乘万骑，盛暑从行，这更莫名其妙。现在天气热到不能

去洛阳了？笑话！

让赵匡胤真正动心的是第六条，军食不充。唐朝以后，江淮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全靠漕运运往北方。开封地处水道枢纽，有汴河、黄河、五丈河和惠民河相系，交通十分发达。相反，自开封到洛阳，漕运只能走黄河，不仅逆水而上，而且水道险峻，加之黄河连年决口，有时甚至无法通航。这也是唐朝以后，洛阳急剧衰落、开封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

然而，一切都无法阻止赵匡胤西幸的决心。

朝日照开携酒看，暮风吹落绕栏收。洛阳牡丹年年竞放，瀍渠的清水依旧静静流淌。上一次来到洛阳时，赵匡胤还是个闯荡江湖的青年。那年，他满怀着建功立业的期望，准备前往河北邺都，投奔名扬四海的郭威。二十余年过去了，当年人们口中的传奇人物，早已埋入黄沙尘土，而自己，也已从谈论传奇人物的人，变成了人们口中的传奇人物。

天子的仪仗缓缓朝夹马营走去，道路两侧围了许许多多的人。有年老者，激动得放声大哭："我辈小时候经历战乱，没想到今日还能再见到太平天子的仪卫啊！"

太平天子，这个称号赵匡胤非常喜欢。他当年离开洛阳时，天下还战火纷飞，如今大家终于能够坐享太平了！

御辇缓缓停住。赵匡胤迈步走下，近臣们发现，天子今天难得高兴。只见赵天子用鞭子指了指眼前的巷子说："这里就是夹马营了。朕记得，小时候朕有一个小石马，那帮小伙伴们总是偷去玩儿，后来朕就将它埋在这里，免得又被偷去。二十多年了，小石马，你还在这里吗？"说罢，他亲自挖开了那块土地，那匹小马仍旧静静地站在那里。

赵光义站在一旁，双手抱在胸前。赵匡胤历次出京，他都留镇京师。然而这一次，赵光义没有再得到独自留守京城的机会。对此，他早有预料。只是看见赵匡胤在夹马营磨磨唧唧，不入正题，

赵光义有几分不耐烦。二哥，你兴师动众来洛阳，就为了看看这匹小石马？

赵匡胤当然不是来看小石马的，在举行完合祭天地的南郊大典后，此次出行的目的终于公诸天下：迁都！

二哥，你终于出手了。赵光义冷冷地望着洛阳的宫城，缄默不语。

是的，朕出手了。赵匡胤想起了死不瞑目的张琼，想起了不舍而去的赵普，他们曾一再警告自己，赵光义是危险人物，赵光义的幕府里充斥着奸诡之士、亡命之徒。早晚有一天，赵光义会一手遮天，那时，开封城就成了一座困死皇帝的囚笼！然而，行事果断的赵匡胤，在赵光义的问题上始终难下决断。张琼发出警告，结果人头落地；赵普左支右绌，结果被罢出京师。剩下的人呢？能像刘温叟、吕余庆、田重进那样政治忠贞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即便不去依附这个弟弟，也是首鼠两端，徘徊观望。

赵匡胤本以为，只要不让赵光义染指禁军，大可以任由他自我发展。可如今赵光义在开封的势力太大，自从赵普走后，那些暗中向赵光义送款的人，就像入夜后的跳蚤一样，一时间全蹦出来了。现在，别说是年轻的德昭，就算是召赵普回来，短时间内也难以与他抗衡。即便日后光义可能会继承皇位，但朕还活着呢！

所以，赵匡胤出了狠招，迁都洛阳，这等于将赵光义在开封的势力连根拔起。那样，过不了多久，枝繁叶茂的晋王府就会枯萎。

赵匡胤出牌了，赵光义必须接招。这次，赵光义派出了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义，李怀义的话依旧老生常谈：粮食运不过来。

赵匡胤依旧不听。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我更想听听，那个人自己会找出什么理由？

赵光义缓缓走入大殿，从容不迫地对赵匡胤说了四个字："迁都未便。"

赵匡胤冷冷答道："迁到河南还不够，以后还要迁到长安

去。”总之，离你的开封府越远越好。

赵光义叩头切谏。

赵匡胤解释说：“我要西迁，并无他意。你看，洛阳有山川拱卫，借助地形之便，我们能省去多少冗兵？我想学周朝、汉朝，以洛阳为都，以安天下。”

好个“并无他意”。在赵光义看来，赵匡胤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借助地利，裁撤冗兵？是个好理由。

赵光义抬起头来，双目紧紧盯着赵匡胤，掷地有声地说道：“在德不在险。”

赵匡胤沉默了。这是战国时期吴起的名言。“德”，什么是德？满朝文武的频频示好，便是赵光义最大的“德”。赵光义是在威胁赵匡胤：你不怕搞得天翻地覆，你就迁都吧！

赵匡胤面色苍白，没有再与赵光义辩论，只是对左右淡淡地说：“晋王的话是对的，暂且就听他的吧。可是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就要被冗兵耗尽了！”看着渐渐远去的赵光义，赵匡胤心中默默道：光义，我若真的做了李世民，你的“德”，又能起多大作用呢？好自为之吧。

四月，赵匡胤起驾回京，路过安陵。那里，他与弟弟光义的父母早已长眠于地下。赵匡胤下辇拜谒，悲号恸哭，连左右的人都被气氛感染，泪流不止。

起身时，赵匡胤若有所悟地说：“此生不得再朝见于此了。”

他登上阙台，遥望洛阳。山还是那么青，水还是那么绿，可惜我生不得居河南，只好死后葬洛京。叹罢，赵匡胤朝西北方向拉弓发矢，然后下得阙台，来到箭落处，从怀里掏出了那个小石马，默默地埋了起来。

“我死后，当葬于此。”

烛影斧声

又下雪了。

开宝九年（976）十月的开封，用青玉砌成宫墙，用雪松搭起房梁，以霜絮勾画成瓦，以冰花点缀成华，天为穹庐，地为藤榻……

忽然一阵西风紧，漫天的雪片在风中乱舞，像扯破的棉絮，毫无目的地四处飘落。

赵匡胤头戴紫貂帽，身披紫貂裘，手中握着玉斧，在渐渐灰暗的天色中，迎着飞雪漫步。一串深深的脚印，烙在绒绒的白毯深处。那一年，三个热血青年围坐炉旁，吃着烤肉，喝着温酒，挥斥方遒，定下天下大计。如今，吴越国王钱俶已有归顺之意，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也已经在入朝的路上，北汉刘继元正被党进的兵马围得寸步难行，契丹耶律贤也不断通使示好。最多两三年，支离破碎的山河，便可混元一统，再也没有什么人，能把好好的赤县神州搅得天崩地陷。

赵匡胤看了看不远处的民居，灯火阑珊处，传来一家老少的欢声笑语。男人再也不用担心被催役逼税，女人再也不用害怕被掠为娼奴，小孩子可以安心玩耍，老人家也能安度晚年。爹、娘，匡胤许给你们的太平天下，就要实现了；辛先生，早晚有一天，学生会让你目睹书本中的大唐之治！

“咳！咳！”正想着，赵匡胤突然猛烈咳嗽起来。天气乍冷，日夜操心劳苦的他有点小感冒，不过对身体倒无大碍。

与此同时，里面内班小底都知王继恩正踩着轻而碎的脚步急匆匆赶来。这位内朝侍奉宦官的首领人物，最近有点红得发紫，也可能是现在皇帝最信任的人。去年征伐江南，他奉旨领兵数千人奔赴前线，在严格防范宦官干预朝政的赵匡胤时代，这几乎让人难以

置信。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本月，王继恩兼任武德使，执掌武德司这个宫廷禁卫与特务机构，脱离于宪台监察之外，唯遵皇命，简直是后世东厂提督的鼻祖。在皇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时，赵匡胤似乎真切体会到汉唐皇帝信赖宦官的深意。

但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这不是好兆头。

不过，王继恩很明白自己的身份，倒也一直守规矩，至少目前尚无兴风作浪之心。此刻，他只是赶来向赵匡胤通报：官家，张真人到了。

哦？我们回去吧。赵匡胤带着身边的内侍，转身朝大内走去。

王继恩所说的这位张真人，名叫张守真。相传，他能够与上天通灵，招来玉皇大帝身边的黑煞将军，降临在自己身上，称为“降神”。赵匡胤最近身体不适，特让他请天神下凡，为自己占卜吉凶。

于是，张真人奉了皇命，沐浴更衣，随王继恩来到建隆观的道场，焚香祈请。观外风声渐紧，若婴儿啼泣。张守真恭然肃静地朝来风处拜了三拜，然后起身，对王继恩道：“神明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

雪下得更大了。

晋王府里，赵光义可没有观雪景的好兴致。他躲在屋中，烤着炭火，想让自己更暖和些。自打从洛阳回来，赵光义天天做噩梦。他不明白，二哥到底在想什么。以这位兄长的倔强，既然决定迁都，怎么会在未与自己争执的情况下，就毅然放弃了迁都的打算？是真被自己胁迫了，还是另有所图？

胜利来得太快，快得让人心里不踏实。尤其是今晚，赵光义接到赵匡胤的邀请，让他夜里到宫中饮酒聊天。赵匡胤还特意告诉他，今晚打算屏退左右，你我兄弟二人，就像小时候一样，快快乐乐地吃顿家常饭。

赵光义害怕了。经历了迁都风波后，自己与二哥之间的窗户纸几乎被捅破了。兄弟二人真的还能回到从前吗？屏退左右，官家是有话要对我说，还是设下了十面埋伏？又或者要对我的忠心做试探，甚至是逼迫我造反，好将我这个皇位继承人，名正言顺地罢免甚至处死？短短一个月，他连着三次去了四弟光美的家里，这又是为什么？他要把四弟也扶起来，就像当年的赵普那样对付我？何况，最近他还大力扶持赵德昭，难道他要纠集整个皇室，来对付我这个亲弟弟？

在充满阴谋诡计的世界里，赵光义并不相信自己的哥哥。看看李筠、李重进、李煜，哪一个不是跟着当今天子的节奏，按照天子的时间表，一个一个“被谋反”？现在，你又要来推你弟弟下火坑了！

赵光义正胡思乱想着，衙役来报：左押衙程德玄求见。

这个程德玄，还有没有规矩，大晚上跑来干吗？心烦意乱的赵光义本想不见，但又怕有什么急事，皱着眉头让程德玄进府。

程德玄慌慌张张进了晋王府，见到赵光义，瞧了瞧左右，似语非语。赵光义连忙叫身边的人都退下。

程德玄这才神神秘秘地说：“大王，属下有一位叫马韶的朋友，通晓天文地理……”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看了看赵光义的脸色。

赵光义脸色不太好看。开宝五年（972），朝廷明令禁止个人私自研习天文、地理、术数，连和尚、道士也不例外。你程德玄怎么还跟这种人搅和在一起，这不是给我添乱吗？

可是程德玄确实有不得不说的话，他压低声音道：“马韶今晚突然跑来，跟属下说，明天是大王利见之辰……”

胡说八道！异常敏感的赵光义轻声怒道。他连忙打开屋门，朝四处望了望，确保无人，才又迅速关上门，压低声音说：“马韶在哪儿？”

程德玄道：被属下关在家中……

赵光义眯起眼睛，点了点头。他与程德玄的低声细语，渐渐埋没在风雪之中。

雪夜中的开封，冷冷清清。

禁军精锐都追随党进，前往太原征讨刘继元了。

满朝文武都窝在家里，准备欢度十日一次的旬假。

宫中内侍都回了住处，以免打扰天子叙旧。

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夜晚。

万岁殿里，天子与晋王的笑声打破了今夜的宁静。那开怀的爽朗笑声，就像久违的雪花，荡涤着空气，让人说不出的畅快。

夜入三鼓，殿前雪已数寸。宫中的光华渐渐黯淡下来，唯有天子的寝宫，依旧烛火通明。两个雄武的身影，觥筹交错，时而纵声大笑，时而号啕大哭，时而指天昂扬，时而杵地沉伏，眼见得一壶壶酒，从飞流落饮到垂滴而尽。

天子盯住晋王，似笑非笑。他究竟是晋王，还是光义？在他眼里，是兄弟情义重要，天下太平重要，还是权力重要，当皇帝重要？此时此刻，寝宫中只有兄弟二人，把盏言欢。天子并不愿去想，却又不得不想。赵普虽然擅权，但却始终为大宋新政鞠躬尽瘁。你晋王呢？自从大宋开国，你一门心思就全在谋取皇位上了！你有没有为江山社稷考虑过，为天下苍生考虑过？

晋王被看得有些不安。二哥，官家，陛下！你待我很好，真的很好。可是，天下大事，朝野要事，你何时问过我这所谓的“重臣”？你是真拿我当小孩儿，还是故意防着我？你想打造太平天下，难道我就不想？更何况，在你身上，永远洗不掉五代武夫的痞气。只有我这个真正的文士，才能开创真正的文治盛世！

酒快喝完了，这是最后一杯。天子亲自斟得满满的，站起身来，举杯敬向晋王。晋王摇摇晃晃，起身避席，双手似推似让，不断摆动，好像已经喝到极限，再也喝不下了。

天子没有再强迫晋王，垂首沉沉地坐了下来，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他随手从桌上拿起玉斧，用玉斧的斧柄不断地戳着殿中的地板，发出“咚、咚”的闷响，好似敲在胸口一般。

“好做！好做！”赵匡胤大声重复着，那声音沧桑低沉，仿佛一盏即将燃尽的火烛，在风中摇曳不停。

夜入三鼓，殿前雪已数寸。

赵光义离开了，在他身后，赵匡胤已经沉沉睡去，鼾声如雷。万岁殿前的脚印，在风雪的打磨下，了无痕迹。

出……出事了！出大事了！

四鼓天，皇后宋氏被王继恩急促的声音惊醒。

官家怎么了！宋氏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官家……官家千秋万岁了……王继恩跪扑在皇后面前，如丧考妣。

官家……宋氏的眼泪犹如决堤的洪水，刹那间喷涌而出。尽管赵匡胤对她的感情有所保留，但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丧夫之痛，怎不教人摧心断肠！可宋氏毕竟是节度使的女儿，她知道，除了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宋氏顾不得擦去眼泪，连忙扶起王继恩，异常坚定地说：“快，召德芳进宫。”

王继恩愣了一下，然后应了一声，转头跑出了皇宫。这个时候，谁先进宫，谁就是大宋的第二任皇帝。

赵德芳，就是日后小说家言中那赫赫有名的“八贤王”的原型。他是赵匡胤的第四子，刚刚年满十八，于开宝八年（975）正式出阁，今年（976）三月领贵州防御使。

赵德芳与他的二哥赵德昭均非宋氏亲生，而当时具备储君资格的是赵光义，具备嫡长子身份的是赵德昭。再退一步，按照传说中的金匮之盟“三传约”，还有个赵光美。这皇位怎样也轮不到赵德芳来坐。

有人说，让赵德芳继承皇位是赵匡胤的意思。赵匡胤在三月间起身前往西京洛阳前，洛阳城刚刚经历了一次大修。而主持大修的，正是赵德芳的岳父焦继勋。

也有人说是因为德芳年龄小，好操控，所以宋皇后才打算让德芳承继大统。

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王继恩出宫后直奔晋王府。

晋王府门前，程德玄坐在冰冷的石阶上，望着鹅毛大雪，一动不动，几乎被飞雪埋成了雪人。

程德玄忐忑，他知道，如果一会儿有一队灯火朝这里走来，那就是决定他，还有晋王，还有许多人命运的时刻。

远远地，一排灯火朝晋王府匆匆而来。程德玄凝视着灯火，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

王继恩！是王继恩！程德玄突然站起身来，面带激动地看着对方，心中呐喊着：王继恩！我可盼到你来了！

王继恩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他问程德玄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程德玄像早准备好的一样，流畅地回答说：“我住在信陵坊，二鼓天的时候，有人敲门说晋王召见。可等我穿好衣服出了门，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如此反复三次，我怕晋王真的病了，就跑到晋王府来了。”

“嗯？怪了……”王继恩听了这话觉得奇怪，但现在不是费神思考的时候。他忙悄声对程德玄说：“主上晏驾，速请晋王入宫。”

大事成矣！程德玄当即拉过王继恩，一起敲开了晋王府的门，匆忙冲了进去。

赵匡胤死了，赵光义却犹豫了。

他……真的死了？确信不是装死？不是试探我？

赵光义对王继恩说：“事情太大，容我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言毕，转身进了后堂，半天不再出屋。

王继恩等得急了，也顾不得身份，闯入后院，跟着低声道："事情拖得太久，就要被别人抢先了！"

一语点醒梦中人，赵光义当即披好裘衣，带着程德玄，随王继恩入宫。

三道脚步声，再度打破大内的宁静。

大内之外，王继恩请赵光义先到直庐（类似今日的值班室）等候，说："晋王先在这里等等，我进去跟皇后通报一声。"

赵光义正要走进直庐，却被程德玄一把拉了回来："直接进去，还等什么！"夜长梦多，如果宫里拖延时间，不让晋王你进去，等赵德芳来了，咱们就都得去见你哥哥了！

"走！"赵光义脸色一沉，迈着大步，朝万岁殿走去。

万岁殿中的宋皇后尚在焦急地等待，来者可能是王继恩和德芳，也可能是晋王抑或德昭。他们直接关系着宋氏的命运，更关系到全天下的命运。

听到王继恩的声音，宋氏急切问道："德芳来了？"

王继恩阴森森地说："晋王来了。"

"晋王！"宋氏倒吸了一口凉气。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原本一切就在他的掌握之中！

理智尚存的宋氏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她见了赵光义，泪眼婆娑地泣道："吾母子之命，皆托付给官家了。"

赵光义也含泪云："共保富贵，别担心。"

大宋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太平天子赵匡胤，永远离开了他最深爱的土地，他最深爱的子民，以及他最深爱的弟弟，享年50岁。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1]庙号太祖。

他没有看到重归一统的那天，也没有看到天下太平的那天。

---

[1] 后定谥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关于赵匡胤之死的“烛影斧声”故事，版本众多。关于赵匡胤去世后，赵光义上位过程的记载，始见于司马光。

没有办法证实烛影斧声是否真实发生过，也没有证据证明赵光义一定弑兄篡位。宫闱秘事，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有人说，赵光义的即位，不过是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兄终弟及；有人说，赵光义下毒弑兄而立，制作毒药的人就是程德玄；有人说，赵匡胤死于疾病，赵光义乘机抢了皇位。也许，辽国人的记载更接近于真相：“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

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政治平稳和社会安定。赵匡胤驾崩后，皇位顺利交接，没有发生兵乱和流血。无论是年龄、政治经验和实际能力，还是准皇储的身份，赵光义确实比赵匡胤的两个儿子更适合继承宋朝的基业。

而站在治乱相交边界上的赵匡胤，终究无法在长君与皇子间做出艰难抉择。皇位继承制度最终完成由乱入治的转变，还要依靠他事业的继承者——宋太宗赵光义来完成。

第八章

太平兴国

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赵廷美案

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一日，赵光义正式继位，后改名赵炅，是为宋太宗。

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赵光美因避讳再次改名赵廷美，继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进封秦王），成为新的准皇储。

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德昭进位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贵州防御使赵德芳继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他们与三位太祖的女儿以及赵廷美的子女一起，被称为皇子、皇女。廷美、德昭的班位均在宰相之上。

弟弟继续做继承人，侄子当成继承人培养，其他侄子侄女待遇不变，看起来赵炅和乃兄一样，是个重感情的厚道人。

但这些不过是赵炅为了安定人心而临时采取的措施。其实，在赵炅颁布的继位诏书里，他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

赵炅宣布，自己将遵循太祖既往的治国方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也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好防范，所有的细节都要有所约束，防微杜渐。

请记住这八个字，它们后来作为统治的根本原则，以“祖宗之法”的面目，主宰了两宋三百年的命运。

而首先要被提防的，便是秦王赵廷美、宰相卢多逊。

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秦王赵廷美，天真地以为自己会成为大宋第三任皇帝。

不过美梦马上就醒了。

当年，赵炅突袭辽朝，企图一举收复幽燕，结果因指挥不当，惨败而归。由于赵炅弃军逃脱，军中群龙无首，将领们便打算拥立赵德昭为帝。后来因为及时找到了赵炅，这才作罢。

赵炅得知后非常不高兴，赵德昭便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回京后，赵炅没有对从征的将士行赏，军中颇有怨言。同样缺乏政治敏感的赵德昭，这时竟然冒冒失失地跑去为将士们请赏。赵炅恼羞成怒，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斥责道：“等你当了皇帝，再赏也不晚！”

这句话给了赵德昭前所未有的压力，为证清白，德昭回府自尽。

两年后（981）的三月，赵德芳也神秘去世。这年他23岁，那正是与赵炅受封开封府尹、赵德昭接待吴越国王相仿的年纪。

七十多年后，赵德芳的后人向朝廷进献了一方写有“皇帝信宝”的玉玺，据说是当年赵炅赐给赵德芳的。这背后隐藏着多少宫闱秘事、利益交换或政治承诺，今人已无从得知。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赵德芳的死和赵炅有关。但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却都把德芳的死因扣在赵炅头上。

其中可能包括赵廷美。

眼见太祖的两个儿子先后去世，作为准皇储的赵廷美惶恐不安，他急需在疾风骤雨中，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这根稻草，就是宰相卢多逊。

自乾德二年（964）赵普拜相后，宰相的权力就一直很大。以

宰相名义签发给各部门的公文——敕牒，不仅与皇帝的诏书并驾齐驱，甚至比诏书更具效力。这也就难怪宋太祖宁可暂时搁置皇位继承人的争议，也要罢去赵普的相位。

而此时此刻，在赵炅的朝堂里，卢多逊正在复制赵普的一切。

卢多逊博学多才，够机灵也有手腕，不仅深得宋太祖信赖，还是赵炅经营的“反普联盟”中的重要一员。他曾利用担任翰林学士、给太祖做秘书的机会，频繁向太祖吹风，把赵普描绘成大奸大恶之徒。赵普倒台，卢多逊诚多力焉。

正因如此，赵炅甫一继位，卢多逊便册拜宰相。当时朝中共有三位宰相，卢多逊资历最浅，排名最末。但前面那两位或老病亡故，或不愿生事，跳得最欢的，反倒是卢多逊。

到后来，各部门上报朝廷的文件，都必须先经过卢多逊的手，卢多逊同意后，文件才能上达。百官按照流程到阁门进献奏章时，要向负责收发奏章的阁门官表示，自己已经跟卢多逊打过招呼了，阁门官才敢把奏章收下。而且，递交奏章的人还要按照卢多逊制定的规矩，写明“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荣”（不敢随便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皇帝给自己加官晋爵）的承诺。

靠扳倒赵普上位的卢多逊，自然也不会放过赵普，不会让他东山再起。在赵炅的默许下，卢多逊整死赵普的妹夫，折腾赵普的儿子，连赵普自己也岌岌可危。

强势如卢多逊，成为赵廷美眼中的救星，而未来皇帝递过来的橄榄枝，权相自然也没理由拒绝。

然而，赵普以与宋太祖的私交之深，与未来皇位继承人赵光义的积怨之重，尚不能躲过心胸豁达的太祖的猜忌；与赵炅私交平平、与赵廷美深相结交的卢多逊，又如何躲得过狭隘狐疑的赵炅的清算。

赵廷美的预感是对的。

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赵德芳去世后半年，赵廷美的厄运

降临。

一名叫柴禹锡的官员向赵炅举报，秦王赵廷美傲慢任性，而且正在谋划不可告人的阴谋。

柴禹锡是赵炅为晋王时的心腹幕僚，由他出来举报，不禁使人怀疑是不是受命故意泼脏水。

对于如此重大的举报，赵炅的反应颇出人意料。他既没有召廷美对质，也没有调查案件，反而招来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赵普。

赵炅向赵普询问，该让谁当继承人。

赵普答："太祖已误，陛下岂能再误！"

不久，便有了赵普作为当事人，亲自陈述的金匮之盟的独传约。

独传约当然是为赵炅量身定制的，它说明根据杜太后的遗嘱，赵炅是皇位唯一合法继承人。而赵廷美，包括已经闭眼的赵德昭、赵德芳兄弟，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独传约，就是赵普向赵炅递上的投名状。

同月，赵普再度出任宰相。

纵然迟钝如赵廷美，也感到大事不妙。他连忙上书，要求将自己的班位调到赵普之下，赵炅批准了。

更加惶惶不可终日的，当然是卢多逊。赵普复出前曾向赵炅密奏："臣是开国旧臣，却遭到权幸奸佞之人诋毁诽谤。"矛头直指卢多逊。复相后，赵普更多次让卢多逊赶紧辞职滚蛋，卢多逊执意不肯——以赵普的性格，卢多逊在失去权位后会有怎样的下场，他心如明镜。

一个想除掉隐患，顺手罢黜权相，从此高枕无忧。

一个要睚眦必报，顺便递投名状，由此咸鱼翻身。

两个势同水火的狠辣灵魂，为了见不得人的不同目标，碰撞出了火花。

太平兴国七年（982）三月，赵廷美再度遭到举报。

举报人除了柴禹锡，又多了一个杨守一。同柴禹锡一样，杨守一也曾是晋王府的幕僚。

当天，朝廷刚刚在开封城西侧的金明池中建成一座水心殿，赵炅正准备乘船登殿游览。柴禹锡和杨守一却突然举报：赵廷美准备在赵炅登临水心殿时，阴谋发动政变。如果实在找不到机会下手，赵廷美就假装生病待在家里，等赵炅登门看望他时，再发动政变。

柴禹锡这次举报，比上一次还要致命。上次只是怀疑，这次是有鼻子有眼。

赵炅却表示，自己不忍心曝光赵廷美，便只罢免了赵廷美的开封府尹之职，让他去洛阳做西京留守。为了表现自己的兄弟情谊和迫不得已，赵炅在给赵廷美的诏书中，充满了关爱，最后，还赏赐给赵廷美大量钱财和上好的住宅。

在一派兄友弟恭的和谐氛围里，赵廷美失去了皇位继承权。他的儿子、女儿也失去了皇子、公主的称号。

赵炅的戏演完了，接下来要上台的自然是赵普。当然，赵普从来不会矫揉造作，只会快刀斩乱麻。四月，赵普举报，说调查到赵廷美与卢多逊勾结的证据。赵炅大怒，当即罢了卢多逊，下御史台，又抓了一批中书门下和秦王府的小吏审讯。

据卢多逊交代，自己数次派人向赵廷美泄露国家机密。去年九月赵普复相后，他又派人向赵廷美传话："希望官家早点咽气，我就能尽心辅佐大王了。"赵廷美也命人回报卢多逊："此言正合我意，我也盼着官家早点驾崩。"他还私下里送给卢多逊弓箭等兵器，卢多逊照单全收。

赵炅召集所有文武高级官员讨论案情，讨论结果是二人大逆不道，应当明正典刑。赵炅"网开一面"，将卢多逊罢职流放到崖州；对弟弟赵廷美依然温情脉脉，只是勒令罢官回家。而先前抓捕的那些小吏，自然无处可逃，作为党羽一并问斩。

老辣的赵普，当然不相信赵炅的"温情"。五月，赵普便指

使官员上奏，说赵廷美不思悔改，牢骚很多，应该迁徙到更远的地方，以防止他再生变乱。于是，赵炅贬赵廷美为涪陵县公，将其流放到房州软禁。房州，当年曾是周恭帝郭宗训的最终归宿。

雍熙元年（984），赵廷美抑郁而卒。赵炅闻讯，痛哭流涕，然后就跟宰相爆了一个“大料”：“赵廷美不是朕的同母弟弟，他是朕奶妈耿氏的儿子！耿氏后来嫁给了一个姓赵的，还生了个儿子叫赵廷俊。”说着说着，赵炅不禁又难过起来。

根据赵炅的暗示，这赵廷美不仅不是杜太后生的，甚至连赵弘殷的儿子都不是。赵炅原来一直在照顾奶妈的儿子，多“温情”啊！赵廷美，你为了一个本来就没有资格继承的皇位，竟然想要杀死这般呵护照顾你的“哥哥”，真是冥顽不化！

不得不佩服赵炅编故事和演戏的能力。在他的剧本里，他曾和父兄一起征战南唐，英气勇武；他曾和赵普一道，主导陈桥兵变；他曾在陈桥驿拦住二哥宋太祖的马，请求太祖率军入京后，不要抄掠京城；他曾和太祖兄弟情深，留下“灼艾分痛”的传世美谈；他更是太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现在，二哥去世了，轮到四弟配合大戏了。

编，继续编。

演，尽情演。

再来看看卢多逊。当初曾有人说，崖州虽然远，但是春州的环境更差，去春州必死，建议赵普把卢多逊流放到春州去。赵普没同意。雍熙二年（985），卢多逊死在了贬所。讽刺的是，由于崖州古称“朱崖”，卢多逊因此被宋人称为“卢朱崖”。

二府三司制的最终形成

迫害赵廷美、流放卢多逊，这是赵炅继位初年最大的政治事

件。在整个事件里，赵炅一直是个可怜的好人：保护亲弟弟的颜面，保护亲弟弟的地位，哪怕在他嘴里这个亲弟弟根本就不是亲弟弟。

“好人”难做，赵炅就更有理由大搞“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了，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中枢机构的二府制。

在太祖时代，朝廷中书已经初步确立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国务的体制，但是二府的权力分工还相当不稳定。赵普独相十年，五代时期被枢密院侵夺的决策大权，重新归还了中书门下。可随着赵普的失势，大权在握的宰相成为备受猜忌的对象。太祖甚至大幅度提升参知政事的地位和权力，使之从宰相助理一跃成为副宰相，用以防止宰相专权。但到了赵炅朝，仍然产生了卢多逊这样的权相，这让赵炅尤为不满。

于是，赵炅对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权力做出新的调整。一方面，赵炅通过设立其他机构，剥夺中书的部分司法权和人事权。他还一度让自己的五个儿子，同时以宰相身份轮流到中书处理政务。一时之间，中书门下竟然有七个宰相、三个副宰相！另一方面，赵炅将枢密院的职责重新定位为“参谋议，备事变”，意思是参与机要，防备夺权篡位。

经过周世宗和宋太祖的改造，枢密院本来正在逐渐成为国家最高的军政部门，专门负责发布调动军队的命令、选拔任免武官等一般性军政事务，其他的决策职能渐渐淡出。

可赵炅却中断了这一趋势，将早年晋王府的幕僚安插进枢密院，大力扶持枢密院的权势，以此来防范一切对皇位的威胁。

枢密院首先被用来分夺宰相权力。雍熙三年（986），赵炅发动了对辽朝的北伐，这是宋代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可整场战争的作战计划，都是赵炅单独与枢密院的官员制定的。宰相不但失去了军事决策权，甚至连前线的战况都了解不到，知情权被枢密院夺走了。

用枢密院制衡宰相，还只是“参谋议，备事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赵炅利用枢密院直接监视官员、百姓，把枢密院变成了特务机构。

在“赵廷美案”中“居功甚伟”的柴禹锡，后来几经迁转，与赵炅的另一名心腹赵镕以知枢密院事之职，执掌枢密院大权。在他们的主持下，枢密院暗中派出许多吏卒充当密探，监视官员、百姓的一举一动。枢密院成为皇帝防范臣下的特务工具，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功能。

可一旦掌握了无限特权，枢密院的吏卒就变成了混蛋。有一次，一名吏卒喝醉了酒，跟一个叫韩玉的书商扭打起来。没想到这位书商极为彪悍，加之吏卒醉酒，因而吏卒根本打不过韩玉。吏卒恼羞成怒，利用职务之便，诬告韩玉咒骂皇帝。柴禹锡和赵镕立即上报，韩玉因此被处以极刑。不久，赵炅才知道这是一起冤假错案。自此以后，赵炅号称不再听信枢密院的特务密报。可话虽如此，枢密院的特务依然横行霸道，无事生非。把“国防部”开成特务部，大抵赵炅也是这方面的鼻祖了。

直到赵炅晚年，随着统治日趋稳定，枢密院“备事变”的职能才逐渐淡化，枢密院吏卒渐渐不再充当特务，但让枢密院和宰相机构彼此制衡的做法，却通过制度固定下来。

淳化元年（990）十二月，赵炅正式规定，中书门下只负责民政事务，枢密院专门掌管军政事务，二府根据职业分工、对掌军国大政的格局就此确立。作为“二府大臣”，副宰相参知政事与枢密院长贰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执政，执政与宰相又合称宰执。

除了二府，北宋前期还有一个重要部门——三司。顾名思义，三司就是指三个“司”，原本是盐铁司、度支司和户部司的统称，听名字也知道，这是三个掌管财政的部门。中唐以来，这三个部门时而分别设置，时而又合并为“三司”。至宋真宗时，三司正式成为一个稳定的部门，并取代了尚书省户部成为全国最高财政部门。

三司负责全国的财政收支，有计司、计省之称。朝廷有时以宰相监管三司事务，称“判三司”，一般则以三司使为长官、三司副使为副长官。由于三司在一定程度上分夺了宰相的财权，因此三司使虽然并非宰执，却仍有“计相”之称。

通过二府三司制，赵炅将中枢机构按照民政、军政、财政进行了划分，各部门的专业性得到加强，权力边界也逐渐明确，彼此之间互相牵制，而能够总揽民政、军政、财政大权的，只有赵炅本人。

勤政、独裁与祖宗之法

由于最高权力集中在赵炅一个人手里，要想维持大宋王朝的正常运转，赵炅就必须勤政。淳化四年（993）四月，赵炅对宰相李昉说：“朕勤于听政，就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

“勤政”二字，赵炅是当之无愧的。

以前的皇帝并非每天都上朝处理政务。比如以勤政著称的汉宣帝五日一视朝，唐太宗三日一听政，唐高宗以后的皇帝一般两天一临政，而赵炅却坚持每日上朝。

每天黎明，赵炅早早便起床洗漱，随后来到长春殿（又称前殿）上早朝。早朝的时间因季节而变化，最晚在冬至日，大约是7点12分；最早则是夏至日，时间是凌晨4点48分。

早朝期间，赵炅接见宰相、执政等重要部门的官员，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退朝后，赵炅转到崇政殿（又称后殿，即太祖时的讲武殿）与臣僚商讨政务，批阅奏章。下午如果没有特别安排，赵炅会读书，有时一直读到深夜。夜里，赵炅还时常召见近臣，探讨国家大事。

前殿早朝—后殿再坐—夜间召对，这几乎是赵炅每天的工作。

宋朝官员有十天一次的旬假，放假当天，赵炅不上早朝，但仍然会到后殿听取宰执奏事。这样看来，赵炅一年四季，几乎每天都在工作。

赵炅规律的上朝活动，日后逐渐成为日朝制度。虽然不同的皇帝会根据实际情况，对上朝听政的频率有所调整，但总体而言，北宋皇帝除了徽宗外都比较勤政，这确实是赵炅传下的优良传统。

到了至道三年（997）三月二十八日，59岁的赵炅因身患重病，不得不取消了前殿早朝，但仍然到后殿处理政务。第二天是旬假，赵炅依旧坚持在后殿召见了辅臣。当天夜里，赵炅去世。可以说，赵炅自登基以来，将勤政坚持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喜欢歌颂勤政的皇帝，如明代洪武，如清代雍正。公平地说，赵炅也应在“勤政圈子”里有一席之地。但在勤政的背后，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是对权力分享者的高度排斥，是对权力篡夺者的绝对防范，是专制制度下的皇帝独裁。在这样的独裁体制之下，开国元勋如赵普、科举状元如吕蒙正，虽然贵为宰相，也只能对赵炅马首是瞻，难以发挥重要作用。所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赵炅时代根本不存在。

还有一个词值得一提，那就是“祖宗之法”。

祖宗之法的祖宗，最初特指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炅，后来泛指一切过世的宋代皇帝。祖宗之法，就是宋代历任皇帝实行过的制度惯例、治国精神，是一套旨在防微杜渐的基本原则，它的目标是保证政治格局和统治秩序的稳定。

宋代的统治阶层又把祖宗之法称作祖宗家法、祖宗典制、祖宗成宪等，这是他们最爱提及的一组概念。很多人熟知的那些宋朝大事，比如杯酒释兵权、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南宋抗金，乃至宋朝的灭亡，无处没有祖宗之法的影子。可以说，宋代历史上的很多问题，矛盾中心就在祖宗之法上。

宋真宗与宋仁宗时期，北宋士大夫政治经历了逐渐成熟的过

程，进入黄金时代。与之相伴的，正是祖宗之法的形成。

宋代的祖宗之法，并不是皇帝和朝廷下一道命令宣布确立的，而是在日常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种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种是皇帝，另一种是作为臣僚的士大夫。

作为宋朝最初的两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炅对祖宗之法的奠定功不可没。

前面讲过，为了消除五代之弊，使宋朝长治久安，使宋朝皇帝的皇位绵延万世，宋太祖开展了削夺兵权、再造中央的渐进式集权，建立了一系列集权性的制度。这些被称为“法度”的防范举措，不仅日后成为祖宗之法，在当时也颇受太祖重视。他曾在给赵普的书信中谈道：“我们创立的这些法度，如果子孙能够谨慎遵守，那么江山社稷就可以传续百世。”

开宝九年（976），赵炅在“烛影斧声”后继承皇位，把太祖之法推向了新高度。前面提到过，赵炅明确提出要遵循太祖的治国方略，并把这种方略归纳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也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好防范，所有的细节都要有所约束，防微杜渐。赵炅统治期间，中央的二府三司体制、军队的枢密院—三衙体制、地方的路制，以及皇帝处理朝政的日朝制基本形成。

由此可见，无论是为了巩固政权，还是出于对臣僚的猜忌，宋太祖和赵炅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制衡的举措，都对宋朝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举措，以及举措背后的防范精神，成为宋代“祖宗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核。

到了宋真宗时代，士大夫逐渐崛起。当时，遵循祖宗旧制，不仅是宋朝皇帝的统治意愿和治国方略，也是士大夫约束皇帝、规范统治的合理方式。士大夫们借助祖宗的威灵，来影响乃至慑服皇帝；借助祖宗朝的成规定法，来规范统治行为、协调统治步调。

明道二年（1033）二月，宋仁宗亲政，士大夫首次明确提出“祖宗法”的概念。对此耳濡目染的宋仁宗非常认同，他积极回应

道：“祖宗法，不可坏。”

在皇帝和士大夫的共同作用下，“祖宗之法”的概念正式定型，遵行“祖宗之法”成为朝堂上不倒的大旗。而这一过程，又与士大夫由个人到群体登上政治舞台、士大夫政治逐渐走向成熟相始终。士大夫群体的崛起、士大夫政治的成熟在不断提升祖宗之法的地位；而拥有这种地位的祖宗之法，反过来又提高了士大夫政治的话语权，对北宋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飞檐走壁的宦官与首创的特务机构

在宋朝的特务机构名单中，枢密院的上榜时间相当短暂。常规稳定的特务机构其实另有其名。

提到中国古代特务机构，相信大部分人第一反应都是明代的锦衣卫和东厂，特别是由宦官直接掌管的东厂。作为正式的机构，东厂的知名度甚至超过许多王朝的宰相机构。然而，臭名昭著的东厂并非在明代横空出世。它的鼻祖恰恰诞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明的时代——宋代。

专门负责监视军旅官僚、探查民情舆论的“特务”，最早诞生于东汉末年，这就是曹操设立的校事。此后，校事一类的特务被历朝历代沿袭下来，特别注重“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北宋当然也不例外。开国之初，宋太祖十分担心军队中的将领模仿自己，发动兵变改朝换代，于是便专门命人在军中搜集情报，打探消息。曾迫使张琼自尽的史珪、石汉卿就是这样的专人。

不过，曹操设立的校事也好，宋太祖在军中任命的专人也罢，他们对百官和百姓的监视工作，充其量只是最高统治者临时安排的任务，甚至很多人只是兼职做特务。朝廷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特务机构来管理这些特务，这些“临时工”也没有固定的编制，因而早期

的特务都是时置时废、时兴时衰。

然而，伴随着官僚政治的成熟，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皇帝猜忌心的加剧，皇帝本人对特务职业化的需求与日俱增。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务机构——武德司，便在北宋应运而生。

武德司其实并不是宋朝原创的机构，早在唐朝中后期，这个机构就已经存在，长官称作武德使，由宦官担任，最初是负责掌管兵器的，后来逐渐承担起皇宫的安保工作。到了五代，皇帝改而任命自己的心腹担任武德使，作为自己的耳目。既然是“耳目”，当然少不了打探各种消息。正因如此，武德使虽然级别不高，却是有能力影响政局的实权人物。后汉末年，正是在武德使的运作下，皇帝几乎除掉了包括禁军高级将领在内的所有顾命大臣，唯一侥幸逃脱的郭威这才有发动兵变、推翻后汉、建立后周之举。

某种意义上讲，后周是被武德司逼出来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武德司在后周时急剧衰落。陈桥兵变前夕，武德司没有发挥任何防范和制约的作用。皇帝的耳目之司已经彻底瘫痪。

因而，大宋甫一开国，宋太祖就回过头，把武德司捡了回来，任命自己曾经的心腹幕僚王仁赡出任首任武德使。这一任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武德司的职能定位。

在宋太祖的心腹名单中，王仁赡的地位仅次于赵普和李处耘，但与赵普善于政治、李处耘长于军事不同，王仁赡的拿手好戏却是“整人”。阴险狡诈的王仁赡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收集了大量官员的恶劣事迹。只要王仁赡看谁不顺眼，这个人就立刻倒大霉。在王仁赡的“辛勤努力”下，武德司无所作为的局面居然很快就得以扭转。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怕极了王仁赡这张嘴，连赵普都感到压力巨大。

有一次，宋太祖留王仁赡单独谈话，赵普很怕王仁赡要整自己，于是便上奏说：“王仁赡为人奸诈，陛下昨天找他谈话，他说的话都是在诋毁臣。”宋太祖读了奏章，在后面亲自批复道：“我

留王仁赡聊天？你见着我叫谁去把王仁赡找来单独聊天了？你别小肚鸡肠，妒忌王仁赡！”

王仁赡掌管武德司的时间并不长，却让宋太祖感受到了武德司巨大的威慑力。到了乾德三年（965），宋太祖发兵灭后蜀不久，马上在蜀地设立了一个武德司的分支机构，名义上是负责监察接管蜀地后的宋朝官员是否有贪污行为。

这个机构的设置意味深长。因为当时已经升任枢密副使的王仁赡，正在征蜀大军中做都监。他的任务当然不是监视贪污，而是防范宋军将士在蜀中割据谋反。这不免让人把武德司的分号与王仁赡联系在一起。

蜀地北有秦岭，东有三峡，西南和西面都是高原山地，在地理上相对独立，最容易形成割据势力。自古以来，征蜀的大将往往有命建功立业，没命走出蜀地。远者如三国时期灭蜀汉的邓艾、钟会，近者如后唐时灭前蜀的郭崇韬。因此，这个建立于蜀地的武德司，最根本的任务与王仁赡是一致的，那就是监视宋军将领，防止他们叛变。

可以看到，作为特务机构，宋初的武德司主要监视的是军队系统，而掌管武德司的则是皇帝的亲信。然而，武德司直属皇帝，不受大臣监督；这就必然导致它的权力恶性膨胀，性质也日益私人化。

开宝五年（972），宋太祖任命姨表弟（也就是刘迁与杜太后妹妹之子）、从小一起长大的刘知信出任武德使，武德司的私密化程度日益加深。到了开宝九年（976）十月，也就是宋太祖驾崩的那个月，太祖居然破格任命宦官王继恩担任武德使。让宦官来掌握专门的特务机构，这味道是不是很熟悉？

宋太祖曾下令，禁止宦官干政。但事实上，太祖并不完全排斥宦官，他甚至在自己身边还养了几十号飞檐走壁的宦官。这群宦官非常健硕，据说一个人能顶好几个强壮的正常男人，骑上马后更是

疾驰如飞。

有一年，地方贡上来一头老虎，宋太祖命人给老虎扔了一只羊腿，老虎瞬间就把羊腿吃了个精光，吃完后还一再向围观的人们示威。可是上一秒还威风凛凛的老虎大哥，下一秒却突然变怂了。太祖命人去查看，才发现老虎吃羊腿吃得太急，嗓子里卡住了一根羊骨。太祖看了看身边的宦官，示意他们帮老虎解决问题。有一个叫李承训的宦官自告奋勇，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手探入虎口，一把将骨头拽了出来。全程干净利落，李承训本人也丝毫没有受伤，这身手，称一句“虎口无影手”也不为过。

在这群宦官里，还有几个会“轻功”的。有一次，宋太祖到五凤楼闲逛，发现东南角楼顶端的鸱吻上落着一只鸟。太祖对左右的宦官们问道：“有谁能把这只鸟抓到？”一位名字失载的宦官当即收好衣角，翻出楼阁，小心翼翼地在楼顶上攀缘挪动，最后一把抓住了落在鸱吻上的小鸟。这位宦官的轻功，不比武侠小说里的凌波微步、神行百变差。

这些身手敏捷、飞檐走壁的人，真的是宦官。宋太祖身边养了这么一群身手了得的宦官，不得不让人把他们跟武德司的特务工作联系起来。而现在，武德司的老大也换成了宦官。

在完成这一“重大变革”之际，宋太祖神秘离世。新即位的赵炅号称要继承他哥哥的治国方略。其他方面不好说，但是在继承宦官职掌特务机构方面，他确实没有说谎，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皇位多少有点来路可疑，因此赵炅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派遣大量隶属于武德司的武德卒到地方去搜集官员和老百姓的情报，企图监视臣民，控制舆论。

这种做法马上遭到士大夫的群体抵制。忠武军观察判官张观算是比较温柔的，他上书朝廷，劝赵炅悬崖勒马，不要派大内密探扰乱地方秩序。靠拳头打出来的状元王嗣宗就没这么好脾气了。王嗣宗时任知汀州，有一天，他见到大街上有武德卒，竟然二话不说，

上来就把这些人绑了，乱棍痛打一气，然后将他们送往开封，还不忘上奏赵炅说：武德卒不讲武德，陛下“好自为之”！（原话为：“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而猥信此辈为耳目，窃为陛下不取！”）

前面说了，武德司本来就是皇帝个人性质特别强烈的机构，现在又是宦官职掌，所以很快名声就臭大街了。到了太平兴国六年（981），赵炅迫于压力，不得不将武德司撤销，以表示不会因私废公。难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宦官职掌的特务机构就此消失了？

并没有！

当时还有一个机构叫皇城司，在宫廷保卫方面，职能与武德司差不多。武德司撤销后，它过去的特务职能被合并入皇城司。名义上，皇帝私人的武德司变成了大宋王朝的皇城司；而实际上，武德使变成了勾当皇城司公事（勾当皇城司公事为皇城司实际负责人），武德卒变成了皇城卒。宦官依旧掌管这一机构，特务们依旧横行，只不过这次不是以皇帝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大宋朝廷的名义。

伤害性极大，欺骗性极强！

这些皇城司的特务从军队到民间几乎无孔不入，而且在后来的历史中，特务活动愈演愈烈。

比如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桑达等几十名禁军士兵喝高了，借着酒劲打架斗殴。结果打急了眼，大骂起仁宗来。皇城司探知此事，立马抓了这一群大兵送到开封府衙门，处以弃市的极刑。

不仅军人说错话要掉脑袋，老百姓说错话，也会被皇城司的人带走。宋神宗推行熙丰新法时，新法自然成了百姓们的时髦话题。可是神宗却派遣了大量皇城卒在开封城的大街小巷游荡，探听路边上的人们都在谈些什么。只要有人说新法不好，这个人就立马被皇城卒抓走。

当时宋朝推行保甲法，要求老百姓平时要购买弓箭，参加日常军训。老百姓又要出钱，又要出力，还没自由，自然要吐槽。结果

又被皇城卒发现了，汇报给神宗。神宗立马让开封府调查此事……

总之，只要特务横行，老百姓就只能闭嘴。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号称政治相对开明、言论相对开放的北宋时代。

其实，就特务活动的危害性而言，压制舆论倒还在其次，更为要命的是，无论是早年的武德司还是后来的皇城司，它们都是不接受台谏系统监督的，它们都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换句话说，对皇帝负责，就是对朝廷、官民、法律一概不负责。皇城卒掌握了不受监督的权力，后果可想而知。

敲诈勒索算得上是皇城卒的工作常态。有些皇城卒亲自到官员那里索贿，不给钱就诬告。有些皇城卒甚至跟黑社会勾结。当时开封有一对董氏父子，是出了名的地痞无赖。他们暗中与皇城卒勾结，专门打探别人的隐私，再以此敲诈钱财。开封城里的官民对这对父子和他们背后的皇城司都怕得要命，背地里就管董氏父子叫“小虫大虫”。

董氏父子的经验说明，只有勾结皇城司，黑社会才有前途。但是，并不是每个黑社会成员都能成功勾搭上皇城司。于是，大量够不到皇城司的地痞无赖索性宣称，自己的背后是皇城司，甚至公开称自己就是皇城卒。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少官民都向这种狐假虎威的伪皇城卒交了保护费。在皇帝的卵翼下，大宋朝养了一群恶棍。

既然皇城司手握大权，自然在官场上也不会消停。宋仁宗初年，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宦官罗崇勋势焰熏天。有一次，罗崇勋向陈留县索要官田，知县王冲不从。罗崇勋便指使皇城卒诬告王冲，导致王冲被流放雷州。宦官牵头皇城司，然后由皇城司与司法部门勾结炮制冤假错案，这种事情在北宋简直数不胜数。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士大夫们的不断抗争中，皇城司的活动范围终于从全国缩小到首都地区。淳化三年（992），皇城司私下派皇城卒到开封府的属县去探事，自然又把官员和老百姓搞得鸡飞狗

跳。雍丘县尉王彬实在看不下去了，立马带人抓了皇城卒，拿到了他们索取贿赂的证据，全部法办。赵炅这才下令，要求皇城卒不得出开封城。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但是首都开封的人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只要皇帝兴起，皇城卒依然可以冲破开封的城墙，到皇帝想让他们去的地方。

在恶评如潮中，皇城司也和武德司一样，面临着解散撤销的问题。这一次，限制皇城司活动的是宋徽宗。不过，徽宗深得乃祖赵炅的真传，皇城司虽然消停了一段时间，宦官掌握的特务系统却从未被正式取代。这样，到了南宋，皇城司就轻而易举地死灰复燃了。

在专制乃至独裁的帝国里，特务机构从来都是皇帝的走狗。

不过平心而论，皇城司也不是完全不务正业。比如皇城卒会监察国库，防止官员贪污；考察各地民情，严防地方官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甚至还负责抓间谍。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八月，皇城卒就从一个叫沈吉的人口中探知，商人张化是辽朝间谍。皇城司当即捕获了张化，沿着这条线索大加考索，牵连甚广。

皇城司还是一个统领禁军的部门。早在太祖朝的武德司，就设有亲事官部队；到了赵炅时，又从亲事官中选拔精锐，组成亲从官。北宋末年，皇城司的禁军编制已超过7000人。但据太祖说，宋初的武德司实际上有数万之众。这些部队负责保卫皇宫，殿前司、侍卫司完全不得插手。这应该是宋太祖吸取了陈桥兵变中，石守信率殿前军封锁皇宫，后周毫无还手之力的教训。

但无论皇城司干了多少正事，它终究只是效力于皇帝私人的机构，是皇权的延伸。一旦皇权做大，士大夫中的高尚官员控制不了场面时，那些所谓的“正事”必然淹没在特务横行的罪恶之中。

路级制度的形成

宋太祖时期，削藩三策基本完成，藩镇辖下的支郡不断被改隶朝廷。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太祖去世、赵炅（赵光义）继位后的第二年，节度使支郡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

这事与两位重量级人物有关，一个是曾任宰相的赵普，另一个是太祖与赵炅的舅舅杜审进。

太祖晚年，赵普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以孟州为会府，下辖支郡为孟、怀二州。

由于赵炅曾与赵普势同水火，因此在继位后，他特意委派与赵普关系不佳的高保寅知怀州，希望通过高保寅来牵制赵普。然而，高保寅到任后，不但不能掣肘赵普，反而被赵普穿了小鞋。一气之下，他索性上奏赵炅，请求废除藩镇统领支郡的制度。赵炅虽然没有骤然废除支郡，但还是将怀州改为朝廷的直辖州。

怀州“支”改“直”事件，成为新的风向标，首先捕捉到风向的是虢州刺史许昌裔。虢州是保平军的支郡，许昌裔上奏称，赵炅的舅舅、保平军节度使杜审进有许多工作失误。赵炅随即派右拾遗李瀚前去巡视，李瀚汇报称：“节度使统领支郡，多任用亲信官吏掌管关津、市场，这非常不利于商业贸易，致使天下的货物流通不畅。希望陛下不再让节度使统领支郡，这也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强干弱枝的办法。”

这年八月，赵炅接受李瀚的建议，正式下诏将全国18个节度使的近40个支郡改为朝廷的直辖州。

至此，节度使统领支郡的制度被彻底废除，宋朝彻底完成了稍夺其权的任务。整个过程用了14年，竟然没有引发一场藩镇节度使的叛乱。可见，宋太祖的渐进策略发挥了巨大作用。

支郡制度被废除后，宋朝急需建立新的地方制度。在中央日朝制、二府三司制逐渐确立的同时，地方制度也按照“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逐渐完善定型。

宋朝名义上的地方官府仍然为州、县两级。州级行政区包括府、州、州级军（军事要塞）和州级监（矿冶、铸钱、产盐区），长官分别是府尹或知府、知州、军使或知军、知监，副长官为通判。

县级行政区包括县、县级军和县级监，长官分别是县令或知县、军使、知监等。县中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的地区设有镇，军事要地设有寨，工矿区设有县辖监。

在朝廷与州级政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路”级辖区。这又是什么性质的辖区呢？

赵炅罢废支郡制度后，全国300多个州直隶朝廷，如何保证州级官府的行政效率和治理水平成了新的难题。赵炅的对策是，赋予转运使对州级长官的监察权。到了至道三年（997）赵炅去世时，全国已正式划分为15个路；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全国增至23路；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又增至24路。

路级的派出机构种类颇多，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

漕司全称转运使司，是最早设置的路级机构。长官转运使握有一路的财政、司法、监察大权，唯独缺少行政权。不过赵炅以降，往往视转运使为一路行政长官，把它当作州、府长官的上级。

宪司全称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主管一路司法事务。赵炅时，提点刑狱尚为转运司附庸；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设提点刑狱司，提点刑狱公事成为一路最高司法官员，转运使的司法权被分离。

仓司全称提举常平司，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成为独立的路级机构，长官为提举常平，负责一路的救济、水利、茶盐等事务，时设时罢。

漕司、宪司、仓司分别掌管地方大区的财政、司法、救济事务，同时还负有监察州县官吏的职责，因此这三个路级机构又统称监司。

帅司全称安抚使司，长官安抚使本来是为赈灾或用兵而临时委派的专员，到真宗以后，逐渐成为专治一路军政和治安的长官。有意思的是，安抚使负责军事，却往往是文官，由帅司所驻州府的知府或知州兼任。

一路之内，漕、宪、仓、帅四司并立，互不隶属，甚至连驻地、辖区都不同。监司之间互相监察，帅司与监司之间互相监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结构，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的死灰复燃，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二、重归一统

灭亡北汉

赵炅即位时，天下基本完成统一。《平边策》所提及的地区内，仅剩下吴越、泉漳、北汉以及辽朝占据的幽燕。

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吴越国王钱俶再度派儿子钱惟演进贡修好，并祝贺赵炅登基。不久，吴越国王妃孙氏去世。赵炅命程羽前去吊祭。临行前，赵炅对程羽说："这次去吴越，顺便看看那里的动静。"

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钱俶入朝。赵炅在长春殿赐宴。和当年的宋太祖一样，赵炅也是一脸笑容，跟钱俶叙叙旧，看起来很亲近。

可是“尽我一世”的宋太祖已经驾崩了，眼前这个赵炅，大家都说他把亲哥哥杀了，那我还留得下吗？钱俶害怕。

更令他害怕的事接踵而至。

当时在吴越国南边，还有一个割据泉、漳二州的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史称“泉漳”政权。就在钱俶入朝一个月后，陈洪进也来了，而且干脆在四月二十五日献出2州12县，[1]151 978户民户。这意味着，整个南方，就只剩下他吴越一家了。

卧榻之侧，就只剩下他钱俶。钱俶急忙把带来的兵器全部献上，接着又上表，请求免去封号，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务，并且收回诏书不题名字的诏令。钱俶情愿解甲归田，只要能回去。

对于钱俶的请求，赵炅置之不理。

万般无奈之下，钱俶只好上表向太宗献土。五月一日，宋再得13州1军、77县，[2]550 608户民户。

献土后，陈洪进受封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留在了京城开封，活到72岁。他的两个儿子陈文显、陈文灏留在当地，成为大宋在泉州、漳州的知州。

钱俶一度被封为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国王”与“王”不同，本来是仍然有土地、臣僚，有相对的独立性。可在混元一统的大宋，“国王”与“王”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国都没了，还要国王的虚名有什么用？钱俶辞掉了国号，于是又被封为许王，后来进封邓王。端拱元年（988）八月二十四日，钱俶六十大寿，赵炅遣使祝贺。当夜，钱俶暴毙。

而就在吴越纳土那年的七月七日，钱俶的老对头李煜早已离世，享年42岁。

---

[1]《长编》所记其版籍所录州县数为2州14县，此处据当时实际情况对数据做修订，参见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

[2]《长编》所记其版籍所录州县数为13州1军86县，此处据当时实际情况对数据做修订，参见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

南方政权全部扫平，北汉灭亡的命运，再也躲不过去了。

早在开宝九年（976）八月，赵匡胤就曾分兵五路，直捣太原。只是由于两个月后赵匡胤的突然驾崩，北伐戛然而止。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皇位已经稳固的赵炅，终于耐不住性子，打起了北汉的主意。二月，一辈子没打过仗的赵炅，像他哥当年一样，正式御驾亲征！为了攻灭北汉，除了石守信和曹彬，赵炅几乎调来了当时最能打的一帮人。

毕竟，有太祖朝一众经验丰富的武将，有太祖朝合围太原、打退辽朝援军的现成打法，面对早已在太祖朝被虐得体无完肤的北汉，赵炅只要依样画葫芦，宋军取胜已经十拿九稳。

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保宁十一年、汉广运六年（979）三月，宋军主力途经河北，正式攻入北汉境内。十六日，宋将郭进在白马岭大破辽军，辽军将领冀王耶律敌烈父子、南府宰相耶律沙的儿子们全部阵亡。要不是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的援军及时赶来，耶律沙也在劫难逃。

辽军一破，接下来的事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完全就是宋太祖亲征的翻版。

北汉被揍得迅速龟缩回太原城，宋军在城外围起长连城。汉军箭如雨下，宋军玩命攻城。然后辽军败报送入太原，刘继元与全城军民泄气。

赵炅也一改文质彬彬的气质，披坚执锐，亲自冒着石林箭雨冲上前线，指挥战斗。左右大臣赶紧阻止，赵炅却毫不畏惧，凛然说："将士们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去玩命杀敌！我怎忍心坐在一旁观看，无动于衷！"说完，又冲了上去。

那些早年跟随太祖南征北战的将士，仿佛看到了熟悉的身影。没有人再对这位没上过战场的皇帝怀疑。

各营将士听闻皇帝身先士卒，不惧艰险，士气高涨，一个个更不怕死了。李汉琼脑袋上挨了箭，还在顽强战斗。最后赵炅生生把

他召了回来，抬进御帐，亲自敷药，感动得李汉琼热泪盈眶。

尽管太原城的城墙依旧坚固，但是太原人心里的城墙却开始坍塌。

五月五日，绝望的刘继元请降，次日开城纳土。刘继元被授命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带着潘美入城，接收太原，以及北汉统治下的1府9州、42县2监，[1]35 220户民户。

夏州之乱

无论是吴越与泉漳的纳土，还是对北汉的军事讨伐，虽然完成于赵炅时期，但实际却奠基于太祖时代。真正属于赵炅自己手笔的，是夏州纳土与经略幽燕。

可惜，这两大手笔都以失败告终。

夏州的定难军政权，是日后成为北宋西北边患的西夏的前身，由党项族建立。党项族一说源于羌族，一说源于鲜卑，在南北朝后期（6世纪后期）才崭露头角。唐中和元年（881），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氏，以夏州为会府。从此，党项李氏世袭定难军节度使，建立起割据政权，统辖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后又增设静州）。唐朝灭亡后，定难军和当时许多小政权一样，对中原的五代王朝和继之而起的宋朝称臣纳贡。赵炅亲征北汉时，定难军甚至派出军队，以壮宋军声势。

太平兴国五年（980），19岁的李继捧成为新一任定难军节度使。由于他太年轻，难以服众，李氏族人掀起叛乱。到了太平兴国

[1]《长编》所记其版籍所录州县数为10州1军41县，此处据当时实际情况对数据做修订，参见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

七年（982）五月，焦头烂额的李继捧实在觉得自己难堪大任，索性主动入朝献土，表示愿意取消定难军这个半独立的割据政权，自己就留在京师开封了却余生。

赵炅大喜过望，毕竟当年对吴越、泉漳这两个小政权，也是通过和平献土来完成统一的。赵炅立刻批准了李继捧的请求，对党项李氏家族的主要成员一一加官晋爵，随即派出使者进入定难军，发遣李氏族人进京。

可赵炅错估了定难军的形势。首先，当年的钱俶和陈洪进，对吴越和泉漳有绝对控制力，而李继捧却根本控制不了定难军的局面，换句话说，他入朝献土，不代表宗族内部其他人一定会老老实实跟着去开封。其次，吴越和泉漳都是临海的政权，面对强大的宋朝，他们缺乏战略纵深，只能献土。定难军却不同，作为一个紧邻沙漠的内陆政权，有的是打游击的机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定难军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好勇斗狠，对宋朝也没有那么强的向心力。

因而，眼看定难军政权被取消，李继捧的族弟、管内都知蕃落使李继迁大为不满。李继迁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三百多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现在朝廷把我们宗族全迁到京师看管起来，生死大权都在别人手里，李氏这是要绝嗣了！"其弟李继冲也认为："虎不能离开深山，鱼也不能离开深潭。我看不如趁着夏州没有防备，我们杀掉宋使，占据绥、银二州，大事可成！"谋士张浦却认为，夏州很难守住，不如暂时北走沙漠，积蓄力量，看准时机再卷土重来。

最终，李继迁采纳了张浦的谋略，带着家族亲信数十人，逃到了夏州东北三百里外的地斤泽，以此为根据地，招兵买马，联合大姓，不断侵扰宋朝的边境。

正是这几十人开创的基业，困扰了北宋近一个半世纪。

雍熙二年（985），李继迁一举攻下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

次年对辽朝称臣联姻，受册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到了淳化元年（990），李继迁更被辽朝封为夏国王。之所以封为“夏国”，与定难军节度使以夏州为会府有关。而日后西夏立国，国号也由此而来。此后，李继迁充分利用宋辽的对立关系，时而联辽，时而附宋，在两大强国的夹缝中纵横捭阖。

赵炅决心彻底消灭李继迁。他一面对李继迁实行经济封锁，一面派李继捧坐镇夏州招抚李继迁。可由于宋朝不再进口银州出产的青盐，反而导致关陇地区的宋朝百姓没盐吃，而李继捧更是暗中与李继迁勾连。没奈何，赵炅最后只好再度诉诸武力，亲自部署五路大军进讨李继迁。结果，宋军还是老问题，缺乏协同，步调不一；西北地区又地势险恶，宋军粮运不济；加上李继迁熟悉地形，神出鬼没，宋军愣是连党项主力都没找到，只得在疲惫不堪中无功而返。

至道三年（997），赵炅在遗憾中去世，李继迁遣使求和。新即位的宋真宗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将已经控制了十五年的夏银绥宥静五州交给他，希望与定难军的关系恢复到李继捧献土以前的状态。可李继迁从中嗅出的味道，却是宋朝的软弱无能。于是，他将矛头指向了西北重镇灵州。从这一刻起，李继迁从“收复故土”，走向了“开疆拓土”。

灵州位于夏州西侧，地处要冲，是由夏州进入河西走廊，进而掌控丝绸之路的关键。而对于宋朝，失去灵州不仅意味着痛失西北边防重镇，更意味着与河西地区的马匹贸易将受制于党项，从而可能引发战马缺乏，而战马又是与辽朝作战的重要战略物资。

然而，灵州地区赋役繁重，当地百姓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李继迁又是势在必得。包括“圣相”李沆在内的不少人认为，以宋朝目前的状态，根本守不住灵州。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发动第三次灵州之战。宋朝派出六万大军支援，可援军尚未到达，灵州就失陷了。

攻克灵州后，李继迁声势大振。他将灵州改名西平府，作为自己新的都城，随后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次年十一月，李继迁攻占由吐蕃六谷部控制的河西重镇西凉府，并改名凉州，由此志骄意满，中了吐蕃人的埋伏，身受重伤，后来凉州也得而复失。景德元年（1004）正月，李继迁因伤重去世，其子李德明（因宋朝赐姓赵，又称赵德明）继位。

李继迁临终前，遗命李德明与宋朝重归旧好。这是因为，李继迁常年征战，夏国虽然在军事上屡战屡胜，可在经济上却陷入困境。而就在李继迁去世的这年年底，宋辽缔结了澶渊之盟，由敌对交战转变为友好和平。夏国外失强援，内有忧患，李德明不得不考虑偃旗息鼓，休养生息。

而北宋在同辽朝复和后，也开始对夏国采取“姑务羁縻，以缓战争”的方针，希望用类似的方法解决西北边患。景德二年（1005）春，宋朝迫不及待地主动向夏国提出议和。双方经过反复地讨价还价，正式于景德三年（1006）九月签订和约。李德明向宋朝称臣，宋朝任命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还赐给他银1万两、绢1万匹、钱2万贯、茶2万斤。与此同时，李德明继续向辽朝求封，并于辽统合二十八年（1010）受封夏国王。

李德明和宋、辽修好的做法，为夏国创造了绝佳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夏国大力恢复发展经济，并依靠对外贸易积聚了大量财富，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提高了党项人的物质水平和精神生活。

在稳住宋辽两大国的同时，李德明继续不失时机地开疆拓土，经略河西。天圣六年（1028），夏国攻灭甘州回鹘，占领甘州；十年（1032），又重夺凉州。夏国的蒸蒸日上，使李德明有了称帝的野心。他迁都兴州，大建宫室，使用皇帝的礼仪，又册立李元昊为太子，追尊父亲李继迁为皇帝。

只不过，为了经济利益，李德明仍然对宋朝虚与委蛇，这引

起了太子李元昊的不满。李元昊能征善战，甘州和凉州都是他打下来的，他早就对对宋称臣耿耿于怀了，认为这样不利于党项人的团结。李德明却告诫他："我常年用兵，太疲惫了！我族人能在三十年里穿着绫罗绸缎制成的衣服，这都是宋朝的恩德，我们不能辜负宋朝。"李元昊却辩解说："穿着皮毛做的衣服去放牧，这是我们蕃人的本性，英雄一世，就应该称王图霸，哪用得着穿绫罗绸缎？"

李德明在统治党项夏国29年后，于天圣十年（1032）十月去世。满脑子雄图霸业的太子李元昊继位，这标志着近30年的宋夏和平即将走到尽头。六年后，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为夏。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经略幽燕

尽管赵炅的"黑历史"俯拾皆是，但最遭人诟病的，还是他经略幽燕的失败。

尽管宋辽缔结了雄州和议，但其创造的和平对峙十分不稳定。宋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幽燕地区的归属，雄州和议只是搁置了双方的争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宋朝要收复幽燕、完成统一，辽朝要保有幽燕、维持现状，两国存在根本冲突。

前面说过，宋太祖本来分别制定了文统和武统两个收复幽燕的战略。然而，开宝九年（976）十月，随着宋太祖驾崩、赵炅继位，文统战略被束之高阁。赵炅毫不犹豫地废弃了雄州和议，选择了武统。

因为在五代的军事信念面前，赵炅别无选择。

军事信念，是一种在过去的实战中积累起来的战斗经验，人们往往认定这种经验是正确的。

宋朝距五代不远，战略战术深受五代时期军事信念的影响。因此，宋初的战争，往往是五代式的。五代军事信念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习惯使用战略奇袭，另一个是皇帝经常直接指挥作战。

五代时期，军人尚武，要获得他们的拥戴，皇帝必须英勇过人。因此，新即位的皇帝往往要率军亲征，在取得军事胜利后，才能镇服军队，坐稳皇帝宝座。

以宋太祖在后周禁军中的威望之高、职权之重、基础之牢，在宋朝开国之初，尚且要亲自上阵平定二李之乱，就更别提从未亲自指挥过军队的赵炅了。加之赵炅的皇位本来就遭人非议，他就更急需按照五代传统，亲自指挥军队收复幽燕，在军中树立威信，特别是超越其兄宋太祖的威信。这是赵炅毅然决定武统幽燕的深层原因。

鉴于军事经验过于不足，赵炅比五代时期的许多皇帝更加依赖当时的军事信念。赵炅决定仿照五代的常规作战方法，以战略奇袭拿下幽燕。

战略奇袭，就是对敌方的核心地带发动突然袭击，使敌方猝不及防，从而在短期内彻底击溃敌方。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赵炅领兵亲征北汉。尽管辽朝照例出动大军救援，但由于北汉在宋太祖的持续打击下早已濒临亡国，加之赵炅照搬了太祖较为成熟的伐汉战略战术，因而战争比较顺利。五月，十国最后一个政权北汉被宋朝消灭。

近半年的战斗刚刚结束，宋军师老饷乏，将士们正等待息兵休整、论功行赏，没想到赵炅马上提出奇袭幽燕的设想。据官方档案称，当时绝大多数将领最初并不愿立即北伐，只是不敢公然反对罢了。

但在宋朝私人著述里，情况却大不相同。五代士兵向来希望多打仗，这样就能多立军功，从而获得皇帝更多的赏赐。平灭北汉后，将士们求赏心切，私下里都在讨论继续伐辽，只不过没人敢贸

然去找赵炅奏报。

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时公开支持赵炅伐辽的，只有殿前都虞候崔翰。崔翰指出："进军幽燕要一鼓作气，不能等到休整以后再起兵。现在我军乘着灭汉的破竹之势突袭辽国，攻取幽燕易如反掌，不能错过这样的天赐良机！"

崔翰的乐观并非全无道理，当时宋军奇袭幽燕，具备两个优势。一是有了雄州和议，辽朝绝想不到宋军会来袭击自己。二是刚刚消灭北汉的宋军，是好不容易征调出来的，此时不用，将来北伐集结人力物力，又得从头再来，耗时费力，还容易暴露。而现在，只要粮草能够及时运到幽州，这场战役就可以达到突袭的效果。

在崔翰的支持下，赵炅亲率十万大军从太原出发，迅速向河北集结。六月十三日，赵炅从镇州督军北上，正式发动战争。

十九日夜间，宋军先锋部队在孔守正等人率领下，突袭辽朝边镇岐沟关，辽易州刺史刘禹（一作刘宇）降。次日凌晨，正当孔守正忙着接收岐沟关时，赵炅已率主力部队乘夜色急速过关，以至于孔守正在安排好关内驻防后，不得不带着"先锋"向前去追赶主力部队。由此可见宋军精锐部队的突进势头。

孔守正追上赵炅主力后，再度成为先锋。他与另一位将领傅潜会合，在涿州城东的沙河一线，正遇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等人率领的仓促赶来阻击的辽军。孔守正与傅潜分军突进，大破辽军，乘胜追杀20里，生擒辽兵500余人。第二天，赵炅路过战场，眼见辽军尸横遍野，大为赞叹。涿州判官刘原德遂举城而降。

士气高涨的宋军继续突进，赵炅本人也锐气十足。他亲率将士，位居全军最前列，大军直抵桑干河。为了加速行军，宋军没有从狭窄的桥梁过河，而是在赵炅的带领下，直接下水渡河。

二十三日天亮前，赵炅已率主力抵达幽州城下，此时距离宋军出境才四天四夜。

辽朝也并非对宋军的行踪全无察觉，但辽景宗起初并不相信宋

朝会撕毁雄州和议。直到二十日，正在避暑游猎的景宗才确认宋军真的入境了。可短短几天，景宗根本来不及派出主力增援。

幽州城内更是一片混乱。辽南京留守韩匡嗣正好不在城内，其子韩德让以权知南京留守事身份代理其职，日夜守御待援。耶律奚底率领的一万残军退回后也不敢进城，一路跑到城北。赵炅急命宿将马仁瑀率军突击，寡不敌众的耶律奚底再度大溃，辽军被斩首千余级，被迫退至更北面的清河一带。

二十五日，辽将耶律学古率领第一支援军进入幽州，协助韩德让守城。不久前曾入援北汉的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也率军从山后地区赶来，正遇到被穷追猛打的耶律奚底。眼见宋军锐气正盛，耶律斜轸不敢硬战，便打出耶律奚底的青色旗帜，退至地势险要的得胜口，以引诱追击的宋军，从而使耶律奚底摆脱覆灭的危险。宋军果然上当，直追耶律斜轸。斜轸趁机绕到这支宋军的后方，发动突袭，大破宋军。

得胜口之战，对当时的战局无足轻重，但它暴露了宋军轻敌浪战的弱点。而辽军控制了得胜口这座燕北要塞，也就控制了入援幽州的孔道，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不久，另一支先前从北汉战场退下来的辽军，在耶律沙的率领下通过燕北要塞，加入幽州战场。

赵炅对此并未有所警觉。得胜口之战后，耶律斜轸拒险自守，只能对幽州遥为声援。赵炅谓斜轸兵力寡少，不足为虑，便不再争夺得胜口，而自领主力全面部署围城。

赵炅命大将宋偓（即太祖宋皇后之父宋延渥）、崔彦进、刘遇和孟玄喆分别从南、北、东、西四个方向统兵六七万围攻幽州；同时以潘美知幽州行府，总领军政。在幽州东南面，赵炅还部署了一支万余人的预备队，由宿将曹翰、米信率领，“以备非常”。赵炅把前线指挥部设在城西的宝光寺，但他自己却时常往来于幽州城外的不同方位，到主攻部队中亲自督战。

宋军不惜伤亡，连日攻城。大军围城三周，上有炮石纷飞，下

挖地道穿城。在猛烈的进攻中，宋军一度有300余名将士登上幽州城头，几乎就要攻克幽州，取得最后胜利。

而辽朝的援军虽然陆续抵达幽州，但兵力分散，无法在城下集结，只能退缩到外围，这使宋军完全掌握了战役主导权。不仅幽州被宋军围得如铁桶一般，附近其他州的辽朝守将也纷纷率部降宋。一般军民特别是汉人更为踊跃，甚至有些幽州百姓带着牛和酒到前线去犒劳宋军。赵炅的军事突袭产生了强烈的政治效果，辽朝在幽州地区的统治近乎土崩瓦解。辽廷上下，甚至有不少人主张放弃幽州，退守燕北要塞。

可见，奇袭能够成为五代宋初最流行的军事战略，确实有它的可取之处。五代时期，藩镇和割据政权的体量都不大，能够调用的战争资源十分有限；军队的士气也不稳定，特别容易受政局的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在战役中遭受失败的一方，很难再继续组织强烈的抵抗。特别是对地方的政治中心发动突袭时，敌方一旦失败，就再无挽回的余地。

但辽朝却不同，它的国土广阔，有强大的兵力和足够的资源，特别是得胜口等燕北要塞均掌握在辽朝手中，这使它不会像五代政权那样被一击毙命，而有机会重夺战役主动权。奇袭的战略效果因此遭到削弱，宋军的军事风险正在增加，这就要求赵炅在接下来的指挥中，必须用更高妙的战术速战速决。

可惜，赵炅对此毫无察觉，他接连犯下的两个战术错误，葬送了整场战役的大好前程。

六月三十日，辽景宗决定全面反击，向耶律沙、耶律奚底和萧讨古下达军事部署。惕隐（掌管皇族事务的官员）耶律休哥主动请缨，景宗命其代耶律奚底为帅，率5000精锐骑兵入援幽州。

七月初，由耶律休哥率领的援军进抵幽州外围，耶律抹只率领的奚族兵也同时到达。六日，耶律沙率军会同萧讨古部，自清河向幽州城挺进，于高梁河遭遇正在城西北督战的赵炅。赵炅亲率宋军

精锐迎战，双方激战至黄昏，辽军渐渐不支，节节败退。

正当赵炅血战耶律沙时，耶律休哥却趁机会同耶律斜轸和耶律抹只，率精骑三万从西面的山中小路，绕到了宋军后方。这是赵炅犯下的第一个战术错误，他忽略了对山路的防范，给耶律休哥创造了可乘之机。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因为即便耶律休哥从后方发动偷袭，依然可能遭到宋军截击。赵炅在围城之初部署的曹翰预备队，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突发事件。可赵炅却犯了第二个战术错误，他为了早日占领幽州，竟将曹翰的预备队派去攻城。

耶律休哥再无阻碍，他与耶律斜轸分为左右两翼，从宋军后方发动猛攻。本已败退的耶律沙也调转矛头杀了个回马枪。在三路大军夹击下，已经疲惫不堪的宋军将士彻底崩溃。

混战中，赵炅大腿被射中两箭，身负重伤，当夜便丢下幽州城下的大军不顾，仓皇南逃。由于伤势过重，赵炅无法骑马，被迫坐着驴车一路狂奔。同样因受重伤无法骑马的耶律休哥，则在后面驾着马车一路狂追。最后，终究是赵炅早跑一步，逃出生天。赵炅也因此，被今天的许多网友戏称为“宋车宗”和“高梁河车神”。

幽州城下，失去皇帝的宋军立刻陷入混乱，将士们一度打算拥立尚在军中的赵德昭为帝，后来得知赵炅的去向，方才作罢。

天亮后，辽军对留驻在幽州的宋军发起反击，士气低落的宋军匆忙撤围溃逃，一路上丢盔弃甲。城中的耶律学古见状，命军民擂鼓助威，开城列阵，与城外辽军里应外合，大破宋军。至此，赵炅发动的第一次经略幽燕之役，以宋军在高梁河的惨败草草收场。

此役之后，宋人不再迷信五代时期的战略奇袭。在战场上死里逃生的赵炅，再也没有亲自走上战场前线。五代时期的军事信念自此瓦解，高梁河战役也成为最后一场五代式的战争。

宋军在高梁河战役中损失过万，但主力精锐仍在。此战最大的后遗症，不是宋军兵力损失，也不是宋军不敢打了，而是宋军的

指挥系统产生了问题。赵炅虽然不再亲上前线，但也不肯把军队全权交给将领。于是他索性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从作战战略和战术的制定，到战区内部各部队的战略协调，甚至到部队具体的布阵方法，所有细节都在赵炅的把控之下。

高梁河战役结束不久，辽军便对宋朝发动报复性进攻，并与宋军大战于满城和瓦桥关。这两场战役全面暴露了宋军新指挥系统的巨大缺陷。

当年九月，辽朝派出十万大军南征，宋朝也调动至少八万军队在满城一带布防。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宋军在布阵时却遇到了问题。依据赵炅的最新指示，宋军将领布阵的依据并不是战场的实际情况，而是由远在570公里以外，又根本不擅长打仗的赵炅颁赐的阵图。按照阵图排阵后，各部队之间相隔过远，极容易被辽朝骑兵分割冲散，然后再分别消灭。所以宋军士兵非常恐惧，还没开打，已经丧失了斗志。

尽管在满城前线，云集了刘廷翰、赵延进、崔翰、李继隆和李汉琼等重将，但赵炅并没有任命主帅。遇到这种棘手情况，大家谁也没有指挥别人的权力，谁都不能拍板做决定，只能商量着来。

赵延进登高望远，眼见着辽军骑兵蜂拥而来，忙向崔翰建议："主上将边事托付给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克敌制胜。现在敌骑浩浩荡荡，我军却阵如星布，差距太悬殊了。如果敌军发动进攻，我军如何能抵抗？不如把军队聚集起来，合力抗击，这样还能取胜。就算我们违抗了命令，但取得了胜利，这不比丧师辱国强多了！"

崔翰也知道赵延进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他仍然下不了决心，反问道："万一不胜，谁来负责？"

赵延进当即表态："如果兵败，我赵延进一人做事一人当！"

另一位将领李继隆（李处耘之子）也表示："用兵贵在因时而变，怎么能预先设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自承担！"

在赵延进和李继隆的力争下，众将终于达成共识，改而排列更

加有效的阵型，这才一举击破了辽军的进攻。

赵炅对前线的战术干预，险些导致宋军在满城会战中战败。但宋军并非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在瓦桥关会战中，赵炅的战略遥控就致使宋军伤亡惨重。

宋太平兴国五年、辽乾亨二年（980）十月，辽景宗率军亲征瓦桥关。瓦桥关附近集结了多路宋军将领的部队，但彼此依旧互不统属，谁也无法调动别人的部队。能够把控全局、协调各路部队的，依旧只有赵炅本人。赵炅对外号称亲征，却始终躲在后方，没有真正到达前线。

前线主帅缺位，导致宋军的各路人马各自为战，无法配合。辽景宗始终掌握着战略主动权，而宋军却一直落后于战局的发展。尽管宋军发起了四次冲击，顽强作战，却屡次被辽军击败。最后，靠着宋军将士的英勇无畏，辽军总算撤兵北返。然而，此刻的宋军，已是伤亡惨重，尸横遍野。

高梁河战役的失败，除了带来遥控指挥的问题，还促使宋朝高层转而支持内政主导的战略。这一战略认为，应通过优先发展内政来增强综合国力，然后以国力上的优势来决定北伐幽燕的时间。

但是，由于执行的过程层层脱节，内政主导战略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赵炅发动的第二次经略幽燕之役，甚至比第一次输得还要惨。

瓦桥关会战结束后，史官张齐贤上疏，提出“人民本也，疆土末也”的观点。宰相李昉也劝赵炅不要急于进攻幽州，现在应该养精蓄锐，等到实力充足，有把握取胜时，再对辽用兵。这些以内政为主导的言论，代表了宋初许多文臣的观点，赵炅对此也基本接受。

内政主导战略明显继承和发展了宋太祖的战略思想。与宋太祖当年重视经济的“先南后北”战略相比，以“先本后末”为代表的内政主导战略更加清晰明确地将和平置于统一之上，试图以和平促

进统一。

但与更注重军事的先南后北战略相比，内政主导战略的实践要困难得多。

按照内政主导战略的要求，宋朝应该休养生息，使国力凌驾于辽朝之上，降低后续战争的军事风险。可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

在宋辽短暂的休战期间，辽朝扫平了东北地区不服从自己的部族，进一步解除了后顾之忧。赵炅却只是忙着巩固个人权力。他逼死了侄子赵德昭，废黜了弟弟赵廷美；打压以宿将曹彬为代表的宋太祖生前的心腹将领，在朝中大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宋朝的社会经济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休战反而让局面对宋朝更加不利，文臣们一致反对短期内再对辽用兵。

然而，赵炅和他的亲信们，却错把个人皇位的稳固，当成了宋朝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辽乾亨四年（982）九月，辽景宗耶律贤去世，新即位的辽圣宗耶律隆绪不过是个12岁的毛孩子，大权掌握在承天太后萧绰（也就是杨家将故事里的萧太后）手里。这让赵炅和亲信们错误地认为，辽朝主少国疑之际，正是自己用兵之机。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三月，赵炅索性撇开文臣，也撇开了内政主导战略，单独和心腹近臣谋划，发动了第二次经略幽燕之役，史称雍熙北伐。

按照赵炅的构想，宋军分成东、中、西共三路大军北伐辽朝。东路军共10万人，由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曹彬统率，是北伐主力。开战之初，东路军假装进攻幽州，但行军务必缓慢，目的是将辽军主力牵制在山前地区。与此同时，以定州路都部署田重进为主帅的中路军，和以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潘美为主帅、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帅的西路军乘虚攻取山后地区，然后再向东挺进，同东路军在幽州会合，与辽军主力决战，一举收复幽燕。

赵炅放弃五代色彩浓厚的战略奇袭，改而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这是进步。但是，雍熙北伐的战略目标极为含混。既然东路军收复幽

州只是诱饵，是协助中路军和西路军收复云州的手段，那么收复云州就应该是战役的目标。可赵炅最终的目标，仍然是收复幽州。

除了战略目标混乱，三路大军的战术配合也是个大难题。

北伐之初，宋朝的中路军和西路军按照计划，在山后地区节节得胜，而作为诱饵的东路军寸功未立，这引起东路军将士不满，他们纷纷要求主帅曹彬加速行军。

由于北伐之前，曹彬作为太祖旧将，曾因深得军心而被赵炅打压，因此这次他不敢约束将士，以避免遭到赵炅猜疑。在曹彬的纵容下，东路军一度突进至涿州。可十余日后，因粮食不济，东路军被迫折返雄州，随即再度出兵，经过20余日再克涿州。

几番折腾下来，大仗还没打，东路军将士已身心俱疲。与此同时，辽军主力在萧太后和耶律休哥等人的率领下，陆续到达涿州附近。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东路军被迫再次放弃涿州撤退。五月初，东路军行至岐沟关，被耶律休哥的辽军追上，随即大溃，数万将士阵亡。

主力溃败，雍熙北伐的失败已成定局。赵炅急命中路军和西路军撤退。可为了挽回颜面，赵炅又要求西路军将曾占领的山后地区的百姓迁入宋境。

由于东路军已溃败，中路军已退军，辽朝10万大军得以集中朝西路军猛扑而来。副帅杨业被迫按照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的要求，以少数人马迎敌，掩护西路军率民众撤退。杨业与潘美等约定，务必在陈家谷口派兵接应。

七月，杨业出兵，遭到辽军伏击，且战且退，好不容易在傍晚坚持到陈家谷口，却发现潘美等人早已退走。杨业捶胸大哭，遂率士兵与辽人死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杨业本人斩杀数十人，身受十余处重伤，被擒后绝食而死。杨业和子孙后代的事迹，后来被演绎成杨家将故事，流传至今。

岐沟关惨败后，赵炅痛心疾首地对大臣说："卿等一起看看，

朕从今以后还干不干这样的事（指北伐幽云）！”可实际上，与高梁河战役一样，宋军在雍熙北伐中虽然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物资，但仍保有相当规模的精锐部队，士气也未受太大影响。基于此，在雍熙北伐失败当年的十二月，不甘心失败的赵炅做出了第三次经略幽燕之役的部署。

一方面，赵炅在沧州设立独立战区，计划让沧州都部署（相当于沧州战区司令）李继隆率军渡过渤海，夺取榆关。榆关是辽东进入幽燕的必经之路，宋军若切断榆关大道，就可以增加东部辽军入援幽燕的难度。另一方面，赵炅又任命宿将、瀛州都部署刘廷让（即刘光义）统帅宋军主力，北伐幽州；同时命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田重进作为策应。

与雍熙北伐相比，这次北伐的战略明显得到优化。尽管宋朝的国力依然不占上风，但北伐以收复幽州为目标，以夺取榆关为手段，战役规划明确，不像此前那样迂回混乱；作战区域集中，也不再需要多路协同调度那么复杂。

当时，宋军上下仍弥漫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赵炅号称要将契丹灭族；刘廷让宣称“并海而出”“声言取燕”；田重进在开战后也捷报不断；知雄州贺令图甚至不自量力地去策反耶律休哥。宋朝君臣对征服辽朝志在必得。

然而，宋辽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辽军不再被动防守，而是转向积极对宋朝用武。宋朝本应迅速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守，可无论是赵炅还是前方将领，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

早在这年十一月，辽军就率先发动了南征，并于十二月初寻求与宋军主力决战，这一下打乱了赵炅的军事部署。而首当其冲的，正是统率宋军主力的刘廷让。

对刘廷让来说，最佳的防御战略是以一支能够迅速调动的野战军为核心，寻找敌军的破绽加以反击。这一战略在满城之战中曾初见成效。宋军可以由刘廷让和李继隆在辽军前方正面迎敌，同时让

负责策应的田重进部绕到辽军后方出击，这对宋军非常有利。

不过，要采取这种防御战略，最关键的条件是各部队之间必须高度协调，保持步调一致。这恰恰是刘廷让最不具备的条件。

如同前几次作战一样，赵炅并没有任命前线主帅。刘廷让虽然掌握着宋军主力，却无权指挥李继隆、田重进等人的部队，自然也就无法组织三路协同的防御作战。因此，刘廷让除了尽力说服附近的李继隆和自己率军正面迎敌，与辽军决一死战外，没有其他选择。

田重进的情况也类似，他确实试图从侧翼攻击辽军，也一度占了上风。然而，同样无权调动其他部队的田重进，也无法和刘廷让协同作战。最终，田重进的先头部队被辽军击败，不得不撤出战场。对辽军的来袭，宋军将领在缺乏战略协同的前提下，仍然侧重于孤立的反击。

宋军以步兵为主，而辽军的主力是骑兵。在野战中，具备冲击能力的骑兵更占优势。不过，被迫用步兵正面对抗骑兵的刘廷让，还是做出了正确的战术部署。

首先，为了避免宋军的步兵方阵陷入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刘廷让在军中增加了强弩等远射程武器，因为强弩是对抗辽军骑兵的有效武器，增加强弩可以减轻宋军正面的压力。

其次，刘廷让在宋军的左右两翼和侧后方配置了骑兵，形成“拐子马”阵型，以防止辽军从侧翼或后方攻击宋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刘廷让将军队的作战单位沿着纵深作梯次编配，前后呼应，以此来减少被辽军骑兵切断后路的危险。

具体的做法是，刘廷让将军队分为两部分，自己率领一部分打头阵，吸引辽军主力；另一部分精兵则与李继隆的部队混编，由李继隆统一指挥，作为后续梯队。当刘廷让与辽军主力短兵相接时，李继隆再乘机出兵，对辽军作决胜一击。

辽军的骑兵具有冲击力，骑射具备灵活的远程攻击力，可一旦与刘廷让的部队短兵混战，这种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这时李继隆

及时上前反击，配合宋军强弩的优势，就能收到后发制人的效果。

这种拉伸纵深的战术，在当时的宋军中运用相当普遍，而且非常有效。但它同样要求先头部队和后续梯队之间必须有效协调，而这恰恰是宋军的薄弱环节。

十二月十二日，刘廷让率先头部队在君子馆遭遇辽军。不料当天漫天大雪，气温骤降，宋军将士竟被冻得拉不开弓，强弩成了摆设，宋军步兵完全丧失了对辽军骑兵的技术优势。

天气恶化还动摇了协同作战的信心。李继隆认为，丧失技术优势的宋军根本不是辽军的对手，刘廷让败局已定，自己再出兵支援无异于白白送命。由于李继隆的级别与作战权限都同刘廷让旗鼓相当，实际上并不受刘廷让节制，为了保存宋军实力，他违背了与刘廷让的约定，率军后退自守。

这使得本就陷入困境的刘廷让彻底变成孤军。此时，辽军的援军也到达了君子馆，并对宋军展开猛烈进攻。刘廷让孤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死者数万人。刘廷让仅孤身逃回。

君子馆会战后，辽军在关南纵横劫掠，如入无人之境，“河朔震恐”。整个河北士气涣散，畏辽如虎，这是此前历次战败后不曾有过的现象。

宋军高层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产生慎重和避战的想法，之前轻敌厌战的氛围彻底消散。

击败刘廷让不久后，辽军又向代州进攻。驻守这里的正是那位提出先本后末战略的张齐贤。起初，张齐贤因兵力不足，派人约大将潘美从太原出兵，来代州与辽军会战，这仍是一副遇敌即战的架势。

然而，张齐贤派往潘美处的信使被辽军抓获，潘美出兵的消息被辽军探知。正当张齐贤担忧潘美会受到辽军截击时，潘美的信使却到了。信使说，赵炅得到君子馆败报后，急令潘美不要再出击，已经出师的潘美不得不返回太原。

张齐贤没有办法，只好将潘美的信使扣留，防止消息再度被

辽军探知。然后他选派2000名地方军出城，形成相互接应的防御之势。又命人到山头点火，虚张声势。辽军见到火光，以为是潘美的援军到来，惊惶撤去。行至土墱寨，遭到张齐贤埋伏于此的宋军伏击，大败而归。

土墱寨之战虽然规模不大，但却体现了宋军指挥层的心理变化。面对持续恶化的形势，赵炅终于转攻为守。

为阻止辽军南下，宋朝委派资深将领翟守素主持河北城池的修复工作，加强防御力量；后来又采纳知雄州何承矩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东至泥姑寨的900里间，利用河淀塘泊，疏通蓄水，构筑塘堤，使契丹骑兵不能发挥优势。这个防御体系号称“水长城”，对防辽起到了一定作用。宋军逐渐恢复了士气，还打赢了几场防御战，但始终不敢轻易出战，再没有君子馆会战以前的锐意好战了。

自高梁河战役以来，宋军在对辽战争中损失惨重，著名宋史学者张其凡先生甚至估计前后损兵多达二三十万！宋太祖时代积累的精锐之师与钱粮财富被赵炅消耗殆尽，恐辽情绪弥漫军中，一直影响到北宋后期。清代李塨曾评价说，自从宋太祖去世后，“天下不能混一矣！”

不过辽朝也没有急于扩大战果。原来，宋辽战争期间，幽燕的百姓常表现出投靠宋朝之心。对辽朝来说，当务之急是保住幽燕，巩固自己在这片核心区域的统治，这就决定了辽朝征宋的目的仅仅是军事威慑和劫掠财富。因此，君子馆之战后，辽朝并没有继续南下，深入宋朝腹地，而是在一番劫掠后扬长而去，见好就收。

这样，宋辽谁也吃不掉谁，双方都以巩固现有地区的统治为目标。宋辽两国实际上又进入了此前维持现状的对峙局面。此后，尽管两国边境的冲突时有发生，可强度始终不大。在相持20年左右后，到了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1005年1月），宋辽两国终于缔结了澶渊之盟，正式承认了这种对峙，两国进入和平对峙的新时期。

蜀中民变

虽然宋朝没能成功收复夏州与幽燕，以致后来演变成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就大江南北而言，毕竟还是基本完成了统一。只是在这统一的王朝内部，并非每一寸土地上的老百姓都能安享太平。比如蜀地的老百姓便过得水深火热，这一地区在宋初更是变乱频发。

当年太祖朝的王全斌66天灭后蜀，可随即便因为军队劫掠，激起蜀地规模巨大的兵变民变。尽管变乱很快被镇压下去，蜀地军民对宋朝官府的怨愤却并没有丝毫消解。

宋初对蜀地的经济压榨极为残酷。不仅后蜀时期的苛捐杂税被继承下来，一般的税赋负担也较其他地区更重。更糟糕的是，宋朝在蜀地实行茶叶、布帛禁榷制度（官府专卖制度）。蜀地素以茶叶和蜀锦著称，许多人以生产和销售茶叶、布帛为生。宋朝禁榷茶叶布帛后，不仅贩卖茶、帛的小商人成批破产，大量茶农、布帛工人也因官府低价强制收购产品而濒临崩溃。

淳化四年（993）二月，破产茶商王小波在青城揭竿而起，高呼口号："我痛恨穷人和富人的财富不均，今天就为你们平均财富！"当时蜀地正闹饥荒，得不到救济的饥民云集响应。义军攻克青城县城，处死了贪官县令。年底，王小波在作战时中箭身亡，义军转由他的妻弟李顺统率。

李顺召集义军占领区的富人，勒令他们申报财产粮食，除留下生活必需部分外，其他的一律没收，分发给穷人，因此获得了贫苦百姓的拥护。淳化五年（994）正月，义军攻破成都，李顺称王，建立大蜀政权，义军达到10余万人。

直到这时，宋太宗才知道蜀地形势的严峻，急命心腹宦官王

继恩率军入蜀。五月，宋军攻破成都，起义主力失败，李顺被擒杀（一说逃亡）。王继恩纵容宋军劫掠，逼得李顺旧部张余集结万余人再度起义。次年（995）二月，张余战败被俘杀。至道二年（996）五月，张余的余部在王鸬鹚的领导下再度起事，宋廷被迫一面免除蜀地一切租赋，一面出兵围剿，才将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余波彻底平息。

王小波、李顺起义，极大震撼了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太宗降成都府为益州，派进士出身的张咏出任知州。当时王继恩抓了许多“乱民”，要求张咏治罪，张咏却将他们都放了。王继恩大怒，张咏却说：“之前李顺裹挟民众为贼，现在我和您把‘贼’又转化为‘民’，有什么不可的？”张咏在蜀中恩威并施，蜀人将他与李冰、文翁、诸葛亮共奉为治蜀名臣。后来张咏离任，蜀地再度发生民变和兵变，宋真宗派张咏再知益州，宋初蜀地叛乱不止的局面才彻底改善。

三、太平兴国

第一个科举时代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曾大力倡导读书，开了风气之先，这为赵炅时期政治风气发生质变奠定了基础。

与乃兄不同，赵炅虽然出身军人家庭，但跟军队的关系并不密切，反而在文化方面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喜好书法，擅长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书体；他还是围棋高手，留下了“独飞天鹅”“大海取明珠”等自创棋势。

对赵炅而言，最有心得的还是读书。读书堪称赵家的优良传统。宋太祖早年在军旅之间，仍手不释卷；赵炅在日理万机之际，也“不废观书”。太祖认为，读书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赵炅却把读书的作用上升到新的高度。他认为：“王者虽然依靠武力来平定乱世，但最终还是要依靠文德致治。”“文德致治”，也就是以文德开创太平治世。正因如此，他才在每天退朝后坚持读书，以学习前代的统治经验和吸取教训。在这里，赵炅明确把读书和文治联系到了一起。

宋太祖倡导读书还是一种思想导向，而赵炅的读书却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

首先是赵炅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唐末五代，北方战乱不断，官方藏书损毁散佚严重。跟江南、西蜀比起来，中原反而是一片文化荒漠。正因如此，自宋太祖起，宋朝就一直注意搜访图书，献书者有奖。赵炅继位后，更加大了搜访募购图书的力度。到他晚年时，国家的藏书已达到“图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的空前规模。

有了书，自然就要有藏书的地方。宋初沿袭后周旧规，将图书藏在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这三个藏书机构合称三馆，可谓当时的国家图书馆。然而，堂堂的“国图”只不过是数十间小破房，室内低湿狭小，屋外环境嘈杂。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赵炅继位的第二年，他曾对左右说：“这样的环境，怎么能收藏天下的图书，又怎么招揽天下的贤良俊才？”当天，赵炅便命令有关部门择址建造新三馆。赵炅派出亲信宦官监督工程，自己更是亲自设计三馆建筑，并多次到工地视察，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经过一番日夜兼作，到了第二年，新三馆终于建成，其屋宇众多，楼阁壮丽，院中广植花木，在宫中首屈一指。赵炅特为其命名崇文院。端拱元年（988），赵炅又在崇文院中修建秘阁，用来收藏珍本图书和古墨画迹。

在搜访图书、修建馆阁的同时，赵炅又大力组织编书。清人

把《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这四部类书并称为宋朝四大书，前三部都是赵炅朝修成的。《太平御览》是一部综合性类书，初名《太平总类》。在这部书即将编成时，赵炅每天在理政之余“御览”三卷，用了一年时间看完了这部一千卷的大书，于是把书名改成了《太平御览》。宰相宋琪曾劝赵炅不要因读书太疲倦，赵炅却说：“朕喜欢读书，其中颇有一番乐趣。开卷有益，难道是句空话吗？”赵炅在贡献了一部大书的同时，顺带也贡献了“开卷有益”这个成语。时至今日，宋代以前的许多图书早已失传，多亏了《太平御览》，我们才得以一窥其断编残简。

《文苑英华》是一部文学作品类书，《太平广记》是一部小说类书。此外，赵炅朝还编撰了医学类书《神医普救方》《太平圣惠方》，语言学著作《雍熙广韵》，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等。无论是规模还是价值，这些图书都堪称一时翘楚，这与此前中原地区文化土壤的贫瘠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官修图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有不少书是以“太平”命名的。赵炅继位后使用的第一个年号便是“太平兴国”，这表现了他致力于太平治世的愿景。以图书为载体的文化事业，是他所说的“文德致治”的一部分，自然在这个愿景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文士的价值空前凸显出来。赵炅让文士担任三馆秘阁的各级职位，对其选任极为严格。日后，馆阁之职成为文士升迁中枢要职的重要途径，宋代文官也以带馆职为荣，馆阁逐渐成为朝廷培养人才的储备库。

不过，影响力最大的培养机制，还是科举制度。赵炅推广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努力，对中国产生了近千年的深刻影响。

科举取士始于唐初（隋炀帝虽设立进士科，但尚未创立科举制），五代、宋初相继沿袭。不过，科举只是当时朝廷选拔人才的诸多方式之一，甚至算不上主要方式。这一情况在赵炅时发生根本

性变化。

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也就是赵炅即位的两个多月后，赵炅第一次开科取士。这一榜被称为“龙飞榜”，破天荒地录取进士109人，诸科（进士科以外的其他科目）207人；自宋朝开国起就一直参加考试，却始终考不中的184名考生，以及7名考试不及格却年龄过大的考生，共计191人，也被以“特奏名”的名义录取。也就是说，赵炅龙飞榜的录取人数高达507人。

这是什么概念呢？太祖朝几乎年年开科，共取士15榜，录取进士最多的一榜有31人，最少的才6人，15榜进士，总共188人。如果算上诸科和特奏名267人，太祖朝总共取士455人，平均每榜30人。

可见，赵炅朝龙飞榜的进士录取名额，占太祖朝所有进士录取名额近60%，而龙飞榜的全部录取人数，已经超过了整个太祖朝。

赵炅后来又开了7次科，录取进士最多的一榜有353人，最少的也有74人。8榜共录取进士1478人，再加上诸科和特奏名4406人，赵炅朝总共取士5884人，平均每榜735人，是太祖朝的24.5倍。

不仅如此，龙飞榜进士的待遇也极高。

首先，他们的起步级别高。宋初进士被录取后授予的官职很低。比如那位靠拳头赢得太祖青睐的状元王嗣宗，初入官场时只是秦州司寇参军。而赵炅龙飞榜的状元吕蒙正，被录取后直接被任命为将作监丞、昇州通判。

前面提到过宋代文官实行官与差遣分离的制度。“官”又称正官、本官、本官阶，用来确认文官的级别、资历、俸禄；“差遣”则表示具体负责的事务。文臣的本官阶又分为朝官、京官和选人（幕职州县官）三种。朝官和京官分别代表高级和中级文官。选人则是地方幕僚，位卑而人众，在做满一定任期后，需要经过五名官员的推荐，才能升级为京官。而只有进入京官序列，仕途才能通达。

选人分为四等七阶，王嗣宗担任的司寇参军，论级别，属于

第四等第七阶，是最低级的文官；论具体事务，只负责一州的司法工作。京官也分为七阶，吕蒙正的本官将作监丞已经是京官的第四阶，比王嗣宗高了整整十阶；差遣舁州通判更是一州的二把手。

升到吕蒙正的起步官阶，王嗣宗用了四年。太平兴国四年（979），赵炅亲征北汉，王嗣宗因上陈边事受到召见，被授予大理寺丞、睦州通判。而此时的吕蒙正，已经升任左拾遗，正式进入高级文官——朝官的序列。

除了起步级别高，龙飞榜的进士们升得还特别快。被录取七年后，吕蒙正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已升任参知政事，成为副宰相。端拱元年（988）二月，吕蒙正正式拜相，与他同朝的另一位宰相乃是开国元勋赵普。从太平兴国二年（977）成为状元，到端拱元年（988）成为宰相，吕蒙正仅用了11年。

同样是11年，建隆三年（962）的状元马适就没那么幸运了。开宝六年（973），马适因为卷入贪污案而被处决。当时他的本官阶是右拾遗，差遣是秦州通判。马适熬了11年才获得的本官阶，吕蒙正只用了两年；而他的差遣，更是吕蒙正进入官场的起步职务。

再看王嗣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他终于官拜枢密副使，成为执政中的一员。而此时距离他中状元，已有39年之久。王嗣宗本人更已七十有一，垂垂老矣。

祖宗两代对科举取士的态度，可谓天壤之别。

为了维持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更为了让天下文士为自己所用，赵炅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大量改革。一是沿袭宋太祖的做法，在礼部考试（省试）之上设殿试，名义上被录取的进士都是天子门生，将最高的人才选拔权收归皇帝手里；二是考官的亲戚参考，需要到专门的考场就考；三是实行锁院制度，主考官接受任命时便进入考场，与外界隔绝往来，防止请托贿赂；四是实行糊名法，将试卷上考生的名字和籍贯糊住。真宗时，又出现了试卷誊录制度，只把试卷的抄本交给阅卷官员，防止其辨认考生笔迹而徇私舞弊。

赵炅之所以大力改革科举制度，一来如他所说，“欲博求俊乂”，广泛收揽人才；二来是宋太祖削藩以来，地方官员出现大量缺口，急需文臣补充；第三个原因则是他不能明说的：赵炅的皇位合法性受到质疑，开科取士，招揽天子门生，可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忠心。

赵炅大开科举之门，科举正式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最主要途径，随即出现了人才井喷。到了赵炅晚期，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士人。这样的士人被称为“士大夫”。

值得一提的是，赵炅朝通过科举考试考中的进士，有不少在宋真宗时位极人臣，对北宋政局影响颇深。太平兴国五年（980）的科举考试，便有“龙虎榜”之称。在这一榜的进士里，李沆、王旦、向敏中、寇准在真宗朝都做了宰相，张咏则成为与李冰、文翁、诸葛亮齐名的治蜀名臣。

毋庸置疑，真正使全社会进入“科举时代”的人，正是赵炅。从此，那些曾经在政治圈子周围兜兜转转的读书人，鱼贯涌入官场，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读书人完成了向士大夫的转变，宋朝迎来了士大夫政治的曙光。

除不去的冗官

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太宗赵炅，宋朝在去五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文治，为真宗、仁宗时期的所谓“盛治”奠定了基础。

然而，北宋中期深入骨髓的财政危机，也在宋初埋下了伏笔。

提到宋朝的财政，总是离不开“三冗”。宋代冗兵多、冗官多，因为要养兵、养官，由此又导致了冗费多，世称“三冗”。

在“三冗”问题中，与士大夫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便是冗官。顾名思义，冗官就是指朝廷有大量多余的官员。在宋真宗澶渊

之盟前后，宋朝有官员近1万人；到了宋仁宗中期，这个数字已高达近2万人。[1]40余年间，官员总数翻了一番。这么多的官，都要由朝廷来养，有时仅养官一项，就占朝廷财政支出的20%，这对财政形成了巨大压力。

冗官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最明显，朝廷并不需要这么多吃财政的官员，特别是那种只拿俸禄却没事做的官员，偏偏这样的官员——闲官太多了。第二个层面更致命，朝廷需要的官员整日里“摸鱼”，吃了财政不干活——打酱油的太多。总而言之，朝廷的钱财给了太多没活干或有活不好好干的官员。

问题的直接原因，当然出在北宋的制度上。而制度背后，却是一股来自时代的力量。

先来说说没活干的闲官问题。直接造成这个严重问题的原因之一，正是造就了士大夫政治盛景的科举制度。

前面提到过，自从宋太宗改革科举制度后，中国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科举时代”。至少在名义上，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制的大门，第一次最大限度地向全社会开放。上到宗室外戚、功勋贵胄、文武官僚之后，下到农民渔夫、贩夫走卒乃至僧侣子弟，大家都具备科举考试的资格。

与此同时，宋朝统治者还在推波助澜。宋真宗甚至亲自写下《劝学诗》，道出那句“传唱千古”的“书中自有颜如玉”和“书中自有黄金屋”，号召大家都来读书当官、发家致富，抱得美人归。

而在官本位社会里，“士”乃“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只有做官，才能真正提高或维持家庭乃至家族的社会地位，才能真正掌握权力，调动社会资源。

就这样，绝大多数人至少在名义上都拥有了改变社会地位的资格，在巨大的诱惑下，投身考场，梦想着一举中第，一鸣惊人。

---

[1] 李弘祺《宋代官员数的统计》,转引自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宋朝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也在水涨船高。宋真宗时，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一再破纪录。咸平三年（1000）录取2100余人，到了景德二年（1005），更是破天荒地录取了3000余人。据统计，整个北宋录取的进士、诸科高达6万多人；南宋失去半壁江山，取士人数仍高达4万人。这样，有宋一朝平均每年的取士人数，是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6倍！科举取士之多，可谓空前绝后。

科举考试被录取的进士、诸科，按说只是获得了任官资格，还需要通过中央人事部门的考试后，才能正式授官，等待授官的这段时间称为“守选”。宋初也实行过守选制度，可太平兴国二年（977）“龙飞榜”时，宋太宗为了笼络士子，除了扩大录取名额外，还开了个先例——只要科举考试被录取，就直接授予官职。此后，守选之制虽然一度于真宗时在考试名次非常靠后的进士、诸科中实行，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

这就意味着，宋代的科举考试已经不是缔造官僚的后备军，而是直接制造了官员。每一次的科举考试，都意味着朝廷又多了成百上千名官员。

科举考试只是宋代官僚系统“造血”的主要途径之一，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荫补制度。简单来说，荫补制度就是权贵和官员的子弟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仅凭父祖辈的关系就可以做官，这是科举政治全面取代门阀政治后在政治利益分配方面妥协的产物。早在宋太祖时，便有了荫补，不过当时对荫补的限制极为严格。

荫补规模的扩大化，出现在宋真宗时。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东封泰山，为了让百官共同分享这样的“盛世盛典”，真宗打破了荫补的诸多限制，荫补人数激增。到仁宗时，荫补规模更是有增无减。皇帝过生日，官员子弟可以沾光荫补；皇帝祭天，官员子弟可以荫补；甚至官员退休、死亡，他的子弟依然可以欢天喜地地迎来荫补。而这里的“子弟”不再指直系亲属，弟弟、侄子、孙子

甚至门客，都可以靠着荫补的光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人中虽然不乏翘楚，比如那位大事不糊涂的吕端；也有很多人为了追求更好的出路，在荫补后仍然选择参加科举考试；但更多的人，是庸庸碌碌之辈。

总而言之，在科举制度和荫补制度的推动下，大批有真才实学和不学无术的官员，一股脑儿涌入了官僚体制。

那么问题来了，官僚体制能消化得了这么多人吗？

当然不能。

宋初经过“再造中央”后，各级政府里大量原来由武人把控的职位被让了出来，宋朝一度非常缺乏文官，这也是宋太宗扩大科举的初衷之一。可随着国家的稳定，以及科举制度的扩大，官僚队伍日趋饱和，最终转变成了“官多阙少”的状态。

前文说过，宋朝实行本官和差遣分离的制度。差遣是真正有具体工作的岗位，本来是一个萝卜（官员）一个坑（差遣）。现在坑满了，萝卜却被不断产出，那就只能等坑里的萝卜拔出来（官员正常离任、退休或发生事故）后，新萝卜才能填进去。可拔萝卜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产萝卜的速度，于是没有坑的萝卜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就成了冗官。

当官员们的差遣任期满后，要到中央人事部门参加铨选，由人事部门按照一定标准授予新的差遣，这个过程称为注拟。由于来参加铨选的官员太多，人事部门不得不按照官员们的顺序，分批次注拟。这样，就必然有官员在排队等待，这个过程被称为待次。

可即便获得了差遣，也不意味着马上就能走马上任，因为前任官员的差遣任期有可能还没到。于是，这名获得差遣的官员只好默默等待前任离任，这个过程称作“待阙”。

待次和待阙的官员，在当时非常多。比如真宗时，陈尧叟曾建议通过增加数百个职位，来缓解官员们的就业压力。可王旦却说：“待次官员有2000多人，就算增加几百个职位，也什么用都没

有。”到了仁宗庆历年间，更发展到每一个差遣职位都有三个人抢的程度。

由于存在大量没有实际工作岗位的官员急需就业，负责分配岗位的中央人事部门压力很大。但如果仅仅如此，冗官还形不成对财政的压力。

关键问题在于，有不少冗官是有工资的。

宋代的文臣有朝官、京官和选人之分。选人在待次和待阙期间不拿俸禄，有的实在等不下去，只好先回家种田经商，糊口度日，等待注拟差遣、正式赴任拿俸禄的那一天。

可京朝官就不一样了。由于宋朝统治者不断扩大统治基础，希望获得全体士大夫的拥戴，因而对官员的待遇非常优厚。京朝官在待次和待阙期间，可以依照自己本官阶的级别，领取相应的俸禄。尽管与有差遣的在职官员相比，这笔俸禄要少许多，但对于朝廷而言，实际上是在花钱养着一帮等待工作、无事可做的待就业者。而随着待次、待阙官员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笔财政开支也就越来越大。

特别是为了安抚宗室贵胄，朝廷还设立了一系列闲职，比如提举某某宫、提举某某观，相当于宗教场所的名誉住持。名义上这是差遣，实际上却根本无事可做。

就这样，待次、待阙的京朝官和担任闲职的官员，大家一起成了吃干饭的闲官，冗官变成了冗费，就业压力变成了财政压力。

再来说说那些有活不好好干的“摸鱼”官员。

相信已经上班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在工作中，有什么样的绩效考核，就有什么样的职工，考核机制的奖惩激励，直接决定了职工的工作状态。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吃大锅饭的人大概率会享受安逸。这个道理，放在宋朝的官僚体制中也毫不违和。

本来，宋朝实行考课之法与资格之法并重的人事考核方法。考课之法，就是考察官员的政绩；资格之法，就是审核官员的资历。

前者相当于绩效，后者相当于工龄。

可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出现了无法操作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就埋在宋太祖“再造中央”的改革措施中。宋朝初年，太祖收夺地方行政权力，其中就包括人事权力。此后，宋朝在人事工作中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官不分中央地方，职位不问高低，事务也不论巨细，全部由朝廷选任、考核。在这种情况下，人事部门根本无法掌握各级官员的政绩，只能依靠官员为官时的考核档案。

可这些档案也往往流于形式，比如考核标准当时有上（优秀）、中（合格）、下（不合格）三等，绝大多数官员不管政绩如何，都会获得“中等”的考核结果。鉴于三等标准已经不能体现政绩，有关部门又细化了考察项目，并赋予了一定分值，给出了评分标准。但人事部门怕出错误，引起争议，因而对这些标准的执行非常教条，这样就使考核再度流于形式。

比如临江军新淦县和吉州吉水县的县尉，曾在任内剪灭了大小盗贼四十余伙，还组织县民结为伍保组织，使两县的治安大为好转。按理说，取得这么大的功绩，两名县尉肯定能从选人改为京官。可中央的人事部门却教条地拿出条文，认为县尉不是同时剪灭四十余伙盗贼，这样零零散散地平均下来，每次剪灭的盗贼其实就没多少了，因而算不得功绩。欧阳修为此大为光火，愤愤地为县尉鸣不平。

相反，和政绩相比，审查官员的资历就容易多了。由于人事部门无法掌握官员实际的政绩，资历几乎成了唯一可考的升迁凭证。宋真宗时，正式形成了用于官员本官阶晋升的磨勘法。所谓磨勘，是指主要依据官员档案来审核任官资格的方法。理论上，磨勘法囊括了考课与资历审查，可实际上只考查官员的资历，最后就变成了只要没有大的过失，文官每三年晋升一次，武官每五年晋升一次。

联系到待次待阙问题和考课法的形同虚设，就会发现，宋代官

员即便无事可做，即便治绩平平，依然不妨碍他们升职加薪。既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谁还去费尽心思干多干好呢？

归根结底，在经历了唐末五代大乱后，士族彻底衰落，中古门阀政治的尾巴被彻底割断，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

自南北朝以来逐渐崛起的庶族，终于全面填补了门阀士族崩溃后的权力真空。而昔日皇帝为了对抗士族，笼络庶族以扩大统治基础的做法，依然具有历史惯性。这就成为宋代扩大科举取士、优待士大夫的社会基础。贵族世袭的特权在帝制时代也始终没有消失，最终又演变成了荫补制度。在新制度与老制度共同的推波助澜下，科举和荫补成为批量制造冗官的永动机。

另外，门阀士族崩溃后，士族基于家族力量对皇权的刚性制衡日益削弱，新兴的士大夫群体只能通过模糊的政治原则和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去实施弹性制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集权被空前加强。在宋初“再造中央”的改革和确立祖宗之法的原则中，人事权也被空前地高度集中于朝廷。新的中央人事部门还无法完全适应这种集中，于是出现考课名存实亡、铨选独重官资的现象。

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官员冗余、开销巨大且吏治不振的冗官问题。

养兵乃百代之利？

和冗官一样，冗兵自然是指多余的兵。宋太祖晚年，宋朝军队的总规模只有37.8万人，其中中央禁军19.3万人，地方厢军18.5万人。这一时期的宋军前承后周，最为精锐。到了宋太宗晚年，经过对辽战争的一系列惨败，宋军精锐尽失，不得不通过扩张军力来守住北方边境，当时的军队规模已激增到66.6万人，其中35.8万人是禁军，比太祖晚年时增长了近一倍。

自此以后，宋军规模迅速膨胀。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宋军兵额首次达到100万人，虽然在真宗晚年的天禧年间（1017—1021）裁减到91.2万人，可到了仁宗对夏用兵的庆历年间（1041—1048），军队总数再度突破百万，竟高达125.9万人；皇祐年间（1049—1054），更达到141万人的巅峰，士兵占全国人口的6.32%。此后，宋军规模又有所下降，但仍然长期保持在百万规模。

这些常备军的吃穿住行，都靠朝廷的财政支持，这笔军费通常要花掉财政收入的70%至80%。百万大军中，超半数（约五六十万人）是负责打仗的禁军，但他们对辽夏作战的表现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剩下那一小半（约四五十万人），是只负责杂役的厢军，连仗都不用打。也就是说，朝廷花重金养了一支战斗力堪忧的军队，久而久之，在士大夫眼里，这支庞大的军队俨然成了累赘。养冗兵的军费成了冗费。

为什么宋朝的军队规模会急剧膨胀，而且居高不下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军队规模的数额，只是当时的军队编制的数量。在贪腐横行的帝制社会里，编制数量和实际数量一定是有差距的，这中间的差距，自然是被统兵官们吃了空饷。但吃空饷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靠吃空饷，把军队的规模持续从40万吃到60万，再从60万吃到100万。

真正促成宋军规模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直接原因——军事需要。在后来的赵炅时代，由于经略幽燕和收纳夏州失败，宋朝的北部边界线上就没消停过，特别是在河北地区，连天险都没有。为了应付北方辽朝和西北西夏的军事压力，宋朝不得不在河北、河东、陕西方面常年配置数十万的重兵。而根据内外相制的原则，沿边的禁军兵力增加，驻守京师重地的禁军兵力也要增加。

更何况，河北一马平川，开封无险可守。要守住开封，宋朝也确实需要配置重兵。因此，赵匡胤晚年提出想要迁都洛阳。尽管迁

都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他确实很有预见性：以开封为都，“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就要被冗兵耗尽了”！

然而，军事需要只是造成冗兵的直接原因，却不是根本原因。真正造成冗兵的是宋朝的兵制——养兵之制。

养兵之制简单来说，如前所述，宋朝继承唐末五代的传统，全面实行募兵制。士兵是直接招募而来、以打仗训练为生的职业军人，朝廷向士兵支付俸禄，因而被称为“养兵”。这本来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制度。

但赵匡胤却发现，养兵不仅与军事有关，还可以为维持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在灾荒之年，大量破产甚至吃不上饭的农民沦为流民，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隐患。如果将这些流民招募为兵，然后由朝廷供养，不仅可以防止他们造反，甚至可以将他们转化为维护宋朝统治的军事力量。正因如此，赵匡胤曾骄傲地对赵普说：“养兵可为百代之利。一旦遇到灾荒之年，有叛民而无叛兵；遇到士兵哗变，有叛兵而无叛民。”

可以这样说，导致冗兵的养兵之制，是为了解决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大众的失业问题。而不断制造失业流民的永动机，正是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

前面提到过，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使大量农民摆脱了土地束缚，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无论如何，宋代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租佃制土地经济和有限的商品经济，仍然不足以消化失业人口，这就极容易诱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甚至王朝颠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赵匡胤才提出了“养兵可为百代之利”。

当然，赵匡胤的“发现”并不是新鲜事物。因为过去唐朝实行均田制，依附于土地的农民还要服兵役。随着均田制的崩溃，朝廷也丧失了对这些农民的控制，自然就没了兵源，于是只好实行募兵制，到社会上去招募士兵。而这些应募者，本来就有不少是从土地

上流散出去的农民。可以说，从一开始，养兵就与破产失业的农民息息相关。

也正是因为养兵具有失业救济的性质，因而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军队素质成问题，宋初的军队还相当精锐，可发展到“百万雄师”时，已是鱼龙混杂，而且哪怕是宋初，宋军的军纪也不佳。宋军打仗打不赢，还时不时会闹小股兵变，这是原因之一。

第二是经济规律不会变化，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不可逆转，离开土地的农民会越来越多。人口在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不足以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于是这些失业流民为了糊口也好，朝廷为了社会稳定也罢，养兵之制只能一直贯彻执行下去。

就这样，土地制度成为批量生产冗兵的永动机，在绝大多数时期，且不说裁军，能够不进一步扩军，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既然养兵不能废止，冗兵难以裁减，后来的北宋朝廷就只能竭尽所能来供养这支百万大军了，这造成北宋财政的首要任务就是养兵。

这种养兵财政的首要任务，必然是保证有足够的财物来供养军队。

北宋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军队规模有多大，只要士大夫们提到军费，一定会占到财政收入的七八成。

皇祐时期（1049—1054），宋军规模达到141万人的巅峰，孙洙在谈论这一时期的军费时，说“耗于兵者常什八”。

宝元时期（1038—1039），宋军规模应已接近庆历时期的125万人，富弼谈论军费，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

仁宗嘉祐（1056—1063）、英宗治平（1064—1067）之际，宋军兵力118万，蔡襄说“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又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陈襄也说“六分之财，兵占其五”。

到了神宗时，宋军规模已经从仁宗时的140多万人，缩减至110万人左右，可张载在提起这期间的军费时，还是说“在天下十居七八”。

为什么军队规模变化，养兵的军费却始终不变呢？其实不变的并不是军费的规模，而是军费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而这个比例，本来就是计划好的。

自从中唐以来，朝廷开始逐渐实行募兵制以后，国家财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由“量入为出”转变为“量出为入”。所谓的量出为入，就是根据下一年的财政支出，来确定需要征收多少赋税。显然，朝廷根据军队规模，可以计算出需要支出多少军费。同理，根据官员规模，可以计算出需要支出多少俸禄，其他费用也是一样。而且在编制预算的时候，一定会留出余量。

比如朝廷要供养百万大军，首先要按人头计算，准备大于或等于百万人的物资，同时将运输、储存及意外消耗的物资也都算进去，然后按照这个数额去征税。

赵匡胤在“再造中央”时，各地向朝廷缴纳的赋税本来并没有定额。可是从宋真宗时开始，朝廷的财政部门为地方各路每年的税收额度确立了计划目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立额”，也是为了配合量出为入的财政体制。

在确定了财政预算后，大宋朝廷当然要开动国家机器，想尽办法去征收钱物，以确保达到财政收入的目标。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横征暴敛实难避免。

就这样，大宋子民可能生活在一个物质感受和精神感受相脱节的时代。虽然从大量宋词来看，宋朝的上层人士活得比较潇洒惬意，然而那不过是一部分人。更多的人口集中在社会的中下层，他们有幸目睹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可以买到更多的新产品，可以到城里听书看戏逛夜市；他们第一次合法地离开土地，拥有了更为自由的职业选择，带着梦想为自己的未来奔波。比起此前千年中

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不能再好；但面对沉重的赋税差役、严重的土地兼并和严格的经营壁垒，他们的生活已难更好。

承继周太祖、周世宗，历经宋太祖、宋太宗，至宋真宗时，宋朝的制度、政策已逐渐趋于稳定。由科举步入仕途的士大夫获得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权力，普通老百姓也获得了更加自由的身份，中国历史告别了士族政治为主导的中古时代，从此进入宋元明清的“近世”时代。

然而，在皇权官僚制的框架之下，士大夫与皇帝讨价还价的资本始终在持续缩水，而老百姓的生活也仅称得上是“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缔宋”缔造的不仅是320年的宋朝，更是未来近900年里中国历史的基本逻辑。

附录

附录一　书中所涉古今地名对照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东京留守	开封府	治今河南省开封市	唐、后唐宣武军会府；后梁国都，号东都；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国都，号东京。宋太宗赵炅出生地
	浚仪县	治今河南省开封市	开封府治
	陈桥驿	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东南	开封府浚仪县境内。陈桥兵变发生处
	陈留县	治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	开封府属县
	雍丘县	治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开封府属县
	酸枣县	治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西北	开封府属县
归德军	宋州	治今河南省商丘市	归德军会府；宋初直属京；宋朝之得名
义成军	滑州	治今河南省滑县东	义成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卫州	治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	义成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汲县	治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	卫州治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天平军	郓州	治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西北	天平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齐州	治今山东省济南市	天平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棣州	治今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东南	天平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厌次县	治今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东南	棣州治
直属京	滨州	治今山东省滨州市	后周直属京
彰信军	曹州	治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	彰信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单州	治今山东省菏泽市单县	彰信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单父县	治今山东省菏泽市单县	单州治
泰宁军	兖州	治今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东北	泰宁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密州	治今山东省诸城市	泰宁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平卢军	青州	治今山东省青州市	平卢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益都县	治今山东省青州市	青州治
	博兴县	治今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	青州属县
	莱州	治今山东省莱州市	平卢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淄州	治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平卢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北海军（潍州）	治今山东省潍坊市	平卢军支郡，宋初置北海军，旋升潍州，后直属京
武宁军	徐州	治今江苏省徐州市	武宁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忠武军	许州	治今河南省许昌市	忠武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蔡州	治今河南省汝南市	忠武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上蔡县	治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	蔡州属县
镇安军	陈州	治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镇安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西京留守	河南府	治今河南省洛阳市东	后唐国都；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陪都，号西京，置西京留守；宋初直属京。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地
	洛阳县	治今河南省洛阳市东	河南府属县
	汝州	治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南	西京留守支郡；宋初直属京
保义军（保平军）	陕州	治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西南	保义军会府；宋初改保义军为保平军，后直属京
	虢州	治今河南省灵宝市	保义军（保平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河阳镇	孟州	治今河南省孟州市南	河阳镇会府；宋初直属京
	虎牢关	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	孟州汜水县境内
	怀州	治今河南省沁阳市	河阳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河内县	治今河南省沁阳市	怀州治
永兴军	京兆府	治今陕西省西安市	永兴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长安县	治今陕西省西安市	京兆府治
	万年县	治今陕西省西安市	京兆府属县
	商州	治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永兴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昭化军	金州	治今陕西省安康市	永兴军支郡，宋初为昭化军会府，后直属京
匡国军（定国军）	同州	治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	匡国军会府；宋初改匡国军为定国军，后直属京。赵匡胤初领节度使即此
	郃阳县	治今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	同州属县
镇国军	华州	治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县西南	镇国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下邽县	治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	华州属县
	潼关	今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	华州华阴县境内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静难军	邠州	治今陕西省彬州市	静难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新平县	治今陕西省彬州市	邠州治
	庆州	治今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	静难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保大军	鄜州	治今陕西省延安市富县	保大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彰武军	延州	治今陕西省延安市东	彰武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灵武镇（朔方镇）	灵州（西平府）	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西南	灵武镇（朔方镇）会府；宋初直属京；西夏升为西平府
	通远军	治今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灵武镇（朔方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凤翔镇	凤翔府	治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	凤翔镇会府；宋初直属京
	乾州	治今陕西省咸阳市乾县	凤翔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彰义军	原州	治今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	彰义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渭州	治今甘肃省平凉市	彰义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潘原县	治今甘肃省平凉市东	渭州属县
定难军	夏州	治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北	定难军会府；定难政权（西夏前身）首府
	绥州	治今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东南	定难军支郡
	银州	治今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东	定难军支郡
	宥州	治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敖勒召其镇	定难军支郡
	静州	治今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境	定难军支郡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河西镇	西凉府（凉州）	治今甘肃省武威市	河西镇会府；吐蕃六谷部控制；西夏占领后改为凉州
	甘州	治今甘肃省张掖市	河西镇支郡；甘州回鹘首府；后为西夏占领
河东镇	太原府（并州）	治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河东镇会府；后唐、后晋、后汉陪都，号北京，置北京留守；北汉国都；宋初改为并州，直属京
	太原县	治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太原府治
	祁县	治今山西省晋中市祁县	太原府属县
	团柏谷	今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东南	太原府祁县境内
	阳曲县	治今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	太原府属县
	白马岭	今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北	太原府盂县境内
	乐平县	治今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	太原府属县
	文水县	治今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	太原府属县
	忻州	治今山西省忻州市	河东镇支郡；北汉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石岭关	今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大盂镇上原村北	忻州定襄县境内
	岚州	治今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北	河东镇支郡；北汉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岢岚军	治今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	岚州属军
	辽州	治今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	河东镇支郡；北汉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雁门镇	代州	治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	雁门镇会府；宋初直属京
	雁门关	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北	代州雁门县境内
	土墱寨	今山西省原平市崞阳镇西北	代州崞县境内
永安军	府州	治今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	永安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麟州	治今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北	永安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昭义军	潞州	治今山西省长治市	昭义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上党县	治今山西省长治市	潞州治
	太平驿	今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西	潞州襄垣县境内
	泽州	治今山西省晋城市	昭义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高平县	治今山西省高平市	泽州属县
	巴公原	今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北巴公镇	泽州高平县境内
护国军	河中府	治今山西省永济市西南	护国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解州	治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	护国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绛州	治今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	护国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建雄军	晋州	治今山西省临汾市	建雄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隰州	治今山西省临汾市隰县	建雄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天雄军（魏博镇）	魏州 兴唐府 广晋府 大名府	治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后梁称魏州，后唐称兴唐府，后晋称广晋府，后汉、后周、宋称大名府；魏博镇、天雄军会府；后唐、后晋、后汉陪都，号邺都，置邺都留守；宋初直属京
	大名县	治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东北	大名府治
	元城县	治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东北	大名府属县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天雄军（魏博镇）	魏县	治今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南	大名府属县
	馆陶县	治今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大名府属县
	宗城县	治今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东北	大名府属县
永清军	贝州	治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西北	永清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博州	治今山东省聊城市东南	永清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冀州	治今河北省冀州市	永清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彰德军	相州	治今河南省安阳市	彰德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镇宁军	澶州	治今河南省濮阳市	镇宁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胡柳陂	今河南省濮阳市东	澶州境内
	濮州	治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	镇宁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安国军	邢州	治今河北省邢台市	安国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尧山县	治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西南	邢州属县
	洺州	治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东南	安国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肥乡县	治今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	洺州属县
	磁州	治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	安国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武安县	治今河北省武安市	磁州属县
成德军	镇州	治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成德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土门	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西	镇州获鹿县境内
	深州	治今河北省深州市东南	成德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静安军	治今河北省深州市东南	深州属军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义武军	定州	治今河北省定州市	义武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安喜县	治今河北省定州市	定州治
	嘉山	今河北省定州市西北	定州境内
	易州	治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义武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满城县	治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	易州属县
横海军（义昌军）	沧州	治今河北省沧州市东南	横海军会府，燕改横海军为义昌军；宋初直属京
	乾宁军（宁州）	治今河北省沧州市青县	后周沧州属军；辽曾置宁州，为幽州卢龙军支郡
	泥姑寨	今天津市塘沽区	沧州境内
幽州卢龙军	幽州（幽都府）	治今北京市	幽州卢龙军会府；辽陪都，升幽都府(后改析津府)，号南京，置南京留守；幽蓟十六州之首
	蓟县	治今北京市	幽州治
	幽都县	治今北京市	幽州属县
	清河	治今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附近	幽州境内
	得胜口	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北居庸关附近	幽州境内
	高梁河	今北京市西直门外	幽州境内
	永清县	治今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	幽州属县
	安次县	治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西	幽州属县
	蓟州	治今天津市蓟州区	幽州卢龙军支郡；幽蓟十六州之一
	渔阳县	治今天津市蓟州区	蓟州治
	静塞军	治今天津市蓟州区	蓟州属军
	三河县	治今河北省三河市	蓟州属县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幽州卢龙军	玉田县	治今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	蓟州属县
	涿州	治今河北省涿州市	幽州卢龙军支郡；幽蓟十六州之一。宋皇室祖籍地之一
	固安县	治今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	涿州属县
	岐沟关（东易州）	今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岐沟村	涿州境内，辽一度在此置易州；因位于后周、宋之易州的东面，故又称“东易州”
	檀州	治今北京市密云区	幽州卢龙军支郡；幽蓟十六州之一
	顺州	治今北京市顺义区	幽州卢龙军支郡；幽蓟十六州之一
关南（直属京）	瀛州	治今河北省河间市	幽州卢龙军支郡；后周直属京；幽蓟十六州之一
	君子馆	今河北省河间市西北	瀛州河间县境内
	束城县	治今河北省河间市束城镇	瀛州属县
	景城县	治今河北省沧州市西	瀛州属县
	莫州	治今河北省任丘市	幽州卢龙军支郡；后周直属京；幽蓟十六州之一
	清苑县（保州）	治今河北省保定市	莫州属县；宋升为保州。宋皇室祖籍地之一
关南（直属京）	雄州（瓦桥关）	治今河北省保定市雄县西南	后周始置，直属京；三关之一
	霸州（益津关）	治今河北省霸州市	后周始置，后周直属京；三关之一
	文安县	治今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	莫州属县，霸州设置后属霸州
	淤口关	今河北省霸州市东	霸州永清县境内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威塞军	新州	治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	威塞军会府；辽改置奉圣州；幽蓟十六州之一
	儒州	治今北京市延庆区	威塞军支郡；幽蓟十六州之一
	妫州	治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	威塞军支郡；辽改置可汗州；幽蓟十六州之一
	怀戎军	治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	妫州属军
	武州	治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	威塞军支郡；辽改置归化州；幽蓟十六州之一
大同军	云州	治今山西省大同市	大同军会府；幽蓟十六州之一
忠顺军	蔚州	治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大同军支郡；辽置忠顺军，为会府；幽蓟十六州之一
彰国军	应州	治今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东	彰国军会府；幽蓟十六州之一
	寰州	治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东北	彰国军支郡；幽蓟十六州之一
	马邑县	治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东北	寰州属县，原属朔州
振武军	朔州	治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	振武军会府；辽改振武军为顺义军；幽蓟十六州之一
	陈家谷口	今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北	朔州境内
辽兴军	平州	治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	辽兴军会府
	营州	治今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	辽兴军支郡
	榆关	治今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西	营州境内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剑南西川道	成都府	治今四川省成都市	剑南西川道会府；后蜀国都；宋初直属京
	汉州	治今四川省广汉市	剑南西川道支郡；后蜀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彭州	治今四川省彭州市	剑南西川道支郡；后蜀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蜀州	治今四川省崇州市	剑南西川道支郡；后蜀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青城县	治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南	蜀州属县
	嘉州	治今四川省乐山市	剑南西川道支郡；后蜀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犍为县	治今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	嘉州属县
	蜀王滩	今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境内	嘉州犍为县境内
武德军	梓州	治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	武德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绵州	治今四川省绵阳市东	武德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剑州	治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	武德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梓潼县	治今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	剑州属县
	剑门县	治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北	剑州属县
	来苏	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北	剑州境内
武德军	青疆店	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北	剑州境内
	汉源坡	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北	剑州境内
武信军	遂州	治今四川省遂宁市	武信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永平军	黎州	治今四川省汉源县西北	永平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宁江军	夔州	治今重庆市奉节县东	宁江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山南道（山南西道）	兴元府	治今陕西省汉中市	山南道（山南西道）会府；宋初直属京
	西县	治今陕西省汉中市勉县西	兴元府属县
	兴州	治今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	山南道（山南西道）支郡；宋初直属京
	文州	治今甘肃省陇南市文县西南	山南道（山南西道）支郡；宋初直属京
	扶州	治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	山南道（山南西道）支郡；宋初直属京
昭武军	利州	治今四川省广元市	昭武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大小漫天寨	今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县一带	利州绵谷县境内
保宁军	阆州	治今四川省阆中市	保宁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开州	治今重庆市开州区	保宁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永宁军	果州	治今四川省南充市北	永宁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雄武军	秦州	治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西北	雄武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成州	治今甘肃省陇南市成县	雄武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阶州	治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	雄武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凤州	治今陕西省宝鸡市凤县	雄武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武泰军	涪州	治今重庆市涪陵区	武泰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荆南镇	江陵府	治今湖北省荆州市	荆南镇会府；荆南（南平）首府；宋初直属京
	荆门	今湖北省荆门市	江陵府当阳县境内
	峡州	治今湖北省宜昌市	荆南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归州	治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荆南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山南东道	襄州	治今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山南东道会府；宋初直属京
	襄阳县	治今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襄州治
	均州	治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镇	山南东道支郡；宋初直属京
	房州	治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	山南东道支郡；宋初直属京
	复州	治今湖北省天门市	山南东道支郡；宋初直属京
武胜军	唐州	治今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	武胜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郢州	治今湖北省钟祥市	武胜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崇义军	随州	治今湖北省随州市	武胜军支郡，宋初为崇义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安远军	安州	治今湖北省安陆市	安远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武安军	潭州（长沙府）	治今湖南省长沙市	武安军会府；楚首府；宋初直属京
	衡州	治今湖南省衡阳市	武安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郴州	治今湖南省郴州市	武安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道州	治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	武安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永州	治今湖南省永州市	武安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武平军	朗州	治今湖南省常德市	武平军会府；湖南首府；宋初直属京
	澧州	治今湖南省常德市澧县	武平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岳州	治今湖南省岳阳市	武平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武平军	叙州	治今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	武平军所领羁縻州
	锦州	治今湖南省新晃县西南	武平军所领羁縻州
	溪州	治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东南	武平军所领羁縻州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静江军	严州	治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东南	静江军支郡；宋初直属京。赵匡胤初领刺史即在此地
	贺州	治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东南	静江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淮南镇	江都府（扬州）	治今江苏省扬州市	南唐陪都，号东都；后周改为扬州，置淮南镇，为会府；宋初直属京
	六合县	治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	扬州属县
	宣化口	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南	扬州境内
	迎銮镇	今江苏省仪征市	扬州永贞县境内
	泰州	治今江苏省泰州市	南唐直辖州；后周淮南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海陵监	治今江苏省泰州市	泰州属监
	通州	治今江苏省南通市	后周淮南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海门县	治今江苏省启东市东北	通州属县
	和州	治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南唐直辖州；后周淮南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濠州观察使	濠州	治今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东北	南唐濠州观察使治所；后周淮南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涂山	今安徽省蚌埠市西	濠州钟离县境内
	定远县	治今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东南	濠州属县
	涡口	今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东北（涡水入淮水处）	濠州境内
濠州观察使	楚州	治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南唐濠州观察使支郡；后周淮南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海州	治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西南	南唐濠州观察使支郡；后周淮南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泗州	治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北	南唐濠州观察使支郡；后周淮南镇支郡；宋初直属京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清淮军 忠正军	寿州（治寿春）	治今安徽省六安市寿县	南唐清淮军会府
	寿春县	治今安徽省六安市寿县	南唐寿州治，后周、宋初寿州属县
	紫金山	今安徽省六安市寿县东北，淮河南岸	寿县境内
	正阳	今安徽六安市寿县正阳关镇	寿县境内
	寿州（治下蔡）	治今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	后周、宋初忠正军会府，后直属京
	下蔡县	治今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	南唐寿州属县；后周、宋寿州治
	光州	治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	清淮军（忠正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德胜军 （保信军）	庐州	治今安徽省合肥市	南唐德胜军会府，后周改德胜军为保信军；宋初直属京
	滁州	治今安徽省滁州市	德胜军（保信军）支郡；宋初直属京。赵匡胤与赵普相识处
	清流关	今安徽省滁州市西北	滁州清流县境内
	全椒县	治今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	滁州属县
永泰军	舒州	治今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	南唐永泰军会府；后周、宋初保信军支郡，后直属京
	石牌口	今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石牌镇附近	舒州境内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西都留守[南唐]	江宁府（昇州）	治今江苏省南京市	杨吴时为金陵府，镇海军会府；南唐改江宁府，为国都，号西都；宋初改昇州，直属京
	白鹭洲	今江苏省南京市西	江宁府境内
	新林港	今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区大胜关一带	江宁府境内
	采石矶	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	江宁府境内
	溧水县	治今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	江宁府属县
	铜陵县	治今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	江宁府属县
镇海军[南唐]	润州	治今江苏省镇江市	南唐镇海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常州	治今江苏省常州市	南唐镇海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利城寨	今江苏省常州市东北	常州境内
宁国军	宣州	治今安徽省宣城市	宁国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池州	治今安徽省池州市	宁国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歙州	治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宁国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武昌军	鄂州	治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武昌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峡口寨	今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富池口	鄂州境内
	蕲州	治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东北	武昌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蕲阳	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西南	蕲州境内
	汉阳县（汉阳军）	治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南唐鄂州属县；后周置汉阳军，直属京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镇南军（南都留守）	洪州（南昌府）	治今江西省南昌市	杨吴时为洪州，镇南军会府；南唐升为南昌府，为陪都，号南都，置南都留守；宋初改为洪州，直属京
	吉州	治今江西省吉安市	镇南军（南都留守）支郡；宋初直属京
	吉水县	治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	吉州属县
	临江军	治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	宋初置，直属京
	新淦县	治今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	原为吉州属县；宋初改为临江军属县
奉化军	江州	治今江西省九江市	奉化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彭泽县	治今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	江州属县
	湖口县	治今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	江州属县
百胜军	虔州	治今江西省赣州市	百胜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镇海军[吴越]	杭州	治今浙江省杭州市	吴越镇海军会府；吴越首府，号西府；宋初直属京
	睦州	治今浙江省建德市东北	吴越镇海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宣德军	湖州	治今浙江省湖州市	宣德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镇东军	越州	治今浙江省绍兴市	镇东军会府；吴越陪都，号东府；宋初直属京
彰武军	福州	治今福建省福州市	彰武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清源军（平海军）	泉州	治今福建省泉州市	清源军会府，后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泉漳政权首府；宋初直属京
	南州（漳州）	治今福建省漳州市	清源军（平海军）支郡；宋初改为漳州，初直属京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忠义军	建州	治今福建省建瓯市	忠义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汀州	治今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	忠义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剑州（南剑州）	治今福建省南平市	忠义军支郡；宋初改为南剑州，直属京
清远军	兴王府（广州）	治今广东省广州市	清远军会府；南汉国都；宋初改为广州，直属京
	春州	治今广东省阳春市	清远军支郡；南汉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恩州	治今广东省阳江市	清远军支郡；南汉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雷州	治今广东省雷州市	清远军支郡；南汉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崖州	治今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东南	清远军支郡；南汉直辖州；宋初直属京
宁远军	容州	治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	宁远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白州	治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	宁远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常乐州	治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东北	—
	海门镇	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	宁远军常乐州境内
建武军	贵州	治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	建武军支郡；宋初直属京
	澼州	治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上思县	建武军所领羁縻州
静海军	交州	治今越南河内市还剑郡	静海军会府；宋初直属京

续表

节镇	古地名	今地名	备注
羁縻州	珍州	治今贵州省桐梓县城娄山关镇	武平军所领羁縻州
	播州	治今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高桥镇	武平军所领羁縻州
大理	羊苴咩城	治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国都
会川都督	清宁郡	治今四川省会理市	大理会川都督府城
	建昌郡	治今四川省西昌市	大理会川都督辖郡
上京道	临潢府	治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	辽朝国都，初名西楼，后改为皇都，再升为临潢府，号上京
直辖	兴州	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西夏国都，后升兴庆府
其他	地斤泽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

附录二　周世宗为什么不叫柴荣?

周世宗到底叫柴荣还是郭荣？这个问题好像没什么好争的，因为在大多数人意识里，周世宗就是叫柴荣。

然而，笔者却坚定地认为，在世宗成为郭威养子之后，至少在周世宗活着的时候，在后周还存在的时候，周世宗从来没有叫过一天柴荣。

柴荣，那是一个属于遥远的过去的名字。

就笔者目力所及，无论正史野史，无论纪传编年，完全找不到一条明确记载周世宗自己，包括周恭帝认祖归宗的史料。

相关的史料，全部指向了世宗姓郭不姓柴。

两《五代史》作者，认为周世宗姓郭

首先来看看正史记载。

宋初的《旧五代史》卷114《周书·世宗纪一》：

>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讳荣，太祖之养子，盖圣穆皇后之侄也。本姓柴氏……

晚出的《新五代史》卷12《周世宗纪》：

>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

两《五代史》在说到世宗时，都说“本姓柴氏”。什么叫“本姓柴氏”，就是说本来姓柴。两书在给世宗立传的时候，应该都是从世宗姓郭的角度来说的。因为说周世宗叫郭荣，本来姓柴，这样的逻辑是合理的。如果说周世宗叫柴荣，本来姓柴，这说不过去。

五代时期，皇帝、节度使的干儿子们一大把，所以两《五代史》在立传的时候，都有一个以姓什么的角度立传的问题。

比如后梁的朱友文，本来姓康名勤。《旧五代史》卷12《梁书·朱友文传》写道：

博王友文，本姓康，名勤。

《新五代史》卷13《朱友文传》同样写道：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

又如唐明宗李嗣源。《旧五代史》未提及其本来姓氏，不过按照《新五代史》的说法，李嗣源本无姓氏。《新五代史》卷6《明宗纪》：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世本夷狄，无姓氏。

再如唐末帝李从珂，本来姓王。《旧五代史》卷46《唐书·末帝纪上》载：

末帝，讳从珂，本姓王氏，镇州人也。

《新五代史》卷7《废帝纪上》亦云：

> 废帝，镇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贱……

史家皆行文如此。而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没有改回本姓的。

当然，也有后来又把姓改回去的。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朱温的干儿子朱友恭，本名李彦威，后来被朱温复还本姓而赐死，因此两《五代史》都没有将其列入宗室。《旧五代史》以“朱友恭”立传，卷19《梁书·朱友恭传》称：

> 朱友恭，寿春人，本姓李，名彦威。……复其本姓名……

这里仍然用了“本姓”。而《新五代史》则以“李彦威”立传，卷43《李彦威传》：

> 李彦威，寿州人也。……冒姓朱氏，名友恭。……已而还其姓名。

就不再说是“本姓”，而是顺次说了改姓、复姓经过。

另一个例子是赵光义的老丈人符彦卿。符彦卿之父符存审，曾为晋王李克用养子，当时应称为“李存审”，符彦卿也应叫“李彦卿”。符存审死于后唐庄宗年间，本未恢复旧姓。后来符彦卿恢复了符姓，大抵是后唐灭亡以后的事。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李存审”“李彦卿”“符彦卿”分得很清楚，胡三省还作注称“李彦卿后复姓符”。这事虽然没有直接记载，但符彦卿既然是赵光义的老丈人，又有后人在宋仕官，其恢复符姓当属事实。

但一来符彦卿自己恢复了本姓，二来他又是国戚，所以连带着李存审也被恢复了本姓。两《五代史》的行文，都明确以“符

存审（字德详）”来为他立传，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写他“本姓符”了。

所以可以明确说，两《五代史》的内文认为周世宗姓郭不姓柴。

那么又有人说，两《五代史》的目录上，不是明明写着“世宗柴荣”吗？

这个，大概是个误会。

《新五代史》现存较早版本之一，是由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根据影印南宋庆元本，配备北宋残本而成的“百衲本”。这个本子应该很接近欧阳修版本的《新五代史》原本的模样。而百衲本的《新五代史》目录上，根本没有“柴荣”二字。同样，明朝的毛本、万历南监本，清朝的殿本、文渊阁四库本也没有。

《旧五代史》原本已佚，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由四库馆臣邵晋涵等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又根据其他史料最终整理而成。现在的《旧五代史》并非宋初成书时的原貌，但是清朝的殿本、文渊阁四库本的目录里，也没有“柴荣”二字。

笔者能看到的版本其实很少，不能以偏概全。但从百衲本、毛本、南监本《新五代史》和殿本、文渊阁四库本《旧五代史》来看，无论宋人欧阳修，还是清人邵晋涵，乃至可能包括以薛居正领衔的宋初史官（其代表了宋初朝廷立场），都是以周世宗姓郭的角度来写《周世宗纪》的。

国号没有改，因为没认祖

后周国号的由来，太祖郭威自己说得清楚：

> 朕本姬室之远裔，虢叔之后昆，……今建国宜以大周

为号。（《旧五代史》卷110《周书·太祖纪一》）

简单来说，就是周武王封了自己叔叔虢叔于西虢，“虢”“郭”同音，后裔逐渐以“郭”为氏。

所以说，后周之所以叫“周”，那是因为皇帝姓郭。

再看柴姓，本是齐文公子高之后，出自姜姓，跟出自姬姓的郭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周世宗恢复了柴姓，那么必然要把与郭姓关联的国号“周”改掉。虽然不一定要选一个跟柴姓有关的国号，但绝不会用周。

显然，周世宗没有改国号，也就没有否认自己是郭姓子孙，那谈何恢复本姓？

亲爹当舅舅，因为没归宗

周世宗恢复柴姓，除了国号问题，还面临一个祖先问题。

五代时期，养子称帝后认祖归宗的也确实有。一个是后唐明宗李嗣源，一个是南唐烈祖李昇。

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他认祖归宗这事，史书没明确说。但李嗣源称帝以后，就把自己的亲爹、亲爷爷、亲曾祖、亲高祖全都追尊为帝，可见嗣源认为这些才是自己的祖先。不过他家本是少数民族，没有姓氏，所以他虽然认了祖宗，却没有可改的本姓，而是把祖宗全改姓了李——认为自己仍然与李克用、李存勖同属一家。

至于南唐烈祖李昇，本名徐知诰，是原南吴权臣、齐王徐温的养子。徐温死后，徐知诰先是袭爵齐王，进而称帝。两《五代史》说他先称帝建齐，两年后恢复李姓，改国号唐；《资治通鉴》说他直接建国号唐，两年后恢复李姓。

先不管李昇改没改国号。李昇恢复李姓，是三部史书共同记

载的。在李昇仍然叫徐知诰的时候，他追尊徐温为帝，庙号太祖，认为自己是徐氏后人。可是一旦恢复李姓，他就改认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为祖先，追尊父祖四代为帝（虽然后人多认为，他跟唐朝宗室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而原来的太祖徐温，庙号就变成了义祖——这个庙号，放在这里的特殊语境下，就像是“义子”的“义”一样，分明在说自己跟徐温不是血亲。

从这个角度讲，李昇最初称帝时，确实国号为齐，因为“齐”与徐温相关联。一旦改了李姓，改了祖宗，国号也就顺理成章变成了“唐”。

而周世宗呢？如果他真的恢复了柴姓，他那还活着的亲爹柴守礼，怎么也应该是个太上皇；他的爷爷、曾祖、高祖也很有可能是要追尊为皇帝的。

然而事实是，周世宗在东京开封继位，柴守礼却住在西京洛阳。而且终世宗之世，柴守礼未曾踏入开封半步，估计是怕尴尬，身边的人也根本没人敢提他是周世宗亲爹的事。由于他是郭威之妻柴氏的哥哥，所以周世宗和后周上下都待他以元舅之礼。

如果周世宗认祖归宗了，那还用得着拿着亲爹当舅舅吗？

何况我们知道，古代皇帝是有避讳的。不仅要避讳自己，还要避讳自己的那帮被追认为皇帝的祖宗。世宗三征淮南，逼得南唐主李璟割地求和。李璟对后周称臣，为了避后周国讳，改名李景，这是《旧五代史》所记。而所避的“璟”字，恰恰是郭威的高祖父、被追尊为帝的郭璟的名字。

而周人记录辽穆宗耶律璟，同样因为避讳而写作耶律明。

如果世宗改回了柴氏，认了柴姓祖先而非郭氏，那么这些避讳就大可不必了，反倒是“守”“礼”，应该被天下避讳才是。

司马光力争世宗姓郭

《宋史》卷119《礼志二十二·宾礼四·录周后》记载了一件好玩儿的事。

宋仁宗时，开始大规模录用柴氏子孙为官，并以其中最长者、柴守礼的孙子，也就是世宗的亲侄子柴咏为崇义公，以为周室之后。周太祖郭威的直系子孙，早在后周建立前夕就已经被后汉隐帝斩尽杀绝；周世宗的后代也已经或去世或失踪（《宋史·礼志》记有世宗孙，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当是侄孙）。于是，录用的柴氏子孙就皆非周世宗的直系。

到神宗时，司马光提出一个问题：

> 崇义公柴咏祭祀不以仪式。周本郭姓，世宗后侄，为郭氏后。今存周后，则宜封郭氏子孙以奉周祀。

说周本为郭姓，世宗原来是皇后的侄子，是过继给郭威作后代的。现在要供奉周室，也应该是封郭氏子孙，而非柴氏。

言外之意，后周国姓是郭。太祖郭威姓郭，世宗是太祖之后，当然也姓郭。

司马光这番话透露出一个事实：后周的皇帝一直都姓郭。如果后周时世宗就恢复柴姓了，那么后周国姓也就由郭姓变为柴姓，那么作为周室后代的崇义公，根本没有姓郭姓柴的问题，反正二者皆可。而正是因为世宗没有复姓柴氏，所以周室的国姓只有郭这一个姓，没有柴姓。这才出现了司马光的疑问。

对此，王安石则认为：

宋受天下于世宗，柴氏也。

神宗说：

为人后者为之子。

王安石又说：

为人后于异姓，非礼也。虽受天下于郭氏，岂可以天下之故而易其姓氏所出？

宋神宗认为，周世宗既是郭威之后，那就是他儿子，是他儿子自然姓郭不姓柴。王安石却咬死了世宗姓柴，但也承认后周是姓郭的，所谓“受天下于郭氏”。柴氏说的是世宗的个人身份，郭氏说的是后周的国姓。

王安石认为继世宗之后，必须是柴氏，而非郭氏，大概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其一，宋太祖的誓碑说：“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太祖之世，世宗之后要么去世，要么托付给大臣改名抚养。所谓“柴氏子孙”，更多的是与世宗有血缘、却非直系的亲属。王安石虽然看不到誓碑，但保护柴氏既然是一种国策，仁宗亦已录用柴氏宗族，则当时宋廷认柴氏不认郭氏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

其二，自太祖而神宗，百年间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或许就包括宋廷暗中让世宗从郭姓回归柴姓，以减少其作为周室宗族的某种政治影响力。又或许，这样的异姓袭位，能够更好地为大宋皇帝们的得位不正洗白。比如异姓篡位的太祖赵匡胤，又比如说不清楚怎么继位的同姓太宗赵光义。——前朝世宗是异姓继位，我们

兄弟的皇位还有什么问题！

总之，无论是国策，还是阴谋，宋廷都是倾向于照顾柴氏、承认柴氏，而不是郭氏。上行下效，也就难怪太宗朝进士陶岳，在真宗时完成的《五代史补》一书中，已经称世宗为柴氏了。（据该书记载，高平之战时，刘崇说："柴氏与吾……"当然，刘崇这话也可能是原话。敌国称世宗为柴氏，也不排除故意贬低的可能。这反而不足以证明其时世宗一定改姓柴了。）

即便如此，司马光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资治通鉴》里，当世宗称帝前，司马光一律写作"郭荣"而非"柴荣"；世宗称帝后，更没有恢复柴姓的记载——既然从来没有发生过，又让温公如何写得？

参考文献

一、史料

史部

纪传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宋]薛居正等撰，陈尚君修订：《旧五代史》，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

[宋]欧阳修撰，陈尚君修订：《新五代史》，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宋]王称：《东都事略》，《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版。

[元]脱脱等：《辽史》，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

编年

[宋]钱若水撰，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

[宋]李心传撰，胡坤校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

[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华书局2006年版。

纪事本末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清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杂史

［宋］王禹偁：《五代史阙文》，《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宋］陶岳：《五代史补》，《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宋］欧阳修：《归田录》，《渑水燕谈录·归田录》合刊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曾巩撰，王瑞来校正：《隆平集校证》，中华书局2012年版。

［宋］侯延庆：《退斋笔录》，《全宋笔记》（第三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王琪：《国老谈苑》，《丁晋公谈录（外三种）》合刊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

载记

［宋］郑文宝：《南唐近事》，《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宋］陈彭年：《江南别录》，《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宋］史温：《钓矶立谈》，《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宋］龙袞：《江南野史》，《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宋］郑文宝：《江表志》，《全宋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宋］马令：《南唐书》，《南唐书（两种）》合刊本，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

［宋］陆游：《南唐书》，《南唐书（两种）》合刊本，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

［宋］张唐英：《蜀梼杌》，《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宋］佚名：《吴越备史补遗》，《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

年版。

［宋］佚名：《五国故事》，《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宋］路振：《九国志》，《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2010年版。

［清］周春撰，胡玉冰校补：《西夏书校补》，中华书局2014年版。

［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史评

［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李贽：《史纲评要》，中华书局1974年版。

［清］王夫之撰，刘韶军译注：《宋论》，中华书局2013年版。

［清］李塨：《阅史郄视》，清光绪五至十八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刻三十二年汇印畿辅丛书本。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订补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传记

［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1986年版。

政书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

［元］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

［宋］王溥：《五代会要》，历代会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宋］李攸：《宋朝事实》，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唐］长孙无忌等撰，岳纯之点校：《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宋］窦仪等详定，岳纯之校证：《宋刑统校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诏令奏议

［宋］佚名编：《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明永乐十四年内府刻本。

地理

［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
［宋］辛怡显撰，王叔武辑校：《至道云南录》，《云南古佚书钞》（增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宋］吴自牧：《梦粱录》，《全宋笔记》（第八编），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宋］陆游：《入蜀记》，《全宋笔记》（第五编），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旧题元］徐大焯：《烬余录》，清光绪望炊楼丛书本。

方志

［宋］马光祖修，［宋］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影印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寀卢村志》编纂委员会编：《寀卢村志》，1999年版。

金石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郭茂育、刘继保编著：《宋代墓志辑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目录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清嘉庆二十四年汪士钟艺芸书舍重刻宋衢州本。

子部

儒家

［宋］程颐、［宋］程颢撰，［宋］朱熹编：《程氏遗书》，《朱子全书外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宋］张载撰，［宋］朱熹注：《张子全书》，清康熙至乾隆刻光绪二十三年朱衡重印朱文端公藏书本。

兵家

［明］何良臣：《阵纪》，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术数

［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浙江巡抚采进本。

艺术

［宋］佚名：《宣和画谱》，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佚名：《宣和书谱》，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郭若虚撰，吴企明校注：《图画见闻志校注》，中国书画基本丛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版。

［明］汪芝辑：《西麓堂琴统》，嘉靖二十八年抄本。

［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年版。

谱录

［宋］佚名：《砚谱》，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李孝美：《墨谱法式》，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杂学杂说

［宋］杨亿：《杨文公谈苑》，《全宋笔记》（第八编），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宋］孔平仲：《孔氏谈苑》，《丁晋公谈录（外三种）》，中华书局2012年版。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

［宋］龚鼎臣：《东原录》，《全宋笔记》（第八编），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宋］苏辙：《龙川别志》，《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合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

［宋］赵令畤：《侯鲭录》，《侯鲭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合刊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

［宋］刘延世：《孙公谈圃》，《丁晋公谈录（外三种）》合刊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

［宋］朱弁：《曲洧旧闻》，《全宋笔记》（第三编），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2012年版。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宋］徐度：《却扫编》，《全宋笔记》（第三编），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全宋笔记》（第五编），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宋］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

［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

［宋］周煇：《清波别志》，《全宋笔记》（第五编），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宋］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全宋笔记》（第八编），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宋］陈郁：《藏一话腴》，《全宋笔记》（第七编），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

杂考

[宋]程大昌撰，刘尚荣整理：《演繁露续集》，《全宋笔记》（第四编），大象出版社2008版。

[元]袁文撰，李伟国点校：《瓮牖闲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明]方以智：《通雅》，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杂记

[宋]潘汝士：《丁晋公谈录》，《丁晋公谈录（外三种）》，中华书局2012年版。

[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全宋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宋]范镇撰，汝沛点校：《东斋记事》，中华书局1980年版。

[宋]文莹：《湘山野录》，《湘山野录·续湘山野录·玉壶清话》合刊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宋]文莹：《续湘山野录》，《湘山野录·续湘山野录·玉壶清话》合刊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宋]文莹：《玉壶清话》，《湘山野录·续湘山野录·玉壶清话》合刊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版。

[宋]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渑水燕谈录·归田录》合刊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张舜民：《画墁录》，《全宋笔记》（第二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宋]王巩：《闻见近录》，《全宋笔记》（第二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宋]王巩：《随手杂录》，《全宋笔记》（第二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全宋笔记》（第二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宋］李廌：《师友谈记》，《全宋笔记》（第二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宋］袁褧：《枫窗小牍》，《全宋笔记》（第四编），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宋］王铚撰，朱杰人点校：《默记》，《默记·燕翼诒谋录》合刊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全宋笔记》（第六编），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

［宋］王明清：《挥麈余话》，《全宋笔记》（第六编），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全宋笔记》（第六编），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

［宋］邵博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宋］陆游：《避暑漫抄》，《全宋笔记》（第五编），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

杂纂

［宋］陶穀：《清异录》，《全宋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宋］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宋］江少虞辑：《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类书

［宋］王钦若、［宋］杨亿撰，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永乐大典本。

［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明嘉靖十六年白坪刻本。

集部

总集

［宋］杜大珪辑，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别集

［南唐］李璟、［南唐］李煜撰，王仲闻校订，陈书良、刘娟笺注：《南唐二主词笺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

［南唐］徐铉撰，李振中校注：《徐铉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本。

［宋］田锡撰，罗国威校点：《咸平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

［宋］柳开撰，祝尚书校注：《柳开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

［宋］王禹偁：《小畜集》，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鸿胪寺少卿曹学闵家藏本。

［宋］宋祁：《宋景文集》，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抄永乐大典本。

［宋］包拯：《包孝肃公奏议》，清道光二十九年至光绪十一年南海伍氏刻光绪十一年汇印粤雅堂丛书本。

［宋］张方平：《乐全集》，清抄本。

［宋］苏舜钦：《苏学士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宋］蔡襄：《蔡忠惠集》，清雍正十二年蔡氏逊敏斋校刻本。

［宋］陈襄：《古灵集》，宋绍兴三十一年陈辉刻本。

［宋］韩维：《南阳集》，清乾隆四库全书抄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宋］苏辙撰，曾枣庄点校：《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宋］晁补之：《鸡肋集》，明崇祯八年吴郡顾凝远诗瘦阁仿宋刻本。

［宋］吴泳：《鹤林集》，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金］元好问：《元好问全集》，三晋出版社2015年版。

诗文评

［宋］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左氏百川学海本。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江苏巡抚采进本。

绘画

［南唐］顾闳中绘：《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苏汉臣绘，［元］钱选临摹：《宋太祖蹴鞠图》，上海博物馆藏。

二、论著

专著

综合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王曾瑜：《王曾瑜说辽宋夏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杜文玉：《南唐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段玉明：《大理国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政治与制度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闫建飞：《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版。

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5卷“隋唐五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昌宪：《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版。

梁天锡：《枢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张其凡：《宋代政治军事论稿》，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版。

黄宽重：《政策·对策：宋代政治史探索》，（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2年版。

军事与外交

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

陈高华、钱海皓总主编，王晓卫分卷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兵役制度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

（美）龙沛著，康海源译：《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

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陶晋生：《宋代外交史》，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

（日）山口智哉、（美）李宗翰、（美）刘祥光、（美）陈韵如、（美）柳立言编著：《五代武人之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

经济与文化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第1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 公元前7世纪—1869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朱瑞熙、刘复生、张邦炜、蔡崇榜、王曾瑜：《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

地理与气候

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日）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人物

（日）竺沙雅章著，方建新译：《宋朝的太祖和太宗：变革时期的帝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张家驹：《赵匡胤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王育济、范学辉：《宋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顾宏义：《宋太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张其凡：《宋太宗》（第2版），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文集

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邓广铭：《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丁则勤、尚小明编：《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

聂崇岐：《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

顾宏义：《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张家驹：《张家驹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论文

汪槐龄：《柴荣与宋初政治》，《学术月刊》1980年第7期。

张其凡：《五代后周禁军考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万点：《五代后周的军队改革》，《军事历史》1991年第2期。

王永平：《后周政治改革述论》，《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真理杂志》1944年第1卷第1期；收入氏著《邓广铭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邓广铭：《赵匡胤的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21号；收入氏著《邓广铭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李裕民：《赵匡胤是怎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王育济：《世宗遗命的匿废与陈桥兵变》，《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顾吉辰：《论后周末年的一场政治谣言：兼论赵匡胤上台》，《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

王育济：《论“陈桥兵变”》，《文史哲》1997年第1期。

杨洪权、丁鼎：《漫议后周“都点检”之职与“点检作天子”之谶：兼与顾吉辰先生商榷》，《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孟庆鑫、范喜茹：《略论周世宗安排的辅政格局》，《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孟庆鑫、陈玉峰：《论北宋初期殿前司、侍卫司高级将帅与后周政权的灭亡》，《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顾宏义：《赵普〈龙飞记〉考略》，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等编《徽音永著：徐规教授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收入氏著《宋事论

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赵瞳：《谶纬与陈桥兵变》，《中州学报》2017年第2期。

闻轩轩：《宋太祖霸府僚佐与宋初的政治格局》，《宋史研究论丛》第31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日）谷川道雄：《关于北朝末期至五代的义兄弟结合》，《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2辑；中译本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顾宏义：《〈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原因试探》，《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收入氏著《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惠冬、张其凡：《“失败者”的历史：陈桥兵变新探》，《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3卷第5期。

惠冬：《韩通死事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8卷第7期。

李裕民：《周世宗皇子失踪之谜：赵匡胤政治权谋揭秘》，《浙江学刊》2013年第4期。

王育济：《“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文史哲》2006年第5期。

田志光：《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田志光：《北宋前期中书宰辅在政令颁行中的权力运作》，《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3卷第3期。

田志光：《北宋前期宰相本官与兼官制度考论》，《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李鸿宾：《五代枢密使（院）研究》，《文献》1989年第2期。

李郁：《五代枢密使和枢密院初探》，《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

戴显群：《五代的枢密使》，《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

曾维君：《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陈元锋：《宋太祖朝翰林学士述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郜玉乐：《两宋翰林学士出任外交使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范学辉：《三司使与宋初政治》，《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赖瑞和：《论唐代的检校官制》，《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

杨倩描：《宋代检校官的源流及其嬗变》，《宋史研究论丛》第12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夏丽梅：《试论宋代检校官制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4卷第2期。

杜文玉、李洪涛：《五代立法与司法制度初探》，《思想战线》1986年第4期。

李惠娜：《宋代直诉制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黄纯艳：《宋代登闻鼓制度》，《中州学刊》2004年第55卷第6期。

齐源：《浅论宋初严法治赃吏》，《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金中枢：《宋初严惩赃吏》，《宋史研究论丛》第12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程民生：《北宋探事机构：皇城司》，《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汪辉：《两宋皇城司制度探析：以其探事职能的拓展及人员的管理为主》，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范学辉：《从崩溃到重建：论宋太祖时期的武德司》，《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王文宾：《宋代外事馆驿考》，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丁则良：《杯酒释兵权考》，《人文科学学报》1945年第1卷第3期；收入丁则勤、尚小明编《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燕京学报》1948年第34期；收入氏著《宋史丛考》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蒋复璁：《宋代一个国策的检讨》，《宋史研究集》1958年第1辑。

方建新、徐规：《“杯酒释兵权”说献疑》，《文史》1982年第14辑。

柳立言：《“杯酒释兵权”新说质疑》，《大陆杂志》1990年第80卷第6期。

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范学辉：《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

马驰：《析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对宋朝发展的影响》，《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2卷第11期。

顾宏义、孙建民：《宋初大将自晦现象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收入顾宏义《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刘冲：《五代宋初军政职官制度与人事变迁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龚延明：《宋代军权三分制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2卷第4期。

王军营：《北宋皇宫宿卫禁军诸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王军营：《两宋皇宫宿卫禁军基本组成考论》，《军事历史》2022年第5期。

袁征：《宋初驭将政策的重要变化》，《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王云裳：《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及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5卷第1期。

任崇岳：《关于抗辽名将杨业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2期。

何冠环：《论宋太祖朝武将之党争》，《中国史学》1995年第5卷；收入氏著《北宋武将研究》，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

何冠环：《宋太祖的从龙功臣李处耘（920—966）》，《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何冠环：《北宋外戚将门陈州宛丘符氏考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7年第17期。

胡坤：《符氏家族与宋初政治》，《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顾宏义：《宋太祖心腹武将张琼死因探析》，《宋史研究论丛》第8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收入氏著《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岳东：《宋初的河朔集团》，《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41卷第3期。

程民生：《简述宋代募兵制的根源及确立》，《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

姜锡东：《北宋的兵源与募征》，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及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2002年。

范学辉：《募兵制度与北宋的“百年无事”》，《理论学刊》2005年第3期。

范学辉：《变法与变意：宋太祖募兵制度改革刍议》，《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

陈长征：《唐宋之际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004年。

李晓芳、李亚：《五代时期的魏州大名府浅析》，《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3卷第4期。

（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日本）《史学杂志》1959年第68编第12号。

（日）日野开三郎：《五代镇将考》，（日本）《东洋学报》1938年第25卷第2号；中译本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

盛险峰：《五代典章制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孙梦驰：《北宋前期班序制度初探》，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姜锡东、史泠歌：《北宋大朝会考论：兼论“宋承前代”》，《河北学刊》2011年第31卷第5期。

尹高林：《北宋宴饮活动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马明达：《宋朝的玉津园宴射》，《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王德利：《宋代的玉津园》，《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14卷第5期。

柳立言：《从御驾亲征看宋太祖的创业与转型》，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刘长东：《宋太祖受禅的佛教谶言与宋初政教关系的重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陈尚君：《五代：政治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文汇报》2015年6月26日第T06版。

惠冬：《“真主”观念与五代政局嬗变》，《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3卷第6期。

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范学辉：《释宋太祖“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张弛：《乱世潜流：五代时期的武人读书现象》，《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33卷第5期。

蒲圣：《从“措大”到“赤老”：五代宋初文武地位的转变》，《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6卷第1期。

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7期；收入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杜文玉：《宋太祖誓碑质疑》，《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1期。

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顾宏义：《岳飞之死与宋太祖“不杀大臣”誓约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收入氏著《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王曾瑜：《宋太祖的秘密誓约和政治文明》，《王曾瑜说辽宋夏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刘浦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文史》2010年第3辑。

杨海文：《“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学术月刊》2010年第42卷第10期。

张希清：《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文史哲》2012年第2期。

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李峰：《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新论：兼与张希清、刘浦江等先生商榷》，《史林》2012年第6期。

李合群：《北宋东京太庙誓碑有无辨》，《开封大学学报》2014年第28卷第4期。

（美）蔡涵墨撰，陈元译：《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

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收入氏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

邓小南：《宋代“祖宗之法”治国得失考》，《人民论坛》2013年第16期。

尹承：《乱世的逻辑：五代皇位传袭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8期；收入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真理杂志》1944年第1卷第2期；收入氏著《邓广铭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蒋复璁：《宋太宗晋邸幕府考》，《宋史研究集》1966第3辑。

蒋复璁：《宋太祖时太宗与赵普之政争》，《宋史研究集》1974年第7辑。

施秀娥：《宋太宗继统考略》，《齐鲁学报》1989年第6期。

刘子健：《宋太宗与宋初两次篡位》，《宋史研究集》1990年第20辑。

侯杨方：《宋太宗继统考实》，《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刘安志：《近年来“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95年第1期。

蒲章臻：《“烛影斧声”“金匮之盟”：宗室政策视角下的太宗继位问题》，《池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34卷第4期。

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史学季刊》1941年第1卷第2期。

李裕民：《揭开“斧声烛影”之谜》，《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顾吉辰：《“烛影斧声”辨析》，《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

王瑞来：《“斧声烛影”事件新解》，《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王瑞来：《“烛影斧声”与宋太祖之死》，《文史知识》2008年第12期。

顾宏义：《“晋王有仁心”说辨析：兼及宋初“斧声烛影”事件若干疑问之考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7卷第2期；收入氏著《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邓广铭：《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收入氏著《邓广铭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王育济：《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文史哲》1994年第2期。

王育济：《“金匮之盟”真伪考：对一桩学术定案的重新甄别》，《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何冠环：《“金匮之盟”真伪新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15卷第3期。

顾宏义：《王禹偁〈建隆遗事〉考：兼论宋初“金匮之盟”之真伪》，《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收入氏著《宋事论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贾雁飞：《“金匮之盟”研究史》，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顾宏义：《赵德芳生母考：兼析宋朝官史失载赵德芳生母之原因》，《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张其凡：《宋初经济政策刍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4期。

葛金芳：《试论“不抑兼并”：北宋土地政策研究之二》，《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杨际平：《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杨际平：《〈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再商榷：兼答薛政超同志》，《中国农史》2010年第29卷第2期。

顾吉辰：《宋太祖税制整改简论》，《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郭洪义：《简论宋初治国策略中经济手段之运用》，《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美）贾志扬：《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李晓：《王朴、周世宗、宋太祖统一战略比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李华瑞：《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陈葆：《试论宋太祖未能攻灭北汉之原因：从“先南后北”战略的角度进行思考》，《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28卷第2期。

孟庆鑫：《后周外部形势及宋初赵匡胤的对策分析》，《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林鹤：《辽穆宗草原本位政策辨：兼评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王育济、白钢：《宋太祖遣使行刺北汉国主考》，《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何灿浩：《安定战略与南唐方镇体制的崩解》，《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何剑明：《南唐国党争与唐宋之交的社会转型》，《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何剑明：《李璟政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1卷第5期。

何剑明：《论南唐与吴越的战争及其对南唐失国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李祥俊：《潘佑变法及其对李觏、王安石学术思想的影响》，《赣南师范

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佟家江：《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李鹏：《辽穆宗时代内政外交评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1卷第6期。

王晓波：《宋太祖时期宋辽关系的变化》，《宋代文化研究》1998年。

陶玉坤：《辽宋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曹显征：《辽宋实现首次交聘之背景分析》，《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漆侠：《宋太宗第一次伐辽——高梁河之战：宋辽战争研究之一》，《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任倚步：《北宋初期宋辽战争宋军失利原因分析》，《牡丹》2016年第22期。

常强：《历史上的“子君父臣”现象（四）：周世宗柴荣与太傅柴守礼》，《紫禁城》2013年第2期。

邓广铭：《论赵匡胤》，《新建设》1957年第5期；收入氏著《邓广铭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张家驹：《赵匡胤论》，《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收入氏著《张家驹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芮和蒸：《论宋太祖之创业开国》，《宋史研究集》第5辑，1970年。

范学辉：《高平之战与赵匡胤的崛起》，《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张其凡：《关于宋太祖早年任职的三点考证》，《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收入氏著《宋代政治军事论稿》，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丁建军：《“宋太祖赵匡胤祖籍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杨倩描：《宋太祖赵匡胤家世、祖陵及籍贯》，《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张其凡：《宋太宗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王瑞来：《略论宋太宗》，《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

虞万里：《宋太宗旧名匡乂、匡义辨证：兼论简化字“义”字的产生》，《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07年第0期。

赵荣织：《后周王朴略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张其凡：《赵普早年事迹考辨》，《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年第3期。

李合群：《北宋东京布局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薛政超、夏黎晖：《南唐金陵宫城及其护龙河新探》，《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卷第1期。

姚亦锋：《南唐金陵城格局追溯》，《现代城市研究》2006年第8期。

张胜珍：《南唐金陵佛寺考辨：兼论南唐崇佛之弊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5期。

陈志平：《宋太宗与书法》，《书法》2013年第1期。

秦琴、王伟：《论李煜的书法艺术风格》，《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期。

李福顺：《中国书法史上应有李煜一席之地》，《艺术百家》2011年第27卷第4期。

侯妍妍、石翠仙：《南唐后主李煜的书法成就述考》，《兰台世界》2012年第21期。

张磊：《李后主与澄心堂纸》，《图书馆》2004年第3期。

刘仁庆：《论澄心堂纸：古纸研究之八》，《纸和造纸》2011年第30卷第5期。

沈果孙：《宋太宗所作的是围棋势：兼评李浚同志〈宋太宗有棋局创作〉一文》，《体育文史》1984年第6期。

何云波：《〈忘忧清乐集〉与北宋东京的围棋记忆》，《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4卷第4期。

马明达：《武术史上的宋太祖》，《文史知识》2000年第7期。

刘连洋：《宋太祖长拳考略》，《精武》2006年第8期。

王忠海：《宋太祖与盘龙棍》，《武当》2008年第8期。

郑红玲、申凯：《赵匡胤及其棍术对北宋体育发展的影响》，《兰台世界》2013年第30期。

张其凡：《校点本〈旧五代史〉献疑（九则）》，《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

后记

十年前，我着手撰写我的第一本书《武夫仁心：太平天子赵匡胤》，虽然写的是赵匡胤的传记，但实际上大体写的就是宋朝的开国史。十年一个轮回，没想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宋朝开国的话题。

最初的想法是将《武夫仁心》改一改，作为《缔宋》重新出版。可是着手修改前作时才发现，“旧书改造”无比困难。一是需要填补一些内容；二是需要吸收十年间新的学术成果；三是现在看来，《武夫仁心》还比较稚嫩，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了。我甚至动过重写的念头，但由于今年的工作事务异常繁重，完全重写恐怕要耽误出版时间。思来想去，最后只好在《武夫仁心》的基础上，做一番大的修改，具体包括补遗、更新、删冗三个方面。

先来说补遗。这次补充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补充了涿郡赵氏（尽管赵匡胤祖籍有争议，为了行文方便，姑且还是这样称呼吧）早期的经历，以及涿郡赵氏所在的幽州镇的简史。尽管在本书中呈现的内容并不多，但却是笔者数次精简，删而又删的结果。

涿郡赵氏早期的经历其实并不十分清晰，但尽量发掘这段历史仍然大有裨益。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家族，这种传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赵匡胤、赵光义兄弟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

又通过皇帝的权力最终作用于王朝的权力结构。虽然宋朝开国之初带有浓重的五代色彩，赵匡胤本人与读书人、士大夫也有着不可弥合的疏离感，但涿郡赵氏这种允文允武的传统，使得宋朝在开国之际就表现出了一种宽仁的气象，而不像某些朝代的开国史那样戾气颇重。当然，这种在家族内传承的文化传统，也不宜过分拔高，宋代史料中将涿郡赵氏打扮成一个儒学世家，显然也是统治者粉饰的结果。

涿郡赵氏早期的家族史，同时也映射着幽州镇的历史。通过这段家族史的梳理，笔者也简要把藩镇制度的来龙去脉尽量说清楚，特别是说明唐后期与唐末五代的联系与不同，也算是“缔宋”的一个宏观背景介绍。毕竟，宋朝开国针对的很多问题，要追溯到五代甚至中晚唐。“缔宋”经历了周太祖、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乃至宋真宗时期的漫长过程。此外，宋朝开国之初，文武将相中有大量河北人，其中包括不少祖籍在幽州军镇者。因此，唐后期与五代时期幽州镇的风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宋朝开国的格局。只是由于篇幅所限，这一部分未在书中展开，希望日后有机会专门阐述这个问题。

补遗的第二部分是后周以来禁军的“殿前化”，这其实也是一个偶然发现。笔者在梳理后汉、后周、宋初禁军两司三衙的中高级统兵官时发现一个现象：郭威建立后周后，将作为基本盘的那一小部分将领全部安置在殿前诸班中，而且其在位时，这些人都没有进入侍卫亲军。直到郭荣继位后，才在密集的军事胜利中，将以殿前诸班将领为主的嫡系将领，不断送入侍卫亲军，通过这种方式来实际控制侍卫亲军。也正是基于这一发现，笔者认为过去一直被视为郭威心腹的韩通，在后周前期并没有被皇帝视为嫡系，因为他始终没有进入殿前诸班，甚至在郭威病重后直接将其罢免军职。这些发现，为审视周宋鼎革之际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

龙沛在《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一书中，提到在宋朝创建

过程中，包括周世宗、宋太祖等皇帝，都是通过军事胜利来达成政治目的的。尽管他在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但是他的表述仍然给人启迪。此外，已故宋史学者范学辉先生在《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中提到，郭威、郭荣全力扶持殿前系，对侍卫亲军持续打压，导致侍卫亲军将士对于后周皇帝、后周王朝的命运全然不顾。这些观点再结合我前面提到的发现，便形成了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后周禁军“殿前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侍卫亲军的中高级统兵官全部被殿前系将领替代，殿前系也走出了自己的皇帝——赵匡胤。

考虑到本书是一部通俗作品，所以对禁军“殿前化”的阐述尽量点到为止。其实这部分内容是写了删，删了写，笔者既希望能把禁军“殿前化”说清楚，又不希望行文太过枯燥让人不忍卒读。而相关的详细内容，我计划在日后单独写一部《大宋前夜：禁军殿前化与周宋之际政局》来专门阐述。

当然，严格来说，禁军“殿前化”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发现”。它的本质，是皇帝为了控制军队，将自己的私人卫队国家化，最终取代国家军队的过程。被“殿前化”的侍卫亲军，其实也曾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只是一旦私人卫队变成了朝廷军队，皇帝为了牢牢控制军权，便又将新的私人卫队拿出来继续国家化，而朝廷原来的国家军队又被这支私人卫队同化，直至被替代。宋朝建立后，随着禁军“殿前化”的完成，新的私人卫队果然又在成为国家军队的殿前军之外出现，这就是武德司（皇城司）执掌的亲事官和亲从官。这其实与历代皇帝搞内朝，再用内朝官员取代宰相是同一个进程，都是皇帝用私人班底取代朝廷班底，从而实现个人对朝廷控制、化家为国的目的。

补遗的最后一部分，是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期的部分内容。宋朝的缔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起点在周太祖时，终点则在宋真宗时。在这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央从枢密院体制演变为二府三司

制，地方由藩镇体制演变为路制和知州制，军队在禁军“殿前化”的进程中形成枢密院—三衙—皇城司—军头司体制，科举时代拉开帷幕，新的经济政策逐渐定型，外交上也由收复幽燕转变为澶渊之盟。一本书的容量有限，对这漫长的过程无法面面俱到。本书还是将重点放在了周太祖、周世宗、宋太祖时期，也就是缔宋的前半部分——“去五代化”的时期。而宋太宗、宋真宗时期，也就是缔宋的后半部分，受篇幅所限，仅在最后一部分简略提及。

除补遗以外，另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是更新。近年来，史学界对五代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从唐后期到北宋前期，政治体制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的。或者换句大家听得懂的话，就是藩镇割据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成宋朝空前的中央集权的。当初写《武夫仁心》，这部分写得不明不白，似乎一切变化也不过是靠着赵匡胤、赵普几个人一两个点子扭转过来的。这次特别对相关的阐述做了更新，同时对过去理解不到位甚至错误的问题也做了纠正，希望能以尽量精简的文字，为读者朋友呈现出更为完整的历史进程。

最后一个工作是删冗。如果说在涉及史学观点、制度演变等内容方面，这次做了大量修改，那么在故事描述上，本书大体还是沿用了《武夫仁心》的内容。只不过今天看来，《武夫仁心》存在内容繁冗的问题；句子也不够精练，这次对相关内容做了大量删改，希望能够提升大家的阅读体验。

不过删冗也是相对的，有些内容仍有进一步修改的必要。另外，由于史料溯源与梳理工作没有全部完成，在个别史料的使用上仍有缺陷（如数次直接使用了《十国春秋》而未对其内容溯源）。但因时间紧迫，这些工作也只好留待以后再完成了。

书中涉及部分对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的模拟，这次仍然按照《武夫仁心》的惯例，史料中有的便标注引号，史料中没有的，完全是笔者模拟的，则不使用引号，以示区分。

本书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朋友悉心指正，不吝赐教。

最后，感谢本书的编辑为此书付梓付出的大量心血。

感谢多年来各位老师、朋友对我的批评指正与无私帮助。

感谢父母，感谢爱妻李田燕和女儿小米乐，感谢家人对我的付出与一如既往的支持。

刘路

2023年10月24日于京